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第二辑）

主编 石仲泉 萧延中



毛泽东传（上）

插图本

【俄】亚历山大·潘佐夫 著

卿文辉 崔海智 周益跃 译 崔海智 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书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第二辑）

主编 石仲泉 萧延中



毛泽东传（上）

插图本

MAO ЦЗЭДУН

【俄】亚历山大·潘佐夫 著

Александр Вадимович Панцов

卿文辉 崔海智 周益跃 译 崔海智 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编委会

顾问 逢先知 龚育之 冷 溶 朱佳木
李忠杰 金冲及 石仲泉 李君如
李 捷 陈 晋

主编 石仲泉 萧延中

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牛大勇	石仲泉	许纪霖	朱学勤
任剑涛	杜 蒲	张小劲	张 宁
张 鸣	李向前	宋新宁	周蔚华
郑 谦	庞 松	贺耀敏	高 华
黄嘉树	萧延中	景跃进	程 农

总 序

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 20 世纪最为重要的政治家、革命家和思想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天才诗人。由于他对现代中国之思想、制度和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也由于他对建构 20 世纪国际政治格局做出的重要贡献，几十年来，对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体系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具有长久意义的学术领域。毛泽东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尽管国外的毛泽东研究在理论目标、分析方式、社会功能和学术立场等方面与国内存在差异，但在全球化的宏观视角下，其研究成果，应当被看作整体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与国内毛泽东研究一起，对这一学术领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基于这样的一种视阈和理解，我们在众多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学术著作中，精选翻译了部分佳作，编成“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以纪念这位旷世伟人，并进一步推进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深入扩展。我们选译的基本原则是，站在 21 世纪全球化的历史视野上，严格遵奉学术理据和研究逻辑，精选经过历史检验，具有较强理论价值和持久性影响，持论较为公允客观，论说严谨缜密的名著。对于那些具有严肃治学精神和审慎推理论证的作品，即使与我们的学术观点不尽一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观念冲突，也在选择范围之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希望把这一睿智古训真正转变为学术行动。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中国政治研究”课题的一个子项目，是这个教学科研共同体集体努力的成果之一。我们期望这次翻译的几部著作不是译介编研工作的结束，而是一项系统科研工程的开始。我们愿意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

在“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出版之际，我们首先感谢以下诸教授：

本杰明·I·史华慈 (Benjamin I. Schwartz)；

斯图尔特·R·施拉姆 (Stuart R. Schram)；

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Jr.)；

莫里斯·迈斯纳 (Maurice Meisner)；

约翰·布莱恩·斯塔尔 (John Bryan Starr);

布兰特利·沃马克 (Brantly Womack);

罗斯·特里尔 (Ross Terrill);

杨炳章 (Benjamin Yang)。

这些教授不仅慷慨允诺让我们翻译其各具特色的学术名著，而且其中不少人专此为“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撰写了“中文版序言”，这无疑是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

国内毛泽东研究的著名学者逢先知、龚育之、冷溶、朱佳木、李忠杰、金冲及、李君如、李捷和陈晋等教授，不仅慨然允诺担任本译丛的学术顾问，而且多次对翻译工作给予指导，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李君如教授还就统一国外著者的译名作了专门指导，使翻译工作避免了不少差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的专家们，在学术方向上的直接指导以及在史料的校译、勘误方面所提出的大量关键性意见，使本译丛的质量有了进一步提高。来自国家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著名高校的编委们，从不同学科的多元视角，为选编工作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工作人员前此的开拓性研究和贡献，不仅给予编选以诸多经验和启发，而且直接为具体的译介工作提供了宝贵的便利条件。在此，我们向上述所有关心、支持本译丛的学者和单位以及图片的提供者，一并表示由衷的谢意。

对书中出现的引文，编译者采取如下的文献处理原则：凡国内有对应的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者，均已按中文版本原文进行了核校；凡确属毛泽东文稿，但未公开发表者，按相关文献进行了核校，如凡引用日本学者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和《毛泽东集》补卷者，按该书进行核校；凡属不能确定是否为毛泽东著作的引文，则尊重原作者的引文，未加处理，如凡引用《毛泽东思想万岁》和国外报刊报道的文献，一律按外文原文译出。

译介工作本是一件永远达不到尽善尽美境界的苦差，语际书写过程中的误读、遗漏和错置等都在所难免。我们恳切期望和真诚欢迎来自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的指教和批评。

石仲泉 萧延中

谨以此书纪念我的外祖父、汉学家、毛泽东传记的
第一批作者之一格奥尔基·鲍利索维奇·爱伦堡
(1902—1967)。他的著作给了我巨大的勇气和灵感。

中文版序言

1936年7月，毛泽东在他位于陕北的基地保安接受有左派倾向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之时，已是举世闻名的中国游击队领袖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之一。斯诺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但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却充满同情。当时的斯诺作为一个高产记者在中美两国的左派中间也已是大名鼎鼎。他的文章常常发表在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和美国的《星期六晚邮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和《外交季刊》等报刊上。在第一次采访毛泽东的那一年他只有31岁。与其他公开鼓吹其亲共产主义观点的驻华左翼记者不同，斯诺享有从不盲从、独立思考的声誉。正是这种“独立性”引起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的注意，遂决定利用这个有才气的年轻记者来扩大他们在国内外的知名度。

斯诺也急于见到中共领导人。他毕竟是一个职业的文字记者，深知这种会谈一定会带来轰动一时的独家新闻。早在1936年3月，他就开始探索进入中国“红区”采访的种种可能途径。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最终成为第一个当面采访了毛泽东的外国记者。

斯诺此行并非孤身探险，他还有一个同伴，此人是黎巴嫩血统的美国皮肤病专家乔治·海德姆，他后来的中国名字叫马海德。两人于7月13日抵达保安，而在两天前，毛泽东就已经到达这个小县城了。当时的毛泽东正忙于躲避蒋介石大军的“围剿”，后者是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领袖。毛领导的红军刚刚在与国民党军队的交锋中吃了大败仗。但是根据斯诺的观察，当时的毛泽东显得非常“轻松、自然和随和”，看上去就是一个英明的、有着深刻的洞察力的哲学王。被迫撤到保安这件事丝毫没有使他焦虑不安。他和他的夫人贺子珍住在一个很不舒服的窑洞里。这个窑洞是在一个黄土峁里挖的一个大洞，不管外面天气如何，这个原始的栖身处永远是又暗又湿，窑洞顶部不停地往下滴水。

“他无疑相信自己吉星高照，命中注定要做一个统治者。”斯诺后来回忆道。这个宽敞的窑洞里的各个房间不时回荡着他的大笑声加强了斯诺的这个印象。“甚至在说到自己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斯诺写道，“但是这种孩子

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目标的信念”，“毛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当然，他的农民本性也未能逃脱斯诺的观察。毛的风格简单而又有点粗鲁，他的幽默感虽不唐突，但有点低俗，“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因此，下述判断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他是如此热衷于谈话，以至于很难相信他也是一个实干家……他的分析能力同样杰出……然而，从西方人的观点来看，他也有弱点。这个弱点就是，他对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看法都受到了他所信奉的、由苏联人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①

按照他自己对斯诺的谈话请求的理解，毛首先谈了自己的少年和青年时代。这是一场持续了几个小时的通宵谈话，谈话地点是黄土高原上的一个窑洞，这种窑洞在当地是典型的民居。即使用中国的标准来看，生活在这些窑洞里的人也是相当穷的。斯诺回忆说：“我们真像搞密谋的人一样，躲在那个窑洞里，伏在那张铺着红毡的桌子上，蜡烛在我们中间毕剥着火花，我振笔疾书，一直到倦得要倒头便睡为止。”

吴亮平^②坐在我身旁，把毛泽东柔和的南方方言译成英语。在这种方言中，“鸡”不是说成实实在在的北方话的 ji，而是说成有浪漫色彩的 ghji；“湖南”不是“Hunan”，而是“Funan”；一碗“茶”变成了一碗“ts'a”；……毛是凭记忆叙述一切的，他边说我边记。^③

陕北之行结束后，斯诺乘火车返回北京，那是他在中国的常驻地。一到北平他就在美国大使馆^④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接着开始了一系列的文章和一本书的写作。1937年7—8月，毛泽东关于他本人生平的自述以自传的形式第一次公之于世，

① [美]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50、53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Edgar Snow, *Journey to the Beginning*,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8, pp. 165-168.

② 他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懂英语。

③ [美]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85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④ 原文如此。——译者注

发表在纽约的《亚洲》杂志上，这是斯诺的朋友理查德·沃尔什办的一家左派刊物。这年年底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也收录了这个自传，只是略有删节。书中有关毛的生平的那一章的标题是“一个共产党人的诞生”。这本书首版于伦敦，很快就风靡全球。^①

继这部开山之作之后，关于毛泽东，已有众多作者写了多如牛毛的文章、小册子和专著，就对毛泽东其人的描述的生动和具体而言，其中的很多作品不亚于斯诺的这本书，甚至超过了斯诺。后来还拍了许多关于毛的电影。互联网问世之后，又出现了许多以他为主题的网站。他的一生中最微不足道的细节都有人作过研究。然而，所有这些作品和研究的真实性究竟如何呢？

自20世纪60年代初苏中两党决裂以来，研究毛泽东的苏联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斯诺的一个说法，即毛信奉“苏联人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最终否定了这个结论。而早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西方和中国的大多数研究者们就已摒弃了这个说法。相反，他们断言，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早在3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就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党；而且，与中共党内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们截然不同的是，毛本人从那时起就已同莫斯科实质性地拉开了距离。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材料，许多学者指出，斯大林并不信任毛泽东，认为他与其说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不如说是一个“代表农民利益的民族主义者”。早在40年代末，包括费正清、史华慈、康拉德·勃兰特和罗伯特·诺斯在内的一批历史学家就开始鼓吹毛在与斯大林的关系上及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上的“独立性”，这一观点后来成了一个经典公式。^② 在毛的领导下出现的中国农民革命的不断高涨似乎驳斥了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本人关于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的思想。

在整个20和30年代，毛泽东从未去过莫斯科，斯大林也从未与毛有过直接接触。在此期间，克里姆林宫倒是收到了不少有关毛的负面报告，这些来自中共党内和党外的形形色色的报告称毛是“反列宁主义”的，甚至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赫鲁晓夫曾说过，斯大林认为毛是“山洞里的马克思主义者”^③。这些报告与赫氏的

^① 参见 [美]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125～180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② John Fairbank K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Conrad Brandt, Benjamin Schwartz, and John K. Fairbank,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Robert C. North, *Moscow and Chinese Communist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③ Nikita S. Khrushchev, *Memoirs of Nikita Khrushchev*, Vol. 3, trans. George Shriver, University Park, Pen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401.

上述说法倒是一致的。50年代中后期，即在苏共二十大谴责了斯大林之后，毛泽东本人也多次说过他对斯大林的一个感觉，即斯大林不信任他。^①

可悲的是，所有这些说法都离真相很远。近几年才解密的中共、苏共和共产国际的秘密档案，为破解毛泽东之谜提供了转机。这些史料长期锁在保险柜里，只是到了今天才向研究者公开。这些档案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由设在莫斯科的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保存的、从未发表过的有关毛泽东及其敌人和朋友的那部分材料。苏联解体、苏共解散之后，这个档案馆已改称“俄罗斯国立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至少同等重要的材料，还有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们的努力而于近年来得以披露的部分中共中央原始文献，后者的大部分至今仍未解密。本书就是依据这些独特的档案资料而写成的。

我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对许多朋友表示深深的谢意，没有他们的关心和善意的帮助，这本书将永远不可能付梓乃至问世。首先，我要感谢我的朋友和同事斯蒂芬·I·利文，他对我的研究出了大力，将此书从俄文译成英文。同样的感谢也要献给玛德琳·G·利文，她对我的手稿做了文字上的润色，使其更臻完美。还要感谢安德鲁·J·内森对最初的手稿所做的深思熟虑的评注。

另外，我也要向以下诸君表达我的谢意：基里尔·米哈伊罗维奇·安德森、叶卡捷琳娜·鲍里索夫娜·博格斯拉夫斯卡娅、毛泽东的侄外孙曹耘山、陈永发、格奥尔基·约瑟福维奇·切尔尼亚福斯基、蒋介石的重孙女蒋友梅、弗里德里希·伊戈里耶维奇·费尔索夫、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戈登、奥列格·亚历山德罗维奇·格里涅夫斯基、柳德米拉·康斯坦丁诺芙娜·卡尔洛娃、塔玛拉·米哈伊洛夫娜·科列索娃、毛泽东的外孙孔继宁、柳德米拉·米哈伊洛夫娜·科什列娃、李丹慧、李玉贞、林彪的女儿林立衡（豆豆）、拉里莎·尼古拉耶夫娜·马拉申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马斯洛夫、阿伦·瓦格维奇·梅里科谢托夫、尼娜·尼古拉耶夫娃·梅尔尼科娃、尼娜·斯捷潘诺芙娜·潘索瓦、拉里莎·亚历山德罗芙娜·罗格瓦雅、斯维特兰娜·马尔科芙娜·罗岑塔尔、斯蒂芬·史密特、伊琳娜·尼古拉耶夫娜·索特尼科娃、达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斯皮恰克、叶列娜·

^① *Верещагин Б. Н.* В 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 Китае. 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дипломата.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9, с. 123; *Григорьев А., Зазерская Т.* Мао Цзэдун о кита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Коминтерна и Сталина, Запись беседы П. Юд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4, №5, с. 107; Odd Arne Westad, ed.,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338-339, 340, 348, 350, 354-355.

康斯坦丁诺夫娜·斯塔罗夫洛娃、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季霍纽科、尤里·季霍诺维奇·托托奇金、沈志华、瓦列里·尼古拉耶维奇·谢皮列夫、王凡西、王福增、余敏玲和毛泽东的翻译之一资中筠。我还要感谢许多不愿意透露其姓名的中国公民，我从他们那里了解了不少他们在毛泽东统治下的生活实情。

俄文版序言

1934年秋的一天，从“碧水塘”旁第十四号院的一栋大房子里传出了电话铃声，电话中一名男子以庄重的语气找“爱伦堡”同志。这栋房子里住了三个人：东方学研究所年轻的教师格奥尔基·鲍利索维奇、他的妻子叶娃和儿子瓦季姆。但是，住在隔壁的人一拿起电话话筒就明白对方找的是乔治（这是住在这所院子里的人对格奥尔基·鲍利索维奇的称呼），因为对方称呼要找的人为“同志”。

电话是《在国外》杂志编辑部打来的，说有一个紧急任务，叫格奥尔基·鲍利索维奇·爱伦堡过去一下。格奥尔基·鲍利索维奇·爱伦堡是一位32岁的汉学家，媒体和学界的人都很熟悉他。尽管除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且时间很短）之外，他什么党派也没有加入过，但他还是深受党内领导的信任，被称为“同路人”，得到非常好的对待。20世纪20年代初他甚至被派到中国，在那里领导共产主义运动（而他竟然不是党员！）。他常在党的媒体上发表文章，被邀请参加一些学术讨论。爱伦堡在《在国外》杂志上发表过关于中国的苏维埃运动、中国共产党及其争取自由的斗争的文章，这些文章令人激动，令人印象深刻。因此，对于编辑部打电话找他，他一点也不感到惊奇。使他感到有点困惑的是这次给他的任务：在最短的时间内准备一篇详细的毛泽东传记。

毫无疑问，苏联舆论界对毛泽东的关注已经持续很多年了，当时他同领导着中国红色游击队的指挥官朱德一样都是大名鼎鼎的传奇人物。当时是中国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朱、毛的名字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是到那时为止，关于这两位英雄人物，人们在描述的时候就好像他们是一个人似的，他们的名字也被混在一起：朱毛。他们中的一位的特写曾在“当代人物”专栏中登过，上这个专栏的通常都是著名人物。给其中一人写传，这还是破天荒头一回。格奥尔基·鲍利索维奇明白：只有一个人——斯大林才可能下达这样的任务。

这意味着，领袖需要提高毛泽东的知名度。尽管半年之前，即在1934年2月，毛泽东在自己的家乡遭受了挫折——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在党内的“同志”没有选举他继续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从

1931年11月起，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但是，是不是恰恰这个事态才令斯大林产生了支持他的念头？是不是为了平衡其他领导人？

不管怎样，格奥尔基·鲍利索维奇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对毛的描述非常生动。毛被描述为一位充满英雄浪漫主义的人、没有偏见的人，同时也是非常普通而朴实的人。被压迫的中国人民的领袖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出身“贫下中农”、“穿着农民的衣服、手里撑着一把雨伞的革命家”^①。

这篇传记于11月发表，影响很大，一种气氛逐渐被营造出来。在这篇传记之后出现了其他作家写的文章、小册子和书，内容都毫不逊色，甚至更胜一筹。他们都把毛写成领袖和朋友、忠实的战友和忠实于斯大林的学生。其结果是，到30年代末的时候，苏联人民已开始把毛泽东视为受压迫的中国人民的主要领袖。

研究毛泽东的热潮迅速增长，直到60年代初。那时，苏联新的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中断了与中国共产党的友好关系。之后毛从“小兄弟”变成了“独裁者”、“反苏分子”、“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可耻叛徒”。整整一代人是在对中国威胁的担忧中成长起来的。而这也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在乌苏里江上的小岛达曼斯基岛^②上发生了悲剧？1969年3月苏联和中国的军队在这里打了一仗！毛就这样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这主要应该归因于极其糟糕的苏共媒体以及盲从党的媒体的苏联舆论。

但是，他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人？敌人还是朋友？斯大林提拔的领导人抑或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或许，是一个另类？见风使舵的人？是否一切都是我们的过错？苏联人在50年代唱道：“俄国人和中国人永远是朋友。”70年代他们跟着维索茨基一起唱道：“现在你一无所有，我们不会让你得逞，毛同志！”

关于毛泽东，已经有了数百部（篇）书、文章、小说，还有电影和专门网站。对他的研究达到了细致入微的程度。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彻底解决上述问题。对于西方学者和中国的大多数学者以及苏中分裂之后的大多数苏联学者而言，早在30年代后半期，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就已经是独立自主的了，而毛泽东也有别于中国的那些斯大林的忠实信徒，他事实上与莫斯科保持着距离。许多学者认为，根据他们掌握的资料，斯大林不信任毛，毛在斯大林的眼中只是一位“农民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早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包括费正清、史华慈、康拉德·勃兰特和罗伯特·诺斯在内的一批历史学家就开始鼓吹毛在与斯大林的关系

① Эренбург Г. Мао Цзэ-дун // За рубежом. 1934. № 31 (63). С. 15.

② 即珍宝岛。——译者注

系上及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上的“独立性”。^①

毛领导的中国农民革命事实上推翻了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本人关于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的论断。在二三十年代，毛从未去过莫斯科，斯大林也从未见过毛。当时，克里姆林宫经常会收到关于毛的负面报告，这些来自中共党内和党外的形形色色的报告称毛是“反列宁主义”的，甚至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赫鲁晓夫曾说过，斯大林认为毛是“山洞里的马克思主义者”^②，他的这一说法看起来是合乎逻辑的。而在50年代，在苏共二十大谴责了斯大林之后，毛泽东本人也多次回忆道：他感觉斯大林不信任他。^③

可悲的是，并非所有这些说法都符合事实。近几年才解密的中共、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秘密档案，为破解毛泽东之谜提供了转机。这些史料长期被锁在保险柜里，只是到了今天才向研究者公开。这些档案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由设在莫斯科的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现为俄罗斯国立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保存的、从未发表过的有关毛泽东及其敌人和朋友的那部分材料。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档案馆的档案材料也很重要，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们的努力，最近这些材料才开始为人们所知。本书就是依据这些独特的档案资料写成的。

我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对许多人表示深深的谢意，没有他们的关心和热情参与，这本书将永远不可能问世。我要特别感谢的是：基里尔·米哈伊罗维奇·安德森、叶卡捷琳娜·鲍里索夫娜·博格斯拉夫斯卡娅、王凡西、王福增、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戈登、奥列格·亚历山德罗维奇·格里涅夫斯基、柳德米拉·康斯坦丁诺芙娜·卡尔洛娃、塔玛拉·米哈伊洛夫娜·科列索娃、柳德米拉·米哈伊洛夫娜·科什列娃、毛泽东的外孙孔继宁、麦德林、斯蒂芬·伊·利文、李丹慧、李奇、李玉贞、林彪的女儿林立衡（豆豆）、拉里莎·尼古拉耶夫娜·马拉申科、

① John Fairbank K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Conrad Brandt, Benjamin Schwartz and John K. Fairbank,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Robert C. North, *Moscow and Chinese Communist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② Хрущев Н. С. Время. Люди. Власть.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В 4 кн.) . Кн. 3. М., 1999. С. 23.

③ Верещагин Б. Н. В 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 Китае. 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дипломата. М., 1999. С. 123; Мао Цзэдуно Коминтерне и политике Сталина в Китае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4. № 5. С. 107; Odd Arne Westad, ed.,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ss, 1998, pp. 338-339, 340, 348, 350, 354-355.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马斯洛夫、米哈伊尔·绥拉菲莫维奇·迈尔、阿伦·瓦格维奇·梅里科谢托夫、尼娜·尼古拉耶夫娃·梅尔尼科娃、安德烈·尤里耶维奇·尼库林、尼娜·斯捷潘诺芙娜·潘索瓦、拉里莎·亚历山德罗芙娜·罗格瓦雅、斯维特兰娜·马尔科芙娜·罗岑塔尔、斯蒂芬·史密特、伊琳娜·尼古拉耶夫娜·索特尼科娃、达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斯皮恰克、叶列娜·康斯坦丁诺夫娜·斯塔罗夫洛娃、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捷普利亚科夫、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季霍纽科、尤里·季霍诺维奇·托托奇金、弗里德里希·伊戈里耶维奇·费尔索夫、毛泽东的侄外孙曹耘山、毛泽东的翻译资中筠、蒋介石的重孙女蒋友梅、格奥尔基·约瑟福维奇·切尔尼亚福斯基、陈永发、瓦列里·尼古拉耶维奇·谢皮列夫、沈志华、余敏玲（音译）。我还要感谢其他许多不愿意透露其姓名的中国公民，他们向我讲述了他们在毛泽东时代的生活。

目 录

第一篇 “润泽东方”

- 第一章 菩萨的养子 (3)
- 第二章 在新世界的门槛上 (19)
- 第三章 “我思，故我在” (33)
- 第四章 空谷足音 (58)

第二篇 做什么？

- 第一章 红楼之梦 (71)
- 第二章 民众的大联合 (92)
- 第三章 世界革命的吸引，还是专政的魔力？ (114)
- 第四章 “走俄国人的路” (135)

第三篇 民族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 第一章 布尔什维克策略的启示 (153)
- 第二章 加入国民党 (167)
- 第三章 希望与失望 (183)
- 第四章 与蒋介石周旋 (200)

第四篇 枪杆子与政权

- 第一章 联合战线的破裂 (225)
- 第二章 通往苏维埃之路 (257)
- 第三章 井冈山上的红旗 (276)
- 第四章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93)

第五篇 领袖的诞生

第一章 在共产国际的羽翼下	(321)
第二章 激烈的党内斗争	(340)
第三章 长征	(364)
第四章 西安事变	(381)
注释	(405)

第一篇
“润泽东方”

★ 第一章

菩萨的养子

在湖南省湘潭县，有一个风景如画的小村子，名叫韶山冲。村子位于群山之间的谷地上，山上林木常青，蓝天白云之下，稻田随处可见。站在村子里远远望去，韶山隐约可见，它是壮丽的衡山山脉的七十二峰之一。这个村子就由此山得名。韶山也是佛教徒们崇拜的一座圣山。离韶山冲最近的一个小城市也叫韶山。如今的韶山市有一条支线铁路直通省会长沙，这条支线全长 100 英里*，火车需要跑至少三个半小时。出了韶山火车站就是一个宽敞的广场，广场上停着一排公交车。车上的售票员不停地吆喝着：“去毛主席故居！”“去毛主席故居的，请上车了！”上车之后半小时，就到了颠簸不平的乡间小路。沿着小路，经过成片的稻田和一个个开满了莲花的池塘，就到了目的地：一座由 13 间砖房组成的颇具规模的纪念馆。纪念馆的左右两侧都是一些风格与那套砖房相似的普通农舍。每座农舍都由传统风格的石墙围起来，墙内的一间间屋子错落有致地围成了一个封闭的院子。整个村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农家气氛。在湖南，像这样的小村庄还有很多。但是，置身于这个村子，你的脉搏会不由自主地加速，因为正是在这个农舍里，多年以前诞生了一位注定要改变 20 世纪历史的伟人。甚至到了今天，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一说出他的名字仍会情不自禁地颤抖，有的是出于敬仰，有的是出于厌憎。他是一个改变了六亿人命运的革命家，一个迫使世界各国的政治家们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的爱国者。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 1 英里 ≈ 1.6 千米。——译者注

相传，在大约 4 500 年前，统治着中国的一个名叫舜的贤明君主曾经到过今日的韶山一带。他在附近的一座山头上休息的时候，

韶山冲的故居，
毛泽东在这里
诞生。



命令跟随着他的乐师们演奏了当时流行的，也是他喜爱的一首曲子，曲名叫《韶》。演奏用的乐器类似于今日的长笛和口琴。美妙的乐曲把天上的凤凰也吸引来了，它们环绕在舜的周围，随着乐声翩翩起舞，令舜龙颜大悦。因此之故，当地人就把舜休息的地方叫做“韶山”，这座山脚下的一条狭长的谷地则被称为“韶山冲”。

山谷里的这个村子里许多居民都姓毛，显然属于同一个宗族。村里所有姓毛的村民都认为他们源于同一个祖先，此人名叫毛太华。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是来自邻省江西的勇敢的战士。14世纪中期，毛太华离开了他的故土江西，参加了元帝国的“红巾军”^[1]，并随军征战到了云南。红巾军的对手是自13世纪70年代以来统治着中国的蒙古人。在这个游牧民族的主力军队被僧人朱元璋所领导的起义军击败之后的1368年，朱元璋称帝，一个新的朝代明朝由此建立。但在当时的遥远的云南，还残留着一些孤立无援的蒙古军队。在云南，毛太华娶了一个姓王的当地姑娘。1380年，他带着妻子儿女迁居到了“楚”地（即今日的湖南）。这一家人最终在韶山地区以南的湘乡县定居下来。大约十年后，毛太华的两个儿子来到韶山冲安了家。此二人就是韶山毛氏宗族的祖先。^[2]

未来的最高领袖所降生的这个家庭的一家之主是毛贻昌，毛贻昌的出生日期按中国的阴历计算是马年的九月二十一日。按照当时中国的王朝纪年法，这一年是清朝的同治九年。毛泽东的出生日期按阴历计算是蛇年的十一月十九日，这一年是清光绪十九年。清朝的统治者是满洲人，他们于1644年开始统治中国。从汉朝（公元前202—公元220）开始，中国的每一位皇帝都有自己独特的纪年方式，即年号，每个年号的第一年一般是该皇帝登基后的第二年。年号名称的选择总是着眼于向臣民们显示皇帝的伟大；同一个皇帝在位期间可能多次变更年号，有的年号纯然是皇帝一时兴起的结果。古代中国官方的朝代纪年法就是由这些年号组成的。光绪的意思是“光明的开端”，光绪元年就是公元1875年，实足年龄只有四周岁的幼儿载湉在这一年成了皇帝，由他的姨母、皇太后慈禧垂帘听政。

在任何一个中国家庭，生儿子都是一件大喜事。根据公元纪年，这个孩子的出生日期是1893年12月26日。对于这个孩子的降生，父亲喜不自胜，而母亲忧心忡忡。婴儿体型很大，做母亲的担心奶水不足，喂不饱这个孩子。此前她已经生了两个男孩，都在襁褓中就夭折了。于是，她抱着新生儿去了隐居在山中的一个尼姑那里，声泪俱下地哀求这位女尼帮忙照看这个婴儿。这位出家人拒绝了，说这个孩子看上去很结实，不必担心养不活。尼姑为这个孩子做了祈福祷告，然后建议忧心如焚的母亲一定要自己养活这个孩子。母亲听罢，一把抱起婴儿，急匆匆地赶到她的娘家，离韶山冲约12里远的一个叫唐家坵的村子里。在距她娘家不远的地方，有一块高约12英尺*的巨石，巨石上建有一座很小的庙，庙里供奉的是观音菩萨。观音在佛教里是一位仁慈的女神。在回娘家的路上，这个十分虚弱、身心俱疲的女人在这个庙前停留了一下，向观音做了祷告，求菩萨把这个刚出生的孩子收为养子。^[3]

* 1英尺=0.3048米。——译者注

依照当时的习俗，很快就有人向新生儿的外公外婆报告了他们女儿生产的消息。作为贺礼，他们还得到一只公鸡。如果生的是女婴，他们就只能得到一只母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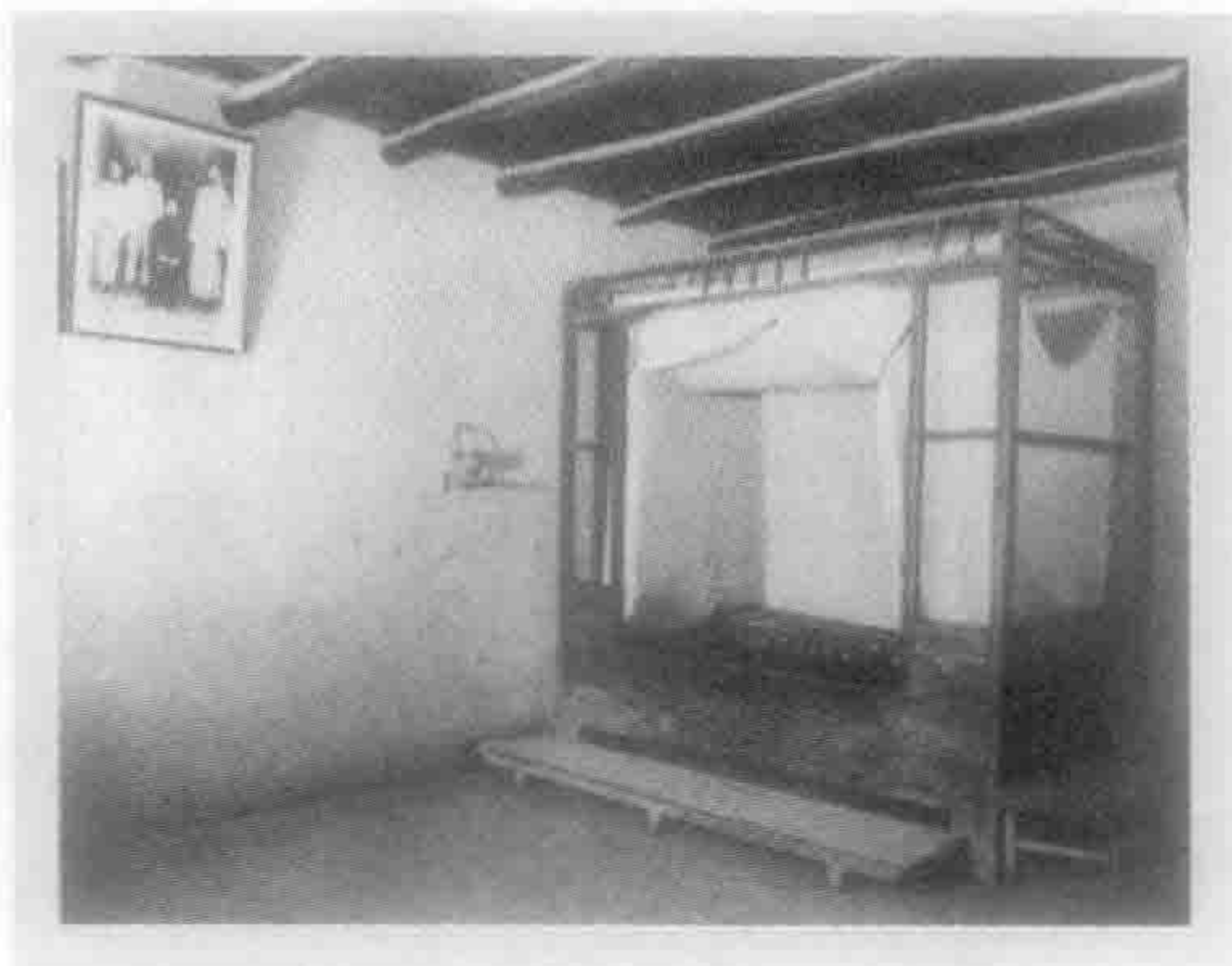
中国人把胎儿在母腹中的九个月算作孩子生命的第一年，所以孩子一落地就算满一岁了。当时的中国还有一个古老的习俗，即

要把婴儿用襁褓紧紧地裹起来，而襁褓必须是用孩子父亲的旧裤子改制的。同时还要在摇篮上方挂上多条父亲的旧裤子。人们认为这样一来邪气和病魔都会被吸引到裤子里面，而不至于侵扰这个孩子。孩子出生后的第三天才能洗澡，而且必须当着受邀来宾的面进行这个仪式。在这以前，除了自家人，父母必须禁止任何外人看见新生儿，以免未知的邪恶的眼睛伤害孩子。在新生儿第一次洗澡的这一天，孩子的父亲要向列祖列宗献上供品，还要在孩子洗澡的热水里放进一个洋葱头和一块生姜，二者分别象征着聪明和健康。洗完以后，母亲把婴儿抱出浴盆，交给为这个孩子接生的接生婆。后者接过孩子之后，把洋葱头根部朝下放在婴儿的头上，同时口诵道：“一求漂亮，二求聪明，三求机灵！”然后，她把一把锁或者一个小门闩依次贴在婴儿的嘴边、两条小胳膊上和两条小腿上。接着说道：“宝宝，不要哭。”再接着，一杆秤会放在婴儿的小胸脯上，此举的寓意是希望孩子将来体壮如牛。然后把几个煮鸡蛋在婴儿的小脸蛋上碰一下，此举的寓意是希望孩子将来幸福平安。还要把一根串有银币的红线系在婴儿的手腕上。婴儿降生一个月后，要给他剃去胎发，但是靠近太阳穴和后颈的头发不能剃。剃胎发也是一件大事，父母会再次邀请宾客上门。后者照例会带上些钱、猪肉、鱼、水果和彩蛋作为贺喜的礼物。给孩子取名字也在这一天。

根据一个非常古老、谁也说不清始于何时的风俗，给新生儿取名时，父母最好是征求信奉道教的算命先生的意见。毛贻昌也不例外。他请教了当地的一位算命先生，后者告诉他，这个新生儿命里缺水，因此孩子的名字里必须有一个与水有关的字。^[4]算命先生的建议恰好与毛家的字辈序列相吻合。属于同一宗族的、包括遥远的未来的一代代人在内的每一代中国人，主要是男人，每个人名字固然各不相同，但是同一代人的名字中必定有一个字是相同的，这个字代表着他们在宗族中的辈分。当然，这个要求只是习俗，不是非得要遵守的铁律。毛贻昌的新生儿属于毛家的第二十代，这一代的字辈是“泽”。这个字的左边是三点水。“泽”这个字有两层含义。其一，它有潮湿和滋润万物的意思。其二，它还有“上善若水”和“施恩于人”的意思，这是一个更古老的含义。至于婴儿名字的第

二个字，毛贻昌选择了“东”字。“东”是“东方”的意思。两个字合起来就是“泽东”，它所具有的不同凡响的美好寓意是：来自东方的施恩者。在取这个正式名字的同时，依照习俗，这个孩子还应该有一个非正式的名字，专供在一些特定的、礼仪性的场合使用。为孩子取的第二个名字是“咏芝”。“咏”是“赞颂”的意思；“芝”是“芝兰”的意思，属于兰花的一种。这样一来，这个孩子就有了响亮优美不亚于“泽东”的第二个名字：“被赞颂的兰花”。可是，不久以后第二个名字就被改动了，因为它缺少算命先生所说的那个要素：水。最终定下来的第二个名字的意思与第一个名字非常接近，但听起来更美——“润芝”，意思是“带着露水的兰花”。“润”与“泽”二字同义，都有滋润万物和给人以恩惠的意思。“润芝”中的“芝”有时也被写成同音字“之”，这样一来，“润芝”就成了“润之”。“之”的意思是他，或她，或他们，也就是所有人。这样一来，“润之”的象征性意思就是：给人类带来恩泽的救星。毛的母亲还给他取了一个小名，叫“石头”，意在保佑他免遭各种灾祸，也暗示这个孩子与菩萨有某种亲属关系。那块由众多砾石和卵石构成的巨石和其上的观音庙直到今天还完好无损，当地人称这块巨石为“观音石”。因为毛泽东是他父母所生的第三个孩子，所以他的母亲又叫他“石三伢子”。有了这三个名字护佑，毛的父母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个男孩满周岁的时候，按照古老的习俗，毛家的亲戚和朋友们再次受邀来到这个孩子第一次洗澡的那个房间，也即孩子父母的卧室，参加和见证另一个古老的仪式。仪式的目的是预测这个男婴长大以后的职业和前途。这个小男孩被放在一个很大的竹筐里，面对着供奉着毛氏祖先的牌位的供桌，供桌紧挨着毛贻昌夫妇的床。在他面前摆放着各种日常器物。人们根据小家伙伸手抓取的第一样东西来预测他的未来。现在已没有人知道毛家的这个婴儿



毛泽东的卧室，他就出生在这个房间。

当时抓了什么东西，但十有八九是一件非常珍贵的东西，否则，何以解释这个男孩日后辉煌的生涯呢？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

毛泽东出生的时候，毛家人丁尚少，只有四口人：他、他的父母和他的祖父。^[5]毛家所居的彼此相连的那些房子，只有一半，即东半边或左半边的几个房间，是毛家的，另一半住着另外几家。这所农家院落的正前方是一处池塘和稻田，背靠着松林和竹林。这个村子约有 600 户人家，几乎全是穷人。他们在自家的小块土地上从事着折腰断臂的辛勤劳作，但所得甚微。

毛泽东的祖父毛恩普^[6]终生贫困，留给儿子的只是一身债务。到了毛泽东的父亲当家的时候，通过苦心经营，家境已不那么窘迫了。毛贻昌^[7]还有两个名字，一曰顺生^[8]，二曰良弼。他是他父亲唯一的儿子，生于 1870 年 10 月 15 日。毛贻昌十岁的时候就与邻县湘乡县的一个叫文素勤（因为在同族姐妹中排行第七，人称文七妹）的女孩订了婚。^[9]文素勤生于 1867 年 2 月 12 日，比毛贻昌大三岁半。订婚五年后，两人结婚了。婚后不久，为了偿还父亲的债务，毛贻昌加入了当地的湘军。^[10]湘军始建于 19 世纪 60 年代初，创立者是一位名叫曾国藩的权势很大的将军。毛贻昌在湘军中服役很长时间，在此期间他用积攒下来的军饷一块一块地赎回了他父亲为了还债而抵押出去的土地，就这样成了一位有着自己的耕地的自耕农。毛贻昌既粗犷暴躁，又勤劳节俭。根据毛泽东的女儿显然从毛本人那里听来的回忆，毛贻昌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吃不穷，用不穷，人无计算一世穷。谁会盘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

算，谁就能过好日子；不会盘算的人，你给他金山银山，也是空的！”^[11]他的勤劳善良、被村里人称为“素勤”的妻子帮着他艰难打拼。^[12]通过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毛贻昌攒下了一点钱，买下了几块

田。那时毛泽东已满十岁。就在毛泽东十岁的那一年，他的祖父去世了。^[13]与此同时，家中嗷嗷待哺的孩子也在增加。毛泽东的祖父去世前8年，又一个男婴降生了，取名“泽民”。^[14]毛泽民出生一年后，毛家又添了一个男丁，取名“泽覃”。在汉语中，泽民的意思是“施恩于人民”；泽覃的意思，既可以解释为“深厚的恩惠”，也可以解释为“施恩于湘潭”。^[15]根据传统，这两个孩子也各有一个礼仪性的称谓（即字）。毛泽民字“咏莲”，又字“润莲”。毛泽覃字“咏菊”，又字“润菊”。这对夫妇还生过两个女儿，但都在襁褓中就夭折了。

毛的母亲有着强烈的宗教情感，也竭力向她的儿子们灌输这种情感。幼年和少年时期的毛泽东经常被母亲带着去寺庙烧香拜佛。这位母亲希望自己的长子长大后能够出家做和尚，以便全身心地侍奉他的养母观音菩萨。毛的父亲对于妻子的这个心愿不以为然，但也没有坚决反对。他内心深处对佛也不无敬意，但从没有诉诸外在言行，直到他亲身经历了一件事为止。在离这个村庄不远的路上，他遇到了一只虎。毛的父亲吓坏了，但显然老虎也怕他，于是人和虎朝着相反的方向各自逃窜。毛贻昌认为这事是上天在警告他，此前一直是一个宗教上的怀疑论者的他，从此开始远离无神论。^[16]

虽说毛贻昌从此对佛教有了敬畏之心，但他还是认为让大儿子学习儒家的智慧更有用处。儒家思想是中国的传统哲学。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中国，一个人如果对孔子这位公元前6—前5世纪的哲学家和他的追随者的教导一无所知的话，他就永无出头之日。中国的全部政治制度都是建立在孔子所开创的意识形态诸原则的基础上的，这种意识形态追求人的道德完善。根据孔子及其追随者的理论即儒家学说，每个人都有义务遵循“礼”，礼源自天启，其核心是仁、孝和德。只有践行由上天所赐予的这些律法和规则，一个人才能成为君子。换言之，儒家所孜孜以求的，是伦理上的至善，而礼就是达到这种境界的方法。

当然，现实生活中并非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按照这位圣人的如下教导去立身处世：“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7]

诚然，是否真的按照孔子的教导去做，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良心，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不熟悉这位哲学家的教导，就休想出人头地。对孔子的语录烂熟到信手拈来的程度，是做官的必要条件。一个不熟悉孔子的《论语》和另外三部古代经典即《孟子》、《大学》和《中庸》的人，就会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文盲。其中，《孟子》的作者几乎与孔子齐名，是孔子之后最伟大的古代哲学家。

毛的父亲一心要他的大儿子掌握儒家经典。他自己只上过两年学，他的妻子则是个文盲。毛贻昌曾就一块山地的归属权打过一场官司，按说理在他这一边，但因为没文化，不能引用孔子的话为自己辩护，另一方即被告则在法庭上展示了他在传统经典方面更胜一筹的本事，结果毛家官司打输了。毛泽东的女儿写道，从法庭宣布被告胜诉的那一刻起，她的爷爷就暗下决心：一定要让我的儿子成为像他那样能引经据典、“为自己争口气”的人。^[18]于是毛泽东在八岁的时候就被送到韶山本地的一家私塾念书去了，在那里，背诵儒家经典是他的基本功课。

孔子的伦理道德箴言没有在他心中留下一丝一毫的影响，像许多注重实际的人一样，毛泽东只是出于纯粹功利的目的才不得不背下这位备受尊重的哲学家的训诫的。这个目的就是，在合适的场合引用这位圣人的某句合适的格言以便驳倒论敌。毛的女儿讲述的下面这个故事描述了她的父亲是如何在一场舌战中智胜其先生的。她写道：

有一天，天气炎热，先生又不在私塾，爸爸就提议大家去游泳，老先生回来看见学生们赤身露体游泳，以为不雅，要惩戒他们。爸爸却引用《论语》上的话说，孔夫子是赞成去河里洗冷水澡的，并把《论语》打开，把孔夫子的原话念给教师听。老先生一听，想起确实有这样一段书，但一时又下不了台，就到上屋场，找爷爷告状：“你家润之了不得啦，他的才学比我高，我教不了啦！”

毛泽东同样擅长引用孔子的话来对付他父亲，后者常常责备这个儿子既不尊长又懒惰。在父子俩的舌战中，毛泽东偶尔也能胜出，但更多的时候这类舌战都是以对毛更糟糕的结局而收场的。做父亲的认为，孝道位居儒家所有准则之首，因此每每对胆敢顶撞他的儿子回以鞭笞，边打边骂：“我就要打死你这个没王法的东西！”^[19]另外两个儿子也挨过他的鞭子。毛的母亲是一个善良且软弱的家庭妇女，每逢看到心爱的儿子挨打，免不了心疼孩子，也试图保护孩子，但多以失败告终。

家庭内部的冲突，父亲的暴虐性格，母亲的懦弱无助和他对母亲深深的爱与怜悯，所有这些都不可不对这位未来革命家的个性产生影响，使其逐渐成长为一个充满激情和自尊的“反叛者”。用他女儿的话来说，他的性格之倔强不亚于她的爷爷。实际上，这对父子性格确实非常相似。^[20]虽然毛对其父亲的坏脾气非常不满，但他自己也变得越来越倔强。父亲对他的蔑视在少年毛泽东心中唤醒了为自己的权力而战的强烈冲动。在中国，湖南人以性格直率、火爆著称。湖南人又爱吃红辣椒，“性如辣椒”这句话就是中国人对湖南人的性格的典型评价。因而不妨说，毛泽东的顽强倔强的个性既有家庭渊源，又有地域文化方面的根源。

在多年以后的1936年7月，已经是非常著名的中国游击队的领袖以及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毛泽东，在距韶山有千里之遥的陕西省北部地区的根据地保安接见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应斯诺的请求他接受了采访，在这次采访中他首次讲述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他们在山上的一个窑洞里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这种窑洞是中国贫苦农民的一种典型住所。埃德加·斯诺回忆道：“我们真像搞密谋的人一样，躲在那个窑洞里，伏在那张铺着红毡的桌子上，蜡烛在我们中间毕剥着火花，我振笔疾书，一直到倦得要倒头便睡为止。吴亮平坐在我身旁，把毛泽东柔和的南方方言译成英语……毛是凭记忆叙述一切的；他边说我边记。”^[21]

毛泽东的自述于1937年7—10月在纽约的左派杂志《亚洲》上首次分四期发表。发行的数量很少，受到了斯诺的朋友理查德·沃尔什的资助。1937年底，这位共产主义领袖的自传在稍做缩减之

后，被收入《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书中有一章的标题很能反映此书的内容和倾向，该标题是“一个共产党的由来”。该书在伦敦的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后，很快就广为人知。1937年11月初，斯诺在《亚洲》杂志上发表的《毛泽东自传》在中国出版了，由国家出版局版权处处长汪衡翻译。这次出版获得了成功：在20天的时间内就销售一空。于是又印了第二版。^[22]毛对斯诺的工作非常满意。当斯诺于1939年到陕北第二次访问他的时候，他对斯诺说：“《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正确地反映了党的政策以及我自己的看法。”此后，在欢迎斯诺到访的群众集会上，毛在介绍他的时候，称他写了一本“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书”^[23]。

毛泽东在接受斯诺的采访时，曾这样谈到他的少年时代和他的父亲：

这时我家有15亩田地，成了中农，靠此每年可以收60担谷。一家五口一年共吃35担——即每人7担左右——这样每年还有25担剩余。我的父亲利用这些剩余，又积蓄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7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那时候我家每年可以收84担谷。……每年有49担谷的剩余，我的父亲就靠此渐渐富裕起来。

我父亲还是一个中农的时候，就开始做贩运谷子的生意，赚了一些钱。他成了“富”农之后，就用大部分时间做这个生意了。他雇了一个长工，还叫孩子们和妻子都到地里干活。我六岁就开始干农活了。我父亲做生意并没有开铺子，他只是从贫苦农民那里把谷子买下来，然后运到城里卖给商人，在那里得到个高一些的价钱。在冬天碾谷的时候，他便多雇一个短工干活，那时我家就有七口人吃饭。……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

过了一会儿，毛又笑着说：

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

我、母亲、弟弟^[24]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凡是明显的感情流露或者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都批评，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我的不满增加了。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在不断地发展着。

父亲和他的长子之间的这种争执在中国是不多见的。毛甚至会当着外人的面与其父发生激烈口角，显示出其叛逆个性之不可思议的强烈程度。在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毛甚至就他父亲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我学会了恨他。”^[25]

毛节俭的父亲有条不紊地继续着其致富生涯。他不再买地给自家种，而是从其他农户手中买下他们的地契，使这些农户都成为他的佃农。他用这种办法积累了一笔可观的、数额在2 000至3 000银元之间的财富。这笔钱在当时中国的一个普通村庄里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多数中国农民都生活在赤贫之中。总的说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清代中国是一个非常落后和野蛮的中世纪式的国度。资本主义尚处在婴儿期，对社会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影响。新兴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集中在上海、天津和武汉这类大城市，离平静又了无生气、如一潭死水的韶山有千里之遥。增长和繁荣仅局限于这几个城市，乡村的生活一如既往，亘古不变。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中国人，把商品生产视为“人类自由和个人独立的顶峰”（马克思语）^[26]。毛泽东的父亲就属于这极少数人中的一个。绝大多数人看不出市场有什么好处，他们知道，和商人打交道，自己一定会吃亏。每逢秋天，为了还债，大多数农民都不得不将自家生产的也为自己所需要的部分粮食以打了很大折扣的低价卖给像毛泽东的父亲这样的投机商。到了春天，也就是青黄不接粮价上涨的时候，他们又不得不以高价从其手中买来数量同他们卖出的差不多的粮食，以免挨饿，并因此而蒙受沉重的经济损失。^[27]显然，最穷的那部分农民对商人、高利贷者和富裕农民毫无好感。贫农和处于农村最底层的其他阶层，包括没有正当职业或游手好闲的流浪者、无家可归的乞丐和所有其他可以统称为“流氓无产者”的人们^[28]，对这些“吸

“血鬼”，即坐贾行商们尤其充满仇恨。而这两类人，即赤贫的农民和农村中的流氓无产者，总数为4 000万~4 500万，在4亿人口的清代中国，这是一个不小的比例。就是说，赤贫者和无业者约占中国人口的整整十分之一。^[29]把毛的父亲这样的农民蔑称为“土豪”或“吸血鬼”的，就是这部分人。由于能够提供就业机会的近代企业即使在城里也为数极少，因而中国人口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都局限于他们的出生地，农村里更是挤满了贫民和无所事事的人。在那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还可以打点零工，尤其是在水稻插秧和稻谷收获的季节。但大多数人没有这种运气。在乡下的大道小路旁，四处游荡、衣衫褴褛、脏兮兮的和伸手请求施舍的人多如牛毛。在集市上，也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景象：一个农民身边放着或者手里拿着特殊的标志物，用哀求的目光看着过路人，身旁有一个柳条筐，筐里放着一个孩子，大多是女孩。这个人要卖的，就是自己的孩子。

许多底层农民被迫加入了具有犯罪性质的黑社会组织，如三合会；也不时打家劫舍，抢劫的对象自然都是“土豪”或“吸血鬼”。茫无目的的、行为残暴的起义在湖南和其他各省都不是什么新鲜事。

1906年的严冬，在与湖南省相邻的、距韶山440里的江西省萍乡地区，一场大规模的暴动开始酝酿。起事者是一个叫做“红枪会”的帮会，它是势力强大的“洪门”的一个分支。“洪门”是一个反清复明组织，它在华南和东南沿海各省都有分支。在包括韶山和萍乡在内的湖南、江西两省交界处，洪门特别活跃。洪门的宗旨是反清复明，即推翻作为异族的满洲人建立的清朝，恢复被清朝于17世纪中叶推翻的汉族人的明朝。红枪会何以会成为洪门的分支呢？原因之一在于，红色代表着弥勒佛，而弥勒佛是明朝的保护神。洪门与其他秘密帮会也有联系，后者包括哥老会、天地会、三点会以及著名的三合会。洪门的成员彼此自称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弟兄”，成员之间的联系纽带是一种对局外人严格保密的独特的宗教仪式。在任何情况下成员之间都要同甘共苦。他们的信仰，既有萨满教和巫术的成分，也包括一些杂糅了道教和佛教因素的驱魔咒语。他们个个习武，相信武术和气功这类体质的和精神的修炼可

以让他们刀枪不入。

在萍乡发难的红枪会公开提出了两个口号，一是“反清复明”，二是“杀富济贫”。有关这场起义的各种传言迅速传遍了江西、湖南两省境内临近萍乡的各个地区。在仅仅十天的时间里，这些用刀、矛和剑武装起来的造反者进攻土豪的家，抢劫劣绅的财产，使萍乡及其周边地区陷入恐怖之中。“劣绅”这个词是贫苦农民用以将为富不仁的农村绅士与善良的、不那么富有的绅士们区别开来的一种称呼。他们大肆偷盗家境殷实的农家的财物，还在这些农民的家里饮酒狂欢。一部分被偷盗的财物确实散给了穷人。政府军花了十天时间就把起义镇压下去了。但在此事过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依然惊魂未定。多年以后，一个名叫张国焘的萍乡本地人回忆了这次起义。张那年只有九岁，后来成了中共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与毛泽东竞争权力的主要对手。当时的他就处在这场政治地震的震中。张在内心深处同情这些造反者，但他当时毕竟是个孩子，他所亲身经历的恐怖情境在他情不自禁地给出的如下描述中可见一斑：

大人们出了家门，然后就上路了。有的两手空空，有的带着些家私。没有人说话，只是急匆匆地赶路。我们三个结伴而行的孩子只知道踉踉跄跄地赶路，并没有遇到什么不寻常的事。走了五里路后，我们三人到了一家杂货铺，这家铺子是一户文姓人家开的。……店主劝告我们不要单独上路，因为只有他一个人看着这家店，没办法抛下店不管陪着我们一起逃难。接着这位店主建议我们不妨留下来饱餐一顿，然后在店里过夜。对于这个盛情邀请，我们自然是求之不得。

大约午夜时分，一群喝得醉醺醺的、手持刀剑的壮汉闯了进来，把我们从床上抱起来放到店铺的柜台上，逼着我们在柜台上站好，然后对着我们舞刀弄剑。有几个人叫道：“把这几个小孩的脑袋砍下来，用小崽子的血来祭旗！”接着就有人附和：“用他们的脑袋来试试刀，倒也不错。”另一些人则建议说：“还是不杀的好。把他们捆起来带走，让他们的家人用白白花花的大洋赎回他们。”

店主竭力要救我们，哀求这些壮汉让我们回去睡觉，答应供给他们酒、饭，店里的东西随他们拿。因为他跟他们实际上是同伙，这是我们事后知道的，壮汉们同意了。混乱的场面又持续了好一阵之后，我们终于得到了解脱，蹑手蹑脚地回到卧室。我们的恐惧感消退之后，便一个个又进入了梦乡。^[30]

包括湖南省省会长沙在内的其他地方也发生过类似的叛乱。毛泽东告诉斯诺，一群从长沙逃到韶山来避难的商人是如何令他大吃一惊的：

我们问他们为什么都离开长沙。他们告诉我们城里闹了大乱子。那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长沙有成千上万的人饿饭。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济。但抚台傲慢地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饭吃？城里有的是。我就总是吃得饱饱的。”抚台的答复一传到人们的耳朵里，大家就都非常愤怒。他们举行了群众大会，并且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他们攻打清朝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府标志的旗杆，赶走了抚台。^[31]

不久以后，韶山地区的哥老会成员也起来造反了，贫苦农民们纷纷响应。他们向富有的农民们摊派钱粮，还开展了一个名叫“吃大户”的运动。毛泽东回忆说：“我父亲是一个米商，尽管本乡缺粮，他仍然运出大批粮食到城里去。其中有一批粮食被贫苦的村民扣留了，他怒不可遏。我不同情他，可是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也不对。”^[32]

这些叛乱都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一位新巡抚到长沙走马上任，他立刻下令逮捕起事的头领们。被捕者中有许多人被砍了头，砍下的头颅还被悬在旗杆上示众，以儆效尤。在韶山一带活动的哥老会也遭到军队的捕杀。他们的头头，一个人称彭石匠的人，被捕以后也被砍了头。许多年之后的1965年，在同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进行会谈的时候，毛泽东再次回忆了这段历史：“在长沙我忍饥挨饿。参与暴动的饥民的头颅被砍下来挂在杆子上。……我们村

子方圆三公里的树木都没有了树皮，一些树木仅在四米高以上的树干留有树皮：它们都被饥民吃光了。”^[33]

对犯人的处决以前在中国是公开进行的。死囚们穿着没有袖子的背心，背心上用黑墨水写着“土匪”或“杀人犯”之类的大字，他们的胳膊被反绑在背后。无论在城里还是在乡下，行刑前总有一场游街。游街的时候，死刑犯们站在一辆辆光秃秃的马拉车或手推车上，车的前后左右都是手持刀枪的士兵。这个特殊行列的两边总是挤满了看客，许多人会从头跟到尾。到了行刑的空地之后，押送死刑犯的士兵们就把犯人扔下车，这时空地四周早就挤满了观众。接着，一个士兵会把他的大刀递给他的一位同伴。后者走近死刑犯，在死刑犯面前跪下，拜一下，说上一句请求原谅的话。这个仪式既是为了避免这个马上就要死在他刀下的牺牲者的魂找他索命，也是为了给行将就死的人一丝尊严，或者说，给他一点面子。最后，死囚被勒令跪下，负责行刑的士兵站在他的身后举起大刀猛力一劈，砍下死囚的脑袋。看完所有这些“表演”之后，围观的人群一哄而散。乡村生活异常枯燥，因而公开处决犯人这样不寻常的事件总是能够激起乡民们的极大兴趣。如果在游街的过程中某个死囚表现得特别勇敢，比如说唱歌或喊几句口号，场面就更加热闹了。每逢这个时候，围观者中就会有人大喝几声：“好！好！”^[34]砍下的人头，有时插在木桩或竹竿上，有时则悬挂在没有遮挡的四方形的笼子里，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以便过往行人都能看得见人头。

暴力是滋生暴力的温床。毛泽东、张国焘和其他许多未来的共产主义革命家的性格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在这种视人命如草芥、大多数人日复一日永无休止地劳作只是为了还债或温饱的社会里形成的。正如毛自己所承认的那样，在他还是少年的时候，农民起义就在他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影响了他的一生。^[35]

根据毛本人的说法，中国文学，首先是那些描写起义、造反和叛乱的小说也对他的世界观和个人意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精忠演义说本岳王全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都是他百读不厌的书。这些小说描述了人民起义领袖、具有传奇色彩的侠义之士和冒险家的文韬武略和战功，赞美侠士之间的

江湖义气，鼓吹对体力和武艺的崇拜。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们每每号召人民揭竿而起，反抗传统和权威。习惯于向孔子像鞠躬和致力于向学生们灌输儒家基本伦理的教书先生讨厌这些讲“土匪”故事的书，认为它们不道德。可是毛泽东和他的许多同学偏偏迷上了这些宣扬“自由思想”的小说，甚至能把有关内容整页整页地背下来。^[36]

毛泽东的母亲向菩萨祷告的一片苦心全都白费了。她心爱的儿子显然无意按照大慈大悲的佛陀的教导，去过一种神圣且高尚的生活，而是执意要走一条流血、暴力和革命的道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孔子的伦理哲学也未在他心中激起一点波澜。他曾向斯诺坦陈：“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37]少年毛泽东在他那专横的父亲、煽动造反的文学和他的全部生活环境的影响之下，很早就得出了一个结论：一个人要想维护自己的权利，反叛是唯一的途径；谦卑和顺从只会让你一次又一次地挨打。^[38]

★ 第二章

在新世界的门槛上

13岁那年，毛离开了私塾。教他的私塾先生教学方法简单粗暴，经常打学生。这个具有叛逆性格的少年忍受不了这些，在离开学校的时候给他所不喜欢的老师留下了一首打油诗，诗中表达了自己的叛逆思想：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39]

他的父亲并不反对他退学。他对儿子说：“我原本就没有指望你去考秀才。”秀才是中华帝国（清朝）的最低一级“学位”，只有通过本地区的科举考试才能获得这个“学位”。不管怎么说，那时科举制已被废除，让这个孩子继续念书已经没有意义了。“田里的活忙不过来，你回来也好。”^[40]毛贻昌想让儿子帮他打理家事，首先是记账管账。但毛想用自学的方式继续他的学业。读书的渴望使他欲罢不能，他贪婪地阅读除了经书以外所有能够弄到手的书。他通常在夜里、在油灯下读书，读的时候用土布做的被单把窗户遮住，以免灯光透过窗户而被父亲发现他在读书。只要看到儿子手里拿着书，做父亲的就勃然大怒，哪怕是在毛泽东无事可做的闲暇时间也不例外。毛泽东的女儿后来写道：“爷爷是十分精明的人，瞒不过他，起床看见爸爸还在看书，吼道：‘哪里这样的喊不赢哪！一夜熬掉了多少桐油，一个月就是几百文铜钱，这样下去，还了得！’”^[41]

就是在那个时候，毛泽东读到了唤起他的政治兴趣的第一本书，这本书把这个年轻人头脑里的反叛导向了爱国的方向。此书就是著名的改革家和买办郑观应于1893年出版的《盛世危言》。此人的另一个名字也很有名：郑正翔。这本书号召中国人研究“富强之学”，就是说，要运用欧洲的工业化经验，以便完成中国的现代化；书中还提到了在中央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的必要性。作者反对延续传统的儒教秩序，主张进行有限的资产阶级改革，以达到强国的目的。^[42]

要想理解这本书对少年毛泽东的震撼有多大，我们必须简略地概述一下中华帝国当时的内外形势。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经济依附性很强的半殖民地国家。1840—1842年和1856—1860年先后发生了两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英国发动的，意图在于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英国伙同法国一起发动的。两次战争的结果，迫使这个中央王国与“多毛的洋鬼子”签署了多个不平等条约。“多毛的洋鬼子”是中国人背后对这些白皮肤的殖民主义者的称呼。征服者通过战争攫取了对中国关税制度的控制权，中国因此而失去了经济上的独立。外国商人还获得了在华境内贸易中的免税特权。当时，一种被称为“厘金”的国内贸易税是在跨省贸易中必须缴纳的，中国商人都要缴纳厘金，洋商则可以不交，仅此就决定了中国商人在与西洋商人竞争中的劣势。英法还为其国民攫取了在对外贸易口岸定居的权利，其他国家也先后获得了这个权利。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前，已有15个对外通商口岸。外国人还获得了治外法权，也就是领事裁判权。换句话说，中国领土上的外国人不受中国法庭的管辖。

廉价的西方商品如洪水般涌入中国市场，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中国手工业者破产。与此同时，中国人民的税负急剧增加。在一系列战争中的失败，使得中国不得不向胜利者支付战争赔款。

中国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引发了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危机的一个结果，是“太平军”的一场巨大的、震撼全国的反抗清政府统治的起义，许多贫困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参加了这场起义。起义军的领袖洪秀全原是位于中国南方的广西省的一个乡村教师，他号

召建立一个基于平等原则的“太平天国”。他的灵感来自基督教，特别是其中的浸礼会和清教这两个教派的教义。但他也往基督教教义里添加了一点他个人的思想。比如说，他相信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弟弟，他说这是天父即上帝通过一个梦亲口告诉他的，在这个梦中和上帝一起向他显现的，还有耶稣。太平天国将在腐败的清王朝的废墟上庆祝自己的胜利；起义者将用剑与火披荆斩棘，杀出一条通向理想的和平和正义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杀戮和劫掠的对象不仅是满族统治者，还有土豪劣绅。

两千多万人在这场内战中被杀害。国家处于崩溃的边缘。从1861年到1894年，慈禧太后领导下的大清朝廷，在“自强”的口号下尝试了一系列旨在建设国家的改革。慈禧和已故皇帝的弟弟恭亲王，以及有势力的权贵们和包括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在内的镇压了太平天国的征服者们，共同致力于中国的工业化和近代化事业，以便使其成为军事强国。使用机器的近代工厂、兵工厂和可以停泊轮船的码头、铁路和开放性的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就是由他们首先建起来的。报刊的出版也始于那个时期。这时的国家也正式停止了对私营企业经营活动的干预，这就为企业家的事业提供了激励。然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非常缓慢，充满了矛盾。腐败的官员和地方上的权势人物为了阻止竞争，纷纷利用其地位限制私营企业家的首创精神。大多数工业企业属于官僚资本，为地方大员所控制。地方大员中最有权势的少数人甚至能够控制军队，把政府军变成了自己的私家军。曾国藩控制了湘军，这是一支在与太平军的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军队。李鸿章控制了淮军，左宗棠则控制了所谓的常捷军。中国的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垄断性。20世纪初中国产业工人的人数只勉强超过1 200万，其中的四分之三，即900万左右的工人是在雇工超过500人的特大企业中就业的。^{*}正是由于国家开始鼓吹自由市场的教义，中小型的本土企业才得不到适宜的发展条件。当时中国的情况很像今日的俄罗斯，只有一点不一样：俄罗斯的大员们没有自己的私家军。说实在的，当时的中小企业家也很难说是安分守己的生意人，因为他们中的每个人都离不开某个具有犯罪性质的黑社会组织来给自己的实业撑腰，

* Гельбрас В. Г.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КНР, 50-60-е годы. М., 1980.

也就是用武力来看家护院。

像郑观应这样的思想开明的爱国者，并不反对在与自强直接相关的领域里开办国有企业，与此同时，他们对政府高官们执行的垄断性的经济政策颇有微词。他们建议取消对中小企业的限制，深化改革，哪怕矫枉过正一点也无妨。偶尔也有人鼓吹民主理念。许多建议认为有必要同时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时进行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的自由化改革。但是，掌权者对他们的呼吁置若罔闻，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

1885年，中国输掉了与法国的又一场战争。1895年，又在中日战争中战败。中国人此前一直认为日本是一个虚弱的国家，因而这次战败对中国人来说是一大耻辱。尽管中国军队败给日本天皇的军队这件事引发了如熊熊烈火般的爱国激情，但改革家们的蓝图仍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新一轮改革运动的领导人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是出类拔萃的哲学家和作家。此二人恳请年轻且又思想开明的光绪皇帝做中国的彼得大帝，敦促他实行君主立宪，使军队和教育西方化，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1898年出现了一个长达100天的改革运动。同情改革派的光绪帝推出了众多新的改革措施，甚至考虑发动宫廷政变，以剥夺太后干预政治的权力。为此，他求助于一个名叫袁世凯的强有力的将军。但所有这些努力都白费了，袁世凯背叛了皇帝，向慈禧太后告了密。保守的太后被自己外甥的激进政治主张吓坏了，遂迫使后者宣布自己心智失常。光绪皇帝自此彻底失势，被软禁在宫中。许多改革者被砍了头，康梁二人则被迫亡命海外。

中国没有市民社会，所有政治上的反对派在国内都受到镇压。因此许多清醒理智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在海外从事政治活动。在当时流亡海外的这类人中，除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以外，还有一个来自南方的广东省的、名叫孙中山的人。此人的真实姓名是孙文，是郑观应的学生。

孙中山生于1866年，先后在夏威夷、广州和香港受过教育，1892年毕业于一家医学院。1894年，对改良运动失去信心的他离开中国去了美国夏威夷，他的哥哥就住在那里。1894年11月，孙中山在夏威夷的檀香山建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

孙中山博士的主张与改良派截然不同：后者提倡通过君主立宪来改革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孙博士则要求走共和之路，对中国进行脱胎换骨的革命性改造。1895年1月，兴中会在英国租借地香港建立了一个支部，不久之后又在临近香港的大都市广州建立了另一个分会。接着，孙本人迁居广州。同年秋天，兴中会的会员们在广州发动了他们的第一场反清起义。不幸的是，起义失败了。在清廷出高价要他的脑袋的情况下，孙中山被迫流亡海外。他在海外度过了16年的流亡生涯，在此期间一次也不曾回国，直到一场成功的反对君主制的革命爆发后两个月，他才得以回国。

尽管这次起义败得很惨，但兴中会还是幸存下来了，而且很快就恢复了其革命活动。1901—1904年，一系列革命组织在中国出现了。1905年，这些组织中的多个团体合并为“中国革命同盟会”，其简称，就是著名的“同盟会”。这个新的革命组织是在东京的成立大会上正式宣告成立的。孙中山当选为同盟会的总理，接着他就宣布了他的名为“三民主义”的激进的政治纲领，三民主义指的是民族、民权和民生这三大主义。

在孙中山看来，民族主义的内容就是推翻清王朝；民权主义的内容就是建立共和制度；民生主义则意味着平均地权，换言之，对中国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实行国有化，以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能力。孙中山的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旨在保证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至高无上的主导地位的政治纲领，其所竭力反对的，是寡头资本主义，即一种只允许少数爬到权势顶峰的人富起来的制度条件。民生主义的目标，是以国家权力为杠杆，推动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孙中山视国家为一种兼具控制和引导职能的力量，而具有进步作用的土地税将在国家的经济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孙相信这种税的征收能够终结寡头—官僚结构下的垄断政策，催生出一个机会均等的“正义社会”。他公开宣示的最终理想是“天下为公”。

就在康有为和孙中山各自探索其革故鼎新、振兴中华的道路之时，在华北爆发了又一场气势磅礴的农民起义。起义针对的目标是“多毛的洋鬼子”，起义的领导者是一个名曰“义和团”的秘密宗教社团。义和团的成员大多擅长武术，他们和前文中提到的当时中国

其他讲究习武和江湖义气的地下组织一样，认为他们所佩戴的神符、念诵的咒语、拥有的武艺和精神修炼，可以让他们免受敌人的子弹、炮弹和军刀的伤害。他们的作战方式类似于拳击和肉搏，所以与他们第一次发生冲突的外国人称他们为“拳民”。这场起义于1898年在山东和直隶的其他各地陆续爆发。1900年6月13日，义和团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北京。在那里，他们洗劫了富商们的住宅和店铺，纵火烧毁了数千栋房屋，还包围了外国使馆区。他们不反对清廷，他们的怒火是直接冲着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来的。当然，他们也不分青红皂白地抢劫和杀害了一些富有的中国人。

匪夷所思的是，慈禧支持义和团的起义。她先是决定测试一下这些拳民是否真的“刀枪不入”。一群自称具备神奇能力的义和团战士受邀进入紫禁城。在她的命令下，拳民们在一堵墙前站成一排，慈禧卫队的士兵们用洋枪对准他们来了一次齐射，结果是无一伤亡。这一奇迹真把太后给镇住了。于是，1900年6月21日，慈禧向整个世界宣战。

可惜，奇迹只是昙花一现。由奥匈帝国、英国、德国、意大利、俄国、美国、法国和日本这八个国家的军队组成的八国联军击败了义和团和清朝政府军。入侵的军队还占领了北京。1901年9月7日，位高权重的李鸿章和庆亲王代表中国政府与有关国家签署了又一个不平等条约。这个所谓的“最后议定书”规定，中国必须在今后39年内支付高达4.5亿两白银的赔款。也就是说，中国得交给列强1.4万吨白银。考虑到还有4厘的年息，实际赔款总额是3.06万吨白银。根据条约，中国军队不得不撤离北京，列强军队开始在中国的首都驻扎。

这样一来，当历史进入20世纪的时候，中国在经济上完全是列强的附庸，政治上也部分地是列强的附庸。外商支配着中国市场。在国际分工中，这个中央王国只是个三流国家。

经过这次彻底的失败之后，1901年，清政府又一次转向改良，这一次的改良被称为“新政”。朝廷开始讨论立宪的可能性，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刺激私营企业发展的措施，新军的组建也开始了。36个具有近代意义上的作战能力的镇取代了早已过时的、中世纪式的

军队。表面上位居改革运动的权力顶峰、实则一直处在软禁中的光绪皇帝，于1908年11月14日驾崩。他的姨母、嗜权如命的慈禧太后，只比他多活了一天，享年73岁。慈禧死前一天，指定了她的姨外孙溥仪继承大统。临终前，据信，眼中含泪的慈禧对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说：“我老了，我统治了几十年，但没有为国家带来一点好处。”接着，她沉默了片刻，用痛苦的目光凝视着惊恐不已的醇亲王，然后说道：“今后决不能让女人统治国家。”这就是她最后的遗言。

巨大且又深刻的变革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国家的两个新的统治者是醇亲王和庆亲王，前者还被任命为摄政王。此二人实施了旨在实施宪政的各种措施。1909年，各省选举产生了咨议局，这是为宪政做准备的一个步骤。这些咨议局立刻成为自由主义的反对派的力量中枢。官方宣布的国会选举时间是1913年。

与此同时，中国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依附地位仍在深化。1912年时，国债总额已达12亿多两库平银，对外开放的条约口岸已达107个。社会政治危机越来越严重。

少年毛泽东对上述事态几乎一无所知。即使偶有所闻，也没有对他产生任何影响。逝者如斯，那个时代的重大事件就这样在与他毫不相干的情况下一个个发生了。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与埃德加·斯诺的多次会谈中，毛泽东一个字都没有提到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这两次造反运动。估计当时没有人告诉少年毛泽东任何有关义和团的事情，韶山也确实是一个连一份报纸都没有的闭塞的小地方。甚至连皇帝和太后驾崩这样的大事也是在溥仪登基两年之后才传到韶山的。^[43]但他对太平天国肯定有所耳闻。当年的那些恐怖事件的目击者有很多后来还活了很长时间。毛泽东的父亲在19世纪80年代曾在湘军中服役，而湘军就是在他服役前20年镇压了太平军的那支军队。

尽管如此，激起毛对政治的兴趣的，却既不是某个革命家的著作，也不是农民领袖们留下的亲历亲闻，而是一个爱国的改良主义者写的一本书。正是郑观应的书促使毛下决心继续上学。写“土匪”的那些书在少年毛泽东心中点燃的社会抗议激情和他个人对造

反的向往，至少暂时地消失了，现在抓住他的心灵的，是民族主义情绪。

他与父亲之间的又一场冲突爆发了，冲突的原因是，父母决定要他结婚。他们为他相中了一位姑娘，相中的时间不是1907年末就是1908年末。这位姑娘像是来自一户体面的人家，也是毛泽东的远亲。他的祖父毛恩普和姑娘的祖母是堂兄妹。她名叫罗一姑，生于1889年10月20日，比毛泽东大四岁。她的父亲罗合楼因为有点文化，名义上算是绅士了，但实际上是个农民。罗家非常穷，也非常不幸。罗合楼夫妇先后生过五个儿子和五个闺女，但是只有三个闺女活到成年，其余的都在婴幼儿时期夭折了。儿子们的早夭对罗家是沉重的打击，因为在中国，只有儿子才算是上天的恩赐，女儿对一个家庭没有多大用处。罗合楼没办法让家里的四个女人吃饱肚子，因此，能将大女儿嫁到毛貽昌家做媳妇，对他来说是喜从天降。毛貽昌的妻子这时也急需一个帮手。虽然文素勤当时的岁数不算大，但由于过度劳累，身体每况愈下，操持家务和做饭使她越来越不堪重负。

依照习俗，媒人们先去了未来新娘的家里去说亲。虽然罗合楼对此事乐不可支，但是把婚事定下来还是耗了点时间。女方不能立刻接受男方家的通婚要求，因为这样是不体面的。最终，两家交换了彩礼，订下了婚约。在当时的中国，这样订下的婚约不管怎么说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即使新娘没等到举行婚礼就死了，写有她的名字的一块木牌也要送到新郎家里，安放在供桌上。如果新郎在婚礼前死了，新娘也要嫁到她“丈夫”的家里去，为他守寡。

毛泽东和他的未婚妻只是在定亲的那一天见了一面。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喜不喜欢罗一姑^[44]，但不管怎么说，当时他一心想的是念书，而不是结婚。然而，除了顺从父母的意志，他别无选择。等到他知道父母的决定时，一切都已不可挽回。婚约已经签字了，婚礼的日子也定下了，毛貽昌已经把聘金和其他为习俗所要求的礼物交到了罗合楼手里。万事俱备，就等着喝喜酒了。毛貽昌在他所在的村子里是一个富人，罗合楼识文断字，在认识他的所有人眼里，也是一个有身份的人。

依照当时当地的风俗，喜宴在婚礼的前一天就要开始，地点就在新郎家，众多亲朋好友应邀前来赴宴。婚礼这一天，新娘一身红妆，坐着一顶红色的轿子来到新郎家。她的脸被一块红纱布遮住，双唇抹着口红。按照习俗，新娘子必须装出一副不乐意出嫁的样子，不仅要哭，还要骂她未来的丈夫，骂他是“毛毛虫”，是“懒鬼”、“烟鬼”和“酒鬼”等等。新娘到新郎家门口的时候，要放鞭炮。然后，这对新人就得在新郎家里供奉祖先牌位的供桌前跪下来，拜天地，拜日月，拜“龙王爷和土地爷”，最后还要拜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然后，新郎新娘以鞠躬的方式对拜。婚礼至此结束，这对年轻人从此正式结为夫妻。但宾客们还要再吃两天的喜宴，每个客人都要给新婚夫妇送礼，一般送的都是钱。婚礼当天，吃饱喝足之后，对新婚夫妇的“观摩”就开始了，这是一种逗乐的仪式，叫做“闹洞房”。仪式的主持人假装自己是“地方官”，把脸抹得黑黑的，穿着装饰有树叶的、异常花哨的衣服，引导宾客们进入洞房。他们对着新人做出各种不雅的姿态，有时还唱着下流的小曲。为了结束这场粗鲁的闹剧，年轻的丈夫必须贿赂客人。新婚之夜过后，新娘必须让自己的婆婆看一下沾有血迹的床单，以证明自己是黄花闺女。

毛泽东很难忍受这些仪式带给他的折磨。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没有和新娘共寝，也拒绝和她共同生活。“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没有想到她。”他对斯诺如是说。^[45]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是：毛是如此不屑于他的第一次婚姻，以至于他后来甚至忘记了订婚的时候新娘子有多大年纪。在漫不经心地提到这桩婚姻的时候，他说：“我14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20岁的女子。”事实则是，罗一姑当时只有18岁。^[46]一方面，很难相信一位14岁的少年会拒绝与一位18岁的妙龄姑娘同床；另一方面，也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对斯诺说的不是实话。《韶山毛氏族谱》非常奇怪地记载道，毛泽东和罗一姑生有一个儿子远志，但不知为什么送给了一个姓杨的人家抚养。^[47]究竟是不是这样，没人知道。但多半是记载族谱的人搞混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毛泽东和罗一姑生过这个孩子。^[48]

我们能够知道的只是，新婚不久毛泽东就离家出走，在一个辍学在家又没有工作的旧日同学的家里住了半年，这个人的家也在韶山。这一年里，毛泽东依旧如饥似渴地读书，对中国古代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和堪称其姊妹篇的班固的《汉书》更是爱不释手。这些书叙述了包括英雄和奸雄、将军、政治家和哲学家在内的中国古代伟大的统治者们的活动。这时的他也开始痴迷当代人的著述，潜心研读了《校邠庐抗议》。此书出版于1883年，作者是改良派的又一领袖人物冯桂芬。这本书叙述了洋人侵略中国的历史，建议在不改变中国固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根基的前提下，通过学习西洋技术来达到自强的目的。^[49]也是在这一时期，他读到了年轻的革命党人陈天华写的一本小册子。他后来称，这本叙述了列强对中国的瓜分的小册子给了他强烈的震撼：

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的宗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50]

可怜的罗一姑，用村里人的话说：“既不是已婚娘子，也不是黄花闺女。”她默默地忍受着这个屈辱的命运。毛泽东的一位传记作者、英国记者菲利普·肖特写道，某些村民认为，她在这个新家住了下来，后来成了毛泽东的父亲的小妾。^[51]这个说法也许是真的，也许不是，谁知道呢？我们能够知道的一件事就是，她死得很早。1910年2月11日，也就是农历新年的年初二这一天，她死于痢疾。^[52]死时刚满20周岁。

顺便提一句，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对于他的第一位岳父及其家人，并没有什么恶感。在革命成功、他已经成为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之后，他给罗合楼写了封信，邀请他来北京。遗憾的是，罗已经没有这个福气了，他早已于1943年12月故去。

出人意料的是，在这件事情上，毛贻昌竟然原谅了这个令他在全村人面前丢脸的、“忘恩负义的儿子”。显然，他并不像毛泽东在

自己的回忆中说的那么坏。在罗一姑死后数月，即1910年秋天的时候，毛贻昌的这个倔强的儿子要父亲出钱供他继续上学。他要付的学费不低，每5个月的学费、住宿费和图书借阅费合计1400个铜钱，用当时中国的银元计，相当于一块大洋。在亲戚们和左邻右舍的劝说下，老头子很不情愿地答应了。毛泽东选中的学校是东山小学堂。这不是一所普通的学校，它教授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现代课程，教学方法也是欧洲式的。该校坐落在邻县湘乡县的一个名叫东山的村子里，距离韶山约有50里。

毛泽东入学的时候已经17岁了，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离开家乡。一路陪着他的，是比他年长九岁的表哥文运昌。事实上，文运昌当时已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正是在这位表哥的怂恿下，毛才选择了这所学校。离开家去上学的那一天，令他愤愤不平的父亲和所有亲戚一直把他送到村口。^[53]毛贻昌回家后，在一张桌子上发现了将要成为东山小学堂的学生们的毛泽东留给他的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一首诗：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54]

那时的他，已有了青史留名的志向。有关历代中国雄才大略的皇帝们的那些书，整日盘旋在这个年轻人的脑子里。其中的两位皇帝，汉朝的刘邦（公元前256—前195）和明朝的朱元璋（1328—1398），都出生于贫寒人家。综观历史，使得来自普通人家的孩子成为杰出的科学家、作家和政治家的那股动力，都是这种要出人头的激情。一个没有抱负的人，注定要在庸庸碌碌中度过一生。毛的爱国主义情感召唤着他去建功立业。这个外省青年心中那些高傲的灵魂，推动着他不断攀登人生的高峰。

通往成功的道路都是曲折的。这个衣衫破旧、又瘦又高的乡下孩子在这所学校的学生中间并不受欢迎。当时的他身高177厘米，而中国南方人普遍个子不高；他的新同学中的大多数来自富裕的地主家庭；还有，大多数学生是湘乡县人。这些学生一个比一个自负，对毛泽东这位只有一件像样衣服的不速之客压根就瞧不起。毛

身上的一切都与他们格格不入，包括他的浓重的方言口音。

汉语中的方言多得惊人，11种主要方言彼此差异很大。至于地方性的方言和土语，简直是多如牛毛。比如说吧，北京人肯定听不懂广东人讲的话，北京人和广东人都很难听懂上海话。中国的官方语言普通话是北方人的方言，而非大部分中国人的共同语。在中国的许多地区，相邻的乡村和市镇都有各自的方言。毛泽东的出生地湘潭县和他母亲的娘家及东山小学堂所在的湘乡县，都在湖南，且是邻县，就是因为隔了一座韶山，两县就有了不同的方言。^[55]说实在的，生活在这两个相邻的县的人彼此还是听得懂对方的话的，不过比较吃力。这种方言林立的局面是自远古以来历朝历代的中国政府都不得不苦于应对的一大难题。

只有少数同学对毛示以同情。除了他的表兄以外，跟他关系最密切的是萧子嶂（又名萧三）。1920年，萧三赴法国勤工俭学。在那里，他成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一个成员。1927年，他又去了苏联，在那里一待就是好多年。再后来，也是在苏联，他用埃弥·萧作笔名，成为一个知名作家和诗人。他也是最早给毛泽东立传的作家之一。1934年，他参加了苏联作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一个朋友，再加一个表哥，是远远不够的。对个性高傲、张扬的毛来说，多数同学对他的敌意是一个不小的折磨。他后来回忆说：“我精神上感到很压抑。”^[56]

敌意增强了他对成功的渴望，侮辱刺激了他桀骜不驯的个性，对他的冒犯使他更坚强，不管在哪个方面超过他的人，都被他视为必欲战而胜之的对手。最终，毛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教师们的尊重。韶山私塾里那位严厉的塾师教给他的功课现在派上用场了：毛不仅勤奋好学，而且能用文言文写一手漂亮的文章。他依旧是一个嗜书如命的人。他终生保持着爱读书的习惯，尽管并非他读过的每一本书对他都有影响。在东山小学堂求学期间，他对历史的兴趣也一如既往，对古代中国的统治者尤其感兴趣，包括传说中的两位圣君尧和舜、嗜血的暴君秦始皇和威名远扬的汉武帝。其中，汉武帝是中国统治者中第一个制服了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的皇帝，也是第一个把东土耳其斯坦、越南和朝鲜置于中国控制之下的皇帝。在东山

他还第一次接触到了地理学并且很快熟悉了有关知识。同时他也开始阅读外国历史。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从书中知道了拿破仑、叶卡捷琳娜大帝、彼得大帝、威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等历史人物的事迹。^[57] 他也想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伟人。

在他当时读过的书刊中，有关康有为和 1898 年维新运动的文献对他影响最大。后者包括一套《新民丛报》的合订本，这份报纸是梁启超在横滨刊印的。他的表哥借给他的这些书刊使他感到一种刻骨铭心的震撼。“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58] 他后来回忆说。梁启超的书《新民说》更是使他如获至宝。《新民说》最初是分期发表在 1906 年的《新民丛报》上的，是一部颇具哲理性的专著。用这位著名的改革家自己的话来说，此书旨在探究“新民之道”：“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59]

梁启超就立宪君主制的进步作用和专制君主制的消极影响所做的雄辩，给毛泽东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读罢该书的“论国家思想”一章后，他写下了如下心得：

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60]

毛泽东衷心服膺康、梁二人，相信一位“诚实、仁慈和英明”的皇帝迟早会征召康、梁来辅佐他，颁行宪法于全国。通过阅读维新派的著述，毛泽东心中早已沸腾着的民族主义感情越发强烈。梁启超和康有为都是极端的沙文主义者，他们相信，中国通过采纳英日模式振兴起来之后，中央王国就能够在世界各国的竞争中独占鳌头，建立霸

权。否则——这两位维新派的吹鼓手断言——中国就将亡国。

在这所学校里，毛泽东听说了1905年日本对俄国的胜利。这个消息是一位曾在日本留学、当时教他们音乐和英语的年轻教师告诉他和其他学生的。毛和他的同学们听了都很激动，毛是如此为日本的胜利而高兴，以至多年后他在接受斯诺采访时还能哼出日本歌曲《黄海之战》。这是他那位老师当年爱唱的一首歌。在这首歌曲中，日本军队因打败了俄国军队而名声大噪，其中的几句歌词是：

麻雀唱歌，夜莺跳舞，春天里绿色的田野多可爱。

石榴花红，杨柳叶青，展现一幅新图画。^[61]

毛告诉斯诺：“这首歌是歌颂日本战胜俄国的，我当时从这首歌里了解到并且感觉到日本的美，也感觉到一些日本的骄傲和强大。”^[62]毛对日方的同情，并非如他的某些传记作者所说的，是在为“黄种人战胜了白种人”^[63]而高兴。据此认为毛泽东是种族主义者的说法十有八九是站不住脚的。当时的毛是一位爱国的民族主义者，而非种族主义者。鉴于在掠夺他的国家方面日本人的贪婪一点也不亚于欧洲人和美国人，毛有什么理由幻想与日本结盟对付白种人呢？“日出之国”对沙皇俄国的胜利之所以使他兴奋不已，是因为在毛看来，它用事实证明了立宪君主制对专制君主制的优越性。日本的胜利同样也证明了毛所敬爱的维新思想家的如下断言：一个亚洲国家一旦走上政治现代化的康庄大道，被专制主义枷锁牢牢缚住的欧洲强国也会被它碾为齑粉。

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总共只待了六到七个月。1911年初，毛决定去湖南省省会长沙，报考那里的一所中学，这所学校也招收来自湘乡的学生。带着东山小学一位老师的推荐信和很少的行李，他在这年早春徒步走了120里路，前往那个他尚不熟悉的大都市。他就是这样告别了他的孩童和少年时光，离开了有着堡垒式围墙的东山小学堂、瞧不起他的同学和对他期许有加的老师们。等待着他的，是一个既诱人又充满了未知风险的新世界。

★ 第三章

“我思，故我在”

他在长沙一住就是七年多。这座他生平第一次见到的真正的城市使他目眩神迷。城市里宽阔的街道，两三层楼高的房子，以及石砌码头边上不可胜数的、随着波浪漂来荡去的平底帆船，都是他以前从未见到过的。用当时的标准来看，20世纪初的长沙是中国最好的城市之一。^[64]这座城市位于江阔水深的湘江右岸，四周为一道气势宏伟的石墙所环绕，城墙下共有七个幽深的、通往城外的出口，每逢深夜这些出口就会被巨大的城门封闭，每个城门上方都有一座高耸入云的角楼。城内有一座建于明代的高达七层的塔楼。此楼名为“天心阁”，在汉语中的意思就是“高得能刺穿老天的心脏的楼”。这个名称之于这座气势逼人的巨大建筑，倒是名副其实。城里的一切：宽阔的、用石板铺成的街道，长长的、在中国其他地方很少能够见到的石砌路堤，巡抚衙门里和其他一些豪华建筑里的电灯以及用黄色的砖做屋顶的两座孔庙，等等，都令他惊奇不已。而最令他感到新奇的，是长沙城东郊与城墙平行的铁路。这段铁路是毛泽东来长沙的三年前竣工的。这也是毛第一次看到蒸汽机这一西方技术所创造的奇迹。一排排店铺鳞次栉比，这些店铺巨大的广告牌像标语一样沿着商店的外墙高挂在高高的竹竿或木柱上。这幅商业景象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商铺里中外商品琳琅满目。难怪长沙在当时被认为是中国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之一。20多万人生活在这个都市里。街道上人群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一位当时造访过长沙的旅游者这样写道：“我们一上街就感受到一种挡不住的诱惑，这座城市的生命像脉搏一样跳动不息。”^[65]长沙也给毛带来同样的印

象。“这个城市很大，有许许多多的人，不少的学堂，抚台衙门也在那里。总之，那是个很繁华的地方。”^[66]他后来兴奋地对埃德加·斯诺这样说道。

那时的长沙已有三千年的历史。其名称最初叫青阳，后又称楚。到公元前5世纪时，已经发展成为一座颇具规模的城市。也就是在公元前5世纪时，它成为强大的楚国的首都。两个世纪后，它被西部强国秦征服，具体地说，是被第一个统一了中国因而成为这个国家的第一个皇帝的秦始皇吞并。根据他的旨意，这座城市被重新命名为长沙。站在城墙上远眺，可以看到湘江水面上一个名曰橘子洲的、由泥沙堆积而成的细长的小岛，岛上密布橘树。看到这个小岛沙滩上的宁静风光，秦始皇触景生情，遂根据此岛景象给这个城市赐了名。康熙皇帝在位时的1664年，长沙成为新设立的湖南省的首府。

越过橘子洲，在湘江左岸，岳麓山拔地而起。山并不高，只有256米，但和韶山一样，也是一座圣山。20世纪初的时候，在绿树掩映的山上分布着几个佛寺和道观，里面住着数千个出家人。在山的东坡，有一所著名的岳麓书院。该书院始建于宋朝，时为公元976年。宋朝的理学大师朱熹（1130—1200）曾在书院教书。1903年，也就是毛泽东来长沙前不久，书院被改造为一个用当时的标准来说堪称现代的教育机构，名为“湖南高等学堂”。

长沙也生活着少数外国人，他们住在橘子洲。其中美国人最多，他们是1906年来到长沙的，在这座城市里创办了耶鲁大学的一个分校和一所医院。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士在长沙都很活跃。长沙对外通商相对较晚，1904年7月才开始，因此当地人对这些闯入他们生活中的外国人还很不习惯，排外情绪非常强烈。虽说根据1903年清廷在上海签署的一个条约，外国人可以在长沙定居，但慑于民众中强烈的排外情绪，湖南巡抚明令禁止该城居民把房子卖给外国人。在这种背景下，就出现了湘雅医院的美国医生爱德华·休姆所描述的当地人对出现在长沙街头的外国人的如下反应：

看到我们走来，妈妈们赶忙把幼小的孩子推到身后，以免

被“邪恶的眼睛”所伤。有些人在我们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就把鼻子捏住。女佣有一次告诉我们说，西方人身上的气味非常特别，中国人不用看，仅凭气味就知道我们是否在他们附近。有些小孩跟在我们的轿子后面，一边跟一边喊：“洋鬼子！”^[67]

这个城市令毛泽东这个年轻人百感交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既受到震撼，又不无焦虑，担心自己被位于这个“大”城市的学校拒之门外。令他惊喜的是，他被录取了。但这一次，他只在新学校待了几个月。1911年10月，反对君主制的革命开始了。革命爆发得很突然，基本上没有流血，对广大农民几乎无任何影响。^[68]10月10日夜，驻守在湖北省省会武昌的新军工程兵第八营打响了革命的第一枪。该营的大部分士兵都是一个名为“共进会”的革命组织的成员，而共进会又与同盟会有密切关系。这天早晨，目睹前一天被逮捕的几个革命党人不经审讯和呈验证据就被处决的惨状，26岁的士官熊秉坤忧心如焚，于是鼓动士兵们起义。工程兵们的起义得到了陆军测绘学堂的学员以及第29和第30这两个步兵标的支持。10月11日上午，起义者已经控制了整个武昌城。次日，紧邻武昌的汉口和汉阳这两座城市的封建政权也被推翻。由汉口、汉阳和武昌组成的武汉三镇由此成为革命运动的中心。这一完全出乎同盟会领导人的意料的自发性事件在遍及全国的许多城市激起了反清情感的大爆发。孙中山是在美国的一家报纸上读到起义消息的，当时的他正在一列从丹佛开往堪萨斯的火车上。他没有马上回国，而是先去了华盛顿，接着又去了伦敦，希望能够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在这两地为同盟会筹集必要的资金。而在漩涡的中心，以湖北省咨议局议长、37岁的政治家汤化龙为首的武汉的立宪派人士在迅速地估量了形势之后，不仅一跃而站到了革命者这一边，而且夺得了革命的领导权。10月11日，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其首脑是年已47岁的新军第21协统领黎元洪将军。黎本人其实是个保守派。汤化龙则被推举为政事部长。

到11月底的时候，中国18个省份中的15个已经摆脱了清朝的

统治。在大多数脱离清廷控制的省份，民政事务的领导权转移到了此前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派手中，他们总是力图尽可能地把真正的革命党人从政权中排挤出去。各省军政府多控制在驻扎该省的新军指挥官手里。各省新成立的省政府接二连三地宣布独立，脱离中央。

长沙地处武汉以南，两地相距 700 里。10 月 13 日，黎元洪的代表抵达长沙，带来了武昌起义的消息。其中的一个代表经校长同意，向毛泽东所在中学的学生们发表了一场颇具煽动性的演说。包括毛在内的许多学生都被他说得热血沸腾。由于城市生活的影响，这时的毛早已从一个爱国的君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了。他的世界观的转变源自他所阅读的第一种报纸《民立报》，该报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喉舌之一，从 1910 年 10 月开始刊印，编辑部设在上海公共租界。控制该报的，是孙中山的主要战友于右任和宋教仁等人。年轻的毛泽东从这份报纸上第一次得知了孙中山这位中国民主运动的头号领袖和他的三民主义，进而成为热烈的支持者。也是从这份报纸上，毛第一次获悉了清政府对 1911 年 4 月革命党人在广州发起的一次武装起义的镇压。这次起义的领导人是他的湖南同乡黄兴，此人也是孙中山在同盟会中的副手。72 名起义者在与政府军的激烈战斗中牺牲。深受革命报刊影响的毛泽东在激动之余，决定写点什么。他把自己写的平生第一篇文章贴在他就读的中学里人人都会经过的一面墙上。他后来承认道：

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和梁启超的钦佩。我不十分清楚他们和革命党之间的差别。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69]

的确，借用这位诗人自己的话来说，这位年轻人的头脑被他所阅读的大量书刊弄得“倒海翻江”。他还没有真正弄明白康梁的改良主义和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他对这些人的心驰神往，仅仅是出于自己要干一番英雄事业的抱负。只要这种抱负的前提是对正义的渴求，那也不是什么坏事。

早在他获悉武昌起义的消息之前，业已选择革命道路的毛泽东就剪掉了自己的辫子。鉴于清帝国要求其所有男性臣民都要留长辫子，以示对满族统治者的臣服，这是一个叛逆的举动。一位同学学着毛泽东的样也剪了辫子，但其余的学生都没有这样做的勇气。黎元洪派来的代表所做的充满激情的演说使学校的气氛为之一变。几天后，毛泽东和几个同学决定投笔从戎，投奔长沙北边700里之外的义军。那是一个充满浪漫主义的憧憬的时代！但我们的这几位英雄却无法离开长沙。原因是，10月22日，星期天，驻扎在长沙附近的新军第49标的士兵们发动了兵变，接着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通过几个东城门开进了长沙城。新军第50标的士兵们起而响应，从北边进入了长沙。起义军夺取了城内所有的战略要地，当天就成立了湖南军政府。军政府的领导人是两个年轻且激进的革命党人焦达峰和陈作新。这两人实际上都是地下帮会哥老会的成员。约瑟夫·爱舍里克在其关于1911年革命的书中对于当时在长沙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有着如下绘声绘色的描写：

焦达峰所建立的，并不是一个能够吸引改良派精英的新政权……焦达峰身穿他为自己设计的都督制服，骑在马上招摇过市，显然给长沙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都督所到之处，欢呼声此起彼伏”。他的朋友和支持者们成群结队地涌往军政府所在地，其中很多人属于秘密会党成员，因而“某种江湖的气氛盛极一时”。人们称他为“焦大哥”，称他的衙门为“梁山泊”。……地下军事组织的成员们纷纷要求得到荣誉称号、官职和大洋，作为对他们参加革命的犒赏。年轻的革命领袖们毫不犹豫地满足了他们的要求。^[70]

焦达峰和陈作新的政府寿命很短。仅仅9天之后，即10月31日，一场政变发生了。发动政变的还是第50标的士兵们。焦、陈二人均被杀身亡。同其他地区一样，政权最终落到了温和的自由派手里。新政府的领导人是前湖南省咨议局的议长谭延闿，这是一个年仅32岁的百万富翁。与约瑟夫·爱舍里克的看法不同，多年之后的

1936年，毛泽东在追忆哥老会在这场反对君主制的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时，赞扬了他们的“光荣的事迹”^[71]。在谈到焦达峰和陈作新的时候，他说：

他们不是坏人，而且有些革命要求。但他们很穷，代表被压迫者的利益。地主和商人都对他们不满。过了没有几天，我去拜访一个朋友的时候，看见他们已经陈尸街头了。原来代表湖南地主和军阀的谭延闿组织了一次叛乱推翻了他们。^[72]

学校停课了，毛泽东遂决定参加革命军，以便为革命出一份力。当时，革命胜利的前景尚不确定，皇帝溥仪还没有退位，清廷正在与北洋军司令袁世凯将军谈判，试图说服他同意率领这支中国最强大的军队镇压起义。袁就是曾经出卖了光绪皇帝的那位将军。然而，袁世凯想独揽大权，于是借口腿部的老毛病又犯了，迟迟不肯出山。与此同时，数以千计的皇亲国戚，因为惧怕报复，匆匆逃离北京，逃到他们祖先的发迹地东北去了。11月1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总理大臣。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的偶像、君主立宪论者梁启超同时被任命为司法副大臣。新总理与起义各省的领导人乃至同盟会的某些领袖，特别是黄兴，进行了接触。他的谈判努力毫无成效，因为各省都督和革命党人都要求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和君主制，而袁世凯则试图与朝廷达成某种妥协。在各方僵持不下的这个关头，12月25日，孙中山终于回国。当时局势十分紧张。这位同盟会领袖并不想与袁世凯谈判，宁愿进行军事摊牌。12月29日，来自起义各省的代表在南京这座曾经做过明朝首都的城市集会，他们效法法国大革命，把自己的集会命名为“自组联合会”，并以绝对多数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宣誓就职，同时宣布中华民国成立。黎元洪成为副总统。

国家陷入了分裂。在北京，政权依然握在皇帝和袁世凯的手里；在南京，掌舵的是孙中山。内战看来不可避免。18岁的毛泽东和其他人一样，都有这个预感。正因为如此，他才参军。这是一个勇敢的行动。湖南军队当时正准备北伐。

事实却是，这个新兵没有参加战斗。孙中山很快就失去了实权。随着国家的分裂，军队迅速开始扮演起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孙中山手里没有军队，他的陆军部长黄兴在各省督军中也并没有什么威望。选举孙博士做大总统的多数国会议员都希望与袁世凯妥协，孙只是他们在与北洋军司令的交易中的一张王牌。这些人骨子里都是温和派，希望坐在总统宝座上的人是一个和他们一样谨慎的政治家，而非孙中山这样有意颠覆传统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寡头，就是说，不仅腰缠万贯，而且拥有政治和军事权力。因此不难理解，他们都害怕实施孙中山的旨在由国家来控制经济的民生主义。在他们眼里，袁世凯是最理想的人选。他们之所以需要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只是为了给那位举棋不定的将军施加压力。结果，他们如愿以偿。

在最终意识到南京临时国会中的大多数议员都把孙视为纯粹的过渡性人物的事实之后，袁世凯就向光绪皇帝的遗孀隆裕皇太后提出了让那个小孩皇帝退位的具体条件。当时的隆裕同时也是摄政王，醇亲王已于1911年12月辞去了摄政王一职。这位太后吓坏了，但什么也做不了。朝臣们窃窃私语，许多人都想起了溥仪登基时出现的不祥的征兆。当时只有三岁的小皇帝在登基大典上又哭又闹，弄得人人心神不定。他哭喊道：“我不想在这里！我要回家！”溥仪的父亲急得直流汗。大臣们的跪拜礼还没有完成，小皇帝已是哭声震天。溥仪的父亲实在忍不住了，便不假思索地说了一句：“别哭，别哭，马上就完了！”多年之后回想起这件事的时候，这位末代皇帝这样写道：“登基典礼结束后，官员们之间私下议论道：‘他怎么能说‘马上就完了’呢？他说他想回家，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73]

1912年2月12日，皇帝正式退位。这个只有六岁的孩子不可能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在朝臣们看来，当年的那个不祥的预兆已经应验了。

革命胜利了！从10月10日起义爆发到皇帝退位，按照当时中国通行的阴历计算，所有这些事件都发生在辛亥年，故这场革命在中国被称为“辛亥革命”。2月13日，孙中山提交了他的辞呈并于第二天被国会一致接受。2月15日，国会代表们又一致选举袁世凯

为临时大总统。

毛泽东在湖南军队服役六个月之后，决定退伍，重返书斋，他需要完成他的学业。他的退伍要求很快获得了批准。他是带着对从军生涯的良好印象离开部队的。在那里他平生第一次尝到了衣食无忧、应有所有的滋味。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每月领到的军饷是七元钱。请注意，他在东山小学堂读书的时候，五个月的学费、住宿费和图书借阅费加起来还不到一元钱。从军期间他还有大量的空余时光，过着显然是非无产阶级的生活。他与大部分士兵不同，后者大多是目不识丁的穷人，当兵是为了糊口，而非什么革命理想。这个自负的学生兵知道自己的身价，情不自禁地以屈尊俯就的态度对待其他士兵。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回忆道：“我每月伙食用去两元。我还得花钱买水。士兵用水必须到城外去挑，但我是一个学生，不屑挑水，只好向挑夫买水。”^[74]

退役之后，毛泽东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同以前一样，他不乏学习的激情，但他一时不知道该干什么好。他开始留意报纸上刊登的各类新式学校的招生广告。最初，一所警察学校吸引了他，他投递了一份入学申请。但他很快就改变主意了，转而对一所肥皂制造学校产生了兴趣。他去那所学校看了看，还报了名。就在这时，在一个朋友的影响下，他又决定做一个律师，向一所法科学学校报了名。接着又向一所商业中学报了名。再接着，又向一所公立高等商业学校报了名。像他这样什么都想试一试而又没有主见的行事风格，在生活中并不少见。毛还很年轻，同许多十八九岁的青年一样，恨不能立刻拥有整个世界。公立高等商业学校对学生的英语要求很高，而毛泽东没有语言天赋。众所周知，即使是说中国话，他也带有很重的湖南口音，更准确地说，是韶山口音。他终生都未能摆脱这种发音柔软、不时带有啞音的口音。结果，毛泽东在那所商业学校只读了一个月，就于1912年春天弃学，转而考入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学校。这个学校不久就改名为“湖南省立第一中学”。

他在这个学校也没有坚持多长时间。“我不喜欢第一中学，”他后来回忆说，“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75]对教师和学校都很失望的毛泽东决定自学。有半年时间，他每天都去湖南省立图

书馆。在那里，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地理、历史和西方哲学方面的阅读上。国内局势出现的革命性变化，使得当时的毛泽东对与资本主义一道从欧美传来的自由主义颇为心仪。在到那时为止他所读过的所有学校中，教给他的都是孔子的思想，作文都是用文言文，很少教授有关外国的知识。当毛泽东在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的时候，已经19岁的他十分惊奇。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开始研读那些构成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础的著作。他阅读过的名著包括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富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孟德斯鸠的《法意》（即《论法的精神》）以及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斯宾塞的作品。他在图书馆还涉猎了有关外国诗歌、古希腊神话和关于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和地理的著作。

随着来自他父亲的资助的中断，他的好日子结束了。这也难怪，看到这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待在城里什么活也不干，几乎一个月换一所学校，不停地问家里要钱，毛贻昌自然心中不快。哪个做父亲的会对这样的儿子感到满意呢？每当毛泽东看中了一所学校、准备报名的时候，都会给父亲写信，请这位被他称为“老祖宗”的人给他寄钱。寄来的钱中，必有一元钱是报名费。长沙居，并不易，对于一个没有工作的学生来说，尤其不易。毛泽东为什么不去找份工作而宁愿依赖他的父亲？在长沙这样的大城市里，工作机会是很多的，当然，许多活都是不那么体面的。这个省会当时正在急速发展中，许多住宅在建，许多马路在铺，商业也很兴旺。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就会知道毛不可能去做诸如搬运工和码头工人这样的苦力，更何况这类工种常常是受黑社会控制的。可是，难道真的没有适合他干的活吗？他完全可以去做一个家庭教师或者广告词撰稿人。事实上，毛泽东压根就没有考虑过就业的可能性。从他的性格和经历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自尊不允许他去谋生。毕竟，他是一个学生，一个潜在的、未来的绅士，一个知识分子，因此，他属于比士兵、农民和苦力们更高的阶级，是“王子”而非“贫儿”！当然，因对体力劳动抱如此认知，毛泽东有某种负疚感，但他并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感受的人。也许可以说，他的自视甚高，在他所属的那个社会集团中是一种普遍现象。不仅是毛泽东，就连那些来

自更贫寒的社会阶层、仅仅接受过初等教育的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个几乎人人都是文盲的社会中，也免不了有一种高人一等的感觉。30年后，在对党内同志所做的一次公开报告中，毛泽东回忆了他当年在长沙的生活，并承认道：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象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最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76]

在大街上，毛泽东经常会碰见苦力、建筑工人、码头工人、走街串巷的小商贩和其他各类不幸的人，还有无数的乞丐向行人们伸手乞讨。革命没有给这部分人民的生活带来任何变化。工人们依旧起早贪黑地苦干，所得甚微，直到累倒。乞丐们依旧沿街乞讨。从早到晚，大街小巷挤满了衣衫褴褛的搬运工人。长仅过膝的短裤和宽松的上衣是他们的常见装束。有的用长长的扁担挑着货物，有的推着独轮手推车，轮子上面横向捆着一块小木板。这两样东西就是当时主要的城市交通工具。有一种独轮车是由人在前面拉的，拉车的苦力肩上套着一根厚厚的、与车相连的皮带当作挽具，两手紧紧地攥住长长的竹制把手。还有一种用来载客的独轮手推车，乘客坐在轮子两边的长木板上，一个苦力在后面用力推行，全身的每一块肌肉都绷得紧紧的。繁重得令人窒息的劳动使得这些运输工人的脸显得憔悴不堪。他们难得休息，也只有在休息的时候他们才能喝上一杯绿茶，吃上一小碗饭，或是抽上一口烟。一位目击者曾这样描述他眼中的长沙搬运工人：

我们路过许多店门大开、没有橱窗也不需要橱窗的店铺。苦力们穿梭在大街上，挑着或推着沉重的稻谷、蔬菜，还有盖房子用的梁木和石块。

有时候他们搬运的是比木材和石块还要贵重的东西。有一次，我们发现，一根扁担的一端是一个竹筐，一个衣着鲜艳的小孩坐在里面，好奇地望着我们。挑夫在拥挤的人群中见缝就钻，还不断地喊道：“让一让，让一让！”我们注意到，许多苦力在一个小茶馆里呷着热茶，稍事休息。还有一些走街串巷的烟贩，他们把长长的竹筒改制成可以共享的烟筒，人人都可以上去吸几口。围在竹烟筒周围的顾客有不少是苦力……

我们在一条街上遇到了一个老太太。她身穿一件有衬里的蓝色外套和一条蓝色裤子，坐在一辆颠簸不稳的独轮车上。这个繁忙的城市里喧闹的街景看来使她很陶醉。她的同其他中国妇女一样的小脚显然使她足不出户，一辈子也没离开过自己所在的村庄，但今天的她竟然亲眼看到了省城！独轮车的另一边放着她一天来所买的东西，包括装在颜色艳丽的盒子里的糖果和两只云南火腿，所有这些东西都用一块色彩明快的方布巾扎在一起。手推车的颠簸使得欣赏美景的她不得不时刻注意身边的白色小茶壶和水烟筒，免得它们翻倒或掉到地上。^[77]

那时的毛泽东对于劳动阶级的苦难尚没有深刻的了解，他更关注与中国的民族复兴有关的诸多重大问题。然而，没有糊口的钱，就不可能进行他的哲学沉思。他的父亲发火了，威胁说，如果儿子再不务正业，就休想得到他的资助。毛终于做出了一个决定：做一名教师。在给父亲写信告知这一决定之后，他得到了一笔钱，也得到了父亲的许可。1913年春天，他成为新成立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学生。

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结识的朋友萧三先于他考进这个学校，说服他来这个学校的，也是萧三。^[78]这个学校规模不大，学生只有两百人左右，学费全免。一年以后的1914年3月，湖南省教育当局把这所学校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者规模更大，办学条件更好，有一千多名学生。毛和所有四师的学生



毛泽东的第一张照片（1913年春天摄于长沙）。



毛泽东求学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一起，自动转入新的一师。该校位于长沙市南城墙之外，地处市区的最南端，其校舍是一座两层楼的石制建筑。第一师范学校是长沙的一所名校，始建于清末时的1903年。其教学楼在当时的长沙是最摩登的，属于欧式建筑，故长沙市民称其为“西洋宫殿”。一条铁路经过校园右侧，再往右就是雄伟的湘江。

在这里，毛泽东很快就结识了一位好友，此人名曰萧子升，又名萧瑜，是萧三的哥哥。毛入学的时候，萧子升已是三年级学生，而且被公认为全校最优秀的学生。从两人第一次见面起，萧子升就对这位新生产生了敬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毛与他特别亲密。直到1921年，两人才分道扬镳，起因是，萧瑜坚决反对成立中国共产党。在毛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多年后的1959年，当时寓居在乌拉圭的萧瑜发表了一部关于毛的青少年时代的回忆录，书名是《我和毛泽东行乞记》。^[79]

下文是萧瑜对这位新同学的第一印象。

这个个子高高的、举止有点笨拙、衣着肮脏的韶山小伙子穿的鞋子已经坏到非修不可的地步了……毛的外貌并非如某些人认为的那样不同寻常。头发盖住了他的前额，那样子就像古

代画家画的魔鬼一样。他的容貌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对我来说他一直是一个相貌平平的人。他的脸很大，但眼睛不大，眼光也不犀利。有些人认为，有着这种眼睛的人往往很狡猾，但从他的眼神里看不出一点狡黠的样子。他的鼻梁不高，是典型的中国人的鼻子。两个耳朵不大不小，比例匀称。嘴很小。牙齿洁白整齐。一口洁白的牙齿使得他的笑容特别迷人。仅凭他的笑容，没有人能够怀疑他的真诚。他走路很慢，走的时候两腿有点向外分，那种走姿不由得使人想起鸭子。无论是坐着还是站着，他的一举一动都很慢。他讲话也很慢，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是一个天才的演说家。^[80]

虽然毛衣着寒酸，但同东山小学堂的学生们不同，第一师范的大部分学生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位同学。他们都已成年，看人重在内涵，而非以貌取人。说实在的，毛泽东不是一个特别勤奋的学生。他已告别了少年时光，因此他认为自己有权仅仅学习自己感兴趣的、学来容易的课程。英语、算术、自然科学和美术都令他兴味索然，他只对社会科学和文学感兴趣。他的作文总是能获得最高分，而在这所学校里写作能力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才能。因此，尽管有着种种不足，毛在这所学校里还是过得如鱼得水。他对读书的爱好一如既往。“毛泽东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国和欧洲的哲人和作家们的著作，在他的日记里对于这些作者的思想做了大量总结和发挥。”萧三回忆道，“他写东西非常快，灵感似火花一样不断地从他的笔尖^[81]飞溅出来。他的作文常常作为范本贴在学校的墙上。他的阅读速度是其他人的两到三倍。在图书馆读书的时候，他的前后左右总是堆满了书。”^[82]

毛泽东在这所学校里还同另一位同学结成了密友。这个人当时的名字叫蔡林彬，与萧氏兄弟和毛的母亲一样，也是湘乡县人。他的真正的名字叫蔡林和仙，在当时的中国，改名字是司空见惯的事。他在考入第一师范的时候，用的是笔名蔡彬。“彬”这个名字与其性格倒是很相配。蔡林彬天资敏锐聪慧，个头和毛泽东一样高，头发浓密，眼神忧郁、深邃，无论是外形还是气质，在一大群学生中都显得鹤立鸡群。他也是嗜书如命的人。他常常几天不洗

脸，几个月不刮胡子、不换衣服。当时恐怕没有人能够想到他后来竟然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不过那时他已改名为蔡和森。毛的另外两位同学罗学瓚和张昆弟，后来也在中共建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毫无疑问，与这些才识不俗的新人们的接触使毛受益匪浅。蔡和森对毛的生活起的作用尤其大。他花了两三年的时间说服毛认识到了“工农问题”的重要性，同时向毛解释了成立中国自己的共产党的必要性。

在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人还是他的老师，这也是很自然的。其中有四位教师特别值得一提。第一师范学校以其高素质的师资而著称，其中不少人留过洋，能说一口流利的外语，如英语、法语和日语。因而毫不令人惊奇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能够受聘到包括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在内的中国第一流的大学任教。在一个名叫袁吉六的教师的指点下，毛泽东学会了写一手漂亮的散文。这个老师又名袁仲谦，人人都叫他“袁大胡子”。徐特立和方维夏这两位曾经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1911年革命的教师，则使毛坚定了其对共和制的信念和爱国情操。徐特立的人格魅力尤其使毛佩服得五体投地。为表示其对立宪的诚挚之心和决心，徐曾经切掉自己的一个手指，给清朝的预备立宪委员会的代表们写了一份血书。在这份血写的请愿书里，徐恳请预备立宪委员会的代表们尽全力说服清廷举行选举，召开国会。徐方二人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成员。^[83]



毛泽东敬爱的老师杨昌济教授。

然而对毛泽东来说，在一师读书期间最重要的收获来自与杨昌济教授的相识。杨是一位衣着整洁不俗、年纪刚过四十的谦谦君子。他在中西哲学和伦理学方面的广博学识使他的学生们为之倾倒。他参加过1898年的变法运动，认识许多中国知名的教育家，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一些追随者也是挚交。1903年他出国留学，在日本、英国和德国学习多年。1913年他回到长沙，旋即收到湖南都督谭延闿的聘书，请他担任省教育厅厅长。^[84]他婉拒了邀请，宁愿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做一个普通教师，而不愿在政府高就。在四师与一师合并以前，他也一直在

四师兼课。毛泽东第一次遇见他就是在四师，时为1913年秋。从此开始了师生之间长达七年的友谊，直到杨昌济于1920年1月中旬逝世。

两人之间的情感可谓惺惺惜惺惺。关于杨昌济，毛泽东曾对斯诺说了下面这席话：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85]

下面则是杨昌济对自己的这位得意门生的评价：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农家多出异才。^[86]

由于教学有方、博学多才，杨昌济教授在学校里有“孔夫子”之称。除了伦理学，他还教逻辑学、哲学和教育学。^[87]他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信徒，但在他的理解中，这种自由主义又与明代著名的儒家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9）的教诲纠缠在一起。王阳明是赋予个人以首要价值的少数中国思想家之一。杨教授还致力于传播另一位大儒王船山（1619—1692）的思想。后者也强调个人人格独立的重要性。^[88]

杨昌济对其学生的吸引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学生们可以连续几天听他上课或与他对话而不感到厌倦。学生们甚至在周末跑到他家里去聚会。常去他家的学生包括毛泽东、萧氏兄弟、蔡和森和张昆弟。“一群严肃的青年思想家聚集在……杨先生身边，”萧三回忆道，“他对我们的影响至深且巨。他能令他的听众如痴如醉、钦佩不已。”^[89]“杨先生人格高尚……他的高贵的气质和年复一年的辛勤

教学赢得了学生们的极大尊敬。”杨去世之后，他的学生们合写了一篇讣告以纪念他们所爱戴的老师^[90]，讣告的作者中就有毛泽东。

像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这样的观念本来应该为杨教授的学生指出一条对中国社会进行自由的和民主的重建的道路。可是，杨教授在与学生们讨论王阳明和西方哲学家们的这类观念的时候，其重心不在于强调抽象意义上的、为所有人谋自由的思想，而是将其置于“英雄与群氓”的架构之下，用一种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方法来讲授和讨论这些观念。他宣称，中国所需要的是强有力的个人，要求他的学生坚持自我修炼，每天不辍。他忠告其学生们说：“克己之功夫多，存养之功夫太少。”“须从存养多下功夫，则可免克己之苦矣。”^[91]杨昌济相信强者有权使自己摆脱公众道德的束缚，他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阐释王船山关于古代的道德观念已不适用于现代世界的主张的。同王船山一样，他也谴责传统的儒教徒的复古理想。在毛的这位老师看来，伦理学一般说来只应该用来服务于一个目的：个人的自我实现。

在这位精神导师的影响下，毛泽东阅读了《伦理学原理》的中译本，这本书的作者是19世纪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泡尔生。作者在此书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一个人如果全神贯注于一个精心规划的目标的实现，那么，这个人追求目标的行动本身，就是最高的和绝对的价值。这一断言使毛确信，伟大的个人的百折不挠的意志凌驾于所有其他伦理原则之上。用人们更熟悉的一句话来说，毛所确信的，就是“目的证明手段正当”。这个想法恰如其分地反映了这个自信、倔强、梦想建功立业的乡下青年的性格和意向。他在《伦理学原理》这本书上写下了总计多达12 000多字的批语。这本书对他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我们从下面这些批语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正鹄与知识无关，而独关系于感情与意志。……道德非命令的而为叙述的。……以广义言之，人类无普通之道德。……道德与时代俱异，而仍不失其为道德。……道德因社会而异，因人而异。……盖人有我性，我固万事万念之中心也，故人恒

以利我为主……利他由我而起点也，利他与我有关系也。谓毫无己意纯以利他为心不可也，世无从他而起点者也……泡氏亦以个人主义为基础，此个人主义乃为精神的，可谓之精神之个人主义。……若盲目之道德，固毫无价值也。……吾于伦理学上有二主张。一曰个人主义。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个人，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我疑惑自然冲动未必非真，义务感情未必非伪。……吾人惟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92]

从上述言论中只可能得出一个结论，毛是这样表述这个结论的：“或人之说，必以道德律为出于神之命令，而后能实行而不唾弃，此奴隶之心理也。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己以外尚有所谓神乎？”^[93]

一个不受道德束缚、为实现一个伟大目标而奋斗的强者，在这里呼之欲出。发号施令的意志和不受限制的权力，在这里跃然纸上。我们这位中国版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所吸收的，就是这些思想。这位拉斯柯尔尼科夫把自己放在与上帝同等的位置上。他不仅想要成为拿破仑或彼得大帝那样的人物，还想做救世主。如此解释自由主义，确是别开生面！不是为每个人谋自由，而是由他来给世人立法。

*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是19世纪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这里倒用得上笛卡尔的那句名言：“我思，故我在。”翻来覆去，毛泽东强调的，无非是一个代词：“我”。在这个问题上，他已经偏离了“阶级道德”和“阶级斗争”，他已经自觉到了自己的伟大，因此，他写出下面这段话也就不足为奇了：

豪杰之士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以成其为豪杰焉。本性以外之一切外铄之事，如制裁束缚之类，彼者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动力排除之。……彼但计此动力发出之适宜与否，得当与否。适宜也，得当也，则保持之，否则，变更之，以迁于适宜与得当焉。此纯出其自计，决

非服从外来之道德律，与夫所谓义务感情也。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发其动力，奋发踔厉，催陷〔廓〕清，一往无前，其强如大风之发于长谷，如好色者之性欲发动而寻其情人，决无有能阻回之者，亦决不可有阻回者。苟阻回之，则势力消失矣。^[94]

芸芸众生，也就是群众，必须盲目听从伟人的指挥！毛对此深信不疑。他的一个基本假定是，人民一般说来都是愚昧无知的，中国人民尤其如此。1912年6月，当他还在省立第一中学读书的时候，写过一篇短文。此文以轻蔑的笔触提到了中国人民的“无知”，说这种无知使中国人不能正确地评价在他看来具有进步性的商鞅的政策。生活于公元前4世纪的商鞅是法家学派的创立者，秦国的一个大臣。“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毛泽东写道，“民何惮而不信？……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95]商鞅是古代中国最嗜血的大臣之一，他建立了一个残酷的暴政，力主“统一思想”，这些事实没有使毛感到丝毫不安。毛所在意的只是，商鞅成功地把他的意志凌驾于群众之上，成功地获得了权力，并通过他的骇人听闻的改革使秦国强大起来。他的老师对这篇文章十分满意，还批给其他同学“传观”。

在那几年毛泽东笃信并力行体力上与精神上的自我完善，其程度不亚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那些主人公。毛和他的同学们不同于俄国民粹主义者的唯一之处在于，前者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矢志拯救他们的祖国而非拯救普通人民。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渴求斗争和英雄式的自我牺牲，都不惮于用非常态的手段折磨自己。在同样狂热的念头的驱使下，毛和他的同学们也都相信意志和理智的至高无上。他们否认上帝的存在，坚信自己有随心所欲的权力。我们不知道毛是否也曾像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一样，为了磨炼自己的意志而睡在钉满铁钉的床上。但是，他和他的朋友们为了迎接未来的斗争而刻意从事锻炼，则不是什么秘密。正如他对斯诺所说的：

我们也成了热心的体育家。寒假里，我们长途跋涉，穿过田野，翻山越岭，绕着城墙走，渡河过江。烈日炎炎时，我们也脱去衬衣，把它叫做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便高声喊叫，说这是一种新的体育项目，叫做“风浴”。在已经下霜的时候，我们还睡在露天，甚至在11月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归于“体格锻炼”一类。^[96]

毛及其朋友们的许多做法其实都是在效法杨昌济教授。后者不论季节，常年坚持在冷水里游泳。^[97]

毛泽东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题为“体育之研究”，这绝不是偶然的。此文于1917年4月发表在上海出版的一份很有影响的杂志《新青年》上，署名是“二十八画生”，因为“毛泽东”这个名字在当时的繁体汉字里共有28画。文章是杨昌济推荐给这家杂志的。^[98]“国力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99]毛在这篇文章里向读者推荐了一套他自己设计的锻炼方法，还建议读者们效法他那位伟大的湖南同乡、太平军的征服者曾国藩将军，说曾国藩60岁的时候还坚持体育锻炼和精神修炼。曾国藩是与商鞅一样残暴的专制统治者，对于这一点，毛同样不以为意。他感兴趣的只有一点，即这位曾将军是一位成就了旷世功勋的名人，他所梦想的也正如此。毛认为体育不仅能够使一个民族体魄健康起来，还能够磨砺人民的意志，而且，后者比前者更重要。他在文章中强调说：“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100]1918年初读了泡尔生的书之后，毛写了一篇文章《心之力》。可惜的是，此文已佚。有关此文，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杨教授非常喜爱此文，给了一个满分：100分。^[101]

毛泽东有志做一个强势的、率性而为的、目标明确且不受任何道德羁绊的大英雄，这一事实并非不可理解。他还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无拘无束的气质使他无法让自己平静下来。历史上的伟人使他心驰神往。然而，仅此尚不足以解释一切。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亲身经历了祖国江河日下的颓势，视其为奇耻大辱。贪婪的列强和割据一方的众多土皇帝正在剥削着他们的国家，毛的许多同龄人也都

梦想着成为能够领导国家打倒这些势力的巨人。他们是多么渴望能够击败傲慢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推翻腐败的官僚、军阀和寡头的专横统治，救民于水火之中啊！张国焘^[102]回忆说：

我与众多老师和朋友多次讨论救国之道。有一段时间我认为基督教可以提供一条出路。有时候我又确信体育是救国的关键所在。在当时的中国，体育还是一个新观念。我对救国之道的探求，到了全心全意的程度。^[103]

在爱国热情的驱使下，同时也是为了了解老百姓的生活，1917年夏，毛泽东和他的朋友萧瑜进行了一次省内徒步旅行。两人在尘土飞扬的乡间小道上走了900里。一路上结识了不少农民、地方官、绅士和商人。在某种程度上，这次旅行很容易使人想起俄国知识分子“走向民间”的活动。毛身穿一件陈旧的浅色长袍，带着一把雨伞和一个包裹，包裹里装的是一套换洗内衣、一块毛巾、一个笔记本、一支毛笔和墨水。最后这两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作为学生，他们只能通过给所到之处的老百姓写牌匾、启事和对联之类的东西来换取糊口之资。当时的毛泽东对劳动的态度显然已经有所改变。毛、萧二人吃住在农家里。在近距离地观察农民们的苦日子的时候，毛十有八九想起了自己艰苦的少年生活。在所有历史上的大英雄中间，当时的毛最想仿效的人物是刘邦。刘也是农民的儿子，百折不挠的意志驱使他组织穷人起来反抗暴秦统治，最后战胜了所有对手，建立了伟大的汉朝。毛的旅伴萧瑜当时就察觉到了毛的这种情绪。多年之后，萧瑜回忆了他和毛在这次湖南省内漫游途中，就这位使毛深感兴趣的皇帝的历史地位而进行的争论：

“刘邦是历史上第一个做了皇帝的平民，”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我认为，必须承认他是一位大英雄！”

“哦？我不这么看，”我反驳道，“刘邦是个坏人，……他太自私，太自我中心，不配做一个皇帝。”我解释说：“他不过

是一个有政治野心并且碰巧实现了这个野心的庸人而已。……他推翻了一个暴君，结果不过是让自己取而代之。秦朝没了，汉朝来了，有什么区别吗？两个朝代一样坏。……他背信弃义，毫无人性。还记得那些冒着生命危险为他打仗的朋友和将军吗？在他的军队获胜、这些人成为著名的领导人之后，他就害怕这些人中间会有人觊觎他的宝座，于是他就把他们统统杀死了。你也知道，有些人被杀后还被剁成了肉酱，有些人还惨遭灭族之祸！……他是个非常残忍的坏蛋。”

“但是，如果他不把他们杀了，他的皇位就坐不稳，他很可能坐不多久就失去皇位。”毛泽东说。

“为了成为政治上的赢家，一个人就应该杀害他的朋友吗？”萧瑜不胜惊讶地叫了起来。但是毛不想让谈话再继续下去。“我们两人当时都知道，”萧瑜写道，“他野心勃勃，自比刘邦。”^[104]

返校之后，毛泽东再次埋首于社会科学的研读，也一如既往地仔细阅读报刊。报刊之中，他最爱读的是曾经发表过他的文章的《新青年》和孙中山的《民报》杂志。随着国家形势的一天天恶化，他越来越感到有采取某种行动的必要性。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了。这位将军出身的政治家留给世人的，只有痛苦的回忆。他试图依靠北洋军对他个人的效忠，用老办法统治中国。作为一个老派的人，新的和民主的种种观念与他格格不入。在国会议员们一致推选他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他立刻开始着手建立一种不加掩饰的独裁统治。虽然中国在1912年3月有了一部赋予人民以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宪法，袁将军却试图结束被他称为无政府状态的新的政治局面，为此策划了多个反革命政变的方案。为此，他不仅遭到孙中山这一派革命党人的反对，也遭到各地军阀们的敌视，因为后者不想解散自己的武装，服从统一的法律。在1912—1913年冬，随着孙中山的同盟会^[105]在国会选举中赢得令人瞩目的胜利，政治局势的对立更加尖锐了。在众议院的全部596个议席中，国民党赢得了269席，占45%。在参议院的全部274个议席中，国民党获得了123席，占44.8%。^[106]在获得了西方列强所提供的2500万英镑^[107]

的贷款、由此确保了列强对自己的支持之后，袁世凯开始为内战做准备。1913年3月，袁采取了第一个反击行动：在他的指使下，国民党的议会党团领袖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杀。与此同时，北洋军开始在华中地区重新部署，占据了各个战略要地。面对这些挑衅，一场名为“二次革命”的反袁起义在南部省份江西爆发了。国民党人积极参加了这次起义，还有几个省份也参加了起义，但都被忠于大总统的军队镇压下去了。1913年11月，袁世凯宣布取缔国民党，孙中山不得不再次亡命日本。与此同时，国会遭解散，宪法被终止。新的宪法实际上把所有权力都拱手送给了总统。1914年12月，再次召集了国会，但这已是一个对袁世凯的意志俯首帖耳的机构，它干脆宣布袁世凯为终身总统。

然而，到了1915年，袁世凯的权力遭到了实质性的削弱，他甚至失去了其最亲密的伙伴的支持。其第一位的原因，在于日本采取的咄咄逼人的侵华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1914年11月7日，日本就以协约国的身份出兵占领了德占区，即青岛港和环胶州湾地区，二者都位于中国东部的山东半岛南部海岸。德国是在1898年获得对上述地区的控制权的。由德国人建的、连接青岛与山东省省会济南的铁路的控制权，也同时被日本攫取。曾经属于德国人的矿山也被日本夺取。鉴于其他列强深陷欧战泥潭，日本于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提交了一份最后通牒，此即所谓的“二十一条”。如果被全部接受，中国就等于是日本的殖民地了。日本的无礼要求使中国知识界群情激奋。慑于日本直接出兵的威胁，袁世凯于5月7日被迫接受了其中的大部分条款。然而，到了这个关头，中国国会也不再愿意跟着袁走下去了，它拒绝批准袁与日本人达成的协定。1915年5月25日，袁世凯只得在协定上盖上总统自己的大印。一场反日运动在中华大地上兴起。年轻人尤其义愤填膺。当时的毛泽东写了一首小诗，以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

何以报仇？在我学子！^[108]

1915年12月底，在其美国顾问弗兰克·古德诺的建议下，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他宣布自己就是新皇帝，改年号为洪宪。这一举动再次激怒了公共舆论，云南、广西和贵州三个西南省份宣布独立，内战再次爆发。内战尚未结束，袁世凯就意外地死于尿毒症，终年57岁。继任总统是参加过武昌起义的黎元洪将军。

所有上述事件自然会影响到湖南的社会政治局势。湖南省都督谭延闿于1912年加入了国民党，原因是，他认为加入国内最受欢迎的政党有助于巩固他的政治地位。1913年，他参加了“二次革命”，宣布湖南独立，谴责袁世凯是篡位者。可惜，这一次他押错了宝。袁大总统派兵打他，袁军占领了长沙，谭延闿被褫夺了一切职务，仅以身免。袁世凯的门徒、保守的将军汤芑铭控制长沙。虽然汤曾留学欧洲，风度也堪称优雅，他在湖南实行的却是恐怖统治，竭力铲除民主的一切幼芽。任何形式的政治活动，包括大、中、小学的学生集会，一律被禁。^[109]因其残暴，湖南人称其为“汤屠户”。在汤屠户统治湖南的三年期间，有4000到5000人因为政治原因而遭杀害。在当时的长沙有这么一个广为流传的流言，说是一个教师因为在学生作文的批语中对袁世凯使用了不够恭敬的词，就被逮捕并被活活饿死。^[110]黎元洪在北京就任总统后，恐怖统治才告一段落。1916年6月，袁世凯在湖南的这位追随者装扮成农民，逃往上海，其政治生涯随之终结。^[111]谭延闿重掌权柄，但好景不长，一年后就被傅良佐将军取代。再往后，随着被湖南人称为“张毒”的张敬尧将军入主长沙，恐怖统治卷土重来。^[112]

袁世凯是最后一位努力维持中央集权的王权的中国领导人，他的死使整个中国陷入混乱的泥潭，湖南也不例外。国家四分五裂。众多军阀控制下的、由破产农民和其他头脑愚钝的失业者组成的各支军队，把国家拖入同室操戈的内战的深渊。西方列强出于向中国出售军火的考虑和攫取更多的经济特权的利益驱动，对中国的内乱推波助澜。

因此，毛泽东有足够的理由对祖国的命运感到忧虑，这种忧国忧民的心态使得他日益怀念那些伟大的和战无不胜的古代统治者。在他看来，正是由于他们的能力和意志，他的祖国才得以引起其邻

邦的恐惧，进而获得了“中国”这个令人自豪的名称。中国的意思就是“中央王国”。那时的毛认为，只有力量才值得尊重，只有一个强权才有能力统一和振兴中国，只有在一个全能的强权者面前，芸芸众生才会俯首帖耳。值得注意的是，那时的毛不仅敬重做了皇帝的刘邦，对于人人痛恨的湖南暴君汤芑铭，他也不无敬重。在这个嗜血的都督逃离长沙后不久，毛给朋友萧瑜写了一封言辞尖刻的信，信上说：

湖南问题，弟向持汤督不可去……汤在此三年，以严刑峻法为治……秩序整肃，几复承平之旧。……其杀人万数千也，亦政策之不得已耳。彼江宁冯氏^[113]之杀人，比此谁多少？……谓其制造民意，逢迎袁恶，污渎善类，似矣。然云、贵、广西诸省，曷尝无此等事哉！图远者必有所待，成大者必有所忍，护国之目的，不如此不足以达之，以此为罪，非知大计者也（杀人、污善二事，在严格的伦理学则当别论）。^[114]

后来，他又写道：“……并非谓凡杀人为恶。”“吾人之所谓恶，仅写象非本体。”^[115]

以上推理确实令人毛骨悚然。如果他当时读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而非泡尔生的书，那又会发生什么呢？但是在当时的中国，陀思妥耶夫斯基还鲜有人知。即使他当时读了陀氏的书，恐怕也不会喜欢。这个湖南小伙子的心思与众不同，一想起自己的远大抱负，他就心潮澎湃，迫不及待地想要尽快到达权势与荣誉的顶峰。

书斋方数日，世上已数年，不知不觉时光已走到了1917年的秋天。毛泽东已经24岁了，尚没有干成什么大事。他还在贪婪地博览群书，想从书卷中找到真理。现在到了做点什么实事的时候了。他终于发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他骚动不安的心灵渴求战斗、战争与革命。他写道：

然长久之平安，毫无抵抗纯粹之平安，非人生之所堪，而不得不于平安之境又生出波澜来。……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

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116]

就在他写下这些话的同时，他曾对蔡和森和张昆弟说，他有一个愿望，就是把自宋以后（也就是13世纪以后）中国所有的诗集文集统统付之一炬。显然，他认为那些诗文没有足够的进步意义。他还充满激情地告诉朋友说，应当破除传统的家庭束缚，在师生关系方面，也应该来一场革命。^[117]

多年之后，他把自己这些年轻时期的情绪归结为一句口号：“造反有理！”这也是全世界都已公认的、专属于毛的政治信条。而在当时，他仍在与其友人们梦想着未来的种种可能性。不过他的梦想的轮廓正变得越来越清晰。在1917年9月的一个温暖的日子里，毛和其朋友们到学校后面的一座山上郊游。他们一边爬山一边争论如何救国的问题。毛泽东语气坚定地说：“学梁山泊好汉！”^[118]梁山泊好汉就是他心爱的小说《水浒传》里那些造反的农民。

★ 第四章

空谷足音

1918年5月，杨昌济教授接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一纸聘书，请他到北大执教。蔡元培是著名的教育家、哲学家和西方文献的翻译家，也是孙中山所在的那个党的成员。这是一个杨所无法拒绝的邀请：北京大学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和最具有自由主义气息的高等学府。同年6月初，毛泽东送别了杨昌济，但两人分离的时间并不长。6月底，杨教授给他的这位爱徒写了一封信，敦促毛速来北京与他见面，说北京有一批男女青年正筹划去法国勤工俭学。杨昌济劝告毛和他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这个了解世界的好机会。^[119]

这时的毛泽东正全力忙于政治与组织活动。他的组织才能的第一次展示是在1915年秋。当时暑假刚刚结束，毛一返校就发出了一则面向长沙各校的启事，邀请有志于从事爱国工作的年轻人与他联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求友之心甚炽”^[120]。已有的几个同学兼朋友对他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毛想扩大他的社交圈子，结交几位“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这则征友启事上的署名就是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到过的“二十八画生”。^[121]

五到六个人做了回复。^[122]但只有三人表示有兴趣参加这个爱国的小团体。其中一人是一个名叫罗章龙的19岁青年。他在与毛联系时用的是一个日本人的姓名“纵宇一郎”。罗是从一位在长沙第一中学读书的朋友那里听到这则启事的，他立刻给毛去了一封信。多年之后，罗章龙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一位较为重要的领导人，但在1931年被开除党籍，原因是他反对奉行斯大林主义的党的领导层。另外两个加入毛泽东发起的这个小组的年轻人后来都成为极

端反动的人物。

毛还收到一个回复，或者说是“半个回复”，回复人是正在长沙一所中学念书的李隆郅，他是被罗章龙劝去与毛会面的。根据毛的回忆，李与毛的会面相当奇特。“李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123]李隆郅对此的解释是，他当时刚从乡下来到省城读书，毛令他感到局促不安。这位22岁的、非常博学的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表现出的良好教养令李自愧弗如。^[124]李的这种自卑感在五六年后已消退殆尽，当时的他已改名为“李立三”，是中国劳工运动的一个主要组织者。1928年，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上的一把手，从此直到1930年底，他一直是中共领袖中数一数二的人物。在那几年，毛得听他的指挥。

但这些都是后话了。而在当时，在罗章龙和其他几位同学兼好友的帮助下，毛泽东竭尽所能，匆匆网罗了一批爱国青年。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几个滑稽的小插曲。其中之一是，一所女校的管理部门得知了毛泽东的征友启事之后，误以为这是一个登徒子寻觅床上伴侣的广告。这场闹剧尚未开场就结束了，一师校方出面为毛泽东的品行做了担保。^[125]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毛身边聚集了一些人。^[126]其中的一个人告诉毛：“（你的信就像）空谷足音，蹙然色喜。”*

下面是毛泽东对这个小团体的回忆：

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青年，他们没有时间讨论种种琐碎的小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必须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非常危急，求知的需要非常迫切，容不得他们去讨论女人或私事。我对女人不感兴趣。……青年人到了这个年龄，谈论女性的美在他们的生活中通常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我的同伴不仅不谈这个，连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情也不谈。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青年的家里，他对我说起要买些肉，并且当着我的面把佣人叫进来，同他谈这件事，然后吩咐他去买一块。我很生气，以后再也不见这个家伙了。我和朋友们只

* 此处所言不确。罗章龙看到毛泽东的启事后给毛回了信，毛在给他的复信中引用了《庄子》中的一句话：“空谷足音，蹙然色喜。”此处转引自 Li Jui, *The Early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of Comrade Mao Tse-tung*, pp. 74-75。李锐弄错了，或者是李锐此书的英译者弄错了。不是潘佐夫的错。——译者注

愿意谈论大事——谈论人的天性、人类社会的本质以及中国、世界乃至宇宙的发展规律。^[127]

1917年6月，毛泽东当选为一师的最优学生，此事充分说明了他在该校学生中所享有的威望。获得这个荣誉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在每个春季学期行将结束时，都会选出几个最优秀的学生，但其中只有一个幸运儿能够获得“年度优秀学生”这一称号。在毛当选的这一次，他共得了49票，就是说，多数学生投了他的票。^[128]此事过去不久，毛再一次展示了其组织才能。1917年9月底，他在一师发起成立了湘潭同乡会。与此同时，他对一师学友会的活动也更加热心，把越来越多的时间用于该会事务中。结果，两周之后他当选为学友会总务。^[129]

学友会当时的第一要务是恢复工人夜校，这个夜校是一师部分学生在六个月前开办的。但到1917年夏天的时候，夜校已难以为继，到了秋天就完全停办了。在毛泽东的努力下，工人夜校才恢复起来。11月9日，夜校正式复课。^[130]复课后的夜校共有102个学生，其中的多数人都是到城里找活干但什么活也找不到的失业者。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改变了对普通老百姓的看法，他已经成熟了，不再鄙视他们，尽管依旧认为自己在社会地位上要高他们一等。他进一步推论道：

草木鸟兽，同兹生类，犹宜护惜，而况人乎？小人原不小了，他本不是恶人，偶因天稟之不齐，境遇之不同至于失学，正仁人之所宜矜惜，而无可自诿者。^[131]

在这所夜校里，“人类的救星”毛泽东承担了中国历史的教学，这也是他生平第一次给别人上课。^[132]

1917年11月，毛泽东积极参与组织了一个旨在维持学校秩序的学生志愿小组。时逢乱世，中国各地内战方酣，湖南也不例外。士兵们经常占据校舍，而一师紧邻一条支线铁路，显然有某种战略价值，因而对军队有相当大的诱惑力。进入校园的士兵们难免对学

生动粗，尤其是对女学生。此类事件总是引起社会上的义愤和抗议。1917年11月，傅良佐开始担任湖南督军。在其统治期间，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成功地抵制了本地军队征用校舍改为营房的要求。在一个危险的关头，毛泽东组织了学校的防御，用萧三的话来说，看他那“发号施令的样子，就好像自己有军事部长的授权一样”^[133]。毛多少有一点军事经验，尽管这点经验极其有限，这是他与教师们和其他学生不同的地方。进入11月之后，形势越来越紧张。当时，傅良佐的军队在与贵州军阀谭浩明的交战中吃了败仗，一路后撤的溃军对老百姓滥施淫威。其中的一支溃军出现在一师附近，看样子想攻进校园。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挺身而出。他联络了附近的警察局，说服了几个警察前来帮忙。一支学生自愿军也组织起来了，但其装备只有木制的假来复枪和竹制的棍子。毛是这支“军队”的指挥官。他毕竟当过兵，也是学友会的总务。学生兵和警察埋伏在预定地点，等到溃兵靠近校门的时候，毛命令警察开枪（只有他们才有真正的来复枪）。紧接着，学生兵点燃了放在空油箱里的鞭炮，同时大喊道：“傅良佐早就逃跑了！贵军已经进城了！只要你们缴枪，我们既往不咎！”事实上，谭浩明的军队还没有攻进长沙城，但溃兵们并不知道这一点，个个心惊胆战，只好投降。^[134]事后，1917年11月号的《一师校志》上登了这么一句话：“湘南战事紧急，风鹤频惊。学生组警备队分夜梭巡，警卫非常。”^[135]

萧三后来回忆道：“我当时就坚信：他日后一定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将军。”^[136]当时的毛泽东对军事特别感兴趣。不仅是中国，整个世界那时都在打仗。通过每天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报纸，毛密切地关注着欧洲战事的发展。他不仅去图书馆看报，还订了几份报纸。据他自己估算，他把父亲寄给他的钱的三分之一都花在购书和订报上了。^[137]他还有一个奇特的习惯：在把每天的报纸从头到尾看完以后，就把报纸四周的白边剪下来，再把这些无字的长纸条用针线钉起来。萧三告诉我们说：“他把报纸上出现过的各国的地名都写在这些纸条上。”毛对波兰境内的马祖里湖和法国的马恩河特别感兴趣，因为前者是1914年9月俄军惨败的地方，后者离巴黎不远，该河两岸是德军攻势被遏制住的地方。^[138]

1917年冬天，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产生了一个念头：把志同道合的同志们组织在一个紧密的团体里。“我和其他城市的许多学生和 朋友建立了广泛的通信联系，”毛告诉埃德加·斯诺，“我逐渐开始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更严密的组织。”^[139]这个组织终于在1918年4月成立了，其名曰“新民学会”。显然，毛泽东和他的伙伴们并没有在这个组织的名称问题上花太多的心思。他们直接从梁启超那里借来了这个名称：“新民”一词取自这位改革家在横滨主办的《新民丛报》杂志。“新民学会”这个名字是萧瑜起的，其他人毫无异议地立刻接受了。

学会的成立大会于1918年4月14日清早在荣湾村中蔡和森 的家里举行，这一天是星期天。荣湾村位于湘江左岸、岳麓山脚下。会场是一片浓密的绿荫掩映下的一个简陋的小屋，与会者共有13人。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一天天气晴好，微风吹拂着蔚蓝色的江水和湘江两岸艳绿色的小草。这一美景给所有与会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140]除了主人和毛泽东以外，与会者还有他们的老朋友萧氏兄弟和张昆弟、罗章龙等人。与会者中也有几张新面孔，其中一位是年已42岁的何叔衡。1913年，他与毛同时考进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14年3月，由于一师与四师两校合并，二人再次成为同学。但何叔衡毕业很早，只在一师待了几个月。1914年7月起，他一直在一所小学教语文课。何个子很矮，两肩很宽，不苟言笑，为人低调，总是戴着一副大而圆的眼镜。年轻的同志们非常尊重他，但因为他蓄着一脸黑胡子，看上去像一位老派的绅士，又开玩笑地称他为“何胡子”。他实际上是一位农村知识分子，18岁时就考中了秀才。毛和萧瑜在1917年暑假于湖南省内漫游时，曾到他位于宁乡县 的家中拜访过这位何胡子，三人从此结为好友。^[141]这位无私的、精力异常充沛且目光敏锐的人在毛的成长过程中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在毛泽东1920年组织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过程中，他是毛最亲密的助手。1921年他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42]何叔衡对毛评价极高，认为毛是一位非凡的人。^[143]尽管两人年龄相差很大，但何一直很尊重毛，从未质疑过毛相对于他的优势地位。

在树荫下集会的这些人讨论了这个组织的会章。会章草案是毛泽东和另一位会员邹鼎丞早在3月就起草好的。其部分内容如下：“学会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所有会员须恪守如下规则：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会章还规定，新成员入会，须满足以下条件：有至少五个会员的推荐；缴纳一元入会费；半数以上会员的批准。每个会员每年还需缴纳一元会费。^[144]

会章通过后，选举了学会的领导人。萧瑜当选为总干事，萧瑜的弟弟萧三在会上曾建议选毛泽东做总干事，但被毛婉拒了，他情愿做萧瑜的两位助手之一。^[145]新民学会最多时拥有70~80个会员，包括几位姑娘，如李思安、陶毅、蔡畅和向警予。李思安是湖南蚕业学校的学生；陶毅是第一师范的学生，也是杨昌济教授的得意门生；蔡畅是蔡和森的妹妹；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女朋友。学会的许多成员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会员中的多数都在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事业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146]

所有会员都追求一个共同的梦想：“使个人及人类的生活向上。”^[147]学会之所以以“新民”为名，原因就在这里。尽管他们拒绝“罗曼蒂克”，但是作为个人，他们都是浪漫主义者。毛泽东写道：

这时候国内的新思想和新文学已经发起了，旧思想、旧伦理和旧文学，在诸人眼中，已一扫而空，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之追求。……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148]

学会会员经常集会，讨论现代文学，憧憬未来，使自己做好战斗的准备。在学会宗旨问题上，学会会员们很快就改变了初衷。他们不再满足于重建学术研究和重构道德教育，他们现在想要的，是“改造中国与世界”^[149]。但如何着手呢？他们真诚地希望从改变自己做起。除了使自己成为更完善、更纯粹和更聪慧的人的崇高理

想，以及为人类谋幸福的愿望之外，他们暂时还没有任何具体目标可言。这个组织的成员李维汉后来回忆说：“学会开始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向上’‘互助’的团体。”“会员们绝大多数是青年人，都抱着要革新、求进步的热切愿望。但是对于怎样革新、如何进步，尚在摸索中，并不明确。”^[150]

我们能因此而责备他们吗？他们所天真地为之奋斗的，毕竟是美好的东西。他们若能永远停留在那个层次上，后来的历史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萧三认为，新民学会的会章，总的说来，“是儒家思想和康德主义的大杂烩”^[151]。毛泽东的评价本质上也一样。“在这个时候，”他说，“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奇特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却是肯定无疑的。”^[152]

1918年6月，毛泽东从师范学校毕业了。如他的女儿所说，当时的他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153]他既没有工作，也不想找工作。他同包括蔡和森和张昆弟在内的几个朋友一起，住在离岳麓山不远的湘江左岸的某个地方。他想创办一个公社，一个一起务农、一起探究科学的“志同道合者的工读团”^[154]。他几乎一文不名，但从不为金钱操心，因而遭到他的朋友们的善意的戏谑，说他“身无分文，心忧天下”^[155]。他把整天整天的时间都花在思考天下大事、在长沙四郊漫游和欣赏大自然的美景上面去了。站在岳麓山顶峰，长沙之壮丽美景一览无余：孔庙上略呈弧形的金色屋顶，在烈日下熠熠生辉；城墙上的八座塔楼高耸入云；地平线上，湘江在岳麓山下徐徐流淌。年轻人生来无忧无虑，毛泽东更有理由感到幸福：他不仅有许多朋友，而且这些朋友全都把他当做领袖。数年之后，也就是1925年的秋天，毛故地重游，遥想当年，挥毫作词一首：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156]。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毛喜欢吟诗弄词，许多年轻人都有这个爱好，斯大林也写过诗。不少革命家都曾有舞文弄墨的爱好，但毛直到暮年依然诗性不减。而且，如同他对待自己生活中所有其他事物一样，他写诗绝非仅仅为了消遣。

正是在这段相对悠闲的日子里，毛泽东收到了老师的信，告诉他有关招募年轻人赴法留学的消息。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蔡和森、萧氏兄弟和其他朋友，大家都很兴奋，蔡和森和萧瑜尤其激动。多年来他们一直梦想着能够出国留学，也认为法国是理想的目的地，因为它是一个民主国家，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还能有比这更好的机会吗？新民学会立即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认为有必要发起一场赴法留学运动并全力促成留法目的之实现”^[157]。会议授权蔡和森和萧瑜负责此事。绝大多数与会者，或者说，25~30个会员，表示愿意去法国留学，只有一个人表示更愿意去日本留学，还有一人因为家庭原因而声明不能离开长沙。^[158]会后，萧瑜立刻给杨昌济复信，要求提供有关北京方面组团赴法的更详细的信息。

“孔夫子”的回信一周后就到了。杨教授在信上说，他已与北大校长蔡元培面谈了此事，蔡校长同意让湖南青年参加拟议中的赴法勤工俭学计划。^[159]

这个计划最初是在1912年提出来的，其首倡者是两个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和吴稚晖。此二人也曾是近代中国第一批留法学生。他们两人都是法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家艾利歇·雷克吕的追随者，后者则是彼得·克鲁泡特金的朋友和同志。雷克吕认为，在教育与革命之间存在着某种辩证关系，他的中国门徒们也作如是观。他们认

为，如果没有科学和教育的广泛发展，一个社会的革命性的进步就将是不可能的。就事论事地看，人们很难驳倒这一观点。1905年，李石曾和吴稚晖在巴黎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1912年，两人组织了一个名为“中国留法俭学会”的团体，旨在为中国学生提供一种成本低廉的受教育方式。他们的想法是，本着“一年做工，两年学习”的原则，新来的留学生应当先在法国企业工作，以便为自己挣得学费。这个社团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吸引中国青年赴法留学，帮助他们找到打工的机会。作为所有这些设想的基础的，是这样一种核心理念：利用西方教育制度的优势，培养出“新式”的、身兼工人和知识分子双重身份的男女青年。无政府主义者相信，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使中国再生。在1912和1913年这两年，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一共帮助了100位中国学生赴法，主要分布在巴黎、蒙达尼和枫丹白露等地。1913年底，中国留法俭学会不得不停止活动，因为袁世凯认为中国学生赴欧洲留学毫无意义。^[160]1917年8月，中国加入协约国，卷入世界大战。此举使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重获生机。中国没有派兵直接参战，只是根据与法国政府达成的一个协议，派了14万劳工前往法国，其中多数人的工作是挖战壕。^[161]这件事使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再次活跃起来。深受鼓舞的李石曾开始全力以赴地组织大规模的中国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他联系了北大校长蔡元培和法国的几位公众人物，很快发起成立了一个名曰“华法教育会”的中法联合机构。其宗旨一是推动中国学生赴法留学，并力图使其制度化，二是加强中法间的文化联系。也许可以这样说，无政府主义者热衷于吸引中国学生到欧洲去的一个意图，就是实现“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一时间，北京、广州和上海都成立了相关分支机构。1918年末，也就是第一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北京、成都、重庆和保定都出现了为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而开办的预备学校。这些学校为招生对象设定的最低年龄是14岁。^[162]

在欧洲受教育的设想对中国青年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用蔡元培的话来说，其原因如下：第一，中国的高校数量稀少，水平也有待提高；第二，国内缺乏高素质的师资；第三，中国政府的教育部

和相关机构缺乏为有效组织学生的教学实践而必需的资源，诸如图书馆、博物馆、植物园和动物园这类设施都很稀缺。^[163]

收到“孔夫子”的信之后，蔡和森立刻去了北京，到京后会晤了杨昌济、李石曾和蔡元培。6月30日，他给毛泽东及新民学会的其他会员去了一封信，信中保证说，赴法一事，千真万确，敦促朋友们尽快来京。^[164]

然而，这时的毛不得不首先把家事安排好。他的母亲文素勤自1916年以来一直病得不轻。她有胃溃疡的老毛病，后来又患了淋巴结炎。我们知道，毛很爱他的母亲，为自己不能守在她身边尽孝道而深感内疚。在长沙读书期间，他定期回家探母。最近几年他的父亲和母亲的关系很僵，近于破裂。我们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随着年岁的增加，毛泽东父亲的脾气越来越坏，文素勤可能觉得实在没法再同他一起过日子了。终于有一天，她决定不再忍受，卷起自己的家私，回到老家唐家坵，住到几个哥哥家里去了。毛贻昌对此事的反应不难想象。他既猜疑又守旧，无法容忍自己的妻子背叛自己，文素勤的行为也确实不见容于儒家道德。在这件事情上，毛泽东一如既往地站在母亲一边。1918年8月初，他再一次探望母亲，不过这次是在他的舅舅家里了。他劝母亲跟他一起到省城去看病。像天下所有的慈母一样，老人家拒绝了，因为她不想给她心爱的儿子添麻烦。回到长沙以后，毛给他的舅舅们写了一封信，再次要求母亲住到长沙城里来。他计划让弟弟泽民陪母亲过来，时间定在当年晚秋。也就在这封信里，他告诉亲人们说，他打算到北京走一趟。信中没有一个字提到他将去世界的另一端——法兰西，还向他们保证说：“此行专以游历为目的，非有他意。”^[165]

其实，毛这样说，只是不想让任何亲人为他担心。他毫无保留地同意与同志们一起赴法，即将到来的海外冒险令他不胜欣喜。^[166]

8月15日，毛和他的25位同志离开长沙，踏上了去北京的旅途。他们先坐小轮船到了武汉，然后弃舟上岸，改乘火车。这是毛泽东生平第一次坐火车，而且是长途旅行，一坐就是两千多里。

他们在河南省的一个名叫许昌的小县城里耽搁了两天，因为黄河泛滥，铁路交通中断了。这一意外却使毛非常高兴，因为许

昌曾是曹丕皇帝所创立的魏国的首都，这位皇帝又是毛所喜爱的小说《三国演义》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在毛的建议下，他的几位朋友决定和他一起去探访许昌古城。他们从当地的农民口中得知，古城遗址位于该县城墙之外。^[167]不难想象当时的毛是多么激动。当时的他正准备去征服世界，对一处历经了十几个世纪沧桑的历史遗址纯属偶然的访问，对他来说充满了象征意义。古代的英雄们仿佛正在鞭策他，要他去干一番大事业，以重塑他的祖国的辉煌和强大。

第二篇

做什么？

★ 第一章

红楼之梦

经过整整四天的行程，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于8月19日抵达北京。下了火车之后，他们直奔杨昌济的家。杨家位于城区北部，离城门不远。杨见到他们后非常高兴，还主动提出可以让四个人住在他家里，其中自然包括毛泽东。^[1]他无法安置更多的客人。他和他的妻子向振熙、20岁的儿子杨开智及17岁的女儿杨开慧住在一起。这套本来就不大的住宅位于一个狭窄、肮脏的胡同里。^[2]对于老师的家人，毛并不陌生。不要忘了，在长沙的时候，他多次同一师的其他同学一起造访过杨家。应这位教授的邀请，毛泽东甚至还在1916年夏天在位于乡下的杨家做了几天客。杨昌济是板仓人，板仓这个小镇位于长沙附近，每年夏天杨都要回到自己的这个老家度暑假。毛还记得，当他接到“孔夫子”邀请他到自己家小住几日的信息时，是多么的兴奋，也忘不了自己当时是穿着草鞋、步行了60多里才赶到这个不起眼的砖结构瓦顶平房的。^[3]那一年，小名叫“霞”的杨开慧^[4]只有15岁。^[5]有点羞怯和局促的毛泽东当时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也没有和女主人即他的师母说过话。与一个不熟悉的女性交谈在当时被认为是很不礼貌的，所以毛泽东每次见到老师的妻子和女儿，都只是鞠一下躬以示尊重。只是与“孔夫子”在一起的时候毛才开口说话，而且是畅所欲言。教授家里的丰富藏书也让他如痴如醉。^[6]1916年夏季后，他与杨开慧也见过几次面，但毛那时对女性不感兴趣，因而压根没有注意到这个女孩正在出落成一位妙龄姑娘。

而今，再次见到杨开慧，毛泽东已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站在

他面前的，是一位有着性感的嘴唇和机敏黑亮的眼睛的亭亭玉立的美丽少女。毛的朋友们也被她打动了。“她生就一副圆脸，身材异常纤巧，有点像他的父亲，”萧瑜回忆说，“都是深眼窝、小眼睛，但她的肤色很白。”^[7]萧三也喜欢这位“异常宁静且心思缜密的姑娘”^[8]。

“小霞”的心也被这位“资质俊秀”的韶山小伙子俘获了，她已从父亲那里听到不少关于这个年轻人的事情。“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我就爱了他。”几年后她回忆道：

不过我没有希望会同他结婚，因为我不要人家的被动爱，我虽然爱他，但绝不表示，我认定爱的权柄操在自己的手里。我决不妄大希求。我也知道都像我这样，爱不都埋没尽了吗？然而我的性格，非如此不行，我早已决定独身一世的。^[9]

令杨开慧沮丧的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发展得并不顺利。过了两年半，他们的命运才结合到一起。毛过于腼腆，也没有钱去讨好姑娘。毛后来说：“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似乎太高了，我是向朋友们借了钱来到首都的。”^[10]他的自尊不允许自己寄住在杨昌济家里。在杨家享受了几天师生欢聚的时光之后，毛和他的朋友们对好客的主人表示了谢意，搬出了杨家，一起住到了只有三个单间的一套很小的寓所里。^[11]他们太穷了，住不起更大的房间。^[12]这是个木制小平房，有着很大的纸糊的窗户。屋里住的，不仅有“孔夫子”的客人，还有他们的另外四个朋友。每当夜间入睡的时候，八个人挤在一张炕上，这个又低又平的炕占据了其所在房间几乎一半的面积，炕的两端紧贴着墙面。炕是中国传统民居里可以在天冷时加热的一种床，这种床的内部有一个开口朝外的壁炉，炉里燃烧产生的烟气在炕的内部循环周转，钻进每一个孔洞，以此来给床加热，最后通过外墙内的出气孔排出。我们的朋友们没有钱买燃料来加热他们的炕，只能在睡觉时紧紧地挤在一起以保持温度。八个人只有一件棉袄，冬天的时候只好轮流出门。到北京四个月之后，他们才攒够了钱，另外买了两件棉袄，这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天大的喜事了。他们用屋里的一个

小炉子开火做饭。^[13]

这座门牌号码是七号^[14]、外带一个小院子的小房子位于一个叫做三眼井的街区里的一个狭窄的胡同里，离北京大学很近，离一个叫做北海的著名的人工湖和紫禁城也不远。北海位于北海公园内，紫禁城则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居所。根据与民国政府达成的一项协议，溥仪保留了皇帝的称号，但其“帝国”版图只限于这个居所。直到1924年，溥仪才被迫离开紫禁城。

毛泽东经常在北京的尘土飞扬的大街上和小胡同里漫步。当地特有的胡同给这个古老的城市增添了独特的魅力。13世纪蒙古建都于北京，当时这个都城名叫“大都”，意思是“伟大的首都”；当时的北京还另有一个名字，叫“汗八里”，意思是“大汗居住的城市”。因为害怕汉人造反，蒙古人有意把首都的街道修得很窄，窄得只能容下一个骑在马上的人通过。

北京不像长沙，它不是一个大商业中心，其商业区的街道上也没有长沙那么多的招牌和广告。然而，正如当时该城的一个居民所说，“这里有很多好看的东西”。许多街道挤满了人，主要的商业街王府井大街尤其是人满为患。北京的人口是长沙的五倍，总计达100万左右。^[15]前文中提到的江西人张国焘，比毛泽东早两年来到北京。在他看来，“北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多姿多彩的城市，古老的和现代的，中国的和外国的，汉人和满人，蒙古人和藏人，在这里汇聚一堂”。总之，“作为这个国家的首都，北京是一个有着地道的中国风味的、别具一格、宏大无比和色彩斑斓的大都市”^[16]。

黄包车在大街上和胡同里到处奔驰，其速度之快，令外国人为之咋舌，令日本的车夫们为之汗颜。日本也有黄包车，但日本的车夫们从来不跑。^[17]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在16岁到50岁的北京男人中，差不多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依靠拉黄包车为生。一个能干的黄包车夫，一个月能挣至少15元银币，这是扣除了黄包车的租金之后的净收入，因为运营中的大部分黄包车都是车夫们从专门的车铺里租来的。而当时北京大学的一个图书馆助理馆员的月收入只有8元。^[18]北京市人口的20%是黄包车夫及其家属。^[19]

汽车在当时还是稀罕物，鸣着喇叭的汽车也是大街上的一景。

马车则不少，拉车的马多是鬃毛浓密、体型矮小的蒙古马。马车夫们习惯于向行人人们大声吆喝着要他们让道。等着载客的黄包车夫不停地叫道：“先生，太太，请上车！”其粗哑的吼声即使是在一片喧嚣声中也听得清清楚楚，而北京大街上的喧嚣声之大，堪称震耳欲聋。路牌自然是没的，十字路口上的交通拥堵倒是司空见惯。北京大街上也经常能见到来自蒙古草原的骆驼商队。它们的出现使得大街上的交通更加忙乱。^[20]

忙乱归忙乱，这座城市给人的印象依然十分美好。壮丽的古建筑、别具一格的宫殿群和庙宇，以及将它们和谐地融为一体的公园式的布局，令每一个游客都叹为观止。毛泽东也感受到了首都的这种深沉的、诗一般的魅力。他后来回忆道：

在公园里，在故宫广场上，我看到了北国的早春，看到了坚冰仍覆盖着北海时，洁白的梅花在怒放。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从而想起了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这一写景的名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清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赏。^[21]

与毛同时代的许多人也同样对北京的美丽景色赞不绝口。其中一人这样写道：

夏日的早晨，薄雾尚低垂在北京的大地上，晨曦已洒在气势雄伟的帝国风格建筑的黄色瓦顶上。此时此刻，站在西山上眺望，在金色天空的映衬下，中国最壮美城市的风光一览无余。在一个个小山丘围成的天然的露天圆形演兵场上，在高出黄海海平面1200英尺的高度，屹立着一座用来礼敬观音菩萨的庙宇；各类树木和藤本植物已经围着它生长了两百年，将其隐藏在灌木丛中。凝视着地平线，你既能看到一片肥沃平坦的土地，城市以外极远方的地平线外的大海也依稀可见，还能发现北方的天边连接着大地与彩云的长城。……在精心构筑的城墙所环抱的这座雄伟的城市里，透过雾海，为数众多的尖塔和

屋顶虽然晦暗但已逐渐明朗。往远处看，可以看到为纪念马克·波罗而建造的那座桥，此人写就的那本并不严肃的著作无意中使西方人发现了这个古老的王国。远方还可以看到颐和园里的湖，从中可以看到冉冉升起的太阳映在水中的斑驳闪烁的倒影，沉睡的世人将很快被它唤醒，开始日复一日的操心劳神。……四十个皇帝曾在这里君临天下，他们中间既有蒙古人，也有明朝的汉人，还有满洲人。仅满洲皇帝在这个城市的龙椅上待的时间就几乎和英国人到美洲殖民以来的美国历史一样长。……自从它成为都城以来，二十代人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地球上没有第二个首都能够像北京这样，支配过如此众多的人的命运。^[22]

北京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始建于四千或五千年前，也即传说中的黄帝时期。教会中国人书写的，据说就是这位黄帝。这个城市最初的名称叫幽都，意思是“北方的城市”。此后数次易名。它现在的名字“北京”是公元1403年命名的。这是明朝的永乐皇帝所赐的名字。把明朝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的，也是这位皇帝。明代统治者彻底重建了这个城市：铺设了多条宽阔的大街，建起了大量雄伟的宫殿和纪念性建筑，为此而征调了成千上万的农民来此服役。正是根据永乐皇帝的旨意，在北京市的中央才出现了占地达720公顷的气势宏大的宫殿建筑群。这个宫殿区的正式名称叫“紫禁城”。在中国，紫色被视为尊贵、权力的象征。在中国传统的宇宙学里，它也是宇宙的中心北极星的颜色。永乐帝还下令在北京城的南部建起了瑰丽无比的天坛，这是帝国君主们向列祖列宗献祭的场所。

1644年入关后，清朝统治者给这个城市增添了不少富丽奢侈的园林。其中之一就是位于城外的西北郊的夏宫。这个美丽而精致的宫殿群坐落在圆明园的中心，后者占地面积达350公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1860年，入侵北京的“文明”的英法联军，野蛮地洗劫并焚毁了整个圆明园。后来的慈禧太后拒绝了重建圆明园的建议，而只是在原圆明园附近的一处园林里整修出了一处富丽堂皇的

避暑宫殿群，此即颐和园。

尽管颐和园早在1914年就对游人开放了，但第一次来北京的毛泽东却无缘领略它的美丽。因为门票太贵，北京的有钱人也不是个个都有钱亲眼目睹这个皇家园林的气派。但毛并没有因此而沮丧，第一次来北京所看到的一切已经让他很满足了。

一个同时代人称北京是“中国的既美丽又粗野的首都”：

它是亚洲的首都，整个东方的首都，也是远东的政治风暴的中心。……走马观花地逛一趟北京就足以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它位于一块干燥的平原上，上有壮丽塔楼的灰色城墙气势雄伟，巍然屹立。站在城墙的最高处往上看，什么也看不到，因为城墙内没有摩天大楼，没有比这些环城一周的防御性建筑更高的房子。北京由多个区域组成，每一个区域都叫做“城”，每个城都有把自己围起来的一圈城墙。有一个巨大的、人口众多的汉城，里面住的全是汉人。还有一个鞑靼城，又叫满洲城。满洲城又由好几个部分组成，其中之一是使馆区，所有的驻华外国使团都挤在这个小而密实的地段里。使馆区也有旨在防御的城墙，但是不高。使馆区外，四面八方都属于鞑靼城。也有一些外国人住在鞑靼城里……但是他们随时准备在发生不测时冲到使馆区里避难。这些外国人会告诉你，使馆区外也很安全，不会出什么乱子，类似义和团那样的乱子不会重演。可是，说是这么说，实际上他们任何时候都备有一个打好的包裹，也总有一架梯子靠在自家院子的围墙上，以防不测。^[23]

列强的公使馆位于北京城区的中央一个叫做“东交民巷”的地方。离紫禁城只有十分钟的步行路程。使馆区由列强自己的军队保护，这些军队是根据义和团事件后签订的条约里的有关条款而驻扎在那里的。在1918年11月以前，使馆区的一条街上曾立着一块纪念碑，被纪念的人是前德国驻华公使冯·克林德男爵，此人是在1900年6月被占领京城的义和团杀死的。根据1901年最后议定书的有关条款，清政府立了这块碑。这个纪念碑激起了中国的爱国者

发自内心的义愤，特别是青年人。他们知道，就是这个男爵，在1900年5月的一次外国公使会议上宣称：“现在是把瓜分中国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的时候了。”^[24]令中国人愤怒的，不仅是纪念碑本身，还有碑上的铭文。这段用拉丁文、德文和中文刻上的文字，其内容是光绪皇帝本人就公使被杀一事而亲自表示的道歉。在获悉一战结束、德国战败之后，北京市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个千夫所指的碑给砸了。

20世纪初，北京既是中国最大的社会和政治活动中心，也是最大的文化和知识中心。1898年在这里成立了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师范学院，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这所学校被改名为北京大学^[25]。1916年秋，信奉自由主义的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新文化”运动从此在北大展开并迅速影响到全国各地的众多教育和学术机构。发起这一运动的思想家有蔡元培、李大钊和胡适等人。蔡鼓吹学术自由，李和胡都是北大教授。这些人类似于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提倡用对理性的崇拜来取代对中国社会的传统信仰的崇拜。启蒙运动就这样来到了中国——虽说有点姗姗来迟，而北大就是这一运动的堡垒。在新文化运动的激励下，中国知识界开始探索新的理论方法，希望借此来解决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张国焘写道：

在猛烈攻击传统经学这一旧堡垒的同时，它用平实易懂的语言提倡民主和科学，宣传各种流派的近代西方思想。……不仅如此，进入二十世纪时依然落后的人们现在觉醒了，开始奋起直追。他们常常青睐激进的言行，激进主义于是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倾向。^[26]

这一运动的喉舌是《新青年》，毛泽东曾于1917年4月在这家杂志上发表过关于体育的文章。杂志编辑部设在北京，主编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这家杂志是反对传统的儒家思想的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是传播民主和人道主义这类西方观念和最新的科学理论的各种出版物中最有影响力的一家。《新青年》上的文章以通俗

的语言普及了反儒教的道德观和西方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以动人的笔触发出了对社会进行精神重建的号召。在传播白话文这一新文体并以之取代文言文方面，《新青年》也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对于中国的广大民众来说，文言文学起来非常困难。

《新青年》宣扬的思想及蔡元培的治校理念，在青年毛泽东看来格外亲切，这也是很自然的。他非常欣赏蔡校长、李大钊、胡适和这一深入人心的运动的其他领军人物，对陈独秀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他对北京大学有着显而易见的兴趣。他在三眼井的住所离北大很近，更具体地说，离新落成的北大主教学楼很近。新教学楼位于沙滩，从三眼井走到那里，只需15分钟。这个四层半的高大建筑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毛泽东。他也知道，北大师生都称这栋楼为“红楼”，因为这栋楼最上面三层的外墙是用暗红色的砖砌成的。红楼这个名称源于《红楼梦》这部清代最著名的小说，《红楼梦》的作者、大作家曹雪芹（约1715—约1763）就是北京人。但这种渊源只



北京大学红楼。

是联想的产物，此红楼非彼红楼，北大的红楼与曹雪芹笔下的红楼完全不是一回事。青年毛泽东十分喜爱这位杰出作家的这部小说，对于书中描写的那个中国大家族的悲欢离合、戏剧性事件和各种人物的情感之痴迷程度，不亚于对其他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因此，名称上的有趣巧合使他不由自主地受到触动。

杨昌济教授察觉到他的穷极潦倒的困境之后，于1918年10月给他在北京大学这个圣地中的圣地找了一份工作。不难想象他听到这个好消息时欣喜若狂的心情。他的这位老师给经济学教授兼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写了一封推荐信，后者的办公室位于红楼一楼的右首，也可能是东南边。李大钊就是在那里第一次接待毛泽东的。和毛一样，李也出身于富裕的农民家庭，他只比毛大四岁多一点，但已功成名就。

李大钊于1889年10月29日生于乐亭县^[27]一个名叫大黑坨的小村子，此地离北京不远。他最初是在乡村私塾受的教育，学的是儒家经典，这些都和毛一样。1907年，他考进天津的北洋法政学堂。天津是毗邻北京的一个大商业城市。他相当早熟，早在1911年革命前夕就投身于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1913年，这位25岁的年轻人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爱国诗文，由此引起了关心国家命运的知识界人士的关注。1913年毕业后，他决定留洋深造，不久后就去了日本，就读于东京的著名学府早稻田大学。1916年5月回国，随即积极参加了陈独秀和蔡元培发起的新文化运动。1917年11月，由于章士钊教授的推荐，他受邀到北大执教。李是在日本结识章的。章士钊本人是保守派，但并不讳言自由思想，对李大钊也有很高的评价。1918年1月，李大钊就任北大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紧接着，应陈独秀之邀，加入了《新青年》编辑部。^[28]1918年12月底，他和陈独秀又创办了《每周评论》杂志，这份杂志在评论政治问题的时候，文笔比《新青年》还要尖锐。

李大钊是一个高个子，总是笑眯眯的，心肠很软，戴着一副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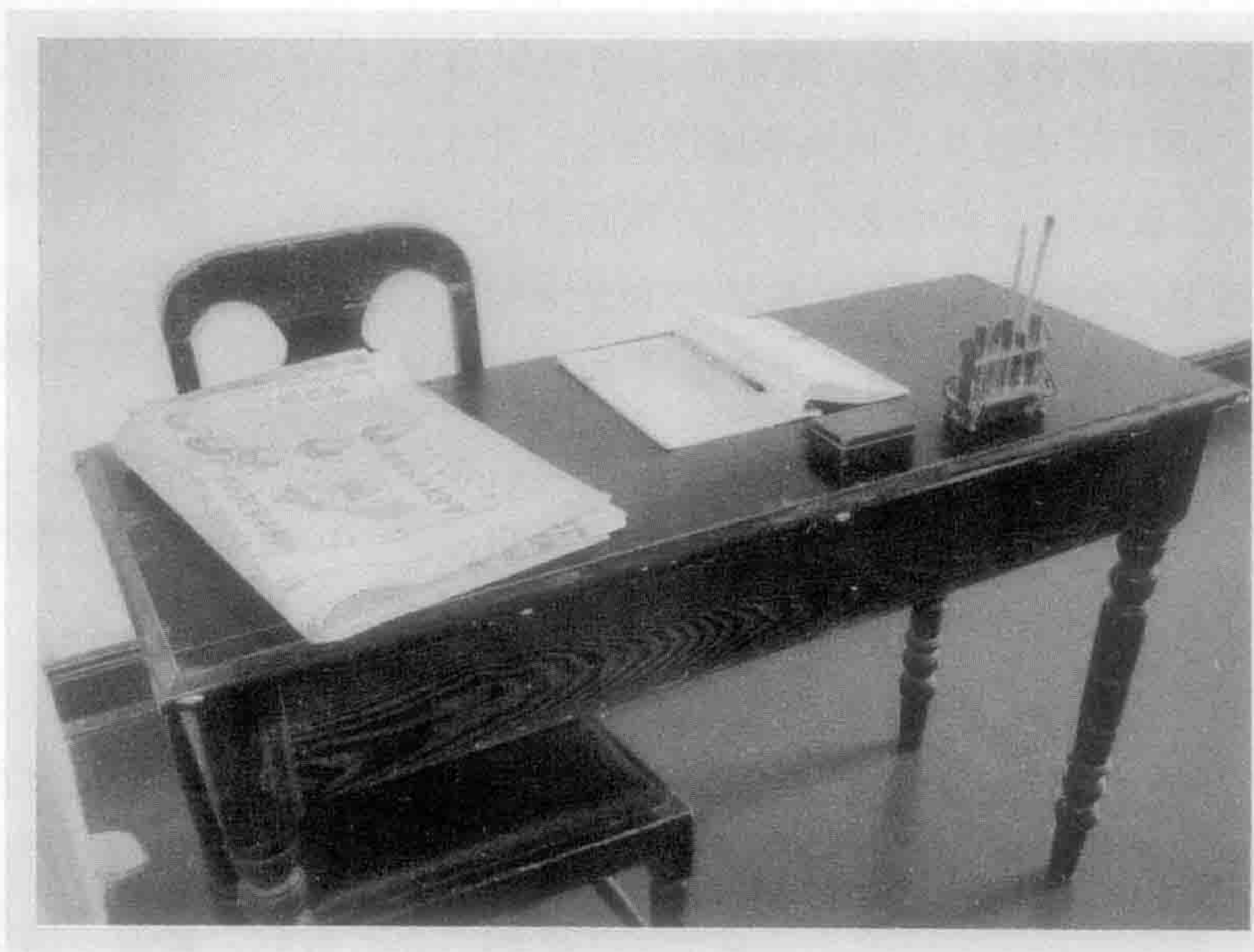


李大钊教授，中国第一位布尔什维主义的传播者，1924年6月。

属框架的圆眼镜，嘴唇上蓄着长胡子。^[29]风度优雅，做事细致，衣着考究，是他一贯的风格。与许多北大教授不同的是，他喜欢时不时地穿西装，包括领带、白衬衫和浆洗得很硬的高衣领。总之，他是一个能够引起别人注意的人物。

李让毛做图书馆助理，薪水是每月8元。^[30]这点钱不算多，但是，我们知道，毛泽东是个从不操心物质生活的人。他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岗位，并且因此而有了生平第一张属于自己的办公桌。尽管他还没有一个单独的办公室，而只是在公共的阅览室内工作，但毛泽东成了北大的一名员工！后来他还自豪地对自己的亲戚说，他已是北大的一名职员了。^[31]

就博学而论，李主任比陈独秀和蔡元培还胜一筹，尤其是在当代西方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他是第一个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真正表现出兴趣的中国人，而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个全新的观念。尽管早在19世纪末有关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第一批信息就传到了这个中央王国，但在李大钊以前，中国人对马克思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知。马克思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媒体上的时间是1899年2月，当时一份名叫《万国公报》的杂志刊登了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基德的著作《社会进化》第一章的译文，文章中提到了



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办公桌。

马克思。三个月后，也就是同年5月，上海的一个出版商出版了基德的这本书，书中提到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这是恩格斯的姓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但基德的书中提供的有关这两位“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的信息非常之少，只是说恩格斯和马克思属于“德国讲求养民学者”，这就是书中所提供的关于此二人的全部材料。^[32] 1903年初，《共产党宣言》的一个非常简短的摘要在中国第一次发表，这个摘要是以引语的形式出现在中国国内出版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中的，书的作者是一个名叫福井准造的日本人。1905年6月底，孙中山的亲密战友朱执信在其所著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中，以浓缩的语言复述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1908年1月，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其所办的杂志《天义报》上发表了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所写的序言的中译文，这也是在中国第一次完整地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章。其后不久，《天义报》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接着，上海的一家名曰《新世界》的杂志全文发表了恩格斯最重要的文章之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译者是施存统。此人后来成为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之一。^[33]

但是，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的印象是矛盾的。当时他们还没有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其他的社会主义学说区别开来。^[34] 毛泽东在1939年12月谈道：“我起初读几年书，只知道‘诗云’^[35]、‘子曰’^[36]那一套，心里总以为做官做皇帝的人个个是好的。后来进了洋学堂，碰到了革命，于是也知道皇帝老爷是坏的了，也懂得了美国的京城是华盛顿，英国的京城是伦敦，什么X加Y等于Z，什么分子、原子和电子。现在你们不仅懂得这些东西，而且还懂得马克思主义哩！我那时，就不懂得什么马克思。”^[37]

关于这一问题后来他还谈论了多次：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摘录

1945年4月21日

那时我们中国除极少数留学生以外，一般人就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其人……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

帝国主义，什么马克思主义。……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据说还有一个什么人，在一个杂志上译过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总之，那时我没有看到过（这些出版物——作者注），即使看过，也是一刹那溜过去了，没有注意。^[38]

毛泽东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摘录

1964年8月18日

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听都没听说过。听过还看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大彼得、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39]，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还看过《富兰克林传》，他穷苦出身，后来变成文学家，还试验过电。^[40]

毛泽东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谈话摘录

1964年9月28日

我28岁才学马克思主义，28岁以前学的是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我相信过康德的东西。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是28岁以后，以前也不会学，是俄国人教的，就是1917年俄国革命教的。1917年以前什么马克思、恩格斯都不知道。那时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卢梭和穆勒，中国方面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孔夫子等等，还有资本主义的东西。^[41]

李大钊不仅是第一个认真关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同时也是第一个注意到布尔什维克的经验的世界意义的中国人。在接受布尔什维克立场的同时，他于1918年开始广泛宣传俄国人的共产主义。因此可以说，他的那位“博学而又彬彬有礼”的助理在30年后登上权力顶峰的道路，是李教授第一个开辟的。早在1918年7月，在其《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李大钊就指出：

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

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42]

这就是在寂静的红楼里诞生的梦想。

毛泽东刚到图书馆工作，李大钊就开始向他灌输有关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的入门知识。他对毛解释说：

世间资本家占最少数，从事劳工的人占大多数。因为资本家的资产，不是靠着家族制度的继袭，就是靠着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垄断，才能据有。……凡是不做工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

李得出结论说，我们必须结束这种“不义的局面”，“我们应该……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答案是：通过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俄国共产主义者已经开始了这场革命。他解释说：

Bolshevism，就是俄国 Bolsheviki 所抱的主义。这个主义，是怎样的主义？……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Bolsheviki……宣告：……他们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合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他们主张……先造欧洲联邦民主国，做世界联邦的基础。这是 Bolsheviki 的主义。这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

*现在通译马克思。——译者注

李大钊对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十分倾慕，对他们的政纲情有独钟。他解释说：

从这一段话，可知陀罗慈基**的主张，是拿俄国的革命做一个世界革命的导火线。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世界革命中的一

**今译托洛茨基。——译者注

个。尚有无数国民的革命将连续而起。……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可以说完全是俄罗斯式的革命，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式的革命。……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Bolshevism 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 Bolshevism 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43]

李大钊并不满足于简单的宣传，他还竭力把他的这位助理拉进实际的政治活动中。他们相识几天之后，李就邀请毛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筹备委员会的一次会议，预定要成立的这个爱国团体的宗旨与新民学会类似。1918年11月末，毛泽东出席了李大钊在北大召集的又一个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44]毛很可能还出席了少年中国学会的一次会议，李大钊在这次会议上做了一个关于十月革命的讲座。^[45]

当然，在结识李大钊以前，毛泽东对于俄国发生的事情已有所耳闻。中国的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媒体对此都有过报道。1917年11月17日，长沙的《大公报》刊登了一篇有关俄国事态的报道。^[46]当时的毛肯定知道布尔什维克党的那位领袖的名字。早在1917年5月19日，即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几个月前，上海的《民国日报》就提到了“尼哥拉斯列银一派”，说他们倡导“极端反对战争主义（超革命主义）”。^[47]这是列宁的名字在中国报刊上首次出现。1917年11月的时候，毛很有可能在《民国时报》和《时事新报》上读到过对托洛茨基和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的报道。在这些简短的新闻里，提到了列宁提出的三项措施：立刻结束世界大战，把土地分给农民，以及解决经济危机。1917年12月28日的《中华新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使得中国公众第一次了解了列宁的理论观点。此文的作者是杨匏安，此人是共产主义在中国最早的支持者之一。到了1918年，有关列宁、托洛茨基、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消息在中国报刊上已屡见不鲜。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摘录

1945年4月21日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比飞机飞得还快。飞机从莫斯科到这里也不止一天吧，但这消息只要一天，即是说，十一月七日俄国发生革命，十一月八日中国就知道了。^[48]

这些新闻报道自然引起了广泛的兴趣。但是，毛泽东并不认为这一事件意味着“新时代之曙光”^[49]。李大钊告诉他的一切都是他闻所未闻的。他意识到自己所受的教育还有欠缺，于是决定旁听北大的课程。

在随后的六个月里，为了能够在北大听课，毛泽东参加了北大的三个学生社团：一个哲学社团、一个现代文学社团和一个新闻学社团。^[50]通过新闻社团的活动，他结识了该社团的领导人、著名的出版家和政论家邵飘萍。邵是一家中文新闻社和发行量很大的北京报纸《京报》的创办人。与邵的交往使毛受益匪浅，邵将毛引入了真正的新闻学的天地。毛后来回忆说：“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51]他在少年中国学会的会议上与李大钊的接触也有着同样不菲的价值。在少年中国学会的一次会议上，一个名叫邓康的北大文学系学生引起了毛的注意。这是一个又高又瘦、喜欢交际、笑容可掬、眼神活泼的年轻人。他爱穿传统的中国式长袍，脖子又长，这就使得他的形象显得非常滑稽。毛主动接近他很可能是因为他的湖南口音。邓康又名邓隆渤，来自湖南省最南端的宜章县，生于1894年10月5日。不管怎么说，这两个年龄相仿、志趣相同的年轻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与毛的老朋友蔡和森一样，邓在毛的生涯中也是一个起了重要作用的角色。此人后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早的组织者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之一，不过，那时他的名字已是邓中夏了。

不过，用毛自己的话来说，“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的人，既不是李大钊，也不是邵飘萍，当然更不是年轻的邓中夏了，他心中的“教父”是陈独秀。^[52]没有理由怀疑这句话的真实性。因为他在1936年曾向埃德加·斯诺这位他当时并不熟悉的美国记者



陈独秀教授，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毫不隐讳地承认了这一点，而不顾下面这一事实：历经坎坷的陈独秀当时已经成为中国托派的一个主要成员。中共的这位领袖若不是发自内心地尊重陈独秀，就不可能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尚处在高潮的时候做出这一表示。这个疑神疑鬼的运动是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手导演的。

不仅是毛，其他人也为陈独秀的人格魅力所倾倒。早在1917年，毛就对他在湖南一师的朋友们说过，陈之于中国，相当于列夫·托尔斯泰之于俄国；说陈同那位俄国作家一样，也是一位“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53]的人。在爱国的知识分子中，当时还很年轻的陈享有极高的

威望。1918年时，陈才39岁。

陈独秀于1879年10月8日生于安徽省东部的怀宁县，该县今属于安庆市管辖。孩童时代接受的也是传统的儒家教育，少年时代就显示出过人的资质。1896年，也即他17岁的时候，就顺利通过了科举考试的第一关，成为一名秀才。1900年至1902年间，他在中国和日本的多所近代性质的教育机构求学，由此开始接触西方科学知识。1902年在东京的时候，他与其他两位中国留学生张继和冯自由共同发起成立了旨在宣传民族革命思想的“青年励志社”。此二人后来成为孙中山的国民党内的要人物。1903年春回国后，他被国内方兴未艾的革命运动吸引，在上海和安徽参与创办了几家进步报刊。1911年反清革命爆发后，他一度担任过新的安徽省革命政府的秘书长。1915年9月中旬，陈独秀在上海公共租界创办了《青年杂志》。1916年早秋，该杂志改名为《新青年》。同年11月底，陈独秀受聘到北京大学任教，不久就被任命为该校文科学长。^[54]

同李大钊一样，当时的陈独秀有时也喜欢穿西装。每当他穿起灰色的三件套西装、挺括的衬衫，配上领结，那模样看起来活像一个美国商学院的教授。但外表是骗人的。他极爱社交，说话尖刻，行事古怪，也知道应该怎么做才能俘获对话者的心。他在做判断的时候有时会表现得异常严厉，争论中也不时显得专横独断。但是他

对其他人，甚至是比他年轻许多的人，从未轻慢过。多达十年的岁数差异没有妨碍陈独秀与李大钊成为朋友，陈非常尊重他的这位年轻的同事。要想说服他很困难，但并非不可能。如果他对一个问题还没有想明白，有人向他指出了关键的论点或事实，他也会立刻承认自己的错误。然而，他毕竟是一个说话刻薄、原则性强和脾气火爆的人，与温文尔雅的李大钊正好相反。^[55]他很早就开始谢顶，但这一事实只不过使得他宽大的前额显得更加突出而已。

就像对待李大钊一样，陈独秀以民主的风度对待毛泽东，尽管后者连北大的正式学生都不是。毛情不自禁地对他心悦诚服。“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毛在数月后这样写道，“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56]然而，与李大钊不同，当时的陈独秀并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在回应《新青年》的一个读者就此提出的问题的时侯，陈指出，鉴于中国工业化水平极端低下，现在谈论社会主义没什么意义。^[57]他继续鼓吹个人自由、民主和人道主义。

陈独秀的意识形态立场对毛泽东影响不小。这个图书馆助理固然尊重李主任，但他无保留地信任的，却是陈教授。因此，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依旧持相当怀疑的态度。在当时流行的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思潮中，毛最感兴趣的，是特别强调个人自由的无政府主义。由于陈独秀和李大钊都同情无政府主义思想，毛的这一兴趣就更浓了。^[58]1916—1920年，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极为流行。这一高涨的兴趣在北大也十分显著，其校长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是第一个在中国拥有大批追随者的西方社会哲学。最早注意到工人的生存状况的那些人，以及最早开始组织工会的人，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还拥有一个牢固的出版阵地。除了为数众多的无政府主义期刊之外，无政府主义著作的中译本在中国也大有市场。这些著作包括彼得·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我的自传》、《告青年书》和《面包与自由》，米哈伊尔·巴枯宁的《上帝与国家》以及艾利歇·雷克吕、马克斯·施蒂纳和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的各种作品。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巴枯宁的自发革命论、普鲁东的工团主义以及某些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的理论，在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

中，都不乏支持者。来自日本的理论主张在山地和森林中建立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新村，并以此来重建社会。中国也不乏土生土长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些人以各种形式发展了道家的思想，也即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的深刻思想。这一思想认为，个人有必要把自我与支配着宇宙中万事万物的“道”融为一体。当时的中国甚至还出现了多个半无政府主义的团体，这些团体的成员自称为虚无主义者，主张通过集体自杀的手段来达到“全人类的彻底毁灭”的目的。在无政府主义诸家中，克鲁泡特金的影响最大。他的主张是，以人们的自由和自愿的结合为基础，通过非中央集权的途径，以众多共产主义公社所组成的类似联邦的联合体的形式，改造国家与社会。不过，总的说来，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一大特点，就是将无政府主义的各种流派融为一体。他们为之奋斗的至高无上的目标，是绝对的个人自由。在他们看来，为达此目的，有必要与当代社会彻底决裂。

毛在北大图书馆能够读到不少无政府主义文献，逐渐熟悉了其中的一些著作并为之心仪。^[59] 毕竟，他来北京的目的是参加“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而这个运动正是由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后来，在回忆其在北京的生活时，他说了下面这席话：

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找寻出路。……我读过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60]

克鲁泡特金对毛的影响最大。毛写道：

另一派是较马克思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61]

显然，毛的理想至少和李大钊一样狂热。

新民学会的所有成员中，只有毛在北大找到了工作，其他人都靠打零工勉强糊口。他们都在多个学校办的留法预备班里上课，为赴法国做准备。其中，有数人在北大的一所附属学校里学习，其他人在距首都西南大约 300 里的一个名叫保定的城市里学习。只有蔡和森有点特殊，他一开始是在保定以南的蠡县的一所学校里就读的。奇特的是，在这群认真地为赴法做准备的人们中间，除了男女青年，还有两位上了岁数的老人。一个是长沙师范学院的教授徐特立，我们在前文中已经介绍过这个人了；另一个是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她还有一个名字叫葛兰英。预备班学习的主要课程是法语，考试成绩是决定一个赴法留学的申请者能否入选的基本依据。考试内容包括法语口试，此外还须通过体格检查。^[62]

进京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毛泽东放弃了去巴黎的初衷。到底是什么促使他放弃这一想法的呢？在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他说：“虽然我帮助组织了这个运动，……但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的时间花在中国可能更为有益。”^[63]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啊！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要去北京？为何要在图书馆打工？毛的这番表白是非常可疑的。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当初他从杨昌济那里得知要招募学生留法的消息时，他是多么兴奋啊。很可能另有原因。首先，他没有钱。但是，理论上讲，他是有能力弄到一点钱的。这位杨教授肯定是愿意借给自己的得意门生必要的经费的。不是钱的问题。一般说来，毛的朋友们都没有钱，他们赴法的路费最终都是通过募捐的方式筹集来的。^[64]问题出在其他方面：毛根本不可能通过法语考试。不要忘了，在外语方面，他是个毫无天分的人。在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他每天早晨都死背英语，可最终英语成绩还只是个 F。^[65]学法语的结果难道会有什么不同吗？即使他真的获准赴法留学，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里他也没有多少自信可言。他可不是那种愿意接受低人一等的地位的人。

因此，他放弃去法国的主要原因在于他的自尊心。毛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爱发号施令的人，因而他不想品尝比别人差的滋味。就是在北京这个精英荟萃的首都，他也不那么自在。

当然，李大钊、陈独秀和邵飘萍对他都不错，他也报之以李。但在他们面前，他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受教育不足的外省人的自卑感。他与李大钊的岁数差不多，但却与李存在巨大的差距。在北大工作的那五个月里，他时常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而在长沙，他是最优秀的学生，也被公认为一个头面人物。他后来回忆说：“我的工作之一是登记来馆读报者的姓名，但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并不存在。……我试图和他们就一些政治和文化问题进行交谈，但他们都是大忙人。他们没有时间听一个讲南方话的助理馆员说些什么。”^[66]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刚刚踏进成功的门槛的年轻人常常傲气十足，这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北大学生会的两个头头傅斯年和罗家伦都是不久前才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鼓动家而崭露头角的新锐，这个从湖南来的图书馆助理确实不在他们的视线里，尽管傅比毛小三岁，罗比毛小四岁。已然大名鼎鼎的哲学教授胡适只比毛大两岁，同样无视毛的存在。^[67]毛泽东在新闻研究会的集会上结识的陈公博和谭平山都是不久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他俩也不把毛泽东当回事。张国焘这个到1919年初时已经因为积极参加爱国活动而在北大学生中一鸣惊人的小伙子，对毛也是熟视无睹。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张国焘在他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写的回忆录里甚至忘记了他与毛是在北大图书馆里第一次见面的，时间要么是1918年底，要么是1919年初。毛对他与张的第一次邂逅则记得非常清楚，他也没有忘记张国焘当时对他视而不见的那副神气。^[68]

1919年1月，萧瑜启程前往法国，由此成为第一个赴法的湖南学生。3月，其他湖南人也做好了出发的准备。就在这个时刻，毛泽东收到家信，信上说他母亲健康恶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不得不赶回服侍”^[69]。然而，他的“赶回”却非常与众不同。他是3月12日离开北京的，可是直到4月6日才抵达长沙。3月28日他才给他的舅舅们写信，说他正在路上。毛先是随着一群准备启程去法国的学生一起到了上海。留在北京的只剩下1918年9月到北大学学习的罗章龙以及暂时同其家人一起待在北京的蔡和森（蔡本人、他的母亲、他的妹妹蔡畅和他的女友向警予直到6月份才离开北

京)。^[70]他在上海逗留了整整 20 天。“因事勾留……”^[71]他向舅舅们解释说。到底是什么事情呢？为他那帮即将远渡重洋去法国的亲爱的朋友们筹措准备。与此同时，他母亲的病势日见沉重。

他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冷酷”？只有联系毛在首都所忍受的屈辱，才能理解这一点。从心理上讲，他感到有必要陪朋友们去上海。另外，由于新民学会的总干事萧瑜已经走了，他只得再一次扮演领导角色，也就是陪同他所领导的那个集体的成员去完成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这使他重新体验到自己是一个重要人物、一个领导和社会活动家的那种感觉！

他可能为此而感到内疚，他的良心折磨着他，但他不得已。

这位不幸的母亲于 1919 年 10 月 5 日病逝，享年 53 岁。带着悲痛和可能的羞愧之心，毛泽东回到家中向母亲做了最后的告别。站在她的坟前，毛吟诵了他自己拟就的祭文灵联：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72]

母亲去世后不到四个月，毛的父亲也去世了，死因是斑疹伤寒，享年 49 岁。他与妻子葬在一起。^[73]那时毛已再次回到北京，忙于他的重要的政治活动，没有参加父亲的葬礼。

★ 第二章

民众的大联合

一到长沙这个熟悉的环境，毛又有了如鱼得水的感觉。最重要的是，在这里他无须像在北京那样向别人证明自己。在受过教育的许多人中间，他早已是众望所归。另外，由于萧瑜不在，他被视为新民学会的头号领袖。

他很容易就在当地的修业小学谋得了一个历史教师的职位。在中国，这类事情总是离不开社会关系。向校方推荐他的，是他在第一师范学校结识的老朋友、当时已在修业小学教书的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这份工作很轻松，一周只有六个课时的课，故有大量的自由时间。薪水也很低，每月只有4元左右，但已足够解决吃饭问题，而且就住在学校。^[74]当时的惯例是教师必须紧挨着学生住，这是当时的教育理念所要求的，即教师不仅要授课，还要在日常行为方面给学生做榜样。

1919年的春天是一个多事的季节。4月末，即毛刚刚回到长沙不久，湖南和整个中国的政治形势就开始高度紧张起来。这一局势与战胜国在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有关（会议旨在起草战胜国与一战中彻底战败的德国之间的和约），具体地说，与会议就德国在中国的权益所进行的讨论有关。这次和会开始于战争结束后不久的1919年1月。中国公众舆论认为，与会的协约国的代表们“背叛”了中国，因为他们拒绝了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提出的一系列要求。这些要求的内容是：把位于华东的、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青岛港及其周边的胶州湾地区归还给中国。此二地区先是被德国人在1898年占领，后来又被打败了德国人的日本人于1914年11月占领。中方

坚持其归还青岛港和胶州湾的正当要求，因为中国毕竟在1917年8月参加了对德国的战争。日本人则想把这块德占区据为己有。与德国人作战以争夺对青岛的控制权的毕竟是他们，不是中国人。日本人还有一个现成的理由：已被已故的袁世凯接受的“二十一条”明确规定，欧洲战事结束后，胶州湾问题将由日本全权处理。^[75]对于西方主要国家的代表们支持日本的事实，中国代表极为失望。早在1917年二三月份，英、法、意三国就在伦敦与日本达成了几项秘密协议，协议承诺日本有权继承德国在中国的权益，作为对日本援助协约国的回报，因此而受到约束的这三个国家不愿与日本发生冲突。西方领导人的决定还有一层考虑：1919年的时候，他们正在卷入一场新的战争，这一次的对手是苏俄；作为西方民主国家的盟友，日本被指望在这场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代表团尝试着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但未能使任何一方感到满意。

中国人原指望巴黎和会能够承认中国是新的战后国际体系中的平等的一员，恢复中国此前屡遭践踏的权益，但是，和会仅仅决定：德国必须把在义和团起义期间掠走的古代天文仪器归还给中国。不用说，这些仪器属无价之宝，但在当时的特殊形势下，中国人视此决定为一个侮辱。由此产生了无穷的义愤，学生们尤其义愤填膺。“日本人拿到了青岛和胶州湾，我们中国人干什么，看星星吗？”愤怒的学生们吼道。1919年3月末，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之一王正廷给上海一家报纸发了封电报，电文给公众的激愤火上浇油。电报中有这么一段话：

吾辈提议于和会者，……主张废止“二十一条”及其他密约。不遗余力。推测日本之伎俩仅有二途：曰利诱，曰用武。然皆与正谊公道相违，必不出此。但吾国人中，有因私利而让步者，其事与商人违法贩卖者无异，此实卖国之徒也。所望全国舆论，对于该卖国贼群起而攻之，然后我辈在此，乃能有讨论取消该条件之余地。^[76]

王正廷的电报所引起的反响，犹如火星掉进了干柴里，一场反

日爱国运动开始席卷中国。中国的爱国者们把巴黎和会称为“帝国主义饕餮们”的集会，它们在会上的表现再次表明，它们对待中华民国就像对待一个半殖民地那样。人们开始搜索谁是王正廷电报中所称的卖国贼。嫌疑很快落在三个重要的亲日派的头上：交通总长曹汝霖、驻东京公使章宗祥和币制局总裁陆宗舆。

国内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最终，冲突爆发了。5月3日是星期六，这天晚上，学生运动的活动家们在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小礼堂里开了一个会。会议决定，第二天在紫禁城入口处正前方的天安门广场举行一场大规模的示威。一个学法律的大学生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这个情绪极度亢奋的学生还撕破了自己的白衬衫，用小刀割破了自己的手指，用血在撕下来的布上写下了“还我青岛”四个字，然后将这个血写的标语高高举起。此举博得了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欢呼。^[77]

5月4日上午10点左右，来自北京各个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聚集到了天安门广场。白旗（白色在中国代表着对死者的哀悼）、青岛地图和标语在示威队伍中比比皆是。标语上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和“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是卖国贼”等口号。他们不顾教育部的一个代表、北京市步兵统领和京师警察厅长的劝阻，开始向邻近的使馆区进发。他们想把以11500名北京学生的名义起草的请愿书呈递给美国公使，他们依然相信“伟大的美利坚”会主持公道。1918年1月8日，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其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提出了旨在建立“普遍和平”的十四点计划。这一计划谴责了秘密条约，呼吁“对所有关于殖民地的要求进行自由、开放和绝对公正的调整”。

使馆区的卫兵们不许学生队伍进入该区，只允许四个学生代表入内与美国公使馆的一个官员见面，公使本人当时不在馆内。

在使馆区门外的受阻使示威者受到强烈的刺激，情绪变得极度亢奋。这时有人提出找卖国贼算账去，示威队伍于是便向不远处的曹汝霖的寓所走去。他们冲进曹宅，大肆破坏，毁掉了屋里的一切。没有砸坏的，都扔进庭院里的池塘里了。曹汝霖设法逃了出来，但章宗祥就没那么幸运了：当时他刚好在曹家，被学生们揪

住，挨了一顿痛打。学生们在曹宅放了一把火后，就在下午5点左右开始散去。^[78]

这场示威以一系列爱国演说高调地开了场，却以地道的街头流氓式的行径而收场。警察抓了一些人，共有32人被拘捕。但在力主宽容的公众舆论的压力下，关押三天后被捕者就全部获释。

然而，这件事情还没有完。整个5月份，直到6月，北京的学生全都行动起来了：罢课、示威、集会。公正地说，这些年轻人在行动中再也没有诉诸暴力。当时正在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俄语的瞿秋白，也是运动的参加者。他在两年后写道：“学生运动的意义是如此，——单由自己的体验，那不安的感觉再也藏不住了。有‘变’的要求，就突然暴发。”^[79]

5月4日事件的消息传遍了全国。在上海和其他许多城市，不仅学生们声援北京学生，就连商人、绅士乃至工人，也都纷纷表示了对北京学生的支持。人力车夫也不例外：在爱国感情的驱使下，他们一致拒绝为日本人提供服务。许多地方的居民通过示威和歇业来表达他们的反日情绪。由于码头工人的罢工，长江上的航运陷于瘫痪。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及其他名重一时的爱国运动的思想家都表示支持北京的学生。他们的支持态度对各省的年轻人具有特别强烈的影响。写有“还我青岛”、“洗雪国耻”和“打倒三大国贼”等口号的标语在住宅、佛寺和祠堂的墙上随处可见。在北京市的中央商会的号召下，一场抵制日货的运动席卷全国。抗议者砸碎了出售日货的商店的橱窗，收缴了大批日货并将它们在大街上焚毁。报纸编辑们拒绝在他们的报纸上刊登日本客户的广告、日本客货轮的時刻表乃至日元与其他货币间的兑换率。^[80]袁世凯的盟兄弟、1918年10月就任大总统的徐世昌被迫勒令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輿三人辞职，但民众的抗议并未停止。直到中国代表团成员拒绝签署协约国与德国之间的不公正的《凡尔赛和约》的消息于1919年6月28日传到国内以后，局势才恢复平静。

为了声援北京学生，长沙的学生们也试图举行一场反日游行。在因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而被定为国耻日的5月7日这一天，数千人涌上了长沙的街道，示威者得到了商人们的支持。然而，张

敬尧指挥下的军队迅速驱散了示威者。^[81]这个被称为“张毒”的人是在一年前开始其对这座城市的恐怖统治的。不知道毛泽东是否参加了这次示威，但很有可能没有参加。

当然，毛不可能不对这场学生运动感兴趣。但是，如我们所知，自发性的抗议活动对他没有什么吸引力。他坚信有必要对自发性加以引导，为达此目的，当务之急是成立一个组织，一个由伟大领袖的意志将其牢牢地凝聚起来的先锋队。他并没有白读泡尔生的书。“道德之实行，固赖感情与意志。”^[82]这是毛泽东永远不会违背的信条。1919年5月初，他开始认真地考虑创建一个有效的组织，来领导湖南爱国的学生运动。1919年5月时，新民学会的会员只有70人左右，而且很多都在法国，因此不适合发挥领导作用。事实证明它办不了什么事。5月中旬，毛与从北京来到长沙的邓中夏讨论了形势问题。邓参加过5月4日的示威，他向毛详细通报了北京学生的活动情况。在与何胡子^[83]商量过之后，毛和邓决定组织一个其成员包括大中学生在内的湖南学生联合会。^[84]原则上讲这并非什么新主意，在学生运动的刺激和启发下，已有多个城市和省份成立了这类学生组织。第一个学生联合会是5月6日在北京成立的，派邓中夏到长沙进行政治鼓动的，就是这个组织。5月11日这一天，天津和上海都成立了学生联合会。^[85]这些学生联合会的成员们给自己规定了听起来相当振奋人心的政治目标：“举学生之全力”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86]。

5月25日，来自长沙各个学校的代表们在何叔衡的位于长沙市北部的楚怡小学内的寓所里集会。与会者有20多人，其中不少是新民学会的会员。会上由毛泽东介绍了邓中夏与各校代表见面，后者报告了5月4日在北京发生的事件，希望湖南学生实行总罢课，以声援北京学生。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均表明：邓的讲话，以及邓本人的年轻且聪明的形象，深深地打动了与会者，邓的讲话尤其令他们激动不已。生活现在开始有了真正的意义，它要求于每个人的，是斗争、自我牺牲和荣誉。

三天后，根据这次会议做出的决定，湖南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湖南商业学校的学生、毛的亲密朋友、新民学会会员彭璜当选

为会长。联合会的总部就设在彭璜所在的学校，离毛泽东教书的学校不远。

湖南学生联合会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6月3日宣布全市总罢课。长沙的20所学校的学生参加了罢课。湘江两岸还从未发生过类似的事情，长沙市民是如此震惊，以至于地方报纸《大公报》于6月4日全文发表了罢课学生的《宣言书》。《宣言书》说：“外交失败，内政分歧，国家将亡，急宜挽救。”《宣言书》还呼吁政府拒签《凡尔赛和约》，废除中日间的不平等条约。^[87]形势陡然紧张起来，只是由于不久后暑假开始，继续罢课已无意义，与当局的冲突才得以避免。

许多学生都回家了，但有组织的行动仍在继续。返家学生组织了众多宣传小组，其任务是用生动的和通俗易懂的形式在乡村中宣传抵制日货。那时文明戏在中国非常流行，这是一种由学生们自己创作的、剧情和结构非常简单的、宣传爱国思想的独幕剧。这些独幕剧给目不识丁的城乡居民留下了深刻印象。下面是一位当事人对其中一部独幕剧的回忆：

我记得1919年6月一个炎热的晚上，在一个关帝庙的戏台上挂上了标语和旗子。幕后是四个巨大的红色字“勿忘国耻”。台上首先演奏了一支欧洲乐曲，但演技不高。台下人来人往，挤得水泄不通。在一名大学生发言之后，有人上台当众打破了两个日本产的漂亮的瓷瓶，以示抵制日货。台下的人对这一举动报以热烈的掌声。演出开始了，我既是观众也是演员。演的是关于朝鲜的悲惨命运的一部话剧。日本帝国主义者把朝鲜当做其殖民地，残酷地压迫朝鲜人民，使他们成为无家可归的奴隶。这部话剧警告中国人不要重蹈朝鲜人的覆辙，号召人们起来斗争。我还记得这部话剧中的一幕：一个日本监工鞭答一名充当苦力的朝鲜男孩，这名朝鲜男孩就是我扮演的。舞台上大量手持长矛、盾牌和其他武器的革命者，他们喊着口号，把日本监工吓跑了。话剧赢得了观众的欢呼。^[88]

部分学生与各个行业的商会代表联合起来，组成了多个纠察

队，以确保有效地抵制日货。7月7日，湖南学生联合会和几家商业团体联合举行了又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示威者呼吁销毁日货。这次示威的准备工作相当细致。周世钊参加了这次示威，根据他的回忆：

游行队伍前面高举着“烧毁日货游行大会”和“同胞们注意，切勿买日货”的大旗，学生每人肩负一匹日本布，后面跟着绸布业的店员工人，最后才是国货维持会和学生联合会的旗帜。游过热闹街道，最后到了教育会坪。学生们将布匹堆放坪中，淋上煤油，直到布匹烧成了灰，游行队伍才散走。^[89]

两天后，在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几位领导人的倡议下，来自各个群众组织的代表开了一个会。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包括所有职业和部门在内的统一的湖南各界联合会。^[90]

所有这些组织和活动，在毛泽东看来都还不够。他与李大钊和陈独秀的交往、他在北大新闻社团所获得的知识以及他与邵飘萍的多次长谈，使他最终得出结论：宣传是影响群众的最有效的工具。当时的毛对列宁尚知之甚少，但他无疑也会说出下面这席话：“我们认为，创办全俄政治报纸应当是行动的出发点，是建立我们所希望的组织的第一个实际步骤，并且是我们使这个组织得以不断向深广发展的基线。”^[91]毛和他的同志们都缺乏办一份报纸所必需的资源，于是他们决定，依照陈独秀和李大钊办的《每周评论》的模式，办一份面向湖南全省学生的杂志。毛泽东用华丽而又热情洋溢的语言描述了该杂志的宗旨：“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92]

经过大约十天的准备和组稿，这份名为《湘江评论》的杂志的创刊号于1919年7月14日面世。在他以主编名义撰写的《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毛泽东声称：“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根据文章中的解释，这里的“强权者”，除了官僚和军阀外，还包括资本家。他在北京待的那几个月并没有

虚度，虽然无政府主义依然强烈地吸引着他，但李大钊就社会主义问题所授的课，也在他心中留下了印记。确切地说，他还是相当谨慎的，没有鼓吹暴力，只是提倡民主和自由。“我们要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他说，“因此，我们不主张起大扰乱，‘炸弹的革命’，‘流血的革命’。”即使是对日本人，他也觉得诸如“罢课、罢市、罢工排货”^[93]之类的方法是最有效的手段。

该杂志的创刊号发表了毛泽东就他心中的偶像陈独秀被北京军阀逮捕一事而写的一篇言辞尖锐的文章。陈是在1919年6月11日学生运动期间因散发他本人撰写的名为《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而遭拘捕的。陈在宣言中严厉地批评了中国的总统和总理在“山东问题”上的对内和对外政策。他坐了83天的牢，出狱后即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定居。对陈的被捕深感震惊的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谴责了整个中国社会：

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94]

为了表示对他的这位老师的声援，毛在这篇文章里全文照录了陈独秀写的那份反政府传单。

也就是在这期杂志里，毛第一次发表了关于布尔什维克党的一篇短评。他没有做任何判断，只是号召中国公众研究一下俄国的经验：“过激党这么厉害！各位也要研究研究，到底是个甚么东西？……—光眼，过激党布备了全国，相惊而走，已没得走处了！”^[95]

第一期印了2 000份，很快就售罄了。7月底，加印了2 000份，但依然不敷所需，三天就卖光了。7月21日，第一期的特别增刊和第二期同时面世，第二期一下就印了5 000份。一周以后，第三期出版，印数还是5 000份。在当时湖南的出版界，这些已堪称是巨大的销量。长沙当时共有九份日报，《大公报》的销量最大，但也只有2 300~2 400份。其余报纸的销量均在100和500份之间。^[96]

在毛泽东的努力下，这份杂志共编排了五期，但只有四期得以面世。第四期的发行日期是8月4日，印数也是5 000。最后一期，也就是第五期正在排版的时候，张敬尧的士兵把印刷机没收了。^[97]

毛泽东为这份杂志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据当时住在他隔壁的周世钊回忆，毛把他上课以外的所有时间都花在这份杂志上了。“半夜醒来，我总能透过墙上的缝隙看到他屋里的灯光。文章写完后，他还要编辑。排版和校对也是他自己干的。有时候还得亲自到大街上叫卖。”^[98]

除了那些重要的文章，每一期《湘江评论》还在“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湖南杂评”和“新文艺”等栏目下，刊有简短的新闻综述。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毛本人写的。其他许多文章也出自他的手笔，包括那篇为他赢得全国知名度的文章《民众的大联合》。这篇思绪宏大的长文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他那时的思想。文章连载在该周刊的第二、三、四期上，占据了这三期的几乎全部篇幅。在这篇文章里，他试图回答已经折磨了整整一代革命者的一个基本问题：在“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的时候，还能做些什么？

毛所提供的答案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他当时的革命观依然是相当温和的。文章的基本假设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苦难的原因在于，压迫人民的那些人，即各国贵族和资本家，已经结成了反对人民的联合阵线。从这一假设出发，他要求“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的观点是，只有“民众的大联合”，也就是针对“强权者”的暴力所结成的大联合阵线，才能拯救国家。本质上说，他所要建立的，是包括农民、工人、学生、妇女、小学教师、警察和人

力车夫等在内的社会上所有被压迫阶层的众多行业工会。毛把所有这些都归入“贫弱”阶级，他们受到“富强”阶级的压迫。他相信，这些被压迫者的小型行业组织有助于催生出所有不幸的人民的“大联合”。一旦联合起来，中国的民众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击溃人数比他们少得多的贵族和资本家。民众只需要团结起来，挺身而出，大声呐喊，“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99]。

这篇文章明显地充满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思想，尽管毛也称赞道：“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间将鸞旗易了红旗。”他呼吁为军阀卖命的中国士兵们学习俄国军人的榜样。他写道，中国士兵们认识到自己是普通老百姓的“儿子”、“哥哥”和“丈夫”的时刻即将到来。届时，他们将“不觉得携手同归，反一齐化成了抵抗贵族和资本家的健将”。如俄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那样，一场社会革命将在中国发生。毛在这里所说的其他欧洲国家，指的是匈牙利、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这场革命将是全球被压迫者的斗争的组成部分。由于李大钊的影响，毛对此坚信不疑：“世界战争的结果，各国的民众，为着生活痛苦问题，突然起了许多活动。”他还写道：

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100]

年轻的毛泽东写下的这些话很容易使某些人得出他过于天真的结论。然而，如果回想一下，1919年5月4日开始的北京学生的“大联合”已经在—个炸弹也没有扔的情况下迫使“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輿倒台，就不难理解是什么在启迪和激励着他。他所理解的社会革命与流血无关，仅涉及“民众的大联合”的协调一致的和和平的行动；联合起来的民众的“有力的大呼”就足以使强权者胆寒。当时的他可能正处在一生中最倾向于这一理论的时刻：“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101]

然而此后不到九个月，他就彻底背叛了自己年轻时代的理论，无条件地接受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激进理念。

当时，毛所主张的一切都是相当和平的。“民众的大联合”看起来也具有相当的可行性。第一步是由志同道合的个人根据互助的原则结合为一个个小而紧密的团体。毛泽东早有在正对着长沙城的湘江左岸建立一个农业公社的想法，临近1919年末的时候，他的这个念头特别强烈。无政府主义对他的影响，其中特别是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曾强烈地吸引了他的克鲁泡特金的以互助为特征的共产主义思想，只不过是强化了他“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愿望。他指望朋友们能在这个问题上帮他。他想在这个村子里办一所学校，以教授社会科学和培育“新人”。把关于新生活的伟大理想付诸实施是毛当时孜孜以求的首要目标。本着与克鲁泡特金完全一致的信念，他宣称：“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102]他坚持认为，在这个公社里：

第一，须有一种经济的工作，可使之直接生产，其能力之使用，不论大小多寡，皆有成效可观。第二，此种工作之成品，必为现今社会普通之要需。第三，此种工作之场所，必在农村之中；此种之工作，必为农村之工作。……创造新学校，施行新教育，必与创造新家庭新社会相联。^[103]

这类空想自然不会有任何结果。但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他一直怀有这个梦想。

《湘江评论》不仅在长沙的自由开明的公共舆论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也在其他城市的有民主倾向的人士中间受到好评。对于《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更是好评如潮。甚至像胡适和罗家伦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对这篇文章也是赞不绝口^[104]，尽管九个月前这些名流还对这个图书馆助理视而不见。以胡适为例，他在1919年8月底的《每周评论》上写道：“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105]

不难想象《湘江评论》的成功带给毛泽东多么大的喜悦。这个

外省青年已经迈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人人都在阅读他的文章，谈论他这个人。第五期的被查封反而扩大了他的知名度：他已经成为暴虐的当局的牺牲品。

事实上，毛泽东并没有下狱，还能继续从事社会活动。1919年8月中旬，在何胡子的寓所里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毛泽东和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其他领导人决定，尽一切努力，把各个公共团体的力量联合在反张的旗帜下。作为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所作所为活像一个土匪。他的三个兄弟张敬舜、张敬禹和张敬汤都在他的军政府里身居高位。张氏兄弟及其手下的官兵们无恶不作：到处抢劫农民财物，掠夺政府金库，勒索商人，绑架和屠杀百姓，强奸妇女，贩卖鸦片，克扣教师五到六个月的薪水。简言之，他们对待湖南，就像对待一个被征服的省份。人们生活在恐惧中，贸易萎缩，物价飞涨。人民中间广为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张毒’不除，湖南必亡。”^[106]

9月初，中美合办的湘雅医院（此前的名称是雅礼医院）邀请毛泽东担任该医院的杂志《新湖南》的主编。这是一份周刊，已经出了六期，但尚未形成自己的特色。毛泽东有条件地接受了邀请，条件是，必须由他来决定刊物的宗旨。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的新闻工作者为自由价值观而进行的抗争已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答应了毛的条件。毛在其担任主编后发行的第一期上，规定刊物的宗旨如下：“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他接着指出：“‘成败利钝’自然非我们所顾。就是一切势力 Authority 也更非我们所顾。因为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107]

在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毛是这样回顾他在那一时期的生活的：

我们的团体^[108]曾经要求实行男女平权和建立代议制政府，一般地赞成资产阶级民主纲领。我们在自己办的报纸《新湖南》上公开鼓吹进行这些改革。我们领导了一次对省议会的冲击，因为大多数议员都是军阀指派的地主豪绅。^[109]

仅仅四周之后，这份杂志也被取缔了。^[110]这难道是什么意料之外的事吗？

这个反抗暴政的战士身上的浪漫气质，他的显而易见的办报天赋，以及他的不断增长的全国范围的知名度，使年仅25岁的、英俊的毛泽东成为女性所特别青睐的对象。火辣辣的湖南人的血液在他的体内沸腾着。“婚姻的中心在恋爱，”激情澎湃的毛高呼道，“人生恋爱的要求，其势力比任何要求要大，非有特别势力，决不是能挡得住的。……来挡住这恋爱要求的横海潮流的，我以为不是别的，就是唯一的‘迷信’。”^[111]

1919年秋毛写了一系列关于爱情、婚姻的文章，这些文章都发表在长沙的主要报纸《大公报》上。促使他写这些文章的，是当时发生的一起轰动全城的事件。一对父母逼迫自己的女儿赵五贞嫁给一个名叫吴凤林的年长但非常富有的古董商做小妾。11月14日，赵五贞在前往新郎家的红色花轿里用剪刀割喉自杀。她的死令她的父母、她的丈夫和所有当时在新郎家等着这位新娘的人惊恐万分。城里的人们一连几天都在谈论不幸的赵家。许多人认为这个姑娘应受谴责，因为她违背了儒教的训诫，但也有不少人同情赵姑娘。毛泽东、陶毅和他们的所有朋友自然都站在赵五贞一边。毛尤其愤怒。他写道：“这事件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112]

然而，恋爱和婚姻问题无论多么重要，都挡不住毛和他的朋友们去追求他们的主要目标：把那位督军和以他为首的那个犯罪小集团赶下台。整个秋天，毛泽东都在尽其所能地鼓动人们起来反对张敬尧。本着“民众的大联合”的思路，毛泽东认为，如果湖南全省上下能一致展示他们拒绝这位嗜血的寡头的意志，就有可能说服北京罢免张。与此同时，他继续领导着抵制日货的活跃的宣传运动，以免这场始于5月的爱国运动失去势头。后面这个工作，他是通过已经转入地下的湖南学生联合会来进行的。专横的张敬尧在查封了《湘江评论》之后，也取缔了这个学生组织。

11月中旬，毛还试图使新民学会重现活力，他召集留在长沙的会员在城北的周南女校开了一次会。会议重组了学会的内部组织，

成立了“评议部”^[113]和“执行部”，执行部下又设了几个分部：学校分部、编辑分部、女子分部和留学分部，还设立了执行委员会作为学会的领导机构。一个原本松散的团体就这样开始具有了权力集中的政党的某些特征。何胡子当选为执行委员长，李思安——一个身体瘦弱、参加学会不久但极度活跃的姑娘，成为他的副手。毛泽东、陶毅、周世钊等人成为评议部的评议员。^[114]

不过，新民学会向政党方向的这次转型并没有成功。11月会议后不久，学会的许多会员都卷入了几个暴风雨般的公共事件。有的会员被迫离开长沙。在近一年的时间里，这个组织再次陷于瘫痪状态。11月底，从沿海省份福建传来的一个消息激怒了公共舆论。那里的日本兵与爱国的中国学生之间发生了冲突。长沙学生决定举行一次示威，以声援他们的福建同胞。他们打算像7月的那次示威那样，搞一次大规模的、能吸引人们眼球的反日行动。就在这个时候，本地的一个旨在保卫国货的委员会的成员在长沙城里的一个火车站的货栈里查获了一大批走私来的日本布匹。他们决定没收这批货并公开焚毁。12月2日，总数达5000人左右的，由学生、教师、工人和店员组成的示威者们上了街，游行队伍最后来到教育会坪前面。对于那天发生的事情，周世钊有如下回忆：

这天天气晴朗，……冬天的太阳照在年轻人绯红的脸上，照出他们内心的愤怒和兴奋。我们学校的队伍跟着游行大队，走过东长街、青石桥、八角亭、坡子街、西长街向教育会坪前进。大队的前面，由军乐队前导，一些身强力壮的纠察队员抬着要焚毁的日货走在军乐队后面，男女学生五千人跟在纠察队后面。大队的两旁，学生用手挽着用日货布匹联成的长布条，正像出丧时送葬人执拂一样。队伍走过洋货店门口时，“抵制劣货”、“打倒奸商”的口号叫得特别响。凡洋货店悬挂放盘赠彩、七折、八扣等旗帜的，都把它取掉。下午一点，游行示威的队伍已经齐集在教育会坪。一大堆日货摆放在坪的中央，学生和旁观的将达万人围绕着日货站成多层的圈圈，等候着日货的焚毁。

正当学联负责人和各校学生代表站在特设的台上讲演焚毁日货的意义时，张敬尧的参谋长张敬汤穿着长袍，骑着马，带领一营兵、一连大刀队，冲进坪中，指挥他的兵从内外两面将学生紧紧围住。他自己向台上一站，就破口大骂：“放火、抢东西，就是土匪。男学生是男土匪，女学生是女土匪。对土匪还要讲道理吗？打啦，办啦，就是道理。”讲到这里他叫大刀队押着在台上的学生代表跪下，并打他们的耳光。他又在台上顿足大呼：“坪中的学生都回去，不许停留！”几百个士兵立即用枪上的刺刀对着学生们的胸膛，逼着我们离开会场。我们带着如火的愤怒心情回到学校。大家觉得今天受了极大的侮辱，难堪到了极点，但不知怎么办才好。^[115]

毛泽东和爱国运动的其他领导人立刻做出反应。第二天，也就是12月3日，新民学会会员与湖南学生联合会的骨干分子在南城门外的白沙井区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讨论了当前局势，制定了相关对策。他们决定宣布总罢课，同时要求北京政府立即召回张敬尧。12月4日，各校代表开了一个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派特别代表团分赴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常德、衡阳和广州等地，开展一场驱逐张敬尧的全国性运动。^[116]

12月6日，罢课开始了。长沙75所学校中的73所完全停了课。约有1200名教师和13000名学生参加了罢课。他们宣布：“‘张毒’一日不去湘，我们一日不复课。”^[117]同一天，毛泽东和其他几位长沙爱国运动的骨干分子启程前往北京。他随身只带了一把用来遮阳避雨的油纸伞、一套换洗内衣和几本书。^[118]在漫天飞雪的北京，伞是没什么用的，但是从长沙到北京，需要穿越大半个中国。

这次行程，他先是乘火车到武汉，接着从那里乘船到了上海，再从上海乘火车抵达北京。路上走了近两个星期，12月18日，毛再次抵达首都。

在他不在北京的这段时间里，这座城市的变化显然不大。没有迹象表明不久前学生们在这里发泄过他们的愤怒。生活已恢复常态，学生们照常上课，教授们忙着自己的事情。不错，陈独秀已不

在北大教书了，他已被迫去了上海，但李大钊仍在图书馆工作。可是，杨昌济一家的情况很不妙：在毛泽东抵达北京前的几个月，这位备受尊敬的教授病倒了。他被确诊患了胃癌，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对他的病都束手无策。他住在一家德国人办的条件很好的医院里，但病势日沉，生命垂危。^[119]毛一到京城就匆匆赶到医院看他，但他能做什么呢？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多说些吉利话来安慰他所敬爱的这位老师。但杨心里明白，自己大限将至。

在杨开慧父亲的病床前，毛泽东与杨又相遇了。但心中悲痛的重负使二人不可能谈论他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他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开慧后来坚持说，在他们不能相聚的那段时间里，毛不断地给她写情书。^[120]可是谁知道这是不是事实呢。不管怎么说，她所说的信没有一封保存下来。更有甚者，直到这次来京，毛一直迷恋着陶毅，这不仅是由于她的女性魅力使他心醉，同样也是因为毛认为她是“狠明达狠有远志的人”^[121]。就我们所知，他倒是给她写过信，甚至还规划过两人的前途。^[122]

1920年1月17日拂晓，杨昌济与世长辞。杨家因此而陷入令人同情的经济困境之中。这位才华横溢的教师挣钱不多。虽然他在湖南长沙县的板仓老家拥有数亩地，并且租出去了，但这块地带来的收益微乎其微。他的大儿子杨开智还是个大大学生，无力养活母亲与妹妹。已故教授的朋友和弟子们承担起了照顾老师一家的重任。他们以他的名义设立了一个基金，吁请所有认识这位令人尊敬的教授的人们尽其所能捐款，以接济他的家人。不用说，在设立基金问题上最积极的几个人中间就有毛泽东，他对老师无助的家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感人的关心。^[123]

当然，在操心着他所尊敬的杨教授的家人的同时，毛也没有忘记自己此次来京的主要目的。湖南代表团^[124]以一连串的要求向总统府、内阁及外交、财政、农业、商务等部的部长们进行了狂轰滥炸，恳请政府立刻罢免和惩办张敬尧，“以全国法而救湘民”^[125]。在他们提交的多份请愿书中，代表团的成员们列举了这位湖南督军及其兄弟犯下的十大罪行。用他们的话来说：“张毒”在湖南，“纵兵殃民，奸淫妇女”；“金融枯塞，无以为生”；“私卖工厂矿山于外

国人”；“驻兵各校，侵占房屋，毁损仪器”；“擅运私盐”，“坐收厚赃不顾民瘼”；“伪造选民改选省议会”。“去岁张敬尧入湘以后，纵饿狼之兵，”毛泽东以代表团的名义写道，“奸焚劫杀，骋猛虎之政，铲括诈捐。”^[126]

所有这些努力都是白费唇舌。这个腐败的、黑手党式的政府根本不打算认真处理张敬尧问题。毛泽东和他的伙伴们得到的唯一成果就是几位政府官员的承诺：将派“一人”赴湘进行“秘密调查”^[127]。毛极度失望。事实证明，在这个与内阁关系密切的省一级的寡头面前，“民众的大联合”是软弱无力的。1920年秋，张敬尧终于被逐出湖南，但不是出于公众舆论的压力，而是匪徒内部司空见惯的争权夺利的游戏的结果。张属于以华北为权力基地的安福系军阀集团，这个集团于1920年6月在与湖北省的大军阀吴佩孚的交战中吃了败仗。在军阀派系中吴佩孚属于直系，而这一派是支持谭延闿重返湖南执政的。

在中国，只有军权才有意义，只有枪杆子里面才能出政权。但当时的毛还没有最终认识到这一点。这倒不是因为他没有看到在他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尽管他也有年轻人所特有的浪漫情怀，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总的说来他是一个头脑相当清醒的人。当然，他的脾气火爆，并且在写给他的朋友们的不止一封信里，他都责备自己“太富感情，……易被感情驱使”，但是近似于歇斯底里的兴奋状态依旧折磨着他。^[128]他不是那种能够切下自己的手指书写爱国血书的人，也做不出在公共集会上高声呐喊的举动，更不可能像后来也成为共产主义活动家的天津学生马骏那样用沉重的烟灰缸猛砸自己的太阳穴，直到流出鲜血。后者在五四运动期间的一次演讲中，受狂热的情绪驱使，用这种自戕的手段把自己砸得精神恍惚。当时的毛泽东依然真诚地相信科学、教育和文化是更可取的手段，相信不偏不倚的新闻媒体和公共领域的活动有成功的可能性。在短暂的几年后他就放弃这些信念了，但在当时他依旧“沉迷在幻想里”。值得注意的是，1920年6月，在媒体上得知张敬尧已逃出湖南、吴佩孚的军队占领了长沙以后，毛泽东写下了下述文字，再一次表现出他的天真：

湖南人应该更进一步，努力为“废督运动”。……湖南人驱张，出于自决，不受何种黑暗势力的牵掣。果真觉悟到督军要废，自己举足踢去就是。^[129]

什么样的人民能做到这一点？当张敬尧的部队撤离长沙城的时候，长沙人都待在家里，不敢在大街上露面。他们真的能站出来反对占据督军宝座上的任何人，不管这个人张三还是李四吗？

那年冬天，毛泽东在与李大钊和邓中夏的交往中受益不少，从他们那里他知道了不少关于布尔什维克的俄国的消息，知道那里同中国一样，也在打一场全面内战。但俄国人内部的自相残杀，其性质与中国不同。在俄国，那个神秘的过激党已经把工人和农民联合在它的红旗下，正在进行着反对毛泽东所痛恨的贵族和富豪的斗争。在李教授的推荐下，他重新开始阅读共产主义文献。他也知道，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他心中的“明星”陈独秀已经转向共产主义。早在1919年4月20日，陈独秀就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他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评论，称其为“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所有这些因素推动着毛更严肃地看待这个新学说。

由于不懂外语^[130]，他只能通过译文来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但当时这类译著很少。他能读到的仅有的马克思的著作是《每周评论》上刊载的《共产党宣言》的节译本和《哥达纲领批判》。后者是一本公开论战性的、左派色彩极强的小册子，它号召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工人阶级专政。至于列宁的著作，他能读到的只有列宁写于1917年4月初的《俄国各政党与无产阶级的任务》。此文的中译文于1919年9月1日发表在北京的一家名为《解放与改造》的杂志上。此外还有一份《共产国际致世界无产阶级的宣言书》的译文，这是托洛茨基特意为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而写的。共产国际是布尔什维克于1919年3月创立的世界性的共产主义组织。这份号召进行一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宣言连载在11月7日至11月11日的北京《晨报》上，连载时的题目是《世界的新生》。毛还仔细研读了其他几本阐释共产主义思想的著作，包括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卡尔·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英国哲学家、费边派社会

主义者托马斯·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后来他告诉埃德加·斯诺说：

我在第二次访问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并热切地搜寻当时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本用中文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那时起，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31]

在对这位美国记者讲述他的思想转变过程的时候，毛难免对事实有所美化。实际发生的一切更为复杂，前面提到的那几本书也不可能使毛的思想立刻发生转变。不仅如此，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是在1920年8月才出版的，故毛不大可能在那年夏天就读到它。^[132]李大钊和陈独秀写的那些宣传十月革命的文章，弥补了译著的不足，填补了正在毛的头脑中逐渐成形的新思想中的空缺。^[133]他与李教授的谈话，与早已接受布尔什维克思想的邓中夏的交往，以及同首都的其他年轻知识分子的来往，也都影响了他的思想。

经过了五四时期的一系列事件，北京学生中的气氛已今非昔比。数以千计的中国爱国者在大战时期对英美自由主义的幻想而今已烟消云散。由此导致了整个中国尤其是首都地区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危机和知识界内部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路线图的紧锣密鼓的重绘。^[134]就在那个时刻，工人阶级第一次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约10万工人参加了五四运动。在已对马克思主义比较熟悉的那部分中国革命者看来，他们的觉醒明确地证实了关于“工人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的。^[135]但是在决定中国的公共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方面起了更加关键的作用的因素，则是俄国十月革命的令人振奋的性质、苏俄政府激进的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政策及红军在与帝国主义干涉者和国内反革命势力

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李大钊在1919年强调指出：“通过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向世人表明，它是一支能够撼动世界的力量。”^[136]这一断言无疑是正确的。

俄国共产主义者的成就，首先是他们在战场上对帝国主义和贵族所取得的胜利，唤起了一种设法去理解他们的意识形态的愿望，因为指导其行动的，就是那个意识形态。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研究布尔什维克的试验，希望找到一种理论，用作撼动中国的杠杆。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布尔什维克的试验这面多棱镜而在中国开始传播和被接受的。多年之后，毛泽东这样写道：“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37]在由众多流派组成的马克思主义内部，大多数中国知识界的领军人物接受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一派。这一派区别于其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显著特点，在于他们在社会发展法则方面的唯意志论的观点，对于人类社会作为自然历史进化的产物所内含的诸原理的看法，在看待群众的作用时所特有的倾向，把阶级斗争视为历史发展的强有力的决定因素的倾向，对私有财产权和个人权利的否定，对暴力的辩护，以及对普世价值的拒绝。这里所说的普世价值，包括被普遍接受的伦理道德观念、宗教观念和市民社会观念。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观念结构持一种简单的理解。他们关于世界发展的观点就性质而言是全球主义的，他们愿意接受的论点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

一些中国青年，因为痛感祖国的虚弱和屈辱地位，对布尔什维克的钢铁般的意志特别向往。发动不受限制的无产阶级力量这一列宁主义的政策，在他们看来是战无不胜的权力的显现，而权力正是这个“中央王国”所欠缺的东西。

如此多的中国青年“钟情于暴力”的那股劲头，令1920年初正在访问中国的英国自由主义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深感震惊。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罗素是应北京大学的邀请来华的，来华前他已去过俄国。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罗素的旅俄札记。^[138]尽管他在札记中对俄国共产主义者的各种行为的描述是客观和仔细的^[139]，但由于他本人的左派立场，在他的演讲和写作中，为了使所有的社

会主义者都能意识到支持苏俄的必要性，他还是强调了“布尔什维克的试验对世界的发展所具有的巨大意义”。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党人所采取的在他看来有悖民主原则的行为及他们所制造的暴力事件，又令他十分震惊和恐惧。^[140]在中国各地的演讲中，罗素在肯定共产主义思想的同时，非难了工农专政。他论证说，必须教育有钱人，说服他们认识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必要性。罗素相信，只要富人们意识到了这个必要，就没有理由去“限制自由或诉诸战争和流血的革命”^[141]。然而，对于罗素所非难的布尔什维克的那些行为，他的中国学生却奉若至宝。罗素后来回忆道：

他们都是布尔什维克分子，只有一个人例外，此人是皇帝的侄子。……他们都是些可爱的年轻人，虽然天真，但也聪明。他们渴望了解外部世界，急于摆脱中国传统的束缚。……他们准备为了他们的国家而做出牺牲，不管这种牺牲有多大。对彻底的觉醒寄予厚望的他们，能令你感受到一种触电式的震撼。在昏睡了几个世纪之后，中国正在一步步认识现代世界。^[142]

1919至1920年的冬季及1920年春季毛在北京的逗留，并没有给他的思想带来根本性的转变。马克思主义对钢铁般的意志的辩护，特别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对此的强调，固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促使他更多地思考俄国共产主义的问题，但1920年夏天的毛依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在1920年3月中旬给他的朋友周世钊的一封信上，毛写道：“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143]同年6月初，在给他的老师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表示：“我对于学问……颇觉常识不具，难语专攻……”^[144]他“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145]。

他的思绪依然纷乱。他一方面承认苏俄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146]，另一方面，深受克鲁泡特金的精神也许还有车尔尼雪夫斯

基的精神影响的他，依旧梦想着与志同道合者去某个地方建一所“自修大学”。他给这个乌托邦公社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分配好了具体的角色和任务，主张“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多得的人，补助少得的人，以够消费为止”^[147]。读了和听了一些在苏俄这个国度所发生的事情之后，他萌生了去那里的念头。1920年2月，他甚至拐弯抹角地与陶毅讨论起了一两年内两人一道去俄国的可能性问题。然而，到了1920年7月底，他突然宣称：“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几年来风驰雨骤，成长得好，与成长得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148]

在6月初给黎锦熙的信中，毛写道：“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只这三科。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起，渐次进于各家……”^[149]他所谓的“现代三大哲学家”指的不是列宁和他的同志们，而是伯特兰·罗素、亨利·柏格森和约翰·杜威这三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在信中坦承自己当时“渴求知识”，但是他的研究是杂乱无章的，他的阅读也没有明确的目的性。“脑子不能入静，功夫难得持久，改变也很不容易改变，真是不得了的恨事啊！”^[150]他什么都读，哲学、语言学，甚至佛学，都引起了他的兴趣。尽管有李教授的教诲，但他还是不能把布尔什维克主义作为唯一正确的世界观来接受。

毛于4月11日离开北京。同一年前一样，他又开始了漫游。这一次他先去了北京东面、距北京有两到三个小时路程的天津，接着去了山东省的省会济南，这个城市以“泉城”著称。然后，毛又寻访了孔子故里、美丽的曲阜城，接着登上了附近的神圣的泰山，一直爬到山顶，在那里可以看到壮丽的泰山日出。下山之后，他访问了另一位伟大的古代哲学家孟子的故里邹城县。此后才取道南京抵达上海，在那儿有的是需要他操心的事。这趟旅程共耗时25天。为了养精蓄锐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政治斗争，这段时间足够了。

★ 第三章

世界革命的吸引，还是专政的魔力？

毛于1920年5月5日抵达上海。此前，他的几位湖南朋友在上海城区西部距哈同路不远的的一个肮脏的街道旁的一个两层小楼里租了个房间，毛就和他们住在一起。受他的吸引，和他在一起住了两个半月的这三位男士和一位年轻女士也都卷入了他发起的旨在驱逐张敬尧的宣传运动。^[151]在那些日子里，毛一如既往地身无分文，他的朋友们也没钱。为了糊口，他不得不放弃他所自称的“知识分子习气”，干起了体力活。他的一位熟人、第一师范学校的校友李声澥当时正在一家船厂工作，他劝毛到这家工厂做工。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件事后来就没有下文了。^[152]最终，毛找了份洗衣服的活。^[153]洗衣工这份活并没有占据他的全部时间，只需要忙一上午，其余时间都花在政治上面，或是在城里漫游。^[154]

这一次他总算设法把上海滩看了个够。这座有着强烈魅力的大城市坐落在黄浦江边，黄浦江^[155]是雄伟的长江的众多支流之一。当时的她已是中国乃至整个东亚最大的工商业中心。自1842年英国人第一次出现在这座当时只有23万人口的城市以来，离长江入海口不远的、名为上海的这座天然良港已经成长为一个大都市。“上海”这个词的中文意思是“在海上”。^[156]1920年的时候，至少有150万人生活在这个城市里，这个数字是北京人口的1.5倍。这座面积只有90平方公里的城市在当时就已经人满为患了。它是这个国家的主要开放口岸。沿着黄浦江的左岸有无数的码头和仓库。

当时的上海主要由六个区组成。其中，五个区位于黄浦江左岸，也即西岸。它们是：南岛、闸北、吴淞、公共租界和法租界。

一个名为浦东的区位于黄浦江右岸，即东岸。“浦东”的意思就是“黄浦江东边”。南岛又叫南市，前者的意思是“南边的岛”，后者的意思是“南边的市场”。这座中国城市的最古老的几个地段就位于这个区内，其年代可以追溯到唐代（618—906）。历史上，这个区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名为“城厢”的、被一道高墙围起来的城市区，这道墙直到20世纪初时还在。“城厢”的字面意思就是城市。另一个就是南市，一个类似于城郊居民区的地方。20年代的南岛区位于火车南站和黄浦江之间。吴淞江^[157]左岸一带靠近火车北站的地区，就是以工业和工人为主的闸北区。闸北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水闸以北的地方”。这是19世纪中期才开始出现的一个新区。由英国人统治的公共租界位于闸北区以南、黄浦江以北以西。公共租界是在1863年通过合并于1845年建立的英租界和1848年建立的美租界而出现的。在公共租界以南并与它毗邻的，是1849年问世的法租界。这样一来，外国租界就形成了两个宽宽的带状地区，硬生生地隔开了中国人治理下的城厢——南市区与闸北区，把上海的黄浦江左岸地区一分为二。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西面、苏州河的上游，是另一个由中国人治理的区：吴淞区。

外国人控制了这座城市的大部分权势和财富。在中国，没有一个地区像上海那样，允许外国人拥有那么多的地产。这个城市的90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属于外国人的有32平方公里以上。在外国人居住的土地上，也就是租界里，实施着外国的法律，驻扎着外国的军队和警察。然而，租界并不禁止中国人居住。反对中国政府的知识分子和富有的中国人充分地、迫不及待地利用了这个机会。事实上，生活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里的中国人的数量比这两地的外国人多出了许多倍。^[158]这里的政治气氛比作为一个整体而言的中国要自由得多，生活水平也高得多。在从黄浦江边一直延伸到公共租界腹地的南京路两边，有许多商店，这些商店的富丽繁华，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里，还不乏欧美各大银行的分支机构与掩映在花草树木中的昂贵的宾馆和高档的别墅。这座城市的建筑风貌与时人在中国其他城市所能看到的建筑之间，有着强烈而鲜明的反差。第一次来到这里的外地人，一定会感受到强烈的情感震

撼。首先是给人以特别强烈的印象的码头，接着是沿着码头鳞次栉比地排列着、其尖顶直插云霄的巨大的石制摩天大楼。沸腾的生活景象随处可见，灯饰广告发出耀眼的光芒，大街上的小汽车横冲直撞地疾驰着，黄包车夫们脚不点地地来回穿梭，来自各国的轮船在港口边装货卸货。在码头的中心区域即外滩的绿荫下，风度优雅的绅士陪着衣着华丽的淑女悠闲地散步。在南京路及其附近的大街小巷上，行人熙熙攘攘。为数众多的商店、饭店、电影院和娱乐场吸引着富足的顾客。1922年春第一次来到上海的苏俄密使谢尔盖·阿列克塞耶维奇·达林对这座城市有着如下的回忆：

在我眼前展开的，是一个光彩夺目的城市的全景画卷。在这幅画卷里，有多层建筑和其屋顶上闪闪发光的氖光灯广告牌，……柏油马路，为数众多的汽车，有轨电车，数以百计的、随时准备为你效劳的黄包车夫，中国音乐，半球形铜鼓发出的音响，两边密布着电灯的街道，商业广告牌上由巨大的氖光灯管拼成的文字，所有这一切立刻就给了我强烈的冲击。^[159]

下面是美国作家哈里特·萨金特对上海的回忆：

20和30年代的上海是一个传奇。……它的名称就能唤起神秘感、冒险欲望和种种异想天开的可能性。在开往远东的船上，常住上海的乘客讲述的有关这个“东方的妓院”的各种故事迷住了其他乘客。他们的故事中有中国歹徒、永不关门的夜总会以及能把海洛因送到你的房间的旅馆。……然而，对于初来乍到者来说，现实的上海还是超过了它的盛名。……你一踏上上海的码头，就会被迎面扑来的、只有上海才有的气味熏得晕头转向，这是一股混合着昂贵的香水味和大蒜味的气味。十多种语言充斥着你的耳朵。乞讨的儿童拉扯着你的衣服。开着美国造的小汽车的司机斥责着拉着你的黄包车夫。有轨电车疾驰而过。在你的头上是外滩上高入蓝天的外国人的大楼。在你的脚下是撕扯着自己的伤口的中国乞丐。在一个小巷里，一位

已届中年的俄国妇女与一个中国少女为争夺一个水手而大打出手。在铺筑过的马路上，推着镀银的独轮手推车的中国车夫诅咒着几位刚从他们的俱乐部里走出来的衣冠楚楚的英国人。一位戴着红色包头巾、指挥交通的锡克警察冲着两位在车流中快跑的中国姑娘直吹哨子，这两个姑娘穿着很高的高跟鞋，旗袍飞扬，露出了臀部。即使蒙上眼睛，你十有八九也能从这个地方散发出的既轻薄又几乎是歇斯底里的活力中辨识出你的所在：上海。^[160]

在上海，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听到英语和法语，甚至俄语。克里姆林宫派来的另一位使者、1926年2月来到这个城市的薇拉·弗拉基米诺夫娜·维什涅科娃-阿基莫娃回忆道：“上海的公共租界里充满了白俄的气息。……白俄警卫们穿着沙皇时代的制服招摇过市。许多商店都有俄语招牌。……并且还有硬音符号。”有一种俄文杂志《当代评论》和三种俄语报纸——《上海曙光》、《言论》和《上海生活报》在这里出版。其中，《上海生活报》是布尔什维克资助的、公开鼓吹左派观点的报纸，头两个都是坚定地反布尔什维克的。一些年轻的白俄受雇于公共租界的英国警察部门。他们身材高大，体格健美，有着典型的俄国人的脸，在南京路上巡逻时常常轻快地哼着俄国小曲：“猎鹰高飞，有如雄鹰。我心伤悲……”访问上海的苏联公民初次见到这些身着外国制服的准同胞时，不由得目瞪口呆。^[161]

1925年的时候，上海有2766个俄国人、至少6000个英国人、约1500个美国人和1000多法国人。不同国籍的外国人总计有37758人。其中，住在国际租界的有29947人，住在法租界的有7811人。日本人最多，1925年时已达13804人。^[162]然而，俄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给这座城市打下的印记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上海处处洋溢着一种欧洲都市的气息。它的欧洲人居住区里的建筑风格与纽约和芝加哥相差无几。

每个来到上海的人都会感慨：这哪像中国啊！毛泽东在公共租界的时候也不由自主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不错，他的住处离南京路

和外滩很远，但他随时可以利用贯通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有轨电车这一技术奇迹。他在到客户家取脏衣服及送上洗干净的衣服的的路上，坐的就是有轨电车。据他自己说，因此而花去的车费占了他微薄收入的相当一部分。^[163]

参加反张运动的相当多的活动家当时都云集在上海。由富有的在沪湖南人发起的一个名曰“湖南改造促成会”的公开组织于1918年12月开始在上海活动。由湘籍人士组成、同样要求驱张的其他互助性质的社团当时也在上海活动。这些组织中最有影响的是“湖南旅沪各界联合会”。1920年春，著名的湘籍人士、同样反对张敬尧的徐佛苏也到了上海。

然而，正如我们在前文中已经看到的那样，毛和其他在上海的爱国爱乡的湖南人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功夫。毛对此浑然不觉，继续与风车作战。更确切地说，他对这一斗争的态度并不那么简单。他所追求的目标，不限于除去这个犯罪集团的老大，还要求改造这类暴君所赖以滋生的邪恶制度。从1920年春天直到秋季，怀着天真的热情，毛泽东撰写了一系列宣言式的文章，大肆鼓吹湖南人民的自决。这个想法很有意思，但却是个空想。他主张湖南脱离内乱中的中国而宣布彻底独立，制定一个省宪法，并选举产生一个真正民主的省政府。毛后来回忆说：“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摆脱关系，可以更加迅速地现代化，所以主张同北京分离。那时候，我是美国的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政策的坚决拥护者。”^[164]回想一下，从一个曾对埃德加·斯诺说自己在1920年夏天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的嘴里说出的这席话，确实令人称奇。

“湖南独立”的想法并不新鲜。1911年革命前夕，湖南的一个名叫杨守仁的革命民主派就在其名为《新湖南》的小册子里提出了这个思想。这位名噪一时的人物坚信，自由的湖南能够成为中国其他各省的楷模，各省追随湖南独立之后，最终仍将在新的联邦主义的原则下重新统一起来，这个原则将带来中华民族的复兴。^[165]独立的设想，更确切地说，自治的蓝图所引来的关注，主要来自具有民族主义情怀的湖南知识分子和商界人士。毋庸置疑的是，这个想法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或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与美国及若干西欧国家的

传统倒是十分契合。

毛并不是一下子就接受这个想法的。直到1920年3月，他还对湖南分离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弟于吾湘将来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本不明白。并且湖南是中国里面的一省，除非将来改变局势，地位变成美之‘州’或德之‘邦’，是不容易有独立创设的。”^[166]

可不久之后，他还是成了独立思想的热情的支持者。他的立场来自下述前提：

中国太大了，各省的感情利害和民智程度又至不齐，……湖南的地理民性，均极有为，杂在全国的总组织中，既消磨特长，复阻碍进步。^[167]

根据为毛泽东立传的众多传记作者之一谢凌霄（音译）的说法，当时的毛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如果把中国比作德国，湖南就好比普鲁士。”^[168]在这里他忘记了一个事实：统一德国的不是普鲁士人民，而是俾斯麦的铁血大军，他首先指望的，就是他的故乡的公民们的创造性的活力。“假如这回湖南人做了一个头，陕西、福建、四川、安徽等省有同样情形的省随其后，十几年二十年后，便可合起来得到全国的总解决了。”^[169]

他对湖南人民的创造性力量的信任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他打算宣布他对所有湖南名人的热爱，不论这些人是英雄还是暴君。他想在省自治的框架下建立一种独特的“湖南文明”，一种既不需要省督军，也不需要军队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自由的人民自己统治他们的国家，发展教育和工商业。^[170]他还把湖南比作瑞士和日本。^[171]

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我曾着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湖南人没有把湖南自建为国的决心和勇气，湖南终究是没办法。^[172]

他对该省省会的市民们期望尤殷，要他们做独立和民主运动的先锋。他曾这样写道：“……这个责任，便不得不归到我们三十万长沙市民的身上了。”^[173]

1920年6月，毛泽东向他所最尊敬的人陈独秀详细解释了自己草拟的复兴和重建湖南的计划。^[174]陈当时住在法租界内一个僻静的弄堂里的一所砖房里，房子不大，是传统的中国式建筑。他主办的《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部也设在那里。陈的反应如何不得而知。但最大的可能是，他对这个天真的计划不感兴趣。否则毛泽东不会不在他的众多讲话中一字不提陈的反应。就陈独秀这方面来说，他倒是试图把这位前图书馆助理引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在这次谈话中，他向毛详细解释了马克思主义。毛后来回忆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75]

那时的陈独秀正忙于建立中国的第一个布尔什维克小组。一些苏俄共产党人，也就是共产国际的成员，在资金上和意识形态方面给了他直接的帮助。共产国际，这个在列宁的倡议下于1919年3月成立的组织，其宗旨是把所有奉行布尔什维克原则的激进的革命政党联合起来并协调它们的行动。该组织集多种功能于一身。一方面，它是世界革命的司令部，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中心和组织中心；另一方面，它也是个强有力的情报机构，向各国派遣了众多拥有特殊使命的人和密谋者。一个由选举产生的、拥有自己的官僚机构的执行委员会（简称执委会）指导着共产国际的工作。执委会及其下属机构的成员既有苏俄的共产党人，也有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执委会的办公地点就设在克里姆林宫对面的沙波日尼科夫广场。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就是从那里出发前往地球的各个角落的。他们随身携带着建议、指令和布尔什维克从俄国以前的贵族和资产阶级那里没收来的金钱和金银珠宝。其中财宝最为重要。正是靠了这些钱，才得以在欧洲和亚洲、非洲和美洲创建共产主义组织，开办地下印刷厂和党校，给罢工工人和职业革命家支付薪水。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

在资助苏俄境外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时候是毫不吝啬的。在苏维埃国家建国之初，他们把在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之上。这一算计的基础是世界革命的必然性。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各个苏维埃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列宁在1918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上曾强调指出：“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们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176]

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中国，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确切地说，在全俄内战方酣的那几年，从莫斯科到中国来是不可能的。所以直到1920年春天，才从苏俄远东地区派遣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小组前往这个国家。根据与共产国际执委会达成的协议，由格利高里·纳莫维奇·维经斯基率领的这个小组所需的经费是由俄罗斯共产党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交处提供的。27岁的维经斯基是一个衣着讲究、精力充沛、身材结实的高个子年轻人，有一头暗色的卷发和一双忧郁、沉思的眼睛。他与生俱来的理解力、机敏老练的风格和高雅的绅士风度常给人以惊喜。他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这对于他的使命来说至关重要，



维经斯基，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第一位代表。

因为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不擅长俄语表达，但他们中的许多人能说西方语言，尤其是英语和法语。仅凭表面接触，人们无法想象这个迷人的年轻人竟会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一个对革命的敌人冷酷无情的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他生于俄国的维特布斯克省，1918年在西伯利亚崭露头角。在那以前，他作为流亡者在美国生活了五年，在那里对社会主义思想着了迷。国内战争爆发时他回到俄国，立刻就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接着就在鄂木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从事地下工作。一度被捕，被判流放到萨哈林岛服终生苦役。服刑期间他领导了一次囚犯暴动。此后成为萨哈林省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市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1920年初，他成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人员。^[177]

他的真实名字是扎尔欣，维经斯基不过是他的众多党内化名之一。他用过的化名还有谢尔盖耶夫、谢尔盖、格利高里、格里戈利耶夫、斯蒂凡、斯蒂文生和塔拉索夫。他的中国同志称他为吴廷康。他的妻子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库兹涅佐娃陪他一起来到中国。她也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内化名是诺拉。维经斯基的使华小组中还有一位中国翻译，此人是山东省平度县人，名叫杨明斋，俄国名字是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施密特。他自1901年以来一直生活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在俄国先后做过工人和会计。同时来华的还有两个人：一个叫季托夫，是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学院的毕业生；另一个是流亡俄国的朝鲜族政治活动家、化名为谢里布里雅科夫的瓦伦京·伊万诺维奇·金。这几位共产国际的特使于1920年4月抵达北京。他们肩负的密谋性十足的任务是：与激进的中国活动家建立经常性的联系，以帮助他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他们有足够的金钱进行这个工作。

他们的运气来得很快。通过一个在北京大学教授俄国文学的俄国流亡者的介绍，维经斯基与李大钊接上了头。这位同情苏维埃俄国的俄国教师是谢尔盖·波列夫伊，中国人都叫他鲍立维。我们这位来自苏俄的布尔什维克向李教授提出了一个在中国创建共产党的令人振奋的计划。虽然李完全赞同这个想法，但建议维经斯基最好先与陈独秀讨论这个计划。杨明斋早就从在华俄国侨民那里听说过陈独秀的大名，故也向维经斯基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带着李大钊写的推荐信，维经斯基、库兹涅佐娃和杨明斋于4月底来到上海。谢里布里雅科夫也到了上海，不过是单独行动，抵沪后他就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季托夫则留在北京。

谢里布里雅科夫和季托夫都劳而无功。在中国办事情，钱固然重要，但人际关系也很重要。从这一点看，维经斯基的办法是唯一正确的，他与波列夫伊和李大钊建立了关系并巧妙地加以利用。分别化名为米涅尔、米诺尔和雅可夫列夫，先于他抵达上海的苏俄共产党人伊凡·基里罗维奇·马马耶夫和他的妻子玛丽亚·米哈伊罗夫娜·莎吉雅诺夫娜、康斯坦丁·阿列克谢耶维奇·斯托扬诺维奇和化名为杨玉书（音译）的列昂尼德·佩林与维经斯基小组取得了

联系。接着，他们开始联手“耕耘”陈独秀这块沃土，而陈也已做好了与苏俄结盟的准备。双方决定就把《新青年》作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论坛，以这份杂志为核心，把所有激进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178]

就在这个时刻，毛泽东拜访了陈独秀。与陈的谈话使毛感到困惑。他信赖陈独秀，但他也不愿轻易放弃他的计划：在自决与进步的基础上宣布湖南独立，并把这个省的人民群众联合起来，以支持这一独立。6月初他回到湖南的时候，心态依旧是矛盾的。

回湘后，他开始实施一个计划，即与朋友们共同集资，建立中国第一家合作社性质的书店，书店将主要出售社会科学和政治方面的书刊。参与这个计划的共有27人。这个名为“文化书社”的书店于1920年7月挂牌，9月开始营业。书店的经营目标是，以最低廉的价格出售书店的主人们认为所有值得一读的书刊和报纸，“本社书包杂志售价至多比出版原店一样，有些比原店更便宜”^[179]，借此大力推动湖南人民的启蒙事业。毛在当地的《大公报》上撰文解释道：

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真是我们馨香祷祝、希望不尽的！^[180]

这一创举引起了众多公众人物的关注。值得一提的是，这家书店的招牌就是谭延闿写的。但是，这是谭在他的部下、湘军总司令赵恒惕的压力下，已于1920年11月末被迫辞去湖南省省长的职务之后才题写的。^[181]书店位于一座两层小楼内，共有三个房间，这些房间是毛和他的朋友们从中美湘雅医院租来的。它的创办资本只有519元^[182]，但是到1920年10月末的时候，在很短的时间内，毛和他的朋友们已经进了164种书，其中包括罗素、克鲁泡特金、达尔文、柏拉图和胡适的著作，还有毛非常爱读的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书店还以单行本的形式出售马克思为《资本论》第一版所做

的序言及记者邵飘萍写的《新俄国之研究》，前者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李汉俊翻译的，后者是由中国人写的第一部关于最近17年来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内容相当详尽。值得一提的是，这部长达140页的书的最后两章实际上就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传记。^[183]书店还经销45种杂志和三种报纸，包括陈独秀、李大钊等社会主义者刊行的《新青年》、《劳动界》、《劳工》、《劳工潮》和《少年中国》等宣传共产主义的刊物。1921年4月的时候，文化书社已在湖南的七个县设立了分店，还在长沙的四所高校设立了售卖处。^[184]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具体地说，在1920年8月下旬，显然是在他与李大钊和陈独秀的谈话的影响下，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185]9月中旬，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谭延闿政府的财政厅长、著名的自由派人士姜济寰被推选为研究会的总务干事，实际负责的是毛泽东。研究会的雄心勃勃的目标包括：对正在苏俄发生的一切进行个别的和集体的研究，收集相关文献资料，出版有关这个苏维埃国度的研究成果和政论文章，为有意去莫斯科留学的人们开办一个俄语班。研究会的会址就设在文化书社内，也就是从中美湘雅医院租来的那几间屋子里。^[186]

我们知道，毛本人当时也梦想着去俄国。在北京的时候他与李大钊和其他几位同志讨论过这个问题，甚至还听过几次俄国教授波列夫伊开设的俄语课。^[187]在上海的时候，他想继续俄语学习，有一段时间他到处寻觅，想找一位愿意教他俄语的俄国侨民。在他头脑里盘旋的一个想法，是组织一个赴俄工读运动，其性质和规模就像无政府主义者发起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一样。^[188]他无疑也获悉了陈独秀和维经斯基就此问题正在上海进行积极谋划的消息。1920年9月，陈和“吴廷康”为那些向往社会主义并想去莫斯科学习的青年创办了一所名为“外国语学社”的机构。^[189]该校学生的主要功课就是俄语，教员是杨明斋、库兹涅佐娃和一位名叫王元龄的非常年轻的姑娘。《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者陈望道每周一次去该校讲授马克思主义。^[190]维经斯基则为该校毕业生提供去俄国的旅费。

所有这些都触动了毛，但他依然不打算完全接受布尔什维克主

义。他非常尊重李大钊和陈独秀，也很注意他们的观点，但是要他放弃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仍然很难。他若有所思地写道：

以政治组织改良社会组织，以国家促进地方，以团体力量改造个人，原是一种说法。但当在相当环境相当条件之下，如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什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中国如有澈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原因暂不说）。所以中国的事，不能从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191]

在全力推进民众启蒙事业以图唤起湖南人的创造力的过程中，1920年夏秋之际，毛还参与组建了其他数个社团，其中既有面向湖南全省的，也有仅针对他的家乡湘潭的。^[192]他一如既往地鼓动湖南自决，在当地报纸上就此问题发表文章，向省长请愿，在会上演说。10月初，他在长沙主持了由省教育会举行的一个公开会议，在会上发起了一场请愿书签名运动。由毛起草的这份请愿书要求召开湖南人民宪法会议。有430人在会议通过的有关宪法会议的决议上签了名，签名者中有记者、科学家、教育家、商人乃至工人。^[193]在10月10日举行的有一万人参加的一场壮观的示威中，这个决议被递交给了谭延闿。这一天通称为“双十节”，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194]在11月7日于长沙举行的又一场大规模示威中，毛泽东带了一面大幅标语，上面写着：“大湖南万岁！”^[195]

然而，毛为争取湖南独立而做出的所有这些勇敢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一个个孤立的示威和会议并没有导致革命，大规模的示威和集会也无济于事。多年之后，在回顾这段经历的时候，毛以辛酸且自嘲的口气说道：

谭延闿被一个名叫赵恒惕的军阀赶出湖南，赵利用“湖南

独立”运动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他假装拥护这个运动，鼓吹中国联省自治。可是他一旦掌权，就大力镇压民主运动了。^[196]

公正地说，在1922年1月1日的时候，赵恒惕将成为中国唯一的为自己治下的省颁行一部宪法的军阀，但他这样做只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支持他扮演一个全国性领袖的角色，毛正确地看到了这一点。赵认为，通过省宪法来加强自己的权力，至少有助于强化他在湖南人中间的权威，进而全面巩固他的地位。用来掩饰老一套的军事独裁的宪法与毛所主张的那种人民的权力没有任何关系。“省宪法的生命之源实在过于狭隘，”毛预言道，“由自治各省组成联邦之实现的可能现在更小了。”^[197]

在这些困难面前，许多原来积极支持毛泽东的人纷纷开始脱离人民自治运动。那些曾经把口号喊得比谁都响的人，如今宁愿待在家里。毛长期以来所主张的一切都成了镜花水月。他深感失望。

令毛最感苦恼并给他带来深深的幻灭感的，是民众的冷漠。事实证明，被毛寄予厚望的人民太消极了，毛为此心灰意冷。在给他相识多年的老朋友、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的一封信中，毛发泄了他的怒火：“湖南人脑筋不清晰，无理想，无远计，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198]

这时的他开始认真思考李大钊和陈独秀对他说过的那些话。这一次，他真的下定决心了：“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199]此前在法国的蒙达尼的一所男子学院里学习法语的蔡和森对他也有不小的影响。蔡在欧洲所看到的一切已使他成为一个热诚的布尔什维克。他在给毛的信中写道：

我认为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应，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故阶级战争质言之就是政治战争，就是把中产阶级那架机器打破（国会政府），而建设无产阶级那架机器（苏维埃）。……因此我以为现世界

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在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我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起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200]

就在蔡和森写这封信的时候，陈独秀、维经斯基和李大钊正在为创建这样一个党而努力。1920年5月，陈和维经斯基成立了一个名为“革命局”的组织，其成员除了他俩外，还有与陈关系密切的另外三个人。^[201]接着，这个组织开始了其建党工作。1920年7月19日，最积极的几位同志在上海开了一个会，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是小组的书记。^[202]8月22日，在陈教授的倡议下，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此后，类似的组织在北京、天津和武昌等城市纷纷出现。10月，成立了以李教授为首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1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临时中央局。

包括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在内的第一批中国共产主义者人数不多，不超过20人。他们中有学生、青年教师和记者，但没有一个工人和农民。年龄最大的陈独秀，虽然不过42岁，但已因其“令人尊重的岁数”而被称为“老头子”。年轻成员中比较出类拔萃的有：专注于理论研究的上海学生施存统和俞秀松，做事干练且容易冲动的张国焘，意志坚定、目标专一的邓中夏，行事果敢的张太雷，颇具诗人气质的何孟雄。所有这些人当时都住在北京。年龄最小的是18岁的北大学生刘仁静，此人粗通俄语。把他们联合在一起的，是这样一个强烈愿望：用一切可能手段，尽快地使在俄国已经发生的事情在他们的祖国也成为现实。1920年11月，陈独秀在上海开始发行一份名为《共产党》的半合法的刊物。陈在这份杂志上不懈地宣传成立一个共产党的理念。该杂志还发表了有关布尔什维克革命在中国的前景的文章和共产国际文件。与此同时，他开始出版一份面向工人的杂志《劳动界》，杂志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受教育程度不高的读者解释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与剩余价值的理论。

毛泽东也理解创建一个“主义的结合”^[203]的必要性。我们知

道，对于一个有高度凝聚力的政治组织的重要性，他不曾有过片刻怀疑。但新民学会一直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也早已不复存在。他不得不一切重新开始。毛决意按照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改组新民学会。他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告诉了已经加入了北京的布尔什维克小组的罗章龙：

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204]

还在上海的时候，毛就试图做点什么来转变他的这个学会的松散性质。1920年5月，他在离苏州河不远的半淞园召集在沪的学会会员开了一个会，与会者共有12人。会议确定了旨在巩固这个组织的若干新原则，但是没有讨论任何与“共同信守的主义”有关的话题。在做出了刻苦工作、做事务实的决议，赞美了一番“望之不尽”的“绿草碧波”^[205]之后，学会会员们就各奔东西了。

就在这个时刻，形势有了戏剧性的变化。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生分裂的前夜说了一句名言：“在统一以前，并且为了统一，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206]这句话再确切不过地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心态。他已经受够了散漫、庞杂之苦，必须用唯一正确的主义把自己武装起来。到1920年11月的时候，对毛来说，这个主义已经有了，那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世界主义”）及其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毛如今所信奉的“世界主义”，说到底，“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207]。1920年11月末，他在一封信中对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大唱赞歌，说多亏了他组织中国学生赴法留学，才使得一些中国人（如蔡和森等）得以研究“世界主义”^[208]。对于自己曾以超乎寻常的热情参与驱逐张敬尧和宣布湖南独立的自由主义运动的经历，现在的他开始感到羞愧。他试图

为那段经历辩护：

我觉得去年的驱张运动和今年的自治运动，在我们一班人看来，实在不是由我们去实行做一种政治运动。……自治运动只是简单的希望在湖南能够特别定出一个办法（湖南宪法），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我们好于这种环境之内，实现我们具体的准备工夫。澈底言之，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209]

并非所有老朋友都同意毛的新观点。1920年10月自法国返国的萧瑜，就不接受布尔什维克纲领。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他言辞激烈地写道：

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颇不认为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普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缓，虽缓然和。^[210]

然而，要毛回心转意已无可能。他曾经有过倾心于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阶段，但一事无成，得到的只是失望。原则上讲，他依然同意萧瑜的见解，即“用和平手段去达共产目的”是一件好事。但他同时也认为，所有这些想法都是纯粹的乌托邦式的幻想。此后不久，他对这些“幻想”本身都不复有任何敬意。而在眼下，他是这样表达其观点的：“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他质问道，如果当今世界的教育都握在资本家手里，人们又怎能指望对这些剥削者进行再教育呢？资产阶级拥有工厂和银行，控制着国会、军队和警察，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者的活动空间在哪里呢？他的回答是，没有任何可能，只有“俄式革命”一途：“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

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换言之，就让布尔什维克主义而非别的更好的办法带着我们走出困境吧，“仁慈”将使你走投无路。毛泽东总结道：“我觉得俄国的革命，和各国急进派共产党人数日见其多，组织日见其密，只是自然的结果。”^[211]

显然，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皈依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他是在环境的压力下，在对人民的创造力和自治能力的幻想破灭之后，才选择这个方法的。布尔什维克式的集权主义，包括它对共产党的专政的诉求，它的狂热和不妥协的性格，对这位年轻的激进分子来说，都是合乎逻辑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它也适合他的纯粹个人的需要：我们不要忘了，在毛的意识里，“意志”和“权力”极为重要。

诱使他拥抱共产主义的，并不是关于普遍平等的浪漫思想。在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里有的是这类货色。真正吸引他的，是对暴力的辩护，是意志的胜利，是权力的凯旋。他终于做出了一劳永逸的选择。这个选择不那么合乎道德，却是可以理解的。在一个缺乏市民社会、4亿人口中有3.9亿是文盲、虽然在1912年就已废除了皇帝的权力但“只有极少数公民真正知道何为共和国”^[212]的国度里，怎么能够谈论自由和民主呢？这是一个资本主义尚未渗透到公共生活的所有领域的国家，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已知的每一种经济结构都与资本主义无缘。这也是一个盛行宗法制的国家。要把这个国家从麻木停滞的深渊中解救出来，需要什么样的力量呢？

布尔什维克主义吸引毛的地方，同样也吸引了其他激进的中国革命者。十月革命给他们的冲击驱使他们在政治上接受了布尔什维克的试验，而不曾对此有过任何批判性的认识。即使是那些或多或少认真地研读过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的著作，因而应该能够察觉到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践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之间的明显鸿沟的人，也倾向于认为俄国共产主义者的行动符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得出结论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有一定的“瑕疵”。举例来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施存统，就写过下面这段话：

我以为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都是拿产业发达的国家底材料做根据的；所以他有些话，不能适用于产业幼稚的国家。……如果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在表面上或者要有与马克思所说的话冲突的地方；但这并不要紧，因为马克思主义底本身，并不是一个死板板的模型。……马克思底共产主义，一定可以在中国实行的。^[213]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导里面，中国的激进青年轻而易举地抓住了具有强烈的革命色彩的以下思想：工人反抗资本家的阶级斗争、反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214]在他们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面，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特别重视的是《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年轻时写的一本具有公开的宣传功能和很强的政论风格的小册子，马恩在其中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号召采取直接的革命行动。小册子的思想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布尔什维克的激进主义，因而对他们很有吸引力。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支持者们之所以认定布尔什维克理论具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其首要依据就是《共产党宣言》。比如，李大钊在1919年夏秋两季撰写的一篇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指出：

有人说，历史的唯物论者以经济行程的进路为必然的、不能免的，给他加上了一种定命的采色，后来马克思派的社会党，因为信了这个定命说，除去等着集产制自然成熟以外，什么提议也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以致现代各国社会党都遇见很大的危机。这固然可以说是马氏唯物史观的流弊，然自马氏与昂格思合布“共产者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无论赞否马氏别的学说的人，对于此点，都该首肯。^[215]

中国共产主义的拥护者正是首先从《共产党宣言》中得出了只

有布尔什维主义理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结论。陈独秀在广州法学院做的名为“社会主义批评”的系列讲座，就是他们这一思路的典型反映。讲座的内容后来发表在1921年7月1日刊行的《新青年》上。讲座大量引用了《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里面的话，并把这两篇文献中的思想与俄国共产党人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主张和政治立场做了比较。陈独秀的结论是：

在俄国才还了马克思底本来面目叫做共产主义。……只有俄国底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正是马克思主义。而德国底社会民主党不但忘记了马克思底学说，并且明明白白反对马克思，表面上却挂着马克思派的招牌。^[216]

1920年12月底，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之一李达在《马克思的复兴》一文中也是这样写的：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已经在俄国完全实现的……列宁并不是创造家，只可称为实行家，不过能将马克思主义的真相阐明表彰出来，善于应用，这便是列宁的伟大，世人都要拜服的。被威廉里布克勒、贝贝尔、柏伦斯泰因、柯茨基等弄堕落了了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到今日却能因列宁等的发扬光大，恢复了马克思的真面目了，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实。^[217]

所有拥护布尔什维克的中国人都认为，他们的运动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中国版的十月革命准备条件。他们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不仅应当摧毁封建军阀势力的统治，而且还要结束资本主义关系在他们国家的发展；革命的矛头应该同时对准旧的和新的剥削阶级，后者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中国革命同时也具有反帝性质，其目标是推翻外国资本在中国的统治。这样一种中国革命的自然结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确立。^[218]

毛泽东最终也得出了类似结论。接受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之后，他再也没有对此有过任何疑虑。1920年11月中旬，毛泽东转而担

负起在长沙建立地下组织的任务。他在10月就已经收到了上海和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寄来的章程^[219]，因此，他着手建立同样的组织，以此开始他的新使命，也就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了。从那个学年开始，他成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主事，这个职位使他能够与年轻人保持经常性的接触。^[220]他是应易培基的邀请担任这个职务的，后者当时是他的母校即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兼谭延闿政府的教育厅长。^[221]

为“代觅同志”以承担合适的工作，毛找了几个人，他找的第一个人就是他在修业小学任教时的学生张文亮。^[222]那时已是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的张显然对他的老师言听计从。与此同时，毛也开始在长沙的湖南商业专门学校和第一中学的学生中寻觅合适的年轻人。^[223]这件事他做得很谨慎，并要张文亮也谨慎从事。张在日记中写道，他“并（对我）嘱青年团此时宜注重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224]。到12月初的时候，他们已经成功地发展了二十多个人。^[225]不久之后，在1921年1月13日这一天，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南支部正式成立。

1920年11月，毛泽东收到陈独秀的一封信，信中建议他在长沙组织一个与上海小组一样的共产主义小组。^[226]陈的建议不仅激起了毛的兴趣，也引起了何胡子、彭璜和毛的另一位朋友——市立船山中学的贺民范的兴趣。出于安全考虑，几位朋友在一个公墓开了一次会。关于这次会议萧三是这样写的：“在秋天的一天，在长沙一个公墓的石碑之间，在浓密的大树下有几个人在走来走去。他们时而在墓碑旁停下沉默，时而在路上走着，并高声谈论着什么。同毛走在一起的是留着一小撮黑胡子的矮个子，他肩膀很宽，目光炯炯。这个人就是何叔衡，是几个青年中唯一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但他是一名精力充沛、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同志。这几个人正在讨论湖南共产党的组建问题。”^[227]

既已开了一个头，下面的任务就是说服新民学会的其他会员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并由此把这个尚未界定自己的政治立场的现成的组织改造为一个共产主义组织。

一时间，诸事顺遂。毛希望为学会拉来更多的会员，至少是在

长沙。他的个人生活也有了起色。9月底，他与已故的杨昌济的女儿开慧重逢。在1920年1月父亲去世后，开慧与母亲和哥哥回到长沙。根据习俗，死者家属把死者的灵柩运回了他的出生地。在长沙以北20英里的板仓镇，令人尊敬的杨教授下了葬。居丧期满后，开慧来到长沙继续她的学业，就读在福湘女中。^[228]这对年轻人起初还有点腼腆，在河边散步的时候还有张文亮作陪。他们在一起经常是谈政治而非谈恋爱。毛告诉她有关苏俄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消息，向她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毫无疑问的是，他对这些常识的了解程度与他向她的解释深度处在同一个水平上。在他的影响下，开慧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两人心中日益增长着的感情最后终于掩藏不住了。开慧后来回忆道：“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见了我的心。”^[229]

显然，他们彼此爱慕。但毛对自由恋爱的天真信奉，都有哪些具体表现呢？1920年冬天，他和开慧结婚了。^[230]这对小夫妻对传统的婚姻仪式抱着同样的排斥心态，没有嫁妆也没有花轿，他们把这一切一概视为小资产阶级的市侩习气。^[231]

他们没钱租房子，两人婚后依然是各住各的宿舍，只有星期天才能见面。只有在韶山冲度蜜月的那几天，他们才终日厮守。他们是在1921年2月初到韶山的。他们去韶山也是为了和毛的两个弟弟、毛的堂妹泽建^[232]，以及毛的弟媳即泽民的妻子王淑兰一起过农历新年。直到1921年10月，他们才在长沙城东门外的清水塘租了一间紧挨着一个水塘的三居室的木屋。开慧把她的母亲向振熙从乡下接来同住。^[233]在中国，有婚后与父母同住的习俗。中国人认为，几代人应该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房租是毛用从党的活动经费里拿出来的钱支付的。到那时为止，毛不仅已经成功地把新民学会共产化，而且还在多个领域扩大了布尔什维克性质的地下活动范围。

★ 第四章

“走俄国人的路”

1921年1月1日早晨，在长沙市中心的潮宗街56号一栋小楼的顶层，也即文化书社所在的那间屋子里，十多个人聚集一堂。尽管这一天是西历新年的第一天，但屋子里既没有葡萄酒，也没有点心。这些青年男女的心思根本就不在派对上。他们都是半合法的新民学会的会员，是应他们的领导人何叔衡和毛泽东的召唤前来参加一个极为重要的会议的。在长达三天的会议中他们讨论了一系列议题，其中最重要的议题是：学会的总目标应该是什么？为达到这个目标应该采用什么方法？作为第一步，眼下应该着手做什么？会议于上午9:30准时开始，会议主席是何胡子。

第一个发言的是毛泽东，他说：

一部分人主张组织共产党，一部分人主张实行工学主义及教育改造。……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234]

讨论随之而起。

讨论非常激烈，提出的诸议题引起了热烈的争论。每个人都明白，这个组织今后的政治纲领取决于多数人在表决时的选择。主要问题是：是否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然而，第一天的整个上午都花在一般性问题的讨论上了，全然没有接触到这个核心问题。上午11:30，会议告一段落，与会者吃过午饭后就散会了。关键性的问

题被推迟到第二天讨论，根据会期安排，这将是决定性的一天。

1月2日上午9点，前一天的与会者全部到齐了。还有一些第一天没有与会的会员，风闻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讨论内容后，也来参加了。屋子里共坐了18人。会议依旧由何胡子主持。

作为会议的第一项议程，首先对学会的总目标进行了表决。结果，多数人主张维持原先对于总目标的表述，即“改造中国与世界”。然后转入第二个议程。仍是毛第一个发言。他介绍了他最近收到的蔡和森的几封信，说蔡的信建议学会会员采纳“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这一点我们已经知道了。毛提醒各位，一般说来，除了列宁主义的解决办法，还有其他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包括“社会政策”、“社会民主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及“无政府主义”。介绍完了这些主义之后，毛建议大家自愿结成小组讨论一下，然后各自亮明自己的选择。何胡子首先表态：“我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235]毛立刻支持了这位年长的同志：

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易采用。^[236]

彭璜表示支持毛与何：

我相信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采取革命方法的优越性。……中国迄未有过德谟克拉西主义。……中国的天然条件，如社会组织、工业状况和人民性情，非常接近俄国，故俄国的过激主义在中国行得通。同时，我等无需一味照搬（这种）过激主义，我们需要的只是同样的精神，换言之，实行革命的社会主义。

与会者大都同意应当采纳俄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因为“中国社会冷漠，人性已然堕落，……中国社会缺乏组织与训练。”这些湖南的“雅各宾党人”特别青睐激进模式：“如果人民没有办法让他们自己幸福起来，就让我们用铁腕把他们拖到幸福里好了。”最终表决结果是，18位与会者中有12位支持布尔什维克主义。^[237]

毛有理由为自己庆贺一番，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已经在长沙建起来了，他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正像许多人常常经历过的那样，成功之后他立刻陷入了沮丧，他的精神似乎崩溃了。前几天的弦绷得太紧了。我们已经看到，此前他给自己做过心理分析。他所内省的本质问题是：“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238]在这个情绪低落的时刻，他给彭璜写了封信，这位中国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在信中列举了自己的八个“缺点”。他认为，这些缺点使自己无法成为君子，即达到完美的境界。也就是说，它们将妨碍他实现他一直梦寐以求的目标，即成为一个真正异乎寻常的人，一个伟大的领袖。这些“缺点”是：（1）感情及意气用事而理智无权。（2）观察批判，一以主观的而少客观的。（3）略有虚荣心。（4）略有骄气。（5）少自省，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6）少条理而多大言。（7）自视过高，看事过易。（8）“意弱”。^[239]他坦陈最后这个“最大缺点”尤其令他羞愧，因为他一直在刻苦磨炼自己的钢铁般的意志力。

在给这位老朋友的信的结尾处，毛坦率地承认，推动自己的动机之一是：“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240]

毛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消沉来得快去得也快。此后他再也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权力抱负的正当性。唯一令人惊奇的是，这封信居然被保存下来了。

此后数月，事态进展堪称顺利。到1921年夏天的时候，中国已有了六个共产主义小组。除了上海、北京和长沙之外，广州、武汉和济南也出现了共产主义小组。施存统和周佛海在日本也组织了一个规模很小的小组。这两人原来都是上海小组的成员，后赴日留学。陈独秀发出了一封供所有小组传阅的信，信中要求确定“召开一次（统一的）大会的日程以及开会的时间和地点”^[241]。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筹备事宜最后终于落实了，开会地点选在上海。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的一位新代表到达中国。他的任务之一，就是帮助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们开好这次大会。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档案里所记载的他的化名是马林。他是在鹿特丹长大的荷兰犹太人，是荷兰社会民主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位资深活动家。

中国人也称他马林。这个马林一生中用过许多名字，包括马丁·伊凡诺维奇·伯格曼、布劳恩和巴恩布雷克尔。对有些人来说，他是曼德尔，另一些人则称他为菲利普同志。有的人叫他山托特先生或西蒙斯先生，还有人叫他乔·梵尚或杰克·霍纳。他来上海时，使用的名字是安德森先生。他真正的名字是斯内夫列特：亨德里克·约瑟夫·弗朗西斯科·马利·斯内夫列特。

说来也巧，马林抵达中国的时间正好是维经斯基离开中国的时候。与维经斯基不同，这位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派来的新使节并不以讲究策略而著称，他知道他的身份不凡。他不是由符拉迪沃斯托克派来的，而是由莫斯科派来的特别使节。他曾经在克里姆林宫的几个大厅里与列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等类似级别的领袖人物一同散步。来华的那一年他已有38岁了，在过去的岁月里他已经证明了自己作为工人运动的杰出的组织者的价值。他不仅在荷兰搞过工运，在荷属东印度^[242]的爪哇也领导过工人运动。1913—1918年他一直在爪哇，积极参加了那里的土著居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

1914年5月，他帮助建立了荷属东印度社会民主联合会。在他已离开爪哇后的1920年春，这个组织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被重新改组。共产国际领导人之所以注意到他，正是由于他的“亚洲经历”。因此，1920年6月到达莫斯科之后，他立刻被请进了克里姆林宫要人们的办公室。在1920年7—8月于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马林成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秘书，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列宁。就在这次大会上，他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执委会是共产国际的领导机构。因此，他的地位高于维经斯基。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中国的许多共产主义者不喜欢他。他的粗鲁举止尤其令人反感。一个穿着灰色的三件套西服、戴着蝴蝶结领结、风度翩翩但又相当自负的绅士，这就是马林的形象。这副派头使人不禁想起他自己与之斗争过的同样傲慢的那些殖民者。至少，这是第一次见面时他留给张国焘的印象。“这个洋鬼子咄咄逼人，很难相处。”张回忆说：

一眼望上去，这个身材魁梧的荷兰人活像一个普鲁士军官。但他的言谈又显示出只有议会客才有的口才。他不时地摆出一副非常严厉的姿态，用炯炯发亮的眼睛盯着你。……他以为自己是共产国际在东方问题上的头号权威，这就是他高傲自大的根源。……他把自己看成是给亚洲人民带来解放的天使。但在我们这些还保留着自尊、致力于我们自己的解放事业的人们的眼里，他的身上好像总有一股白种人的社会优越感。^[243]

与马林同时来华并肩负着同样使命的，还有苏俄特使瓦西里·伯格。他的化名是尼科尔斯基。他还有两个党内化名：瓦西里和瓦西里耶夫。他是受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的派遣，从伊尔库茨克启程来到上海的。远东书记处成立于1921年1月，是共产国际特设的一个地区机构。^[244]根据张国焘的回忆，他是个“说话不多、相貌平平的人”^[245]。他的妻子与他同行。

陈独秀这时已不在上海。1920年12月，应两个月前刚刚夺取了广东省政权的军阀陈炯明的邀请，他来到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陈炯明将军本质上与其他寡头执政者没什么两样，但当时的他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正在极力招揽知名的公众人物。他还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自由派，到处招摇撞骗，发誓忠于民主。他不仅成功地欺骗了陈教授，也让孙中山上了当。这位中华民国的前临时总统当时已是历经坎坷。这里不妨回顾一下历史。在1913年11月袁世凯宣布他的国民党为非法政党之后，孙逃往日本。袁世凯死后，流亡海外达两年半以上的孙中山才于1916年6月回国，到了广州。中国的新总统黎元洪将军最初还试图恢复被他的前任撕毁的宪法，但在北洋军阀的压力下，他又被迫亲自宣布解散国

会。1917年6月，被总统的这一决定激怒的部分国会议员开始云集广州，聚集在孙中山周围。9月18日，在这个城市，国会宣布复会，两个政权的局面由此正式形成。实际形势要复杂得多。我们知道，每一个地方军阀都认为自己实际上是独立的。1917年9月10日，孙中山当选为南方政府的大元帅，但这一次他并没有掌握实权。他还是没有自己的军队，缺乏控制军事寡头所必需的权威。1918年5月，邻省广西省的军阀首领陆荣廷将军向孙发难，要他下野。孙博士别无选择，只好退居上海。在那里，他与美丽的妻子宋庆龄一起住在位于法租界莫利埃路29号的一幢被绿荫环抱的华丽的两层小楼里。这幢楼是爱国的加拿大华侨赠给他的礼物。后来，新起的军阀陈炯明打败了陆荣廷，陈随之邀请这位倒霉的大元帅重返广州。陈碰巧又是孙中山领导的那个党的党员，这位寓居上海的流亡者没有理由不信任他。1920年11月底，孙博士重返广州。1921年4月7日，他在广州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老奸巨猾的陈炯明如此卖力地推销自己作为革命者的形象，就连老于世故的共产国际的代表们也被他迷惑住了。于1921年1月来到广州并与这位“人民”的将军举行过会谈的维经斯基，就对他深有好感。^[246]老布尔什维克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瓦伦斯基-西比尔雅科夫在写给列宁的信中，称陈炯明是“年轻的、自由的中国的杰出人物”之一，说他“在政治履历、对革命思想的忠诚和组织能力上，堪与孙逸仙博士比肩”^[247]。这里不妨把后事提前说一说。请读者注意，不到一年半之后，也就是1922年6月，陈炯明就发动兵变，背叛了不幸的孙中山，迫使后者于两个月后再次流亡上海。

然而，在当时，新纪元的曙光似乎已在广州出现。这就是陈独秀接受陈炯明的邀请来广州做“中国的卢那察尔斯基”^[248]，并且几个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对此都无异议的原因所在。在此背景下，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们的提议，做出了在陈缺席的情况下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的决定。李大钊忙于北大的事务，也无法来上海开会。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对此也不为所动。1921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核心成员李达，代替陈独秀，以上海小组的名义，向全国各地的所有共产主义小组发出通知，邀请每个小组派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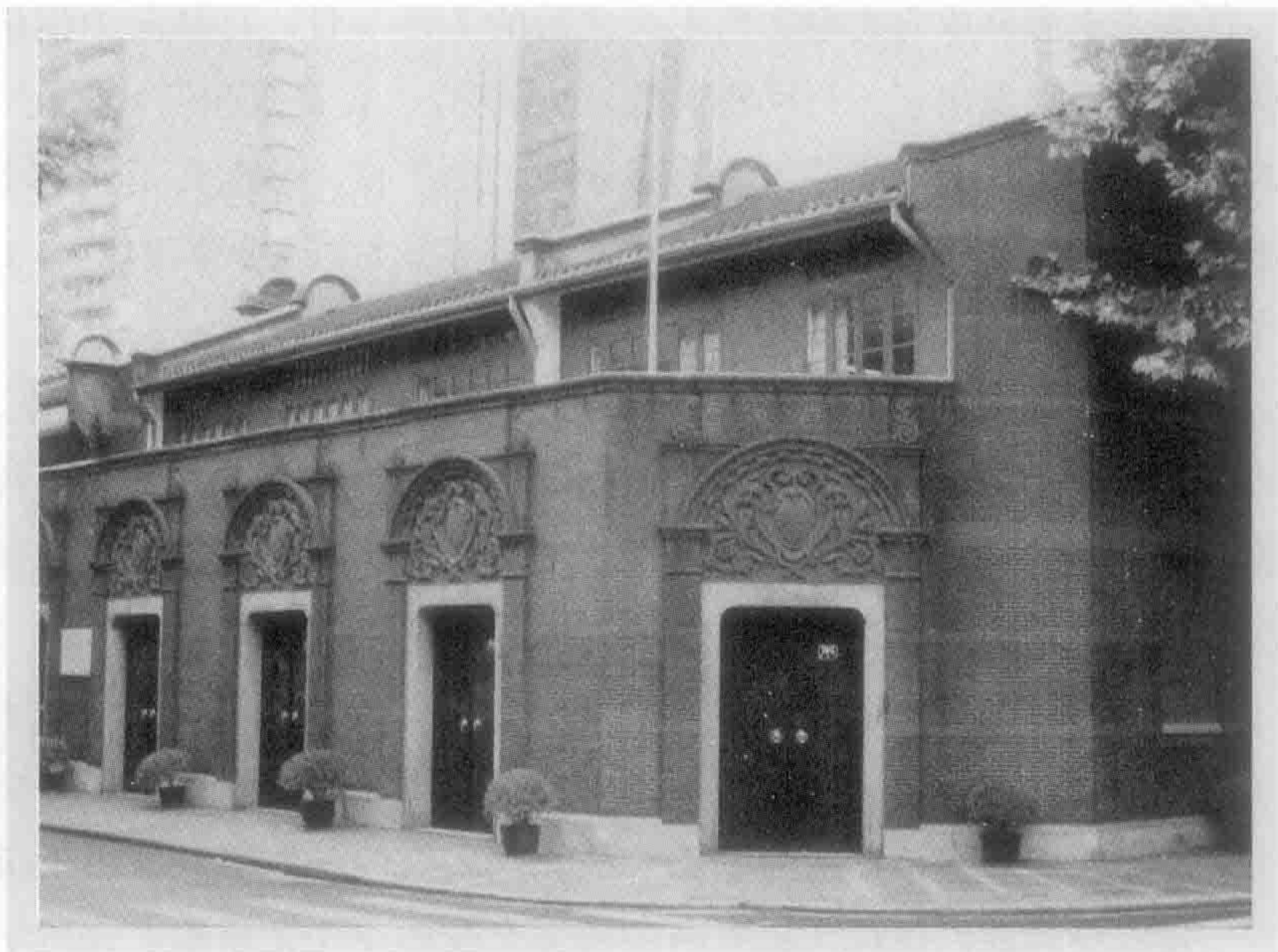
位代表来上海开成立大会。^[249]不久之后的7月9日，马林向中枢机构、向莫斯科发出了一封秘密快信，其中称：“我希望我们计划在7月底召开的这次会议能够大大有益于我们的工作。分散在不同的小组的同志们将被联合起来。会后我们就能够开始进行我们的中心工作了。”^[250]

到了7月23日这一天，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来自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和济南的各两位代表，以及来自广州和东京的各一位代表，共12人，都到齐了。毛泽东和何胡子也在其中，他俩是作为长沙小组的领导人，由小组成员派到上海开会的。

毛与何是6月29日晚坐轮船离开长沙的，途经武汉和南京，于一周后抵达上海。在码头上迎接他俩的是上海小组的联络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李达的妻子王会悟。代表们的安顿事宜就由王负责。她安排代表们住在法租界内的博文女校的学生宿舍里。这所学校的校长黄绍兰太太是她的一个熟人。不用说，黄太太不仅没有疑心，而且很高兴可以赚得一笔额外收入，反正暑假期间学生宿舍空着也是空着。王会悟对她说来城里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的一群教授和大学生需要临时住处。付给黄太太的租金不算高，所有费用加起来只有20元，但这对黄太太来说已经足够了。因为宿舍里没有床，前来住宿的“教授和大学生们”只好睡地板。^[251]

7月23日，代表大会在同一幢宿舍楼里的一个房间里开始了，与会者共有15人。^[252]除了12位代表外，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以及陈独秀的特别代表、武汉党小组的组织者包惠僧也参加了大会。最年轻的代表是刘仁静，他在1921年3月刚满19岁。年纪最大的是45岁的何胡子。然而，对与会代表来说，年龄没有任何意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其他一切内容一样，尊重长者的儒家习俗，是他们嗤之以鼻的对象。大会开了两天之后，会址转移到不远处的大会代表李汉俊的家。新的会址是马林出于安全考虑而选定的。李汉俊是李书城的弟弟，李书城是当时中国著名的军界和政界人物，也是上海滩最富有的人之一。李家在法租界拥有两套彼此相距不远的私人住宅。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就在其中的一套位于街道拐角处的住宅中继续举行，该住宅的门牌号是贝勒路树德里3号*。^[253]马林认为

* 后称望志路106号，现改为兴业路76号。——译者注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原上海望志路树德里106号）。

特务们的鼻子不大可能嗅到那里去。

李汉俊的这个房子至今还屹立在原处，中共一大博物馆自1952年以来一直设在那里。这是一幢漂亮的两层砖楼，但也像所有历史博物馆一样，给人以冷冰冰的、令人生畏的感觉。一个滔滔不绝的讲解员会引导你穿过里面的庭院，进入一楼的一间不起眼的18平方米的屋子里。屋子中间有一张很大的长方形的餐桌，餐桌边上整齐地摆着椅子和凳子，桌子上面放着一套精致的茶具、一个玻璃花瓶和一个铜质的烟灰缸。紧挨着一面墙，放着一张小桌子。一切陈设都和1921年时一模一样。看着这一切，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多年以前，就在这里，一小撮人为一个党制定了纲领，而这个党在28年之后竟能够把5亿人置于其统治之下。

1921年7月底的时候，就连这次会议的参加者也不当真相信他们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取得全中国的政权。当时中共只有53名党员。^[254]聚在一年前才建成的李汉俊的新家里的那些人，充其量只能朦胧地感觉到为了社会主义革命而要在未来进行的血腥斗争的影子。我们在前文中已经结识了的北京代表张国焘被选为大会主席。^[255]毛泽东和从日本赶来的周佛海被指定为大会秘书。忙于会议记录工作的毛泽东在会上的表现不是很积极。他在会上只发了一次

言，简要地汇报了长沙布尔什维克小组的情况。诚然，在后来开始制造对毛的个人崇拜的时候，他的老朋友同时也是他的早期传记作者之一的萧三，曾写道：毛的“生动的、内容具体的发言，和他所取得的真正的工作成就，使其他代表相形见绌”^[256]。事实是否果真如此，我们无法判断。萧三没有参加这次大会，我们也不知道他的说法依据何在，因为毛的发言记录没有保留下来。从张国焘的回忆来看，当时的毛“面色苍白”，但他展示给大家的，是一个

相当可爱的性情。……他穿着土布长袍，像是从某个村庄里来的道士。他的知识面很宽。……毛很健谈，喜欢辩论。与人谈话的时候，喜欢给人设置语言陷阱，这种技巧会令谈话对手不知不觉地暴露出自己的自相矛盾，从而掉进陷阱。这时，显然很开心的他就会大笑起来。^[257]

张本人与李汉俊、包惠僧和刘仁静一样，在会议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书呆子”刘仁静尤其活跃。^[258]他还特别建议，党纲中应该明确规定，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救中国。多年以后，刘回忆说：“我当时说，我在北大的时候读过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这篇文章指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完成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影响了我的，就是马克思的这个思想。”^[259]张国焘也提到了这件事，说刘仁静在大会期间逢人就说无产阶级专政，简直没完没了。^[260]

他其实用不着担心。与会者中的大多数都坚定地支持这个见解，唯一的例外来自他们的东道主。李汉俊对马克思的经济思想相当熟悉，因此对这个问题持谨慎态度，告诫说不要试图在一个落后国家过快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这个意见很快就被否决了。从一个编辑委员会事先准备好的大会文件中，不难感受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纯正气息”。当时规定的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性原则的具体内容如下：

甲：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到阶级的差别消灭。

乙：采取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废除阶级。

丙：推翻资本所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及半制成品等，悉归社会所有。

丁：联合第三国际。^[261]

上述纲领实际上也就决定和解释了大会所批准的策略路线：“本党采用苏维埃的形式，组织工人、农民及士兵，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本党主要政策；完全与黄色知识阶级及其他类似党派断绝一切关系。”^[262]

以上所说的最后一点，同样出现在《中国共产党党纲》中。《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和发展：

对现存各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和排斥的态度。在政治斗争，反对军阀与官僚，以及要求言论出版与集会自由时，凡必须表明态度者，本党应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准与其他党派或团体发生关系。^[263]

对于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这样的中国民族革命组织，这个共产党的成员们采取了同样的孤立主义立场。不顾陈独秀是广州政府的阁员的事实，《大会宣言》强调，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府并不比北洋军阀政府更好。^[264]显然，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年轻支持者在某些方面比列宁和托洛茨基还要激进，后者从不排除与其他政治力量进行任何一种合作的可能性。这一对比表明，中国的这些左翼激进分子是多么雄心勃勃，他们已经与自由主义正式决裂，以此来宣示他们在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连马林和尼科尔斯基都觉得这种革命热情热得有点过分。前者试图进行干预，他向与会者讲了他在爪哇岛的活动，这种活动涉及东印度社会民主联合会与当地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合作安排。^[265]他解释说，有许多不同种类的民主主义者；为了加强他的观点，他引用

了一年多前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几个基本决议。^[266]

其实，早在1919年11月下旬，先是列宁，接着是莫斯科的其他领袖们，就开始意识到，在苏俄的东部国界线以外传播布尔什维克理论的努力面临着严重的障碍。除了左翼激进分子组成的小集团以外，在东方没有人渴望在布尔什维克的旗帜下前进。多数知识分子坚持的是民族主义观点。广大群众更容易接受的，也是民族主义思想，而非共产国际所支持的抽象的国际主义观念。到1920年夏天的时候，列宁已经彻底认识到，在东方社会占优势的种种条件的制约下，旨在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的“纯粹”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策略，不可能取得成功。这一认识迫使俄国共产党人正视这样一个问题：怎样使他们的理论适应在工业发展方面比俄国还要落后的、不是殖民地就是半殖民地的那些国家的具体国情？这些情境迫使他们对他们关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传统理解做出某些修正。他们对这一革命的理解，从此不再仅仅是“所有国家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反对各自国家的资产阶级”的斗争，而同时也是，也许更多的是“所有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的被压迫人民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267]这一新的理解与规定了共产国际对华的新政策的那些原则有直接关系。其基础，就是列宁于1920年夏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认真地制定出的反殖民主义的独特理论。

他的新理论的关键内容如下。在工业落后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东方国家，其人口的大多数都是生活在封建宗法制度或半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农民，如果不首先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对这些国家的统治，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将是不可想象的。由此决定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的革命，其性质是民族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的。在这些革命的进程中，与广大群众的民族主义斗争深思熟虑地联系在一起各个民族的共产主义者，有义务支持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因为若非如此，就不可能把东方各国的共产主义组织转变为真正的政党。共产主义者应当通过参加这些民主运动而非自我孤立的途径，掌握对群众的领导权。他们应当通过掌握领导权的方式把民族主义运动转变为一种新型的资产阶级革

命；与此同时，要通过宣传农民苏维埃和被剥削者的苏维埃的思想，努力赋予这些运动以更加民主的性质。只要是条件允许的地方，他们就应该立即进行建立劳动人民苏维埃的尝试。^[268]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讲坛上详细阐述这一思想的同时，列宁一再强调这一新方针的暂时性和纯粹策略的性质。他宣称，东方各国的共产党人只有在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真正的民族主义革命家，因而既不妨碍共产党人以真正革命的即共产主义的精神去教育和组织农民和被剥削的广大人民群众，也不反对共产党人去支持广大群众反对地主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所有表现形式的条件下，才能给资产阶级民主以支持；与此同时，要无条件地坚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哪怕这种运动才刚刚起步。列宁甚至还说，如果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妨碍共产党人的组织工作，不允许后者去完成他们的、其内容为在他们的国家内部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的特殊使命，在那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就应该与改良派的资产阶级做斗争。^[269]换言之，我们应该支持民族的革命家，但是只有在他们不妨碍我们组织群众与他们这些民族革命家作斗争的条件下，才能那样做。^[270]



1920年7月19日，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做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的报告，和列宁并排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卡尔·拉狄克。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与会人员合影。参会人员有：Л. М. 加拉罕、卡尔·拉狄克、Н. И. 布哈林、列宁、А. М. 高尔基、Г. Е. 季诺维也夫、М. Н. 罗易、列宁的妹妹乌里扬诺娃等。

与上述思想相联系的，是这样一个观念：东方各国反殖民主义革命的胜利将促使它们走上某种“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马林竭力向与会代表传达所有这些思想，特别强调布尔什维克在中国的政策应当是灵活的，但他的话没有对代表们产生任何作用。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的拥护者们发现，让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理论和以反帝国主义为目标的合作的概念并行不悖的必要性，理解起来极其困难。他们也无力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全部布尔什维克主义都是建立在一个谎言的基础上的。列宁主义的辩护士所鼓吹的“背信弃义的权利”一时间把他们给弄糊涂了。他们之所以受共产主义的吸引，主要是缘于其革命的魅力、其关于阶级斗争的浪漫思想和其蕴含的平等理想。

当时的毛泽东也不能接受列宁的上述思想。尽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天下唯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但对他来说，这早就不是什么头等重要的道理了。这个个性强烈的韶山人从少年时代起就“没

有这等本领”去践行很久以前老子所教导的这个“理”。在一次坦露真情的时候，他曾吐露道：他“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271]。

就在与会者准备对会议进行总结的时候，7月30日晚，一个身穿黑色长袍的中年人闯进正在开会的屋子里，打量着他们。与会者问他是谁，来干什么。这个陌生人咕哝着说要找出版社的一位叫做王先生的经理。这个不速之客说罢就走了。马林非常不安，下令所有人马上离开会场。只有这间房子的主人和他的朋友、广东代表陈公博留了下来。过了不到一刻钟，几个法国警察闯进了屋子。为首的警官用法语问道：“谁是这屋子的主人？”

“是我。”李汉俊答道。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

“在你房间里开会的都是什么人？”

“没有开会，”李反驳道，“只有几个北大教授在一起讨论新时代出版社的计划。”^[272]

“屋子里怎么有这么多的书？”

“我是个教师，我的工作离不开这些书。”

“为什么你有这么多社会主义的书？”

“我是个兼职编辑，他们寄来的书我都得读。”

“刚才有两个外国人在这里。他们是谁？”

“两个英国人，都是北大教授。他们来这里过暑假，顺便过来聊天。”

接下来警官开始用英语盘问陈公博，因为陈不懂法语。

“你是日本人吗？”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警官问了这么个问题。

“不是，”陈回答道，“我是广东人。”

“你来上海干什么？”

“我是广东法学院的教授。现在放暑假，我是来上海度假的。”

“你住在哪里？”

“就在这里。”

警察们在屋子里无所事事地待了一阵子，这才开始搜查房间。他们显然漫不经心，因为没有搜到任何东西。这就让李汉俊和陈公博逃过了一劫。在李的卧室里有一张书桌，书桌的一个抽屉里就放着《中国共产党党纲》的草案！

深夜，密谋者们聚集到当时为李达和王会悟所暂住的陈独秀的家里。大家都意识到，继续在上海开会已不可能。毛泽东认为有必要转移到某个与上海相距遥远的地方。但王会悟建议去她的家乡嘉兴市。嘉兴位于上海以南的南湖边上，距上海有 35 英里，属浙江省。王说，他们可以租一条游船，把最后阶段的会议放在湖上开。几乎每个人都同意这个方案，但也有少数人因各种原因决定不去。比如，陈公博就吓坏了，他是带着年轻的妻子来上海的，他觉得若继续与会，他们的蜜月就泡汤了。在征求了李达的意见之后，他和他的太太立刻去了杭州，在那里逗留了数日。杭州属浙江省，在上海以南 100 多英里。何叔衡没有等到会议结束就启程返湘了。因为多数代表觉得他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要求毛泽东找个说得过去的借口打发他回家。李汉俊也不能离开上海，因为警察正监视着他的家。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决定不离开上海，以免引起警方对他们两人的关注。

第二天，即 7 月 31 日，剩下的十个与会者，包括毛在内，在王会悟的陪同下，乘火车来到嘉兴。毛的老朋友萧瑜当时也在上海，并从毛那里知道了开会的消息。他也决定去嘉兴，以便看看这个会将如何收场。王把所有人都安顿在当地一家昂贵的旅馆里，旅馆的名字与这个会极不相称，叫“鸳湖旅馆”。他们还通过这家旅馆租了一条游船。盥洗完毕并用完早餐之后，毛和除萧瑜以外的其他人在上午 10 点左右到湖上去了。船很大，船内的舱室也不小。大家坐定之后，游船划向湖心。他们的运气不错，当天天气不好，飘着蒙蒙细雨，湖上游客很少。午饭时间过后，湖面上几乎空无一人。

在共产国际代表缺席的情况下，与会者们通过了一个党纲、一个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目标的决议案和一个宣言，三个文件都充满了革命措辞。看来他们都自以为是无所畏惧的英雄。接着，他们一致推选陈独秀为党的中央局的书记。1922 年，书记一职被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取代；1925 年，这个职位又改称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到 1927 年 7 月为止，担任这些职务的一直是陈独秀。另有两人被选入中央局：一个是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另一个是李达，负

责宣传工作。在陈独秀因故不能履职的情况下，书记一职由周佛海代理。

已经是下午6点了，但代表们没有一个愿意离船上岸。坐在船上的这伙年轻人呼起了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人类的解放者共产主义万岁！”^[273]不知道这些口号当时有没有引起回声。

第三篇

民族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 第一章

布尔什维克策略的启示

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表现出的极端任性及其公然与共产国际代表的指示对着干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马林的耳朵里。他无意容忍这帮政治新手的不服从行径，大会刚结束，他就通过中间人包惠僧传话给陈独秀，要他立刻返回上海，担负起党的直接领导责任。^[1]陈独秀本来有自己的打算，他想把中国共产党的指挥部迁到广州去。^[2]尽管如此，陈还是被迫服从了。1921年9月，他辞去了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回到上海。

与此同时，根本不把中共一大的有关决议放在眼里的马林来到中国，想试探一下中共与孙中山结成反帝联合战线的可能性。1921年12月底，他与孙博士在广西省的桂林会了面。^[3]北京共产党组织的成员、当时一直陪着马林的张太雷是会谈时的翻译。会谈中讨论了国民党与苏俄秘密结盟的可能性。马林还提出了如下建议：国民党实行转向，支持民众；建立一所专为中国革命训练军事干部的学校；把国民党改造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能够联合各个社会集团的代表的政党。他还就苏俄问题向效忠孙中山的军官们做了一次演讲。他在这次演讲中强调说，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在国内战争之后之所以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是为了部分恢复市场关系，这很像是对共产主义的偏离。马林的这些话给孙留下了特别强烈的印象，因此孙很快就把这一新消息告诉给了党内同志。他通报说：“俄国的经济状况尚未为共产主义创造必要的前提，正因为如此，当首次听说俄国在实行共产主义的时候，我非常吃惊。但现在我从马林那里得知，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与我们的工业化计划没有很大的差别。”^[4]

马林的这次南方之行，他与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及陈炯明的会谈，他刚刚了解到的有关国民党在组织工人运动方面的成就，都坚定了他的一个决心：要尽其所能地纠正中共领导人“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他相信这种态度的转变将使中共更容易与华南的工人和士兵建立起联系，因为华南的政权是掌握在孙中山的支持者手中的。不用说，马林也没有忘记强调：中共无须“放弃它的独立性，相反，同志们应当共同决定在国民党内部工作时所应遵循的策略”。他的结论是：“只要他们还没有与国民党建立联系，（共产党人的）这些小集团从事的宣传工作的前景就只能是黯淡的。”^[5]

马林首先提出的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得到了孙中山和其他一些国民党领导人的赞同，他们还向这位共产国际代表保证说，他们不反对在他们的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不过，对于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党际合作的前景，孙中山的态度是悲观的。^[6]

回到上海后，马林向中共领导人通报了他与孙博士的会谈情况，建议他们认真考虑他的在国民党内发展中共的新建议。马林的建议使陈独秀和其他中共领导人极为不安，这也是很自然的反应。这个建议一提出就遭到了否决，关于这一点陈独秀当即就向当时在莫斯科的维经斯基作了通报。^[7]陈的这一举动激怒了马林，后者遂于1922年4月底离华返俄，到莫斯科诉苦去了。他甚至没有和任何一个他所认识的中国人说声再见就走了，唯一的例外是他在上海的临时女友，而这个姑娘与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任何瓜葛。^[8]

在这场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争吵中，毛泽东坚定地站在他的老师陈教授一边。长沙的其他共产主义者也是如此。广东、上海、北京和湖北的党小组的成员们，换句话说，绝大多数中国的布尔什维克，都拒绝与国民党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9]他们都认为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建立自己的党组织及在共产党的庇护下开展工人运动。

返回长沙之后，毛在党和工会的组织工作方面都很活跃。他在8月中旬才回到长沙，返程时在南京逗留了几天。他在长沙迅速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根据中共建党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这个机构的总部也刚在上海成立不久。^[10]从一开始他就不得不与当地的无政府主义者打交道，因为无政府主义者是湖南工人运

动真正的先驱。他们的领导人是黄爱和庞人铨，他们于1920年11月建立了名为“湖南劳工会”的工会组织。无政府主义者还发行了一份《劳工周刊》杂志，杂志在工人中很受欢迎。参加了1921年4月长沙第一纱厂罢工的那些工人，就是这个工会最活跃的会员。这次罢工共有2000人参加。^[11]

毛泽东意识到，若跟这样一个有影响力的工会进行竞争，他毫无胜算。于是，毛做了一件在这种情势下唯一明智的事情：将黄、庞二人争取过来。1921年11月底，毛泽东为这份无政府主义杂志写了一篇文章《所希望于劳工会的》。他在此文中宣称，一年来他一直同情这个组织，接着他就尝试着大力推销其布尔什维克理念：

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是宗旨所在，希望劳工会诸君特别注意的。^[12]

通过劝说，毛最终使黄爱和庞人铨于1921年12月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不料，1922年1月，劳工会的这两位领袖都被赵恒惕所豢养的暴徒抓了起来，并被处决。给两人安插的罪名是：“私购军火，串通匪徒，在年末时煽动铸币厂工人罢工。铸币厂那时停工实难容忍，盖因彼时正亟须铸币厂铸造铜钱给士兵发饷。”^[13]这些罪名是否属实，尚无定论，但黄庞二人的被杀客观上有利于毛泽东则是无疑的。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才有能力控制这个省的工人运动。饶有意味的是，多年后毛泽东在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对黄爱的评价相当消极，说他是“右派劳工运动的一个领袖，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是反对我们的”^[14]。

这一时期，在组织共产党工会方面给了毛泽东以极大帮助的，是他的老熟人李立三。此人就是在1915年秋因为在我们这位“无所不知”的第一师范学生面前感到羞怯局促而没有加入毛发起的朋友圈子的那位小伙子。自那以来，李已经经历了很多，作为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一员他已经开了眼界，对社会主义思想已经有了基本体

验。1921年11月他回到长沙，随即出现在毛的房间里。虽然当年与这个怪异的小伙子的初次相遇曾给毛带来不快，但这一次毛还是友善地接待了他。在法国的时候李立三与蔡和森结为好友，这就足以使毛改变他对李的看法。“洞庭有归客。”毛说道。这句话既表示了对李的欢迎，也是一副对子的上联，意在邀请李答出下联，这是那个世纪之初受过教育的人们中间流行的一种风尚。李的回答十分得体：“潇湘^[15]逢故人。”^[16]*

* 这个对子出自南朝梁诗人柳恹的《江南曲》。——译者注

他们没有成为朋友，但在当时他们之间至少形成了同志关系。此次见面后不久，李立三就加入了共产党。事实证明他很能干。他是个富有激情的演说家和行动果断的人，在工人中深受欢迎。1921年12月底，毛和李一起去了安源煤矿，旨在发动那里的工人运动。该矿位于江西西部，紧邻湖南。在确信那里的成功机会很大之后，毛要求李立三留在安源，从事当地工人的组织工作。^[17]

在李立三忙于安源工运的时候，毛致力于在长沙和湖南其他城市的几个企业的工人中组织工会。由于马克思的影响，这时的毛认为工人将是未来革命的主力。在他的家乡湖南实际上不存在产业工人阶级的事实，并没有使他踌躇不前。在湖南，总共只有三家大工厂，在其中的一家即第一纱厂里，相当多的雇佣工人是9~12岁的孩子。也有几家规模很小的有色金属厂，这些厂雇用的工人很少。被中国共产党人视为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工人都是刚刚离开农村、在手工工场做工的临时工和季节工，此外就是苦力和人力车夫。但毛毫不为之所动，在他看来，概而言之，大多数人“都是用手或用脑做事的劳工”^[18]。不用说，从严格的社会学意义上说，并不是那么回事。

到1923年年中的时候，毛和他的同志们已经成功地组织起了22个工会，其中有不少都称作工人俱乐部。加入工会的有矿工、铁路工人、印刷工人、市政工人、铸币工人、人力车夫和理发师，等等。^[19]毛在其中的8个工会中被选为秘书。^[20]这些组织的会员共有3万人。其中大部分工会规模相当小，根本不能和李立三创立的安源工人俱乐部相提并论。1922年5月1日成立的这个俱乐部拥有11000个会员的时候，长沙各工会中最大的人力车夫工会只有2000个会

员。^[21]由于共产党人的宣传,所有这些工会都积极地卷入了阶级斗争。根据毛的回忆,1922年初,在长沙和其他地方,“展开了蓬蓬勃勃的劳工运动”^[22]。根据毛的估计,在工人运动达到高潮的1922年秋,有22 000多名工人参加了各类罢工。^[23]

毛直接卷入了其中的绝大多数罢工。他在湘东北和赣西四处奔走,经常陪伴他的,是已于1921年入党并已有孕在身的开慧。他常在水口山铅锌矿、安源煤矿、新河火车站、岳州火车站以及长沙和衡阳各工厂的工人礼堂发表演说。^[24]他把自己的亲人也拉进了工人运动。除了开慧之外,帮他从事工运的,还有自1918年起就与他一起在长沙生活的小弟泽覃、二代堂妹泽建和泽覃的女友赵先桂。1921年底,在毛泽东的劝说下,正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书的泽覃和正在长沙一所女子学校念书的泽建都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3月,毛泽东派毛泽覃去水口山铅锌矿的工人俱乐部工作。同年10月,泽覃就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毛泽覃就调回长沙,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市委员会书记。毛泽建和赵先桂也在1923年入了党。次年,赵就与毛的这个弟弟毛泽覃结了婚。^[25]

连一贯清醒、有主见的二弟泽民也抵挡不住他长兄的滔滔宏论和甜言蜜语。父亲去世后,泽民独自一人挑起了韶山老家家事的全副重担。后来,他把家里所有的地都租出去了,于1921年2月离开家乡来到长沙,义无反顾地搞起政治来了。当时担任湖南一师附属小学主事的毛泽东给泽民在这个学校找了个庶务的差事,还给他安排了一间宿舍。毛泽东花了许多个长夜给泽民和他的年轻妻子王淑兰讲解政治常识。1922年秋天,毛泽民加入中共。不久之后,毛就派他到正在安源煤矿工作的李立三那里去。在那里,善于精打细算的毛泽民成为煤矿工人消费俱乐部的主任。遗憾的是,淑兰不能陪她的丈夫一起去安源,因为她在半年前生了一个女儿,这就是毛泽东的侄女毛远志。自那以后,淑兰一直没有离开过韶山。^[26]

在毛的指导下,湖南的许多共产党人都参加了劳动人民中的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会的工作。其中一些人,如易礼容、陈子博和夏曦,是新民学会的老会员;另一些人,如郭亮、朱少连和任树德,

是后来才参加到这个运动中来的。他们的努力结出了果实。在1922年和1923年上半年举行的十场大规模的罢工中，有九次罢工是以工人完全的或局部的胜利而告结束的。规模特别大的罢工是在9月份组织的武昌—长沙铁路工人大罢工、株洲—萍乡铁路工人大罢工以及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仅在安源以及连接安源与外部世界的株洲—萍乡铁路，就有17 000人响应工人俱乐部的号召同时举行了罢工！这次罢工持续了三天，最终矿务局行政部门和铁路管理部门被迫同意了工人们的要求。武昌—长沙铁路工人举行的第19次总罢工也取得了胜利。^[27]

绝大多数罢工都是经济性质的。罢工者的要求包括：实行8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他们提出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他们的生活条件之恶劣，的确不堪忍受。工人们每天工作12~13个小时，住在肮脏而简陋的屋子里，工资微薄。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无意推翻任何人的统治。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实是，他们提出的最得人心的要求之一，就是设立一个仲裁委员会，由它在当局的主持下解决劳资争议。^[28]罢工通常是相当和平的，极少导致与老板们的流血冲突。不仅湖南的罢工是这样，较为发达的上海地区的罢工也是这样。以下是一位当事人对上海药剂师和药房工人罢工事件的描述：

一天晚上，有人把一条巨大的白色横幅带到了我们这里，横幅上面写着“药剂师和药房工人宣布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我们对这件事讨论了很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见机行事，其他药房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大清早老板就派我去看看在我们这条街和其他街上的中国人开的药店是否开门了。在得知都没有开门后，我们药店的店员也决定不开门，并在门口挂上了横幅……到了上午十点钟，其他药店的罢工工人组成的庞大的游行队伍举着横幅，喊着口号走向我们药店，请求我们也加入游行队伍。我们这些学徒被分派了发送传单的工作，我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我把这些传单发给一些人，又沿墙张贴了几张。接着就赶快上了一辆电车，游行队伍走向一些尚在营业的药店，

说服所有人都进行罢工,参加游行。游行队伍中的人们一直都站在这些药店的门口,直到这些药店关上了门、药店的工人加入了游行队伍为止。游行队伍就这样到了一家又一家的药店和药房。游行队伍已经非常庞大了,而围观的人更多,街道被严重堵塞。公共租界的大批警察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开始驱赶游行。我们的罢工持续了几天。^[29]

这些胜利加强了毛对工人的影响力,他所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权威也相应增强。1922年11月5日,以这个机构为基础成立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这是一个更有代表性的工会组织,毛泽东当选为总干事。^[30]甚至连省长赵恒惕都不敢小视毛。这年12月中旬,毛泽东代表全省工团联合会与赵省长会谈,双方讨论了影响到工人利益的一系列紧迫问题,其中主要是经济问题。会谈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结果是赵被迫承认宪法赋予工人的结社权和罢工权。毛当即把会谈消息发表在《大公报》上。^[31]

有一件事是毛及其同志们想做而未能做到的,那就是往工人的头脑里灌输共产主义意识,他们在这方面的几乎所有努力都失败了。尽管毛在与省长的会谈中宣称“工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确于工人有利”^[32],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各地,包括上海在内,情况都是这样。陈独秀在给莫斯科的一份报告中承认:

大多数工人是在旧式的手工工场做工的手工工人。他们的思想完全是封建宗法式的,政治观也是消极的,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现代产业工人的数量非常少。虽说他们的政治觉悟已开始有所发展,但他们的要求仍仅限于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和结社自由。如果我们跟他们谈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往往怕得要死,躲得远远的。他们中间只有极少数人因为和我们的交情而入了党,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人就更少了。^[33]

毛和其他参与劳工运动的共产党人在给马林的报告中也谈到了

同样的情况。^[34]

毛迫切地想使劳工运动走上激进的道路，但一无所获，可他还是执着地告诉公众说：“‘殷鉴不远’^[35]，俄罗斯的资本阶级、贵族阶级就是个榜样，他们现在是已经悔之不及了！”^[36]

顽强地致力于把工人们为日常生活需要而进行的斗争与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统一起来的毛泽东，认为湖南省省长“背叛了他支持过的一切主张，特别是他凶暴地压制一切民主要求”^[37]，而全然不顾下述事实：赵恒惕容忍了他，没有阻止他发表文章，还在自己的官署里接见过他，在接见的时候甚至还说过这样的话：“社会主义在将来也许能够实现。”^[38]这种看似奇特的逻辑对一个共产党人来说，实际上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在无法依靠工会和劳工运动来反对省长的情况下，毛很自然地转而利用他已经花大力气建起来的这个省的党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中共湖南省支部是在1921年10月10日成立的。按照1911年革命后采用的新历法，这一天是民国十年十月十日。毛泽东、何胡子和其他参与建立这个组织的人们戏称：“我们这样做，也是在庆祝‘三十节’。”^[39]当选为书记的自然是毛泽东。省委的办公地点就设在他的家中。他家位于名为清水塘的郊区，离火车站不远。1922年5月底，根据中共中央局的提议，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统一领导湖南省和江西省西部的共产党员。当时这两个地方的党员总数已超过30人。还是毛当书记。^[40]他同时还领导着1922年6月中旬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41]这样一来，这一地区的地下布尔什维克运动的领导权就全部集中在他一个人的手里了。不久之后，除长沙以外，在衡阳、平江、常德的一所学校里和安源煤矿都出现了中共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支部。^[42]在所有这些组织中，这个日渐成熟的共产党领袖的“钢铁般的意志”都是显而易见的。到1922年11月的时候，湖南的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总数已达230人；相形之下，上海只有110人，广州更少，只有40人，济南有20人，东部省份安徽则只有15人。^[43]

毛手头的事情显然太多,可他还是想到俄国留学^[44],在那儿待个三四年。但他忙得不可开交,他不仅自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还得教其他人。1921年8月,他和何胡子在长沙创办了一所为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有趣的是,这所冠以“自修大学”名称的学校完全是合法的。在当地知识界的帮助下,毛还成功地从他所痛恨的赵恒惕政府那里为学校争取到了一笔经费。^[45]每月的政府拨款是400元。这所学校与毛一年半前所心仪的那个无政府主义计划没有多少相似之处。毛是这所大学的指导主任,他的弟弟泽民担任该校的庶务。为此,兄弟两人不得不放弃了各自在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职务。^[46]

中共党内局势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重要变化。1922年新年伊始,应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的邀请,一批中国政界人士访问了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参加了共产国际主办的远东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团由40多人组成。其中至少有28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或者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还有三人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另有国民党代表三人,宗教界代表两人,余者皆为无党派人士代表。^[47]中共代表中,有五人参加过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其中包括张国焘和何胡子。^[48]

这次大会给中国共产党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会议的主题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共产国际的领导人竭力要在与会代表的头脑中培育出共产党人与民族主义革命家之间的合作观念。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格列高利·季诺维也夫对此尤其热心。他直截了当地表示,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共产主义者“现在仅是一些小集团”,因此,他们“不应当洁身自好,或者藐视那些尚未成为共产主义者的罪人和小老板,而应当投身于最激烈的斗争中去,与正在中国进行抗争的几千万人民站在一起,与正在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而奋斗的人民站在一起”^[49]。本质上说,这也是列宁所发出的信号。在会议间隙,列宁会见了包括张国焘、另一名共产党员邓培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在内的一组大会代表。列宁还特别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可能性问题,并询问了张秋白和张国焘对这个问题的意见。^[50]

这样一来，中共领导人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列宁和季诺维也夫非马林之流可比，他们是领袖，是导师，是可以信赖的顾问。结果，张国焘、何叔衡和其他与会的共产党人不得不投票支持《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其内容之一，就是呼吁所有反帝的革命力量团结起来。^[51]

1922年3月回国后，张国焘向中央局汇报了他的莫斯科之行的结果：

莫斯科的大部分领导人认为，中国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和与其勾结的国内军阀及其他反动势力的革命。……这样一场中国革命应该把全中国的所有各派革命力量联合起来。总之，国民党和共产党应当合作。列宁本人着重提出了这个观点。^[52]

陈独秀显然很困惑，但这个问题无论如何必须解决。

在此背景下，1922年5月初在广州公开举行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谨慎地表达了这么一个观点：有必要支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革命斗争及为争取实现民族独立和公民自由而进行的斗争。^[53]若没有陈独秀的同意，这个观点是不可能被大会通过的。一个月之后的6月15日，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这个由他本人亲自起草的文件承认孙中山博士领导的广州政府得到了华南工人的支持，同时指出：

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阵线。^[54]

当然，陈写下上面这席话时心情并不轻松，他把共产国际所定义的民族阵线偷换成了具有更激进的色彩的民主阵线，绝非偶然。不久之后，即6月30日，他又给维经斯基写了一封信。信上说，中共“很希望”国民党能够“觉悟改造（的必要性，即与共产党人联

合并政治上使自己激进起来),能和我们携手,但希望也很少”^[55]。这番话的确是对共产国际政策的一种独特解释。毕竟,在莫斯科看来,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所提出的客观要求,不是要国民党与共产党携手前进,而是要只有195名党员的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拥有10000名党员的那个更强大的党结成反帝联盟。

尽管如此,还是出现了某些积极的变化。中共的新方针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中得到了批准。中共二大是在1922年7月16—23日于上海召开的。大会是在毛缺席的情况下举行的,虽然毛为了出席会议已经来到了上海,但他未能与会。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他“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56]。这话很蹊跷,毛至少应该记得陈独秀的地址,因为他去过陈家多次。然而,对于他的缺席,目前也没有更有说服力的解释。^[57]无计可施的他只得返回长沙,这对他来说一定是件憾事,因为这次大会很重要。与会代表们重组了党的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用它取代了中央局;创建了党的新喉舌名为《向导》的周报。他们还讨论了摆在他们面前的主要问题,即联合“民主”战线问题。在12位与会代表中,有5人参加过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的实际筹备工作。张国焘专门就共产国际组织的这次大会做了一个报告。^[58]听取了她的报告之后,大会表示同意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秘密决议和一个大会宣言。两个文件都充分论证了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建立一个党际联盟的必要性。^[59]文件使用阶级术语,把这个联合战线描述为以无产阶级与贫苦农民为一方、以民族资产阶级为另一方的“暂时联合”。根据大会宣言的说法,这个联盟将“能结合全国的力量,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北京卖国政府”^[60]。对于马林此前提出的、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大会不置一词。

有趣的是,在大会的文件中提出了关于组建所谓的民主联盟或者是争取民权运动联盟的建议^[61],这是对建立联合战线的想法的补充。建议的内容是:“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工会、农民团体、商人团体、教职员联合会、学生会、妇女参政同盟团体、律师公会、新闻记者团体等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62]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他们

自己应当成为这个民主同盟中的左翼。这一激进的“同盟”是比较奇妙的：在国民党不愿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情况下，想以这种形式促成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大会的决议发给了每一个党组织。毛泽东也收到了这份决议，并在8月中旬，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在长沙召开了湖南工学商各工团联合会的成立大会。李立三成为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北京、河北、上海和广东的各类社会组织和民主协会也结成了同盟。^[63]但是，这一举动没有得到国民党的支持。

1922年8月12日，马林志得意满地回到中国。他随身携带的两份文件，令中共党内反对他的人们哑口无言。第一份是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卡尔·拉狄克写就的一份指示，无保留地支持马林关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提议。该指示强调指出，中共应保持其在国民党内完全的独立性；它应该一直留在国民党内，直到把自己发展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治组织为止。共产国际认为，随着“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鸿沟”^[64]的加深，这样做是可能的。第二份文件是现已成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部长的维经斯基发出的直截了当的指令：“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做出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其全部工作中都必须……注意与菲利普同志保持密切联系。”^[65]如我们所知，菲利普是马林的又一个化名。

根据张国焘的回忆，马林一到上海，就通知共产党的领导人说：“共产国际已经批准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主张，认为这是为建立联合战线所必须遵循的新路线。”^[66]8月25日，他拜访了孙中山。后者当时由于陈炯明出乎意料的背叛已被再次逐出广州，因而当时也在上海。坐在孙博士舒适的办公室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这位特使向这位国民党领袖通报说，莫斯科已经建议中国共产党人与他的党联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他劝告孙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群众运动中去。^[67]被他的军事盟友陈炯明的背叛弄得茫然失措的孙准备接受马林的建议，同意改组国民党。在那些日子里他一直在思考中国革命的命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对以往所信奉的一切都感失望”。在以前的战友陈炯明刚发动政变不久、孙本人还在广州的时候，他就已“确信苏俄是中国革命的唯一的好朋友”^[68]。在会谈的最后，他再次表示，赞同共产党员加入

国民党。^[69]

马林有足够的理由感到高兴,但陈独秀并不打算轻易屈服。二大上选出来的包括张国焘、蔡和森(他于1922年初离法返国)和新创办的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的主编高君宇在内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和候补中央执委李大钊,都支持他们的委员长。僵持了一段时间以后,根据马林的提议,所有这些人于8月29日云集杭州,开了一个会。同在嘉兴举行的中共成立大会的最后阶段会议一样,这次会议也是在水上开的。与会者们租了一条游船,在随后两天的时间里,漂荡在风景如画的西湖上,吃睡都在船上。西湖位于杭州城边,为奇异瑰丽的群山所环绕,山间点缀着优美的、中世纪风格的宝塔。中国人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所赞美的,就是苏州和杭州的美丽风景。不过这一次,平静的湖面及其上摇曳着的荷花并没有给与会者们带来宁静。游船在覆盖着竹林的小岛之间缓缓地滑行,船上的会议却如暴风雨一般激烈,不乏戏剧性的冲突。与会者包括马林及其译员张太雷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从陈独秀的回忆来看,那位共产国际特使不容分辩地要求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而与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所有委员都反对马林的这个建议。最初只有张太雷支持克里姆林宫派来的这位代表,但张并不是执委会委员。马林成了孤家寡人,他提出的所有论点和论据都遭到了反对。最后,马林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性子了,为了扭转会议的风向,威胁说谁再反对,就将被开除出共产国际。他的话听起来就像最后通牒。他直截了当地提出,与会者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纪律。^[70]

陈独秀这才恍然大悟:与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们之间的平等,只是一个梦想,没有任何意义。他的党草创不久,完全依赖莫斯科;而后者的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绝对的服从。在中共成立以前,这些布尔什维克团体所需要的大部分活动经费是陈独秀从他的出版业务中筹措来的。随着中共的成立,资金变得极度匮乏起来。共产党人的经费支出不断上涨。在1921年初,他们的开销只有200元,到了这年年底,已高达18000元。^[71]中共领袖们一度试图保持自己的纯洁性,天真地以为没有共产国际的补贴他们也能生存下

来。^[72]然而，事实证明这不可能。1921年，共产国际给这个新生的党提供的经费，用当年的中国货币计算，为16 650元；同年，中共自己筹措到的经费只有1 000元。1922年，中国共产党全部活动经费都来自莫斯科。到这年年底时，他们已经从莫斯科那里拿到了15 000元。^[73]他们没有对莫斯科说“不”的底气。

他们的心情肯定不好受，西湖的美丽也不可能驱散他们心中的阴霾。在湖的西北岸上有一座岳飞的石雕像，这位南宋时期的伟大将军最后的安息地就在这里。岳飞的目光此刻正默默地注视着他们。

★ 第二章

加入国民党

孙中山同意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做出的加入国民党的决定。^[74]应陈独秀的要求，李大钊和另一位共产党活动家林伯渠开始与孙博士谈判。林与国民党领导层的渊源很深，年轻时（1922年时林已有37岁了）他就是孙中山的同盟会的成员，参加过反对君主制的革命。事后回忆这次谈判的时候，李大钊写道，他们与孙中山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具体说来，他与这位国民党领袖讨论了在政治和组织两个方面改组他的党的问题，尤其是允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曾记有一次，”李回忆道，“孙先生与我畅论其建国方略，亘数时间，先生与我等畅谈不倦，几乎忘食。不久孙先生就同意两党结盟。”^[75]这次谈判之后，1922年9月初，经孙中山批准，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和张太雷加入了他的党。^[76]

9月4日，就国民党改组问题，国民党中央机构成员和省一级机构的领导人们在上海开了一个会。共产党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两天后，孙中山任命了一个负责起草国民党党纲草案和章程草案的九人特别委员会，陈独秀名列其中。与此同时，孙开始与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进行频繁的通信。越飞是托洛茨基的私人朋友、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人物之一，他是作为苏俄外交使团的领导人于1922年8月抵达北京的。

共产国际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软化共产党员对国民党的消极态度。1922年秋，陈独秀本人被召到莫斯科，陪他一起赴俄的是感情外露的左派刘仁静。此二人参加了1922年11—12月举行的共产国

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陈、刘二人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领导人们见了面，还同他们讨论了反帝联合战线的策略问题。陈独秀和刘仁静回国后不久，中国共产党人放弃了“民主战线”的口号，转而呼吁建立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线”。

1923年元旦这一天，孙中山就国民党改组问题发表了一份声明。第二天在上海召开了一个有关党务的会议，党的纲领和章程也在这一天公之于世。这些文件对孙中山的著名的三民主义给予了新的更激进的诠释。孙现在特别强调反对帝国主义、保护劳工权益及对中国进行民主改造。^[77]与此同时，他邀请陈独秀、张太雷、林伯渠和早年也曾是同盟会会员的广东共产党人谭平山参加国民党中央和地方机构的工作。

1923年1月，孙中山和越飞在上海举行会谈，会谈的结果就是于1月26日发表的、很快就变得家喻户晓的《孙文—越飞宣言》。苏俄政府的这位代表在《宣言》中向孙保证，在争取民族复兴和彻底独立的斗争中，“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烈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双方表示他们对“中俄关系各重要事件，意见一致”；《宣言》还强调说，“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为尚缺乏必要的条件。^[78]

就在孙中山与中共和苏俄的友好关系继续升温的同时，几个效忠于孙的当地军阀的部队把背叛了孙的陈炯明的势力赶出了广州，驱逐到广东东部去了。1923年2月，孙返回广州，再次成为以南方为基地的中国政府的领袖。

所有这些风起云涌的事件毛泽东都没有参加，他一直在湖南工作，在长沙和其周边地区组织罢工和工人示威，直到1923年4月。1922年10月24日，喜事临门。杨开慧在湘雅医院生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取名岸英。这个名字是开慧带着新生儿回家后由毛泽东取的。他眉开眼笑地望着他的妻子说：“我们该给孩子取什么名字呢？”不等妻子回答，他就说：“就叫岸英好了。”^[79]开慧同意了，心中喜滋滋的。

可是，毛没有时间照顾他的儿子，党的工作占据了他的全部时间。1922年晚冬，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1923年2月7

日,到那时为止一直巧妙地把自己打扮成“劳工的朋友”的军阀吴佩孚,在汉口的郊区江岸对正在罢工的铁路工人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共有52人被杀,300多人受伤。一波白色恐怖席卷了中国的其他城市,吞噬了河南和河北两省。许多工会和工人俱乐部都遭破坏。毛不得不做出反应。在要求惩办凶手的同时,2月8日,他组织了长沙—武昌段铁路工人大罢工。于同一天在省会长沙举行的追悼会吸引了两万多工人和学生前来参加。许多城市的工会也举行了集会,安源煤矿工人还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

又过了一段日子,3月29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湘区委员会会同长沙的其他公共团体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至少有6000名示威者在长沙市的街道上参加了游行。这场示威游行是全国范围的反日运动的一部分。时值日本租借中国的旅顺港和大连港的租期届满。同几年前一样,中国公众舆论借此机会再次呼吁废除趁火打劫的“二十一条”。^[80]

毛的行动考验着那位湖南省长的忍耐力,而今他的忍耐已到了极点。1923年4月,赵恒惕效法吴佩孚,开始对工会领袖进行镇压,他还特别下达了对毛泽东的逮捕令。^[81]毛被迫逃离长沙。

事实上,早在1923年1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就已决定把毛调离长沙。陈独秀请他到上海的中央机关来工作。马林和陈独秀对毛泽东在湖南的工作都极为满意,因此,给他的调令意味着提拔而非免职。在写于1922年11月的一封信给季诺维也夫、越飞和维经斯基的信中,马林甚至称湖南的党组织是中国最好的省级党组织。^[82]陈独秀也极为赏识毛泽东的组织才能,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提到了这一点。^[83]毛现在面临的任务是把湖南的经验向全国推广。

被任命接替毛的职务的,是他在新民学会的老朋友、刚从法国回国的李维汉。李于2月的上半月从上海赶到长沙。他和毛约定,再过些日子才正式接替毛的职务,毛则先要携家眷回老家去过中国的农历新年。李维汉出生于与湘潭相邻的长沙县。接替毛领导全省各工团联合会的是郭亮,毛的旧识夏曦则承担起了对各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进行领导的任务。^[84]收拾完简单的行装之后,毛就乘船到上海去了。毛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妻子和儿子。开慧又怀孕了,已有

三个月的身孕，谁也不知道这次夫妻分离会有多长时间。新的和更大的任务在等待着毛。

一周后他到了上海，但陈独秀已不在那里。为了与孙中山建立直接联系，陈已于1923年3月去了广州。毛直奔位于闸北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闸北区是一个肮脏、烟雾弥漫且嘈杂的工人区。中央执行委员会也在准备搬家。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党的中央机关必须跟它的委员长在一起，因此也要迁到广州。6月初，毛泽东与马林一起，启程前往华南。^[85]

在那里，由于有孙中山的庇护，中共党员第一次得以公开活动。对毛来说，地下活动、秘密会议和暗号都成了过去。他现在全神贯注地紧张进行的，是与建立联合战线有关的合法工作。早在长沙的时候，由于来自中共中央执委会的电报和信件的影响，毛就已开始改变他对国民党的消极看法。实际经验对于他的态度的改变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吴佩孚对汉口铁路工人的血腥屠杀以及湖北、河南和河北的工会组织所遭到的大肆破坏使毛震惊，而赵恒惕的反动政策所致的湖南工人运动的垮台对他的影响尤其大。在这种情况下，他不由得注意到：孙中山和他的三民主义对工人运动都持同情态度。1922年1月，孙中山的广州政府对罢工中的工人和香港海员给予了大力援助。后者的罢工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得到了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东全省人民的支持，并凭借着这种支持而获得了部分的胜利。由共产党员发动起来的汉口铁路工人则得不到任何其他社会力量的支持，实际上处于孤立地位，结果失败了。

1923年4月10日，也就是在他离开长沙前数日，毛第一次公开表示了其对于反帝国主义的联盟的支持。在自修大学当天出版的刊物《新时代》上，毛写道：

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共产党暂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这是和平统一的来源，是

革命的生母，是民主独立的圣药，大家不可不知道。^[86]

不过，说句实话，他也不可能是像马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那样的热情十足的联合战线的拥护者。^[87]有一段时间，他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一事不置一词。但共产党和工人的孤立处境和工会运动面临的深刻危机，使他深感沮丧。因而，他把与国民党的结盟视为摆脱困境的出路，虽然不是最理想的出路。与马林在上海面谈时，毛泽东无法掩饰他的沮丧情绪。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这位代表的话来说，下面这个事实使毛精神消沉：在湖南全省3 000万人口中，有组织的工人不超过3万人。马林写道：毛“在劳工组织方面的事业已经完了，他很悲观，认为俄国的干涉是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建议苏俄在中国西北建立一个“军事基地”；不仅如此，毛还认为，“在中国现有国情下，封建宗法社会的旧传统太强大了，……我们没办法建立起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群众性政党，不管是共产主义政党，还是民族主义政党”^[88]。

不过，到了广州一段时间之后，毛泽东重新振作起来了。参加中共三大是其精神上的转折点。这次代表大会是于1923年6月12—20日在广州合法地举行的，具体开会地点是东郊的东山区，那是一个上流社会的住宅区，内有几个两三层楼的欧洲风格的别墅。陈独秀主持了大会，马林在会上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在这个幽静、高档的环境下，在那栋看来似乎尚未有人住过的房子里开会^[89]的40位代表，代表着全部420名党员，其中的约四分之一，即110人，还在监狱里。自二大以来，党员数已经增加了近一倍，即增加了225人。当时的中共可以说是男性占优势的党，只有19个女党员；也是个知识分子占优势的党，只有164名工人党员。在广州、上海、北京、长沙、安源、唐山、济南、杭州、汉口、北京附近的长辛店火车站和南京附近的浦口火车站以及莫斯科都有党的支部或小组在活动^[90]，其中，莫斯科支部是由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中国学生组成的，这是共产国际于1921年创办的一所特殊学校，其校名的俄语缩写是KYTB。在所有上述基层组织中，毛所建立的组织是最活跃的，如我们所知，规模也是最大的：它囊括了党员总数的半数以

上。因此之故，陈独秀在他的大会报告中单把湖南党组织挑出来加以称赞，也就不是什么令人惊奇的事情了。报告中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91]

在联合战线的策略和形式问题上，大会上的争论特别激烈。毛也不得不深入钻研这个问题的种种细节。起初他觉得很难确定自己的立场。在湖南，国民党员比共产党员少得多，也没有人从事联合战线工作。一般说来，在中国，在共产党活跃的大部分地方，国民党的影响都是微乎其微的。事实上，孙中山的这个党，基地在广州，在上海有一个相对说来比较大的组织，至于其他地区，国民党员的数量几乎是屈指可数。参加大会的几个普通代表说，孙中山是一门“大炮”，只会唱高调，别的什么都做不了。^[92]他们质疑道，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非要每个人都加入国民党不可？在国民党的支部数量屈指可数的情况下，他们该加入国民党的哪个组织？如果让共产党员自己把国民党的组织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然后再加入进去，这种做法将是愚不可及的。

像张国焘和蔡和森这样的党内重量级人物，虽然总的来说已不再反对加入国民党的策略，但根据蔡和森后来的回忆，他们不想“在这个方向上走得太远”^[93]。与这一派意见针锋相对的是马林，支持马林的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和其他一些顺从莫斯科的代表。他们认为：“批评国民党的某些封建性质的做法”是有必要的，但与此同时，他们应该把这个党“推动到、引导到革命宣传的道路上来，并在其内部形成由工农组成的左翼”；为达此目的，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国民党组织”^[94]。马林和陈独秀提出了一个口号：“一切工作归国民党！”^[95]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支持张国焘和蔡和森。^[96]他毕竟是蔡的多年好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受蔡的影响。后面这个事实对读者也不是什么秘密。另外，在大会开始的时候，对于在中国发展群众性政党和工人运动的前景，他还抱着悲观态度。但与此同时，他的立场的不妥协性也没有张蔡二人那么强烈。显然，他的心态暂时还是矛盾的。他发自内心地认为，“中共不应只看见局处广州一隅的国民党”^[97]，但是在讨论《关于国民问题与国民党的议决案》的时候，

他没有再说类似的话,反而表示:“小资产阶级控制了国民党。我相信目前小资产阶级能够领导。这就是我们加入国民党的原因。……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农民和小商人是国民党的优质材料。”^[98]可另一方面,在对陈独秀提出的这项决议草案进行记名表决的关键时刻,他又投了反对票。这项决议草案指出,共产党员有义务在全国范围内帮助国民党扩大其组织。表决结果是:21票赞成,17票反对,决议通过了。毛马上“宣布,他接受多数人的决定”^[99]。

尽管这个决议还强调指出,“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且承认只有国民党能够承担这个角色,至于中共,决议宣称,它在近期内不可能转变为群众性组织,因为“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100],可毛最终还是接受了。

毛最终收回了他的反对意见的事实并没有被人忘记。显然是在马林和陈独秀的提议下,毛泽东第一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这次大会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由九名正式委员和五名候补委员组成。在选举中执委的表决中,毛泽东获得了34票。只有三个人的得票数超过了他:陈独秀以全票当选,获得40票,蔡和森和李大钊都获得了37票。^[101]毛还进入了拥有更大权力、只有五个成员的中央局,这是一个以陈独秀为首的、类似政治局的机构。中央局的其他三位成员中,两个是他的老朋友罗章龙和蔡和森,另一位是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人谭平山。^[102]毛还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秘书和组织部主任,这才是最重要的。在组织部主任这个职务上,被他取代的,是张国焘。由于尖锐地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张国焘未能再次选入中执委。

毛泽东成为与他的老师平起平坐的人物,这在他的生平中还是第一次。现在的他不仅是一位记者,还是全国一级的共产党官员。作为一位“具有毋庸置疑的才干的工作者”,他在莫斯科也出了名。苏联驻上海的一名特工、化名为弗拉基米尔的所罗门·拉扎热维奇·维尔德,在其给维经斯基的一封信里,就是这样称呼毛的。^[103]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也第一次认真地思考了农民问题。这对当时的他来说还是一个全新的问题,但后来竟成为与他的名字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问题。当然,他是基于亲身经历而非道听

途说了解到农村的贫困生活的。但直到那时为止，他尚未真正从事过组织农民的工作。在湖南，在他的领导下，只发生过两次试图把无地农民组织起来反抗大地主的事件，都没有成功。在1924年1月谈起这件事的时候，毛泽东有过这样的解释：

在这些地方，我们最初倒是把不识字的农民发动起来了，然后带领他们去斗那些更富的农民。结果怎么样？我们建立的组织很快就解体了，要么就是被查封了。所有这些农民，不仅意识不到我们是在为他们的利益而战，还恨我们。他们说，如果我们当初没有把他们发动起来，灾难和不幸也就不会降临到他们头上。^[104]

尽管如此，他和谭平山还是成了负责起草农民问题议决案的委员会的成员。他还参加了关于党对农民的政策问题的讨论。与其他许多代表不同并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毛显示出了对这个问题的敏锐的理解力。他在发言中指出：

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105]

说实在的，当时没有人重视这些颇具预见力的话。大会代表批准的农民问题决议案语义含混且自命不凡。决议宣称：“我党第三次大会决议，认为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牵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106]

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代表大会的一项指示是5月24日从莫斯科发出的，但直到7月18日才被大会收到。该项指示明确指出：“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及组建反帝战线的同时，必须进行农民反对封建残余的土地革命。只有这样革命才能成功。……政治上的核心问题就

是农民问题。”^[107]这个指示是俄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尼古拉·布哈林的杰作，当时的他正在积极参与共产国际的工作。^[108]在当时的环境下，这只是一纸空文，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将其付诸实际的政治工作中。毛在三大上关于农民问题的讲话在当时也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插曲。

实际上，当时唯一已经开始发动农民的共产党人是广东人彭湃，此人早在1922年就开始冒着个人风险干起来了。他的朋友们对此的看法是：“这完全是白费功夫。农民是一盘散沙，没有能力组织起来；因为无知，他们对宣传也无动于衷。”^[109]对这些非议，彭湃不为所动，成功地在广东东部的海丰和陆丰地区组织起了几个农民协会；但在它们于1923年发起减租运动的时候，这场农民运动就被陈炯明镇压下去了。^[110]

由于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失败的影响，三大之后，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共产党员，都被在国民党内进行工作的想法吸引过去了。中共中央执委会甚至拟订了一个把国民党组织扩大到华北和华中的所有重要地点的计划。^[111]用维经斯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以前的同事、俄罗斯电讯社的记者所罗门·斯莱帕克的话来说，“人人都想挤上孙中山的这辆车，别的一概不问”。斯莱帕克愤愤不平地报告说，其结果，“由于国民党内猖獗的派系活动的结果，（共产党自己的）工作实际上陷于停顿”^[112]。

旨在创建联合战线的组织工作所带来的过分乐观的情绪，显然也俘获了毛泽东。三大尚未结束，他就开始在会议间隙与李大钊和张太雷商讨与赵恒惕的死敌、前湖南省省长谭延闿结盟的可能性问题。^[113]谭当时住在一幢奢华的三层小楼里，从那里到三大会场，步行只要两分钟。他是国民党员，与孙中山的关系良好，因此与他结盟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大会一结束，毛就加入了国民党。^[114]对于派孙中山的战友覃振去湖南建立国民党组织的计划，毛也予以了热情支持。他托覃振给李维汉带去一份指示，要中共湘区委员会给孙博士的这位使者以全力支持。^[115]

在中国建立反帝国主义的战线的问题上，苏联的布尔什维克们也给予了同样积极的帮助。应孙中山的要求，莫斯科于1923年3月

决定，提供200万金卢布的财政援助，以“帮助中国的统一和民族独立”。1923年5月1日，越飞向孙中山通报了这一决定，同时强调，苏联方面要求中国南方政府的这位元首“对我们提供的一切援助予以最严格的保密”^[116]。1923年6月，由五人组成的第一批军事顾问离开苏联，前往广州。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与孙中山合作，创建一支听命于孙本人的国民党军队。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的观点来看，这应该是一支“新的”、真正的“人民”军队，这支军队应该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友好精神捍卫民国”。他们呼吁孙中山根据以上原则建军。^[117]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高级顾问、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

7月31日，根据斯大林的提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派米哈伊尔·鲍罗廷前往中国，任孙中山的政治顾问。鲍罗廷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当时还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主要成员。^[118]他被赋予双重身份：既是“国民党的高级顾问”，又将接替马林，成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派驻中共中央执委会的新代表。马林是怀着失望的情绪离开中国的：他未能同中国同志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他感到自己受到了误解。在向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拉狄克进行报告的时候，他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得太早了，确切地说，是人为地、过早地成立的”^[119]。

但是，鲍罗廷却持另外一种看法。

诚然，在被派往中国之前，鲍罗廷只做过一回有关东方问题的的工作：在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他把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一文翻译成了英语。^[120]但是，这一缺憾既没有使他也并没有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的其他人感到不快。8月2日，他同苏联驻北京政府全权代表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加拉罕一起到了中国。

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生于1884年，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他跟列宁很熟，在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参加过里加的街垒战，也出席了1906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会后，他携全家流亡国外，先是在英国，后来

到美国,直到1918年才回国。侨居海外的这段经历使得鲍罗廷身上有点马林的影子,给人的印象就像一个西方人。鲍罗廷的两个儿子都生在美国,不会讲俄语。“高个子,仪态威严,脑袋像狮子一样”,这就是孙中山的妻妹宋美龄对因举手投足毫无瑕疵而引人注目的鲍罗廷的第一印象。他有“一团梳理整齐的、长而密的、略显波浪形的、咖啡色的并一直垂到颈部的头发”。她回忆道:

他蓄着一撮虽然浓密但并不因此而显得夸张的胡子,当时的法国将军大都喜欢黏这种胡子,说着一口带有美国中部口音且一点俄语味道都没有的英语,说话时声音既洪亮又低沉,发音清晰,不疾不缓,像个男中音。在强调他正在阐述的某个观点的重要性的时候,他就会把声音放得更低沉,更缓慢,像个男低音。这是一个能给人以控制一切的印象并使人产生强烈好感的人。^[121]

熟悉鲍罗廷的美国共产党人查尔斯·西普曼也曾提到过他的“魅力”,强调在这个“高大的男人”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高贵、权威、才智和教养”^[122]。谢尔盖·达林对鲍罗廷的第一印象就是“仪表堂堂”。这位共产国际特务对他的回忆是:“高个子,有一张轮廓突出的脸,为人矜持但又善于交际,性格率直,眼神活泼,爱说笑话。”不仅如此,“有他做伴是一种享受。他说话不多,更愿意倾听而不是表达;在向别人表达自己的观点及对外部事件的反应时言简意赅”^[123]。

与菲利普(马林)同志不同的是,鲍罗廷对中国共产党人有更大的耐心。根据张国焘的回忆,“他和马林不属同一类人”^[124]。

鲍罗廷真正的姓是格鲁岑贝格,但已有好久没有人这样叫他了。同在共产国际工作的所有人一样,在为党工作的多年里他多次改名换姓。他用过的姓名包括:瓦纽辛、基里尔、亚历山大·古姆贝格、迈克尔·伯格、乔治·布朗、彼得·亚历山德雷斯库、尼基弗洛夫、雅科夫、安格里恰宁和班克尔。中国人一般称他“鲍罗廷”或“鲍顾问”。

8月16日，孙中山派出了一个特别代表团赴苏访问。他挑选的代表团团长，是蒋介石。蒋是他所信任的人，是一位精力充沛的将军，也是自同盟会时期起就参加了共和革命的老党员。为这个国民党代表团的俄国之行做准备工作的马林甚至把蒋说成是“最受孙信赖的助手”^[125]。除蒋之外，代表团成员还包括另一个国民党员和两个共产党员，其中一个就是张太雷。9月2日，代表团抵达莫斯科。11月29日，代表团启程回国。在这三个月里，他们逐渐了解了包括俄共中央委员会在内的苏联的政党组织结构，研究了各级苏维埃的运作，访问了多个军事机构，会见了包括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契切林在内的多个领袖人物。^[126]蒋将军时年36岁，年轻英俊，兼之受过良好的教育，因而给莫斯科的领袖们留下了非常积极的印象。当时的他持有左派观点，还竭力显示他对布尔什维克们的“亲密感”^[127]。显然意识到俄国当局会秘密审查他寄出的每一封信，因此蒋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有意提到他正在利用业务时间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说：“我觉得这本书的前半部分非常艰涩难懂，但后半部分不仅思想深刻而且引人入胜。”在另一封信里，他热情洋溢地写道：“我喜欢与托洛茨基先生谈话。他拥有一个革命家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即毅力和活力。”读了这些信之后，共产国际的官员们毫不掩饰地向这位将军示意，他们希望他加入共产党。蒋原则上不反对这样做，但回答说，在加入中共以前，他必须事先征得孙中山的同意。^[128]蒋当然无意加入共产党，但那时的他确实是一个左派。

应蒋的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于1923年11月起草了一份关于中国的国民革命问题和国民党问题的新的决议案，这份草案综合了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所有新的解释。共产国际据此给了国民党一个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所要求的合乎逻辑的纲领。纲领的关键内容是要要求进行激进的土地革命及对工业实行国有化。^[129]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了这个决议，随即将决议文本传给了蒋介石，蒋又将其呈给孙中山。孙接受了共产国际提出的几乎所有建议，至少在形式上接受了，只对关于土地问题的建议持有异议。根据孙的授意，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

代表大会通过的《大会宣言》的第二部分，就是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这个议案为基础的。

鲍罗廷和苏联政府派驻北京政府的公使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加拉罕于1923年8月底抵达中国。加拉罕留在了北京，鲍罗廷继续前行，途经上海，于10月初到达广州。继他之后，其他苏联政治顾问和军事顾问陆续来华，为中国的南方政府效力。^[130]在与他们的会谈中，孙中山对苏俄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军事建设方面的经验及俄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鲍罗廷给他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作为这些会谈和这一印象的结果，1923年11月，孙中山发表了《国民党改组宣言》和新的党纲草案。12月1日，在广州召开的一个会议上，孙就国民党改组问题做了一次演讲。演讲中，他把国民党改组的目标定义为：创建一个不仅依靠军事力量，而且依靠人民支持的群众性政党。他还说：

现在一位好朋友鲍君，是从俄国来的。俄国革命之发动，迟我国六年，而俄国经一度之革命，即能贯彻他们之主义，且自革命以后，革命政府日趋巩固。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故能成功。故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131]

孙中山发表这次演说的时候，毛已不在广州了。应陈独秀的要求，他已于7月底返回上海。他与他的朋友蔡和森、罗章龙和向警予一起住在市区北部的闸北区香山路附近的一个小弄堂里。这条路的名字与这个肮脏的工人社区的现实一点也不相称：那里的空气中没有一丝芳香的气味。9月初，中央执行委员会再次从广州迁回上海。尽管与国民党的合作正在加强，陈独秀还是希望在他与孙中山之间保持一定距离。^[132]他显然不希望把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变成“国民党的奴仆”^[133]。中执委的办公地点也就是毛、蔡、罗、向诸人的住宅。

这座院子由三所房子组成，可以安置大约十个人住。为了掩人耳目，他们装作是一家人，向警予是一家之主；同时伪装成一个帮助中国商人填写报关单的事务所。^[134]

同在广州的时候一样，毛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联合战线工作上去了。他写道：

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国民历史上的使命。……现在是要团结全国国民实行做革命运动，……为推翻共同的敌人取得共同的利益而团结而奋斗，是最必要的。……大家要相信只有国民革命是拯救自己和国家唯一的道路。^[135]

9月中旬，毛泽东回到长沙以帮助建立国民党的分支机构。^[136]那时，孙中山的特使覃振到湖南已有两个半月了，但长沙市的有关工作毫无起色。湖南的共产党人蓄意破坏在本省建立国民党组织的人为努力。即使对毛来说，要克服他的这些老同志的抵触情绪，也非易事。困难之一在于，他缺乏开展组织工作的资源，他“每月至少需要100元钱”^[137]。这年夏天在赵恒惕和谭延闿之间爆发的新一轮战争使总的政治局势有所恶化，这也不利于这个省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9月，吴佩孚将军出兵支持赵，他的干预使局势更加糟糕。毛自然是同情谭的，但谭输掉了这场战争。这个省再次陷入恐怖的深渊。赵恒惕颁布了戒严令，查封了自修大学，解散了全省工团联合会。他还亲自下令通缉毛泽东、郭亮、夏曦等工运领袖。^[138]转入地下工作的毛泽东不得不使用了一个化名：毛石山。^[139]实际上，这不是一个真正的化名，而是他少儿时代用过的名字“石三伢子”的某种改头换面。毛在那时唯一的快乐来自他的家庭生活。岸英是一个健康的、一天天在长大的男孩；11月13日，开慧又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他们给他取名“岸青”，意思是“到达社会主义彼岸的青年”^[140]。

1923年11月，当毛还在长沙的时候，中共中央执委会在上海

开了一次全会。当时的党内形势正变得越来越紧张。在华北和华中所有重要地区建立国民党组织的计划失败了，只在北京一地建立了国民党的地方组织。中共党员数量减少了四分之三，只剩下大约100人。陈独秀本人承认，党正经历着一场危机。在这次会议上，他以中央的名义指出了如下原因：（1）因同志中对于决议案有多少疑虑；（2）因国民党本部办事不敏决；（3）因同志们和国民党党员间的猜疑及政治观念不同；（4）因本党经济困难。^[141]

全会谴责了对于联合战线政策的“左倾的曲解”，通过了一个关于共产党员实际参与国民党改组的决议案。全会通过的另一个名为“国民运动进行计划”的决议案强调指出：“国民党有组织之地方，如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处，同志们一并加入；国民党无组织之地方，最重要的如哈尔滨、奉天（沈阳）、北京、天津、南京、安徽、湖北、湖南、浙江、福建等处，同志们为之创设。”^[142] 决议也指出了“改善国民党政治立场”的必要性：“促使国民党做反帝国主义的宣传及行动。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在中国国民运动中，比反军阀运动更为切要，在军阀与帝国主义者有冲突时，吾人援助军阀以抗外人，断不可借外力以倒军阀。”与此同时，全会要求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在联合战线内部建立他们自己的秘密组织，这些秘密组织成员在他们的一切政治言论和政治行动上，有义务接受中共的领导；共产党员的任务是，“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但同时又强调说：“如果缺乏实现这一路线的现实可能，那么无论如何都不应使用武力。”^[143]

在此之后，改组国民党的努力取得了进展，虽说在这一过程中有点不和谐的噪音。孙中山计划在1924年1月下旬召开国民党的统一代表大会。12月25日，中共中央执委会发出有书记陈独秀和秘书罗章龙（由于毛泽东去了湖南，秘书一职由罗接任）签名的第13号通告，通告再次要求各地的所有共产党员都必须加入国民党，并尽最大的努力致力于改组这个党。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强调：“吾党在此次国民党全国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当选一人，望各区会与地方会预商当选之同志，此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明晰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144] 为实施这些方针，

中共中央的主要官员分头到各地帮助工作：陈独秀到了北京、宝鸡、天津和济南，林伯渠到了广州，而到湖南对毛泽东进行帮助的，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特使李大钊。^[145]

到那时为止，由于毛泽东的努力，国民党组织终于在湖南建起来了。总计有三个地方支部。第一个是长沙支部，是在1923年10月初建起来的。另外两个支部，一个在宁乡，一个在安源，是在同年秋末建立的。^[146]到12月底的时候，湖南的国民党员总数已达500人，但其中最活跃最能干的大都是共产党员。在省执行委员会中共产党员也占了压倒性多数：九个委员中七个是共产党员。^[147]因此，这年年底，毛被湖南省国民党组织推举为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之一绝非偶然。

他不得不再次抛妻别子。12月末他再次来到码头。同以前一样，与妻子的告别使他心碎。但这一次他的心情尤其悲伤：临走前一天他和开慧之间发生了一点不愉快，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人知道。

他登上开往上海的轮船，凝视着渐渐远离的长沙，双唇喃喃自语，吟诵道：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
 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
 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
 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
 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148]崩绝壁，又恰象台风扫寰宇。
 重比翼，和云翥。^[149]

★ 第三章

希望与失望

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早期和中期，处在国民党的开明统治下的广州同上海一样令人目眩神驰，但风格截然不同。“在南方，……气氛不同，”谢尔盖·达林写道，“工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都能合法活动。”^[150]空气中都带有一股革命的气味。会议、集会和示威一个接着一个。“政治生活异常活跃，”维什尼涅科娃-阿基莫娃回忆说，“所有公共场所的墙上和柱子上都贴满了政治布告和传单，在路人的头顶上是悬挂在牢牢的旗杆上的各类旗帜，用各种材料制成的横幅横贯在大街上空，上面写满了口号。”^[151]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期间，高涨的革命热情尤其引人瞩目。“代表大会是改组国民党的第一步，大会的筹备工作因而既打乱了孙中山的这个党的权力结构，又唤醒了其蛰伏多年的权力意识。”广州政府的军事顾问亚历山大·切雷帕诺夫这样评论道。^[152]张国焘的回忆印证了同样的历史记忆：“人们忙于大会的准备工作，宴会比平时更多了。那情景，就像一个大家族忙着准备过大节一样。”^[153]这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似乎迎来了它的新生。



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在广东，1924年春天。

广州位于宽阔而江水略呈红色的珠江左岸，江水是被夹带的淤

泥染红的。它处在香港的上游，距香港只有 90 英里。广州被当之无愧地视为华南的首府。它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到处是一片繁忙景象。沸腾的生活就展现在它的弯弯曲曲的商业街道旁、喧闹的市场里和冒烟的港口上。与上海不同的是，它几乎没有现代工业。只有十几家小型的丝织厂和为数众多的原始的手工作坊，后者生产的产品种类繁多，从用珍珠母制成的装饰品到漆器雕像，可谓应有尽有。

这个城市始建于公元前 214 年，当时它的名称叫“番禺”，这是个无法翻译的纯粹的地名。它发展迅速，在一百年后就被授予相当于今天的省会城市的地位，成为幅员辽阔的“交”地的中心。公元 226 年，“交”改名为“广州”，意思是“广大的地方”。从公元 7 世纪开始，它又被称为“广南东路”，意思是“广阔的南方的东边的路”。但“广州”这个名称并没有消失，当地居民用这个词来非正式地称呼番禺城。14 世纪时，这个省的名称被简化为“广东”，意思是“广阔的东方”，并以此区别于“广西”（“广阔的西方”）。1918 年，番禺被正式改名为广州。18 世纪时，法国旅行家称这个城市为 Canton，这个词是他们对华南方言中“广东”这个省名的音译。这个词流行开来以后，就成了所有外国人对广州这座城市的称呼，虽然广州的外国人比上海少得多。自 1842 年以来，广州始终只有一个外国租界，此即英法联合租界。它占据了白鹅湾上小小的沙面岛的全部面积。白鹅湾位于广州西南部，是珠江干流开始一分为二的地方。租界所在的这个岛与广州主城区之间，只隔着三到四米宽的江面。这个地区至今仍以其优雅的西式建筑、呈对称状分布的街道和广场以及将它们置于浓密的绿荫之下的花园和公园而显得与众不同。当时的租界就是一个小天堂，与中国人居住的、暴露在烈日下的、纷繁多样和拥挤不堪的另一个广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当时的一个观察家曾这样写道：

广州像一个巨大的、充满了活力和流动性的，甚至在深夜也不会关闭的市场。像所有亘古以来就一直存在的中国城市一样，广州的街道也很窄，只有两三尺宽。英文标识极其罕见，

使得外国人晕头转向。……街上的喧闹声永不停息，中国音乐随处可闻。在沿着码头砌筑的广州的主要大街上，飞舞着众多苕胥*。^[154]

* 苕胥是蝴蝶的一种。——译者注

20年代初的广州人口不下50万，其中至少20万人以船为家。这些船被称为“舢板”，舢板的字面意思就是“三块木板”。珠江岸边随时可见排成三四行的数以百计的舢板。一个目击者回忆道：

它们的弓形船顶一个挨着一个紧贴在一起。它们看上去既破败又肮脏，样子也令人生厌。一户户人家就住在里面。孩子们探出他们瘦小的脑袋，朝我们的方向好奇地望着。有的孩子腿上系着绳子，绳子的另一端拴死在船上；有的孩子在后背上系着独特的救生装置：一块干燥的木头。腿上拴着环的鸡不停地啄食。操着浓厚的华南口音的船民们的吆喝声既洪亮又刺耳，一个赛过一个。^[155]

当然不能说，广州完全没有欧洲文明，至少广州是和沙面紧挨着的。但这座城市完全不同于上海。不错，这座城市中有一些宽阔的街道，可以行驶汽车，一些地方使用了电灯，在一些水岸上有一些漂亮的现代建筑。甚至有两座“摩天大楼”：一座六层楼高的商场和一座九层楼高的商场。但是这座中国南方的大都市不具备西方文明的某些起码的要素。总的来说，它仍然是一个纯粹的中国城市，但与古板的、具有文化气息的北京不同。这座城市像其他华南城市一样，是多姿多彩、热闹而喧嚣的。

1924年1月中旬，毛第二次来到这里。作为出席国民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这一次他没有去东山，而是直奔市中心的文明路，这个重要会议的会场就在那里。会议定于1月20日开幕，所以毛还有几天观光的时间。如今展现在他眼前的广州与他在去年夏天住过的温馨安逸的东山小区截然不同。广州的市中心完全是另一番景观。与宽阔的、有着良好的照明设施的文明路平行的几条街道既狭窄又肮脏，挤满了乞丐、苦力和小商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安

身之处。每逢深夜，城市安静下来以后，这些人就在人行道上铺开席子，躺倒睡觉。有些人睡在各种各样的箱子里，还有一些人睡在门廊里。谢尔盖·达林回忆道：

有时是一个人睡，有时是全家人睡在一起。这些工人既没有地上的立足之地，也没有船可住。白天的时候，他们从事着长时间的、辛苦的劳作，从流动的食品摊上买吃的；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就睡在人行道上。他们的前胸凹陷，后背瘦骨嶙峋，两条胳膊却很结实。一张席子和一包当作毯子用的破布，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156]

在华南的其他城市，包括长沙在内，如此赤贫的人也不在少数。即使他们知道这次国民党代表大会的消息，也很难想象，他们中间会有人真的指望这次大会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变化。公共舆论中无处不在的革命气氛，在这座城市的贫民窟里是一点也感觉不到的。

漫步在大街上的毛泽东，当然不可能不注意到这幅悲惨的景象。一种信念油然而生：“在中国不可能有资产阶级革命。所有反对外国统治的运动都是由那些吃不饱饭的人来进行的，而非依靠资产阶级。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157]早在中共三大期间，他就表述过这个观点，但并没有作为重点强调。自那以后，他从未放弃过这个观点。不错，他支持与国民党的联盟，但他也理解这种联盟的局限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他有时也确实被与民族主义者的合作的顺利发展冲昏了头，但怀疑和失望的情绪总是与之交错出现。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救中国的坚定信念从来没有离开过他。

他到广州的时候，广东、江西、湖南和湖北四省共有国民党员约 11 000 人。其他地方的党员数量当时还没有统计。广州的国民党组织规模最大，拥有党员 8 218 人。江西省的党组织拥有 2 000 多个党员，其中大部分住在上海。湖北省的党员有 500 左右，湖南省的党员也有 500 左右，汉口市的党员有 300 多人。^[158]与此同时，中共加入国民党人员只有 100 人多一点。换句话说，即使我们假设在国

国民党统一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大多数中共党员都已加入了国民党(事实并非如此),与国民党比起来,共产党依然更像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小的地方支部,其人数,不及孙中山领导的那个党的百分之一。

尽管如此,在1月20—30日举行的大会期间,共产党员在会场内外都非常活跃。在198名大会代表中,实际到会的只有165人。后者中有23人是共产党员,占与会代表的近14%。在这些共产党代表中,陈独秀并非唯一的佼佼者。像李立三、林伯渠、李维汉和夏曦这些著名的共产党人,在大会上都很活跃、主动。即使是持左派观点的张国焘,由于共产国际的影响,也已重新考虑了自己的宗派主义观点,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因而也在大会过程中起了积极作用。而最积极的共产党人,当数李大钊、谭平山和毛泽东这三个人。就我们目前所知道的而言,在大会的所有论坛和机构中都有来自共产党的代表。^[159]

总的说来,从大会主席团和各个委员会的构成来看,右派和左派(包括共产党人)的力量对比大体平衡。国民党党员是否可以身兼共产党党员的问题,是经过了激烈的斗争才解决的。在大会开幕的当天举行的欢迎与会代表们的宴会上,国民党右派成员茅祖权宣称:“如果共产党人接受我党纲领,他们就应该退出他们自己的党。”在章程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右派代表何世楨提议,应禁止国民党党员同时拥有其他政党的党籍。但在多数代表的压力下,他被迫撤回了这个提案。最后,在1月28日的会议上,在党章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反共集团中最活跃分子方瑞麟和冯自由在发言中提议,党的章程中应包括以下条文:禁止他党党员加入国民党。李大钊当即做了回应,说了下面这番显然是言不由衷的话:

若想完成此国民革命的事业,非有一个统一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不可。……我们环顾国中,……只有国民党可以造成一个伟大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能负解放民族、恢复民权、奠定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投入本党来。……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不但自己愿来加入本党,并愿全国国民一起加入本党。……我们

加入本党是来接受本党的政纲，不是强本党接受共产党的党纲。试看本党新定的政纲，丝毫没有共产主义在内。^[160]

在做出上述表白的同时，李大钊也不避讳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联合战线内部，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将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而采取行动。但是，在这位能言善辩的演说家的口中，只要共产党能够成为联系孙中山的党与世界革命运动的一个纽带，它的这种独立性对国民党来说就是一件好事。一位天津代表与李大钊争论起来。但总的说来，右派处于少数。^[161]许多代表发言反驳右派，发言者中包括像廖仲恺、汪精卫和胡汉民这样的左派领袖兼孙中山的老战友。廖仲恺的态度尤其鲜明：“只有与其他革命党联合起来，我们才能胜利地完成革命。理解这一真理的时候已经到了。”^[162]

孙中山的态度举足轻重。大会期间，他真诚地实施了重建国民党的政策。当时的他正试图利用苏俄和俄共的经验来重建他的党，因此，他在发言中表示，赞同接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163]由此产生的影响是，绝大多数代表在表决中，都支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只附加了一个条件：他们必须遵守党内纪律。10名共产党员被选入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共有41名委员，其中委员24人，候补委员17人。

李大钊、谭平山，以及另一位共产党员、代表北京国民党支部的于树德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正式委员。谭甚至成为常务委员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摄于1927或1928年）。

会的委员。常务委员会是国民党的最高机构，相当于政治局。他同时还成为中执委下辖的最重要的机构之一——组织部的领导人。毛和其他六位共产党员当选为中执委候补委员。在这些来自共产党的、没有投票权的中执委候补成员中，除了毛之外，还有林伯渠、张国焘和瞿秋白。前两人我们已经熟识了，瞿秋白是一位虽然年轻但异常活跃的新闻工作者。这位身体虚弱的、孩子气的、戴着一副圆眼镜的男人，一个举止文雅的典型的知识分子，注定了要在20年代末期的中共党内扮演领导角色。他将肩负着把中共从其最深重的危机中拯救出来的重任，这

个危机是莫斯科在联合战线问题上将要采取的错误政策所引起的。而在此刻,在国民党一大期间,这位24岁的年轻人只不过刚刚开始赢得中国舆论界的尊重。他的成功极大地得益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成员们对他的高度信任。作为发行量很大的北京《晨报》的记者,瞿曾在莫斯科工作了两年多,时间是从1921年1月到1923年春。作为一名记者,他甚至全程报道了1921年6—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的官员们注意到了这位聪明、年轻、熟悉俄语、崇拜高尔基和托尔斯泰的中国人,称他为“斯特拉霍夫”。汉语中的“瞿”和俄语中的“斯特拉霍”意思一样,都是“恐惧”的意思。1922年春,他在莫斯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天,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他承担了协助出席大会的中共代表陈独秀和刘仁静进行工作的任务。这位中共领袖由此对他产生了好感。于是,在1923年春天回国后不久,瞿就被推选为出席中共三大的代表。会后,他被任命为《新青年》的主编和新创办的党的刊物《前锋》的主编。1923年夏天,他还和张太雷一起,成为马林的秘书。^[164]米哈伊尔·鲍罗廷于1923年8月底来到中国后,瞿成为他的翻译和助手之一。^[165]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联合战线。大会发表了一个内容全新的《宣言》。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共产党员,对这些成果极为满意。在联合线性的成功发展的鼓舞下,毛憋足了劲要大干一场。鲍罗廷也一样,他抛掉了所有的疑虑,以不下于马林的坚定性向他的中国同志们“解释”说:“创建国民党组织,而且多多益善,是共产党员的首要任务。”^[166]

苏联对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多的资金援助,强化了对鲍罗廷的指示的认同度。在西湖会议上屈服于克里姆林宫的压力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很快地就使自己适应了新的形势。作为既存事实,他们接受了与莫斯科的不平等关系。在自己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司令部的关系的财政方面,他们现在已非常主动。马林给他们上的犬儒主义课程,并没有白上。如果说,陈独秀在1922年6月底给维经斯基的信中还得为中共对共产国际的依赖找借口,同时表白说希望“明年

（一九二三）中国共产党能够自行筹款”^[167]的话，那么，西湖会议之后，在开口向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官员们要求更多的资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不再感到难为情了。在这种变化的背后，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根据马林提供的数据，最多只有十分之一的中共党员能交党费，与此同时，很多党员都只有一份工作，即为党工作。而开展革命工作需要大量资金。^[168]

“我们已经根据你们的指示开展反帝工作，”在1924年11月初写给苏联驻北京政府的大使列夫·加拉罕的一封信中，陈独秀写道，“可是我们还没有收到您答应提供的必要的费用。我们上海现有费用600元。请尽快告诉我们。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T. S. Chen。”^[169]

李大钊在致加拉罕的下面这封英文信中提出了类似的要求：

亲爱的同志：

卡尔干（张家口）地方党委要求北方区委支付田滕修、马洁亮和傅恩祖三同志的月生活费，他们在包头为《新民报》工作。北方区委认为，这三个同志乃受中共北方区委的派遣做军事工作，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们的费用都是由贵方支持的。所以，请做出安排并且对此要求给予回答。

致同志式的问候！

中共北方区委书记 T. C. Li.

下面这封信还是关于同一话题的：

拉丁同志（共产党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赵世炎）离开这里到天津之前，曾经请我（李大钊）问询你对天津工作的财政支持一事有什么回答。（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认为）一个月的费用是1500元。前天我听同志们说你给我发了一封信，可我没有收到，因我不在这里。也许你在那封信里已经回答了。亲爱的同志，请给我打电话或写信或通过罗欣同志（当时正在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员格奥尔基·兰姆勃

列夫)告诉我,因为拉丁希望尽快得到你的回答。

致同志式的敬礼!

T. C. Li.

再看一个例子:

亲爱的加拉罕同志:

马伦先生离开之前,我和罗欣同志商定由普罗梅女士接替他的工作,为此要付给她工资。发电报的一直是她,而不是马伦。她想知道她每个月为发报工作能得到多少工资。请把这一切立即(通过罗欣同志)告诉我,因为她想今天晚上就得到答复。

致同志式的敬礼!

您的 T. C. Li. [170]

这种依附关系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截至30年代中期,只有依靠克里姆林宫提供的每月高达3万美元的经费^[171],中国共产党才得以开展工作。苏联的资金支持不仅范围广泛,无所不包,而且精打细算,每一分钱的用途都必须交代得清清楚楚。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外交官甚至还支付了党的各级组织的办公费用及相关工作人员的工资。

在这方面,共青团^[172]与共产党处境相同。共青团的书记是任弼时,此人在20年代初曾在俄国留学。1926年2月,任弼时在致苏联大使加拉罕的一封信中写道:

为了开展工作,(团组织)需要适当的经费支持,眼下我们还没有收到青年共产国际从1925年11月至今的经费。据原有预算,全团每个月的经费是825元。我们已经挪借了约5000元,近期就该归还了。故此给您写信求助。请按月给我们经费,并酌情追加一次。^[173]

完全依赖苏联的财政援助的中共领袖们没有办法在鲍罗廷面前

挺直腰杆。在他的影响下，他们在与国民党的关系方面走得太远了。聊举一例。1924年1月，也即国民党一大期间，在与鲍罗廷进行会谈的时候，所有与会的共产党员“一致”表示，开展激进的土地革命的时机还没有成熟。^[174]

毛也支持这个“右”的方针。他于1924年2月中旬从广州回到上海。在“成功所带来的令人陶醉的”气氛中，1924年2月25日，他和其他几位国民党的活动家共同建立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该部办公地点设在法租界内的环龙路44号，离孙中山的寓所不远。他们没费多大力气就与法国警方做成了一笔交易，被重金收买了的法国警长向这些国民党员承诺，如果法租界要采取针对他们的任何不利行动，他会提前给他们打招呼。^[175]除了行使中共中央机关的秘书职责之外，毛也开始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在执行部的第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这个机构的组织部秘书，紧接着他又开始承担文书科主任的职责，不久后他又成为执行部常务委员会的候补委员。^[176]需要他做的工作实在太多了，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3月，作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他出席了在公共租界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全会。在这次会议上他结识了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谢尔盖·达林。达林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对国民党的极度乐观的预期使他震惊。对毛的热情有所不满的达林，在这次会议后立即向维经斯基报告说：

你将要听到的这些会令你毛骨悚然的话是中央委员会的秘书毛（马林的不折不扣的门徒）说的。比如说吧，国民党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允许它作为一个支部加入共产国际。在农民问题上，他说阶级阵线应该抛弃，我们现在在贫农问题上什么也做不了，我们必须与地主和绅士们保持一致，等等。这个家伙是党派驻青年团的代表，在青年团的这次全会上他竭力兜售他的这些观点，但并没有如愿以偿。我已经给党的中央委员会去了一封信，要求他们任命一个新代表。^[177]

达林是在自寻烦恼。由于鲍罗廷的影响，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共

领导人都持差不多同样的见解。的确,我们不知道党的其他领导人是否也认为应当允许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但是,毛当时持有的其他观点并非他的首创。1924年2月,中共中央执委会批准了《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决议认为,扩大国民党组织,纠正它的“政治错误”,同时吸收工人、农民和城市中间阶级的代表加入国民党,以扩大国民党的群众基础,是共产党员的主要任务;共产党应该把自己转变为国民党内的非法组织,做好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的秘密准备。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执委会不得不对这种“偏向”做出截然相反的反应,以图扭转航向。1924年4月,维经斯基启程使华。共产国际交给他的任务是,向中共领导人解释清楚,在国民党内工作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目的是加强共产党、使之成为下一阶段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做好准备,这一斗争将在国民党之外进行并且是针对国民党的。^[178]1924年5月,在维经斯基的安排下,举行了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维经斯基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批判了前述执委会的二月决议。^[179]

这次会议使中共领导人转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1924年7月13日,陈独秀给已经回到莫斯科的维经斯基写信说:

至于国民党目前的状况,我们在那里只看到右派反共分子,如果说那里有一定数量的左派,那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孙中山和另外几个领导人是中派,而不是左派。……所以现在支持国民党,就只会是支持国民党右派,因为他们掌握着党的所有机构。……你需要紧急给鲍罗廷同志发一份电报,请他提供实际情况报告。我们期待你们将根据他的报告制定共产国际的新政策。我们认为,对国民党的支持不能沿用以前的形式,我们应该有选择地采取行动。这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反对派。

接着,7月21日,陈独秀和毛泽东采取了一个不无风险的主动行动:给党的下级组织发出了一份秘密通告,通告指出:

此时国民党只极少数领袖如孙中山廖仲恺等尚未有和我们分离之决心，然亦决不愿开罪于右派分子。……我们为图革命的势力联合计，决不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然而，鉴于国民党的革命使命，对于非革命的右倾政策，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我们须努力获得“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并维持在我们手里。^[180]

就这样，中共领导人对于在国民党内部从事组织工作的热情被事实证明是并不长久的。这股热情只维持了几个月，总的说来尚未对党产生严重影响。有了维经斯基所代表的共产国际做后盾，他们开始抵制鲍罗廷的指示，同时坚持认为有必要“现在就抛弃广州”，以便为一场“工人、农民和士兵的大起义”从容不迫地做好准备。在毛的好友蔡和森身上，这股情绪尤其强烈。^[181]

共产国际执委会匆匆忙忙地再次干预。莫斯科对于维持反帝联合战线依然极感兴趣，更何况它已经为建立这个战线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花了那么多的钱。从1923年开始，苏联一直在给孙中山提供武器、其他军事援助和金钱。1924年的时候，至少有20位苏联军事顾问在广州工作，其中多数人的任务是帮助国民党筹建一所特殊的陆军军官学校，该校的使命是为一支新式的“党军”培养军官团。为此，苏联政府向孙中山提供了90万卢布的建校经费。^[182]该校位于离广州不远的珠江三角洲中的黄埔地区，坐落在一个名为长洲的小岛上。实际开学时间是1924年5月1日，正式开学典礼是在同年6月16日举行的。这所在中国历史上以“黄埔军校”而闻名的学校成了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的军官摇篮。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该校校长，此人就是曾于1923年秋赴莫斯科与那里的布尔什维克会谈的那位将军。廖仲恺被任命为该校的党代表。在法国待了四年多、刚回国不久的年轻的共产党员周恩来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当时的周恩来尽管只有26岁，但已是大名鼎鼎。他是公认的五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天津的学生领袖、1919年成立的爱国社团“觉悟社”的发起人和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1922—1923）的组织者之一。这位

身材高大结实、面相有点像欧洲人的年轻人，给人的印象是情绪稳定、做事认真。他也受过良好的教育，懂得日语和三种欧洲语言（法语、德语和英语），气质谦和而又不失高贵。总之，他崭露头角就被公认为一个杰出的人才。

1924年5月至7月担任苏联顾问团团长的帕维尔·巴甫洛夫，在俄国国内战争时期他曾指挥过一个军团。他死于一场意外事故。在离石龙县城不远的东江里，他在从一艘小木船登上一艘轮船的时候，身体失去平衡，掉进河里淹死了。填补他的空缺的新的首席军事顾问于10月上任。此人名叫瓦西里·布留赫尔，是一位重量级的指挥官和未来的苏联元帅。他与孙中山一起商讨了旨在由国民党统一全中国的作战计划。他在广州一直待到1925年7月，然后就回国治病去了。^[183]

莫斯科自然不想鼓励共产党方面的“极左倾向”。1924年11月，维经斯基再次被派往中国。这一次他的任务是给陈独秀和他的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降降温。本着这一目标，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个时候，共产党人和孙中山的追随者之间的严重分歧已经表面化了。在上海，双方的矛盾尤其深刻。已再次迁回上海的中共中央执委会没法回避这一矛盾。毛以其特有的个性鲜明的方式对变化了的环境做出了反应。在国民党内的艰难工作迅速消耗着他的精力。1924年5月，他的身心均感不适。到7月的时候，与国民党的“摩擦”进一步加剧，以致其心灰意冷，辞去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一职。^[184]这个时候，根据共产党人彭述之的回忆，“他看上去相当憔悴，因为消瘦，他的个头显得比他的实际身高还要高。他的面色苍白，微微泛绿，显得很健康。我担心他患了肺结核，我们的许多同志都染上了这个病”^[185]。

整个春季和夏初，他一直住在整天烟雾弥漫的、肮脏的闸北的一间寓所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就设在那里。6月初，开慧和她的母亲以及他们的两个儿子到了上海。向警予为毛和他的一家人专门腾出了一间厢房，但五口人住在里面依然拥挤不堪。幸运的是，这一家人后来还是有了一个更好的住处，新住宅位于公共租界里一



1924年，杨开慧和两个孩子岸英（右）、岸青（左）在上海。

个僻静的弄堂里。夫妻间曾经恼的气早已烟消云散，杨开慧尽其所能地帮助她心爱的丈夫做工作。晚饭后她还不时挤出时间到一家工人夜校去讲课。^[186]因为身在上海，她生平第一次发现自己抵挡不住一些简单且无害的诱惑。毕竟，她是一位女性，这座奢华的城市又能提供数不胜数的令人神往的服务。然而，她的要求不高，与她的孩子们一起照一次相就令她很满足了。这张黑白照片保留下来了。照片中的开慧看上去很平静，但又略带一点忧伤。还是婴儿的岸青坐在她的膝盖上，小家伙的头发显得很滑稽。岸英站在她身边，这是一个身体结实、有着胖乎乎的脸蛋和坚定的目光的小男孩，很像他的父亲。

到了这年仲秋时节，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经很糟糕了，他开始出现神经衰弱的症状。双十节这一天，在上海执行部组织的一个会议上，两个国民党右派挑起了一场斗殴，挥拳猛击与会的几个左派。这个事件加深了共产党员与孙中山的信徒们之间的不和。^[187]雪上加霜的是，广州方面给上海执行部的拨款也停止了。此举导致上海执行部的工作陷于停顿。12月底，毛向中央执行委员会请了病假。陈独秀准了假。于是毛和他的家人离开了讨厌的上海，回到长沙。他们在长沙未作停留，直接去了板仓的岳母家里。2月初，毛泽东夫妇带着孩子们又回到韶山，毛泽民与他们同行。泽民是因为患阑尾炎于两个月前来长沙的。手术后他暂时住在长沙城里。当毛泽东夫妇看望他的时候，泽民提出想回老家看一看，哪怕只待几天也好。^[188]不久之后，三弟毛泽覃和他的年轻的妻子赵先桂也回到韶山。一大家人就这样团聚了。

毛泽东在老家待了整整七个月。令人烦恼、日复一日的关于联合战线的谈论及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虚情假意的谈判已经使他厌倦透了。最初的亢奋已经过去，随之而来的是消沉。哪怕中共四大即将召开，他也不愿留在上海，这一举动绝非偶然。事实上，在他离开上海两周后，四大就召开了，大会于1925年1月11

日开始,于1月22日结束。他毕竟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秘书,党的第二号人物,但他还是抛下这一切,离开了。

莫斯科没完没了的干预可能也激怒了他。我们知道,他是出了名的感情激烈、容易冲动的人。坐在党代会的会场上,再一次洗耳恭听“英明”的维经斯基给陈独秀“洗脑”,对他来说可不是什么惬意的事。所以他请了“病假”。但这一举动也不像一个雄心勃勃的人应该做的事情。

四大确实是在维经斯基的领导下举行的。大会代表共有20人,代表着全党994名党员。乖巧的陈独秀不得不再次屈服并改正他的“错误”,“左派们”的立场受到了尖锐的批判。代表中很少有人敢于表示异议。鉴于共产国际内部正在进行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少数几个表示不同意见的人很快就被扣上了“托洛茨基主义”的代理人的帽子。^[189]缺席的毛未被选入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有“鲍罗廷的右手”之称的瞿秋白取代了毛的地位。瞿还同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和彭述之一起进入了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中央局。^[190]彭述之曾是中共莫斯科支部的领导人之一,在莫斯科以其化名伊万·彼得罗夫而知名,1924年夏天才从莫斯科回国。大会结束后,深受共产国际信任的彭成为中央宣传部的主任。瞿秋白则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新的宣传部和新的报纸都不遗余力地鼓吹莫斯科的政策。

这些变化对毛影响甚微,他正在享受着家庭生活的宁静和温馨。当然,他的活跃的个性不允许他无所事事,他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袖手旁观,多年来他已经习惯于做一个组织者。诚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要他克服自己对乡邻的鄙薄最初也并非易事,这些乡邻面朝黄土背朝天,世世代代在地里劳作。很久以前他就和这个村庄一刀两断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把自己的乡亲视为“可憎的愚民”。^[191]马克思主义教导他要尊重城里的工人,他们是“人类的解放者”,并没有教他去尊重贫苦的农民。做农民工作对毛没有什么吸引力。“在我们能够确信我们已经在农村拥有了强大的基层组织以前,在我们尚未对农民进行长时间的鼓动工作的时候,”毛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如是说,“我们不可能下决

心对比较富裕的地主们采取激进的措施。一般说来，中国的（阶级）分化尚未达到足以使我们主动发起这样一场斗争的程度。”他还说：

我们能肯定我们现在就可以行动起来反对地主，同时也反对所有那些虽然拥有土地但自己不去耕种的阶层吗？我们（把土地分给无地农民和佃户）的主张尚不能被农村里那些真正在劳作的人们所理解。因此，如果我们提出这个口号，我们立刻就会遭到地方精英们的反对，或许还会遭到商人们的反对；同时，这个口号也不会对农民群众产生真正的吸引力。^[192]

当然，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他是同情农村的穷人的；作为一个在农村环境中长大的人，他也不可能不理解农民问题。尽管如此，与受压迫的、无知的农民交往，而非与品尝过城市生活滋味的工人交往，对他来说还是要难一些。第一个在农民中间进行鼓动的是彭湃，但农民们最初把他看成疯子。^[193]同彭湃一样，毛也得亲身经历类似的过程。只是在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才开始尝试着采取行动。在一个名叫毛福轩的远亲的帮助下，毛终于成功地与他的左邻右舍建立起了联系。毛福轩显然有能力让他的乡亲们相信，贻昌的这位大儿子不是神经病。他开始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向他们解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布尔什维克战略。他在自己的家里或是在某个预先选定的地点比如说祠堂里与他们交谈。那一带的山上分布着不少祠堂。他家附近的多数农民跟他是同宗，这一点对他帮助不小。直到现在，仍有60%以上的韶山居民姓毛。^[194]他的妻子开慧、小弟泽覃、弟妹淑兰和先桂及二弟泽民，都尽其所能地帮他做农民工作。但泽民在老家待的时间不长。1925年5月，应中共湘区委员会的要求，泽民回到长沙。7月，他被派往广州参加农民运动讲习所举办的短期训练班。这个农讲所是在中共的建议下，于1924年7月底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办的。农讲所为各地农会训练了不少鼓动家和组织者。泽民是第五期讲习班的学员，这一期的负责人就是彭湃。在他离开韶山前，他和淑兰有一次简短的谈话。她不想

离开家四处奔波，他们相聚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泽民说：“我是党的人，工作很危险，今后天南海北浪迹天涯，我们还是脱离夫妻关系为好。”谈完后他就走了，夫妻俩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淑兰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1927年，她甚至成为湘潭地区的妇女运动和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到那个时候，另一位叫钱希钧的女性已经走进了泽民的生活。与淑兰相比，她至少有一个优势：她比淑兰小11岁。^[195]

根据毛泽东的说法，1925年春天，在他的家乡一带，他和他的同志们成功地建立了20多个农会。^[196]这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在那以前整个湘潭地区只有一个农会，是在1925年2月成立的。7月，在韶山冲办起了一个农民夜校，开慧在夜校里教农民识字和算术。淑兰是夜校的第一个学生，然后妯娌俩说服了更多的农民来夜校上学。她们挨家挨户到农民家里谈话，还教会了他们下面这首歌谣：

农民苦，农民苦，
打了粮食交地主^[197]。
年年忙，月月忙，
田里场里仓里光。^[198]

这种简单的宣传手段比党的任何决议都更加有效。差不多同时，泽覃在临近的一个小村子里建起了另一所农民夜校。6月中旬，毛在韶山冲建立了一个中共支部，委派毛福轩为支部书记。他还建立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共青团小组。^[199]

出人意料的是，从事农民工作居然对他很有吸引力。他获得了新的经验，这种经验在不久的将来将被证明是无价之宝。虽然他还没有开始对这些无知的和不识字的辛劳的人们予以更高的评价，但他已经认定了一点：只有依靠无数不幸的农民，革命才能成功。

★ 第四章

与蒋介石周旋

就在毛泽东、毛泽覃、杨开慧和王淑兰在韶山的农民中进行宣传的时候，在更大的世界里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死因是肝癌。他的病情在12月急剧恶化，在随后的两个半月里，他只能靠定期注射吗啡来维持生命。^[200]他死在北京而非广州。他是为了参加旨在统一中国的一个和平会议，取道上海、长崎和天津来到北京的。他是应冯玉祥的邀请来到这个北方的都城的。冯原是吴佩孚的部下，后于1924年10月起兵反对他的主子。冯宣布拥护孙中山，依照国民党的党名把他的军队重新命名为“国民军”，率军占领了北京，随即呼吁结束内战。接着他向苏联求助，后者很快派遣了以三位著名的指挥官为首的一批军事顾问来帮助他。这三位将军是维多福特·加日米罗维奇·普特纳（他在中国

工作时的化名是左仁江）、维塔利·马尔科维奇·普里马科夫（化名林）和格奥尔基·鲍里索维奇·斯卡洛夫〔化名是史纳尼（音译）〕。

孙中山的去世固然是一个重大损失，但并没有使中国总的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在国民党内部，各个派系的支持者之间爆发了权力斗争，但左派很快就胜出了。孙博士的最亲密的合作者之一、国民党左派的领袖、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部长汪精卫脱颖而出，成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和广州政府的元首。冯将军、国民党和苏联之间的结盟关系在继续深化。3月底，左派人士蒋介石统率的“党军”打垮了陈炯明的部队，使得广州政府得以



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左派的代表人物汪精卫。

控制广东省的东部地区。6月,这支军队又镇压了来自云南和广西的两支部队举行的叛乱。孙中山以前曾经依赖过这两支军队的支持。从那时起,黄埔军校的这位校长逐渐获得了“战无不胜的将军”的称号,成为国民党内迅速升起的一颗新星。

1925年5月30日发生在上海的一个事件,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民族主义感情的大爆发,其强烈程度是五四运动以来所未有过的。这一天,英国军警向聚集在南京路上的一群中国人开了枪,后者当时正在举行示威,以抗议一个日本人在五天前杀害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的暴行。顾是一家日资纺织厂的工人,5月15日这一天,他组织了一批工人,企图强行占领已被资方无理关闭的这家工厂。一个日本人,即这家工厂经理的儿子,为了显示他的权威,朝顾开了几枪,还捅了他几刀,顾因而死去。不幸的顾的被害激怒了全市人民,多家工厂的工人举行了罢工,学生们也罢了课。在为顾举行葬礼的5月24日这一天,成千上万的人们参加了反日示威游行。事态发展到此为止,若无节外生枝,本来倒也可能趋于平静的。不料在5月28日又发生了一起惨案。这一天,青岛的中国军阀应日本企业主的要求,向为声援上海纺织工人而上街示威的中国工人开了枪,致使2人死亡,16人受伤。日本人的野蛮暴力行为犹如火上浇油。5月30日,大约两千名中国学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中心地带南京路举行集会,并高呼着“打倒帝国主义!”“上海是中国人的!”“归还租界!”“中国人,团结起来!”等口号。租界当局试图驱散他们,还抓了一些人。下午3点左右,约有一万人聚集在老闸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者。负责在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官失去了理智,下令向人群开火,导致10人死亡,几十人受伤。^[201]这一惨案激起了愤怒的狂潮。在上海工会积极分子于5月31日举行的一个会议上,以李立三为首的上海总工会宣告成立。在他的号召下,20万上海工人同时放下了手中的工具。作为对这一事态的反应,26艘外国军舰开进了黄浦江,美国、英国和意大利三国的海军陆战队在上海登陆。流血冲突于是再起,又导致了41个中国人死亡,120人受伤。^[202]

上海屠杀事件标志着新的反帝高潮的开始,这就是五卅运动。

事实上，这也是国民革命的开端。全国各地到处都是示威、抗议集会和外资企业工人的罢工。公众再次掀起了抵制外国商品的运动，不过这一次不仅仅是针对日本货的，而是针对所有外国货的。6月19日，香港工人也行动起来，以声援他们在上海的工人兄弟。两天后，沙面工人也开始罢工。两地罢工者总数达25万人。接着出现了大批工人离开这两个殖民中心、回到广州及其周围的城镇和农村的现象。国民党政府开始全力支持大罢工，宣布封锁香港和沙面，还成立了以苏兆征为主席的、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人部领导下的省港罢工委员会。苏的副手是邓中夏。苏兆征是广东人，做过商船水手，参加过同盟会，1925年春，也就是大罢工前不久，才加入中国共产党。苏有丰富的罢工经验，曾领导过1922年1月的香港工人和海员罢工。

这场反帝斗争的浪潮一日高过一日，广州是这一斗争的毋庸置疑的中心。在广州政府的基础上，以汪精卫为主席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于7月1日在这座城市正式宣告成立。汪精卫还是新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与此同时，效忠国民党的各支部队被整编为统一的国民革命军，下辖六个军。（后来，1926年3月成立了第七军，同年6月成立了第八军。）蒋介石成为以黄埔军校学员为主体的第一军军长，前湖南省长谭延闿是第二军军长，周恩来被任命为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在其他各军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员。^[203]随着革命浪潮席卷全国，国共两党间的联盟再次开始巩固起来，成为一支不可抗拒的力量。

7月，爱国运动的浪潮波及韶山。出于对上海的流血冲突的义愤，毛泽东迅速着手在农会的基础上组织了一个“雪耻会”。实际上，这个骄傲的名称并不是他发明的，有着类似名称的组织当时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湖南也不例外。6月初，在长沙市举行的一次有两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的反帝集会上，就已成立了类似的组织。7月初，毛泽东组建了韶山地区国民党区党部，更准确地说，是复活了这个区党部，因为该党部从前一年开始一直存在着。^[204]在一家祠堂召开的、重组了国民党区党部的同一个秘密会议上，在已成立的二十多个乡雪耻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区一级的雪耻会。以这

些组织为依傍，毛泽东发起了反帝宣传运动。他和他的同志们还运用五四运动时期的经验，组织青年宣传队和讲演队到各个村庄进行宣传，同时号召农民们抵制洋货。^[205]

到了8月，这些工作突然被打断了。赵恒惕第二次发出了对毛泽东的逮捕令。触怒了这位省长的，主要不是毛泽东进行的革命的反帝宣传，而是他在8月初组织的一次矛头对准一位姓成的地方要人的斗争。当时韶山正闹旱灾，担心庄稼收成不好的农民们找到这位成姓富人，请求他把自己的存粮卖一部分给他们。成自然无意这样做，他正打算把自己的谷子运到城里高价卖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毛立刻召开了共产党支部和农会的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派出两名骨干分子去与成交涉。但交涉毫无结果，成即将把谷子装进驳船以便运到湘潭县城。于是，在毛的命令下，一百多名农民带着锄头、箩筐和竹制的扁担，乘着夜幕的掩护，赶到“吸血鬼”成的谷仓，要求打开谷仓，将谷子平价卖出。成害怕挨打，只好屈服。他由此恨上了毛泽东，立刻向省长本人报告了这件事，毛不得不再次逃跑。朋友们早就警告过他，要他小心被逮捕。也是毛命不该绝，一个认识毛的县政府的雇员碰巧在办公桌上看到了赵恒惕发给他的上司的电报，电文是：“立即逮捕毛泽东，就地正法……”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毛。按照淑兰的主意，毛化装成一个郎中，乘着一顶密闭的轿子，逃离了韶山冲。走之前，毛敦促他的幼弟泽覃，不要等着赵恒惕下令抓他，而要立刻跟着他去广州。

第二天，毛到了长沙。9月初，他启程南下。精神上的疲惫和紧张又开始折磨他了，使他倍感痛苦。由于恐惧，一个夜里，他在住宿的旅馆里烧掉了自己一路上写的所有东西。9月中旬，他终于到达广州。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因为精神极度疲惫，他一直在东山医院疗养。^[206]不久，毛泽覃也来到这个南方首都。来了以后，他开始黄埔军校和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工作。^[207]

疾病的折磨过去后，毛在10月又经受了一次打击。他青年时代的两位好朋友，蔡和森和向警予，分手了。这件事情是如此的骇人听闻，以至对全党的士气产生了消极影响。蔡和向的结合在中共党内一直被视为楷模。毛的这两位朋友对资产阶级道德嗤之以鼻，是

最早的没有履行任何婚姻仪式就生活在一起的中国青年之一；此后又过了好长时间，这种自由恋爱的风尚才在向往自由的中国青年中间流行起来。他俩的个性非常相似：矜持含蓄，公私分明，做事认真，有着清教徒式的道德观。许多可爱的、爱调情的女共产党员都很怕向警予，因为向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对她们进行道德训诫。在党的会议上，向警予时常公开斥责陈独秀，因为后者喜欢讲“黄段子”。因此之故，许多女同志送给她一个外号：“革命祖母”。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因为是在抛弃了她所不爱的第一个丈夫之后嫁给瞿的，所以特别怕向警予。因此之故，两人的分手犹如晴天霹雳。

毛泽东不得不对这个问题有所反应。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谴责了向警予，但无疑他是同情他的亲密朋友蔡和森而谴责了向警予后来的情人彭述之的。在蔡与李立三的冲突中，他很可能也是站在蔡这一边的。诚然，他心里明白，蔡和森远不是一个理想的丈夫。这并不是说蔡曾对他的妻子不忠，正相反，蔡对女人不感兴趣。跟他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熟悉他的人曾这样回忆道：

蔡和森不像是一个能使他的妻子幸福的丈夫。……他可以整天不说一句话，只顾自己埋头阅读和写作。每当他想出一个自认为有意思的句子，就会干笑几声。他患有严重的哮喘。每当哮喘发作的时候，他的呼吸就会变得剧烈起来，那股噪音听起来就像正在鼓风的风箱一样。……在他的屋里书报放得乱七八糟，一点也不整洁。累的时候，他就往床上一歪，倒头就睡，既不脱衣服也不脱鞋。睡了一会，他就一跃而起，继续工作。^[208]

一般说来，他不是一个人容易相处的人。然而，说实在的，向警予也远非完美的妻子，但她多年来一直在尽其所能地照顾蔡和森的生活。^[209]毛自然不知道像蔡这样只顾自己的需要的人是否还会有新的激情。无论如何，这场感情风波无助于毛的康复，身心上的疲惫继续折磨着他。幸运的是，12月底，开慧带着母亲和孩子来到了广

州,随后全家人住进了东山区一个安静的街区里。^[210]毛这才感觉到过去的那个自己又回来了。

让他长期赋闲养病是不可能的,早在开慧到来以前毛就出院了,那已经是10月初的事了。虽然尚未完全康复,毛还是一头扎进了繁忙的政治活动之中。同1924年初一样,不可抑制的爱国冲动再次支配了他,他又把完成国民革命的目标视为头等大事,认为社会改造的任务不妨暂时往后放一放。他告诉斯诺:“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正逢黄埔学生打败云南军阀杨希闵和广西军阀刘震寰。广州市和国民党内部弥漫着一片乐观气氛。”^[211]1925年秋,毛阐述了他的如下政治信念:

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212]

10月初,汪精卫邀请他进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接替他所担任的宣传部部长一职。汪当时被政府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无暇领导宣传部。他知道毛泽东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记者和鼓动家。于是毛在新的岗位走马上任了。他立刻着手编辑一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宣传部的机关刊物《政治周报》,以此来传播他在联合阵线和国民革命问题上所持的上述观点,及对国民党右派发起批判。^[213]

他所捍卫的这些观点与中共领导层所表达的观点完全一致。当时的他对陈独秀没有不同意见,对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可能也没有什么异议。同中共其他领导人一样,他也一如既往地周期性地顺风转舵。要制定出一个能够达到国民革命与社会革命这两种要素之间的最佳结合的政治纲领是非常困难的。到了1925年的时候,中共领导人的几经摇摆的曲折策略总的说来开始具备了某种政治路线的

特征。这一路线的理论基础的阐释和内容的界定不用说是在莫斯科完成的。同以前一样，陈独秀和其他中共成员对此只有服从。

新政策的实质如下。在克里姆林宫的理论家们看来，从现在起，中共要利用其在国民党内的存在，不仅要完成以前的既定方针，即把它自身改造为一个群众性的政治组织，而且要对国民党的阶级性质和政治特征进行激进的改造；达到后一目标的途径，是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在新政策的框架下，中共成员应该利用其在国民党内的存在，尽可能地把这个组织改造为一个“左翼”的党和“人民（工人和农民）的党”。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应当首先把“资产阶级的代表”从国民党的领导岗位上驱逐出去，然后把他们从国民党内清洗掉。再往后，他们应当将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同盟者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以达到通过国民党而非直接通过共产党，最终在中国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

这个新的策略路线的基本轮廓是维经斯基在1925年春天勾勒出来的。他与鲍罗廷不同，后者依然坚持要求把共产党转变为国民党的尽可能亲密的盟友。而作为共产国际的官员的维经斯基，根据孙中山死后出现的新形势，认为现在已有可能把下面这个任务提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俄共（布）和中共领导人的议事日程上了。这个任务就是，中共大力加强其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以达到除掉国民党右派的目的。^[214]维经斯基的这个主意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货，首先提倡这个观点的，就是中共领导人自己，时间是1924年2月。但是，维经斯基自己当时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个政策，这一主张就被压制住了。而今维经斯基回心转意，因为他认为围绕孙博士的遗产而进行的党内派系斗争的结果，已经在国民党内创造出了有利形势。1925年4月，维经斯基有机会向斯大林陈述了自己的想法。他在1925年4月22日写给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的信中，谈到了这件事：

前几天，在与斯大林的长谈中，斯大林很清楚地表示，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已经被打散了，他们没有自己的组织，国民党正在虐待他们。斯大林同志对共产党人的这种依附地位表

示痛惜。他显然认为,中国目前的这种形势历史地看是不可避免的。我向他解释说,共产党有自己的组织,这个组织比国民党更团结,共产党人享有在国民党内进行批评的权利,国民党自己的大部分工作是我们的同志替它做的。他听了以后非常吃惊。在解释自己何以就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的情况持上述观点的时候,他提到了报纸和我们从中国获得的大多数情报。的确,不难想象,对那些从未去过中国的人和不熟悉那里的情况的人来说,鲍罗廷的报告只能让他们形成这样的观点。^[215]

斯大林对维经斯基的话感到吃惊,他开始对他所听到的一切进行思考。不久之后,他就对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前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用说,斯大林没有提到告诉他“实情”的维经斯基。新观念的“著作权”只能属于领袖,而非某个在下面跑腿的办事员。这位领袖还赋予这个理论以普遍意义,把它作为不仅能解决中国问题,而且能够解决整个东方问题的万应灵药提了出来。他开始认为,把国民党和东方世界的其他民族主义的革命政党改造为“工农的”或“人民的”党,作为一种精心制定的策略,有助于确立共产党在国民运动中的统治地位。他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扩大全会(1925年3—4月)关于在印度的工作的决议草案的分析,就是从这一视角出发的。(这次全会没有专门就中国问题通过决议。)在他对这个文件所作的评注中,他特意提出了在印度未来的某个“人民的”政党中确立共产党人的统治地位的问题。^[216]

共产国际执委会迅速贯彻了斯大林的这些指示,并立刻向中共做了传达。关于这一问题,维经斯基写道:“中国共产党应当尽快提出和理解如下概念:它虽然是工业无产阶级的政党,但是它不会直接地实施领导权,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革命前的俄国的共产党就是这么做的。它是通过民族主义的革命党,依靠在城市和农村的广大小资产阶级及激进的知识分子,来实施领导权的。中国共产党要在这种情况下采取适当策略,使反帝运动更加高涨,同时开展广泛的斗争,反对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斯大林。

对共产党的影响，在对帝国主义的现实政策问题上反对国民党内中小资产阶级的动摇。这一斗争是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217]

1925年5月，在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建校周年庆典上的讲话中，斯大林公开阐述了这个问题：

在像埃及和中国这样的国家，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为两派：革命派和妥协派。只要资产阶级中妥协的一翼尚未勾结帝国主义，共产党人就不再能够提出组织一个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联合线的目标。在这样的国家，共产党人应该把民族联合线的政策转变为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的政策。在这样的国家里，这个联盟应该采取一个单一政党的形式，就像国民党那样。^[218]然而，这个独特的党事实上是两种力量的联合：共产党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只要它还没有捆住共产党的手脚，只要它还有助于共产党掌握对革命的实际领导权，这样一个混合的党就是必要的和有效的。如果它不能满足所有这些要求，这样的混合党就是多余的和无效的。因为它只会使共产党融化在资产阶级的营垒里，只会给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军队带来损失。^[219]

共产国际执委会把斯大林的上述思想作为其指导方针，再次做出了迅速的反应。由此出笼的多个具有斯大林主义气味的决议，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全会的影响十分明显。这次全会是于1926年2—3月召开的。与第五次全会不同的是，它专门做出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该决议指出：

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崛起为进一步发展和加强这个国家的所有革命民主组织，首先是国民党这个人民的革命党和广州革命政府，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国民党代表着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民主力量之间的革命联盟，这个党的主要部分支持它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结盟关系。这个联盟的基础，就是这些阶

级和阶层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军事封建的生活方式、争取国家独立和建立联合的革命民主政权的斗争中所拥有的共同的阶级利益。^[220]

斯大林或许以为他只不过是发展既定的路线，实际情况则是，他把这个路线修改到了荒谬的程度。他的理论在实践中就意味着，对于中共和斯大林来说，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本身就是目的。根据这个理论，从逻辑上讲，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应该在以下两个策略中择一而从：要么（与各种力量携手）进攻，要么防御；究竟选择哪一个，视具体情况而定。当然，斯大林的如意算盘是，共产党人最终将成功地把“资产阶级的代表”先从领导岗位后从国民党内驱逐出去。但要使这一点成为现实，需要同时具备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有利条件。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就是说，如果事实证明国民党的力量比共产党更强大，共产党人就将被迫对国民党领袖们做出让步，后者将会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和政治上的独立性。为了能够留在国民党这个“人民的”党内，所有这些推理都有可能成为现实，因为退出国民党就等于葬送了把这个党改造为“工人和农民的党”的希望。

这样的—个联合战线的概念本质上是十足的官僚作风的产物，其依据几乎全然是坐在扶手椅上对国民党内的力量对比进行的一厢情愿的算计。作为精通党内阴谋的老手，斯大林十有八九坚信自己关于联合战线的政策的必然胜利，因为当时的他正一门心思地盘算着和全力以赴地进行着旨在把他的对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清除出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层的斗争。然而，在国民革命的烈火正在熊熊燃烧的中国，这个政策是不可能奏效的。国民党是一个革命党，其内部反共的军事集团不仅在军官们中间大受欢迎，就是在中国社会内的一些重要社会集团中也颇得人心。把这个反共集团的成员挤出他们自己的政治组织是全然不可能的。

客观地说，中国共产党人是斯大林这条路线的人质。他们不可能拒绝它，因为，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他们完全依赖苏联的财政援助。然而，执行使国民党共产化的指令，同时又想避免联合战线

破裂的风险，也同样是不可能的。^[221]从张国焘的回忆录来看，中共的大多数领导人对这一点最终都是心中有数，因而不得不玩弄迂回、欺骗和曲解等花招。^[222]但这些花招并非总是有效，唯一可能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失败。

的确，最初没有任何征兆表明事态发展会有灾难性的转折。表面看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真的有可能把国民党改造为“工农的”党。反帝运动正席卷全国，工人斗争也如火如荼，左派的和看起来像左派的国民党领导人无不强调他们与中共、苏联和共产国际发展友好关系的兴趣。对于毛在国民党内进行的消灭地主阶级的激进宣传，也没人干预，尽管国民革命军的所有中高级军官和大多数国民党领导人事实上都属于这个阶级。^[223]不错，1925年8月20日，当时毛泽东尚未到达广州，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之一廖仲恺被一个恐怖分子暗杀了。但这个事件只是削弱了右派的地位并使其陷于孤立。针对这次暗杀，汪精卫提出了一个口号：“革命的往左边来！”^[224]士气低落的右派试图分裂国民党，他们在北京城外的西山单独开了一个会，自称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但一无所获。受到共产党支持的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和其他众多国民党领导人都公开表示反对他们的这一行径。11月27日，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份致全党同志的呼吁书，尖锐地批判了西山会议派的行径。这份呼吁书发表在12月5日出版的《政治周报》第一期上。此文以布尔什维克式的愤世嫉俗的口气宣称：“盖今日之革命，乃世界上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做最后决斗之一幕。……须知今日之局面，不为革命，便为反革命，无丝毫中立回翔之余地。”^[225]

在他的长篇论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更加系统地阐发了他的观点。这篇文章发表在1925年12月1日的《革命》杂志上，该杂志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官方杂志。虽然它的题目是“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但它并不是一篇进行严格的社会学分析的学术论文。中共党内当时还没有人有能力对中国的阶级结构进行认真的分析。在其党内既没有权威的社会学家，也没有重要的经济学家。^[226]但毛撰写此文，其志本来就不在学术。他的文章严格说来是

宣传性的，有着明确的政治意图。这个意图就是要证明：由于中国社会的独特性质，革命的敌人在人口中只占少数，因而左派的联盟将不可避免地取得胜利。出于简单化的考虑，他把社会成员分为五类：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他全然不考虑这样一个事实：他是在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图式套用到中国社会中来，而这套图式并不适合中国的现实。他提出了一个纯粹政治性的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他给出的最终答案是：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毛认为流氓无产阶级也是“真朋友”。他指出：“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结论是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图景：三亿九千五百万人是朋友，一百万人是敌人，四百万人是动摇分子。^[227]

毛并没有花心思对有关各个社会集团的实际构成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所有的数据都是他匆匆忙忙地拼凑出来的。他给出的数值为四亿的中国人口总数也是武断的，根据1922年通过邮政系统进行的人口普查，实际人数已达4.63亿。他也懒得去解释在生产关系体系中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经济地位。^[228]然而，由于此文在政治上的价值，文章一炮打响，风靡一时。1926年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在其主办的杂志《中国农民》上转载了这篇文章。

毛积极参与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和会议过程。大会是在1926年1月召开的。此前蒋介石的军队刚刚打垮残余的地方军阀，使得广东全省都处在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毛是代表资格

审查委员会委员和关于宣传问题与农民问题的决议起草委员会委员。在第八天的会议中他做了关于两年来党的宣传工作之成效的长篇报告。^[229]国民党二大是在不断加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翼的团结的口号下召开的，对于这一事实，毛堪称功不可没。在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选举中，毛再次当选为候补执委。进入这个国民党最高权力机构的共产党员人数从上一届的10人增至13人。在国民党一大中，只有3名中共成员当选为拥有充分投票权的中执委的正式委员，此次大会中，则有7位中共党员成为中执委的正式委员。这一结果的出现，缘于汪精卫个人的指示。中共领导人自己的意见是：只要求有两名中共代表进入中执委。两名中共成员谭平山和林伯渠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还有一名中共成员进入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

表面看来，没有任何征兆表明将会出现麻烦。据当时在广州的维什涅科娃-阿基莫娃回忆，在大会的整个过程中，“汪精卫比共产党人还要左”。汪在大会报告中表示，共产派和非共产派在历次战役中，热血流在一起，凝结成一块，早已不分彼此。^[230]这位苏联特使高兴地看到，“在大会即将闭幕时，大会主席团的一个成员展开了一幅红底金字的标语，上面写着：‘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挣脱帝国主义的枷锁！’这个标语是第三国际送给大会的礼物。掌声和欢呼声持续了几分钟。……被击垮的右派们坐在那里，缄默不语。”^[231]大会结束后不久，毛泽东被批准继续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理部长，谭平山就任组织部部长，林伯渠就任农民部部长。林还领导着2月初新设立的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之一。^[232]

“左派的狂欢节”一直延续到1926年3月下旬。国民党领导人胡汉民于2月17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标志着这一狂欢节的高潮。孙中山的这位老战友当时说：

世界革命只有一个，中国革命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的伟大领袖孙中山的教导在基本问题上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是一致的。……国民党的口号是：一切为了人民大众！这

就是说,工人和农民必须把政权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233]

与此同时,1926年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竟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正式提出了加入共产国际的申请。在胡汉民向共产国际领导人递交的这份申请书中,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强调:“国民党将努力奋斗以完成已长达30年的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从国民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234]

这一切足以把人弄得头晕目眩。1926年2月,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领导人认真地审查了这个请求。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大部分成员表示,可以接受国民党作为同情党加入共产国际。^[235]然而,谨慎的态度最终还是占了上风。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建议,在维经斯基与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商量过之后,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封信表示婉拒的信起草出来了。1926年2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批准了这封信。该信随即交给了胡汉民。^[236]

信上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认为国民党是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真正的盟友”,承诺把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列入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议程中,如果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届时依然坚持这个要求的话。^[237]

事态并没有向共产国际的官员们和中共所欲推动的那个方向继续发展。旨在使国民党共产化的共产国际决议的实施不可避免地招致了一场发生在广州的反对左派的军事政变。政变是由蒋介石领导的,此人从1926年初就开始急剧地向右转。

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这位军长的反共情绪在1926年3月20日突然爆发了。此时距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全会的结束只有五天。三年前曾被共产国际的官员们邀请加入共产党的蒋介石长期以来一直以怀疑的眼光注视着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人在中国的活动。1923年秋的苏联之行已经使他得出结论:布尔什维克“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恺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238]。1923年12月末回国之后,他就把这个看法写进了给孙博士的报告中。在这篇足有40页的长篇报告中,蒋断言:“其对华政策之唯一目的是使中国苏维埃化。”与此同时,作为一个

聪明的和老奸巨猾的人，他暂时对自己的真实情感秘而不宣，他这样做还有一个特殊原因：他没有收到孙中山对他的报告的任何反馈。蒋的表演如此娴熟，就连颇有心计的鲍罗廷也在到达广州后不久就把蒋视为自己的朋友。^[239]

然而，到1926年春天的时候，蒋已经失去了耐心。蒋对许多苏联专家的活动早就心存不满，他们中的不少人举止傲慢。蒋对在苏联红军中当过军团司令的尼古拉·弗·古比雪夫尤其恼火，此人是驻华南军事顾问团团团长，在中国工作时的化名是季山嘉。他看上去的确是一个既傲慢又愚蠢的老兵，在布留赫尔不在的情况下，被自己的巨大权力冲昏了头。季山嘉之所以自视甚高，显然还有一个原因：他的哥哥瓦列良·弗·古比雪夫是斯大林的亲信、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根据维什涅科娃-阿基莫娃的说法，这位“前额宽大”、“眼睛呈深蓝色”^[240]的将军毫不掩饰他对大多系军阀出身的中国军官的蔑视。他无视外交礼仪，坚持要对军队实行大权独揽的集中管理，厚颜无耻地试图将国民革命军置于他个人的严密控制之下。他显然低估了蒋介石，因而无视他的存在，在军事问题上倾向于直接与汪精卫打交道。而那位国民政府主席也有意利用季山嘉来败坏蒋介石的名声。在团结的外表下，这两位国民党领袖彼此间有着极深的反感。蒋介石英俊且沉着，不屑于道德说教和纯粹社交性的闲谈，与汪精卫这位为人圆滑的“女人芳心的征服者”和“党内头号演说家”全然不同。汪主席无法容忍粗鲁的军人蒋介石，而这位涂着厚厚的润发油的喋喋不休的奶油小生也只能令蒋感到恶心。只有鲍罗廷好歹能够维持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部脆弱的力量平衡。中国共产党人的厄运缘于以下事实：在这场权力斗争中他们毫不含糊地站在汪精卫和季山嘉这一边。

从2月底开始，所有对政府的左派倾向不满的人们都开始围绕在蒋介石周围集结。其结果，以蒋介石为一方、以汪精卫和季山嘉为另一方的人际冲突开始带有越来越多的政治色彩。3月20日，蒋将军出手了。他宣布广州全城实施戒严，逮捕了一些共产党员，派兵包围了苏联军事顾问的住所。这个事件完全是他一手挑起的。两天前，蒋曾命令“中山舰”政委、共产党员李之龙把这艘军舰开到黄

埔军校附近以执行警戒任务。当李奉命将军舰开到军校附近的停泊处之后,他又突然被指责为企图“哗变”,蒋由此捏造了一个“共产党政变”的流言。^[241]一时间,广州城里到处贴满了蒋发布的告示,其中称:“我信仰共产主义,我本人几近于共产分子。但中共党人把自己出卖给俄人,成了其‘走狗’。因此之故,我决意反对他们。”^[242]这次事变给蒋带来的直接收获是:季山嘉及其副手罗加乔夫和拉兹贡立即就失势了,而他信任的布留赫尔则再次被任用了。^[243]据切雷帕诺夫的报告说,被这当头一棒打得晕头转向的季山嘉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但信被退了回来,信封上加了一个签注,说蒋不在家。^[244]木已成舟,只有默认事实。四天之后,季山嘉、罗加乔夫和拉兹贡离开了广州。事变和平地结束了。既已达到目的,蒋就释放了被捕人员,甚至还向留在广州的苏联专家道了歉。5月底,布留赫尔回到了中国的这个首都。

蒋介石发动的这次突然袭击,毫无疑问是冲着中苏两国的共产党人来的;换言之,其矛头所向,是苏联的军事和政治顾问及其强化对国民党的影响力的努力。这一事变标志着国民党右派和中派对国民政府所控制的地区的几乎是不加掩饰的军事独裁的确立。其结果,共产党人和集结在汪精卫周围的国民党左派的地位都遭到了严重削弱。汪被迫出走海外,公开的说法则是出国治病。广东境内各个村庄的农会开始被解除武装。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最严重的后果来自蒋介石集团提出的一系列要求,这些要求旨在严格限制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地位。这些要求是由蒋本人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的一次全会上提出来的,谭延闿和孙科(他是孙中山与其第一位妻子所生的儿子)发言表示赞成蒋的要求,这些要求遂被中执委批准。这些要求包括:禁止批评孙中山和他的思想;有意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名单须提交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主席保存;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省党部委员会和特别市党部委员会中的人数,不得超过各该机构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各部的部长;在未获相应的国民党领导机关批准的情况下,禁止国民党员以本党名义召集会议;禁止国民党员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参加共产党的活动;中共给其党员

的所有指示必须事先提交两党联席会议^[245]批准方能有效；禁止国民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246]这次全会后不久，蒋介石大权独揽的局面即告形成。他一人身兼数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其中，总司令一职尤其重要。国民政府主席一职则由谭延闿担任。^[247]

早在5月全体会议召开之前，中共就已经知道蒋介石将在这次全会上提出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未来地位问题，遂请示莫斯科：“应该怎么办？”陈独秀本人倾向于退出国民党，他不想牺牲共产党的独立性。维经斯基同意陈的意见，他在未请示上级的情况下于4月24日写信给陈独秀表示，有必要“中止与国民党的名存实亡的联盟关系”^[248]。在政治局内部就此进行的讨论中，托洛茨基建议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不久之后，在4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发言表示赞成维经斯基的意见。然而，斯大林无法接受所有这些意见。这些意见会毁掉他的基于策略考虑的全盘计划。在这位克里姆林宫领袖看来，仅在几周以前，在这个“代表工农利益的国民党”内部，共产党员已接近于夺取政权，怎么能如此轻易地放弃已经夺得的阵地呢？根据斯大林的逻辑，这样做无异于无缘无故地向国民党右派投降。^[249]莫斯科给中共中央执委会的指示是，在国民党内放慢进攻的速度，以便赢得时间重组力量。斯大林承认，有必要“在国民党内对国民党左派做出组织上的让步，就是说，进行人事调整”^[250]。这仅仅是左派内部的问题。政治局认为，蒋的言论是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客观上的同盟者之间冲突的反映。在当时的苏联领导层中，尚没有人把蒋视为右派。鲍罗廷的理解是，苏共和中共的政治攻势已经走得太远了，蒋介石的示威性的举动是合乎情理的。他在与张国焘的私下谈话中透露了自己的一个真实想法：“假如孙博士还活着，他很可能也会采取措施限制共产党的活动。”^[251]

鉴于来自莫斯科的压力，以及苏共中央政治局在1926年5月指示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苏联政府策略性地“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在人事上和财政上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252]，中共不得不再次屈服。

同谭平山和林伯渠一样领导着国民党中央的一个部的毛泽东，

辞去了他的代理部长职务。据张国焘回忆,毛对此极感不快,他责备鲍罗廷的退却政策,在与张国焘的私下谈话中骂他是“洋鬼子”。^[253]新任宣传部长和农民部长分别是顾孟余和甘乃光,此二人都被认为是国民党左派。组织部长则由蒋介石本人兼任。^[254]

实际上,辞职后的毛并非无事可做。早在3月中旬,即在此次政变的四天前,他已被任命为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那时的讲习所已经重组,招收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5月3日,为新学生举行了开学典礼,5月15日开始上课。这一届学生共有315人。从4月初开始,他也给国民党广东省党部青年部训育员养成所讲授农民问题。^[255]因此,在离开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岗位之后,毛泽东就可以全力以赴地从事自1925年夏天以来事实上已成为他的主要工作的中国农民的组织工作了。

这项任命不是偶然的。自离开韶山以来,毛不知疲倦地到处谈论农民运动问题,在国民党的出版物上写这方面的文章,在讲话中也常常提出这个问题。在他看来,

我们把太多的精力放在城市人民身上而忽视了农民。……农民所受的压迫越轻,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会到来得越快。……如果我们真想巩固国民革命的基础,我们就必须再一次解放农民。……只有赞成中国农民的解放运动的人,才是我党的真正革命分子,反其道而行之者,就是反革命分子。^[256]

我们知道,共产党当时对农民问题极少关注。毛逐渐被视为农民运动方面的真正的专家。就连国民党的领导人,包括那些有右派倾向的领导人,也认为这位“湖南王”(这是中共党内打趣地送给毛的外号)是“农民问题专家”。据鲍罗廷说,正是这些国民党领导人建议“让毛进入农民问题委员会的”^[257]。早在1926年1月,毛就在《中国农民》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文,这篇题为《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的文章直接讨论了中国农民的内部分化问题。尽管此文重复了乃至一字不动地照搬了他在此前发表的关于中国社会的阶级问题的文章中的许多观点,国民党左派对

于这篇文章还是很感兴趣。这篇文章同样不是一篇出色的学术分析，那时没有人对学术分析感兴趣。革命者需要的不是学术论文，而是政治观点犀利、战斗性强及文字流畅的宣传品。毛的这篇文章正具备这些特征。此文没有延续把农村社会分为五种成分（大、中、小资产阶级，以及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观点，而是划分为八类：大地主、小地主（同以前一样，他把他们分别与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联系起来）、自耕农（小资产阶级）、半自耕农（他们耕种的土地有一部分是租来的）、半益农（拥有自己的农具的佃户）、贫农（没有自己的农具的佃户）、雇农（出于某种考虑，毛把农村手工业者也归入这一类）和游民。这种分类离现实近了一步，但离精确二字还是差得很远。毛没有意识到的一点是，同前一篇文章一样，这一篇也高估了中国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

这篇文章有一个新意。毛以特别同情的语气讨论了游民问题。受生活所迫，这些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要么当土匪，要么当乞丐，要么就是在军阀的部队里当兵吃饷。同以前一样，他把他们看作“很能勇敢奋斗”的同盟军，但他这一次对这个问题没有仅作泛泛之论，而是做了进一步的表述：“对于游民无产阶级则劝他们帮助农民协会一边，加入革命的大运动，以求失业问题的解决，且不可迫其跑入敌人那一边，做了反革命的力量。”

无可否认，他依然把希望寄托于集合在“一个组织之下”的五类农民（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手工业工人身上，要求他们与整个地主阶级作斗争，而不是仅仅与大地主作斗争。[他把大地主规定为占地500亩（相当于33公顷）以上的地主，看不出这个标准有何根据。]“对于地主阶级在原则上用争斗的方法，请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让步，在特别情形上，即是遇了……最反动最凶恶极端鱼肉人民的土豪劣绅时，则须完全打倒他。”^[258]

大约同时，也是在1926年1月，毛在他编辑的《政治周报》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再次强调，整个地主阶级实际上都处在敌人阵营，与帝国主义者、官僚、军阀和买办同流合污。文章总结道：“实际革命的乃小资产、半无产和无产这三个阶级成立的一个革命的联合。”这里的无产阶级包括游民在内。整篇文章的矛头都是针对

地主的,最猛烈的抨击对象则是小“地主”。毛用轻蔑的语气这样描述他们:“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发财,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救苦;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准备作新的压迫阶级,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要得到自己的解放并且使将来永无压迫自己的人。”^[259]

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左的观点在当时还是很有代表性的,蒋介石的军事政变还是两个多月以后的事。许多中共领导人那时的看法与毛并无二致。此前不久,1925年10月在北京秘密召开的中共中央执委会的一次扩大全会也刚好确定了强化农村的“阶级斗争”的方针。因为偶然原因,毛泽东和陈独秀都没有参加这次全会。这次会议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认真关注农村问题的中央全会,在全会的秘密报告《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中强调指出:“现时已经要使一般工人农民知道:到了建设国民革命政府的时候,没收土地的问题是革命中的重要问题。假使土地不没收交给农民,假使几万万中国农民因而不能参加革命,政府必定不能巩固政权,镇压军阀的反革命。我们的党应当知道:我们现在所提出的过渡时期的农民要求,如减租整顿水利、减税、废除陋规、收回盐税管理权、减少盐税、农民的乡村自治、农民协会的组织及农民自卫军等等,可以使农民革命化,可以组织农民起来。”^[260]然而,如果农民得不到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是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261]可以看出,这些内容是对布哈林关于在中国必须进行土地革命的提议的发展。早在中共三大之前,他就提出了这一建议。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的维经斯基参加了这次全会,他特别强调,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应当接受这一建议。全会还决定在中央执委会内部专门成立一个关于农村问题的部。(这个部当时并没有成立,直到1926年11月才成立。)^[262]

1926年2月中旬,毛泽东以生病为由,把宣传部的部务交给了他的副手沈雁冰(此人就是后来的著名作家茅盾),自己花了两周时间对广东北部和湖南南部的农民运动进行了一次调查。回来之后,他在国民党军队第二军的军官学校做了一个关于农民问题的讲话。^[263]

与此同时,在打压了共产党人和左派之后,蒋介石开始认真着

手准备和进行北伐。这是孙中山生前构想的，以消灭军阀、统一中国为目的的军事行动。在这个问题上，与蒋介石和其他中国将军相处融洽的布留赫尔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他们把这位总军事顾问称为“加仑将军”，但他们未必能够猜到，这个化名是怎么来的。

布留赫尔是在1924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为自己选择这个化名的，当时的他直接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要搞到一本护照。像所有在中国的苏联工作人员一样，他应当在化名的掩护下开展工作。根据同他一起在参谋部门工作过的同事马尔科·卡扎宁的回忆，布留赫尔当时说：“就写加仑吧，毕竟我的妻子是加仑娜。”^[264]——“那名字和父称写什么呢？”——“嗯……我孩子的名字是卓娅和弗谢沃洛德，我的名字和父称就写卓伊·弗谢沃洛多维奇吧。”卡扎宁接着写道：“大家都笑了。但有人说，没有叫卓伊这样的人名。布留赫尔反驳说：难道只能起教历中的名字吗？”^[265]于是他的名字就成了卓伊·弗谢沃洛多维奇·加仑。他在给莫斯科写的秘密报告中使用的另一个名字是乌拉尔斯基。

3月底，就在北伐的直接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之际，毛泽东出席了依然由共产党员林伯渠任部长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召集的一个会议。意识到国民革命军的到来势必吸引几百万农民参加国民革命的事实，毛泽东提议：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应更多地注意国民党军队必将经过的区域。他直接点明的省份有江西、湖北、直隶、山东和河南。^[266]出于某种考虑，他没有提及他的家乡湖南，其部分原因可能是：在与广东直接接壤的省份组织农民运动的必要性已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7月初，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其官兵总计达10万人。由冯玉祥指挥的、总数达15万人的强大的国民军是北伐军的事实上的盟友，因为冯已于1924年10月宣布支持孙博士。1926年5月，冯元帅甚至加入了国民党。然而，如今他还帮不了他的本党同志，因为在北伐开始三个半月前他刚在与北洋军阀的交战中吃了一场大败仗。蒋介石军队的对手是三个军阀集团。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盘踞在华中的吴佩孚。我们知道，此人曾在1923年2月7日下令向汉口的罢工工人开枪。另外两位，一个是已经与吴佩孚决裂的、盘踞在

华东的孙传芳，一个是占据了华北和东北的张作霖。吴和孙的军队分别约有 20 万人，张手下能够投入战场的军队则有 35 万人。力量对比显然是不平衡的，但运气在蒋这一边。早在 1926 年 2 月，吴佩孚的部属、湖南省长赵恒惕的军队内部就发生了分裂，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宣布起义，投靠广州政府。顺便说一句，毛与其他湖南共产党领导人在这次起义中起到了联络作用。为了赢得广州方面的支持，唐向赵将军发起了攻击，迫使其逃离长沙。1926 年 3 月底，唐宣布就任湖南省长。但在他还没有来得及加强在长沙的防御工事的时候，吴将军就调兵进攻他，迫使他放弃了这个省城。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采取了唯一正确的行动：5 月 19 日，他派出一个兵力达 2 000 人的团进军湖南。

这个团是国民党军队中唯一一个由共产党员指挥的团，当然，这位团长的党员身份是保密的。这位团长就是叶挺。这个团的低级和中级军官及数百名士兵也都是共产党员。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这个独立团帮助唐生智控制住了局势。接着，第七军的一个旅也被派往湖南。6 月初，唐生智的师被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以上行动奠定了北伐战争的最初胜利的基础。在北伐正式开始两天之后，7 月 11 日，第四军、第七军和第八军合兵一处，再次夺回长沙。8 月中旬，唐生智和蒋介石会晤，决定兵分两路，继续北伐。西路军的目标是夺取武汉三镇，东路军则直指江西省的省会南昌。蒋介石本人指挥东路军，唐生智指挥西路军。8 月 17 日，北伐军恢复了攻势。^[267]

国家的统一进程已经开始，但毛依然留在广州。虽然他的家乡湖南已被国民革命军所解放，工作缠身的他却无暇返乡。他时常受邀在各种会议上宣讲农民运动。人人都预期在农村将会出现一个大规模的革命高潮。在他所主持的为期四个月的那一期农民运动讲习班中，毛讲了三门课：农民问题（讲了一周，总计 23 小时）、农村的教育工作（9 小时）和地理（4 小时）。他还应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农民委员会的邀请，在该委员会给军官们举办的训练班中讲课，讲授的是土地问题、共产国际的历史和苏联问题。7 月，他与农讲所的学生们一起，在毗邻湖南的广东北部，在农民中间进行了长达一

周的宣传鼓动工作。8月中旬，他带领学生在该省东部的海丰地区实习了14天。9月初，他给黄埔军校的学员们做了一次讲演。与此同时，他编辑和筹划出版了《农民问题丛刊》。（原计划出版52种小册子，实际只出版了26种。）^[268]

他的观点依然不变，依然号召打倒整个地主阶级，全然不顾一个事实：“地主的儿子们”正在前线指挥北伐军。他断言道：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269]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当前的主要任务应该是迅速发展农民运动。这就是他教给他的听众们的行动方针，这也是他全力以赴去做的事。看来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使已经展现出来的革命前景黯淡下来。几百万受压迫的农民看来也已经做好了砸碎这个旧世界的准备。

第四篇

枪杆子与政权

★ 第一章

联合战线的破裂

到1926年秋季的时候，国民革命军的西路大军在湖南、湖北两省已经击溃了军阀吴佩孚的主力部队，到达长江流域。9月6日、7日，汉阳、汉口分别被攻克，双十节这一天，武昌也被攻克了。至此，武汉三镇已全部掌握在国民革命军的手中。它是中国最大的中心城市之一，当时的人口约有150万人。它地处华中平原，位于自西向东的长江和南北向的北京—长沙铁路这两条交通大动脉的交叉点上，这一地理位置赋予这座城市以战略意义。武汉也是一座始建于公元3世纪即汉朝末期的古城，历史上发展迅速。19世纪末，武汉成为对外通商口岸，外国人在汉口建立了几个租界。此举无疑对汉口的经济繁荣起了作用，使武汉的这个位于长江左岸也即北岸的区域发展成为华中最重要的商埠。它和相邻的汉阳都出现了工业企业。这两座城以长江的支流汉江为界。然而，经济上的崛起对左岸的政治局势并无影响。武汉三镇的公共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中心始终在武昌。它是湖北省的省会。那里的衙门，著名的宝塔楼阁，包括在中国诗歌中经常被咏赞的壮丽的、高达五层的黄鹤楼，就屹立在这条大江的右侧即南边。

对这样一个重要的人口中心的占领自然被视为国民党军队的一个伟大胜利。11月初，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做出决议，把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一个月后，部分部长，其中多数是有左派倾向的部长，随鲍罗廷来到这个新的大本营。他们被视为为迁都做准备的委员会成员。1927年元旦这一天，武汉被正式宣布为中华民国的首都。^[1]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对反动的北洋军阀的日趋临近的胜利正成

为一个明显的事实。

11月初，毛泽东也离开了广州，但他没有去武汉，而是去了上海。根据中共中央执委会的决定，他再次被调到那里的中央机关工作。这一次，他的任务是领导新成立的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而且将要与著名的广东农民的组织者彭湃并肩工作。总共将有六个人在毛的领导下工作，他们个个都已经显示出在农村为党工作的才华。^[2]毛也有同样的经历，尽管他的农民工作的实际经验明显不如彭湃这样的人丰富。他的特长是：他有对事实进行理论归纳的能力，明快、清晰而巧妙地把思想表述为一个概念体系的能力，及作为一个宣传家的杰出才能。他对农民问题的看法得到许多中共领导人的赞同。比如说，1926年9月，中共中央局成员瞿秋白曾建议中央执委会宣传部，把他们的工作建立在毛在其关于农民运动的一篇文章中所阐释的思想的基础上。瞿记住了毛关于农民反对“革命最大的对象”“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3]的斗争的思想。毛有可能是在瞿秋白的坚持下，才被任命为农民运动委员会的书记的。^[4]

对毛的任命可能也得到了维经斯基的支持，此人自1926年6月起就常驻上海，任新成立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的书记。陈独秀、瞿秋白和其他四名共产国际官员也是远东局的成员。^[5]从北伐战争一开始，维经斯基就以他个人的权威，甘冒个人风险，强调要加快进行土地革命，要求中共中央执委会在农民问题上采取一种坚定和激进的政策。^[6]

尚不清楚总书记陈独秀是否反对对毛的这个任命，但可能不反对。“老头子”（陈独秀）同以往一样，在党的领导层中享有巨大威望，没有他的认可，很难想象毛能得到这个职位。陈本人持左派观点，但一直在玩迂回战术。一方面，他服从持左的观点的维经斯基的意见，另一方面，他又努力让斯大林确信，威胁联合战线的极端主义不会再得到支持。北伐战争开始后不久，陈独秀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又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全会通过了一个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用张国焘的话来说，这是个“软弱的”决议^[7]，它只号召农民为减租减息减税及禁止投机买卖而斗争。决议称：“全体农民起来反抗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反抗军阀政府的苛税勒捐！”^[8]仅此

而已！无论是瞿秋白、张国焘和谭平山，还是其他许多共产党人，对这个决议均不满意。就连他的儿子陈延年这时也反对这位总书记。（陈独秀的这位在党内被称为“小陈”的儿子当时领导着广东省的党组织，那是中共最大的省一级组织。）“小陈”和他的同志们强调：“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不够彻底。”他们要求，“与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相适应”，“为了动员农民参战”，应当提出“‘给农民分配土地’这样一个土地革命的口号”^[9]。但是，地位虚弱的总书记做不了任何事情：毕竟正是他要为不折不扣地在中国贯彻斯大林路线负责，因此，他别无选择，只有沉默。

可能正是为了使自己摆脱这个自相矛盾的处境，他才同意了对毛的任命，私下希望这位著名的农民问题“专家”能够帮助自己避开共产国际的干扰，“推动”起一个左派的事业。一旦失败，他还可以把所有责任都推到那位“浮躁”的农委会书记身上。为了缓和局势，并对陈独秀提供帮助，1926年10月22日，维经斯基以驻上海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书记的名义给莫斯科发了一封电报，请求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批准中国共产党积极在国民革命军的后方开展群众运动。^[10]

毛未必猜到陈的这些心计。他所主持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他受邀去上海之前两个月就已结束了，所以他是带着轻松的心情走马上任的。他的家人没有理由单独留在南方，故他们与毛同时离开了广州。他的亲爱的“小霞”又怀孕了，且已有五个月。夫妻俩于是决定，她带着她的母亲和孩子回到长沙。^[11]多么残酷的命运啊！对于他们的再次分离，开慧没有任何抱怨。她明白，正在席卷全国的这场革命风暴需要毛泽东。

然而，在了解了党内种种阴谋之后，他没有在上海逗留太长时间。中执委机关内部的空气非常紧张，如我们所知，党的领导层被大大小小的争吵所分裂。彭述之已经积累了巨大的权力，而由于他与向警予和蔡和森之间的那桩事，毛十有八九是瞧不起他的。还有，毛泽东在黄浦江畔弃舟登岸后没几天，中共领导层内部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的力量对比就发生了变化。就在毛从广州赴上海的途中，维经斯基收到了来自莫斯科的一个恍若晴天霹雳的指令。由于

担心北伐战争的后果，斯大林命令中共转而实行进一步退却的策略；这一次，不仅是对国民党左派，对右派也要让步。“现在的后退是为了以后更好的出击。”^[12]这就是斯大林的传声筒、《共产国际》杂志的编辑亚历山大·萨莫伊洛维奇·马丁诺夫对这一策略的特征的描述。

斯大林的想法是，正在发展中的中国军事形势改变了国民党内的力量对比，新的力量对比不利于中国共产党，而且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就是中共在清洗国民党内部的“反共分子”的问题上显得十分软弱的原因。10月26日，根据斯大林的密友、陆海军人民委员克利门特·伏罗希洛夫的提议，苏共政治局通过了一份给中共的指示，禁止在中国开展针对资产阶级和封建的知识分子——共产国际到那时为止一直视为右派的那些人——的斗争。这份指示强调：“只要一直存在帝国主义者和北方的危险，同他们的斗争不可避免，国民党就应该会珍惜自己潜在的盟友和志同道合者。……我们同意，土地问题应当在实践上提上议事日程，若无农民就不能取得胜利。但是，立即在农村发动国内战争，在同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战争正在紧张进行的情况下，会减弱国民党的战斗力。”^[13]不用说，无论是斯大林还是他的支持者们都没有放弃使蒋介石的这个党共产化的希望。这只是一个策略的调整问题。（有意思的是，在中国的大革命之后，在1927年7—8月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在谈到这个指示的时候，斯大林的解释是，这是一个令人大伤脑筋、产生误解的文件：“它是一个孤立的电报，完全不能代表共产国际的路线，不能代表我们领导集体的路线。”他认为它“毫无疑问是错误的”^[14]。伏罗希洛夫的判断则是，作为一个孤立的、针对当时的具体事态的指示，它无疑是正确的。^[15]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不是吗？）

事实则是，在他们于10月26日做出的指示中，斯大林和政治局提出了新的对华政策。远东局就是本着这一认识来看待这个文件的。这封信是远东局在中国开展工作的五个月（1926年6月至10月）来收到的唯一一份带有总揽全局的政治色彩的指示，这一事实更强化了远东局的上述认识。^[16]

在11月5或6日（也就是毛抵达上海的前夕）接到这个指示以后，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执委会立刻对当时的形势发展做了一番评估。陈独秀不无苦涩地注意到，在与共产国际的博弈中他赌赢了。如果当初他采纳了维经斯基和瞿秋白的建议，他现在马上就会沦为替罪羊。如今，根据本人立场也已后退的维经斯基的提议，做出了新的决定：“推动国民党左派走上革命道路……但应采取不致过早地引起它的恐慌或使其抽身逃走的方式。”换句话说，使农民运动进一步激进化的做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允许的。一项决议迅速发给了莫斯科，决议向这个最高司令部保证说，只会提出没收最大的地主、军阀和劣绅的土地及公有地给农民的要求。即使是这样一个温和的决议，斯大林还是认为过于极端。在对该决议所作的一个评注中，他坚持要用对反革命分子的土地实行政治没收这个没有实际意义的要求来取代没收最大的地主的土地的口号。^[17]

这就是毛抵达上海时面临的形势。他无意放弃自己的观点，但也不想兴风作浪。在他通往权力的征途中的这个时刻，后一选择将是鲁莽的。抵沪不久他就召集了农委会的一个例行会议，并在会上建议制订一个具体的“目前农运计划”。这个计划的基础，是他在1926年3月底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的一次会议上提出的见解。计划对中共的要求是：“在目前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具体说来，它所要求的组织农民运动的重点地区，不仅仅是广东，而且包括国民党军队正在作战的地区，特别是湖南、湖北、江西和河南四省。另外，计划要求把“相当的力量”用于在其他地区组织农运，这些地区既包括四川这个业已志愿接受国民党政府的领导的省份，也包括江苏和浙江这类将很快成为国民革命军的战场的省份。计划还要求立刻向已成为国民党的主要领导机构的驻扎地的汉口派出一位中央执委会农民部的代表，并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18]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确保不会错失领导革命群众的机会。

1926年11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局批准了这个计划。11月底，毛登上了从上海开往武汉的轮船。他已被委任为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驻汉口的代表。出发前，他向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向

导》周报投了一篇关于江浙两省农民运动的稿子。在这篇文章中他只谈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不再谈论反对整个地主阶级的斗争。^[19]他急于采取行动，但共产国际的指示捆住了他的手脚。革命的火焰正在四处蔓延，国民党军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城市，胜利看来不远了。在他那充满了想象力的头脑里，可能正幻想着以下图景：农民大众揭竿而起，革命法庭审判“嗜血的”地主，帝国主义者、放高利贷者和地主们的权力正在崩溃。让他痛心疾首的是，此时的他却不得不约束自己的行动！

到了汉口之后，他的情绪好多了。这里的气氛比广州还要左。“除了安静的外国租界以外，整个汉口老城都披上了革命的新衣。”一位目击者回忆道，

吴佩孚的衙门已经换了主人。青天白日旗到处飘扬。不同级别的各种军事单位和政治部门都挂起了写有自己单位名称的牌匾，这些不同尺寸和颜色的牌匾随处可见。这些牌匾中间夹杂着它们的上一级单位张贴的官方告示，也不乏五花八门的动人呼吁和悦耳声明。革命看上去就好像一张可以随意涂写的支票，没有人操心它的兑现问题。形形色色的革命组织从地底下接二连三地冒了出来，人们在大街小巷上经常可以碰到这些组织的布告牌。……虽然中共能够控制的实际军事力量相当小，它在各支军队的政治工作中及湖北和湖南两省的国民党省党部中却拥有很大的潜力。……公开演讲不仅流行，而且内容是越左越好。甚至连工商界的大老板们也喊出了“世界革命万岁！”的口号。^[20]

鲍罗廷也在不久后到了武汉。他显得暴躁易怒，斯大林的10月指示把他手中的牌全打乱了。他本来已经制订了一个削弱蒋介石的绝对权力的计划，这个计划是10月初开始筹划的。这时的蒋已经成为国民党右派的旗手，鲍罗廷对这位将军的敌视也有相当一段时间了，他忘不了3月20日的事件。10月下半月，在这位“高级顾问”的一手安排下，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各省和特别市党部

的联席会议，与会者多为左派。对3月20日事件记忆犹新的毛也出席了这次联席会议。会议通过了国民党的新政纲，其内容包括中共在农民问题上所持的大部分温和主张，也就是中共在其中央执委会7月全会上通过的《告农民书》这一公开文件中提出的减租减息之类的要求。另外，在左派的压力下，全会还要求当时尚在法国的汪精卫“销假”回国。这一决定明显是对蒋介石的一个打击，而鲍罗廷还想乘胜追击。他不顾莫斯科给他的指示，一到武汉就会晤了国民革命军西路军的司令唐生智。他告诉唐，他已不再信任蒋介石，现在一切都要仰仗唐了：“谁忠实地执行孙中山博士的主张，谁就将成为中国最伟大的人物。”受到奉承的唐将军眉开眼笑地回答说：“我随时准备执行你的一切指示。”^[21]这次会谈之后，鲍罗廷就一门心思地忙于他与蒋介石的斗争，不再理会斯大林的10月指示。

与此同时，这位“高级顾问”一到武汉就遇到了几个大麻烦。最大的麻烦在于，随着越来越多的军阀武装倒向国民党军队，从来就不曾是自由主义的堡垒的国民革命军的军官团正日趋保守。这些军阀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唐生智。被鲍罗廷草率匆忙地寄予厚望的唐将军无论如何算不上一位左派。他只不过是在玩弄革命辞藻，盘算着在中共和国民党的帮助下赶走蒋介石，自己做总司令。用熟悉唐的一位苏联军事顾问、在华工作时使用过“捷鲁尼”和“捷尔”这两个化名的弗拉基米尔·泰罗夫（捷尔-格里戈良）的话来说，“唐就像一位卖弄风情的漂亮女人……随时准备把自己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唐也不止一次对泰罗夫说：“蒋介石已经累了，休息休息对他来说更好。”但他的这番表白得不到对话者*的任何鼓励。泰罗夫的结论是：“他自己的言行表明，他并不是一个衷心服膺革命的将军。”他还向鲍罗廷透露说，唐一直在幕后与日本人谈判，也在与上海的反动军阀孙传芳谈判。^[22]总之，国民革命军的内部构成上的变化实际上促成了国民党右派势力的迅速崛起，鲍罗廷无力反对这股势力。当时也在武汉冷眼旁观局势发展的张国焘对上述形势有一个精彩的评论，他说，用“美丽的黄昏”来描述这座城市的局势是再恰当不过的了。^[23]左的辞藻的泛滥与实际力量对比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指泰罗夫。——译者注

1926年11月，蒋介石的军队占领了南昌。在这一胜利的鼓舞下，他开始与鲍罗廷直接对抗。作为对这一对抗行径的反应，在我们这位“首席顾问”的倡议下，一个所谓临时党政联席会议于12月13日在武汉成立，该会议还宣称对国民党控制的地区拥有全权。左派人士、司法部长、蒋介石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之一徐谦当选为联席会议的主席。^[24]进入这个机构的，除了国民党左派以外，还有三位共产党员。写有“提高党权”、“汪蒋合作”和“欢迎汪精卫回国”等标语的宣传海报遍地都是。汪尚未回到中国这一事实似乎并没有使任何人感到不安。早些时候装饰着这座城市的“我们支持蒋总司令”的标语如今已被“我们支持中央政府的领导”的口号所取代。^[25]左翼的武汉和右翼的南昌之间的决裂已成不可避免之势。

在临时联席会议于12月13日结束的当晚，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成员们立刻开了一个会，维经斯基和鲍罗廷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讨论了发展中的局势。陈独秀、彭述之、瞿秋白和维经斯基为了这个会特意赶到汉口并逗留了几日。同是中央局成员、自1926年入秋以来一直滞留在武汉的张国焘自然也出席了这次会议。毛泽东以及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和湖南省委员会的代表也受邀与会。

这是一次争论激烈的会议。陈独秀首先做了一个政治报告，报告根据10月指示的精神，指出联合战线内部存在着“极其严重”的破裂的危险。他认为，“国民党现在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大部分都握在右派手里”；这些右派，虽然“拼命地想要平息工农运动，但还没有公开阻碍反帝运动”。他建议，现在要尽一切努力“挽救右派”，使他们确信有必要“使军队与人民联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他尖锐地批评了“广东的同志们”（也就是他的儿子）所犯的“左倾错误”，并提请与会者注意“北京和湖北的同志们”所犯的类似“错误”。在报告的结尾处，他提出了纠正“左稚病”和“挽救局势”的方法。他特别要求缓和城乡的阶级斗争，不要再提可能刺激国民党的那些过分激进的口号。中共的这位总书记还宣称：“我们应当努力向店员和工人们解释清楚，为什么他们不应提出过高的要求。”他还补充说：“在现阶段，对于农民来说，开展减租减息的

斗争要比解决土地问题具有更加迫切的意义。”^[26]

老师的报告使毛深感沮丧。假如五年前有人对他说，这席在共产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话将会出自陈教授这位“思想界的明星”之口，他十有八九会将这个人视为胡说八道的造谣者而加以蔑视。他知不知道陈本人对自己说的话也感到厌倦？他正在被迫劝说同志们相信他自己一点也不相信的论点。

而在当时，我们的这位脾气刚烈的湖南人还不准备不做丝毫抵抗就投降。尽管陈没有点名批评他，毛还是发火了。陈的意见也激起了来自地方的代表们的反对。比如说，广东的“同志们”强调有必要动员群众反击蒋介石，湖南的一位代表要求通过发展农民运动来解决土地问题。这些观点得到了毛的支持，但遭到多数与会者的反对。^[27]会议结束时通过的决议宣称：

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是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28]

因此，中共必须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以推动国民党的军事政权向左”，同时要做民众的工作，“迫使他们稍微向右一点”。会议还决定，共产党员退出湖南和湖北两省的国民党农民委员会的领导岗位，代之以国民党左派。^[29]

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未能扭转形势。这次中央局会议之后，维经斯基去了南昌与蒋介石会谈，这次会谈没有任何结果。回到汉口后，他告诉张国焘：“形势毫无希望。”^[30]（陈独秀和其他中央局成员那时已经回到上海。）1926年12月31日，国民政府主席谭延恺和其他不愿从广州迁都到左派的武汉的保守的政府部长们到了南昌，加入了蒋介石的阵营，尽管第二天左派们就宣布武汉正式成为国民党中国的首都。国民党右翼的力量仍在与日俱增。1927年1月3日，蒋介石在南昌紧急召集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建立一个名曰“临时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反对武汉的权力中心。2月初，他要求召回鲍罗廷，用一个蒋所属意



蒋介石（摄于1927年1月10日）。

的人取代他。蒋特意提出了两个候选人，一个是拉狄克，另一个是加拉罕。^[31]

至于毛泽东，则利用湖南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邀请他莅临大会并做报告的邀请，乘机离开了武汉。党内高层的形势使他心灰意冷，与鲍罗廷的交往也令他心烦。因此湖南之行来得正是时候。12月17日这一天，他人已经到了长沙，那是一座能让他自如地呼吸的城市。

长沙方面为他安排了一个堪称盛大的欢迎仪式。这是他的故乡，那里的人们还记着他，尊敬他，珍视他。之所以如此，还有一个特别原因：共产党人依旧在当地的国民党组织里占据支配地位，这些共产党人中的多数是把他作为一位在事业上取得了辉煌成功的

老乡来予以特别礼遇的。毛毕竟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这就是说，他已经进入了领袖的行列。“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其成员多为中共党员的大会组织者们给他的邀请电中说，“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任感禱！”^[32]为欢迎他的到来而印发的大会报道上写有下面这段话：

毛先生泽东奔走革命，卓著勋绩。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重。去岁回湘养疴，曾于湘潭韶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后为赵恒惕所知，谋置先生于死地，先生闻讯，间道入粤。……先生为发展全国农运，奠定革命基础起见，遂于前月赴长江一带视察农运情形。农民代表大会开幕时，曾电请先生回湘，指导一切，现已抵湘。^[33]

三天后，毛泽东在湖南农民代表大会和湖南工人代表大会的联席会议上做了一个重要演讲。（后者是与农民代表大会同时在长沙举行的。）三百多位代表前来聆听他的讲话，把会场所在地、名为“幻灯场”的当地剧院的小礼堂挤得爆满。毛被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引见给了听众。然而，这位“领袖”的讲话却没有像大多数

激进的代表们所希望的那样革命。可话又说回来，在斯大林的10月指示和中共中央执委会的十二月决议相继做出之后，毛在公开场合还能说什么呢？更何况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的一位代表就是大会主席团的成员。此人就是鲍里斯·谢苗诺维奇·弗莱尔，他的党内化名是英杜斯，真正的名字是西格尔，中国人都叫他布利茨。他是专程到长沙来向湖南工人和农民的代表们表示致意的。毛在讲话中所传递的基本信息如下：

我们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少租额，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的时候。所有这些都是农民问题的组成部分。……农民问题的性质是经济问题。我们现在的要求是减少地租，但是在国民革命时期我们并不要求把土地夺到自己手里。

同以前一样，他在讲话中自然也强调了农民斗争的意义。“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这个问题的解决。……如果农民问题解决了，工人问题、商人问题、学生问题、教师问题和其他问题都将会得到解决。”^[34]

毛的讲话使苏联代表甚为满意，他在一个月后向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执委会报告说，毛做了一个“出色的讲话”。^[35]实际上，毛的讲话回避了所有的实质问题。湖南的共产党人明显感到失望。这些激进分子想从他嘴里听到“人民自己起来重新分配土地”的号召。

在现实与他们的愿望之间，反差太强烈了。毕竟，无论是在湖南、湖北，还是在江西，农民们都没有自己站起来反抗地主。在各地农村，在挺进中的国民革命军的各路大军的后面，力量因之而增强的，并非真正的农民的自发的运动，而是农村游民无产者掀起的骚乱。自古以来农民们都把农村人口中的这个组成部分视为最具破坏性的社会成分。事实是，中国乡村生活的一个典型特征，就在于其社会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分化为贵族和农民，而是分化为两个彼此深刻对立的部分：一部分是拥有土地的农民，包括富裕的农民和仅

能维持温饱的农民；另一部分是没有土地的农民，即农村的游民无产者。由于中国农村人满为患，做不到人人有耕地，因此即使是一个佃农，不管有多穷，与在田间地头四处流浪的这些衣衫褴褛的游民比起来，他依然觉得自己是幸福的。换言之，种地的农民与农村游民无产者之间的鸿沟是巨大的，比富裕的农民和贫穷的农民之间的鸿沟还要大百倍。前面说过，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从未有过固定的、像“农民”和“地主”这样的阶级差别。农民彼此间的差异只能用他们的财产收入水平来衡量，并因此而被归入大地主或小地主或农民之列。当然，这并不是说土地占有者这个阶级内部就没有矛盾了。但是，这个阶级内部的所有矛盾在游民所带来的危险面前，大都黯然失色：后者的犯罪和暴力构成了对所有有土地的农民们的威胁。正因为这个缘故，即使是无地的佃农，其立场也是站在土地占有者一边的。

乡村中存在的强烈的宗族间的对立，使得上述情况更加复杂而严重。农民是生活在一个个共同体里的，从内部维系这些共同体的，是强烈的传统纽带。共同体内部每个人与他人都有着或远或近的亲缘关系，所有人的姓都是一样的。另外，同一宗族的人常常也都是同一个秘密社团的成员。当然，宗族内部各色成员的地位和收入是不同的，在宗族这个共同体内部，既有家财殷实的大户，也有贫困的佃农。但这种情况通常并不会导致日常生活中的不和。农民中间的血缘关系要比阶级意识强烈。比较富裕的宗族成员对同宗的佃户的剥削一般并不很过分，前者以优惠的条件把地租给后者种也是一个惯例。较穷的亲戚有权以优惠条件租种属于本宗族的土地，这一现象也不少见。他们也能享有武装民兵提供的保护。这种民兵，即所谓的民团，是由各村头面人物们出资供养的。这支武装不仅在农民与乡村土匪之间的冲突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在激烈的宗族间械斗中，其地位也是如此。这类械斗相当频繁，尤其是在地处华南的、其社会传统地分裂为较富的和较穷的宗族的那些地区。较穷的宗族在血统上通常是许多世纪以前从北方迁到南方的移民的后代，这些人和他们的先辈一样，无论在文化意义上还是在社会意义上都没有被当地人所同化。即使到了20世纪，南方人依然把

他们蔑称为“客家人”。“客家人”这个词不仅是用来称呼祖先来自北方的那些人的，也可以指其他从外地迁来的人。比方说吧，从广东迁徙到四川的人，从广东和福建迁到湘赣边界地区的人，以及从广东北部边境地区一直迁到河北省南部的人们，都被称为“客家人”。在中国，客家人共有三千多万，其下的各个分支星罗棋布地分布在西起四川东到福建的华南广大地区。土生土长、飞扬跋扈的本地人往往拒绝把肥沃的土地让一部分给这些移民耕种，客家人于是被迫居住在很不适合农业的山地。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他们世代代被迫租种本地人的地，后者不用说是不会错过压榨移民以肥己的机会的。一般说来，四分之一的外来者没有活干。为了谋生，这些人要么做了土匪，要么沦为乞丐。这些客家人是如此贫困，以至于在大部分客家人家里，米饭都被视为难得一吃的佳肴，一年中最多只有三个月能吃上米饭。然而，与他们的贫困相比，更让他们感到不堪的，是他们不得不忍受的日复一日的羞辱。本地人在许多事情上都鄙视他们，既因为他们讲着不同的方言，也因为他们的女人从来不缠脚^[36]。而最重要的一条歧视理由是，很久以前客家人就“背叛”了自己的故土。一个本地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离开故土这件事表明，他们不尊重自己的祖先。这样的人怎么配得到尊重呢?!”这样一来，受压迫的那些宗族不时地起来造反也就不足为奇了。生死相搏的战争随之而来，这类战争经常导致势力较弱的宗族的彻底灭绝。^[37]

饶有意味的是，一般说来，无论是农村游民无产者还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宗族的成员，都不要任何形式的重分土地。他们所孜孜以求的东西，简言之，就是权力。他们想要统治、羞辱每一个境遇哪怕只比他们稍好一点的人，想把他们碾为齑粉。农村游民无产者对生产资料全然不感兴趣，那些较穷的共同体的成员们则深信，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把富裕的宗族斩尽杀绝。与西方不同，中国没有欧洲式的贵族大地产，所有的土地不是由自耕农自己种就是租给别人种，在这种情况下，在平等的基础上面向所有人重新分配土地的一揽子做法势必要伤害到佃农和贫穷的自耕农的利益，即使不会使他们丧失自己赖以养家糊口的所有土地，也不可避

免地会减少其土地面积。倾向于彻底重分土地的唯一社会集团就是依靠救济维生的贫民，他们与土匪和游民无产者不同，尚未丧失从事生产性劳动的习惯或兴趣。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由于受到家长制的和宗族的生活观念的束缚，也很少愿意费举手之劳去耕种地主的土地。在最好的情况下，更准确的说法也许应该是，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会与农村游民无产者为伍，进攻富裕人家，抢夺他们的财物。

农村游民无产者和依靠救济维生的贫民所构成的威胁对于宗族间的矛盾自然会起到一定的缓和作用，但不可能消除这一矛盾。在中国，生活之所以没有沦为无休止的宗族间的战争，其原因在于，除了农村游民无产者之外，所有的农民都还面临着另一个共同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政府。更中肯地说，包括地主和佃户在内的每个农民都深受重税的政府、腐败的官员和军阀出身的寡头之苦。只要税收负担增加，纳税的地主们就不得不增加地租。压迫之重，触目惊心！凭借着武力，军阀们对农业人口进行着赤裸裸的掠夺。税负不限于土地税，还有几十种附加税，如专为抵御自然灾害而征收的灌溉税，名目繁多^[38]，其数量与时俱增，乃至与日俱增。这些税通常都是提前数年预征。比如说，1925年末时，在湖南的一些地区，土地税已经征收到了1931年。还有其他形式的勒索盘剥。农民们得给官员送礼，用奢华的宴席款待他们，还得尽其他义务。唯一能够免于这些苛捐杂税的，是那些由于其家庭背景或其他人脉方面的关系而能得到官僚们或军官们的保护的农村精英阶层。^[39]

显然，农民问题很简单；对于这些问题，并非每个人都有能力找到适当的解决办法。在中国的国情下，如果中共真的想一并夺取国民党内的权力和农村中的权力，共产党人在农村的客观上的盟友就是游民无产者。我们已经看到，毛很早就理解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在1926年1月就呼吁允许这些“粗野的”人们加入农会，绝非偶然。可是，除了他，又有谁更应该知道如下事实，即农会章程禁止接纳无赖和没有正当职业的人呢？农民们不愿意看到游民无产者大量涌进他们的组织，国民党遂对他们做了让步，甚至还专门通过决议，关闭了“盗匪分子”进入农会的大门。不过，碰巧的是，

鉴于农会会员都立下了不赌博的誓言，农村游民无产者自己也没有大声疾呼要加入农会。^[40]如果中共真的想领导一个群众运动，那么，除了这些受到排斥的社会成员以外，它还可以指望处于依附地位的客家人的无条件的支持。它也很有希望获得一部分与富裕农民同宗但在经济上处于最贫穷地位的农民的同情，不过这需要特别高的宣传技巧。这样一来，中共面临的就是一个二者择其一的问题：要么为获得革命的领导权而战，为此需要把农村贫民、游民无产者和与富裕农民同宗的最穷的那部分农民鼓动起来，让他们去反对其余的农民；要么放弃斗争，屈从于正在领导着一场反对军阀的战争的国民党，对这个党保护自耕农的权益和地主特权的政策听之任之。

不难理解的是，在斯大林的10月指示传达到中国以前，包括湖南在内的各地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的、以在未来建立起共产党人的专政为出发点的总的战略方针的指导下，有意识地在农村点起了一场同族相残的战火。

以上局势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在北伐的最初阶段，湖南的农民们态度消极，很少显示出对国民革命军的真正支持；但在新政府建立起来以后，迅速出现了大规模的民众运动。这一运动主要是由那些为了推动革命而深入“人民”中间的共产党人发动起来的。到1926年底时，约有110位共产党的组织者在湖南农村工作，另外还有大量的共青团员在同一地区做着同样的工作；而在该省农村工作的国民党人只有20人。^[41]诚然，要走遍农村、对所有的农民进行宣传鼓动，已有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数量尚不敷所需。然而，在他们的呼吁和口号所激化了的的气氛的感染下，即使是在共产党人鞭长莫及的地区，也爆发了自发的运动。所有意在禁止游民无产者加入农会的国民党的决议和农民们自己制定的这方面的禁令都被弃之不顾，其结果，许多农会的领导权都握在诸如红枪会和哥老会这样的带有土匪性质的秘密社团手里，这些社团总是令普通农村居民恐惧不已。^[42]整村整村的人，包括贫穷的宗族的成员在内，都加入了农会。

一个不足为奇的现象是，“农民的阶级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出来。如果说，1926年7月，湖南省内各种农民组织的成员数是40万的话，到了这年年底，这个数字已经增至130万以上。^[43]“在湖南，失业农民是最勇敢、最具英雄气概的闯将。”由共产党人控制的一个农民协会的会员们曾这样写道，

他们向剥削阶级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给富人戴上高帽子^[44]，游乡、罚款、罚供应吃喝、殴打和算账（等方法都用上了）。……现在，惊慌失措的封建阶级站了出来，四处宣传，说什么湖南农民运动是“惰农运动”，所有的流氓无赖都加入了这个运动；还说什么真正的农民运动还没有起来。^[45]

在国民革命军所占领的其他省份，类似的“革命”高潮也出现了。盗匪行径大规模地爆发。在贫穷的和富裕的宗族之间发生了骇人的族际冲突。

而如今，到1926年12月的时候，因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政策转向，所有这一切都得停下来。向那些杀红了眼的“革命战士”做解释，让他们相信被他们视作敌人的那些人是他们的真正的同志和朋友，这个解释工作真的能做通吗？应当由谁来解释党的这个新政策？该由那些压根就不相信这一套“自由主义者的胡说八道”的人们来做吗？

毛泽东全然无意蹚这趟浑水。但是，为了说服党的领导层——可能的话，还要说服斯大林——相信，向右派让步的政策是错误的，他需要证据。他决定在湖南的几个地区进行调查以便搜集必要的材料来证实他的观点。若干年后，针对类似的情况，他说了一句话：“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46]这句话明白无误地暗示，坐在办公室里高高在上的其他“理论家”们无须花很多时间就可以从别人的调查中坐享其成。

这次调查花了他一个月的时光，时间是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搜集了有关湖南的五个地区的群众运动发展的大量资料。他与之交谈过的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包括“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47]。这番努力的成果，是一篇综合性报告，即《湖

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是在长沙开始动笔写的，开慧在资料整理方面帮了他很大的忙。她对此文的贡献不可谓不大：由于孩子们的外祖母向振熙回了自己的老家，他们不得不在12月雇了一位保姆来照看孩子。

当时的毛住在离长沙市中心不远的名为望麓园的地方。这是一处风景优美的所在，毛所居住的小木屋位于一座小山顶上，从那里可以看到缓缓流淌的湘江对岸的雄伟的岳麓山。小木屋所在的这个地区就是因其所处方位才得名“望麓园”的。^[48]展现在毛眼前的开阔的风景足以使任何诗人诗兴大发，吟出赞美爱情与幸福的高雅的诗歌。然而，他感觉不到任何诗意，驱动他的笔端的只有满腔怒火。他逐字逐句地写下了为劳苦大众的土地革命做辩护的这篇檄文。

报告一开头，毛泽东就声称：“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接着就摆出了他的主要论点：

我想这些情形，很多地方都有。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取舍。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毛所谈论的是哪些“农民”？他想领导的又是什么人呢？

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

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垅）。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殷实的农民们把这类“农民”视为社会渣滓。一窝蜂地涌进农会的贫民们即使对那些不是很富的村民们也很不客气。在各种各样的借口之下，他们甚至不让后者加入农民协会。根据毛本人的报告，“他们提出了一个口号：‘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在有些地方，即使只拥有50亩地，也被称为土豪；所有穿长袍的人都被称为劣绅”。这些人不仅可以专横地给任何人扣上“土豪”和“劣绅”的帽子，然后强迫他们缴纳罚款和补偿金，还殴打那些坐轿子的人。这些贫民认为，坐轿子的人是在剥削轿夫。（其实，所有家境殷实的农民和地主出门都坐轿子。）有些人还干下了其他无法无天的勾当。他们会成群结队地涌进比较富裕的乡邻家里，杀他们的猪，吃他们的谷子。“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有些人甚至敢枪杀富人。贫民们还以取笑富人为乐，毁坏或褻渎以前禁止他们这类人入内的某些神圣的场所。毛泽东写道：

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又有一处地方，因禁止贫农进祠堂吃酒，一批贫农拥进去，大喝大嚼，土豪劣绅长褂先生吓得都跑了。

根据上述事实，毛作出了如下结论：

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

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好得很。……名至实归地说，如果可以给民主革命的成果打十分的话，那么，城里人和军人的成就只有三分，余下的七分成绩应该归功于农村革命中的农民。

读着这份报告，人们不禁为人的变化会如此之快而感到吃惊。在做出暴力的和流血的革命是无效的断言之后仅仅七年，这个一度信奉自由主义的热情澎湃的年轻人就把如此多的仇恨泼洒在纸面上，以至于仅仅阅读这些文字就令人不安：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49]

报告差不多写好、只剩下一个结尾的时候，毛泽东不得不返回武汉。离开长沙的他，匆匆忙忙地奔向一个吉凶未卜的未来。他将再一次“到中流击水”，他无意退缩。高傲的湖南人的气质使他决意造反，他已把自己的命运与那些因绝望而奋起一搏的人们联系在一起了。

他于2月12日回到武汉。四天之后，他就此次湖南之行向中共中央执委会提交了初步报告。报告中有下面这句简明扼要的话：“农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阶级的行动都是对的，过分一点也是对的……”^[50]递交了这份初步报告之后，他又埋头继续加工这个报告，并向中央执委会承诺将在几天内提交正式报告。不久之后开慧带着孩子和保姆来到他身边。一家人住在武昌的一栋离城中心不远的共有十居室的相当宽敞的房子里。有一段时间，他的几位党内朋友，包括蔡和森、彭湃和郭亮等人，也住在那里。蔡和森是在1927年3月从莫斯科回国的。^[51]

就是在这里，在2月的下半月，毛完成了他的《报告》并提交

给党的领导层。接下来发生的事是：这份文件被接受了，获得了中共中央局的大多数成员的高度称赞。《报告》在莫斯科也受到了热烈欢迎。1927年3月，总共只有三章的《报告》的头两章在党的主要刊物《向导》上发表了。《报告》的全文则开始在湖南省共产党的周刊《战士》上连载。国民党左派的媒体也刊登了《报告》的部分内容。4月，汉口的一家名为“长江”的出版社出版了《报告》的单行本，瞿秋白为这个单行本作了序。好事还在后面。1927年5月和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政治喉舌《共产国际》杂志用英文和俄文转载了发表在《向导》上的《报告》的头两章。紧接着，苏联亚洲学会的刊物《革命东方》再次发表了《报告》的头两章。最后，在1927年5月，当时还是斯大林的最亲密的伙伴和克里姆林宫实际上的第二号人物的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也积极评价了毛的这份《报告》。

这一反应并不难解释。就在毛在湖南旅行的时候，莫斯科做出了一个决定：鉴于唐生智与蒋介石之间的权力斗争正在激化，应停止退却。于是，一连串发往中国的指令指示中共不要害怕农村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可能性。在斯大林的压力下，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就中国问题通过了一个火药味很浓的决议。这个文件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立刻开展土地革命的要求，却包含了一项指示：有必要把这个问题置于“国民革命运动纲领中的突出地位”。决议甚至强调说，没有必要担心这样做将会削弱反帝联合战线。^[52]1926年12月17日发给鲍罗廷的、带有明确的斯大林个人风格的指示，使新的策略具体化了。^[53]不仅如此，整整两个月之后，斯大林试图在国民党内开始实施一种出其不意的进攻性政策。他是在1927年2月19日爆发了上海工人大罢工的形势下身不由己地做出这一决策的，这一罢工是中共领导的。三天后，罢工发展为反对军阀孙传芳的武装起义。^[54]尽管两天后起义就被镇压下去了，它仍不失为一个迹象，表明整个国家的形势正在迅速地趋于激进。2月，苏共政治局采取了紧急措施，以帮助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迅速回国。苏联领导人把其加强国民党内左派的地位的希望寄托在汪途经莫斯科的回国之旅上。共产国际的

官员们准备在莫斯科与他讨论中国问题。^[55]在这一背景下，新的策略就导致了如下结论：

积极地为国民党左派奠定一个由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工人构成的基础。……应当以清除国民党右派，使他们在政治上信誉扫地，一步一步地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排除出去为目标。……以夺取军队中的重要职位为目标……加强军队中国民党和共产党组织的工作力度。……应当致力于武装工人和农民，把各地的农民委员会改造为事实上的权力机构和武装自卫组织。……志愿的半合法政策是不可接受的，共产党不应当像刹车那样阻挠群众运动。……否则的话，革命将面临巨大的危险。^[56]

说白了，毛碰上了好运气。他的《报告》与莫斯科的决议不谋而合。然而，现在就庆功未免太早了，武汉的政治形势仍不稳定。激进的农民运动自然无助于使局势正常起来。到1927年春季的时候，农民运动已经突破了所有的界限，用张国焘的话来说，农运业已达到“疯狂的阶段”。张是中共中央执委会中对毛的《报告》持怀疑态度的少数成员之一。在不少城市中耀武扬威的所谓工人纠察队的成员们的行为也同样出格。大批涌进这些组织里的乌合之众甚至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头面人物们的亲属也动了粗。比如说吧，在湖南，他们逮捕了两个重要领导人的父亲：这两位领导人分别是建设部部长邓守权（音译）和夏曦。后者是中共的一位地方领导人，也是毛泽东的老朋友。由于被捕，这些老人被剥夺了一切生存资料，家产全被没收。^[57]谭延闿的女婿也在长沙被捕并被罚款，虽然谭已在1927年2月和蒋介石分道扬镳，来到武汉加入了左派阵营。在湖南省的醴陵县，农会逮捕了何键将军的父亲，而何键是新成立的国民革命军第五军的军长。唐生智将军的父亲也受到迫害，虽然唐被认为是国民党左派的中流砥柱。^[58]这就难怪唐将军在1927年2月到访长沙的时候，会在与他的日本顾问的私下谈话中不经意地说出下面这番话：“别看省政府暂时握在共产党人手里，他们这些人和他们惹起的这场乱子早晚要被清算，他们的过火行为早晚会被制

止。那时他们的政权必将垮台，新政府将走马上任。”^[59]

1927年3月10—17日在武汉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给这股烈火又浇了一勺油。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压力下，全会通过了一系列旨在限制蒋介石的权力的决议。全会剥夺了蒋将军所担任的一切党内要职，包括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一职。全会还决定对国民政府进行重组，还将劳工部长和农业部长这两个职务分别送给了共产党员苏兆征和谭平山。业已和其他五位中执委候补委员一起被授予了表决权的毛泽东积极参与了全会的各次会议，并在全会辩论中做了多次发言。他和两位国民党左派参与起草了关于农民问题的各项决议和全会对农民的宣言。由于他的影响，全会通过的这些文件和其草案一样激进，特别是后者。该文件直截了当地号召农民起来进行土地革命，换言之，不仅要深入发展矛头针对“军阀、帝国主义者和土豪劣绅”的农民运动，而且还要把农运的矛头对准整个“封建地主阶级”所享有的特权。^[60]

没有参加这次全会的蒋介石被迫声明支持全会的各项决定。但他这样做只是为了争取时间，以便能够给整个“武汉匪帮”以决定性的打击。这一意图很快就昭然若揭了。武汉集团同样也在等待着与蒋介石摊牌的有利时机。全会刚刚结束，他们就给当时正指挥着长江右岸的国民革命军的程潜将军下达了一个秘密指令，要他尽快速捕蒋介石。^[61]因此，全会过后，国民党内的两极对立态势未见缓和，反而更加尖锐了。

3月21日，上海突然爆发了又一场人民起义。这一次，起义总算成功了，统治上海的军阀孙传芳被推翻了。3月22日傍晚，国民革命军进入了已被工人民兵解放了的上海。第二天，也就是3月23日，南京被攻克。这些胜利是如此的始料未及，以至于一时间武汉方面人人都以为国民党的胜利将指日可待。在莫斯科，人们也在庆祝这一胜利，组织了群众集会和游行，天才的马雅可夫斯基到处朗读自己献给“虽不熟悉但亲爱的中国劳苦大众”的“最出色的诗篇”^[62]。

4月1日，汪精卫从欧洲返回解放了的上海，在那里受到民众

的热烈欢迎。4月10日，汪精卫抵达武汉。

同所有其他人一样，毛泽东自然也为革命军的胜利而感到高兴，但他的视线依然聚焦在农村。3月初，根据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的决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昌成立，所址离他家不远。毛泽东被委任为这个教育机构的领导人之一。他同以前一样忙个不停：备课，招募教员，处理资金上的问题，以及讲授他最喜爱的两门课程“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他还要管理学生们的日常生活。新一届学生超过800人，是广州时期学生数量的三倍。^[63]此外，他还继续着其在中共中央执委会农民运动委员会的工作，到处上课，给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和其他机构作报告。3月底，毛又在汉口召开的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筹备会议上当选为新成立的中华全国农民协会的领导人之一。他还是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五名成员之一，并领导着这个协会的组织部。中华全国农民协会当时领导着在全国17个省展开活动的农民协会。^[64]

就在这次筹备会议上，他提出了一个动议，其内容，用他自己后来的话来说，是“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65]。当时在礼堂里就座的还有彭湃、来自江西省的农运组织者方志敏及两个苏联共产党员约克和沃伦^[66]。从我们目前掌握的全部材料来看，当时没有一个与会者反对这个方案。与会者通过了一份决议，该决议批准了毛泽东的建议。这样一来，这个建议就摆在了中共中央执委会的面前。筹备会议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即将召开的第五次党代表大会上认真考虑这个问题。^[67]4月2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毛进入了中央执委会下属的土地问题委员会，以便帮助制定“分给土地与农民”的实施办法。^[68]对他来说，一切都显得再好不过了。

就在这时，毛的家庭又添了人丁。1927年4月4日，开慧生下了他们的第三个儿子。孩子的父亲最初给他取的名字是“岸民”，意思是“到达社会主义彼岸的人民”；后来又改为“岸龙”，意思是“到达社会主义彼岸的龙”。^[69]他用“龙”来比喻“翻天覆地”的农民运动，因为龙在中国民间故事里是一位力大无比的英雄。

可惜好景不长。不久之后，坏消息接二连三传到武汉。帝国主义于3月24日公开干涉中国的内战。在已被国民革命军占领的南京发生了几起针对外国人的居所的攻击行为，包括一位英国领事在内的几个外国人因而受伤；作为报复，该市遭到了英美军舰的炮击。这一事件过后不久，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来到上海，当时的他显然正在准备重演1926年3月20日发生的那幕戏，只不过这一次将会是一个有力得多的终结性行动。维经斯基早在1927年2月底就向莫斯科报告说蒋有反叛的意图。^[70]蒋介石的军队与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冲突越来越频繁。一些地方的工会组织被蒋的军队取缔了。面对这一局面，斯大林显然又退却了，他不愿意激怒蒋介石。1927年3月底，政治局决定对蒋介石做出新的让步。发往中国的多份指示要求中共中央执委会“避免与国民军及其在上海的领导人发生冲突”^[71]。但为时已晚，斯大林的政策遭到了彻底的破产。在已事先获得上海的大商人和上海黑社会组织“青帮”的头头们的支持的情况下，蒋介石于4月12日在上海和华东的其他地区大开杀戒，开始了白色恐怖。

拿下上海之后，蒋立刻就开始与那里的银行家和黑帮头目进行接触和对话。4月7日，蒋从上海银行团那里获得了金额达300万银元的巨额贷款，后者还向他保证，只要他把工人运动镇压下去，还将另外提供700万银元的贷款。与此同时，他与拥有10万武装歹徒的青帮达成了联合行动的协议。作为蒋手下的士兵与青帮歹徒的联合行动的结果，在政变的头两天即4月12日和13日，有五千多人被杀害，还有差不多同样多的人遭到逮捕。

也算造化弄人吧，就在4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土地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做了发言，要求立刻开展土地革命。被来势汹汹的群氓的盗匪行径惹恼了的蒋介石的军官们正在镇压共产党人，此时的毛泽东却一如既往地坚持其使运动激进化的主张。他似乎认为斯大林的新指示并无胜算。“所谓土地没收，”他宣称，“就是不纳租，并无须别的办法。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自动地不纳租了，自动地夺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他就得了。”^[72]



1927年夏天，
被蒋介石逮捕
的行将就义的
共产党人。

上海事变的消息所激起的效果只是火上浇油。接着，4月15日，从广州传来了共产党员被屠杀的消息，那里的将军们选择了蒋介石的道路。三天后，蒋介石在南京宣布成立新的国民政府。这一连串的坏消息使毛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激愤之中。在几位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情绪亢奋的毛开始在土地委员会的会议上讨论一份旨在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草案。然而，这份草案遭到了汪精卫、谭延闿和何键的批评，他们认为，必须避免农民运动中的“过激”倾向。结果，这个委员会白白辛苦了一场。^[73]土地委员会被迫做出如下结论：“问题太重大太复杂了，非征集各省的材料和各方面的意见不能遽尔得到解决的办法。……根本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亦非中央会议所能详细规定。”^[74]毫无疑问，这个结果令毛极为不满。“国民党领导人用空洞、自夸的言辞来掩饰他们全然无意和无力满足农民要求的事实。”这就是他的结论。^[75]

在一定程度上，毛的情绪与蒋介石政变后不久通过共产国际发往中国的斯大林的新指示的精神是一致的。斯大林如今要求中共马上行动起来以使国民党左派激进化，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尽其所能地力促汪精卫的支持者投身于真正的社会改造。在执行这一政策的过程中，斯大林对共产国际的新任驻华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



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易。

印度共产党人马纳本德拉·纳特·罗易寄予厚望。此人于1927年3月被派往中国。他的真名是巴塔查利亚·纳兰德拉·纳特。在中国，人们都叫他“罗易”。精力充沛的罗易于4月初到达汉口之后，立刻开始向鲍罗廷和中共领导人陈述了一系列激进观点。^[76]（蒋介石政变之后，中共中央执委会从上海迁到了汉口。）不错，“他能说会道，”多年之后毛以嘲讽的口气谈到了罗易，“能说，而且说得太多了，却提不出任何实现的办法。”^[77]

罗易很快就与鲍罗廷发生了冲突，这也是很自然的。鲍罗廷的直觉告诉他，共产党方面采取的任何一种激进的行动方针都会把国民党左派的将军们推向反共阵营。陈独秀支持鲍罗廷，他也认识到，在现存局势下，实施斯大林的新政策的尝试只会导致一个血腥的结局。4月12日以来，陈“整日整日地沉浸在思考、焦虑和辛勤的工作中，但忧郁的阴影总是死死地缠着他不放”^[78]。他知道，考虑到将不可避免地降落在共产党头上的一切，他面临着与斯大林的一场较量。陈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他在这些年来不得不执行的斯大林的对华政策注定要失败。对此，他可能比中共党内任何其他人都认识得都要清醒。“他竭力想找到一个补救的办法，但苦于力量不足，上天不会降下奇迹。”^[79]张国焘后来回忆说。

中共五大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在上海事变两周后召开的。4月27日，大会在位于武昌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第一小学的一个礼堂里开幕。会场离毛的家不远。大会的开幕式是一场华丽的表演。包括汪精卫、谭延闿、徐谦和孙科在内的许多国民党左派领袖和国民政府领导人都到会表示祝贺。开幕式上充满了连篇累牍的发言和空洞虚夸的辞藻。这是到那时为止中共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党代会，80位代表和20多位来宾在装饰着各种标语和各类旗帜的礼堂里济济一堂。与会代表代表着57 967名党员。想一想吧，在1925年1月中共四大举行的时候，全党只有994名党员。党的队伍的壮大确实使人印象深刻，不过，大会上宣布的这个数字掩盖了一个重

要的事实：在大会召开前夕，在上海和广州这两个最大的城市，中共党组织已被摧毁殆尽。因此之故，实在没有什么可庆贺的理由。事实上，形势是灾难性的，而大会对此却无能为力。

为了庆祝五一节，大会暂时休会。“五一”过后，会场搬到了位于汉口郊区的工人住宅区里的一个属于当地的一家会馆的一栋建筑里。^[80]下面是毛对这次大会的回忆：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 1927 年 5 月在武汉召开的时候，党仍然在陈独秀支配之下。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南京开始袭击共产党，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为地主，就没有再讨论土地问题。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81]

当然，并非党的领导核心内部的每个人都支持已然全无斗志的陈独秀。瞿秋白一如既往地站在毛这一边。大会期间，瞿分发了一本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矛头直指“右倾机会主义”。他固然没有点名道姓地攻击陈独秀，但整篇文章的锋芒都是针对与陈关系密切的彭述之的。作为宣传部主任，彭述之则为让步政策做了言辞尖锐的辩护。毛的密友蔡和森同样为毛做了激昂的辩护。^[82]

在这些有权势的人物的支持下，5月7日，即大会闭幕前两天，中央局提名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这次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把党的最高机构的名称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改名为中央委员会。）毛在党的领导集团中排名第32位。会后，毛还失去了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职务。该委员会重组为农民部，谭平山被任命为农民部主任。

蒋介石和广州的将军们的背叛行径对毛而言具有个人生活、公共关系和政治方面的多重意味和后果。“四一二”政变期间，他的弟弟泽民正在上海，另一个弟弟泽覃在广州。毛不禁为他们的安全担忧。1925年11月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之后，泽民一直在闸北的工人区工作。他是中共中央执委会出版和发行部的领导，同时兼任党中央直属的印刷厂厂长和书店经理。他在上海时使用的化名是杨杰，与他共同生活的是他的第二位妻子、一位名叫钱希均的发行部工作人员。至于泽覃，1927年4月的时候他正在广东省农民协会工作。他也有了第二次婚姻。1925年10月，他的第一位配偶赵先桂受党的派遣，离开长沙去了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专为中国革命者新设立的学校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学习。^[83]在118位前往“红色麦加”朝圣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中，包括蒋介石16岁的儿子蒋经国，他是蒋介石的第一次婚姻的产儿。留在广州的泽覃并不是单身汉。1926年夏天，年方十六、脸庞圆圆的周文楠同她的母亲一起从长沙来到广州。周文楠是泽覃在社会主义青年团里的亲密朋友，她正是应泽覃的要求才来广州的。早在泽覃的妻子去莫斯科前一年，她就已经吸引了毛的这位幼弟的眼球。周文楠抵达广州四五个月之后，他们就结婚了。（当时的革命青年对诸如正式的离婚手续之类的传统习俗根本就不屑一顾，因此，在妻子去了莫斯科之后，泽覃就认为自己是自由身了。）结婚半年后，泽覃的这位心上人加入了共青团；不久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1927年4月的时候，她已经有五个月的身孕了。

幸运的是，毛的弟弟们和弟妹们都安然无恙。他们想方设法，总算逃离了在上海和广州掌权的“白色”将军们的魔掌，最后都到了武昌，在那里受到了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热情接待。奇妙的是，他们是乘同一艘船到武昌的。泽覃夫妇是取道上海去武昌的，他俩在船上与泽民夫妇不期而遇。到武昌后不久，泽民成了国民党左派的报纸《汉口民国日报》的总编辑，泽覃被派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工作，军衔是上尉。在国民革命军各军中，第四军中的共产党员最多。^[84]

与此同时，中共所面临的形势持续严重恶化。4月底，从北京

传来了坏消息。4月28日，李大钊被一个军事法庭处以死刑。他是在4月6日在使馆区内距苏联公使馆不远处被中国警察逮捕的。根据当局的命令，一个警察分队竟然搜查了使馆区。除李大钊之外，中共北方局和国民党的19位领导人也在受到严刑拷打后被处决，其中还有一位是女性。^[85]毛悲恸欲绝。他一直是把李教授作为自己的师长来信赖的。两个半星期以后，也就是5月17日这一天，由夏斗寅将军指挥的、一直被认为是完全忠诚的独立第十四师起兵反叛武汉政府。接着，夏将军调集其军队进攻武汉。只是经过超人的努力，这次进攻才被挫败。（顺便提一句，毛泽东也参加了这次武汉保卫战，他在农讲所的学员中组织了多个武装自卫小组。）^[86]但在5月21日，又发生了新的叛乱。叛乱的组织者是驻守长沙的国民革命军中一个名叫许克祥的团长。此人在湖南的这个省会城市“举办”了一个用鲜血做酒浆的狂欢节。

斯大林再也克制不住他的怒火了，于是开始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系列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指导国民党左派在所有省份开展土地革命，从革命的农民和工人中征募“八到十个师”以“保卫武汉”，坚持不懈地向汪精卫的支持者们解释一个道理，即如果他们不“学会做革命的雅各宾党人，他们将被人民和革命所埋葬”^[8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给鲍罗廷的电报摘录

1927年4月18日

汉口、鲍罗廷

附件呈送陈独秀和（罗易）

不应把土地革命与向北京进军对立起来，请两件事情同时进行，这是取得胜利的关键……

我们建议最高领导人在最小的范围内进行讨论，而在与莫斯科的代表出现分歧的情况下，应当认为，鲍罗廷的意见是决定性的……

决定立即向你们转交300万美元，其中的100万美元已为你们送往上海，其余200万美元将近日送达……

(Н. И.) 布哈林、(И. В.) 斯大林、(В. М.) 莫洛托夫、
米哈伊洛夫 (Л. М. 加拉罕)

外交人民委员部

该电文在 1927 年 4 月 18 日 11 时 35 分发送

(РГАСПИ, Ф. 558, Оп. 11, Д. 799, Л. 83.)

斯大林全然不理解中国各派势力之间的真实关系，因而坚持认为：

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我们要坚定地支持自下而上地夺取土地的行动。……我们需要把新涌现出来的来自基层的农民领袖和工人领袖吸纳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我们必须改造国民党的现存结构。我们必须更新国民党上层，把在土地革命中涌现出的新的领导人安插进去。另外，我们必须增加几百万工会和农会会员，以扩大我们的外围组织。……我们必须结束我们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采取行动的时候已经到了，我们必须惩罚那帮恶棍。^[88]

根据张国焘的回忆，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宣读斯大林的这份电报的时候，“在座的每个人的反应都是哭笑不得。……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还能奢谈消灭不可靠的将军的问题”^[89]？陈独秀只是一个劲地摇头：“季诺维也夫早先命令我们要帮助资产阶级，如今斯大林要求我们在 24 小时以内就开展土地革命。”^[90]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毛泽东找来了他的两个弟弟，想同他们讨论一下当前的形势。他们假装打麻将，以免给开慧增添烦恼。实际上，他们要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毛意识到汪精卫很快就会步蒋介石的后尘，于是说道：“我们不能等着他们来杀我们，我们必须要么随军队离开这里（当时第四军即将开始进攻九江，该市地处武昌东南的鄂赣边界上），要么回湖南。”商量的结果是：两位兄长向党组织要求回湖南工作，泽覃随第四军离开武汉。他们还决定，泽覃的已经怀孕的妻子和开慧及毛的儿子们一起离开武昌回长沙，越

快越好。^[91]

毛随即立刻向陈独秀提出请求，要求派他回湖南工作，以便尽可能多地挽救那里的一切。蔡和森支持毛的请求，建议改组湖南省委，以毛泽东为省委书记。但陈独秀想派毛到四川做党务工作，毛不同意。结果，政治局常委会于6月24日采纳了蔡的建议。毛立刻动身前往长沙。不久之后泽民也去了那里。^[92]

事态继续发展，形势越来越紧张。每个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联合战线正在瓦解。6月中旬，一个消息传开了：冯玉祥这位一度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国际视为最可靠的军事指挥官之一的将军，正在积极准备走蒋介石的道路。几天后，冯发动政变，并在河南省省会郑州进行了一场可怕的屠杀。在武汉，形势也越来越复杂。商业瘫痪，商店关门，工厂停产。每一位商人和实业家，只要有可能，都逃离了这座城市。武汉陷入了名副其实的四面包围之中。市民们的不满日渐累积，螺旋形上升的物价演变成了一场灾难，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政治形势一片混乱。大部分中共中央委员都有一种感觉：“夜幕已降，暴风雨即将来临，他们却在一间漏雨的破房子里徘徊不定。”^[93]

就在这个关头，在重组湖南省党组织的决议做出整十天之后，陈独秀把毛泽东召回了武汉。根据毛的说法，陈担心毛的激进行动可能激起唐生智的叛变。^[94]陈依旧希望能够挽狂澜于既倒。他在鲍罗廷的汉口寓所召开了一次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扩大会议，还与罗易和鲍罗廷讨论了当前的形势。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是白费功夫。在莫斯科的压力下他被迫退让，这时已是7月12日了，距汪精卫与共产党决裂只有三天时间了。中国共产党的失败和与之相连的斯大林的对华路线的失败终成现实。

毛感到震惊。当时的他都在想些什么呢？是在想只要党把土地分给农民一切都可以挽回，还是在想应该把农民和工人武装起来，抑或是在想中共应当退出国民党？也许这三者他都想过。也许他想起了当国民革命军占领了上海和南京时自己曾是多么的喜悦！也许他还想起了当心爱的“小霞”生了第三个儿子时自己的快乐心情。回首过去，在3月和4月的时候，似乎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都预示着胜利！正是在那个春意盎然的时节，带着对未来的憧憬，他登

临了离他家不远的、直插蓝天的黄鹤楼。久久地凝望着远处流向天际的长江里的巨浪，像在他以前数百个登临过黄鹤楼的诗人一样，他诗兴大发，一句句直出胸臆，赋成了一首词：

茫茫九派^[95]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96]。

烟雨莽苍苍，龟蛇^[97]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98]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99]

★ 第二章

通往苏维埃之路

如我们所知，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联系紧密，自始便受到后者的强有力的控制和意识形态压力。这一点正是中共此次失败的主要原因。陈独秀和中央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们没有行动自由，在所有问题上他们都得请示莫斯科；在情势急迫、需要立刻做决定的情况下，至少也得请示莫斯科派来的代表，如维经斯基、马林、鲍罗廷和罗易。这些苏联人在对有关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发号施令的时候，很少理会他们的中国同事的意见。只有中国人在为克里姆林宫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其实对中国问题一窍不通的事实大伤脑筋。共产国际里的每个人都自以为是了解所有国家的革命运动的权威。张国焘曾写道：“我们对这个规矩感到愤怒，觉得它毫无道理，但是鉴于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养成了对莫斯科亦步亦趋的习惯，我们只得默认它。”其结果就是：“中共中央自己没有权力根据它对形势的理解独立地和迅速地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它得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不论大事小事，在所有问题上，共产国际的指示都得服从。”^[100]我们已经看到，这些指示常常缺乏起码的可行性。从1924年到1926年初，斯大林的决策就罔顾事实。在这次革命的最后阶段，当斯大林再次不顾起码的现实，也不经慎重考虑，就要求中共对国民党左派实施果断的进攻政策的时候，特别危急的局势就被制造出来了。

加速了中共的失败的另一个因素是贫民和农村游民无产者在农村制造的爆炸性的恐怖局面，张国焘甚至认为这是一个“主要因素”。^[101]这些疯狂的民众不加区别地劫掠和杀害有罪者和无辜者的

野蛮行为无疑是一个破坏联合战线的非同小可的因素。这类行径的目标多是中小地主，而他们正是包括左派在内的国民党的社会基础。

而今，白色恐怖震撼了中国社会。在农民自卫武装（民团）和业已倒向他们的秘密社会的成员的支持下，国民革命军的军官团毫不犹豫地采取了最残酷的手段。他们想做的只有一件事：复仇。在国民党军队控制的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份，血流成河。在许克祥兵变之后的20天里，在长沙及其周边地区，被杀者超过1万人。^[102]换言之，每天约有500人被处决！恐怖的牺牲者中很多都是中共和农民协会的地方领导人。在毛的故乡湘潭县和常德县，也有1万人被处死。在湘潭，行刑者们“砍下了总工会……主席的脑袋，然后将头颅一脚踢开，接着往他的肚子里灌满煤油，烧掉了尸体”。与此同时，在湖北，比较富裕的宗族的农民们在国民党军队的帮助下将整村整村的村民都杀光了。仅在麻城县，就有几十个村落被彻底夷为平地。行刑者对受害者所干的事情包括：挖出他们的眼睛，割掉他们的舌头，砍下他们的脑袋，砸碎他们的骨头，砍下他们的腿，朝他们身上倒汽油，然后活活烧死，用烧红的铁块烙他们。“如果受害者是妇女，行刑者就用线穿透她们的乳房，牵着她们在大庭广众面前裸体游街；或者干脆将她们剁成碎块。”在湖北的三个县，政变后头几周就有几千人被杀。^[103]

报复经常采取在西方人看来是最不可思议的形式。父亲曾被农会抓起来的何键将军于1927年末派了一群士兵去韶山掘毛泽东家的祖坟，还准备把挖出来的尸骨抛在那里的几处山坡上。根据古老的民间信仰，这样做会毁掉毛泽东本人的风水。可是，何键的手下并没有把这事干成。这群“丘八”不知道毛的家人埋在哪里，只好向当地的农民求助。农民们断然拒绝与他们合作，于是士兵们开始威胁他们，一个农民就骗了他们：他把这支前来执行惩罚使命的队伍带到了当地土豪家的祖坟前面，士兵们就掘了这些坟。^[104]

组织脆弱、缺乏武装的农会在国民党军队的第一轮打击下就崩溃了。出于对控制了农会的农村游民无产者的恐惧而违心地加入农会的那些农民，无意为了与自己无关的利益而去反抗国民党军队。只要有可能，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扔下手中的长矛，逃之夭夭。手

下只有 1 000 官兵的许克祥竟能控制整个长沙地区，原因就在这里。^[105]事实证明，拥有数百万会员的农会不过是“纸老虎”。

在这个多事之秋，事实证明，毛差不多是唯一的一位能够对形势做出非常清醒的评估的中共主要领导人。这一评估是他对共产党夺取政权所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1927 年 6 月末和 7 月初短暂的湖南之行使他确信，中国共产党人夺取政权的斗争只有具备以下条件才有可能成功，这个条件就是：共产党创立自己的军事力量。如果忘记了这个关键，一切政治游戏、联合战线和民众运动都将不过是一场闹剧。在业已军事化了的的中国，“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06]。换句话说，不应该再玩什么造反游戏，而应退却，以便通过苦心经营，打造一支红军。这支共产党军队的兵源从哪里来呢？毛对这个问题早已胸有成竹，也早就给出了答案：就是那些“很能勇敢奋斗”的农村的贫民和游民无产者。

在 7 月 4 日于汉口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刚从湖南返回的毛指出，挽救党的一个可能的途径就是命令湖南农会“上山”，因为在山区“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毛在这里暗示的是汪精卫的不可避免的背叛）我们即无办法”。这次会议后不久，毛与他最亲密的朋友、如今又住在他家的蔡和森讨论了这个问题，认为不能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他说这话时情绪很激动。蔡当时的感觉很不好，他的哮喘病又发作了，但他同毛一样情绪激愤。在毛的建议下，他立刻致信政治局常委会，要求它“做一军事计划”。^[107]

然而，这个建议当时未获采纳。陈独秀当时仍在台上，7月初的时候，又一场灾难降临到了这位历经忧患的“老头子”身上，使他的精神消沉到了极点。7月4日这一天，他的长子、刚刚被他任命为江西省党组织的负责人的陈延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杀害了。噩耗传来后，张国焘写道，陈的“世界沦入一片黑暗之中，于是他不得不让位于更能干的人们”。张自己恰好就是这些“更能干的人们”中间的一位。^[108]

令毛欣慰的是，在陈独秀隐退之后，由毛的庇护者瞿秋白为首的党的新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临时政治局）^[109]接受了他的“上

山”的主意，但只是作为后备计划。在1927年夏季的危急形势下，共产党人需要的是撤退。在近期内组织反击的任何尝试只会带来更大的牺牲。但是，包括瞿秋白在内的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从来就不曾想到过这个简单的道理。他们心中的怒火还在燃烧，很难克制自己而不去发动莽撞的暴动。8月中旬，他们决定在近期内在湘鄂粤赣四省的农村发动一系列武装暴动，同时在国民党军队，也就是著名的第四军中策动起义。对国民党以血还血的冲动令他们不能自己。他们采纳毛的方案是为了以防万一：如果暴动政策不能奏效，就用毛的方案来补救。^[110]

共产国际也坚持立刻组织武装暴动。但它所发出的指示暂时还没有提到由共产党单独进行的军事冒险，而是说有必要“鼓动国民党左派影响下的群众起来反对他们的上层领导人”。莫斯科强调说，“只有在事实证明国民党的革命性转变已经毫无希望，且在这一失败的同时又出现了新的和名副其实的革命高潮的情况下”，才有必要“建立苏维埃”^[111]。换言之，莫斯科所要求的，是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号，举行反对叛徒汪精卫的起义！

在任何一个讲求实际的人眼里，这类指示恐怕都显得荒谬，但中共领导人还是被迫接受了。党所蒙受的灾难性的失败并没有把他们从斯大林的影响下解放出来，相反，实力受到削弱的中共不仅未能取得独立地位，反而被莫斯科拴得更紧了。斯大林把导致失败的大部分责任都推到中共领导人头上，这一做法使中共的处境雪上加霜。“在（中共）中央委员会里没有一个人具备能够理解目前局势的（社会）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头脑。”他在写于7月初的、致他的两位同志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中就是这样抱怨的。信上还说，对于这样一个中央委员会，人们唯一能够指望他们做到的，就是把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搞砸。信上还想出了一个旨在加强中共的特殊的制度：“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里的各个部、每个省里的地区党组织、这些地区党组织下属的各个部、党的青年组织、中央委员会农民部、中央委员会军事部、中央的喉舌（党报）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都配备党的顾问。”在斯大林看来，“鉴于目前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虚弱、结构混乱和政治上的盲目性以

及不成熟”，这些“保姆”“在现阶段是必需的”^[112]。

早在6月底，斯大林就把他最信任的心腹之一、格鲁吉亚人罗米纳兹派往中国，以替换马·纳·罗易。^[113]他想“清洗出中国”的人，不限于罗易，还有他不再信任的鲍罗廷（鲍氏是在7月底和一组苏联顾问一起离开武汉的）。到8月中旬的时候，此前来到武汉的干部中只剩下布留赫尔（化名为卓伊·弗谢沃洛多维奇·加仑。他在同莫斯科秘密联络时使用的另一个化名是乌拉尔斯基）还留在原地，他现在的身份是共产国际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和罗米纳兹一起工作。在这个危急时刻，布留赫尔的任务是确保把莫斯科提供的金钱安全地送到中国受监护人手里。直到8月底，布留赫尔才离开中国，此后“金融家”的职责就转交给了罗米纳兹。^[114]斯大林的新特使于7月23日抵达，当晚就与瞿秋白和张国焘举行了会谈。多年后张在其回忆中称它是“最糟糕的谈话”。

被他的朋友们称为贝索或罗米的维萨里昂·弗·罗米纳兹是一个性格强硬的人物。他15岁就参加了革命。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库泰斯（他的家乡）、梯弗里斯和巴库的布尔什维克地下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他以其对于死亡的轻蔑而令每个认识他的人感到震惊，不管是他自己的死还是别人的死，他都毫不在乎。1921年3月，他和其他参加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一起，极其残酷地处置了参加喀琅施塔得叛乱的水兵。这场叛乱因其悲惨的起因和结局而闻名于世。他很早就进入了斯大林的核心集团，在后者的支持下，年仅24岁时就成为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



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米纳兹。

员会的书记。他在1925年成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和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位领导人。青年共产国际是隶属于共产国际的青年组织。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不到30岁就已品尝到官僚制度下权力滋味的男人，而权力的腐蚀作用不可能不对他产生深刻的影响。不知是因为近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常常不停地眯眼睛。尽管如此，身高约6英尺、身体结实、头发又黑又密的罗米纳

兹还是一个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他在莫斯科的一些好友看到他就会想起《战争与和平》中的男主角比埃尔·别祖霍夫。^[115]但中共领导人可不会认为这是一个恰当的类比。罗米纳兹的官僚作风和对他们颐指气使的习惯很快就使他们有了格格不入的感觉。他在中国的时候用过两个化名，一个是尼古拉，一个是维尔纳。这位尼古拉下车伊始就冲着瞿秋白和张国焘倾泻了一大堆毫无根据的指责。张国焘写道：

罗米纳兹首先声明，他是共产国际的全权代表，受命到这里来是为了纠正共产国际的某些人和中共中央过去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下的众多错误。说完这席话以后，他没有就当前形势问我们任何问题，而是直截了当地宣称中共中央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我问他中共中央犯了哪些具体错误，他的答复大意如下：中共中央最严重的错误是放弃了争取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的努力……中共中央被某些缺乏阶级意识和革命意志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控制了；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遭到以机会主义的方式而进行的歪曲；共产国际不能再依靠这些动摇不定的知识分子，而必须把一些立场坚定的工人同志大胆地提拔到中共的领导岗位上来，使他们在中央委员会中占据多数。^[116]

罗米纳兹要求尽快召开一次紧急党代表会议以便重组党的领导机构。

莫斯科特使的这个要求激怒了瞿秋白和张国焘，这也是很自然的。但他们又能做什么呢？共产国际的纪律捆住了他们的手脚。何况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们迫切需要莫斯科的金钱。另外，为了实施他们正在计划着的暴动，他们也需要苏联的武器。事实上，就在此时，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同意给中共提供“足以装备一个军”的援助，为此拨给中共1.5万支来复枪、1000万发子弹、30挺机关枪、4座山炮及山炮所需的2000发炮弹。这批军火的总值达110万卢布。按计划，这批军火将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起运，运到共

共产党人将要通过武装暴动夺取的一个中国港口。^[117]为了这批援助，瞿、张二人只得咽下这口气。

同一天晚上，中央委员会收到了湖南省委寄来的一封信。这个省的局势在持续恶化，虽然毛的老朋友、省委书记易礼容想方设法想把局面稳定下来。省委委员们在信上说：“书记毛泽东走后……省委各部工作无不吃紧，盼望毛泽东回湘。”^[118]但是，眼下瞿秋白本人也正处在关键时刻，因而不想放毛泽东走。在即将召开的党的会议上，这个“脾气火爆的湖南人”的支持对瞿来说至关重要，他需要毛这个农民运动权威。7月末8月初的时候，农民武装暴动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中央委员会里热火朝天地进行着，毛自然参与了计划工作。计划的主旨是要贫农在秋收时节起来造地主的反，因为按道理讲这个季节该是佃户与地主结清一年账目的时候。共产党人想用—一个虽说非法但却简单的不还债的主意诱使贫农入其彀中。

在此期间，在7月31日至8月1日的夜间，在中共的精心策划下，驻扎在江西省南昌市的国民革命军的几支部队起义了。起义者是由国民党左派将军张发奎任总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旗下的几个独立部队。当然，张将军本人没有参加起义。就在两天前他还与汪精卫、唐生智和国民党左派的其他重要人物一起在度假胜地庐山开了一次会，会议已决定清洗第二方面军属下各个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张发奎的部队当时驻扎在江西，沿九江至南昌一线部署。党对这次起义的领导由周恩来负责，前文中在谈到黄埔军校的时候我们已经介绍过这个人了。同以前一样，这时的他依然是一位自律甚严、精力充沛和做事高效的干才。当时的周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军事委员会书记，因而参与了这次兵变的准备工作。协助他的有张国焘，他是在起义前夕被罗米纳兹派到南昌的，还有李立三、彭湃等共产党员。直接指挥起义部队的有三个人：贺龙、叶挺和朱德。贺龙曾在湘西当过土匪，时任二十军军长，非常同情共产党人；叶挺是共产党员，曾做过著名的第四军独立团的团长，时任第十一军的一个师长；朱德也是共产党员，时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兼第九军副军长。两万多起义官兵成功地占领了这个城市，但他们并不打算长期坚守在那里。根据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7月24—26

日拟订的计划，他们应该立即远征广东，在那里宣布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政府。8月3日，已经重组为第二国民革命军并由贺龙任总指挥的起义部队撤离了南昌市。然而，他们的南下行程十分艰难。“敌人比我们预想的要强大和狡猾；部队疲惫，且吃不饱；领导人的军事经验相当缺乏；最后，我们没有办法成功地唤起农民，使其觉悟，愿意做我军的屏障。”驻上海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年轻的拉斐尔·M·西塔洛夫（化名伯格）就是这样向莫斯科报告的。^[119]1927年9月末10月初，起义军在广东东部的汕头港一带遭到决定性的失败。他们到那里是为了获取苏联武器。此役过后，起义军就被打散了。贺龙逃到了香港。叶挺和彭湃辗转到了广东省陆丰县，准备在那里建立一个军事上的根据地。朱德则率领一支队伍向粤赣边界艰难地挺进着。

毛泽东没有参加南昌起义的筹备工作。得知起义的消息以后，他迫不及待地想参加起义。8月初，他向中央委员会建议，由他来组织并指挥一支“农民军”，以便支援贺龙。在这个主意的刺激下，瞿秋白于8月3日火速任命毛泽东为湘南特别委员会书记。但就在同一天晚些时候，他又撤销了这一任命。进一步的思考表明，毛的建议是相当不现实的。首先，毛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创建一支军队；其次，如前所述，就在8月3日这一天，贺龙的军队离开了南昌。^[120]

“湖南王”不得不留在武汉。8月7日，他参加了中央委员会的一次紧急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绝密的情况下、在为武汉政府工作的一位苏联顾问的寓所召开的。毛认识这位顾问，因为他们曾在土地委员会里共过事。中国人叫他“罗杜莫”，但他的真名是米哈伊尔·奥西波维奇·拉祖莫夫。在国共两党的联合战线破裂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苏联依然与国民党维持着关系，因此在包括汉口、长沙和广州在内的一些城市里还有一些苏联代表处，甚至还有领事馆。拉祖莫夫夫妇当时暂时住在汉口的前俄国租界里，这是一个安静的、居民多为外国人的住宅区。他们的寓所位于一栋很大的欧式建筑里，这栋楼共有三层，他们住在第二层。毛泽东在8月7日一大早走进的就是这个屋子。几乎同时抵达会场的郑超

麟^[121]后来披露说：

一个外国人坐在前楼看书，不理我们。这是屋主人。……我们到后楼去，那里已经到了好多中国人。我们以后又有人来。人数到齐后，走进来一位身材魁伟的俄国人，皮肤如此白净是俄国人中少见的。秋白正要向我们介绍时，这位俄国同志就自己说：他名尼古拉。后来有些文件常拿N字代替他，他就是罗米纳兹。……时间……短促。……秋白当翻译。^[122]

瞿一脸病容，他患肺结核已经很久了。疾病和经历的事件已经把他完全拖垮了。他说话的时候唾液四溅。每当他激动的时候他都是这样，因而房间里好像有“一团由结核病菌组成的浓雾”^[123]。与毛、罗米纳兹和郑超麟一起与会的还有24人，其中包括另外两个苏联同志。两人中，一位是房间的女主人安娜·拉扎列芙娜·拉祖莫娃（娘家姓是西格罗维奇），另一位是男的，但后来几乎没有人想得这个人到底是谁。^[124]至于开会的房间，则是既拥挤又闷热。

与会者中，有10位中央委员、3位中央候补委员和两位在中共五大上当选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五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由31位正式委员和14位候补委员组成，五大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则由7位正式委员和3位候补委员组成。陈独秀没有被邀请与会，虽然他还住在城里。他是在1927年9月10日才离开武汉前往上海的。^[125]共青团中央的3位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一位工作人员、来自湖南和湖北的各一位代表倒是受邀参加了会议。^[126]

大部分与会者都是毛相识已久的人，只有少数人可能是他不熟悉的。后者中间有一个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的新成员，一个谦恭但非常能干的年仅22岁的年轻人。此人很矮，个头只有4英尺11英寸*，身高只到毛的肩膀。据说他刚从苏联来到武汉，在苏联的时候他先是在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了一个月，然后到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学习了几个月。去苏联以前他在法国工作和学习过，去法国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少年。他最初的名字是邓先圣，意思是“胜过圣人的人”。在5岁的时候他有了一个更谦逊的名字，即邓希

* 1英寸≈2.54厘米。——译者注

贤，意思是“希望做一个贤达的人”。来到武汉从事秘密工作以后，他再次改名，新的名字是邓小平，意思是“小的平安”，这在中国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很难引起人们的关注。毛当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身材矮小的人呢？极有可能没有。但即使他的目光在他身上停留过，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他死后，这个看上去一点也不起眼的人，一个四川客家人家的儿子，竟会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命运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主持会议的是李维汉，他是临时政治局成员、前湖南省委书记。毛与他的相识可以追溯到新民学会时期。罗米纳兹首先讲话。他尖锐地批评了中国共产党人，强调中共犯了“严重的错误”，错误的根源是“非常深刻的”。罗米纳兹讲完之后，李维汉请其他与会者各抒己见。

毛第一个发言，并支持了这位共产国际代表。这样做对他来说并不困难，因为我们知道，他早就要求党实行激进政策了，并且经常反对陈独秀。人人都知道他为了彻底的土地革命进行了多么顽强的抗争。而此时此刻，他的机会看来已经到了。也正因为这个缘故，他首先谈到了在农民运动问题上前任领导班子所犯的“错误”。“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他说，“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公正地说，毛在讲话中确实没有提及陈独秀的名字。顺便说一句，这也是当时党的领导人们的共同立场。这次会议上没有一个中国人点名批评陈独秀。虽然斯大林对他的看法是负面的，陈在他们眼里仍然是“一家之主”，只有罗米纳兹点名攻击了陈。

说完了他的批评意见之后，毛把话题转到了党的基本任务上面。这是他第一次在这么高级别的正式场合说出他的真实想法，这个使他近日来焦虑不安的想法就是，有必要特别关注军事问题：

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有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27]

这席讲话在那个时候非同小可，甚至有点非布尔什维克的弦外之音。共产国际一直在教导各国的共产党人，说在革命运动中他们应当首先依靠广大群众，首先是产业工人，其次才是贫农。这个教诲符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但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和内战中取得的真实经验却正好相反。尽管如此，军事因素的决定性意义依然没有受到重视。把“几百万俄国无产阶级群众参加的一次伟大的社会革命”说成是某种军事政变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包括毛在内，只有五个人发了言。所有这些人讲完以后，瞿秋白做了一个具有自我批评性质的报告。接着大家开始讨论三个决议草案，一个是关于农民斗争的，一个是关于工人运动的，还有一个是关于组织问题的。此外还有一个冗长的《告全党党员书》。最后这份文件是罗米纳兹起草、瞿秋白翻译的。接着，毛又做了一次发言。

这次发言不长，只有五分钟。但非常重要，至少他是这样认为的。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发言也特别重要，因为毛在发言中首次系统地阐述了他在农民问题上所持的所有基本观点，总结了他从农村获得的所有经验。发言内容如下：

一、大中地主标准一定要定，不定则不知何为大地主中地主，我意以为可以五十亩为限，五十亩以上不管肥田瘦田通通没收。

二、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困难的是在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现在应解决小地主问题，如此方可以安民。

三、自耕农问题，富农、中农的地权不同，农民要向富农进攻了，所以要确定方向。

四、土匪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因此种会党土匪非常之多，我们应有策略。有些同志以为只可以利用他们，这是中山的办法，我们不应如此。只要我们实行土地革命，那一定是能领导他们的。我们应当他们是我们自己的兄弟，不应看作客人。^[128]

就这样，毛通过其论辩，就下一步的革命斗争，提出了他自己的基本纲领中的核心观点。他在这两次简短的讲话中所说的一切，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几点：我们必须创建一支由土匪、贫农、贫民和农村游民无产者组成的军队；只要没收地主和农民的土地，我们就能把他们吸引到我们这边。（在农村游民无产者眼里，每个有活干的农民都是“富农”。）几个月之后，他用一个简洁的公式表达了这些思想：“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此后终其一生，他都是这么做的，当然也不乏某些变通。

毛的主张是如此愤世嫉俗，以至于就连罗米纳兹这位绝非软心肠的人也站出来反对了。“我们要使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立，”他表示说，“如开始即要没收一切土地，则必使城市小资产阶级动摇来反对我们。……至于东同志（指毛泽东）提出的会党问题，我们……不利用。”^[129]

然而，罗米纳兹的批评是以友好的态度提出来的。“东同志”可能走得太远了，但他仍是一位真正的左派，他与机会主义者陈独秀不一样！其他人对毛的讲话的反应也差不多。因为哮喘病发作而上气不接下气的蔡和森犹嫌不足，于是力挺这位他从少年时代就结交的朋友。他建议，作为一个“曾经反对过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政策”的人及“要求立即开展土地革命这一倾向的代表人物”，毛应该进政治局。于是，罗米纳兹于会前已拟好的临时政治局的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单上就添上了毛的名字。经投票表决，毛当选为临时政治局的候补委员，在定期举行的第六次党代会召开以前，领导全党的将一直是这个机构。当时的设想是在6个月后召开六大。被选进临时政治局的还有其他15人，其中9人是正式委员，6人是候补委员。政治局成员包括我们已经熟知的下述人物：瞿秋白、李维汉、彭湃、邓中夏、周恩来、张太雷、张国焘和李立三。值得注意的是，蔡和森不在这个名单之中。^[130]

瞿秋白这下满意了。领导层的变动进行得很顺利，陈独秀一劳永逸地下台了，也没有公开反对共产国际的这位代表。多数共产党人已经习惯于对莫斯科俯首称臣。说真的，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没有办法抛弃自己对陈独秀的似乎是根深蒂固的尊重，因而他们只是在

形式上接受了罗米纳兹对党的这位创始人的批判。但大局已定，尊重与否又有多大的区别呢？罗米纳兹不知道的是，瞿秋白于当天深夜就秘密拜访了“老头子”，就诸多问题的处理向他讨教。^[131]

会后不久，瞿与毛就今后的打算谈了一次话。他想让毛去上海，跟他一起在中央共事。共产国际执委会已经决定：工人阶级的上海应该重新成为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所在地。莫斯科依然固守着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的观念。毛却再次要求派他回湖南。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132]根据张国焘的说法，毛“自愿去湖南是在冒很大的风险”，中共的大多数领导人都不太愿意去那个省。^[133]在8月9日召开的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毛的工作安排最终敲定了：瞿要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去组织一次“秋收暴动”。按计划，主要战斗将在湘南进行，为此专门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湘南特别委员会。瞿秋白新任命的湖南省委书记、一个叫彭公达的精力充沛且行事果断的年轻人，与毛泽东同行。此人也是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在许克祥的血腥政变之后，他曾立刻向陈独秀提出了一个计划，其要点是用30万武装起来的农民进攻湖南省省会。此议使他一举成名。

8月12日抵达长沙之后，毛发现形势十分严酷。许克祥显然是铁了心要把共产主义连根铲除。地方党组织几乎被完全摧毁了。3000名党员中只有约100人活了下来。^[134]“对付共党分子，只有一个办法，”多年后许克祥回忆说，“那就是铁腕，因为力量是他们唯一能够理解的语言，也是他们真正害怕的东西。”^[135]毛没有时间谨慎行事，他不得不执行党的领导中枢下达的特别指示：“开始暴动，以发动土地革命，推翻反动统治。”^[136]他还得与苏联驻长沙的新领事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库楚莫夫保持密切联系。库楚莫夫化名马也尔，中国人叫他马可夫，此人同时也是共产国际派驻当地的代表，是同罗米纳兹一起从莫斯科来华的。^[137]



苏联驻长沙领事及共产国际代表库楚莫夫。

8月12日抵达长沙的当晚，毛就在任何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秘密会见了前省委书记易礼容。易当时在党内处于千夫所指的地位，因为他是党内极少数敢于公开指责共产国际在中国犯了“机会主义”错误而又没有勇气承认的人之一。^[138]罗米纳兹自然对他极为反感。但对毛来说，这一点不足以构成与老朋友绝交的理由。两人决定尽快召开一次省委会议。在离开武汉前，毛和彭公达就已计划在8月15日召开这个会议。接着，毛去了板仓，他的妻子和孩子离开武昌后一直住在那里。出于某种原因，他在板仓待了些日子，其时间之长，是当时的形势根本不允许的。他在8月16日或17日才动身回长沙。在长沙城里等他的省委委员们实在等不起了，于是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于8月16日开了这个会。

毛是与妻子、儿子和帮着带孩子同时照顾开慧的保姆一起回到长沙的。这一次“小霞”不想让他一个人上路。也许，直觉告诉她他俩相聚的时间不多了。全家五口就这样一起来到长沙城里。他们住在开慧父亲住过的、被人们敬称为“板仓杨寓”的老房子里。^[139]

毛一回来就召开了又一次省委会议，并在会上做了一个纲领性的发言，扼要阐述了组织暴动所需要做的主要工作。他重复了他在八七会议上提出的意见，认为中共的主要口号应该是没收一切土地。他说：

没收土地要有对象。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没有好多被没收者。被没收的土地既少，贫农要求的土地又多，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140]

的确，跟他以前的数次讲话不同的是，毛在这次会议上没有提到必须没收自耕农的土地，但这绝非表明他已经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就在第二天，他在给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里就坚持认为：

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归之公有，由农协按照“工作能力”与“消费量”（即依每家人口长幼多寡定

每家实际消费量之多寡)两个标准公平分配于愿得地之一切乡村人民。^[141]

他自作主张、特立独行、决不妥协的劲头是惊人的。看来没有任何东西能动摇他的决心。他非常清楚,大多数农民和他所挚爱的农村游民无产者根本就没有重分土地的要求。如我们所知,前者梦寐以求的,只是减税减租;后者则企图瓜分他人的财物。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供的所有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之所以提出“彻底重分土地”的问题,可能只是为了满足一部分一无所有的贫民、最贫困的农民和穷困的客家人的利益。在中国农村这类人数量不少。不要忘了,光客家人就有三千万!然而,最重要的原因还不在这里。到1927年的时候,毛的人格已经定型了。在党内的多年经历使他养成了领导别人的习惯。像许多习惯于发号施令的老板一样,他毫不怀疑自己有权决定每个下属的命运。毛绝对确信自己比农民更清楚他们需要什么。由此可以解释,何以在仅仅数日后,在没收一切土地的主张遭到罗米纳兹的批评之后,他还是坚持这一主张,而且是当着共产国际驻湖南代表库楚莫夫——马也尔的面做此表示的。这一次,他确信中国已经为自己的1917年10月做好了准备。^[142]因此,他认为没有必要“放纵”“地主”和“资产阶级”。

在此后的岁月里,这个“倔强的湖南人”将继续强力推行他的主张。不错,他也将被迫做些机动、妥协和迂回的姿态,但他从来没有背叛过自己的追求普遍平等的理想!

“愚蠢”的农民可能不会行动起来响应他的号召。为了防止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就在这次省委会议上,他还提出了军事因素的特殊意义这个问题:

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

意军事运动。

最后，毛再次提出了他显然喜爱的那个形象化的公式：“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143]

湖南省委的多数成员支持他们所信赖的这位老乡。只有易礼容谨慎地提出了异议：

如果我们现在就没收他们（指小地主）的土地，他们肯定会倒向大地主，站在反革命的阵营里。因此现在不是没收小地主的土地的恰当时机。……分给他们土地之后，农民可能会变懒。如果真是这样，收成就会减少。我担心这样一来会出问题。^[144]

但是没有一个人重视他的话。每个人都确信现在是停止密谋转而打民粹牌的时候了。他们声称：“建立民主革命政府的口号已经过时了。”这些共产党人想在他们自己的旗帜下而非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下起义，并公开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还想砍掉所有被认为是地主的人们的脑袋。至于农民是否需要这些东西，他们根本就不感兴趣。“我们的方法是自上而下进行革命，并且先从事军事运动，然后扩大为农民运动；而不是相反。”彭公达坦承道。^[145]

但是，罗米纳兹控制的临时政治局反对他们的计划。在给湖南的同志们的回信里，毛关于军事与民众运动的关系的观点被临时政治局称为“军事冒险”。信上还说：“中央认为，我们必须依靠民众，军事力量应当是第二位的。”毛提出的立刻和全部重分土地的主张也被否定了。信上说：“现时主要口号是‘没收大地主土地’。”不过，信上强调说，不触动小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的政策仅是出于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前的“策略考虑”。^[146]政治局还以毫不含糊的语气，要求一切工作应当继续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下进行。莫斯科发出的改变口号的指示尚未到达。

湖南省委内部没有一个人同意这个政策，只是由于政治局明确要求必须执行其指示，毛和他的“同事们”才不得不屈服。^[147]后来

的事态表明，他们的屈服只是形式上的。^[148]

在政策争论的同时，秋收暴动的准备工作没有丝毫放松。8月底，湖南省委决定把三支部队联合起来，重点进攻湖南中部地区。这三支部队是，驻扎在长沙以东几个县的一支“农民军”的残部、由一个共产党员指挥的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团，以及安源煤矿的失业工人组成的一支队伍。起义的口号极其简单：“处决当地反动派，没收他们的财产，烧毁他们的房子，破坏交通通讯。”首要目标是夺取长沙。脑子里灌满了俄国经验的大多数共产党人无法想象一场没有城市基础的革命。毛本人愿意进攻这个省会城市吗？他极有可能不想这样做。根据彭公达的回忆，毛极力主张缩小起义范围。^[149]他对起义本身并无兴趣。他早就认为革命已经失败，眼下需要做的是集结几支武装，然后上山。但是他得服从政治局的决定，只是在多年之后他才有能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的同志们身上，而无须考虑后者的真实想法。

为了领导起义，成立了两个委员会。一个是前敌委员会，负责纯军事事务；一个是行动委员会，负责协调发生起义的各县县委之间的关系和行动。毛领导前敌委员会，易礼容领导行动委员会。一切都决定好了以后，8月31日凌晨，毛离开长沙前往湘赣边界，起义将从那里开始。

他最后一次拥抱了开慧。他走得很急。他们决定在他走了以后，她带着孩子和他们的保姆一起回到板仓，和她母亲一块住。分手前她给了他一双新的草编凉鞋，嘱咐他要照顾好自己。让她放心不下的是，几天前他们一起从板仓到长沙的路上毛的腿受了点伤，到分手时走路还有点瘸。她没有陪他去火车站，她的堂弟开明志愿送毛去了车站。他们能直觉到他们永远不会再见面了吗？在那个清晨他们知道他们是在永别吗？毛去了长沙火车站，从那里发出的一列快车将把他带到新的生活之中去，在那个新生活中他将成为“民族的大救星”、“导师”和“领袖”。而她将永远留在过去。

虽说不容易，她和孩子们总算相对安全地在板仓老家生活了一段时间。她是一个在当地受人尊敬的家族的成员，这一身份保护了

她。地方官和军官们都不敢碰英年早逝但人人敬重的教师和教育家杨昌济的女儿。她没有钱，但能不时地收到毛的弟弟泽民从上海寄来的汇款。从1927年末开始泽民就在那里负责中共的出版工作。她思念丈夫，并把这种感情倾注到了下面这首诗中：

天阴起溯风，浓寒入肌骨。
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
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
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
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
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
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150]

只是在毛所率领的红军严重激怒了湖南当局以后，她才遭到逮捕。在共产党军队占领长沙后不久的1930年8月，湖南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官何键将军下令逮捕她。当局悬赏1000银元要她的脑袋。10月24日，她被关进了监牢。一同被关的，还有在那一天刚满8岁的长子岸英和她家忠实的保姆。在她被捕的时候，二儿子岸青号啕大哭，两只小手紧紧地抓住士兵们的大衣。一个士兵随手抓起一件重物砸了他的头部。可怜的岸青倒在地上，得了严重的脑震荡。他从此再也没有从这次冲突所带来的创伤中完全恢复过来。

何键对杨开慧的要求只有一个：与她的丈夫离婚。他估计，只要毛的妻子公开宣布与毛离婚，许多共产党员就会向警方自首。但她拒绝抛弃她的心上人。她遂被移交给一家军事法庭。应开慧的母亲请求，德高望重的北大前校长蔡元培呼吁赦免她，但也无济于事。法庭开庭后，只审理了不到十分钟。例行公事地问了几个问题以后，法官就把毛笔蘸上了红墨水，在审讯记录上写了几个字，然后把笔抛在地上。在中国法庭上，这是宣判死刑时的例行程序。1930年11月14日上午，他们来到她的牢房，要把她押往刑场。与她关在一起的岸英大哭起来。开慧却对他说：“你怎么了？你是我们家的男子汉！我的宝贝，告诉爸爸，不要为我的死而难过。他应

该多多努力，让革命早日成功！”接着她又说了一句：“我死后，我希望家里人不要做俗人之举。”

她是被一个行刑队在长沙城北门外一个叫做识字岭的郊区枪杀的，行刑地点是一个墓地。九个月前，她的堂弟开明，也就是在1927年8月31日护送毛泽东去长沙火车站的那个人，也是在这个地点被处决的。目击者报告说，她是用黄包车送到刑场的，荷枪实弹的士兵们在黄包车两侧一路小跑。在她身中数弹倒下以后，一个行刑者迅速脱下她的两只鞋子，然后将其扔得远远的。这种做法在中国由来已久，目的是避免死者的灵魂回来缠住杀死他或她的刽子手。愿神保佑不会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事毕后士兵们就回到营房吃饭去了。一个观刑的老百姓突然跑过来报告说，“死了的人”还有生命的迹象。七个行刑者不等饭吃完就赶回到行刑现场，把她彻底杀死了。补了几枪之后，这个濒死的女人用她那颤动的手指痉挛性地抓着黑土，他们则一言不发地注视着。

当晚，她的遗体交还给了她的亲属，他们把她运回板仓下葬了。坟墓坐落在一块种棉花的斜坡上，上有松荫遮蔽，离她父母的家不远。不久，当地地下党通过贿赂监狱看守，把岸英救出来了。一个月后，从报上得知妻子死讯的毛泽东给他的岳母寄来30块银元，吩咐用这些钱立块墓碑。“开慧之死，”他写道，“百身莫赎。”^[151]

★ 第三章

井冈山上的红旗

1927年8月31日，毛乘火车第一次前往长沙以南的一个名叫株洲的小镇。在株洲，他与包括他的老朋友朱少连在内的镇党委委员们讨论了起义计划，做出了由株洲的共产党人首先开始起义的决定。他们得炸毁湘江上的一座铁路桥，还要沿着铁路线进行一系列牵制性作战行动。接着，毛泽东到了安源，已计划在安源城外召开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会议是在一个名叫张家湾的村子里举行的。出席会议的党的活动家们决定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这个师的兵员约有五千人。

会后，在一位县委书记的陪同下，毛泽东动身前往安源以北的一个名叫铜鼓的小镇，旨在向驻扎在那里的亲共产党的士兵和贫农们传达把他们改编为第一师第三团的决定。他的心中充满了豪情，已经自视为起义者的领袖。一首新词由此吟出：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152]。

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153]

看来一切顺遂。不料半路上，在离张家湾不远、距铜鼓 35 英里的地方，毛和同行的县委书记潘心源被属于当地民团的一支队伍截住了。民团士兵们不知道他们逮住的是什么人，但拿定主意无论如

何要把他俩带去见他们的头头。局面一下子变得恐怖起来。当时白色恐怖依然在肆虐，被抓的这两个人有可能直接就枪毙了。毛对埃德加·斯诺谈起这件事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 1 码 \approx 0.9 米。——译者注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154]

精心准备的暴动于9月9日打响了，最终却以惨败告终。当然，本来就不可能有更好的结果。无论是态度消极的农民，还是士气低落的铁路工人和矿工，都没有给起义的官兵们以任何实际支持。彭公达写道：

农民们没有起来，他们的领导人缺乏决心。军事行动一结束，对农民的政治影响也就结束了，党组织也就不见了。……遭到这么多挫折以后，劳工运动的起义勇气已经丧失大半。未能把铁路破坏掉，对长沙暴动的进行是一个沉重打击，迫使我们停止了长沙暴动。^[155]

在这种形势下，9月15日，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湖南省委委员们根据他们自己对形势的判断，决定放弃进攻这个省会城市，也不在这个城市内部举行起义。这种毫无意义的行动将一无所获，只能带来重大伤亡。现在不是充当英雄好汉的时候，退却的时机到了。

毛泽东把残余部队集结到长沙以东60英里的一个名叫文家市的小镇，然后宣布了他的意图：部队将沿着湘赣边境南下，向一个叫做井冈山的高山地区进军。^[156]这个交通不便的山地位于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长期以来一直是叛乱者和土匪的庇护所。在毛看来，“对于我们正在建立的那种机动部队说来，井冈山证明是绝好的根据地”。用他的话来说：

它有很好的天然屏障，种的农作物足够供给一支小小的军队。它方圆有五百里，纵横约八十里。本地人有另外的名称，叫它大小五井。……五井这个名称是从山麓五口大井得来的，即大、小、上、下、中五井，山上的五个村就是以这五口井相称。^[157]

这个地方的地形特征是，既有高耸入云的山峰，又有陡峭如削的悬崖，二者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总的说来，它是个理想得不能再理想的避难所。

9月21日，1500名筋疲力尽的战士，也就是第一师的全部残余人马，脖子上系着作为起义标志的红布条，开始了艰难的行军。“当时部队的纪律差，政治训练水平低，指战员中有许多动摇分子，开小差的很多。”^[158]毛泽东回忆说。一个当时曾参加这次行军的普通士兵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同样阴暗的图画：“我们的部队不熟悉周边环境，准备不足，疟疾流行，这次远征又赶上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还缺乏后方基地。所有这些加起来，导致了大量的减员。”^[159]直到10月27日，毛的这支已在途中减员三分之一的队伍，才到达茨坪镇。这是井冈山地区一个主要的居民点。到了茨坪之后，部队就在一块遍布着纵横交错的稻田的宽阔的谷地上驻扎下来。这个谷地位于五指山的山脚下。此山海拔5700英尺，是那一带最高的山。

站在谷地上举目四望，看到的都是陡峭且高耸入云、覆盖着四季常青的植被的崇山峻岭。^[160]

一个月以后，根据毛的提议，建立了两个政权机构。一个是立法机构，叫工农兵代表大会；一个是执行机构，叫人民委员会。他暂时没有使用“苏维埃”这个词，但这些机构实质上就是苏维埃。他很快就遇到了一大堆难题，这也是很自然的。他需要在一个不熟悉的新环境中做事情，排外的本地人常常对不请自来的外地人持敌视态度，本地人的特殊方言也是包括毛在内的许多官兵听不懂的。

在这个天高皇帝远、湘赣两省政府都管不到的穷地方，人们在生活中遵循的是他们自己的传统法规。这个地方的经济，用毛自己的话来说，“还停留在杵臼时代”^[161]。这句话的意思是，住在这里的山里人依然在用研钵和碾槌来给谷物去壳。只有在山下的平谷地区才能见到使用人力的磨坊。在这里掌权的是几伙亡命徒，他们的头头是袁文才和王佐。用老式的手枪、来复枪和刀剑武装起来的600个匪徒奴役着拥有15万人口的整个宁冈县。^[162]因此，可想而知，要想成为“井冈山的人”，毛首先得与这帮在这一带打家劫舍的“好汉”建立起友谊。这事他做得很成功。他事先为这次相遇所做的准备并没有白费。其结果就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成了“山大王”。^[163]

毛结交这两位“绿林兄弟”的历史很值得说一说。袁文才和王佐在当地都属于低人一等、生活贫困的客家人，他们的祖先是在这个山谷地带已经得到充分开发以后从广东或福建迁来的。换句话说，这两个人虽然是在井冈山土生土长的，但都不被视为本地人。袁、王二人对山谷地区的居民没有好感也就不难理解了。和每一个存在着类似情况的地方一样，这里的本地人也摆老资格，瞧不起后来的人，还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无情地剥削他们。因此之故，袁、王二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加入了一个名曰“马刀队”的土匪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都是跟他们一样的“外地人”。后来他俩成了这个集团的头头。再后来，他们开始向当地居民强索贡赋，并用中世纪的手段残酷地惩罚那些胆敢抗命的人：砍掉后者的脑袋并把其头颅插在杆子上示众。在这个团伙中，袁是老大，王尊称他为“大哥”。

土匪们的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

1927年10月初，也就是毛刚刚踏上井冈山的土地的时候，他就派人送给袁文才一封措辞恭敬的信，信中建议两人见一面以讨论当前形势。他还表示，如果袁允许他在这一带驻扎，他将送给他100支来复枪作为见面礼。这个土匪头子只有60支破旧的来复枪，因此无法拒绝这一礼物。但是出于自尊，他不好意思白白收下这批武器而毫无回报。于是，在与毛会谈的时候，他给了毛几百块银元。这是一个慷慨的姿态，也属于典型的中国人的交友之道。这种传统要求接受了别人礼物的主人应加倍地回报送礼的客人，不然的话，他就可能“丢面子”。其实，客人可能认为主人正面临着麻烦。毛当时就是这么看的。他的质朴和礼貌兼而有之的姿态博得了袁的好感。这个土匪头子早就知道毛是中共领导人之一，这样一位大人物竟如此看重他且公开表现出来，令他感到脸上有光。深受感动的袁甚至告诉毛，他一年前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无法弄清这个说法是否属实，但毛假装相信了。他又通过袁与王佐建立了联系，给了他70条枪，还有相当数量的子弹。这位共产党领袖的博学给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王佐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他赞叹道，“跟他谈上一次，真是胜读十年书啊！”^[164]建议毛把茨坪作为根据地的就是王佐，茨坪属于他的地盘。临时医院则设在临近的茅坪，那是袁文才的老家。毛比袁和王大五岁，此二人于是称他为“毛大哥”。根据土匪的惯例，既然结为盟兄弟，他们就用果酒和烤猪肉庆贺了一番。

当然，不可能一切都很顺利。毛的部队和袁、王的手下也发生过摩擦。生性多疑的王佐对这些摩擦尤为恼火。当然，他的不安也是有理由的。在人数上，毛的部队比马刀会多出近一倍。王有一次对袁谈起了他的疑虑。“要是毛夺了我们的权怎么办？”他说，“他会不动声色地吞并我们的人马。”狡猾的袁于是想出了一个旨在把毛与他们拴在一起的主意。他介绍毛认识了他的一位老朋友兼老同学的妹妹，一个来自永新县的迷人的姑娘，推荐她做毛可以信赖的方言翻译。姑娘年方十八，名叫贺自珍（其第一个孩子去世后，改名为贺子珍，意为“珍惜孩子”）。她是在不久前的1927年7月加入

袁的部队的。根据记载，很重旧情的袁对她十分信任。贺自珍与袁的妻子谢梅香也特别要好。王佐对她也很有好感，曾送给她一支毛瑟枪。“自珍”（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是“珍惜自己”）在16岁时就入了党。“白色分子”在当地掌权以后，永新县的党组织立刻派她上了井冈山。她读过不少书，有政治修养，最重要的是，她迷人、有活力、可爱且举止优雅。至于相貌，她有着甜甜的椭圆形的脸、大而有神的眼睛和细腻的皮肤。难怪她小时候还有个名字叫桂圆（意思是桂树园上空的圆月）。^[165]她给毛留下了相当好的印象。她也喜欢他，虽然毛比她大16岁。她知道他结过婚，还有三个儿子，这也是他亲口告诉她的。但是这一切都挡不住她，毛知道如何取悦女人。等到他们彼此熟悉的时候，对她来说，毛的魅力已是她完全无法抗拒的了。他很瘦，头发很长，前额很高，有一双忧郁且漆黑的眼睛。自珍的心确实被他俘获了。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不仅有身体的力量，还有知识的力量。另外，他还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会写诗，熟知文学和民间传统。年轻的贺自珍以前从未见到过这样的奇才。这是一种相互间的爱情呢，还是仅仅是性的吸引？认识他们的人对此看法不一。但谁又知道真相呢？灵魂是善于保密的。

1928年初春，毛请贺自珍抽出点时间帮他整理一下手稿。“不嫌我的字写得差就行。”她就这么答应下来了。第二天她来到他的住处，毛当时的办公地点是在山上的一座庙里，从此他们就生活在一起了。临近5月末的一天，可能是25日，也可能是26日，办了一场“婚礼”。参加者中有媒人袁文才和他的同志们。大家吃了喜糖和一些坚果，还喝了茶。他们说着笑话，开怀大笑，乐了个够。

就在毛忙于安排他的个人生活及在湘赣边境建立苏维埃的时候，中共党内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9月19日，也即毛泽东在文家市集结他的部队的那一天，斯大林终于做出了决定：共产党正式退出国民党，开始进行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斗争。第二天，瞿秋白从苏联驻汉口领事那里收到了这一指令。郑超麟告诉我们：

我还记得9月中旬我同秋白到汉口俄国领事馆去，我在候见室中坐着，他走进里面去，出来后告诉我：“国际有电报来

叫我们退出国民党。”右派国民党和左派国民党已经都把我们开除了。^[166]

9月底，中共领导人们离开汉口，乘船前往上海。^[167]他们在那里继续其高度隐秘的地下活动。罗米纳兹不久也去了上海。10月，共产国际的另一位驻华代表、德国共产党员海因兹·诺伊曼（化名莫里兹）到了上海。他的公开身份是一个名叫格卢伯的澳大利亚旅行推销员。11月，他取道香港前往广州，准备在那里举行新的暴动。历史上被称为“广州公社”的这次暴动同样以失败而告终。众多牺牲者中包括做过鲍罗廷的翻译的张太雷。这次暴动的军事领导人叶挺得以逃命，但也纯属侥幸。

总的说来，白色恐怖加上冒险主义的暴动政策使中共付出了沉重代价。到1927年底的时候，它已经失去了大约五分之四的党员，党员总数从近58 000人锐减为10 000人。

这就是许多共产党人，不仅仅是毛，在1927—1928年的冬天退到农村去的原因。在这些地处边远、交通不便的地区，他们在莫斯科所批准的苏维埃的口号下开始了新的斗争。在这方面，毛也是先行者，虽然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他是用他自己发明的特殊名称来称呼苏维埃的。作为先行者，他遇到了许多难题：同志们的不理解，嫉妒他的人对他的敌意，“左”倾和右倾的指责。早在9月，毛就因为其拒绝进攻长沙的行为而遭到苏联领事兼共产国际代表库楚莫夫的严厉批评。后者在他的报告中及在他于9月16日和17日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几封信里，称湖南省委的“无所作为”是“极端可耻的背叛和怯懦行径”，要求政治局立刻改变省委领导。这位苏联领事确信，如果彭公达和毛泽东没有表现出“极其可恶的中国式的市侩作风”，长沙起义本来是可以成功的。作为对这一指责的反应，瞿秋白命令立刻举行长沙起义。与此同时，他派任弼时作为他的全权代表去长沙。任改组了湖南省委，但彭公达保住了书记职位。然而，任的努力也无济于事。他很快就发现长沙“暴动的时机”已经“失去了”。^[168]

1927年11月7日至14日在上海举行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给

了毛又一次打击。莫斯科的两位特使主持了这次会议。一个是我们的老朋友罗米纳兹，另一个是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奥尔佳·亚历山德罗夫娜·米特科维奇（她的两个化名分别是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奥尔佳）。会议尚未结束，罗米纳兹就于11月10日启程回国了。此二人对政治局工作的干预预先注定了那些丢脸的暴动的组织者将要面临的惩罚的分量。斯大林又要找替罪羊了。同以往一样，莫斯科拒绝承认自己对错误的政治路线负有哪怕是部分的责任。对于毛和他的同志们，会议通过的决议《政治纪律议决案》是这样说的：

湖南省委对于农民暴动的指导更是完全违背中央策略。中央屡次指出湖南暴动应以农民群众为其主力，并且向省委书记彭公达同志当面警告其军事投机的错误，要省委改正此错误。……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于上列执行错误政策之党部执行机关及负责同志，决定下列的处罚。……湖南省委委员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应撤销其现在省委委员资格，彭公达同志应开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并留党察看半年。毛泽东同志……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69]

在这个决议中，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使用了“毛泽东主义”这个词，作为“军事机会主义”的同义词。

四个月之后，也就是1928年3月初，在重组后的中共湘南特别委员会的特派员周鲁上山找到他以后，毛才知道他已被开除出了政治局。这个自信的年轻人因为担任了湘南特委军事部长一职，故自视甚高。^[170]他所代表的那个党委会三个月前，也就是1927年底才成立。中央委员会把改组井冈山地区党的领导机构的任务交给了这个特别委员会，因为当时在长沙的中共全湘委员会差不多已被国民党一网打尽了。

在上海的领导人不能原谅毛的自作主张，于是在1927年12月31日决定，在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有关决定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解除毛的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一向为人克制、遇事沉着的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对毛尤其表示不满。他的这种态度的一个可能的

原因是，他自己并非白璧无瑕。我们知道，他领导的南昌起义也算不上是成功的。周指责说：“毛的部队简直是一股到处流窜的土匪。”还说：“（像毛）这样的领导人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犯了军事机会主义的错误。”湖南省委同意他的看法，称毛的军队完全由“无业游民”组成。^[171]

设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对毛的军队的判断也同样不客气，也并不更准确。例如，共产国际执委会下属的秘密机构国际联络部的驻华代表阿列克山德拉·艾米利亚诺维奇·阿尔勃莱希特（从事地下工作时使用过的名字有阿尔诺、伍德罗和马克斯·哈勃，真名是阿布拉莫维奇）在1928年2月末向莫斯科报告说：“必须建立一支红军，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现有的这些军队既没有基地也没有给养，由此给农民带来沉重负担。其中一些军队就其来源来说具有半土匪的性质，毛泽东的部队就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往往作鸟兽散，进而促使农民们反对他们。最糟糕的是，这些部队进攻过军队*之后，经常一走了之，让农民为他们的行动付出代价。”^[172]

* 指国民党军队。——译者注

党纪处分的消息使毛的心灵受到极大的打击。说话尖酸刻薄的周鲁出于彻底否定毛的领导人地位的明显动机，宣布说中央已经开除了毛的党籍。这一举动使毛更加沮丧。这是一个赤裸裸的谎言，但毛没有办法核实湘南特委的这位特派员的话是否属实。其结果，周鲁把毛排除出了所有与党有关的工作，叫他当了第一师的师长。根据共产党人的逻辑，这就意味着降级。^[173] 作为一位“非党”师长，毛不仅不能决定政治问题，在军事问题上也没有决定权，因为只有党才能领导一切。周鲁还解散了前敌委员会，把第一师的党务权力交给了他所属意的一个团政委何挺颖。何只有22岁。显然，这位特派员的如意算盘是，让这位年轻且缺乏经验的师党委书记成为任他摆布的傀儡。可惜他打错了算盘，何挺颖把毛作为一个理应享有权威的领导人来对待，因为他们一同参加了秋收起义和从文家市到井冈山的艰苦进军。^[174] 周鲁也没有意识到，在第一师中，除了何以外，还有其他对毛忠贞不贰的人。诚然，“开除出党”这件事使毛感到屈辱，但他无意缴械投降。

毛在井冈山最信任的人之一就是他的三弟泽覃。前面说过，在

汪精卫政变前夕，根据毛的建议，泽覃离开了武汉，跟第四军一起去了位于鄂赣边境的九江。他就是在九江获悉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已经开始清洗共产党员的消息的。身处险境的泽覃听从了第四军参谋长、共产党员叶剑英的建议，逃往南昌，希望能够与正在那里准备起义的贺龙的部队会合。然而，等到他赶到南昌城的时候，共产党人已经撤走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国民党军队。泽覃在南昌市的一个城门口被一支巡逻队截住了。幸运的是，他们只是简单地盘问了几句，就放他走了。泽覃说他名叫覃泽，是张作霖大帅指挥的东北军的一个军官，是奉命来谈判的。城防卫队的指挥官相信了他的话。离开南昌后，泽覃一路南下，很快就在距南昌 120 英里的一个地方碰上了起义部队的几个哨兵。他们带他去见了周恩来，周一眼就认出他是毛泽东的弟弟，于是分派他到叶挺部队的政治部工作。他参加了进攻汕头的战役，接着又与朱德的部队会合，随这支部队一起向粤赣边界做艰苦的转移。1927 年 11 月中旬，朱德手下的士兵在粤赣边境遇到了毛手下的一群战士，后者来自毛所指挥的那个师下辖的一个营。这个营在被国民党军队切断了与主力部队的联系之后，正在边境一带的山地转战。朱德和泽覃从这些战士那里得知了秋收起义的消息及毛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消息。朱德遂决定与毛取得联系，为此，他派毛的这个弟弟先去见毛。泽覃随身携带了朱德致毛泽东的一封信，信上说：“我们两支部队必须联合起来，实施一个合理的军事和土地政策。”^[175]

泽覃于 11 月底安全抵达茨坪。兄弟重逢时浓烈的亲情就不用说了，毕竟血浓于水。泽覃留在毛身边，协助他处理一切。他的新对手周鲁于 1928 年 3 月出现在井冈山，并因自己手中的权力而得意洋洋。党组织的重组刚刚结束，他就命令毛泽东重新部署他的部队，离开茨坪进军湘南，以便支持那一带的农民运动。抗命是不可能的，毛觉得自己的地位还不够强大，因而不能公开抗拒一位党的代表。直到一个月以后，当时已经进军到湘东的毛才说服了周鲁同意他的撤退计划。在湘南并没有出现什么农民运动，毛倒是听说朱德的部队已经出现在井冈山附近。11 月末的时候，这支部队已经从江西转移到湖南南部，现在距井冈山山口已经非常近了。他需要尽快

出发与他们会合。

打从泽覃给他带来朱德的部队已经到达赣南的消息以来，与朱德会师的念头已经在毛的头脑里盘旋很久了。朱德既是个职业军人，也是个老党员，与他会师将大大加强井冈山根据地的实力。朱指挥着一支超过2000人的强大的部队。早在1927年12月中旬，毛就起草了一份与朱德会师的计划并提交给湖南省委，获得了省委的批准。中共中央也很欣赏这个主意，并为此向朱德发出过指示。但是一直要到1928年4月，会师的前景才显得真实可信。两位未来的著名革命领袖的历史性会面发生在1928年4月21日，也可能是22日；地点是井冈山以西的酃县境内的一个小村子。三天或四天之后，两支部队完全会师了。会师以前，湖南省特别委员会已经给未来军队起了个新的名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这个名称是为了纪念北伐战争中著名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读者应该还记得，这个军中共党员占多数。^[176]（1928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工农革命军改名为红军。）

朱德比毛泽东大7岁。在他身上，我们的传主找到了一位他梦寐以求的战友。和毛一样，朱也是出身农家，但他是四川人，该省位于毛的故乡的西北部。他的父亲属于客家人的一支，比毛的父亲穷得多，连自己和全家人的肚子都填不饱，以至于他不得不亲手把自己的五个孩子扔到池塘里淹死。^[177]“我爱母亲，但我怕父亲，也恨他，”朱德于1937年向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坦承道，“我实在不明白父亲为什么那么凶。”^[178]这位未来的总司令算是幸运的，他那杀人狂般的父亲的一个富有的亲戚在他刚满6岁的时候收养了他，并资助他上学。他不仅长大成人，还接受了高等教育。1909年，23岁的朱德考进了云南陆军讲武学堂。该校位于云南这个西南省份的省会城市云南府（现名昆明）。“我的志向一直是做一个军人，”多年后他在与埃德加·斯诺的妻子的谈话中说道，“而这个学堂在当时的中国很可能算是最进步的和最现代化的了。它有严格的校规，所以，能进那个学校学习，我感到非常幸运。”就在同一年，作为一个有着浪漫情怀的年轻人，朱德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从此他全力以赴地投身于“争取共和的斗争”。^[179]与此同时，他也成

为具有黑社会性质的哥老会的成员。这个组织严密的秘密社团已将其网络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层级。1911年，朱德积极参加了反对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到1921年的时候，他已经为自己开辟了一个灿烂辉煌的职业前程：成为云南的一支军阀部队中的旅长。这年9月，他被任命为云南省警务处长。“他在云南省的省会拥有一座宫殿式的住宅。”埃德加·斯诺写道，“他拥有了他想得到的一切：财富、权力、爱情、儿女、名望和一个可以料想得到的安逸的未来。事实上，他还有一个‘坏’习惯，一个唯一的、真正的‘不良’癖好，而正是这一点‘毁’了他的前程。这个癖好就是：他爱读书。”^[180]阅读使他远离了生活的常态，使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产生了兴趣。“我对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兴趣得自我所阅读的关于俄国革命的书刊。”朱德如是说。他放弃了一切，去了欧洲。先到了法国，后到了德国。在欧洲他继续研究军事科学。他在德国遇到了周恩来，受到他很大的影响。正是周说服他于1922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7月，朱从德国来到苏联，成为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名学生，在那里开始研究布尔什维克的社会学和经济学。他在那里读书时使用的俄语名字是达尼洛夫。可是不久之后他就转学到了一所秘密的军事学院。1926年夏天毕业之后，他回到中国，参加了北伐战争。接着，在他的老朋友周恩来的领导下，他在南昌起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他的身体非常强壮，喜欢打篮球，有时与士兵们一起睡在潮湿的地上，在待人接物和衣着方面都很朴实。他的谦虚、直率、宽容和与人为善的气质与风度打动了每一个认识他的人。而他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完全没有政治野心。从一开始，朱德就承认毛泽东在与政治有关的一切事务上的主导地位。在毛这一方面，他也从一开始就明智地注意避免在军事问题上与朱德唱反调。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两人都是一对理想的搭档。^[181]

朱毛会师之后，两人很快就在重返罗霄山脉的中段、恢复井冈山的老根据地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他们把指挥部设在茨坪以北、人烟相对稠密的小镇砬市。周鲁也不再可能挡毛泽东的路了：在回到井冈山后的一次战斗中，他被国民党军队俘获，随即被杀害。

毛朱为自己在井冈山地区的斗争设定的目标是：先巩固这个苏维埃根据地，再努力把他们的势力扩大到湘赣粤三省边境地区的六个县。用毛的话来说：

这一战略同幻想着迅速扩展的党的建议是相反的。在军队内部，朱德和我不得不同两种倾向作斗争：第一种倾向是立即进击长沙，我们认为这是“冒险主义”；第二种倾向是要撤退到广东边界以南去，我们认为这是“退却主义”。在我们当时看来，我们的主要任务有二：均分田地和建立苏维埃。我们要武装群众来加速这一进程。^[182]

对毛来说，与朱的会面还有一个重要意义：正是从朱同志那里他才知道自己并没有被开除党籍。会师后不久，毛又从江西省委那里收到一个好消息：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湘赣边区特别委员会书记。这是毛的一个不小的胜利。早在1927年12月，他就建议要建立这样一个党委会，但没有回音。^[183]现在，随着这个委员会的建立，他再一次把井冈山地区的政治军事大权集中在他一人手中。他自然十分欣喜。1928年11月，毛的权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他成了新恢复的前敌委员会的书记。前敌委员会是一个有权直接向江西省委报告工作的特殊机构，地位高于湘赣边区特委。

众多贫民和游民无产者随着朱德的部队来到井冈山。顺便说一句，因为经济困难，朱德才最终决定让他的部队撤离湘南，上井冈山。

这样做的结果是，到1928年5月的时候，约有18 000名战士聚集到了井冈山。毛本人对他们的评价是：其中的多数人是“军纪很差的乌合之众”^[184]。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对这个武装起来的团伙施予严格的纪律约束。没有一个能够为他们提供衣食的正常的后勤基地，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药品也极度匮乏。来到井冈山的时候，至少三分之一的官兵是伤病员。武器和弹药的生产也是不可缺少的。这支18 000人的部队只有2 000条步枪和少量机关枪。总

之，必须做点什么，不能坐以待毙。毛决定进行广泛的社会经济改革，准确地说，就是开展土地革命。从1927年10月开始，直到那时为止，毛的部队和袁文才、王佐的土匪一直是沿用旧式办法来解决军需问题的。他们向山谷地区的居民征税，并从土豪劣绅家里拿走他们能拿得走的一切。然而，即使抢走了身边和周边的一切，毛也只能做到让他的士兵每人每天获得三个铜板的军饷。这个数目自然是微不足道的，因此，老办法必须尽快改变。

他终于可以把多年来在他的头脑中逐渐成形的关于正义的中国社会的蓝图付诸实施了。我们已经知道，这些想法是极端平均主义的，本质上是反农民的。井冈山地区所有的土地，不管是属于农民的，还是属于地主的，一律没收，归土匪袁文才为首的“边区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所有。然后根据严格的平等原则，依据每户的人口数，在农村居民即这个政权的供养者中间重新分配。土地买卖自然是被禁止的，获得土地的人“均需强制劳动”。

所有这一切都是根据毛个人的指示来实施的。这些措施的准法律基础只是在第四军撤离井冈山前的一个月即1928年12月才提供出来，当时，该地区的苏维埃政府以事后追溯的形式颁布了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在这个问题上，毛也是言行一致的。不要忘了，1927年4月12日，他曾在土地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公开表示：“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他就得了。”他现在就是这么干的。^[185]

在写于1928年11月25日的致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毛汇报了土地改革的情况。从这个报告中我们得知，到1928年6月的时候，井冈山地区的大部分土地已经被没收和重新分配了。其余土地的没收和分配直到这年秋末才结束。这种粗陋的重分土地运动自然激起了许多人的抵抗。反对土改的，不仅有对平均主义毫无好感的地主，还有众多农民，首先是自耕农，后者属于相对富裕的本地人。毛泽东承认：“在家族组织盛行的农村，最大的麻烦不是劣绅，而是各中间阶级。”最强烈地阻挠重分土地的，就是后者。

其结果，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

中心问题”^[186]。这样一来，恐怖就成为生存的唯一手段。“我们今后农村斗争整个的战略是……毫无顾惜的杀戮地主豪绅及其走狗，用赤色恐怖手段威胁富农，使不敢帮助地主阶级。”为了随时实施这一政策，专门成立了由“最勇敢工农分子”组成的“赤杀队”，其任务是对村庄进行游击战式的夜袭。^[187]大部分成员属于贫民、农村游民无产者和客家人的红军士兵自然是热烈拥护这些政策的。“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毛在报告中热情洋溢地写道，“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188]客家人总的说来是一个尚武的族群，打起仗来特别勇敢。

由于井冈山地区日常生活的军事化，到夏末的时候，红军开始取得对国民党的小股部队的小规模胜利。其中，黄洋界之战特别有名。黄洋界位于茨坪的西北方，红军在那里击溃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的一个团。毛欣喜若狂，放眼四季常青的群山，填词一首：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189]

但他高兴得太早了，给养问题依旧严重。红军官兵吃的大部分食物是南瓜，米饭被视为珍馐。别的什么都没有。习惯于吃辛辣食物的南方人算是遭罪了。战士们痛苦地喊出了一个口号：“打倒资本家，吃南瓜！”这种饮食使许多人得了胃病。根据他的女儿的说法，毛在当时患了便秘。他受不了淡而无味的食物，但当地又没有他爱吃的红辣椒。贺自珍亲自用温热的、像肥皂一样的灌肠剂给他灌肠，才缓解了他的病痛。^[190]

到秋末的时候，把“军事共产主义”引入中国的这一尝试已经孤立了毛的部队。毛知道真实的情况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他无意重新审视自己的极端观点。同以往一样，心灵中蕴藏的巨大能力驱使他前行；斗争目标和斗争本身的浪漫主义色彩迷住了他的双

眼；强大的意志力推动着他去克服一切障碍；对专政的威力的信心使他拒绝偏离既定的道路；眼前的困难只是加强了他把自己的蓝图贯彻到底的决心，不管会付出多大代价。

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自认为是与常人迥异和与错误绝缘的人。这种心理难道一点根据都没有吗？虽然身为湖南省一个偏僻地方的农家子弟，但他已经在其生命的历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不仅在这个世界上为自己闯出了一条路，而且还令这个民族的许多优秀的子弟尊敬他乃至害怕他。他怎么能不对自己抱有信心呢？

他不想离开井冈山。从战略上讲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地方：四面环山，山又高又陡，还与湘赣两省有道路相连。在这里可以长时间地组织成功的防御，完全不必惧怕敌人的包围。换了任何一个地方，毛泽东担心，红四军可能陷入“虎落平原被犬欺”的境地。^[191]

可他最终还是不得不放弃这个地盘。1928年12月初的时候，井冈山地区的经济资源几近耗尽。红五军的士兵们在12月初刚到井冈山的时候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这个军是由数月前国民党第五独立师第一团属下的几支起义部队组建的。）红五军军长彭德怀后来回忆说：“当时红四军还是草鞋单衣，冬服未解决，无盐吃，每天三分钱的伙食也难解决。”^[192]1928年5月的时候，受毛指挥的军队总兵力是18000人；这时最多只剩下6000人了。摆在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面前的出路非常明显，那就是离开这个地方，到新的地方去建设根据地，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面临的困难。^[193]

1929年1月初，毛泽东和朱德最终做出决定：把根据地转移到紧邻福建的赣南地区。毛泽东虽然认为新的地区地理位置过于偏远，但他自然也不会不考虑到赣闽边界地区对共产党人来说所具备的大量优势。这个地方人口稠密，而且客籍人很多，在中国甚至有“客家人之乡”之称。此地遍布森林，气候温和宜人，远离国民党所控制的工业中心。因此，毛的部队的主力有很大的胜算在此地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根据地。贫穷的当地客家人大多数是同情共产党的革命的，其中有许多人甚至把红军视为他们的同宗远亲。

1929年1月14日，人数勉强超过3600人的朱毛部队离开井冈山南下。^[194]他们士气低落、体力虚弱。井冈山上的实验失败了，这

一事实对这支队伍中的任何人来说都不是秘密。毛本人在给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里也承认了这一点。^[195]留在那个老根据地的，只有彭德怀指挥的已经重组为红四军第三十团的原红五军的五个连、红四军的伤病员以及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队。所有留守部队统归彭德怀指挥，他此时已被任命为红四军的副军长。

在朱毛部队离开井冈山的数天前，在为红四军和红五军合并而召开的庆祝会上，发生了一起事故，许多人视其为不祥之兆。当毛朱等领导人正在上讲台的时候，为这次会议而匆匆搭起来的讲台因为不够牢固而突然坍塌。人们惊呼起来，朱德竭力想使大家镇静：“不要紧！垮了台，搭起来再干嘛！”^[196]虽然会议没有中断，但不安的情绪却在士兵们的心中久久不能散去。新的考验在等着他们，而这件不吉利的事使他们更加心烦意乱。

★ 第四章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当朱毛在井冈山开展土地革命的时候，蒋介石正在有条不紊地巩固他对中国的统治。1928年中，北伐战争结束，中国在国民党统治下实现了统一。同年6月20日，处在蒋介石的盟友阎锡山的部队占领下的北京，改名北平，意思是“北方的和平”。北京易名前十几天，北京政府的元首、东北的主人张作霖被日本人暗杀，当时日本人对于张在与国民党的战争中的消极表现很不满意。他的继承人、27岁的张学良成为东北的最高统治者，并正式承认了蒋介石的权威。南京被宣布为中华民国的首都。这时的中国下辖28个省和两个地方（内蒙古和西藏）。1929年1月1日，军政时期宣告结束，同时宣布了新的名为训政的阶段的开始，这一阶段将为期六年。换句话说，以苏共在苏联的专政为样板，国民党建立起了其对国家和社会的公开的独裁统治。这种独裁的理论依据，是已故的孙中山提出的，通过军政、训政和宪政这三个阶段逐步过渡到真正的民主的思想。

这样一来，至少在表面上，1925—1927年革命的基本理念已经实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已被制止，全中国的统一政府已经成立。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不同的寡头家族之间的军阀性质的战争仍不时发生。1929年2月到4月，整个华南都被拖进了蒋介石与广西军阀之间的战争。此战过后，蒋介石与国民军司令冯玉祥又打起来了。蒋的军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蒋在所有这些武装冲突中获胜。

统一后的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依然处于对列强的依附地位。虽说从1928年到1930年，大部分大国与南京政府签约，归还了中国

的关税自主权，但是，包括治外法权在内的许多不平等条约依然没有废除。

这段时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共党内都出现了重大变化。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承认革命高潮已经过去，宣称反对冒险主义的暴动政策，主张将重点转到“争取群众的辛勤工作”上来，以便把他们拉到中共这一边。数月之后，1928年6—7月，中共六大召开。由于国内的白色恐怖，大会是在苏联举行的，具体地点是莫斯科省纳罗夫明斯基区内的一个名叫佩沃玛伊斯科伊的村庄。在严密的安全措施的保护下，118位代表来到莫斯科出席了大会，其中，正式代表84名，候补代表34名。安娜·拉扎列芙娜·拉祖莫娃精心安排了他们的出境。1927年8月7日召开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的会场就是她在汉口的寓所。代表中有我们熟悉的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和蔡和森。

当时没有可靠的中共党员人数统计。1927年11月的一次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一项决议，把党证制度和党员登记制度都取消了。大会估计的党员总数是4万到5万人，这个数字与实际党员数差得太远。^[197]在苏联各类学校留学的中国学生参与了会务工作。苏共的第二号人物、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布哈林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名义监控着大会的进程。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他当时正在井冈山进行针对“反革命”的农民战争。

大会表示支持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的各项精神，包括其对“盲动主义”的谴责。除了支持，它还能表示什么呢？中共自1927年后期以来所执行的全部暴动政策都被指责为“错误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再一次全身而退，应为这个错误方针承担责任的自然是党的领导人瞿秋白。大会通过了由布哈林口授的一份决议，该决议把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定义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尽管民族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决议的要点是：在落后的、半封建的中国，不可能实施诸如对作坊和工厂进行国有化、消灭小资产阶级和富有的农民以及深化反对富农的斗争之类的纯共产主义性质的政策。

显然，通过声称一个特定国家接受共产主义变革的程度取决于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布哈林和追随他的中共领导人努力想证明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忠诚。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全然忘记了一个事实：列宁本人早已拒绝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解释。如下文字是这位十月革命的领袖在1922年底写的：“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来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198]这种看法很有趣，不是吗？

更令人吃惊的是，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的所有领导人，包括斯大林在内，都同意布哈林的观点。通过宣讲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教义，他们似乎正在狂热地奉行着一种神圣的宗教仪式，而这个仪式与他们的实际行动毫无共同之处。在苏联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他们追随列宁，极端激进。而无论用什么标准，俄国都不适合搞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的口号似乎是：“照我们说的去做，不要照我们做的去做。”

在大会上盛行的这种气氛的影响下，毛的激进观念遭到了猛烈的抨击。于是就有了来自湖南省委的一位代表说的下面这席话：

在湖南，我必须说……有一种偏向，也就是毛同志的独特的理论。他有一整套思想体系。他对我们都说了些什么呢？他说我们现在正在直接进行工农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说国民党的旗帜已经变黑了，现在我们必须打出我们自己的红旗。我还不得不说的是，毛同志的这种革命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观点已经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开了。^[199]

这里还有一段瞿秋白就若干“同志”在土地问题上的立场所做

的发言（当时他一定想起了毛泽东）：“我们的斗争口号不应当是没收农民土地。去年秋天在我们的同志们中间确实存在过这种错误观点，但中央是反对它的，并曾就这个问题多次发出指示，指出了这一观点的错误。”^[200]后来，在一封专门解释政策问题的信中，中共中央要求毛“联合富裕农民”，认为他们与所有其他自耕农一样是“反对地主”的。^[201]

说实话，对毛的批评并不具有政治上的毁灭性。党的领导人当时还未能与闻毛在井冈山推行的那些政策。他们所严厉指责的，基本上是毛过去所犯的并已得到彻底纠正的错误。周恩来说：“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指毛泽东和朱德）对土地改革和苏维埃组织持什么态度……我们也不知道毛泽东和朱德进行的是哪些形式的斗争。”一位代表直截了当地为毛辩护说：“毛泽东的情况目前已经有所改善。以前他不知道中央的路线是什么，现在省委已经与毛泽东建立了联系，给他下了指示，因此他们已经开始做这个工作了。至于军队，它也已经改变了惯常的做法，开始发动群众了。”^[202]

这就是毛泽东何以不仅没有在六大上被开除党籍反而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的缘故。他毕竟是中共第一块根据地的创立者，而且共产国际当时也认识到了建立一支中国红军的意义。除毛以



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领袖李立三。莫斯科，1937年。

外，还有23人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13人成为候补委员。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推荐下，48岁的工人运动领袖向忠发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从来没有人认为向是一个杰出的政治人物，共产国际支持他是因为他的工人阶级背景。当时莫斯科把中共遭到的所有灾难归咎于下述事实：在党的领导人中知识分子太多了。为了帮助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把诸如周恩来和李立三这样的大知识分子塞进了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周在代表大会结束后立刻就进入了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李立三则是在1928年11月才被选进这个机构的。瞿秋白和张国焘保住了他们在党的最高机构中的地位，但是为了惩罚他们的“盲动主义”，此二人被

留在了苏联。瞿秋白负责领导改组后的中共、共青团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派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各个最高机构的代表团，张国焘做他的副手。^[203]

毛很晚才知道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和中共六大通过的各项决议。与上海的通信很差。直到1928年11月2日，他才收到中共中央在6月4日寄给他的关于“共产国际二月决议”的指示信。至于六大的几个主要决议，他是在1929年1月初、在他即将离开井冈山的时候才收到的。由于某些原因，十一份文件中的三份他没有收到。这三份分别是关于组织问题、宣传鼓动工作和工会运动的决议。尽管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这几份决议否定了他的政策，毛在表面上的反应还是非常积极的。他在政治上已经很老练了，因此没有公开表示他对莫斯科的异议，而只是假装衷心拥护给他的各项指示。事实上，他无意做任何改变。只要他觉得自己还没有能力直接反对克里姆林宫，他就会继续用这种办法来与共产国际周旋。

眼下要做的是给中央委员会一个回复，这事他很快就做好了。回信称：“我们完全同意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另外，“六大通过的各项决议都是非常正确的，我们十分欣喜地接受。”^[204]但是湖南特委的特派员周鲁曾强迫他执行“左”倾方针。毛在给中央的信中写到他“批评我们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205]。在这个问题上，毛还仿佛是顺带地提了一笔：“至于不没收自耕农土地的问题，在边区独立政权控制下的地区，所有的土地都已经没收了，这个问题自然也就不会再出现了。”^[206]这就是说，我当然同意你的意见，但要对既成事实做任何改变已经太晚了。

不用说，1929年4月在赣南制定和颁布新的土地法的时候，相对于《井冈山土地法》，毛泽东不得不做了至少一处重大改变：没收一切土地的条款被一个声明只没收“公共土地和地主阶级的土地”的条文所取代。然而，禁止土地买卖的条文及原则上按每家人口数平均分配土地的条文还是保留下来了^[207]，虽然这些规定明显

地不符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原则。

在各个相应级别的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讨论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的决定和六大的决议，这也在情理之中。毛唯一没有拿出来供大家公开讨论的，是涉及中共对于绿林土匪的策略的几点精神。它们包含在六大的两个决议里：一个是《农民问题决议案》，一个是《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它们谈到了如何争取土匪中的普通成员站到党的一边来。至于所有的土匪头子，包括那些在暴动期间帮助过共产党的在内，都必须清除掉。^[208]在袁文才和王佐也在场的情况下，毛怎么能宣布这些精神呢？

这里不妨把后面的事情提前说一下。毛离开井冈山地区几个月之后，袁文才不知怎么弄到了这两份决议的副本。他把最重要的几点内容读给不识字的王佐听了，还说：“我们对他们再忠诚，他们还是不相信我们。”王佐大发脾气。这件事证实了他所担心的最坏的可能性。袁、王的部队当时驻扎在茨坪以北的永新县。1930年2月，在巩固了他们在永新的地盘之后，这两个土匪对驻扎在井冈山上的彭德怀的部队发起了进攻。彭调集部分兵力予以反击。袁、王与彭的部队在离县城不远的一座浮桥上发生了遭遇战。战斗为时不长，土匪们被打败了。袁、王二人企图逃到山上去，无奈气数已尽：一个被击毙在桥上，一个跳进河里，结果被淹死了。袁、王的部下中，得以逃脱的，只有二百人多一点^[209]，被俘者有几百人。根据客家人的信仰，每个人都有三个魂和七个灵。由于袁、王二人都不是自然死亡，上天不会让他们进天堂，因此，他们的魂和灵将得不到安宁。^[210]

在1936年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毛以轻蔑的口气回顾了这两个人：“后来，当他们独自留在井冈山的时候，他们又恢复了土匪的习气，结果被农民们杀死。当时农民们已经组织起来，建立了苏维埃，能够保卫他们自己了。”^[211]显然，这件事使毛有点心烦意乱。

袁、王二人的事到此还没有完。多年以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0年代初，袁文才和王佐恢复了名誉，他俩的名字写进了革命英雄名录中。显然，没有毛泽东的批准，这件事是不可能发生

的。看来他还是忘不了他们对他的帮助。1965年5月29日，在重上井冈山的时候，毛泽东接见了袁文才的遗孀谢梅香和王佐的遗孀之一罗夏英（王佐生前同时有三个妻子）。在这次会面中，他说了一句话：“袁文才和王佐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有贡献的。”打那以后，中国历史学家开始把袁、王的死因说成是“叛徒的阴谋”。直到今天，关于他们两人的结局，还是这样写的。^[212]

离开井冈山的时候，毛也没有料到仅仅一年之后袁、王二人就会落得个如此下场。他们是在温暖、和睦的气氛中告别的。

朱、毛的部队以相当快的速度向南进军。2月1日，也就是仅仅两周之后，他们到达了一个名叫罗福嶂的山区。该地是客家人聚集区的中心，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这是个穷地方，半饥半饱的佃农占了当地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213]在这种地方停滞不前意味着再次把自己置于无法忍受的生存环境之中，更何况敌军还在红军战士的后面紧追不舍。为了摆脱追军，朱、毛的部队突然北上，接着又向东走，然后再次掉头南下。他们没有办法建立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因此无意中成了名副其实的“飞行军”，这是周恩来在中共六大上对这支军队的称呼。^[214]这支红军中几乎一半人是党员。他们每到一处，就号召无业游民和贫穷的佃农夺取和分配他人的土地，拒付债务，拒缴田租，还教他们组织游击队。他们把每个在他们看来是“反动派”的人都抓起来，嘲弄他们，给他们带上纸糊的帽子，一村一村地游街。在安徽、湖北、广西和广东，共产党人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在彻底根除“反动派”的口号下，毛泽东和朱德不断强化其反对小资产阶级、富裕农民和商人的斗争。在占领了一座商业城市之后，朱德和毛泽东在致该市居民的一份公告中写道：

红军是为工农谋利益的军队，对于商人极力保护，纪律森严，毫无侵犯。鉴于目前粮食供应短缺，特告知你们如下要求：你们须本着友好的精神，为我们筹集5 000元外币以做士兵饷银；7 000双草鞋和7 000双袜子；300匹白布和200个工人。事出紧急，因此必须在今晚8点以前把这些物资和人员送

到我们的司令部。希望你们毫不拖延地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做。如果你们无视我们的要求，那将证明宁都商界与反动派勾结，企图恶化红军的处境。届时我们将被迫焚毁宁都市内所有反动派的店铺，以示对你等背信弃义之警告。勿谓言之不预也。^[215]

1929年5月下旬，在闽西的一次战斗期间，贺自珍生了一个女婴。红军当时暂时占据着龙岩城，但绝无可能固守它。敌军正在迅速逼近，朱、毛军队必须马上撤退。毛只来得及给新生儿取名，名字叫“金花”，别的什么都顾不上了。孩子生下来才半小时，自珍就把婴儿托付给一户农家，还留下15块银元。据她自己说，她当时甚至都没有哭。^[216]她当时难过吗？很可能是，但她是一个坚强的人，能够掩饰住自己的感情。然而不久之后，她就把自己名字中的“自”字改成了“子”字。前者是“自己”的意思，后者是“孩子”的意思。于是，她现在的名字就有了“珍惜孩子”的意思。

“革命胜利了，我们再把她接到身边。”毛对妻子这样说道。他知道对于一个刚做母亲的19岁女人来说，抛弃自己的孩子是多么的不容易。他们的女儿没有得到片刻来自父母的温暖的爱。可是，他无力兑现自己的诺言，无论是毛还是子珍都没有办法找回她。

在与政府军和地方农民自卫武装即民团的持续不断的战斗中，红四军迅速减员，两个月就损失了六百多人。党内斗争也带来了麻烦。4月，一封信从上海不期而至。信中迫切要求毛、朱二人离开部队，但没有提出任何理由。中央还要求红四军化整为零，说这样一来就可以渗透到最广大的地区，进而能够到处点燃土地革命之火。^[217]不用说，毛对此情不自禁地感到不满。待在党的中央机关的那些人正在玩花招。简单地说，新一届中央领导人对毛、朱二人和他们的军队的独立性感到不安。

毛自然马上就明白了这个并不复杂的伎俩。因此，他和朱德都拒绝服从命令。“中央要求我们把部队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大的队伍，隐匿大的目标，”毛在以前敌委员会的名义写给中央的回信中写道，“目的在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理想。”他带着难以掩饰的火气继续写道：

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恶劣环境中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现在从福建来交通极便，以后务望随时派人来视察。^[218]

就在这封信里，毛泽东向中央介绍了他与朱德在井冈山和赣闽边区的作战中发展起来的游击战战术。其原则如下：

- 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
-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 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
- 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219]

毛写道：“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220]

这些就是他在此后多年将继续遵循的原则。后来，印度支那和亚非拉地区的其他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拿起武器的共产党人都采纳了这些战术原则。这些战术后来又被冠名为“人民战争”。许多年之后的1965年3月，毛泽东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对这些原则作了如下解释：“主要是两条，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打我的，又有两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帝国主义最怕这种办法。打得赢，我就把你吃掉；打不赢，我就走掉，你找也找不着。”^[221]

看起来令人惊奇的是，毛泽东的回信没有加剧他与中央的冲突。毛出人意料地再次交上了好运。4月底，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到了中国，进而在一段时间内软化了中央领导人对他的态度。1929年4月，因其“亲富农的右倾观点”，布哈林先后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和苏共第六次代表会议上受到了最严厉的批判。紧接着，苏联开始了一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运动，包括矛头主要针对自耕农的大规模的集体化运动。所有这些变化都源自斯大林。对于这些变化，斯大林都是支持的。在涉及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所有问题上斯大林都是实用主义者。顺便说一句，正是他的实用主义挑起了布哈林“事件”。令斯大林恼怒的是，这位原来“全党都喜欢的人”（这是列宁对布哈林的称呼）竟然会认真看待历史唯物主义，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马克思的物质规律无论对于斯大林还是对于列宁来说，都不是某种金科玉律般需绝对信仰的东西。马克思曾断定：“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222]对此，斯大林继列宁之后直接证实了其矛盾性，尽管他们没有对马克思进行攻击。在宣誓忠实于马克思所说的“存在决定意识”的同时，他们马上就用自己的意志把“落后的”存在一分为二。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是非常相似的。他们都是意志坚定、精力充沛的人，对于他们来说，意志坚定的决定是获得成功的保障。他们试图通过各种途径来实现自己平均主义的思想。

苏共的新方针自然要影响到共产国际的土地政策。到1929年的时候，布哈林在无论是苏共还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中的领导地位对斯大林来说都已经没用了。7月3日，布哈林在共产国际中的职务被免除。此前一个月，斯大林开始着手改变中共的“亲富农”政策。7月7日，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就农民问题致信中共中央。信上说：“不确立一条针对农村各个阶级阶层的正确路线，党要在争取农民群众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这里的首要问题是对富农的策略问题。这是因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同志们犯了最严重的错误。”来信接着说道，“富农”经常“在运动中扮演着或公开或隐蔽的反革命角色”，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来信直接称赞了毛泽东和朱德的行动，说他们的“游击队……在反动派屡次试图镇压他们的情况下，不仅设法保存了干部队伍，还于近期在福建省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223]。

莫斯科反对中国“富农”的斗争的升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俄语中 кулак（“富农”）一词所代表的特定的社会阶层即农村资产阶级，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在中共的文件中，кулак 一词被译为“富农”，而中文中的“富农”在语义上仅与财产有关，意思是“富裕

的农民”。用这个词来表示一个与其他农民不同的一类农民群体，在实践中只会导致共产党人的反农民政策的复活或强化。实际发生的事情是：莫斯科要求把斗争的矛头不仅对准地主，也要对准农民。农民是穷还是富，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具体界定“富”的含义的解释权就握在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手里。

这封信的中译文于1929年11月发表在中共的《共产》杂志上。毛泽东对此自然是欣喜若狂。1930年2月7日，因莫斯科的支持而备受鼓舞的他，颁布了新的《土地法》，这也是他制定的第三部土地法。该法是在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赣西特别委员会、红五军军事委员会和红六军军事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获得通过的，会议是在江西省中部的陂头村举行的。除了规定没收地主的全部不动产之外，《土地法》还规定了以下条款：“自耕农的田地、山林、池塘、房屋，除自食自用外，尚有多余，经当地多数农民要求没收的，苏维埃应批准农民的要求，没收其多余的部分并分配之。”同前两部土地法一样，这部《土地法》确立了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毛泽东把这个原则生动地表述为“抽多补少”。六个月以后，他又增加了一句：“抽肥补瘦。”^[224]

贫穷的客家人欢迎这样的法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他们中的许多人参加了土地革命。在赣南的寻乌县，到1930年5月的时候，已有80%的土地被重新分配。当地的积极分子还编了一首歌，这首歌很快就在客家人和其他人中间流传开了：

穷兄穷弟爱同心，
 穷姊穷妹爱团结，
 团结起来当红军，
 当到红军杀敌人！^[225]

莫斯科的支持来得再及时不过了。在毛获悉莫斯科支持他的立场以前，从1929年6月到11月，他情绪非常消沉。他与中央之间还是没有建立起正常的联系，因此他并不知道政治局已经在6月12日否定了它自己在2月来信中对毛的批评，把这一“错误”的所有责任都

推到了布哈林身上。中共中央如今认为，此人在中共六大上对中共做出了不正确的指示。^[226]

6月的时候，毛遇到的另一件麻烦事是：他与朱德的关系急剧恶化了。朱出人意料地表达了他对毛的不满，因为毛对部队作战行动事无巨细的过度控制，侵犯了本属于他的指挥权。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家长制作风”也开始令他恼火了。几位下级指挥官支持朱德。

毛调派官兵在群众中做宣传鼓动工作的做法，令他们尤其不快。在毛看来，这项工作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毛如今在赣南和闽西大力进行革命宣传的原因就在这里。在他的部队中已有几百个宣传员了，但毛还要士兵们去参加宣传工作。一个同时代人写道：“共产党人在宣传上非常有创造力。因此，一旦控制了（一个城市的）邮局，这些共产党人甚至在信封上也写满了格言和口号。”^[227]在红军的帮助下，把共产主义革命的思想注入农村居民的头脑中，这就是毛在赣闽两省的试验。他自然希望这个试验能够成功。这类宣传活动对士兵们执行的纯军事任务所构成的干扰，毛全然不以为意。

毛朱二人本有可能自己设法化解掉他们之间的分歧，不料1929年5月初从上海派来的中共中央军事部的一位特派员粗暴地干预了正在他俩之间慢慢升温的冲突。此人的名字是刘安恭。这个自负的年轻人才30岁，刚从苏联回国。他在莫斯科的步兵学校读过一年书，因而自认为是军事专家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俄语名字是叶甫根尼·尼古拉耶维奇·迈伊斯基，还有个俄语外号叫“多勃雷伊”，意思是“好心人”。他是不是真的好心人，尚可存疑，但他在毛泽东的命运问题上所起的作用是相当丑恶的。此人并不了解实际情况，但无条件地支持了朱德，很快就给毛泽东扣上了一顶政治上致命的“宗派主义”帽子。他还附和若干军官们的意见，指责毛在红四军党组织中大搞“家长制”。当然，上述言行不可能是他自己的独创，他的苏联教官们教导过这个步兵学校的学生应该如何与“敌人”做斗争。刘安恭一到就被任命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紧接着就开始给这场冲突火上浇油。毛自然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特别令毛恼火的是，刘总是炫耀他在“莫斯科”受过的教育，但对江西的具体情况一窍不通。对毛来说幸运的是，刘整他的

时间并不长，1929年10月，刘在战斗中受到了致命伤。^[228]然而，对于那些从苏联回来的傲慢自大的留学生，毛的敌意始终不减。毛甚至专门针对刘安恭这样的人写过一篇名为《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在1930年5月写成的，同年8月以单行本的形式发表，发表时的题目叫《调查工作》。“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他质问道。锋芒所指，不仅是刘安恭，还隐隐指向许多身在上海的领导人。他还补充道：“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文章接着指出：

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229]

6月中旬，双方的冲突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毛决定辞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他在6月14日给一位聪明且又年轻的指挥官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上称：“我个人身体太弱，智识太贫，所以我希望经过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230]

看来所有这些不顺心的事真的削弱了他的体力，结果，身心俱疲的他患了疟疾。6月底，他放下所有的工作，和子珍一起隐居到了距闽西的古田村不远的一栋两层小楼里，在那儿度过了余下的整个夏天。康复的同时，他用阅读和吟诗填词来打发时间，偶尔也参加党的会议。他仍是前敌委员会成员，但书记的位子已经被28岁的陈毅取代了。陈于1923年入党，是周恩来的老朋友，他们的交情始于在法国时的共同工作。为了向中央汇报工作并请求指示，陈书记于7月下旬动身去了上海，8月底他向中央汇报了朱、毛军队的情况。^[231]然而，如我们所知，当时周恩来、李立三和其他领导人已经站到毛这一边来了。可是毛当时对此并不知情，因而除了等待、焦虑，什么也做不了。

与此同时，他的军队继续控制着客家地区，所到之处到处留下

火光和灰烬。一位同时代人写道：

契约书、地契、债务记录、课税清册（包括纳税人名单和税收账簿）统统被付之一炬。“不（向地主）缴租、不（向国民党当局）纳税、不（向高利贷者）还债”的口号被付诸实施了，过去的税务局统统都被捣毁了，税吏们都被杀死了。暴动中的工农兵用他们的快刀消灭了土豪、绅士（即农村知识分子）、军阀、官吏、国民党党部成员和身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的牧师和传教士。^[232]

但毛的心情依然压抑。8月底，他和子珍搬到了山上的一个竹屋里，他在那里继续着他的休养和思考。他在这个孤零零的小屋门口挂了一块木板，在上面题写了“饶丰书房”四个字。^[233]抑郁使他再也掩藏不住他的伤感和悲哀，这种忧伤使得在他心中一度泯灭的对对他忠贞不渝的开慧的深深的爱又涌现在他的心头。子珍固然年轻美丽，但也很倔强。客家女子素以独立不羁著称，子珍尤甚。毛对她说过一句话：“你是铁，我是钢，碰到一块响叮当。”后来他曾告诉他们生于1937年的女儿李敏，他们之间的辩论经常以吵架收场。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毛常常进行“武力威慑”，援引他的“政治权威”，试图以此压服子珍。他连吼带骂，威胁说要把这个不听话的老婆开除出党，给她口头“处分”。但首先开口求和的人通常也是他。他制服不了子珍。^[234]

因此之故，毛常在凌晨醒来，想起温顺的“小霞”及他和她的儿子们，辗转不安。多年后在一首词中他曾写到“我失骄杨”^[235]。（开慧的姓“杨”在汉语里是杨树的意思。）该词全文如下：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236]。

问讯吴刚^[237]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238]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239]，泪飞顿作倾盆雨。

11月底，刚刚从他的避难所里走出来的毛给上海的李立三写了一封信。当时，由于总书记向忠发能力不强，识字不多，李立三得以一手独揽党的大权。毛请李转告在上海工作的弟弟泽民，说他需要开慧的通信地址。他告诉李：“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原。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240]显然，虽然身处残酷的内战之中，毛尚顾念旧情。也许冥冥之中有某种东西突然使他焦虑不安。难道是一种不祥的预感吗？不管怎么说，在毛想起杨开慧之后仅仅一年，她就死于非命。

在给李立三的信里，毛也谈到了自己以前的导师和领袖陈独秀，在最近几个月里这还是第一次。但这次对陈的态度却是非常消极的。他在信中写道：“独秀近来行动真岂有此理，中央的驳议文件已经到此，我们当普遍地宣传。”^[241]陈独秀又有什么过错呢？1927年9月以来，他一直住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党的领导人仍然秘密地造访他，同他磋商一些问题。当然，在莫斯科的压力之下，作为游戏规则，他们不得不继续在共产党的媒体上进行一场反对他的激烈运动。斯大林曾多次召陈到莫斯科，但遭到了陈的拒绝：他不愿成为克里姆林宫的替罪羊。此外，他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许多新政策也都不满。他不赞同发动起义，并且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是稳定的。陈向以前曾是他的学生的共产党领导人说，国民党赢得了绝大多数居民的支持，因此，不应该把头往墙上撞，应当承认暂时性的失败。他对红军在农村发动的游击战争的态度也非常消极，他指责朱、毛的军队为“缺乏阶级意识的无产者”。他对造访他的向忠发和周恩来说道：“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说的？应当是城市控制农村，还是农村控制城市？”周说道：“根据理论，当然是城市控制农村。”^[242]他还能怎么回答呢？但是，现实使所有的教条都显得苍白无力。党内媒体对陈不公正的批评使他感到恼怒。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中国人对于遭受的侮辱是特别敏感的，而现在他几乎每天都要遭受谩骂。最后陈忍受不住了，他开始进行反击。1929年5月，中国当局夺取了在苏联管理之下的中东铁路，在东北发生的这件事恶化了中苏关系。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新的中共领导人完全支持苏联，甚至赞同苏联使用武力。在

这种氛围下，在此后的七、八两月，陈独秀遭受了党内盲目亲苏的人们的强烈批评。因为陈的言行都是斯大林无论如何不能原谅的。

原来，在1925—1927年革命之后，克里姆林宫的独裁者对中共能够使中国共产主义化的能力感到失望，于是开始执行旨在把中共变为亲苏的、自己的霸权政策的执行者的政策。正是在那个时候，他的民族共产主义思想开始成为一种法律。与那些仍然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的布尔什维克不同，如今的斯大林及其支持者仅仅把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看作加强苏联世界地位的一种手段。现在莫斯科对所有其他革命运动也是这样看的。当然，斯大林没有完全建成自己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监管的组织体系，但是他不仅不愿减少对中共的控制，反而在日益加强这种控制。因此，突然发生的中东路事件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对其忠诚性的一场检验。毕竟，斯大林不能不承认，无条件地保护苏联会最终破坏中共在群众中的影响，因为后者拥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是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命运已经不是他所特别关切的了，他需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今后成为他的全球政策的一个工具。因此，陈独秀的言论对他来说是特别危险的：毕竟陈还是有威望的，但这个人却公开谴责中共所奉行的屈服于苏联国家利益的政策！斯大林需要对他进行惩罚，因此中共中央加强了对陈的攻击。

为了对中共新的领导人进行反击，1929年秋，陈以及仍然忠于他的部分老干部组建了一个特别的派系。但是他们得到的仅是，在被几次警告要遵守纪律之后，1929年11月15日，陈及其四名最为亲近的战友（其中包括彭述之）被开除出党。（1929年12月30日，把他们开除出党的决议得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批准，半年后正式生效。）加入这一派系的其他成员在一个月后也被剥夺了党员身份。^[243]同时，陈独秀通过自己的一些战友（这些人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保持着联系）了解到了托洛茨基反斯大林的一些著作。托洛茨基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其他领导人不同，在1925—1927年革命的过程中一贯支持中共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真正独立。在得知这一点之后，陈独秀感到非常惊喜。1929年12月10日，陈发表了一封致全体中共党员的公开信，其中指责共产国际在

中国的致命错误。最后，1930年初，他在共产党之外另组了一个派系，即所谓的“共产主义左翼反对派”。同年3月，他同其支持者开始出版亲托洛茨基的杂志《无产者》，在这份刊物上继续对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行批评。这样，陈独秀这位中共的奠基人就同他的学生，其中包括曾经喜欢他的毛泽东永远地分道扬镳了。在斯大林看来，托洛茨基主义是反苏主义的一个最恶劣的变种。

毛毫不犹豫地陈独秀进行了谴责。他们早就没有任何联系了，而且他也不会忘记1925—1927年革命的最后数月他们在农民问题上的斗争，何况这次他愿意支持中央的立场。毕竟在收到关于揭露陈独秀的文件的同时，他还收到了一份期待已久的中央的决议，这份决议承认，正确的是他，而不是朱德。这些材料都是从上海返回的陈毅带回来的。他和朱德开始请求毛返回，但高傲和所受的委屈使他没有马上就接受邀请，他仍然在孤独和诗词中度日，而且不仅仅是革命的诗词，还有抒情的：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244]

经过了一个月的讨价还价之后，毛才最终走出他的山中隐居处。他再次成为前敌委员会的一把手，他的对手们纷纷落马，毛可以严厉地惩罚他们，也可以示以宽大。无论是奖还是罚，毛都像一个英明的领袖那样行事自如。

这一次，他决定息事宁人。朱德和他的关系已经恢复了，他们眼前还有许多麻烦事要处理。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向上海方面通报说：“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245]1929年12月，在闽西的古田，毛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代表大会。虽然他在会上尖锐地批判了“纯军事观点”，但同时也暗示了摆脱危机的办

法。^[246]后来，他把在闽西检验过的这个方法称为“治病救人”。

毛所做的这一切很适合中国人所特有的精神气质。中国人的处世哲学认为，消灭对手并不能证明他是错的，你必须让他“丢面子”。如果你的敌人愿意忍辱偷生，你就可以对他为所欲为。届时只有你才能决定是否恢复他的“面子”。所谓允许他人改过自新，指的就是这类事情。列宁或斯大林会认为这种处世哲学是共产党员可以接受的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但是在中国，这是与对手打交道的绝妙方式。当然，毛也并非始终如此行事。毕竟，他不仅是一个中国人，同时还是一个共产党人。总的说来，他只对那些他真诚地认定为不可救药的“阶级敌人”以及在他看来即使“给面子”也没有什么用处的人才使用布尔什维克的方法。

处理完军队内部的关系之后，毛才得以再次把注意力集中到政治问题上来，国内外形势的剧烈变化需要他全力关注。与苏联的全盘集体化相关的苏共党内所谓反右倾分子的斗争的激化，自然对共产国际产生了影响，不仅导致了其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政策的激进化，而且引起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整个策略路线的激进化。在1929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决议中，这一变化就已有了明显的体现。这些决议的矛头直指据说正威胁着所有国家的共产党的右倾危险。在出席这次全会的人们看来，右倾分子的主要错误在于，他们拒绝承认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新的革命高潮的各种迹象”。换言之，他们落到了革命群众的后面。

上海方面于9月底收到的这次全会的各项决议，在中共中央内部引起了混乱。

暴动时期的记忆犹新……随之而来的对盲动主义路线的抨击言犹在耳。……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成员最初倾向于对来自国际的这个指示做谨慎的理解。他们担心，如果对这个警告做过左的理解，可能最终又会碰得头破血流。在与我们讨论决议文本的时候，周恩来在如何理解才算准确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我们翻来覆去地琢磨“подъем”这个词，还研究了决议的俄文本。

“подъем”这个俄语词之所以让中国人感到困惑，是因为它有两种意思，一是“占据上风”，二是“上升”。^[247]

他们想绝对确保他们的苏联老板这一次不会再找他们的茬。因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这次批评的，不是他们的“盲动”，而是他们的消极，而且批评来得很突然。第十次全会明确地把右倾危险列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

以上所述就是30年代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内部占优势的倾向。根本就不可能谈论中共方面的独立性，任何程度的独立性都谈不上。对莫斯科的彻底的财政依赖使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们动弹不得，他们充其量只敢反对共产国际的驻华代表，从来不敢反对莫斯科。主要通过国际联络部这个专门机构汇给上海方面的资金一直在稳步增长。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其金额已达到几十万乃至几百万卢布。1930年一年，仅为培养在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的中国革命者，苏联人就花了500万卢布。这所学校是在1925年建立的，建校时的名称是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248]从1930年2月到9月的七个月间，中共中央从莫斯科那里收到了223 000墨西哥元。^[249]同年10月，它又收到了1万美元。^[250]同样是在1930年，从同样的渠道，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获得了7万银元，共产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中国分部则收到了11 400银元。这个中心是共产国际下属的特设机构，旨在帮助和接济从事地下活动的共产党人和身陷囹圄的革命者的家属。^[251]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产生背叛莫斯科的念头呢？

1929年12月8日举行的中央全会对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了彻底的讨论，接着中央委员会发出了题为“执行武装保护苏联的实际策略”的第60号通告。通告勾勒出了新的、进攻性的政策的轮廓。中共领导人显然想摆出一副“比教皇还正统”的样子，这里的“教皇”自然是斯大林。为此，他们要求全体党员行动起来以“促进革命的巨潮”，把农村地区的武装斗争与在城市举行的新的暴动结合起来。这份党内通告基本上是由李立三和周恩来这两位当时最有权威的领导人起草的，在这个问题上，总书记向忠发同以往一样迟钝消极，对这两个人言听计从。

当时总的国际形势似乎也证明了十次全会决议的“正确性”。就在中共起草这份通告的时候，中国和世界总的说来都发生了异乎寻常的事变。1929年10月底，纽约股市崩盘。大萧条很快吞噬了资本主义世界，在所有共产党人心中唤起了新的希望。马克思和列宁早就预言过的世界资本主义的不可避免的崩溃看来正在迅速到来。这场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也有直接影响：工厂开始倒闭，失业激增，出现了灾难性的通货膨胀，贫困现象蔓延开来，贫富差距扩大了。此外，不同寡头集团之间的争斗也加剧了。1929年9月，张发奎将军起兵反对蒋介石，一个月后，冯玉祥元帅也起兵反蒋。国民党分裂了。以汪精卫为首的相当有实力的“改组派”提出了改革国民党的要求。根据以上形势，共产国际得出结论：中国现已处在“一场革命高潮的开始阶段”。

12月中旬，上海方面收到了莫斯科的新指示。这是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于10月26日起草的一封信。起草之际正值世界金融市场过热之时。这项新指示火上浇油，要求中共领导人立刻将注意力转向中国社会“所有矛盾的激化趋势”上面。来信强调这个国家正在进入“最深刻的民族危机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工人运动正在从1927年的严重失败后的消沉状态中复苏”。这份文件的作者们从中捕捉到了革命运动的“日益高涨的真实的和极其重要的信号”。因此，他们要求中共：

立即着手使群众做好用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和地主的联合政权、迎接以苏维埃的形式建立起来的工农专政的准备，积极发展和不断地扩大诸如群众性政治罢工、革命性的示威和游击攻势等阶级斗争的革命形式。

来信在结尾处威胁道：“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情绪，它低估农民战争的意义，低估和抑制革命的热情和首创精神，轻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独立的领导作用。”^[252]

中共中央狂热地力求执行这些指示，不过，它走过头了。2月底，它向全党发出第70号通告。通告宣称：

目前全国危机是在日益深入，而革命新浪潮是在日益开展。从两广到顺直^[253]，从四川到江浙，没有一省不受着军阀战争之直接祸害的。……说明全国群众斗争之走向平衡发展的道路。……目前革命形势的发展，很明显的可以看出一省或几省革命首先胜利的前途，特别是武汉及其临近的省区，表现着更多的可能。

据此，中央认为有必要调集红军进攻和占领大城市。^[254]

至于朱德和毛泽东的部队根据以上精神该如何行动的问题，中共中央在1930年4月3日发出的致红四军前委的信中有具体指示。这封信详细阐述的一个思想是，在近期内攻克江西、湖北和湖南三省及武汉这个中心城市是有可能的。^[255]中央的这些人个个都拼命地想显示自己的极左倾向。

这个任务与毛泽东本人在一年多前写给中央的一封信里提出来的设想不谋而合，这个设想就是，用一年的时间，夺取江西和邻近的闽西和浙西地区。^[256]而当时的中央委员会对毛尚持批评态度，对此建议不理不睬。如今时过境迁，它不仅对毛的建议做出了反应，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总的来说，形势的变化只会使毛高兴。在兴头上的他禁不住填词两首，一首是：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257]。
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梁再现^[258]。

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259]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260]

另一首是：

宁化、清流、归化^[261]，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262]

他从没有放弃过自己一年前提出的夺取江西的计划，只是对其做了些调整。“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他在1930年1月初给林彪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263]2月初，差不多也就是在收到第70号通告的三周以前，毛在红四军的一次党的会议上自作主张地宣布了攻打吉安的计划。吉安是江西省西部最大的城市。^[264]与李立三、周恩来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毛也有过一段时间的心血来潮，对于革命爆发的前景有着乐观的预期。他在给林彪的信中写道：

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265]

当时他还写下了另一首战斗的诗篇：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
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赣江^[266]风雪迷漫处。
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267]

在那段时期内，在共产国际12月来信的激励下，中共领导人继续着其高度亢奋的革命准备工作。1930年3月初，为了递交一份报告，周恩来启程前往苏联。他绕道欧洲，于4月抵达莫斯科。他此行的目的是想驳倒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央委员会的冒险主义的出人意料的批评，这些批评来自远东局成员、波兰共产党员伊格纳奇·里尔斯基等人。留在国内的李立三于是成为中共事实上的领袖。这个充满活力、容易激动和主动性很强的人同时还领导着中

央的鼓动和宣传部。正是在他的倡议下，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于5月下旬在上海召开，到会代表约40人。当时，除江西、福建两省外，在湖北、湖南、广东和广西也都出现了苏维埃区域。在李立三的影响下，这次会议号召苏维埃工作人员“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反对“反革命的富农”^[268]（换言之，就是反对勤劳的农民）。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269]，尽管李立三再三要求他撇下一切事务来上海赴会。他能肯定李立三不会趁机硬把他留在上海吗？毛还记得中央领导人当初是如何坚持不懈地竭力想使他和朱德离开军队的。不过，毛对这次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没有异议。

会议做出了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决定，那就是对红军进行整编，具体办法是减少军的数量，成立四个军团，红一军团归朱德和毛泽东领导。接到这个消息之后，朱毛二人立刻于6月13日着手统一了所有正在赣西南和闽西作战的部队，受他们指挥的官兵约有两万人。显然是由于意识到这点兵力够不上一个军团的规模，朱毛最初把其部队改称为红军第一路军。不过六天之后，显然是出于避免与上海方面发生新的冲突的愿望，他们还是接受了中央委员会授予他们的番号：红军第一军团。除了林彪指挥的红四军以外，当时正在离朱毛部队不远处作战的红六军和红十二军，也被编入红一军团。

紧接着，6月21日，李立三派来的一个特使抵达朱毛部队驻扎地，向红四军的指挥官们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做出的一项耸人听闻的新决定。这个决议是政治局于6月11日通过的，其题目就很特别：《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要胜利》。决议是李立三起草的，其要点在于向全体党员指出近期内的前进方向：发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中国是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就是世界革命的火花最易爆发的地方。”^[270]这个决议如是说。

时间紧急，第二天朱毛就下达了进攻九江和南昌的作战命令。这是江西最大的两个城市。“伟大的革命”开始了！

结果是失败，这还用说吗？他们连九江都攻不下来，更不用说南昌了。在撤退前不久，毛泽东悲伤地写道：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271]要把鲲鹏^[272]缚。

赣水^[273]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274]。

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275]

只有彭德怀指挥的、拥有七八千名官兵的红三军团赢得了些许胜利。他们拿下了长沙，但为时不长，在国民党军队的压力下共产党人十天后被迫撤退。读者还记得吗？正是在占据长沙的这几天，毛泽东的两个前弟妹王淑兰和周文楠从长沙的狱中获释。

1930年8月下旬至9月初，毛的军队与彭德怀的军队实现了会合。两支军队总兵力达3万人左右，组成了第一方面军，即红一方面军。^[276]红一方面军成立后，毛转战长沙附近，两次试图重演三军团的胜利，但无论是他还是彭都无力再次征服这个省会城市。这个城市的劳动群众依然非常消极，拒不支持共产党。两次尝试的结果只是使红一方面军的几支部队遭到重大伤亡。^[277]

中共领导人，包括毛在内，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做出了全然错误的判断。中国确实陷入了危机，但中共实力依然太弱，无力夺取政权。诚然，党在过去三年来有所发展，号称拥有6万党员，但还是明显地实力不足。全国的红军加起来只有54 000人，其中只有一半人持有枪支。^[278]所以，对毛来说，向全世界宣布“革命的火药已经点燃了，革命的曙光快要出现了”^[279]，还为时过早。对李立三来说，也是如此。世界革命依然遥不可及，必须要做的是再次退却，是重组军队，而最重要的功课则是改变战略，实行持久战的战略。还是需要一块根据地，一块像井冈山那样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根据地，但必须比井冈山大得多。一块小地盘是喂不饱他们的肚子的。

毛早就认识到建立这样的根据地的必要性，但许多野战指挥官不支持这个想法。如我们所知，他们所秉持的，是自由闯荡的土匪式的信条。他们的头脑简单的军事学无外乎就是进攻、补养，然后跑到新的地方去。林彪就是这样的一位指挥官。对于这位优秀的军官，毛对他不吝赞词，但毛也总是批评他不愿意花时间去建立一个稳固的苏维埃根据地。^[280]毛在一篇通信中写道：

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在我看来，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毛泽东断言，着眼于在全国各地有计划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机构的政策，在“帝国主义最后阶段中互相争夺”^[281]的半殖民地的中国才是唯一正确的。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一点火星才能点燃一场燎原大火。

第五篇

领袖的诞生

★ 第一章

在共产国际的羽翼下

这一次，毛决定在赣北建立安全的根据地。这个地区位于该省主要航道赣江的中游，战略地位优越。此地离南昌的距离——1930年9至10月间，毛没有拒绝攻打这个省会的命令——并不比井冈山到南昌远，井冈山仍活动着红一方面军的部队。这个多山的丘陵地区非常适合打游击，你可以随意突袭据守在富庶的商业城镇和居民区的敌人，然后躲到森林茂密的山上去。这个地区的中心是吉安，这是个坚固的商业城市，有5万人口，是江西的第三大城市。许多富人——他们是劫掠行为的主要目标——住在那里，城里还有许多造武器的作坊。只要能够在此地站稳脚跟，就有希望建立起强大的苏区。

他于1930年10月4日攻占了该城。三天后，他宣布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并把自己的一个亲信安插在政府里做了一把手。他终于可以为他的军官和士兵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了。攻克吉安后，红军从市民手中缴获了800万墨西哥元和许多黄金。^[1]一幅美妙的的前景看来正在红一方面军面前展开，但生活却变得更复杂了，不仅对毛来说是这样，对他在中央委员会里的上级来说也是如此。

李立三和他的同事们在1930年秋季不得不面对一些重大难题。共产国际对他们的冒险主义政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与来到莫斯科的周恩来谈话后，已开始怀疑中共中央在理解和执行莫斯科的指示时过分“左”了，但也只是怀疑而已，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各级官员们自己就相当“左”，因而无法很快辨析清楚各种“左”倾观点之间的细微差别。当然，莫斯科当时正不断地收到

驻上海的远东局发来的批评李立三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报告，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仍然无法弄清事实真相。莫斯科的确在6月23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了一封电报，“明确地”反对“在目前的情况下”在大城市组织暴动^[2]，但它绝不是冲着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左”倾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来的。7月2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的一份报告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对李立三的领导没有提出直接批评，它只是说：“目前在我们面前并没有出现全国范围的客观的革命形势，这一事实应当是对现阶段的斗争进行分析的出发点。”不过，莫斯科原则上并不反对“夺取一个或多个工业和行政中心”，它只是认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红军实力的加强。^[3]

不过，中国共产党人7月末至9月初所遭受的失败迅速地改变了形势。斯大林不喜欢失败者，从不原谅他们。恰在此时，有人向他展示了几份李立三有关世界革命的声明，其中的观点与他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相冲突。8月初，听到攻占长沙的消息后，乐不可支的李立三请求苏联直接插手中国革命。他的想法很简单：要挑起一场他确信苏联会最终取得胜利的世界大战。因而，他认为中国革命应当为这场“伟大的世界革命”起到导火索的作用。斯大林还了解到，李通过埋怨共产国际、强调自己虽然忠实于莫斯科但更忠实于中国革命，已在党内领导层拉起了一个小圈子，说什么“等我们拿下汉口，就能让共产国际听听我们的意见了”。

对斯大林来说，这一切听起来就像是托洛茨基主义，他对李立三发出了一道威胁性的命令：“立刻到这儿（即莫斯科）来。”^[4]1930年9月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要求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上海召开了一次极为保密的扩大全会，以“通过集体的自我批评来改正我们的错误”。已从莫斯科回到中国的瞿秋白、周恩来以及远东局驻上海的代表，即化名罗伯茨和罗伯特的德国共产党人格哈德·埃斯勒共同主持了会议。但全会并没有批判李立三的纲领。李立三在党内很有权威，无论瞿、周还是极为敌视“李同志”的埃斯勒对他都无能为力。全会听取了李“严肃”的自我批评，但仍让他当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是撤销了他的政治局常委会委员的职务。

政治局常委会彻底重组，现在只有三个委员，向忠发、瞿秋白和周恩来。全会结束时只承认在执行共产国际路线时犯了“策略和组织上的局部错误”。^[5]

对此，斯大林再也没有耐心了。他迅速把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远东处^[6]的领导巴维尔·米夫派到中国来，此人被苏共中央政治局认为是一个杰出的中国问题专家。米夫是个坚强和冷酷的人，在乌克兰经历过内战的严酷考验，后来根据党的指示成了一个中国问题专家。他的真名是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弗图斯。“米夫”这个化名是由他的名和姓缩略而来的。1930年时，他只有29岁，但已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内小有名气。从1925年11月起，米夫就是莫斯科的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负责财务的副校长，在1926—1927年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高潮中，他领导着



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

该校的斯大林派，无情地打击这所大学当时的校长卡尔·拉狄克及其支持者，为此博得了斯大林的青睐。在撤销了拉狄克的职务后，斯大林提拔米夫当了中国共产党孙逸仙大学的新校长。1928年9月，该大学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此后不到一年，米夫被任命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处处长。迅速的擢升让米夫得意洋洋。据他的同时代人说，“这位共产国际的头号中国问题专家”，举止像个傲慢、专横、信心十足的官僚。张国焘回忆道：“他是个野心勃勃的人……而且擅长于斯大林的战略技巧。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善于应变。”^[7]

米夫伪装成一个名叫彼得雪夫斯基的德国商人于1930年10月到达上海。他绕道德国，为安全起见，在那里做了整容手术。抵沪之后，米夫立即承担起了远东局的领导工作。^[8]他公然干涉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宣布取消9月全会的决定。在李立三已去莫斯科“学习”的情况下，他积极筹备召开一次新的中央全会。11月16日，他收到了一份有关李立三问题的名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李立三主义的来信”的新文件，这使他的工作更容易了。在信中，李

的政治路线被指责为“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和“机会主义”，其“要害”是托洛茨基主义。考虑到当时共产党人中流行的术语，这份文件听起来就像一份判决书。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被打懵了，米夫则可以据此为所欲为了。

他牢牢把握住了这次机会。被中国共产党人称作约瑟夫的米夫确信，党的“拯救”只能通过更换党的领导层来完成。于是，他于1931年1月初在上海召集了一次新的中央全会扩大会议。在会上，



秦邦宪（博古）。

仅凭他的一句话，就让他以前的学生陈绍禹（俄语化名是伊凡·安德烈耶维奇·戈鲁别夫）当上了政治局委员，此人以前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另一位毕业生沈泽民（俄语化名是古德科夫，别名是古多克）当选为新的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为了支持这些决定，米夫邀请了一群他在莫斯科教过的学生来参加会议。这些年轻人没一个是中央委员，却占了与会人数的三分之一！这伙人中，除了陈绍禹和沈泽民外，还包括博古（真名秦邦宪，俄语化名是博古雷洛夫，别名博基和博格纳）、王稼祥（俄语化名是考姆纳德和考姆森）和陈原道（俄语化名是涅夫斯基）。^[9]所有

这些人很快将在中国共产党内和毛泽东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

米夫在张国焘缺席的情况下增补其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在莫斯科时与米夫在一起工作过两年半的时间，他也一直反对李立三路线。张在1月的第三周回到了中国。瞿秋白被排除在这个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之外，他因在9月的中央全会上“姑息”李立三而名声受损。瞿像李立三本人一样也被撤销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但他们两人仍是中央委员。

中央全会后过了没几天，米夫又往前跨了一步。他一点程序也不走，就直接任命陈绍禹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让他与向忠发、周恩来和张国焘并驾齐驱。1931年3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机构在他的坚持下也进行了重组。博古成了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书记。

米夫的“革命”对中国共产党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他最信任的陈绍禹、博古等人往党和共青团的领导机构里塞进了一大批以前在苏联的各类国际学校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这些人都深深地打上了莫斯科的烙印。最重要的是，他们在苏联都经历过并积极参加了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他们之中最显眼的是浓眉大眼、矮壮敦实的陈绍禹，他长得很像米夫，同米夫一样，也是一个精力充沛、固执而又强硬的人。陈有学习外语的天赋，1925年11月下旬考入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后不久，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学了一口流利的俄语。这一招成了他的王牌。当其他学生还在费力地用西里尔字母拼写发音古怪的单词时，陈在这所大学的教师中却如鱼得水，这些人都不懂汉语。陈很年轻，入团入党的时间也不久：他生于1904年，1925年9月加入共青团，1926年入党，尽管如此，他却成了米夫的助手和翻译。米夫在这所大学里教授“列宁主义”这门课。1926年9月，米夫提名他担任学生会主席，同年底，又拉他积极参加了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10]在米夫的帮助下，陈和他的同伙们通过恐吓、将最危险的对手赶出学校等办法，最终控制了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大群学生。

1929年，陈回到中国。他和他的妻子孟庆树（俄语化名罗莎·弗拉基米罗芙娜·奥赛特洛娃，在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过）落脚上海，在那里从事一些基层工作。在相当一段时期里，他一直默默无闻。突然间，他的好运来了。刚来中国的米夫决定倚重陈和其他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毕业生。老同志们显然很不高兴，但大都默不作声。当然，也有一些人表达了不满。24岁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王克全开始议论在中国共产党内正在成型的一个斯大林派^[11]，尽管他自己在1月的中央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毛的一个老朋友罗章龙更是持坚定的不妥协态度，站出来反对“斯大林派”。^[12]党对“分裂分子”迅速采取了组织措施，“老罗”这位入党最早的党员之一甚至被开除了党籍。

这样做的结果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权威于1931年达到了顶峰。“自从李立三反抗共产国际和李立三的反共产国际路线受到批判之后，”周恩来回忆说，“中国共产党人将共产国际特使的每

一句话都奉若神明。”^[13]

毛对党的领导层中的这些变故知道得较晚。他在1930年12月初才得知9月中央全会的内容。1月新召开的中央全会结束后两个星期他才获知详情。直到1931年3月，他才知道“李同志”已被灰溜溜地派到莫斯科“学习”去了。

毛对这些事件喜忧参半。一方面，他从来没喜欢过李立三，因而没有理由对他的命运感到难受^[14]，毛还记得这位“昙花一现的大王”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对他的所有指责。他也没忘记李曾要他离开自己的队伍到上海去，李于1930年6月15日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仍清晰地呈现在他的脑海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封信10月才到达苏区，而此时斯大林已命令下属将那封“关于李立三主义的来信”送到了中国。在6月15日的来信中，陶醉于无上权力中的李话语十分粗鲁，使得毛十分光火。李指责毛这位最老的老党员之一具有“农民意识”，没能理解变化中的政治形势，没能执行中央的指示。到头来，李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在9月的中央全会上，毛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在1月的中央全会上又再次当选。对此，毛很高兴。同样让他满意的是，现在已对他忠心耿耿的朱德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尽管只是个候补委员。

但是，毛是否知道中央全会对他的任命是屈从于来自莫斯科的压力？他是否知道，恰在此时，斯大林已开始认真地观察他作为未来党的领导人的可能性？这难以确定。但谁知道呢？他可能已经猜到了这一点。说到政治，他已经不是新手了。

此时，莫斯科已开始对他青睐有加。从20年代末开始，斯大林的共产国际就开始偏袒毛。当中共领导人批评这个固执的湖南人时，他们不时地站出来为他辩护。在给总部的报告中，远东局高度赞扬朱毛红军在各个方面都是“最好的”。^[15]读着这些报告，看到苏区一天天扩大，斯大林于1930年7月下结论道，在中国的情况下，“政治上成熟又能打仗的红军的建立……是事业的第一步，其成就将会保障革命的有力发展”^[16]。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越来越关注毛。当时，苏联有过一场颂扬他并捎带着赞美朱德的运动。当时的苏联报纸对这“两个英雄”是这样写的：他们是“两个共产党员，

两个游击队领导人，仅仅他们的名字就足以使数以千计的高贵的中国人或闻之变色，或气急败坏，但更多的时候是闻风丧胆。他们在国外也是知名人物”^[17]。

1930年夏，正是莫斯科以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名义促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先是任命毛担任最有权力的一个职务——红一军团政委，然后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此后的10月中旬，莫斯科积极倡议毛进入苏区中央局。这是党的一个新机构，其职责是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统一领导党在农村地区的一切工作。^[18]后来，莫斯科又提议毛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或者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是个类似于全苏区临时政府的机构。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是由中央政治局在1930年10月17日做出的，组建苏区中央局的决议也是在这一天通过的。同时，毛泽东所在的苏区被称为中央苏区。在此之前，1930年6月，在江西省的苏区就已经成立了所谓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它在毛控制的区域作为军事官僚机构行使最高权力，所有中共地方武装以及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都归它领导。从一开始，毛就担任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但他并不处理行政管理事务，而是将主要精力放在政治和军事问题上。

以下是1930年11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关于此事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我们红军的指挥员（毛泽东、彭德怀）与政府没有关联，政府是一回事，军队是另一回事……不用说，这样的情形是不合适的。我们需要做出安排以便毛泽东不仅负责军队的管理与作战，而且还要参与政府，负责政府的部分工作。他必须被任命为政府成员（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没必要讨论这样安排的好处，这是不言而喻的。^[19]

起初，在已被任命为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和另一个重要的党的领导人项英到达江西之前，在莫斯科的提议下，毛泽东被委托领导这个机构。这样的安排自然满足了他的自负，因此，他同意了

中央全会的决定。

另一方面，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毛一直敌视米夫的那帮“机灵的学生们”，这些人绕过一切规则钻进了领导层。我们知道，他根本受不了在苏联的国际学校里喝了一肚子墨水的学生。在与野心家多勃雷伊^[20]打交道时他就烦得不得了，此人的迂腐让他十分生气。莫斯科学生们的粗野的教条主义作风与他的个人方法形成鲜明的对比，他每到一地首先是认真调研当地的情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毛在1943年底总结二三十年代的农村工作经验时这样写道。当然，毛总是调整结论以适应他的激进观点。但现实情况是，实践不是真理的标准，反而是“左”倾主义者的观点成了真理的标准。真让人无可奈何。

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的会谈记录片断

1936年10月

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我当选为主席。红军在湖南有广泛的影响，几乎和在江西一样。湖南农民都知道我的名字，因为悬了很大的赏格不论死活要缉拿我、朱德和其他红军领导人。我在湘潭的地被国民党没收了。^[21]我的妻子和我的妹妹，还有我的兄弟毛泽民、毛泽覃两个人的妻子和我自己的儿子，都被何键逮捕，我的妻子和妹妹被杀害了。其余的后来得到释放，红军的威名甚至已扩展到湘潭我自己的村里，因为我听到一个故事，说当地的农民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家乡去。有一天，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他们就断定飞机上坐的是我，他们警告那时种我的地的人，说我回来看我的地了，看看地里有没有树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有砍掉的，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22]

1930年，他对赣西南的七个村庄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结果当然是同样的。这里，革命的敌人不仅有地主，还有富农。他将富农定义为“有钱余剩”和“有多余的土地”的人。他承认，富农们与地主不同，他们都自食其力，并不强迫任何人给他们干活。他们不

出租土地，起得早睡得晚，辛勤耕耘自己不多的田地。总的来说，他们确实是勤劳的人，但这也正是对他们认识的分歧所在。在毛看来，这些“富农们”的勤劳使得他们得以生产出多于本身生活所需要的东西。因此，他们能在市场上卖掉部分粮食，或把它借给贫穷的邻居们。换句话说，他们与那些食不果腹的贫穷乡邻们迥然不同，许多穷人因而仇恨他们。毛写道：

……大批的贫农唤着“平田”和“彻底废债”的口号，就是对付这种富农的。共产党如要阻止贫农的行动，那末贫农就非恨共产党不可了。因此可知，不但打倒半地主性的富农是没有疑义的，而且平富裕自耕农的田，废富裕自耕农的债，分富裕自耕农的谷，也是没有疑义的。必须这样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23]

他的新调查“证实”了他不断重复的观点，这就是，在农村的无产者和“无家可归者”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力，后者天冷时无衣可穿，常常“衫很烂”。^[24]在红军占领的地区，包括罪犯和乞丐在内的所有这些都“欢迎革命”，毛意味深长地写道，“当他们听说当地的土豪劣绅被打倒了，土地被重新分配，他们都极为高兴……他们中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这值得深思。”^[25]

但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人都同意他的这种观点。1930—1931年间，毛不得不面对来自党内的强烈反对，这是他从事土地革命以来所遇到的最强有力的一次抵抗。江西当地的党组织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或者更准确地说，不同意他倾向于贫农而忽视下中农的观点。双方分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1930年12月初导致了一场公开的武装冲突。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是不同观点持有者之间的第一次流血冲突。这次派系间的“清除”行动被称作“富田事件”。1930年12月初，江西派的部队袭击了正在富田忙于揭露“反革命分子”的毛泽东的代表。

1930年2月，在红四军前敌委员会、赣西特委和红五军、红六军军委召开的联席会议上，冲突的根源第一次暴露出来了。会议在陂头村召开，此地与江西中部主要的人口聚集地东固不远。我们知

道，正是这次会议于2月7日通过了一部《土地法》。这部法律像井冈山时期的法律一样，再次确立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平分土地的原则。这个规定引发了争议。江西当地的共产党人坚持反对平均主义。他们只要求将地主的土地根据每户人家的壮劳力数来分配，而不是平均分配给农民，或根据一个家庭的“人口数”来分配。^[26]可以理解的是，毛认为这是明显的右倾，应给予坚决反对。“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他总结道，“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27]

他确信自己是正确的。在会议前几周，他阅读了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就农民问题于1929年6月写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这封信的反富农立场使他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在会上代表江西共产党人的不仅仅是赣西特委，红六军军委的代表也不少。这支军队本身就包括在毛的部队到来之前就在该省活动的当地游击队（这些部队是江西红军的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独立团）。毛根据中央的指示将他们整编为红六军，任命28岁的刘士奇担任军委主席，他的弟弟毛泽覃任政治部主任。可以理解的是，他想将江西人置于可靠的掌控之中。在该省转了一年之后，他确信当地的党和军队都不值得信任。

如果说在赣南、闽西和粤东北连成一体“客家地盘”上，大多数农民和党员都欢迎红四军的话，在赣中以及毗邻的赣西、赣西北，情况就不同了。居住在这些地区的人认为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江西人（本地人），他们对南部客家人的敌视已持续了好几代。出身于这些地区的人也控制了当地的党组织、游击队以及三点会江西分会，后者是受共产党支持的一个秘密社团。红四军中50%的人是湖南人，另有20%的人来自赣南和闽西。所以，当地人把他们看作外来的客家人，不信任他们。这就是江西的党组织坚定地反对毛提出的激进的《土地法》的原因。^[28]

但是在陂头会议上，江西人却处于少数。如我们所知，《土地法》通过了，毛开始“用火与剑”在赣中和赣西发动土地革命。毛同朱德一起提出了“彻底消灭富农”的口号。我们知道，朱本人就是客家人。^[29]这才是导致冲突加剧的原因。

此时，红一方面军也成功地打退了蒋介石的围剿。毛和朱在井冈山和赣闽地区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策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在新的条件下显示了它的威力。这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胜利。红一方面军歼灭了敌方一万五千多人，抓了许多俘虏，缴获了一万多支步枪和一部电台，只是没人会使用电台。一个叫张辉瓒的师长甚至也当了俘虏。红军砍下了他的头，把头绑在一块木板上，让它沿横江顺流而下。横江是赣江的一个支流，红军估计张的头颅最终会直接漂到南昌蒋介石的手里，他正在那儿等着呢。^[30]

沉浸于胜利之中的毛泽东喜不自禁，将万丈豪情化作了一首词：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31]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32]

第一次反“围剿”后，红一方面军又成功地击退了蒋介石于1931年4—5月和7—9月组织的两次“围剿”。“共匪”胜利的消息在爱好和平的市民中播下了种子，但南京政府无可奈何。蒋介石调动了他的精锐部队来对付他所称的“恐怖分子”。第二次“围剿”是由国防部长何应钦领导的，第三次则由蒋本人亲自指挥。但这一切都没用，现实情况是毛将战事令人绝望地拖长了。毛泽东继续讴歌自己的军队取得的胜利：

白云山^[33]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飞将军^[34]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此时，毛在赣西南的社会经济政策也失败了。就像井冈山时期一样，他与农民建立关系的尝试又无疾而终。难道是红一军的士兵们在撤离井冈山之前就已经注意到的不祥之兆终于应验了？在他们离开井冈山的前几天，毛泽东和朱德脚下的讲台塌了。这有可能就是一个先兆。

在富田事件之前，反“围剿”战事还在进行时，毛就曾建议放弃江西根据地，向东南部的福建方向转移，那里也是客家人的地盘。但这个计划当时未能实施。彭德怀的红三军团的一些指挥员反对这样做。1月底，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央委员会此时建议毛“稍微往南”移动。^[35]但毛还不打算立刻推行这个计划。在富田事件没解决之前，他的撤退会被看作是向“无耻”的江西人投降。只有当毛得知中央政治局按他的意愿解决了这场冲突后，他才松了一口气。现在，他能够将他的总部转移到与福建接壤的边界去了。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红军战士编了下面这首有趣的歌谣：

毛委员运粮上山坳，粮食绝对可靠。
大家齐心协力，粉碎敌人“围剿”。^[36]

毛与江西当地人和当地共产党所发生的冲突证明了，他只能在有利的社会环境下以及有利的族群背景下才能取得胜利。客家乡村在这两个方面都是理想的。1931年3月末，就在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围剿”之前，毛、朱德和项英终于转移到了赣东南。在这里，他们先是驻扎在一个名叫清塘的小村庄里。这个村子坐落在山谷深处，战略位置优越。村子周围全是陡峭的山峰，山上是浓密的森林，敌人很难接近它。但在抗击第二次“围剿”时，毛泽东和朱德不得不放弃了它。他们带领部队几次转移总部驻地，直到击退第三次“围剿”后的9月底，才终于在叶坪安顿下来。这里是客家乡村的一个主要贸易中心，在瑞金以北几英里远的地方。

此时，上海的形势在不断恶化。党的中枢机构没能经受住它在1931年所遇到的严酷考验。米夫4月回莫斯科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遭受了一系列沉重打击。险情不断出现，失败接

踵而至。4月底顾顺章的被捕导致了特别危急的情况。顾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他领导的机构是根据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设立的，主要负责在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城市中组织实施“红色恐怖”。顾顺章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学生，直接负责清除内奸、叛徒和其他已被中央委员会判处死刑的共产党的敌人，也负责监视、保卫党的最高领导人。顾于1931年4月24日在汉口被捕，他去那里的目的是准备刺杀当时在那里的蒋介石。他假扮成一个名叫黎明的跑江湖的魔术师^[37]，却在—个公园里被密探认了出来。这个带有上海花花公子习气的职业杀手害怕被枪毙，因而自愿“丢脸”。^[38]他向警察招供了中央政治局、江苏省委和湖北省委的所有秘密联络点，导致三千多名中共党员在5月至7月间被逮捕，其中很多人被枪毙。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向忠发也是他叛变行径的受害者。向在拷打下也招供了，但这也救不了他的命。国民党宁愿处决这样一个出名而又垮掉的人。

根据顾叛变后提供的线索，上海市警察局逮捕了远东局的两个关键人物，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的负责人雅科夫·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化名牛兰）和他的妻子达吉亚娜·尼古拉耶夫娜·玛依仙柯-维利卡娅。他们以牛兰夫妇的名义与3岁的儿子奥米特里（别名吉米）住在上海。共产国际正是通过他们经由虚假的大都会贸易公司的一个账户给中共中央和远东局提供资金的。该公司是由国际联络部的特工阿列克山德拉·阿尔勃莱希特于1928年4月在上海注册成立的。党和共青团在城市中的组织长期以来主要依靠共产国际的资助，而牛兰夫妇的被捕则切断了党团的资金通道。从1930年8月至1931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每个月都给中央委员会提供两万五千多美元。^[39]这个月支付额是1929年时的五倍。

不过过了一段时间，共产国际又找到了继续提供资金的替代方法。就在1931年9—12月，上海的党组织就收到了来自莫斯科的10300美元。^[40]总的来说，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共产党的资助到年底时总额已达一百多万银元。^[41]但白色恐怖却使远东局完全瘫痪了，它在1931年夏不得不停止活动。为了更有效地开展工作，莫斯科的主要代表伊格纳季·里尔斯基（化名欧斯丁、奥斯腾、奥斯

汀、比格曼、保罗、保尔、肖，真名是留别涅茨基）9月中旬左右决定再次重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此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大部分都不在上海，一些人在坐牢，另一些人则在北方从事地下工作。张国焘已在4月初到了武汉以北鄂豫皖交界处的苏区。他在那里领导当地的中央局，实际上是唯一的主宰。当过水手的政治局委员陈郁从1931年6月开始就在波廖沃伊的化名下，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陈绍禹因害怕被逮捕，千方百计想从中国逃到莫斯科去。周恩来回忆道：

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明确指示中央委员们不要去公共场所，不要去会见任何会影响工作的人。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命令，在上海设立了临时中央委员会来负责工作；它由卢福坦^[42]、陈云^[43]、康生^[44]、博古、洛甫^[45]和李竹声^[46]组成，后面三个人不是中央委员。他们的分工如下：博古——政治领导；李竹声——组织部；洛甫——宣传鼓动的负责人；卢福坦——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康生和陈云领导中央特科^[47]的工作，康生兼任工人委员会主席。^[48]



陈绍禹（王明）。

临时中央（准确地说是临时中央的临时政治局或者中央临时政治局^[49]）成立后的1931年9月末，陈绍禹和妻子便迅速动身去了莫斯科。在那里，这位“米夫的雏鸟”负责领导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为了这项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他为自己取了个王明的新化名，他就是以这个名字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历史上出名的。在与中共中央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密信联系时，他有时使用另一个化名“温哥华”。不久，周恩来也化装成一个神父离开上海去赣南与毛会合。在那里，他终于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央局领导。^[50]

除了后来投向国民党一边的卢福坦和李竹声外，所有这些人将来都会与毛泽东并肩战斗。他们与毛的关系错综

复杂，曾与毛在党内展开争斗。但他们最终都信服毛泽东了，只有张国焘和王明两人不服。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在1931年，毛的势力在不断增长。他清除了中共赣西南特委中的“富农残渣”、击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围剿”后，在党内的地位日益巩固。他现在唯一需要的是斯大林的首肯。斯大林此时还没有坚定地站在毛一边，尽管他持续地支持毛。克里姆林宫的主人用马基雅维利式的手腕，以三组人马为基础为中国共产党构建了一个混合式的领导层：土生土长的游击队干部（毛泽东及其支持者）、莫斯科的毕业生（王明、博古、洛甫）以及共产国际的老同志（周恩来、张国焘、项英）。每一方都没机会独占鳌头。所以，毛只能等待。

他的孩子由他人照看。他们怎么样了？有什么感觉？对此他一无所知。他的儿子们此后要经受许多磨难。我们知道，开慧死后，当地地下党通过贿赂狱卒让他的大儿子、8岁的岸英获得了释放。他和7岁的弟弟岸青、3岁的弟弟岸龙此时与外婆住在板仓村。他们自然受到了监视，警察希望通过孩子们抓到毛本人。

时间在流逝，就在农历新年（1931年2月17日）前夕一个星期一的晚上，当所有人包括宪兵们正准备过年时，一个陌生人敲开了外婆向振熙的门。他带来了毛泽民写给开慧的长嫂李崇德的一封信，李也住在这里。为了安全起见，毛的弟弟要求将他的侄子们送到上海他的身边，他的妻子、没有生育的钱希均非常担心孩子们的命运。泽民正是在她的劝说下才写了这封信。李崇德回忆道：“我忐忑不安地在油灯下打开了包裹，吃惊地看到了毛泽民的笔迹。他要我把毛泽东的三个儿子送到上海，给了我时间、地点以及如何与那里的人接头的方法。”李与亲属们商量后决定答应泽民的要求。为安全起见，孩子们都被取了两个大孩子都得记住的新名字，岸英叫永福，岸青叫永寿，岸龙叫永泰。他们的姓也从父姓改为母姓，也就是姓杨。然后，李崇德带着孩子们经由长沙、武汉前往上海。她扮演着他们母亲的角色，旅途上陪伴他们的是外婆向振熙。

艰难的旅程花费了好几天的时间，当筋疲力尽的孩子们终于到达泽民叔叔家时，他们放声大哭。孩子们本以为他们会被送到爸爸

身边来，但到头来他们不得不住在租界里的大同幼稚园里。周恩来做出了这项安排。上海的这个庇护所是由“共产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出资为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子弟设立的。对孩子们来说，这里并不是个理想的地方，但没有其他选择。当时，大约有30个孩子住在那里，其中包括李立三和蔡和森的女儿，以及彭湃的儿子。李立三的夫人是幼稚园里的一个保育员。毛的儿子们并不想去那里。“我想与爸爸在一起，”岸英哭着说，“我一定要为妈妈报仇！”孩子们抓着李崇德的衣服，恳求她带他们回家。“他们的哭声像把刀子刺穿了我的心。”李回忆说。泽民的妻子想要哄他们，但她自己也哭了。她好像是知道，对她的侄子们来说，最坏的情况还没来到。

刚到幼稚园不久，小岸龙就拉肚子，发高烧。最近的一家医院诊断他得了痢疾。他最终毫无希望地病死了。^[51]顾顺章叛变后不久，幼稚园就关闭了，泽民叔叔和希均阿姨离开城里去了苏区。大同幼稚园的园长董健吾（化名王牧师）也是中央特科的一名官员，他把毛的儿子们带到自己家住了一段时间。但不久，他也不得不动身去武汉，孩子们则交由他的前妻黄慧光照看。黄不知道他们的底细，也不关心他们。她自己就有四个孩子。

岸英和岸青一直盼望着能有父亲的消息。泽民叔叔准备离开上海时，他们托他给爸爸带了封信，但他们的爸爸根本没来接他们。1932年夏末，他们从黄阿姨家跑开了。在四年的时间里，他们流浪于肮脏的街道，翻垃圾桶，收集剩饭和烟头，从小店主那儿赚零花钱，卖报纸。他们不止一次受到殴打和谩骂。直到1936年春天，上海党组织的人才找到他们。手握重权的斯大林此时对他们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经斯大林同意，中共中央安排毛泽东的儿子们经由香港、马赛、巴黎去了苏联。真是山不转水转，负责这次旅行的还是那个他们熟悉的王牧师。^[52]

此时的毛将全副精力都投入了党的工作和军事工作中去了。1931年秋，当他收到孩子们的信时，他根本无暇分心，要做的事太多了。他需要在叶坪安顿下来，巩固中央苏区，为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这次大会要把全国的红区统一起来，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因而非常重要。毛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

代表，直接负责主持筹办这次大会。开会地点选在叶坪，这使毛的责任更大了。这里是苏区的中心，有六百多名代表要到这里来，所有人都要安排住宿、饮食和警卫。这个村庄坐落在靠近福建边界的赣东南的大山深处，离瑞金市非常近，1929年春为毛的部队所攻占。在两年半的时间里，该地在国民党和红军之间多次易手。现在，毛显然牢牢地扎根在这里了。在莫斯科的授意下，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53]

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的11月7日这一天，一切都已准备就绪：

会议大厅里挂着绣有锤子和镰刀的红旗，建筑物里面布置了电线，电线与去年从吉安缴获的发电机相连。到了该拉亮电灯的时候，一群群农民好奇地聚集在周围……会议大厅被几百个玻璃灯照得通体透亮，几个虚弱的农妇当场晕倒了……会议大厅里面摆满了松枝和群众组织带来的大旗，苏维埃的口号贴满了支撑房顶的大柱子……大会堂有四个门，建筑物每边各一个。主大门外部上方悬挂着两面绸缎制的红旗，旗上绣着锤子和镰刀，一面红旗代表苏维埃，一面代表共产党。正大门外面是一堆绿树枝，树枝中间是两个巨大的五角星。五角星是用银子造的，当时的苏区不缺银子。^[54]

11月7日早晨7点钟，代表们在排枪和鞭炮声中步入大厅。台上的乐队开始演奏《国际歌》，代表们一律穿着高领的红军上装和蓝棉裤，这是特地定做的服装，看起来喜气洋洋。他们上衣的左袖子上缀着红星，右袖子上缀着红绸三角星，三角星上面绣着代表的号码。代表们军帽的帽带上系着丝带，丝带上写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字样。

会议开了两周的时间，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宪法大纲，一部强调平分地主、农民的动产和不动产的《土地法》^[55]，一部劳工法和其他几个文件，选举了一个临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一周后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



1931年1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在江西瑞金。右起：王稼祥、毛泽东、项英、邓发、朱德、任弼时、顾作霖。

毛根据事先安排当选为这个最高立法机构的主席，张国焘和项英被选为他的副手。此外，毛还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外交人民委员——对于一个没人承认的国家来说，这是个相当可笑的职位——由米夫的学生王稼祥担任；军事人民委员这一职位自然属于朱德；教育人民委员是瞿秋白。瞿因患肺结核此时还在上海，所以，毛过去的老师、来自长沙的徐特立临时负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人民教育工作。瑞金被宣布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

自从共产党的部队来到这个始建于公元5世纪的古城后，城里的人口就不少于6万人。瑞金东西长2~3里，四周群山环抱。城内有几家纺织和机械作坊，还有许多被共产党人夺来当办公地点的寺庙。这还是个集市，四周的农民都来这里买卖东西。总的来说，尽管瑞金不如上海繁华，把它作为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还是很合适的。

毛似乎到达了权力的顶峰，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一场激烈的斗争才刚刚开始。王明的铁小子们并不想把胜利者的桂冠送给毛，其

中最敌视毛的是化名博古雷洛夫的博古。在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离开上海之后，他实际上成了中央政治局的领导。24岁的博古六年前才加入共产党，野心并不比他的朋友王明小。博古具有毛所痛恨的莫斯科暴发户们的典型特征，他又高又瘦，长着一张耶稣会会士般阴沉的脸。对中国的现实只有肤浅了解的博古像米夫所宠爱的其他从莫斯科回来的人一样，坚定地主张一切权利应归于苏维埃。日常生活中的他披散着头发，戴着一副大眼镜，笑声干瘪，话音颤抖，性格跋扈，作风粗暴专横。他崇拜斯大林，模仿他抽着一根大烟斗。他毫不在意人的性命，无论是那些“阶级敌人”的性命，还是他自己的党内同志的性命。

博古不敢公开质疑莫斯科对毛的支持，就怂恿他的支持者们极力削弱毛的影响力，在斯大林面前贬低他。披在毛身上的伟大的游击队领导人这一光环让博古头痛不已。

★ 第二章

激烈的党内斗争

最初的不快发生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写于1931年8月31日的上海来信表露了中央对毛的不满。毛泽东在信中受到了出人意料的批评，语气之尖锐不亚于李立三对毛的批评。毛所领导的中央局被指责犯了极其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以及“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工作中“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目前还不清楚最高层领导中的何人起草了这封信，可能是周恩来或陈绍禹，也可能是其他人。但毋庸置疑的是，这封信鲜明地表达了新领导层的观点。米夫的人已开始在国内占据统治地位了，即使周恩来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他也会根据最高领导人的指示来写这封信的。1931年8月正是陈绍禹和米夫的其他弟子最活跃的时期。

新领导们认为，毛在土地改革中根据“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平均分配土地的做法，就是执行“富农路线”，因而极为不满。在他们看来，所有的好地应该分给穷人，富农只能分给最差的土地。顺便说一下，在这前后，毛的老朋友、来自北京的邓中夏也受到了新领导层尖刻的批评。1930—1931年间，邓在贺龙的部队中负责政治工作，该部队正活跃在湘鄂边界的苏区。据周恩来说，邓站在毛一边，曾表示不同意“党对土地问题的路线”。邓曾批评有些共产党人在与“富农”作斗争时，把“中农”当成“富农”而不分给他们土地。^[56]

毛的游击战术也受到了临时政治局的严厉批判，尽管正是这些战术才使得红军得以击退国民党的三次“围剿”。很明显，这也正是令新掌权的领导们不满意的原因：毛的成功破坏了他们的权威。

他们坚持认为，迅速攻占“大城市”来“扩大”苏区才是最重要的。^[57]从1930年10月中旬到此时，毛不请示上级，自作主张，拒绝了所有攻占中心城市的计划。^[58]无独有偶，这些计划都是李立三参与制定的，而此人已在1931年受到了共产国际和党的严厉批评。

陈绍禹和王稼祥这伙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显然比毛和李立三还“左”。他们竭力给其他人蒙上“立三路线”的污名，其动机只不过是要抓住机会巩固自己的权力而已。他们一回国就在暗地里与李立三和其他“元老们”作斗争了。1930年夏天起，他们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活跃。他们根据事前的商议，用俄语和英语给他们的前校长写了许多密码信。他们并不反对政治局的冒险主义，那时候批评李立三“左”倾并不时髦。但他们非常清楚莫斯科最讨厌什么，因而一致指责李的右倾，即使李提出了疯狂的世界革命计划，他们还是这种态度！“由于医生的胆怯、无知和缺乏好药，右肺还在疼，”就在中央政治局于6月11日通过一份极左决议的前三天，王稼祥（考姆森）告诉巴维尔·米夫，“在新的革命浪潮中”，“你能寄些药来吗”？“一部分主人正患右肩疼的毛病”。陈绍禹以自己的名义附和说：“如果不能持续地寄来越来越多的好东西，公司无论如何都恢复不过来了。”以下是他们共同写的一封信：

主人的右脑生病导致他丑陋不堪。这种病需要一流的治疗，而这在贫穷的中国是很难办到的。我们希望很快就能找到名医和良药来医治主人。^[59]

这些话很有趣，不用解释就能理解。

即使在巴维尔·米夫这位“名医”动了所需要的“手术”后，陈绍禹和其他人还是持续推行主动出击的政策。他们显然认为1月全会还没能完全切除“脑子里的病变部分”。以上就是8月来信出笼的原因。

中央苏区收到此信后不久，项英、任弼时、王稼祥于10月中旬来到了中央苏区。他们首先重组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用朱德取代毛担任中革军委的主席，王稼祥和彭德怀成了朱的副手。此后，

就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夕的11月初，这些临时政治局的代表们在瑞金召开了一个党内会议，真正的“纵酒狂欢”就此开始了。毛受到了暴风雨般的谴责，他被指责犯了“狭隘的经验论”、“极严重的一贯右倾主义”、“富农路线”和“游击主义”的错误。最重要的是，他所领导的苏区中央局的一切工作被一笔抹杀。毛试图为自己辩护，提到了当地的条件，但批评者根本不听。除了几个地区的书记之外，与会的大多数人都赞同中共中央的来信。会议撤销了毛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60]

所有这一切偏偏发生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前的几天，而会议已预定“选举”毛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在这次党内会议召开前两三天的10月底，叶坪就收到了一封要求“选举”毛的电报，我们已经知道这是莫斯科首肯的。^[61]那么，为什么此时还要痛打这个已经安排好了要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脑的人呢？

只能有一种解释，这就是：上海的领导层和他们在赣南的代理人要让全体党员明白，中央委员会和苏区中央局的书记们将像以前一样控制一切，而不是新当选的毛主席。主席只是党的一个战士，还远不是最好的一个，党组织有权任意控制他。这样一来，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就成了一个纯粹的摆设。

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朱德成了中革军委的主席。与此同时，红一方面军的部队被重组成两个军团（第三和第五军团）和五个军，直接听命于中革军委。红一方面军的总部、毛所担任的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的职务也相应地被取消了。^[62]这个沉重打击急剧地降低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影响。

毛开始感觉到了日益恶化的周围气氛，除了幸运地还待在中央苏区的两个弟弟和弟妹外，几乎所有的好朋友都不在了。但泽民和泽覃都不是中央委员。1928年5月初，高傲、热情、富于斗争精神的向警予在汉口被枪杀了。三年后，她的前夫、毛最好的朋友蔡和森于8月初死于广东。他死得尤其惨烈。刽子手们先是惨无人道地拷打了他，然后把他钉在了自己牢房的墙上。最后，他们用尖利的刺刀往他的胸部刺了好多刀，直到无生命的躯体在铁钉上耷拉下来

才住手。就在两年前的1929年8月，彭湃死于上海。

周恩来于1931年12月底到达瑞金，替代项英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在1月7日苏区中央局的第一次会议上，他宣称中央局在与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犯了错误，因此“要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承认对于过去肃反工作中路线错误的领导责任”^[63]。毛作为中央局成员当时也在场。尽管周的批评深深地伤害了他，但他没有提出异议。

两天后，博古和他的朋友、在临时政治局中负责宣传工作的洛甫发布了一道“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指示。这道指示的标题与李立三炮制的那个臭名昭著的决议几乎一模一样，他们对此毫不在意。他们发出的指示与李立三的指示一样，要求红军再次进攻南昌、吉安和江西的其他主要城市。他们提醒所有的怀疑者，“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是目前的主要危险……应该集中火力来反击右倾”^[64]。

周非常清楚毛无法忍受在他看来没完没了的讨论，于是这位中央局的新书记在详细阐述了博古和洛甫的指示后，向中央局成员提出了具体建议：进攻江西的第二大城市赣州。赣州坐落在中央苏区和井冈山之间。顺便说一句，井冈山仍有共产党的小股部队在活动。

攻占这座壁垒森严的要塞将会给扩展“红区”创造一个良好的机会，但无论周还是中央局领导层的大多数人似乎都没有注意到，这根“硬骨头”是红军无法啃动的。毛自然不同意，因而再次受到批判。^[65]他的对手们满意地看到，这个“老是犯错”的对手再一次“丢了脸”。

毛于是决定去从事国际政治方面的“斗争”。由于日本的不断扩张，中国的国际地位此时已经急剧下降。在上述事件发生前四个月的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66]挑起了所谓的九一八事变。利用日本人自己炸毁“南满铁路”后所引起的混乱，关东军占领了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以及吉林省会长春。到了秋末，拥有3000万人口的东北全部被日本人占领了。全神贯注于“围剿”苏区的蒋介石对侵略没能进行任何抵抗，由此在全国引发了一个广泛的抗日运动。民众开始组织抗日团体，开展了类似五四运动时期的抵制日货运动。鉴于民众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密切关

注这些事件的毛于1932年1月得出结论说，共产党人“利用”这些事件将不是一个坏主意。他认为，群众的反日情绪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被用来对付蒋介石。蒋毕竟没有守住东北，因此很容易把他说成是一个“民族的叛徒”。被蒋介石派来与共产党人作战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于12月中旬在江西省宁都城突然起义，启发了毛的这个想法。这支有17 000名士兵的部队之所以起义，正是因为他们对蒋的对日不抵抗政策极为不满。坐落在瑞金以北数十里的宁都城就这样一下子变“红”了。^[67]

1932年1月中旬，在中央局的一次例行会议上，毛向他的“同志们”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侵华已经引发了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大家都知道应当利用发展中的形势，但毛真正想讨论的问题是怎样利用。

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临时政治局的代表们几乎是勃然大怒。共产国际也认为，日本人制造皇姑屯事件的目的就是为进攻苏联搭建一个平台。有一个人气昏了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他当面指责毛，“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68]接下来是死一般的寂静，毛则气得说不出话来。

他不想再与中央局的成员们共事了。刚开完会，他就请了“病”假，和妻子、警卫一起到山上去了，把他的政府职责交给了项英。这是他的老把戏了，1929年6—11月间与朱德和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发生矛盾时，他就用过这一招。接着，他又受到一次打击。王稼祥撤销了他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此时已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考姆纳德（王稼祥的俄文化名）自己取而代之。

毛似乎陷入了忧郁之中。在离瑞金25里远的高高的东华山上，他找到了一个废弃的寺庙。他一连几天坐在光线暗淡的庙里吹奏一支洞箫。这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乐器，它由竹竿制造，上有八个孔。还在井冈山时期，毛就喜欢上了它。庙里潮湿阴冷，贺子珍坚持让他搬到附近的山洞里。在山洞里，他继续吹箫取乐。但吹箫和乡村生活并不能安定他的精神，吟诗弄词也不行。^[69]毛回想往事开始意识到，未来的斗争将是极其残酷的。

中共领导层中最近的这次“左”倾冒险主义还是与莫斯科直接有关。中国共产党人像以前一样接受莫斯科的一切指令，无论是战略的还是策略的。而在此时，那里的人正在一股脑地讨论右倾的危险。斯大林彻底击败布哈林和其支持者后，又从党的领导层中清洗了政治局候补委员谢尔盖·瑟尔佐夫以及我们非常熟悉的罗米纳兹。罗米纳兹在自中国回国后，成了联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委的领导。他属于一个“左—右小集团，该集团的纲领与右倾观点相同”^[70]。此事发生在1930年12月初。随后就是对“工业党”的审判。这是个被编造的由工程师、技师和经济学家组成的右翼组织，被控反苏和搞破坏。在这起案子中，有两千多人被镇压。这就难怪许多共产国际的人认为右倾危险就在身边，斯大林的看法也是如此。他认为，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加速进行和世界危机的深化，阶级斗争将越来越尖锐，资本主义将越来越具有攻击性。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1931年3—4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认为，“革命高潮在成长”，尤其表现在“苏区和红军在中国腹心地带的发展和加强……以及殖民地革命运动的日趋强大”^[71]。

7月3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给中共中央发去了一份特别指示。该指示在详细阐述了全会的决议后指出：“在运动的当前阶段，国家正面临革命危机，苏维埃政权在一些地区取得了胜利，斗争的结果首先直接取决于共产党本身……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各个方面全面揭露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在理论和实践上与它斗争到底。”^[72]

顺便说一下，正是这份文件正式规定：富农和贫农对土地具有不同的权利。但这只不过是泛泛而谈，并没有对毛泽东提出具体的批评，与毛斗争的尖锐化是中国共产党新领导层自己的事。决议也没有提到对城市的新的进攻，攻占“一到两个中心城市”的计划同样也是上海领导层策划的（由此导致的、攻占赣南的赣州市的计划在1932年初付诸实施，此战使红军蒙受重大损失），尽管在共产国际看来，他们的计划还不够大胆。临时政治局发出8月指示两个半月后，米夫就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提出了攻占中国主要城市的想

法。^[73]斯大林支持了他。

在这种情况下，谈论“游击策略”自然不可能让中央局领导层满意。周恩来同中央局成员一起开始认真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共产国际同意这个指示，但是毛反对。这并不是说，他一味地反对攻占城市。富裕的商业中心一直吸引着他的注意力，只不过他想的是像小说《水浒传》中他喜欢的英雄一样行事。这就是：突然攻占一个防守薄弱的小城，抢掠一番，然后回到安全的避难所。他认为坚守大城市是错误的。正是这个看法惹恼了领导层。像以前一样，他们认为中国革命只有依靠城市中心才能取得胜利。不过，毛还真是勇敢，这不是他第一次逆潮流而动了吗！也许，他已经感觉到了他背后的某种力量？

毛这次又幸运地度过了危机。攻占赣州的努力失败了，彭德怀统一指挥下的红三军团和红四军遭到严重损失。许多军事指挥员现在明白，毛反对这次进攻是正确的。“我三军团兵力才14 000人，敌以优势兵力，据坚防御，当然不易攻克。”彭德怀后来回忆说，“敌情没有确实弄清楚，就贸然攻坚，这也是一次严重的错误。”^[74]更不幸的是，包围赣州的这两个月（1932年1—3月）正是日本进攻上海的时间。日本于1月28日进攻该城，目的在于镇压抵制日货运动。在他们看来，抵制日货不仅威胁他们的经济利益，而且威胁到居住在上海的天皇臣民的安全。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防守该城的是国民党第十九路军。^[75]形势看起来好像是，共产党和日本人在互相配合。“打赣州，”彭德怀写道，“不仅没有利用一·二八事变，高举抗日旗帜，在政治上打击蒋介石国民党，反而给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找了借口。”^[76]

中央局的领导们不得不低下他们高傲的头。3月初，项英冒着倾盆大雨来到毛的住处，以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周恩来个人的名义请求他迅速回来工作，毛泽东喜不自禁。不得不厚着脸皮来求人的项英被雨淋得像个落汤鸡，看起来很可怜。毛和贺子珍当晚就收拾了东西下山去瑞金。毛把他的洞箫也收了起来，谁知道他将来还要吹几次呢？事实证明，他这一次走出“冷宫”的意义并不大。

他现在必须立刻到瑞金以西二百里处的赣县前线去，不过，在

那里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将有关日本侵华的一份宣言交给中央局和苏维埃政府的成员。早在1月下旬日本开始轰炸上海不久，他就拟好了宣言的大纲。宣言明确宣布：中华苏维埃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共产党的部队离东北和上海还远得很，因此这个行动纯粹是走形式，但它在政治上的意义却很大。毛认为，通过宣传与鼓动，大胆利用民众的反日情绪，中共就能够使自己在众多中国爱国者的眼里成为一股真正的民族主义力量，这有助于它与国民党的斗争。经过漫长的争论，毛的“同事们”终于于4月15日通过了这份宣言。六天后，它被刊登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机关报《红色中华》上。^[77]

此时，毛已经远离瑞金了。在3月剩下的时间里，毛一直待在赣南，试图扭转危险的局势。后来，他转移到在福建的林彪的部队里，参加了在闽南和闽西南的军事行动，直到6月底。战果是明显的。不用说，这巩固了毛在军队中的权威。对福建的英勇作战紧接着对赣州的不成功的进攻，前者给官兵提供了许多快乐的时光，后者则是新领导们的败笔。^[78]

不过，他还是得与中央局的成员们就策略问题进行激烈的、不愉快的讨论。他的对手们认为，不应当用小规模作战来刺激敌人，眼界应当放宽一些，应打大仗，一下子就攻占一个省。讨论变成了尖锐的政治冲突。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和朱德在1932年5月3日发给中共中央的一封电报里对双方的观点进行了总结。以下是电报的部分内容^[79]：

关于（中央）苏区扩大的方向和红军的行动，我们有分歧。去年底，在苏区中央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建议在福建、广东、江西、湖南交界处的山区建立苏区。考姆纳德（王稼祥）站出来反对这个计划，说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下，这偏离了攻占大城市的方向……当莫斯科文（周恩来）来到后，毛泽东……表示反对进攻中心城市。……毛的政治路线是百分之百的机会主义，它低估了当前的形势，完全违背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我们已决心与毛泽东的错误作斗争，在党

内批评他。^[80]

九天后，毛不在瑞金的时候，中央局开了一次会，再次批判毛的“逃跑主义路线”。会议通过的决议说：“须彻底纠正中央局过去^[81]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82]这份决议被迅速发往上海临时政治局的各位成员。中央局将他们与毛的分歧也通告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他们显然很有信心地认为，他们的保护人米夫最终会制服这位固执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脑。因此，他们没等回复就迅速地给周恩来发了一封电报，强调有必要与右倾机会主义做更坚决的斗争。

但是，中枢的反应却令人泄气。比米夫更有权力的人对毛的问题进行了干涉，其中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1932年5月15日，与斯大林关系密切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库西宁、曼努伊尔斯基、皮亚特宁茨基和皮克研究了在瑞金所发生的冲突，他们都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成员。毛被置于莫斯科的保护之下。^[83]

临时政治局和中央局并不想承认失败，但他们不得不撤退。“所有的问题都被正确地解决了，”周恩来在收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委员会的电报后于1932年6月9日向中共中央报告说，“我们的讨论是在同志般的气氛中进行的，而且仅限于中央局内部。这并没有妨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工作。”^[84]

让博古和他在江西的同伙们唯一感到高兴的是，莫斯科只是不让公开地批评毛。像以前一样，莫斯科还是不赞同他的游击策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周在发了那封提到“同志般的气氛”的电报后，又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要求领导层同意让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这位主席离开瑞金。周在6月10日的电报中是这样写的：“毛泽东身体非常虚弱，他在高山上坚持工作，失眠，胃口不好。但他善于指挥作战，一与部队待在一起就生龙活虎。中央局已经决定派他去前线指挥作战，他自己也希望到前线去。”^[85]

这封电报的内容有点奇怪！此时的毛还没有从赣南走到瑞金的“高山”上，可在周恩来笔下，他却已经感到身体不适，不能吃，睡不着了。中央局的成员们对这位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

双料主席的归来大概不太高兴吧。毛自己也不想回瑞金。6月中旬，他已经到赣南与他的部队在一起了。他就是在那里才知道，临时政治局决定重新组建红一方面军。新组建的红一方面军由三个军团（第一、第三和第五军团）和几个独立的部队组成，朱德再次担任红一方面军的总司令，王稼祥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毛将与他们一起领导红一方面军抗击进攻苏区的国民党军队。^[86]

此时的毛不仅要展示他杰出的军事才能，还要表现出超常的外交能力。对同一个领导班子中的老对手王稼祥，毛灵巧地使用了政治家们无不喜欢的“分而治之”策略。早在1931年4月初王同任弼时一起来到他在清塘村的家时，毛就十分关注王。这个驼背的年轻人比他小13岁，戴一副圆眼镜。像陈绍禹团队中的所有人一样，王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但与陈、博古和洛甫不同的是，他没有过多的野心。他虽然是个教条主义者，坚定地相信苏联经验，但骨子里仍然是个普通的中国农民。^[87]尽管他有时粗鲁、不饶人，但你同他可以找到共同语言。

毛在4月末时就已经开始“拉拢”他了，但未能取得什么实质性的结果。^[88]此次，在朱德的帮助下，他重施故技，最终将这个“顽固的年轻人”争取过来了。7月下旬，周与毛、朱和王一起签发了一份给中央局的电报，要求他们取消再次进攻赣州的计划。同一天，四人向中央局（它在瑞金的代理书记是任弼时^[89]）建议，恢复设立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位。这是为毛量身定做的。为了让毛顺利就位，他们甚至提议取消政府主席这个职位（毛不可一身兼两职）。^[90]

眼下，毛需要这两个前对手，于是便竭尽全力拉拢他们。毛希望在他们的帮助下，打破党的新领导们在他身边筑起的隔离圈。

但是，远在瑞金的中央局成员们，在博古和洛甫的压力下，无意缓和关系。尽管不得不过毛当政委，他们还是继续批判他的游击策略，坚持主张攻打大城市。

盲目执行临时政治局指示的中央局成员的军事观点与毛的观点差别太大，冲突日益激烈。中央局再次提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这位双料主席的“机会主义”问题，对毛的批评

达到了最高潮。他们尖锐地批评毛像以前一样，顽固地坚持“防御策略，一点也不敢进攻”，躲避大战，钻山沟，分散部队。^[91]对这种行为极为愤怒的任弼时等中央局成员于1932年9月得出一个结论：“毛泽东不懂马克思主义。”^[92]他们决定撤销毛的职务，公开批判他，并将他们的意见及时通知了中央：

毛泽东同志对扩大（中央）苏区、攻占大城市以及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革命）胜利等问题犹豫不决。他的机会主义路线……在继续。他常常无视党的领导来推行自己的路线，根据个人关系而不是工作需要提拔同志。尽管莫斯科文同志在那儿^[93]，但他很难将中央局的精神贯彻到实践中去，以根本改变他们的行为。……为了在军事领导层统一思想，我们公开地、坚定地批评了毛同志的错误，希望把他调到后方来从事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工作。^[94]

很明显，毛无论在前方还是在后方都不能让他们满意。9月末，中央局成员们不等中央委员会或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批准，就去前线（宁都县）“召开中央局全会”。他们10月初到达前线，在小源村召开了会议。在会上，他们不仅对毛的“游击习气”和“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也批评了周恩来、朱德和王稼祥等“姑息者”，说他们“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结果，毛不得不像过去一样“以健康原因”离开前线，被送到宁都以南三百多里的一个设在高山上的医院里。中央局几个成员不无高兴地同意他“暂时请病假”。^[95]

临时政治局的领导们此时也正在上海开会，接到瑞金的电报后，他们“高兴得直搓手”。对迫不及待地要打倒毛的临时政治局来说，宁都的这次会议显然提供了一次机会。“我以为应该做坚决的斗争，但不一定指出泽东名字，而与他的倾向在党内做积极的斗争。”博古激动地说。“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洛甫附和说。^[96]其他领导人虽然也同意，但是他们担心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对此事的态度。他们害怕惹得莫斯科再次发火。解决方法实际

上也简单。详细讨论后，领导们撰写了两份内容不同的电文。第一份电报用汉语发给中央局（在毛泽东已经离开宁都后，苏区中央局才收到），第二份电报用英语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并附上了中央局来电的译文。两份文件均于10月16日到达莫斯科。发给共产国际的版本强调，不应当有针对毛的“公开讨论”，但发给江西的版本说的正好相反：“开始讨论泽东的观点。”^[97]

中央局几个成员摸清了政治局的态度后，背着毛撤销了他总政委的职务，由此消除了他对军队的任何影响。他们把这个职位给了周恩来。两周后，他们的决定得到了上海的批准。

毛并没有把他在政府中的闲差当回事，宁都会议使他感到自己没有真正的工作可干。据贺子珍回忆，毛得知这个决定后怒不可遏。他大叫道：

教条主义真害死人！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反而到处下指示，却要指手画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他们懂吗？^[98]

此时让他唯一高兴的事是又添了一个儿子。1932年11月初，子珍生了一个儿子，毛给他取名叫岸红，意思是“到达社会主义彼岸的红军”。幸福的妈妈双手抱着他，乐不可支。但她也有烦恼。她正在打摆子，医院里的人害怕她的奶水可能不安全，不让她给孩子喂奶。但是毛并不泄气，根据毛的指示，警卫员为婴儿找了一个奶妈。这个淳朴的农妇称呼怀里所有的孩子都用一个名字“小毛毛”，意为“小毛球或毛茸茸的小东西”。毛泽东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叫法时乐坏了，“你看，”他对子珍说，“人家叫我老毛，我的儿子叫小毛毛，比我多个毛。将来要比我强哦！”^[99]

在这种困难的形势下，除了靠幽默调解心情外，帮助打发日子的还有他的旧洞箫。毛吹奏的悲伤曲调也正适合他妻子的心情。

莫斯科再一次出手救毛。莫斯科往中国派了一个新的代表，博古、洛甫之类的人在此人面前都得立正站好。1932年秋天，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新代表及其夫人（她的名字叫奥古斯塔·伊丽莎，娘家

的名字是萨博洛夫斯基，化名萨博）到达上海，他是个名叫亚瑟·恩斯特·艾威特的德国人。当然，在中国没人知道他叫艾威特。他是拿着登记姓名为哈里·伯格的美国护照入境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圈子内，他开始使用“吉姆”和“亚瑟”等秘密化名。（离开中国后，他曾多次改名，亚瑟·布劳恩、格雷、阿尔贝托、卡斯特罗和内格罗都是他曾用过的名字。）这个42岁的德国老共产党员曾当过四年德共政治局委员（1925—1929），在共产国际里地位很高。1927年，他成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两个重要部门中欧局和英国局的成员。1928年，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他甚至被选为执委会候补委员。从1929年开始，他同米夫一起担任东方部的副部长。他像所有的德国人一样，一丝不苟而又迂腐。他还是个酒鬼（也许是因为他在苏联待了很长时间？）。艾威特在这个关键时刻在毛的政治生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正是他在毛与党内对手斗争时给这个倔强的湖南人提供了支持。尽管他自己也认为毛的军事策略是“危险的”、“消极的”、“偏离正确轨道的”，还向共产国际报告说，“毛泽东的大方向是错误的（过分强调防御的效果，过分强调钻山沟等等）”，但他还是选择支持毛。

在收到中央局的电报后，他毫不犹豫地进行了干预。在他看来，“江西党的领导”在没有任何事先准备的情况下就撤销毛的职务、公开批判毛是错误的。1932年10月8日，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书记约瑟夫·阿罗诺维奇·皮亚特宁茨基（其在密码电报中的代号是皮亚特宁查，还有米哈伊尔）报告说：“不用说，在目前形势下这样处理问题会向敌人暴露我们的弱点。”他指出：

不应当在没有穷尽所有的可能性和没有认真准备（更不必说必须事先征得你们的同意了）的情况下就寻求这样的决定。毛泽东依然是个受欢迎的领导，因此，在与他作斗争以执行正确路线时有必要谨慎。因此之故，我们已经出面反对决议中的那部分内容，要求消除领导机构内部的分歧，反对此时撤销毛泽东的职务。我们将尝试转变他的思想。^[100]

艾威特自然也把他的看法通报给了中共中央的领导人。

博古和洛甫虽然不得不后退一步，但他们依然不让毛重掌军权。看来党的领导人就是无法容忍他，但是他们也无法避免与他打交道。1933年初，他们甚至不得不亲自见毛。此后，他们的工作是如此繁杂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不能想象避免个人接触。1933年1月末，博古、洛甫和另一个临时政治局的成员、28岁的上海印刷工人陈云（此人真名廖陈云，曾有一段时间与周恩来一起领导中央特科）被迫转移到中央苏区。^[101]他们的转移是由严酷的白色恐怖造成的，用待在莫斯科的王明的话来说，白色恐怖“使党的领导中心事实上无法在上海待下去了”^[102]。中枢机构的转移导致了对苏区中央局的大幅调整，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党的领导层都被置于博古的控制之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到达苏区后，与中共苏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了一个叫做中共中央局的新机构^[103]，但真正的权力还是在博古手里。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来制定党的基本政治路线的人，就是他。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显然是担心这次行动会导致再次爆发党内冲突，于是在通过艾威特发给中央委员会的一封电报中特别提到了“毛泽东的问题”。“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104]在将这道指示转给瑞金时，艾威特附上了自己的意见：“我们要求你们紧密团结毛泽东一起工作，但是你们同时也要注意他，以确保军事工作顺利开展，而不被过多的讨论和犹豫不决所破坏。”^[105]

从1933年1月起，共产国际执委会和它的远东局逐渐失去了影响中国共产党党内决策的机会。在临时政治局离开后，它们之间的联系降到最低限度。艾威特发给瑞金的电报无法替代共产国际特使与博古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直接接触。党的领导人中唯一留在上海的是李竹声（化名斯拉文）和康生。前者领导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后者则于1933年6月去了莫斯科，并从7月起开始担任王明的副手，其间他用过的化名有皮亚特宁茨基、康生和鲍斯。一年后，李竹声在国民党的一次伏击中被抓获，随即叛变，开始与秘密

警察合作。上海的党组织后又蒙受了新的致命打击。于是从1934年10月初起，共产党人在该城的活动实际上就消失了。不久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也关闭了它的远东局。^[106]

随着党内斗争的持续升温，戏剧性的事件在瑞金渐次发生。博古对毛泽东的印象是如此糟糕，以至于他起初竭力避免与毛有任何接触。1933年1月，在经过毛还在住院治病的小镇时，博古断然拒绝去看这个“病人”。他身边的人试图劝说这位高傲的领导：“你应当去看看他。”博古没好气地说：“毛泽东有什么好看的？”^[107]

博古这样公开地表达敌意当然没什么意义。毛从不这样放纵自己的行为，这不是因为他心里没有恨，他只是更为谨慎而已。

顺便说一下，博古确实应该去“看望”毛。在与国民党作斗争的问题上，毛经验丰富，一些党的官员不时地向他请教绝不是偶然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是位脾气火爆的游击队员，在与毛泽东见了一面后，他就代表省委公开赞扬毛的策略，由此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1933年2月，盛怒之下的博古对所谓的“罗明路线”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党内斗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毛的弟弟泽覃被撤销了一切职务，1933年5月，他甚至被赶出了军队。在那以前，他从1931年6月起一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个地区党委的代理书记和红军独立第五师的政委。他和其他几个毛泽东的积极支持者所受到的打击不少于罗明，毛在中央苏区的大多数亲属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1933年春天，一直担任人民委员会的机要科科长之子珍丢掉了工作，被派去中央党校“进修”。她的妹妹、泽覃的妻子贺怡也被派到那里，此时的贺怡已怀孕六七个月了，但党的领导们仍坚持这样安排。1933年秋末，她生下一个男孩，但孩子很快就夭折了。领导们不断纠缠贺怡，让她揭露自己的丈夫是“机会主义分子”，以至于她生过孩子后不久就得了重病。博古等人认为她是装病，甚至提出开除她的党籍。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和党校代理校长的老党员董必武出面说情，事情才算平息。贺怡逃过了批判，但子珍的大哥贺敏学很快就被撤销了代理师长的职务，被派到红军大学学习去了。甚至连毛的岳父岳母、子珍年迈的父母也受到了打击。他们住在中心区北部的东固村，当地的党组织把他们两人都赶了出来。^[108]

此时的邓小平也被指责犯了“罗明式的机会主义”错误。1931年7月以来，他在中央苏区担任过许多职务。毛在那时注意到了这个性格刚强、在毛的敌人面前不低头的人。^[109]党的领导们表面上严厉批判的是鲁莽的福建省委书记和他的假定的“支持者”，实际目标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尽管没有点名。这同以前一样都是公开的秘密了。

毛感到自己一下子跌到了人间地狱里。在反罗明运动高潮期的2月中旬回到叶坪时，毛明显地感觉到他被完全孤立了。毛的女儿李敏写道：“爸爸消瘦了……喜欢谈笑的爸爸，常常是一个人默默无语，凝神静思起来。他，有时遥望苍穹，对天长叹，有时又以吹吹洞箫来排解自己一腔的烦恼和忧愁。”^[110]

只有贺怡经常到他家来看望他和她姐姐。她哭着抱怨她的生活，毛很同情，但无能为力。“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到我的牵累呀。”^[111]他难受地说。他实际上被剥夺了工作，政治局的大多数会议也不邀请他。许多人害怕与他打交道。他常常一连几天足不出户，宁愿与家人待在一起。许多年后，他回忆道：“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112]

偶尔他也到瑞金的外面去，四处走走看看。有一次他到了距瑞金以北50里的一个不大的军事小镇大柏地，触景生情，遂填了下面这首词，以表达自己的伤感：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113]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幸运的是，他们没有折腾毛泽民和他的妻子钱希均。天性沉默寡言、做事有条有理、沉着冷静的泽民一直在政府部门工作。从

1932年3月起，他就担任国家人民银行的行长，钱希均则担任政府机关党总支副书记。泽民从没参与过任何党内斗争，虽然在内心深处非常同情他的兄弟们，但他帮不上忙。朱德、周恩来和王稼祥此时都在远离叶坪的前线。从1933年2月末开始，前线就在与蒋介石的军队激烈作战，红军用一个月的时间才打退了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在这次“围剿”中，南京政府投入了50万兵力来对付共产党，由军政部长何应钦亲自指挥，形势非常危急。朱、周和王只有一个办法能打败敌人，也就是采用毛的“诱敌深入”的老策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个“魔”法又一次大显神威。3月底，第四次“围剿”被打退了，但周和朱仍像以前一样跟部队待在一起。王稼祥虽然于5月初转移到了瑞金，但毛无法与他单独谈话。王在4月末被弹片击中腹部受了重伤，伤口还未愈合，情况很糟糕。弹片刺进了身体使得他浑身剧痛，因而不得不整天躺在医院里。王被迫吸食鸦片，这是唯一能缓解疼痛的东西。

1933年秋，远东局成员、德国共产党人奥托·布劳恩来到了中央苏区。他曾使用登记姓名为奥地利人库尔特·瓦格纳的假护照居住在上海，在中央苏区，他化名为李德和华夫。他像艾威特一样非常喜欢喝酒，甚至比这位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喝得还要多。他的身材像博古一样又高又瘦，浅色的头发，圆眼镜后面是一双雅利安人的蓝眼睛。他的举止打扮使他看起来像旧德国军队的军士长。布劳恩非常自信和粗鲁，容不得不同意见。尽管他到瑞金只是来担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的，但他明显地夸大了自己的重要性，认为在红军的战略和战术问题上自己才是主要权威。

他的另一重身份是苏军总参谋部第四局即情报局的秘密特工。由于在军事策略问题上，毛这位游击队领导人和中央委员会、共产国际之间存在着根本分歧，因此此人的到来对毛也不是什么好兆头。这位中央委员会的军事顾问1932年秋到达上海时，就已经有人向他介绍过毛的“机会主义”观点了。与布劳恩建立了亲密关系的博古也向这位德国人反复灌输了对这位“傲慢的湖南人”的仇恨情感。这样一来，布劳恩自然就成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及朱德、周恩来这类很少待在瑞金的“软骨头们”的反对

者了。^[114]他和1934年仲夏之前的艾威特不一样，不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但在博古的支持下，他还是篡夺了红军的指挥权。^[115]他本人口头上也批判几年前共产国际领导人的“罪恶”，自己却以实际行动重蹈其覆辙。他不了解中国人或“红军在中国斗争的独特条件”，只与博古和其他苏联学校的毕业生保持联系。至少，同他们在一起时，他可以说非常流利的俄语。来中国前，布劳恩在莫斯科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了四年，所以才有资格进入“斯大林的中国小组”。他专横而又严厉，很快就开始对所有问题，不管是军事的还是政治的，指手画脚。“所有有关党和红军的重大事项都得经过他同意。”毛的弟弟泽民后来向共产国际报告说。^[116]布劳恩自己也承认“其他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李德）。

人的意见受到压制，前线指挥员的主动性常常被忽视”；“我非常固执和僵化……全力维护自己的观点，没有一丁点的自我批评。”^[117]

这样一来，毛头上的乌云便越聚越多。只是由于军队指挥员和有威信的地方党委书记们不动声色而又坚定地支持毛，博古和布劳恩才没能彻底打垮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当然，像过去一样，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还是莫斯科的态度，尽管它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在弱化。我们知道，那里有影响的大人物不想打倒毛。共产国际执委会里的情况当然是复杂的，并不是所有的领导都把毛看作中国共产党里最重要的领导人。东方书记处远东处及其处长巴维尔·米夫一门心思地想把莫斯科各高校的中国毕业生提拔到中国共产党内的关键岗位上来。正是在米夫的帮助下，王明在1931年成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团长，博古成了党的领袖。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的其他官员们也意识到，“米夫的雏鸟们”缺乏实践经验。他们中的一些人看好共产国际的老同志周恩来、项英和张国焘。共产国际执委会内部也有几派，最著名的一派是由约瑟夫·阿罗诺维奇·皮亚特宁茨基和德米特里·扎哈罗维奇·曼努伊尔斯基领导的。这些派别在幕后斗

得你死我活，例如，米夫和东方部副部长路德维希·伊格纳季耶维奇·马蒂尔就经常闹矛盾。^[118]在谁来主管中国共产党这个问题上，他们之间也没达成一致。因此，可以理解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中的各派官员们大多出自个人的野心来支持中国共产党内“他们自己的人”。我们知道，斯大林起初并不把宝压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或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的任何一派身上。毛只是作为周恩来、项英、王明、博古和洛甫的平衡者才被提拔起来的，此举实质性地巩固了他在30年代初的地位。

只是到了30年代中期，斯大林才做出了支持毛这一决定性的选择。1934年1月中旬，在莫斯科的坚持下，中共中央的一次例行全会选举毛为政治局委员。^[119]这次全会在瑞金召开，但是毛找了个老借口“生病了”，拒绝参加会议。为此，博古“语带讥讽地”对奥托·布劳恩说，毛周期性地犯“外交病”。问题的症结在于，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像往常一样，它一直在试图破坏毛泽东的威信）的决定，“关于苏维埃运动及其任务”的报告将由党内的二号人物洛甫来做，而按照正常的程序，这个报告本该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来做。^[120]博古派还提议由洛甫取代毛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毛当然对此不满，故而“称病”不出。

全会选举了由七人组成的新的政治局常委会，这七人是指定担任总书记的博古及洛甫、周恩来、陈云、张国焘、王明和项英。

1月底，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693名代表和83名候补代表批准了党提出的所有决议，再次选举毛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此时这个职位已没有任何权力。^[121]在代表大会结束后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洛甫就取代毛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它现在被称作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122]令人吃惊的是，毛是在莫斯科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取代的，这不同寻常。^[123]

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结束后，他又一次“称病”休息。但博古、奥托·布劳恩和他们的支持者似乎对事态发展的这一趋势感到高兴。1934年初春，他们把毛的“病”情通告给了亚瑟·艾威特。艾威特通过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李竹声又将此事汇报给了共产国际

执委会书记皮亚特宁茨基和王明：

毛泽东已经生了很长时间的病了，因而要求把他派到莫斯科去。你们认为是否可以派他去当（预定于1935年7—8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根据你们的代表（艾威特）和（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看法，很难保证他的旅途安全。此外，我们需要考虑政治后果。^[124]

但共产国际执委会很清楚，派毛泽东参加大会这个想法是博古想出来的。对博古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将这个“顽固和有势力”的领导人赶出苏区的借口。4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通过了以下决议：

他到莫斯科的旅行是不合适的。必须尽最大努力给他在苏区治病。只有在苏区实在没有办法治的情况下，他才能来苏联。……我们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旅行，因为我们不想把他置于长途跋涉必然带来的危险之中。他一定得在苏区治病，不管花多大代价都行。只有在当地实在没有办法治而有死亡危险的情况下，我们才同意他来莫斯科。^[125]

博古试图反对。在他的命令下，1934年6月来到莫斯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土地部长高自立又一次提出了毛的问题。他把博古的话带给了王明，说毛“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的”^[126]。

不过，此时也正是莫斯科开始宣传毛的英雄形象的时候。1934年，俄文版的《共产国际》杂志和《在国外》杂志刊登了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毛的报告同时出了俄语和汉语的单行本，分别发行了5 000册。随后，毛泽东讲话和文章的第一个选集在苏联同样以这两种语言出版了，同样分别发行了5 000册。（的确，这本选集只收录了毛的三篇讲话，因为他撰写的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其他文章，共产国际执委会一篇都没有。）^[127]1934年11月，《在国外》

杂志在它的“当代人肖像”栏目中刊登了格奥尔基·鲍里索维奇·爱伦堡所作的毛的第一篇特写。在此之前，只有一篇向读者介绍毛泽东生平的文章在苏联刊登过，这篇文章是1930年2月由《真理报》驻华记者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伊万诺夫以笔名阿尔文发表的。但在文章中，毛是和朱德一起出场的。^[128]

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正副团长王明和康生摸清了风向后，于1934年9月建议中共中央“学习朱德和毛泽东的榜样，直接打游击去”^[129]。

但博古和奥托·布劳恩依然不退让，毛像以前一样，无论对军事事务还是党的事务都没有发言权。冲突在加剧。最重要的是，此时中央苏区的军事战略地位灾难性地恶化了。1934年10月，11个月前改名为中央红军的红一方面军在与蒋介石军队作战时遭受了非常严重的失败。

一年来，中央苏区的共产党人一直试图遏制“围剿”部队的进攻。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于1933年9月下旬，即奥托·布劳恩到来前的两三个星期。这一次，蒋介石投入了100万兵力，亲自指挥对“赤匪”的进攻。蒋介石的身为纳粹党员的德国顾问们为整个战役制订了周密的计划，他们沿着苏区边界修建了几千个坚固的石头碉堡，每个碉堡之间间隔一至两英里，以图一举荡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蒋决心要一劳永逸地消灭中国共产党，因而处处谨慎。最重要的是，他不想操之过急。士兵们以每日两到三里的速度慢慢向“赤区”挺进，每到一个新战线就巩固阵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包围圈在缩小。蒋介石的一个将军把这种战术形象地比喻为“涸泽而渔”。蒋不仅动用了军事手段，还动用了政治手段。他特别强调后者，宣称“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在所有重新夺回的地区，都恢复了传统的互相担保的乡村保甲制度。当地农民的自卫团也被重新建立起来。对共产党领导人提出了高额悬赏，例如出价25万大洋买毛泽东的人头。1934年，在蒋介石的提议下，国民政府发起了一个宏大的民族复兴运动，目的在于恢复儒家的礼仪和道德规范。^[130]

所有这些措施都产生了效果。红军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损

失惨重。奥托·布劳恩根本不知道中国的情况与俄国完全不同，反而在博古的支持下提出了“不丢失一寸土地”的口号，强制红军打毫无意义的阵地战，这使得形势更为恶化。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他学的最重要的课程就是如何策划进攻，这使他坚定不移地相信闪电攻势的魔力。

他不断地指挥红军部队向工事坚固的敌人阵地发起进攻，让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往前冲，这自然没什么效果。毛被剥夺了话语权，对此无能为力。只经历过严酷的游击战训练、没上过任何军事院校的毛明白：“只要我们缺乏优势兵力或充足的弹药，在每个苏区都只有一支红军部队承担全部作战任务，阵地战就对我们基本上没有用处。对我们来说，无论进攻或防守，阵地战总的来说是不合适的。”^[131]但博古和布劳恩根本不理他。

1934年夏初，形势终于变得不可救药了。亚瑟·艾威特是这样描述的：“由于不停地打仗和战场缴获不多，我们的弹药供给严重不足。开小差的人日益增多，我们的损失巨大。”5月，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决定将主力红军撤出中央苏区，他们给莫斯科发了一封紧急电报：“我们决心保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到最后一刻，同时准备将主力部队往其他方向转移。”^[132]随后的另外一份电报要求给予相当于100万墨西哥元的资金援助以购买药品和军服。^[133]博古、洛甫和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指挥作战。^[134]但根据奥托·布劳恩的回忆，实际上所有重大问题都是博古、周恩来和布劳恩“私下商谈”解决的。^[135]顺便说一下，这种做法很快就惹恼了洛甫，他不想扮演他在党的领导层中的这种有名无实的角色。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于6月8日批准了博古和中共其他领导人提出的计划，约瑟夫·皮亚特宁茨基很快就将这个计划告诉了艾威特，但强调：主力部队离开中央苏区应当被认为是“暂时的”，是“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免于受到攻击”的权宜之计。在资金方面，只给“中国同志”寄了20万卢布而不是墨西哥元（根据当时的汇率，大约相当于15万墨西哥元）。^[136]

毛泽东对这些情况毫不知情，尽管他很早就认识到了突破封锁的必要性。7月底他就已经考虑到了把红军以及会昌县委撤出中央

苏区的可能性，并且提出了向广东方向突围的想法。当然，这个行动需要得到博古、布劳恩和周恩来的同意。这些人当然不会同意的，他们打肿脸充胖子，认为还没有到撤退的时候。毛在盛怒之余写了一首词：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137]

三人团没有告诉他撤退的真实计划，连周恩来也不露一点口风，尽管他和毛的关系不错。^[138]直到撤出瑞金前不久的10月初，三人团才感到有必要将撤退一事告知毛。此时，他正在首都以西二百里处的于都与红一军团的官兵在一起。从9月下旬起，他一直在打摆子，此时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这场病把他折腾得够呛，他看起来形容憔悴，疲惫不堪。

此时，三人团才将允许30名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妻子们跟随部队的决定通知他，这一决定又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的。除了这30人，只有另外23名妇女被允许参加长征，其中大多是护士和其他服务人员。^[139]令人高兴的是，30个人中包括子珍。她报名参加了总卫生部的卫生队。但毛和子珍不得不撇下他们两岁大的儿子“小毛毛”岸红。三人团在这方面很坚决：不能带孩子行军。

毛立即派了一个人把这个消息通知了他的妻子，她此时正与他们的儿子住在瑞金西南38里处一个名叫云山庙的山中古庙里。她为了躲避敌机的空袭，在1934年7月与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官员们一起转移到了那里。毛建议子珍将孩子交给奶妈，我们知道奶妈对孩子就像自己亲生的一样。但奶妈住在一百多里外的闽南乡下，子珍来不及将孩子送给她，于是向她的妹妹贺怡求助。贺怡和她丈夫、毛的弟弟泽覃以及与他们住在一起的亲戚们没有转移。她和泽覃像其他许多党和军队的干部一样，要在项英和陈毅的领导

下坚守在老根据地。泽覃被任命为一个独立师的师长，活动在闽西南的大山中。

情急之下，子珍让她的妹妹负责安排岸红，贺怡当然高兴地答应了。“走吧，啥也不用担心，”她安慰子珍说，“我来照顾亲戚和这个外甥。”她们商定由贺怡尽快地将孩子送交给奶妈。

子珍和毛再也没见到他们的儿子。几天后，红军主力部队从中央苏区向西开始了他们著名的长征。10月25日，他们冲破了第一道封锁线，转移到了湘南。这时，贺怡已经把岸红送到了乡下奶妈的手里。贺怡自己和她的亲戚们则在一个有名的红军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她又怀孕了，因此，组织上决定她不随丈夫去山区。后来，泽覃为侄子的安全起见，决定做一些更稳妥的安排。在他的指示下，孩子被转移到了他在瑞金的一个警卫员的家里。几个月后的1935年4月，毛泽覃和一队游击队员中了埋伏，牺牲了。他把岸红下落的秘密带进了坟墓。

革命胜利后的1949年秋，子珍、贺怡和她们的哥哥敏学都想找到这个孩子，但没成功。贺怡特别用心，因为她感到对不起姐姐。但在她寻找之际，她乘坐的吉普车就在泽覃牺牲处的一条山路上翻了车，贺怡在昏迷之中死去。^[140]

★ 第三章

长征

1934年11月初，红军各部队突破了第二道碉堡封锁线后，挺进到湘东南。此时，他们还有八万六千多人。部队被分成五个军团（第一、第三、第五、第八和第九军团）和两个所谓的野战纵队——军委纵队（它的秘密代号是红星）和运输纵队（它的秘密代号是红章）。第一纵队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组成，包括毛泽东。第二纵队由中央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的成员和各种后方服务人员组成，包括医疗队。我们知道，贺子珍就是医疗队的一个护士。与第二纵队一起行军的是“预备师”，全部由失业的农民组成，他们被招来当搬运工，每人每天给半个大洋。用奥托·布劳恩的话来说，这些人“运输几百捆传单、成箱的银元和兵工厂……预备师的人为方便起见没有武器，至于他们带的长矛、大刀和匕首，算不上什么武器”。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体上是三比一。六万名士兵有四万支步枪和一千多挺轻、重机枪，还有几门很快就被扔掉的大炮。他们是一只前行的长龙，随时随地都会受到敌人的攻击。所有的士兵都携带着成包的米和盐，分量足够支撑两个星期。^[141]

行军的目的地到最后都没有确定，唯一的目标就是突破包围圈。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只要他们冲出了碉堡封锁线，一切都会自然明了。与共产国际执委会没有电台联系。随着1934年10月初上海局遭受灭顶之灾，电信联系就被切断了。国民党警察在搜查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俄语化名米茨科维奇）的秘密住所后，发现和没收了一部电台。这部电台一直是中共中央、远东局与共产国际执

委会之间保持通信联络的唯一途径。^[142]与其他苏区也没有联系，没人知道各地的情况如何。中央风闻以南昌起义英雄贺龙任总指挥的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正在湘鄂川边界一带活动。这支部队此时的党委书记是中央局的前成员任弼时*，他于1933年5月被派去协助贺龙工作，毛在新民学会时期的老熟人夏曦就在任身边工作。有关张国焘领导下的第四方面军的消息也断断续续地传来了。传言说他们在1932年10月被蒋介石打败后，从鄂豫皖地区先是撤向北边，然后又撤到川西北。但情况是否真实，无论毛还是中央委员会的其他人都不知道。只有一件事或多或少是清楚的，他们必须往西转移，去桂湘黔交界的三角地带。据布劳恩说，在共产党人控制的这个区域里“没有敌人的碉堡”^[143]。认真研究后制定的行军路线将穿过客家人聚集区^[144]，客家人自然把红军当做解放者来欢迎。正是由于他们的支持，红军才得以最终克服一切障碍于12月到达贵州。尾随而至的国民党军队害怕客家人造反，不敢贸然进攻红军的主力部队。客家人按照自己的氏族规则生活，并不买“当地国民党人”的账。

*任此时担任红二军团政委、湘鄂川黔临时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译者注

尽管红军成功地突破了敌人的几道封锁线，相当顺利地完成了第一阶段的长征，部队的士气仍不高。许多深受撤退影响的干部战士开始埋怨，行军中的困难更是增加了他们的不满。他们不知道还要走多远，还要受多长时间的苦，是否有一天还能回来。逃兵和落伍者每天都在增加，留下来的人已经筋疲力尽。这为毛东山再起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毛认为只要把这种情绪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加以利用，就能打败博古。他要让三人团起内讧，让罪魁祸首博古和奥托·布劳恩与其他政治局委员，包括那些在过去也冒犯过他的人对立起来。他必须大胆、果断，但又不能太张扬。

毛开始在暗中秘密策划，等红军到达贵州时，毛已成功地将党的领导层中的大多数都争取过来了，军队指挥员也都站在他一边。最关键的是，他与博古以前的亲密战友和忠诚的朋友洛甫结成了一个秘密联盟。毛在20年代初就在上海见过这位学究气的哲学家。那时，洛甫还不叫这个奇怪的化名。这个化名是由他的俄语姓氏Измайлов的最后两个音节构成的，这个姓用中文写就是伊兹梅洛

甫。^[145]大家都知道他叫张闻天，是个有才华的年轻记者和小说家，是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少年中国学会”的一个积极分子，与许多著名作家和诗人都有来往。他多才多艺，在中国、日本和美国都上过学，学过西方文学、物理学和数学，精通社会科学。比毛小七岁、比博古大七岁——他出生于1900年8月30日——的洛甫代表了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两个阶段。他同未来的共产党创始人一起参加了五四运动，1925年至1930年间受中共上海市委派遣与“米夫的雏鸟们”一起在莫斯科的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学习。他像博古和奥托·布劳恩一样又高又瘦，但与他们不同的是，他处事非常圆滑。透过他眼镜上厚厚的镜片，你可以看到一双知识分子的聪慧的眼睛。^[146]

在长征前的几个月，也就是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毛就开始对洛甫下功夫了。他注意到，随着军事形势的恶化，洛甫变得越来越紧张，而且不时地对奥托·布劳恩和博古的专制作风表示不满。就在毛决定要利用这一点时，洛甫本人出人意料地来向毛“讨教”了。他像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不太熟悉军事事务，喜欢怀疑，喜欢刨根问底。他们之间的对话是平等的，没人知道他们谈了什么。只是在过了许多年之后，洛甫才讲述了他同毛泽东所谈论的一些迫切的问题。“我觉得完全失去了权力，我对此非常生气。我记得，在长征前，有一次毛泽东同志同我谈了话，我坦诚地向他讲述了我所受的所有委屈。在此之后，我就同毛泽东同志接近了。他建议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团结起来。这样就形成了三人小组。”^[147]在这次会谈之后，毛就开始在他参加不多的政治局会议上有意识地称赞洛甫，而洛甫与博古的争执也就多起来了。在4月底红军遭受了又一次重大失败后，洛甫向他的老朋友开火了。当时在场的布劳恩多年后回忆道：

洛甫说，在这样不利的地形和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本不该打仗。博古反驳说，他的观点与列宁所批判过的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是一样的。在1905年莫斯科起义后，后者发表了典型的孟什维克式的声明：“他们本不该拿起武器。”

奥托·布劳恩支持博古，说“我们不应当迷信地形，打仗前谁

也无法确定胜负”^[148]。还待在医院里的王稼祥在中央苏区时就密切关注军事行动，他完全支持洛甫。

撤退开始时，毛、洛甫和王之间的关系已变得如此牢固，当毛建议他们三人在同一个纵队时，他的新朋友们痛快地答应了。^[149]毛把一切都扭转过来了。据布劳恩回忆，第一阶段的行军结束时，“阴谋家们”组成了“政治领导中的小集团，它从事颠覆性的活动以图夺取党和军队的领导权”^[150]。三人中的每个人都尽力“拉拢”军队指挥员和党的高层领导。由于腹部疼痛和其他原因总是处于一种极其烦躁状态下的王稼祥在这方面特别积极。^[151]周恩来虽然还站在博古一边，但这不足为虑。毛毫不怀疑，这个灵活而又谨慎的人最终将会与最强者站在一起。

毛的估计不错。在红军攻占的第一个贵州小镇黎平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当洛甫、毛和王稼祥要求博古立即召开一次领导层的扩大会议以讨论抗击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结果时，周支持了他们。博古无可奈何，只得同意。尽管他很清楚，即将召开的会议目标是对准他和奥托·布劳恩的。

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当红军向贵州北部的该省第二大商业中心遵义挺进时，斗争的双方都在紧锣密鼓地为决定性的政治斗争做准备。据可靠情报，遵义没有敌人重兵把守，不难攻占，因而决定在遵义召开会议。这样，在领导们致力于解决党内分歧时，红军士兵们也可以休息一下。

遵义是在一个雨蒙蒙的凌晨被攻占的，这一天是1935年1月7日，星期一。由于行军而饥肠辘辘、劳累、浑身透湿的士兵们很高兴能有个吃饱饭和歇脚的地方。他们两周的给养早就耗光了，乡村中贫穷的客家人自己都缺衣少吃。贵州地处山区，天气多雨，不适合农耕，乡下人大多不富裕。有句中国俗话说：在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在经过了五千多里的艰苦行军后，士兵们只想在平静中舒服地过几天。富裕的城市让他们感到兴奋，一个参加过长征的人回忆道：

进入黔北后，红军放了12天假。在湖南境内的行军使大家

备尝艰辛，故这次休息使得大家的体力和精神得以恢复。……遵义是黔北最重要的地方……离四川不远，与四川在风俗、习惯和商业上有密切联系。……在遵义的小餐馆里，你总是能找到可口的川菜。^[152]

1月9日，毛泽东、博古、党的其他领导人和军队将领们进入了这个城市。毛同洛甫和王稼祥一起住在一处宽敞的私人住宅里，这个房子原属贵州军队的一个指挥官。当红军士兵们在小餐馆里大吃四川大白菜、炖肉、鸡、红辣椒和各种腌卤制品时，三个“阴谋家”已为即将召开的会议做好了一切准备。博古也没束手待毙，在他的要求下，依然忠实于博古的凯丰（真名何克全）同红军中的一个重要将领聂荣臻进行了几次“启发式”的谈话。但聂明确地拒绝支持博古。^[153]

总的来说，会议的结果在会议开始前就已经定下来了，博古和奥托·布劳恩脚下的地面迅速坍塌了。在会议的前一夜，毛同他的支持者们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充满激情的王稼祥在会上信心十足，表示道：“到时候要开会，把他们‘轰下来’！”^[154]

决定性的日子终于到了。1月15日一大早，19个人聚集在黔军



遵义会议会址。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实上确立了其领导地位。

师长柏辉章不久前刚建好的私人住宅的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很快又有一个人参加了进来。）这些人是随中央红军行军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几个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除了他们之外，会议前夕才担任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奥托·布劳恩和他的翻译也在场。会场空间有限，房间里有一个硕大的衣橱，与会者的激动的面容映照在衣橱的玻璃门上。除了布劳恩和他的翻译，大家都围坐在一个长方形的大桌子边，桌子上放了一盏旧煤油灯。会议可能要开很长时间，灯可能会派上用场。此时，一道微弱的光线透过一扇彩色玻璃窗照进屋里。像往常一样，外面下起了小雨。

会议开始后，坐在主席位子上的博古首先宣读了一份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的报告，周恩来接着作了补充报告。两人都试图为他们的行为辩护。博古把一切都归咎于客观原因，周则归咎于主观原因。这时，洛甫以毛、王稼祥和他自己的名义发言，对总书记的军事、政治路线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完后，毛接着讲了一个小时。用布劳恩的话来说，“与他过去的习惯不同，他使用了精心准备的稿子”。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这次会议对毛来说至关重要。毛彻底驳斥了博古和周的观点，指责他们两人和布劳恩应为撤离中央苏区承担主要责任。他宣称，他们三人一开始坚持的是“单纯防御路线”，然后“转入阵地战”，到了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时刻，他们“扭头就跑”。毛称这种行为是“把作战当儿戏”。此外，他还批评了博古和奥托·布劳恩的“领导作风”。^[155]

他刚一说完，王稼祥就站起来表示完全支持毛和洛甫。因为想发言的人多，会议开了整整三天。朱德、彭德怀、聂荣臻和林彪在发言中，尖锐地批评了奥托·布劳恩的军事指挥和博古的政治领导。林彪痛斥布劳恩的战略战术“又笨又蠢”。^[156]唯一为总书记辩护的人是年轻的共产党人凯丰，他也是米夫的人。他说毛很可能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但这种批评没什么新意。毛回忆道：“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了。我问

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157]

在这些人发言的时候，奥托·布劳恩安静地坐在门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感觉很不好，这不只是因为他认为这次会议是“卑鄙的偷袭”，还因为他当时正打着摆子。博古的感觉同样糟糕，尽管他没生病。在开会的大多数时间里，他举止明显失常。他不时紧张地露出大牙笑一笑，然后恶狠狠地扫视每个人。周恩来则迅速调整了自己的态度，第二次发言时，完全承认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们是正确的。^[158]强忍着不发一言的布劳恩“要求允许自己和红一军团一起行动”，以便他“能更好地”“通过在前线的直接经验，熟悉毛泽东所高度赞扬的中国内战”^[159]。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毛派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会议通过了洛甫起草的决议草案。决议声称，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错误的”，放弃中央苏区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和政治路线上的错误。^[160]

会后不久，当被邀请来的指挥员和政委们回去后，政治局委员们单独召开了一次组织会议。会上选举毛为政治局常委，任命他担任总政委周恩来的副手，周已不再对他构成威胁了。尽管博古还担任原职，毛、洛甫、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的影响现在已占了上风。^[161]

毛现在快乐至极。开完组织会议后，他兴冲冲地跑去找子珍。

“会开完啦？你，你怎么样？”她紧张得语无伦次了。

听到这话，他笑了起来：“不错，今后有发言权了。”

多年后，他告诉了他的女儿李敏，他们是怎样庆祝他的胜利的。

那晚，你妈妈等我等了好久。当我回到房里还未坐稳她就问。我想给她卖个关子吧，可我的心里也高兴，总也绷不住。人一高兴，话就多起来。我背着手在房里踱着步，慢慢地说：“这个会议，大家都觉得我这个菩萨又有用了，把我抬出来，承蒙大家捧场，选我进中央政治局常委。大家看得起我老毛，认为还是有一点本事。惭愧，惭愧！进入中央领导层，滥竽充数而已。不过我也没有谦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你的妈妈两眼紧巴巴地望着我，听得那么入神。那晚，我们好高兴哟！^[162]

在向他的女儿叙述时，毛只省略了一件事。她的妈妈正怀着孩子，行军中的艰辛、由他的权力斗争所带来的煎熬已经严重损害了她的健康。子珍已经筋疲力尽了，她一个月后就要生孩子，她知道保不住孩子。长征在继续，孩子是不必要的负担。毛似乎没想过这一点，他陶醉在胜利之中。

一个月后的1935年2月，子珍在贵州北部一个小村庄的一个贫穷的彝族农民家的稻草棚里生下了孩子。这个地方像川滇交界的许多地方一样，有许多少数民族，其中彝族是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他们被分成黑彝和白彝。黑彝是当地的贵族，白彝是受压迫的穷人阶层。他们都恨汉人，不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什么区别，经常攻击小股的红军部队。红军的大部队到来时，所有的彝族人都收拾起他们的牲口和财物跑到深山老林里去了，只给红军留下了空荡荡的房子。子珍就是在这样的一所房子里生下了孩子。女婴响亮地哭了很长时间，但精疲力竭的妈妈强忍着不去看她。卫生队的队长回忆说：

孩子被洗干净后，我们用一块破布包好了她。我与董老^[163]商量（下一步怎么办）。董写了一个纸条，附上30块大洋，上面主要说的是“部队在行军，无法带走这个刚生下来的孩子，我们把她留给你们来抚养。就把她当做你们的孙女吧。她长大了会照顾你们的”。

把女婴放在刚生下她来的床上，用破布盖上，把纸条和钱放在旁边后，所有的人包括子珍就离开了房子。“铁流”继续往西流去，没时间伤感。

这个妈妈连名字都没给起的小女孩到底怎么样了，没人知道。有传言说，红军离开后，那家的住户把她抱进了自己家，取了个名叫王秀珍，“秀珍”的意思是美丽的珍宝。但三个月后，她死于恶

性肿瘤。^[164]没人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毛没有精力关注他的女儿，甚至从未来看过她。权力斗争在继续。无论博古还是奥托·布劳恩都不承认他们的错误，凯丰不断地发脾气。有些政治局成员尽管已接受了毛、洛甫和王稼祥这个新三人团，但并不积极支持他们。所以，他们的行动必须坚定而又积极。毛和洛甫决定孤注一掷。

在2月初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洛甫出人意料地提出“变换中共中央领导的问题”，毛则提议由洛甫“负总责”，另外两个在场的人陈云和周恩来未加以反对。不知所措的博古屈服了。一个月后的3月4日，党的新领导通过革命军事委员会实施了一项重要的决定：“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165]朱德仍然是整个中央红军的总司令，周恩来是名义上的总政委。第二天，朱德、周恩来和王稼祥以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阐明了形势。（只有战斗部队受前敌司令部直接指挥，非战斗人员被指定由新成立的野战司令部指挥。）^[166]

这个倔强的湖南人最终夺回了他1932年10月在宁都失去的位置，军队的大部分权力又回到他手中。但处在最高位置的他还得谨慎，下面的人可能正在妒火中烧。毛明白这一点，于是相机行事。接受任命一周后，他与洛甫决定成立一个三人军事小组来负责军事。他提议，三人小组由他、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任命周恩来为组长。^[167]周恩来名义上是领导，毛在小组中却是最有发言权的人。现在，实际上是他在指挥部队。

与此同时，长征在继续。长征的目的地现在已经明确了，他们要到川西北去与已经到达那里的张国焘的部队会合。这段时间，毛异常兴奋。2月末或3月初的时候，毛热情饱满地写了一首新词：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168]

他的部队以每日80~100里的速度前行，但他们离目的地还很远。受到破坏的、凋零的遵义已被远远地抛在后边了。用一个目击者的话来说，在红军撤离前，“这座城市呈现出一派凄凉景象”。一度繁华的商业中心变成了废墟：

商店和仓库也都空了；大地主和商人的乡寓以及省主席的夏宫被钉上了木条，或者多半被毁；在房屋的墙上还到处挂着我方政治工作人员张贴的标语口号的碎片。这些都是一月初热烈进行的苏维埃化所留下的最后痕迹。^[169]

但毛并不关心这个可怜城市的居民。重要的是他的部队已在那儿休息好并补充了给养。

官兵们仍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衣物和武器都不足。奥托·布劳恩回忆说：“行军大多是在夜间，因为白天天气好时，国民党的飞机几乎整天不间断地飞行、轰炸和扫射。”在一次轰炸中，子珍受了重伤，嵌在身体里的弹片让她非常难受。后来，子珍作了X光检查，发现她身体里有七块弹片。^[170]在接下来的行程中，她不得不躺在担架上。

“先头部队、侧翼掩护部队和后卫部队，往往要历经几十次遭遇战，一会儿在前，一会儿在后，有时甚至几处同时遭遇敌人。”奥托·布劳恩写道，

当我军翻过云贵边界陡峭的大山时，形势变得更困难了。崎岖的羊肠小路通过直上直下的深谷，许多马摔倒在地跌断了腿，只有骡子勉强能支撑过来。我军越是深入云南境内，给养就越糟，大山里几乎找不到什么可吃的东西。红军战士们从死马尸体上割下一块块肉来充饥，最后只剩下一具具骨骸。即使和平川上稻米和蔬菜也很少……由此可以想象，部队的情况如何了。病号和累垮的人多于战斗中的死伤者，损失与日俱增。虽然自年初以来，我军在贵州招募了几千名志愿兵，但许多师团还是明显地缩减了。^[171]

长征开始时离开中央苏区的 8.6 万人，到达四川时只剩下不到两万人。

但这些幸存者继续往前走。5 月初，他们渡过了 200 米宽、水流湍急的金沙江，长江在这一段就叫这个名字。一个月后，他们沿着滇康（西康）边界渡过了名为大渡河的另一条汹涌的深谷激流。这次渡河尤其困难。河流夹在大山之间，湍急的河面上悬挂着一条狭窄的铁索桥，铁索桥建于 18 世纪初，连通南北两岸。当中共部队到达时，敌方士兵已经拆除了一半的桥面板。当共产党人开始过桥时，国民党飞机开始凶猛地轰炸他们。不过，红军战士还是设法到达了对岸。

此后，他们经过了一片无人居住、人迹罕至的荒野山区。天气越来越冷，但红军士兵依然穿着便鞋和草鞋。部队向大山深处进发，只有越过这片大山，他们才能到达川西北的高原。“我们还得蹚过急流，穿过茂密的原始森林和深浅莫测的沼泽，越过 4 000 至 5 000 米高的山隘。”布劳恩回忆道，“越来越多的人倒在行军路旁，其中有击毙的、冻死的和纯粹累死的。我们所有的人身上都长满了虱子，简直令人难以想象。最糟糕的是赤痢蔓延，伤寒病也出现了。”^[172]

6 月中旬，中央红军来到了川西懋功县境内一个更窄的铁索桥。桥上铺着木板，桥下是条名叫佛至河（音译）的山间小河。在这里，他们与张国焘的先头部队终于会师了，这是他们长久期盼的会师。张本人和他的随员在邻近的茂县，离此地还有两天的路程。张知道他们会师后，赶紧赶了过来。6 月 25 日，毛和张终于互相拥抱在一起。他们是在懋功以北 140 里处两河口镇的一个旧喇嘛庙里见面的。张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的：“我一看见（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成员），立即下马，跑过去，和他们握手拥抱。久经患难，至此重逢，情绪之欢欣是难以形容的。毛泽东站到预先布置好的一张桌子上，向我致欢迎词。接着我致答词，向中央致敬，并对一方面军的艰苦奋斗，表示深切的慰问。”当晚举行了欢迎宴会。没人提到长征、遵义会议和四方面军的情况。“毛泽东这个喜欢吃辣椒的湖南人，将吃辣椒的问题当做谈笑的话题，大发其吃辣椒者即是革

命者的妙论。秦邦宪这个不吃辣椒的江苏人则予以反驳。这样的谈笑，固然显得轻松。”^[173]长征似乎是过去的事了，但聚餐者所要面临的严峻考验还在前头。

38岁的张国焘是共产主义运动的老战士，他脾气火爆，自视甚高，不喜欢妥协，是个极端渴望权力的人。张个子高，颧骨高，宽大的下巴有点往前突出，从外表看起来就是个很难打交道的人。张在共产党内的长期经历中不止一次地当反对派——先是反对马林，然后是罗米纳兹，最后是瞿秋白。1930年春天，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时，他曾花了很长时间在委员会面前为内定要清洗的在莫斯科受训的中国学生辩护。那时，在反托洛茨基主义的高潮中，共产国际执委会里有些人试图指控他与暗藏的托派分子有联系，但是提不出什么证据。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均认为，关于他的“托派分子”的情报是一种“挑衅”。^[174]总的来说，共产国际认为他还不错，尽管他有的时候有点挑剔，这大多出于永远怀疑一切人的布尔什维克的职业习惯。按照一般的说法，他被认为是忠诚的。在距米夫着手“清洗”中共尚有三年的时候，即1927年11月，他曾被誉为“中国革命的勇士”，被授予红旗战斗勋章。

但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以前的学生们洛甫、博古、王稼祥和凯丰却不信任张国焘。他们抱着“无风不起浪”的心态，认为他是一个“老机会主义分子”和“秘密的托派”。而张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创始人则几乎毫不掩饰对米夫手下的暴发户们的蔑视。

因此，聚会中流露出来的“喜悦”并不能迷惑任何一个人，领导层的再次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无论怎样，毛都稳操胜券，想要把张国焘排挤出去的“莫斯科的学生们”必然会团结在他的周围。只有毛，凭借着策划能力和将死马医成活马的水平，才能确保力量的平衡对他们有利。

毛本人对张也有戒心，尽管眼下张并没有反对抬升毛的权威的遵义会议决议，但毛预料到会有这样一场挑战。毛清楚地知道，张认为自己是“形势的主宰”，他手下的兵力是中央红军的七八倍，而且装备精良，吃得好，穿得好，士气也高。张在他部队的指挥员和政委中享有不容置疑的权威。精疲力竭、破衣烂衫、几乎完全丧

失了战斗意志的中央红军与他们简直没法比。考虑到千辛万苦到达懋功的这 10 000 人中还有整整 2 000 名非战斗人员，彼此的悬殊就更大了。^[175]

因此不难理解，在这种情况下，“自发的友谊”很快就消散了。张开始要求权力。7 月，他的部队挑起了一系列与毛的部队的军事摩擦，意在为他们的领导争权。^[176]毛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别无选择，只能退缩。7 月中旬，洛甫准备把总书记一职交给张，但是张却宁愿要当时来看更重要的位置，也就是红军总政委。红军会师后很快被重组为九个军：四个军属于红一方面军，五个军属于红四方面军。周让出了总政委一职，毛也让出了前敌政治委员的位子，军队的指挥权到了张国焘手里。张的军官们还要求让张当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但是张大度地仍让朱德担任这个职务。这个位置已经没有什么大意义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权力现在已集中到了张的手里。^[177]

与此同时，长征在继续。整编后的红军向北边的川甘陕交界地区前进，政治局决定在那里建立一个新苏区。他们不能留在川西，因为当地部落憎恨抢走了他们所有钱财的共产党人。这也是个蛮荒、危险和十分贫穷的地区。毛告诉埃德加·斯诺：“在四川，十八岁的姑娘没裤子穿，穷得穿不起。如果希特勒想要禁止裸体的话，在中国，他就得给他们发裤子。”^[178]但红军也需要给养。

此时，毛和洛甫决定对张国焘进行反击。在周恩来向张交出红军总政委这一要职几天后的 7 月 20 日，行军停止了，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洛甫用平静的声音要求张国焘就 1931 年 4 月他离开上海进入鄂豫皖边界苏区以来所做的工作做一个汇报。（我们知道，张在蒋介石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于 1932 年 10 月被迫撤离这一地区。）张报告完后，毛对张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责张放弃老根据地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张当然拒绝一切指责，会议没有开出任何结果。但新的党内矛盾已经明显地形成了。两个星期后，洛甫又指责张国焘放弃了川北的新根据地。张终于忍不住了：“你们把整个中央苏区都丢了，怎么还认为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179]他现在完全明白，毛和洛甫是在有意激化矛盾。他决定等到一个更有利的时机再作打算。

眼下，他建议将部队分成两路纵队向甘南进军。一路沿沼泽地左侧，一路沿右侧向前走。他们将在甘肃境内离川甘边界90英里的一个地方会师。8月10日左右，张国焘和朱德领导的左路军率先出发，包括毛和大多数政治局成员的右路军断后。周恩来病倒了，7月时他就患上了疟疾，现在状况很不好。医生尽了全力，但还要过几天才能度过危险期。

8月底，右路军也终于上路了。在他们面前是一望无际的、十分美丽的绿色草原，但这种美丽暗含着致命的危险。奥托·布劳恩回忆道：

草地看上去是一片诱人的绿色植被，但下面是危机四伏的黑色沼泽。谁要是失脚踏破薄薄的一层绿地，或是离开那狭窄的小径，就会被沼泽吸下去。我亲眼见到一头毛驴就是这样悲惨地死去的。我们赶着当地的牛马，它们能直觉地找到危险最小的途径。地面上总是笼罩着灰色的雾，一天总有好几次冷雨纷纷，晚上又变成湿漉漉的雪或雨夹雪。望穿双眼也看不到屋子、树或者灌木。我们都在高出沼泽的小丘似的地面上蹲坐着睡觉。薄薄的毛毯，宽沿的草帽，蜡纸伞，还有个别偷来的披风，这些就是我们唯一的防护。早上总有些醒不来的——寒冷和疲惫的牺牲品。……我们唯一的食物是随身携带的谷粒，运气好的时候，能有一块坚硬如石的肉干。沼泽中的水是不能饮用的，但还是有人喝了，因为没有木柴把水烧开消毒。赤痢和伤寒在西康的时候本来已经渐渐减少，此时又蔓延开来。……幸运的是，敌人既不能从地面也不能从空中进攻我们。^[180]

这次最困难的行军花了好几天时间。当精疲力竭的战士们终于踩到干燥的土地的时候，突然传来了张国焘、朱德和总参谋长刘伯承的命令：原路返回！他们率领的左路军已经陷在了沼泽里，无法渡过挡在他们行军路线前面的一条山间小河，因此，张、朱、刘决定掉头向南，部队也有这个要求。但事情并不这么简单！9月8日，他们收到了周恩来、洛甫、毛泽东和右路军其他几个军长和政委的回

电：“务望兄等熟思审虑，立下决心……改道北进。”^[181]换句话说，政治局要让张知道，他们并不打算服从他的命令。

张国焘此时迈出了危险的一步，他给他原四方面军的下属、现正担任右路军各级指挥官的军官们发了一封密电，要求他们对政治局“展开斗争”。^[182]但毛立刻就知道了这封电报的内容，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此事，会议决定继续往北向甘肃进军。他们随后发表了一份《告同志书》，在这份呼吁书中，毛、洛甫、周恩来、博古和王稼祥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要求右路军的干部战士不要服从任何往南去的命令，要继续往北，“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双方针尖对麦芒，谁都不肯让步。

气愤的张国焘依然掉头往南，毛泽东的队伍则进入了甘南。红军的分裂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共领导层的分裂已成事实。

9月中旬，在甘肃省界附近，右路军的6000人被重组为所谓的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林彪任副司令员，毛任政委。此时，又确定了一个新的行军目标：向苏联边界而不是甘肃东北部行进，以便接受苏联援助。毛声称，这样做的“原因”在于：

首先是，四方面军闹分裂，张国焘去了南边，这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不过，我们绝不会灰心丧气，我们要大踏步地前进……陕北和陇西北是我们应该去的地方。^[183]

到现在为止，与莫斯科还没有联系上。因此，9月20日做出了一个决定：往位于遥远的中国西部的新疆派两名党的代表，以便与共产国际执委会取得联系，将长征中发生的一切汇报给他们。当时在运输纵队的毛的弟弟泽民被选为特使之一。^[184]

不过，计划很快就改变了，泽民和另一位中共代表去新疆的旅程被取消了。在甘南的一个邮局，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缴获了最近的国民党报纸，他们从中吃惊地获悉，在靠近甘肃东北部的陕北地区有一个相当巩固的苏区，一个名叫刘志丹的共产党人所领导的红军部队在那里非常活跃。^[185]他们目前离这个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

这条消息真是雪中送炭，毛高兴得直搓手。现在可以把宝压在

陕北这块地上了，这件事还有绝妙的宣传价值：整个长征可以被说成是事先计划好的行动，目的是在有可能遭受日本侵略威胁的地区建立共产党的根据地。到1935年秋天的时候，日本人已经大大增加了华北的压力。占领东北后的1933年1—3月，日本军队占领了东北热河。两年后，他们插入冀东地区。帝国的军队已到了北平和天津的家门口了。日本人的计划非常明确：将整个华北合并起来变成一个“独立”国家。此前，他们已经上演了一出“满洲”“独立”的闹剧。1932年2月18日，所谓的“满洲国”在吉林省会长春宣布成立，该城被改称为“新京”，意为“新的首都”。1934年3月1日，“满洲国”改称为“满洲帝国”。被辛亥革命推翻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被宣布为“大帝国”的“皇帝”，年号为“康德”，意思是“和平与美德”。日本人变本加厉的侵略使中国的反日情绪更加高涨。毛认为，巧妙地利用这种情绪，可以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北上抗日”不仅有利于他在与腐败的南京政府争夺权力时巩固共产党人的地位，而且有助于他一劳永逸地打垮张国焘。这个“分裂者”毕竟没想到往北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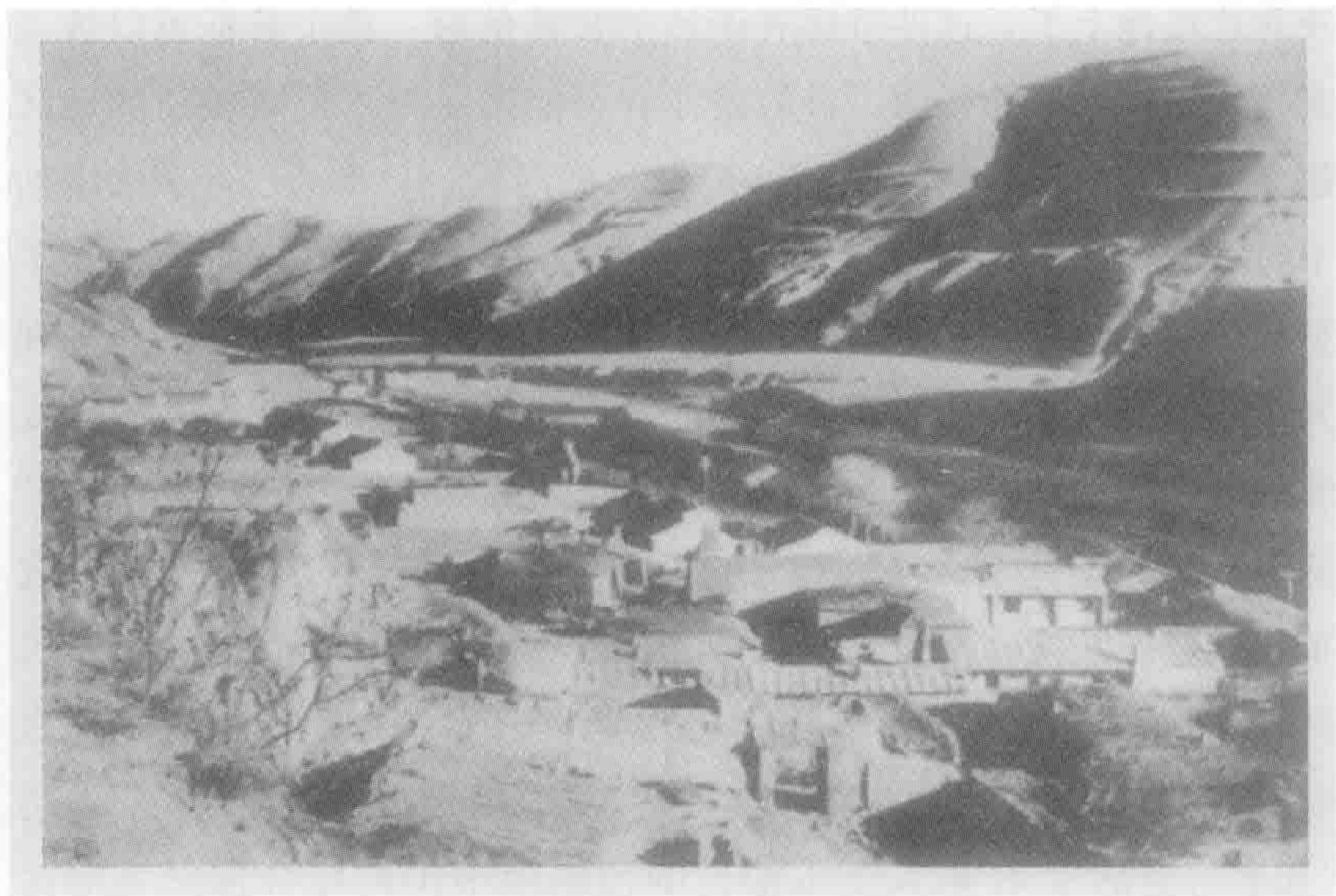
9月22日，在陕甘支队政委和指挥员的一次会议上，毛宣布：

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究竟哪个是机会主义？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186]

一个月后，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10月中旬，毛的部队越过了陕北苏区的边界；19日，他们进入了吴起镇。这个镇坐落在一个小山沟里。从前来迎接的当地人那里，他们得知红色总部设在此地往东160里处的苏区首府保安，于是就派了一支小分队去与刘志丹联系。^[187]10月22日，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上，毛宣布长征结束了。

从8.6万名红军官兵离开中央苏区到现在，已过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他们穿越了11个省，行程两万多里，跨越了5条山脉，强渡了24条大河，走过了危险的沼泽地，历尽千辛万苦，他们终于完成

陕西北部的吴起镇。1935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这里宣告长征结束。



了长征！但为成功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最终到达陕北的仅七千多人。

这是一股真正的、英雄般的“铁流”。毛为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骄傲，他用生动的诗词表达了胜利的情怀：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188]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189]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 第四章

西安事变

张国焘此时正在川西北转来转去，他用了40天的时间才将他的部队从沼泽地里撤出来。四年后，刚刚回到莫斯科的奥托·布劳恩向他的上级报告说：“在长达40天的时间里，张的主力处于没有给养、没有歇脚处的状态，因为他们找不到造桥的材料，而过河又只能靠桥（布劳恩的原话如此）。据说，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情况。”^[190]10月5日，完全丧失了理智的张国焘成立了一个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新的“中央政府”和新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而且“开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和洛甫的党籍”。^[191]你很难想象有比这更愚蠢的事了。他手下的指挥员和政委中，谁敢反对这些行为他就给予最严厉的惩罚，有些人甚至被枪毙了。^[192]

此时，政治局已安顿在陕北。1935年12月中旬，毛迁移到苏区中心瓦窑堡，其他领导人也在那里住了下来。用布劳恩的话来说，这里“牢牢地掌握在红军手里”。“我们注意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部分盐碱化了的贫瘠的土地。”一个目击者回忆说。^[193]村庄中的院落破败不堪，田地无人耕种，稀疏的乡村人口勉强维持着凄惨的日子。连年军阀混战、土匪的烧杀抢掠、恐怖的饥荒和流行病灾难性地破坏了当地经济。在毛的部队到达前的1928—1933年，一半多的当地人口死于饥荒，许多村庄中10岁以下的儿童都死光了。陕北几乎成了无人区。^[194]像华北各地一样，这里的外地人和本地人没有什么区别，但就像在“客家人地盘”上一样，当地人的赤贫——他们处于饿死的边缘——为中国共产党的壮大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小山沟和被幽深峡谷所分割的黄土高坡。光秃秃的黄土山峰阴沉地俯视四周，战争和饥荒的幸存者就住在这些山丘上。放眼四周，你可以看到数十个乃至数百个窑洞。

实际上，任何人都可以在松软的黄土上挖个洞居住。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包括毛泽东和贺子珍，也住在这样的窑洞里。从赣南、福建生机勃勃的亚热带森林转移到荒凉的北方只能让人感到忧郁，但毛没有陷入这些唏嘘感叹中。遵义会议尤其是与张国焘的分裂已经把他抬升到了一个人人把他当作领袖的位置，大家都指望着他拿主意。

在秋末和整个冬天，他忙于在这个新地盘建立权力机构。他自然投入了大部分精力来加强他的军事力量，红军合并了当地游击队后总兵力达到 10 410 人。^[195] 11 月初，毛重组了他的部队，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老名字。由于朱德还在张国焘那里，司令员的职务便由彭德怀担任，毛自己当了政委。成立了作为最高军政机构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行使对苏区的全面控制。毛是这个机构的主席，已经病愈的周恩来和朱德成了他的两个副手。毛没有埋怨“老朱”。他知道，这个职业军人习惯了服从党的领导，因此不会抵制张国焘。苏区也建立了政府，它的正式名称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它主要负责经济事务。毛的弟弟泽民被任命为国民经济部部长，政府主席这一崇高的位置则给了博古。毛知道如何与他需要的人修复关系，这些人包括以前的敌人。屡试不爽的“治病救人”原则继续有效，心存感激的博古愉快地为毛泽东服务。

但毛与桀骜不驯的张国焘始终未能恢复良好的关系，双方的冲突延续了整整一年。直到 1936 年 11 月末，不幸的张才在朱德的陪同下来到陕北，寻求和解。他在四川、西康和甘南的沼泽地和高山之中与兵力占优势的敌人不停地作战，几乎损失了所有的部队。毛大度地接待了他，张已经“丢了脸”，因此就不再危险了。即使他继续从事反党活动，也没人会追随他。“我们发表了演说，互相祝贺，”张国焘写道，“那时我们所谈论的不是那些过去的事，而是策划未来。”^[196] 毛甚至主动提议张担任一些重要职务。他让张取代朱德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担任他的副手，再次任命他担任红军总政委

(总司令仍是朱德)，还让他当了政府的副主席，双方的分裂就这样弥合了。^[197]毛对未来十分乐观。

对共产党人来说，未来开始露出曙光。日本人的活动越来越猖獗，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在高涨。一年前的1935年12月，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抗日运动席卷全国，此即一二·九运动，全国军民群情激昂。政府对赤裸裸的侵略者的不抵抗政策已激起了国民党军队的不满，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开始得到公众舆论的呼应。

在多年的血腥内战之后，毛开始意识到，只有顺应民众的爱国感情，共产党人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当然，无论是他还是他同僚中的任何人都没打算宣布放弃阶级斗争，但“缓和他们的激进理论”在策略上对他们是有利的。尽管严酷的内战还在继续，蒋介石依然是主要的敌人，但从那时起，在斗争中唤醒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已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任务。

毛的新政策与共产国际的路线不谋而合！1935年夏，斯大林本人在外交政策方面做出了同样的调整。因为害怕德国和日本侵略苏联，他迅速改变了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政策。从现在开始，共产党人不再寻求推翻统治阶级，而是要与其建立新的统一战线——在西方是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东方是抗日统一战线。当然，我们清楚，在斯大林的内心深处，他一点也不想改变统治世界这一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目标。^[198]他改变政策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以便将更多的同盟者吸引到他的身边以及各式各样的共产党身边来。这些决定是1935年7—8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做出的。这次大会期间，王明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共中央的名义于8月1日公开发表宣言，要求全国同胞停止内战，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当然，王所说的“同胞们”并不包括蒋介石和其内阁成员，他仍然认为这些人是“人面兽心的败类”。^[199]

由于中断了与莫斯科的联系，毛和其他政治局的领导人很长时间内不知道这些变故，他们不得不不顾风险地独立行事。我们知道，在做出去陕北的决定的同时，政治局取消了派毛泽民和其他特使去新疆的决定，与共产国际执委会建立联系一事被推迟到一个更为合适的时机。他们不知道此时的莫斯科正在尽最大努力力图恢复

与中国共产党人的联系。莫斯科已经知道了遵义会议的情况，而且完全支持它的决定。参加了这次会议的陈云向共产国际的官员们汇报了会议要点。陈云同包括瞿秋白遗孀在内的另外七八个共产党人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结束不久的1935年9月到达苏联的首都。（瞿因健康状况不好，红军开始长征后仍留在中央苏区。他于1935年2月在福建的一座山上被抓获，三个月后，他被国民党处决。）

根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陈云实际上于1935年6月就离开了中央红军，但他最初的使命并不是去苏联，而是去“重建上海的党组织”。因为他无法完成在上海的任务，于是他在9月初根据王明和康生领导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命令动身去了莫斯科。到莫斯科后，他化名史平，开始在共产国际的国际监察委员会工作。^[200]他就是在那时将遵义会议的情况汇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书记们的。^[201]因为他不是专门到莫斯科来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的，所以他没有遵义会议决议的副本。因此，他的汇报无法得到文件的证实。莫斯科是在1936年的某个时候才收到决议文本的，这些文件是由也参加了遵义会议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带来的。^[202]1939年的晚些时候，原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和未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刘亚楼（化名王松）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干部部递交了一份决议文本。刘亚楼此行的目的是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203]

决议文本本身并不特别重要，即使没有它，莫斯科也乐于支持中共政治局的这次会议做出的各项决定。^[204]这并不出人意料。1935年9月，共产国际已经开始树立毛的权威。在夏季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有人宣称毛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总书记、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一样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旗手”。^[205]这句话是中共代表滕代远说的。显然，没有在莫斯科身居高位的那些要人的批准，滕是不可能这样做的。所有大会与会者的发言稿和报告都经过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相关部门的事先审查、编辑和批准。第七次代表大会特别致力于树立共产党领导人的权威。中共



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

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1935年8月下旬特别召开的一次代表团会议上，特别强调要全力执行大会的决议。他说：“应当树立谁的权威？当然是政治局委员们的权威……首先是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的权威。”^[206]

我们知道，王明自己就想当党的领袖，所以对毛泽东并不服气。不久以后，和王明在一个机构共事的一名工作人员郭肇堂（俄语化名阿法纳西·加弗里罗维奇·克雷莫夫）在王明的直接协助下，给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写了一份关于毛泽东的材料，目的在于破坏斯大林对这位游击队领导人的好印象。材料是这样说的：

社会背景——小地主（有个读材料的人用红铅笔在这上面打了个问号）。没有系统性的错误。非常努力的工作者，高效率的鼓动者和组织者，知道怎样深入群众中去，群众工作的好领导。在农民运动和游击战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能在艰苦和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工作。他非常积极，能很好地完成工作。个人性格是无私的——能与群众打成一片，善于做宣传工作。以上是优点。缺点是理论修养不足，因此容易犯个人政治错误，不过在正确的和坚定的党的领导下，能很容易和很快地改正他的错误。（最后这句话的大部分被人用红铅笔在下面画了线，并被加上了括号，在页边空白处还打了个问号。）^[207]

格奥尔基·伊万诺维奇·莫尔德维诺夫（化名克里洛夫和根那季·尼古拉耶维奇·卡尔波夫）和张遂上（化名鲍里斯·卡拉什尼科夫）以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前成员李立三和赵毅敏曾向上级反映，王明“正在破坏毛泽东在驻苏联的同志中的威信”。以下是1940年2月17日李立三在与共产国际的官员们谈话时就这个话题所谈的内容：

在我看来，毛泽东不是政治领袖这一流言的主要来源似乎是王明。他告诉我，小艾（赵毅敏）和其他人说，毛泽东是个很好的人，但在理论非常薄弱。在与我和他更信任的小艾谈话

时，王明谈到了毛泽东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说报告里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是他修改了它们，现在报告好多了。从中国收到的其他文件同样被修改过。结果就是，这些被修改过的许多文件与它们原先的中国版本是不同的。^[208]

极有可能的是，王明是在共产国际领导层的压力下才不得不树立对手的权威的。像以前一样，中国共产党人中没有人能够质疑这些决定，因为中共对苏联的资金依赖并没有减少，苏联的大批资金持续地流向中共中央。1934年6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决定，从中国共产党未花费的基金和备用基金中各抽出10万卢布寄给中共。^[209]1934年7月1日，莫斯科决定在1934年的每个月都给中国共产党7418金美元。^[210]

第七次代表大会一结束，苏联就发起了大规模宣传毛泽东的运动。1935年12月初，共产国际的理论和政治喉舌《共产国际》刊登了长篇歌颂文章，题目叫做“中国劳动人民的领袖——毛泽东”。^[211]文章没有署名，但是它的作者不难查明。这篇文章是由《真理报》外国部副主任亚历山德罗·莫伊谢耶维奇·哈马丹所写的，在担任这个职务之前的1932年，他是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的情报处处长。^[212]考虑到当时的情况，他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完成了上级党组织交付的这个任务。他找不到文献资料，除非共产国际执委会中的中方人员提供给他有关毛的材料。1935年12月13日，《真理报》又刊登了同一作者撰写的介绍这位中国人民的领袖的文章。^[213]随后，毛的传略和该作者所写的有关朱德和方志敏的传记由国家社会经济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和英雄》。^[214]方是闽浙赣根据地党政军的最高领导人，死于1935年8月。

直到1935年11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一个特使、中共老党员林育英（化名张浩）到达陕北时，毛才得知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以及对他的广泛宣传。林育英是毛的最忠实的一个将领、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的堂兄。林育英和毛在1927年春天就已经互相认识，尽管他们很长时间都没有再见过面，但都非常尊敬对方。^[215]

在他到来后，中共领袖们花了几天时间讨论了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显然，为了贯彻斯大林的新政策，党有必要修改基本的政治路线。洛甫表示，党也需要重新审查其社会政策，首先是对富农的政策。“我们必须区分地主和富农。”他强调说。林育英显然支持他，说这样的方针符合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不过，毛在这个问题上有自己的想法。尽管他承认农村问题的根本解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他不想完全改变他以前的政策。12月1日，他给正在起草一份有关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党内决议的洛甫写了一封信，阐明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他写道：

对富农策略的转变基本同意，但决议上应指出，当斗争发展贫农中农要求平分富农土地时，党应赞助这一要求。富农可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过去分坏田的原则是不对的；但富农土地完全不动的原则，在苏区尤其在南方苏区也是不对的。在土地问题上，对富农策略同对中农应该有一点区别。农村中的党应善于领导与监督富农，严防为富农所领导。要指出当斗争深入时富农必然转入地主阵线，这是中国半封建富农阶层的特点。对有劳动力又破产了的小地主阶层，在群众同意下应按富农待遇。^[216]

毛的意见只是“基本上”被接受了。毛所说的假如在斗争中贫农和中农提出了平分富农土地的激进口号就应当支持他们的看法，在洛甫看来是不对的，他认为毛的观点与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政策尖锐对立。12月6日，在毛随部队外出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洛甫起草的“关于改变对富农的策略”的决议草案。^[217]九天后，不想陷入冲突中的毛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出了一道相应的指示^[218]，但他并没有改变自己在富农问题上的观点。

两天后，洛甫在瓦窑堡又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审议与共产国际改变路线有关的一般性政治和军事问题。这次会议开了好几天，是一次为中国共产党的新路线打基础的会议，已经习惯于在这种场合保持一致的洛甫和毛作了主要的报告。会议决定要“把国

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矛头对准日本人和蒋介石。会议还决定，联合所有爱国力量，包括国民党在内，组成一个“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但是，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统一战线中不应当包括蒋介石及其最亲密的同伙。^[219]毛强调说：“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这种情况……有利于革命……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220]

在会议召开前，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就已经开始为这个目标做相应的工作了。1935年11月末，毛第一次向驻扎在陕西的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军官提出了停战、共同抗日的建议。实际上，这是对这支部队的总司令、西北最著名的军人张学良所做出的善意姿态。这位前东北军阀在中国的权力平衡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他的东北军在日本关东军的进攻下撤出了东北，现在正驻扎在陕西的南部和中部地区。这支20万人的部队的总部设在该省的省会西安。1936年时，他仅有35岁。由于其父张作霖做过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又是东北军的元帅，因此子承父业的张学良被称为“少帅”。少帅与日本人有不共戴天之仇，是个著名的坚定的反日人士。1928年，因他的父亲张作霖元帅想要在东北奉行“独立”政策，日本的情报机关便设计暗杀了他。张作霖乘坐的火车被炸飞了，他因重伤而死，但日本人并没有就此罢手。1931年，关东军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了张学良的所有地盘。从此，他就试图与任何他认为能够帮助他把日本人从东北赶出去的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 指墨索里尼。
——译者注

天真的少帅对意大利的领袖*寄予特别的希望。这首先是因为他同情法西斯分子，相信只有墨索里尼式的钢铁般的专制独裁才能将中国从目前的危急中拯救出来，其次是因为他指望领袖的女儿埃达的帮助。埃达是意大利驻上海的总领事、未来的外交部长加莱阿佐·齐亚诺伯爵的妻子。张是个风流的人，年轻，外貌英俊，一头黑发，胡须上翘。他喜欢夜总会和歌舞表演，舞跳得很好，风度优雅地追逐女人。顺便说一下，张的个人财产大约相当于5000万美元。齐亚诺伯爵平时不太理会他的妻子，宁愿在上海的酒吧和妓院里鬼混。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热情如火的意大利女人抵挡不住英俊

的元帅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有传言说，跟丈夫在一起的时候，埃达尽了最大的努力想要怀孕，为达到目的颇费了一些周折。^[221]由于埃达的不断努力，他们于1931年10月1日在上海生下了墨索里尼的外孙小法布里奇奥伯爵。埃达与张学良的关系在生过孩子后热乎起来，但持续时间不长。1932年，埃达和她的丈夫回到了罗马。

1933年4月，张学良也动身去意大利。尽管他迷住了墨索里尼的女儿，墨索里尼仍无法提供援助，他不愿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张元帅尽管对领袖感到失望，但仍保持着对极权主义的信念。他从意大利去了德国，在那儿会见了希特勒和戈林，但从他们那里仍一无所获。接着，他去了法国，在那里邂逅了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张认为也许会从共产党人那里得到帮助，便请求李维诺夫为他安排去苏联的旅程，但李维诺夫断然拒绝了他。斯大林并不想使他与日本人的关系复杂化。^[222]

至此，张学良才明白不能指望从外国得到帮助。他于1934年1月回国，但只是在1935年11月毛向他的一个将领提议停战的时候，他向日本人复仇的机会才到来。1936年4月9日，张开始与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共代表们直接谈判。代表们来到了当时还在东北军控制之下的陕北小城延安。双方谈判后不久，张学良就同意停止针对共产党人的军事行动，甚至供给他们武器。

双方的协议缓和了苏区边境地区的形势，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1936年6月，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师长高双城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出人意料地进攻了共产党人，攻占了他们的首府瓦窑堡。毛、洛甫和所有其他人不得不立刻向瓦窑堡以西300里处的保安撤退。到了那里，他们还是住在窑洞里。保安是个半荒废的小镇，只有不到400人，几乎所有的房屋都是废墟。^[223]



1936年毛泽东与贺子珍在保安。

尽管出了这种事，中共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依然没有改变，毛对到保安来采访他的埃德加·斯诺明确地强调了这一点。在1936年7月15日他们第一次见面时，毛就强调：“中国人民今天面对的根本问题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224]

斯诺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非常同情。在美国和中国的左翼人士中，许多人都读过他的文章和他在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以及美国的《星期六晚邮报》、《外交季刊》上发表的采访报道。他非常年轻（在1936年的时候他仅有32岁^[225]），文字犀利，见解激进。尽管他有点左，但却以独立而著称，这一点使他不同于在中国的其他左翼记者，这些人公开宣扬他们亲共产主义的观点。正因为“独立”，斯诺才引起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的关注。他们决定利用这位年轻而有才华的记者，以便在不可避免的中日战争前夕在中国和世界舆论中宣传他们的看法。

而埃德加·斯诺也在寻求与中共领导人会面。毕竟，他是一位专业的报刊记者，他明白这样的会见会在新闻界引起轰动。早在1936年3月他就开始试探访问中国“红色地带”的可能性。但是只是到了7月他才确信，访问能够成行。在他和中共领导人之间起了中介作用的人包括：著名的北京大学俄国文学教师、俄国移民谢尔盖·波列伏依，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中共中央华北局领导人刘少奇以及中共华北局组织部长柯庆施。^[226]如我们所知道，谢尔盖·波列伏依早就与共产党保持着联系：早在1921年4月他就帮助苏俄代表与中国的新锐分子建立了联系。宋庆龄从20年代末就开始为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工作，她的代号是孙夫人和莉亚。当然，同波列伏依一样，她也并非中共正式党员，但是，作为一名左派人士（季米特洛夫在谈到她的时候声称，她“跟共产党员差不多”^[227]），她从1925—1927年以来，一直与共产党领导人保持着正式的联系。^[228]

由于这些人的努力，斯诺成了访问中共陕北根据地的第一个外国记者。陪同他一起访问的有美国皮肤科医生、黎巴嫩人乔治·海德姆（中国人称他为马海德）。在埃德加·斯诺面前，毛显得“很平和、自然而毫无拘束”，是一位有着很强的预见力、洞察力和说

服力的哲人。看来瓦窑堡的丢失对他毫无影响。斯诺回忆道：“他无疑相信自己吉星高照，命中注定要做一个领袖。”在宽敞的窑洞的各个房间都能听到他响亮的笑声，这笑声进一步强化了斯诺的上述印象。斯诺还写道：“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

他已经习惯了北方的环境，不再为这种气候感到苦恼。他对雪山情有独钟。在斯诺到来半年前的1936年2月，毛写了一首名为《雪》的词。^[229]在他的诗词作品中，这首词无疑是佼佼者：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馀莽莽；
大河上下^[230]，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231]驰蜡象^[232]，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233]，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当然，斯诺还注意到了毛作为农民的本质：“他说话平易，生活俭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他是如此热衷于谈话，以至于很难相信他也是一个实干家……然而，从西方人的观点来看，他也有弱点，这个弱点就是，他对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看法都受到了他所信奉的、由苏联人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的不无武断的影响。”^[234]

斯诺在中国共产党人那里待了三个多月：从1936年7月初到10月12日。他调查了局势，采访了许多人，走访了一些红军部队。他在7月、9月和10月同毛进行了多次会谈。他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内外政策问题、抗日战争问题、国际共运问题和建立统一战线的前景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应他的请求，毛在10月中旬与他进行了几次谈话，在这些谈话中毛首次讲述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

这些会谈通常都是从晚上9点开始，到凌晨两点结束，对此斯诺作了如下描述：

我交给毛泽东一大串有关他个人的问题要他回答，我为我的爱追根究底感到很不好意思，几乎就像一个日本移民官员应该——然而却没有——为他的无礼唐突感到不好意思一样。对于我在不同事情上提出的五六组问题，毛泽东一谈就是十几个晚上，但很少提到他自己或者他个人在谈到的某些事件中的作用。我开始以为，要想他给我谈谈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是不可能的了：他显然认为个人是不重要的。他也像我所遇见过的其他共产党人一样，往往只谈委员会啦、组织啦、军队啦、决议案啦、战役啦、战术啦、“措施”啦等等，而很少谈到个人的经历。

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这种不愿详谈私事，甚至不愿谈他们的同志们的个人功绩，也许是出于谦虚，或者是对我有所顾忌或怀疑，或者是考虑到其中许多人头上悬有赏格的缘故。后来我才发现，与其说是出于上述的原因，还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大多数人实在不记得那些个人琐事了。当我开始搜集传记材料的时候，我一再发现，共产党人是能够说在青少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但是一旦他参加红军以后，他就把自己给忘在什么地方了，如果你不是一再地问他，就不会听到更多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你所听到的只是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这些名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大写的。他们能够滔滔不绝地谈每次战役的日期和经过，以及他们进进出出别人从来没有听说过

的无数地方的情况；但是这些事件对他们只有集体的意义，不是因为他们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而是因为红军曾经到过那里，而在红军后面的是他们为之战斗的那个意识形态的整个有机力量。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却造成了报道的困难。

一天晚上，当我的其他问题都得到答复以后，毛泽东便开始回答我列为“个人历史”的问题表。他看到“你结过几次婚”这个问题的时候微笑起来。后来传出谣言说我问毛泽东有几个老婆^[235]，但是他毕竟是主张实行一夫一妻制的。不管怎样，他是不大相信有必要提供自传的。但我力争说，在一定程度上，这比其他问题上所提供的情况更为重要。我说：“大家读了你说的话，就想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再说，你也应该纠正一些流行的谣言。”

我提请他注意关于他的死亡的各种传说^[236]，有些人认为他能说流利的法语，有些人则说他是一个无知的农民，有一条消息说他是一个半死的肺病患者，有的消息则强调他是一个发疯的狂热分子。他好像稍微感到意外，人们竟然会花费时间对他进行种种猜测。他同意应该纠正这类传说。于是他再一次审阅我写下的那些问题。

最后他说：“如果我索性撇开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诉你，你看怎么样？我认为这样会更容易理解些，结果也等于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

“我要的就是这个！”我叫道。^[237]

对于同美国记者进行的每一次访谈，毛都进行了准备。当谈论的时候，他会时不时地看一看放在他前面的小纸片。在这些小纸片上他事先记下了会谈的计划。斯诺回忆道：“他给我讲述的不仅仅是一些可供我随后了解他们的生活的事实，这些充满自我批评精神的报告也是整整一代革命家的信仰。”^[238]在谈话的时候毛毫不拘束，不介意做一些粗俗的举止。有一次，在窑洞里，他感到很热，于是毫不犹豫地脱下了自己的长裤和上衣，然后非常放松地坐到了椅子上。他非常简单地解释说：“妈的，太热了！”斯诺写道：“他很有

幽默感，喜欢讲笑话，有一次他请我向他讲一下查理·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的内容……他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239]

毛有相当的理由镇定和乐观。瓦窑堡的丢失对战略形势没有影响；红军在稳步扩大，已经达到 25 000 人；抗日战线也在逐步形成；与张学良的交往进行得如此顺利，以至于共产党的领袖们甚至开始考虑秘密吸收少帅入党。（张已经表示想要加入共产党。）^[240] 6 月末 7 月初，中共与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也恢复了。毛泽东在他的第一封电报中，就请求斯大林将对中共的援助增加到每个月 200 万墨西哥元。他还希望莫斯科送来飞机、重炮、火箭炮、步兵武器、高射炮和浮筒等。此外，他还向斯大林汇报了张国焘的“机会主义错误”。^[241]

援助很快就来到了。斯大林寄给他 200 万卢布，几个月后，又送来了 50 万美元，以及 1 166 吨燃料、军需品和其他战略物资。^[242] 在此之前的 8 月 15 日，斯大林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名义发了一道指示，表示他“基本上”同意毛的政策。

斯大林 8 月 15 日的电报还建议扩大统一战线的规模，建议毛改变对蒋介石的否定态度，在红军和整个国民党之间而不仅仅是与张学良“设定一个停止军事行动的路线”。顺便说一下，他禁止吸收张入党。“我们认为，把蒋介石与日本侵略者同样看待是不正确的，”斯大林表示，“……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在目前的阶段，一切都要服从于与它的斗争。”^[243] 克里姆林宫主人的观点很容易理解。从 1934 年开始，斯大林就不断地从国家安全总局对外部和军事情报部门收到情报，说日本人极有可能进攻苏联。早在 1934 年夏季，已被国家安全总局招募的墨西哥驻上海的领事莫里奇奥·弗雷斯科就向苏联驻外代表报告说：“根据意大利线人的情报，蒋介石已得知日本将要在一两个月内进攻苏联。”^[244] 墨西哥人的这个情报虽然没有得到证实，但苏联远东边界的紧张并没有缓解。

毛当然不知道苏联情报机关的秘密报告，但无论如何，他没有反对斯大林的意见。十天后，他依照斯大林的指示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了一封电报，建议结束内战，开始谈判。^[245] “我们政策

的核心是与蒋合作抗日。”他后来对中国共产党人宣布说。^[246]

但是在中国，国家大事远不是共产党人所能左右的，蒋介石才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角色。根据苏联驻华领事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博格莫洛夫提供的报告来看，蒋“只有在对日战争的前夕，而且在与苏联签订协议的情况下”^[247]，才可能与共产党人建立联盟。此时，蒋正在为第六次“围剿”共产党人做准备。这一次，他需要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在不可避免的大规模对日作战的前夕，他决心用“围剿”来巩固他作为民族领袖的权威。

蒋介石知道张学良和共产党方面的私下谈判，对此十分不满，反复警告少帅，说共产党人不值得信任，但都没有用。1936年12月初，蒋决定去见张以进行“一次重要的谈话”。在他父亲被暗杀后的一段时间内，少帅把蒋当做他的“大哥”来看待，蒋介石记得这一点，因而觉得有把握让这个鲁莽的年轻人恢复理智。1936年12月4日，他乘一架老掉牙的小飞机从河南省会洛阳——他的战地指挥部设在那里——起飞去西安会见张学良。蒋住在唐朝皇帝玄宗（李隆基）的古代府邸里，这个府邸位于西安市郊一个名为华清池的风景如画的地方。这里四周群山环抱，因其温泉而著名。玄宗皇帝迷人的妃子、著名的美女杨贵妃喜欢到这来洗温泉，玄宗与她不顾后果的交往使自己丧失了皇位。公元755年，坚定而又大胆的安禄山领导军队起兵造反。皇帝和他的宠妃逃往南方的四川，但运气明显地不再眷顾他了。在一个陡峭的山口，玄宗的私人卫队造了他的反，他们把一切降临到朝廷上的灾难都归罪于柔弱无力的杨贵妃。士兵们勒死了她，并把她的尸体扔进了山沟。玄宗被迫宣布退位。蒋介石选择住在这样一个地方真是不吉利！

蒋住进了光线暗淡、名叫五间厅的单层厅房，这套房子位于庭院的东南角。他就在那里会见了张学良，张则由少帅的同盟者、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将军陪同。张学良坚持认为需要与共产党人联合起来抗击日本人。蒋不同意他的观点，认为消灭共产党才是成功地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关键。会谈很艰难而且很快陷入了僵局，陈设简陋的亭阁的荒凉气氛似乎也不利于取得成功。

12月9日星期三，谈话的气氛更紧张了。12月8日，日本陆军大臣发表谈话，对中国提出了新的威胁，西安的一万多名学生为此组织了示威游行。游行这天恰好是1935年全国范围的反日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这真是火上浇油。学生们要求结束内战，联合各派力量抗日。临潼离蒋介石的住处不远，学生们在从西安到临潼的路上碰到了警察，后者对他们开枪，两个学生受伤，而受伤者刚好是一个东北军军官的孩子。^[248]

张学良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为了给蒋介石施压，12月11日星期五晚上10点钟，他向东北军的高级军官们下达了一道逮捕蒋的命令。^[249]12月12日早晨5点钟，一支两百人的队伍在张学良的警卫之一、28岁的上尉孙铭九的带领下进攻了蒋介石的住处。蒋听到枪响后，跳出了卧室的窗户，在周围白雪覆盖的山上找了个狭窄的石缝藏了起来。两个小时后， he 被发现。他光着脚，睡衣外面披了件袍子，冻得直发抖，开始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慌乱之中，他忘了戴义齿。上尉按军中惯例向蒋敬了礼。蒋语气沉重地说：“你是同志，就开枪把我打死算了。”

“我们不开枪！”孙回答，“我们只要求你领导我国抗日。那时，我们就第一个来欢呼我们的总司令。”^[250]

“把张少帅叫来，我就下山。”蒋介石说。

“张少帅不在这里。城里的部队已经起义，我们是来保护你的。”

听到这些话，总司令明显地放心多了，要求他们带一匹马来，让他骑着下山。

“这里没有马，”孙回答，“不过我可以背你下山。”

他在蒋介石面前蹲下。总司令吃力地爬上了上尉宽阔的肩膀。张学良的卫队长把总司令背到一辆汽车边，最后对他说：“既往不咎。从今开始中国必须采取新政策。”

“我确信，”蒋介石干巴巴地说，“张少帅有个对中国非常好的政策。”

“现在是民族危亡的时刻，”孙岔开话题说，“我们希望总司令接受人民的要求。”

“我一直准备考虑张少帅的要求。”蒋回答道。

“中国的唯一紧急任务就是打日本。这是东北人民的特别要求。你为什么不打日本而下令打红军？”

“我从来没说过我不打日本。”蒋气愤地回答。

“但是东北军要求您尽快地打日本，他们的家被敌人占领了，全中国都受他们拖累。”

“我是中国人民的领袖，”蒋突然大声说，“我代表国家。我认为我的政策是正确的。”

“如果你代表中国人民，”孙说，“为什么你不抗日？这是全中国人民的要求。你不答应他们的要求怎么能说代表他们？”

“我是个革命者，”总司令顽强地争辩道，“我随时准备牺牲自己。我从来没有改变过我的信念，即使你抓了我，我的精神也永远不会屈服他人。”^[251]

蒋介石被送到了西安。在那里，张学良为给他带来的不便道了歉，再次要求蒋停止“剿共”，领导全国抗日。与此同时，12月9日下达命令驱散游行学生的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及蒋介石的十几个随员也被逮捕了。^[252]

12月12日早晨，蒋介石被逮捕的新闻传到了共产党在保安的总部，毛泽东和其他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兴奋不已。毛的秘书、共产党员叶子龙回忆说：“12月12日凌晨，我被电台值机员叫醒，说是张学良、杨虎城从西安给毛泽东发来一封电报，是特急件。电报不长，是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写的，我看不太懂，但记得其中有‘兵谏’两字。我立即把电报交给毛泽东，他还没有休息。看过电报以后，高兴地说：‘喔，去睡吧，明天有好消息！’”^[253]

那两个字表示的意思是张学良决定用武力去“劝说”蒋介石，这就是少帅告诉毛泽东的内容。据叶子龙说，当毛醒来时，整个城市都极度亢奋。住在中共中央大院附近的奥托·布劳恩也为笼罩着保安的不同寻常的兴奋所震惊。他注意到毛早晨起得很早，这极不寻常，因为他总是晚上工作，白天醒得很迟。在毛的窑洞里，连接其他党和政府领导人以及军队将领的外线电话响个不停。奥托·布劳恩的警卫员告诉他所发生的事件，博古也证实了这个轰动性的新闻。奥托·布劳恩回忆道：

这个消息像闪电一般传遍了整个保安城，人们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蒋介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最痛恨的人……这一天晚上，也许是第二天晚上，在露天开了一个大会，保安和附近地区的所有党员、部队战士和苏维埃工作人员都参加了这个公开集会……毛泽东首先在会上讲话，在他之后讲话的，我记得还有朱德和周恩来。讲话的主要内容是……清算和公审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叛徒蒋介石的时候到了，只有对他进行清算，才能为全国一致抗日开辟道路；必须要求南京政府立即停止一切内战，特别是反对红军的内战，以及立即停止对共产党员的迫害……必须动员整个民族和全国一切武装力量，反对日本及其在国民党中的帮凶。^[254]

这次大会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公审’卖国贼蒋介石，城里一片喜气洋洋”^[255]。在12月13日早晨的政治局会议上，极为兴奋的毛把逮捕蒋介石说成是革命的、抗日的进步事件。^[256]“这个突如其来的电报，使我们都大为激动，”张国焘回忆说，“有的说：‘蒋介石也有今天！’有的说：‘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毛泽东……一直在那里大笑。”^[257]政治局几乎一致决定，应审判蒋介石并判处他死刑。^[258]后来，毛亲自把相关事件汇报给了共产国际。^[259]

西安事变的消息于12月13日当天传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的首脑们像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一样感到震惊，季米特洛夫极为高兴。“乐观、赞赏地看待张学良。苏联需要保持克制，灵巧地应对与西安事变相关联的反苏运动。”他在日记中写道。^[260]第二天，他与最信任的同事们召开了一个会议来讨论中国事务。他在会后才跟斯大林联系，但他听到的话让他大吃一惊。老板像往常一样简洁明快：

建议他们（中国共产党人）拿出独立的主张，站出来反对内乱，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坚持签订协议和共同行动，对所有支持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党派和团体坚持民主的纲领。在共产党给国民党的信中和毛泽东的谈话中要强调党的这些主张。^[261]

这些想法太出乎人们的意料了！斯大林实际上是在要求共产党人释放蒋介石！否则的话，冲突怎么能够和平解决？

几个小时后的午夜时分，斯大林突然给季米特洛夫打来电话，十分生气地问道：“你们那个王明是什么人？是内奸吗？他想发一封电报让他们杀掉蒋介石。”

大吃一惊的季米特洛夫回答说，他没听说过这样的事。

“我把电报找给你看。”斯大林说完就扔下了话筒。^[262]

事实上，斯大林并没有找电报。最大的可能是，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是有人误导了斯大林。也有可能是斯大林知道季米特洛夫正要下指示杀掉蒋介石，想吓唬他一下。不管怎么说，领袖对此很不高兴。

此后不久，斯大林给莫洛托夫打了电话。

“明天3：30到斯大林同志的办公室来，我们要讨论中国的事情。只有你和曼努伊尔斯基，没有其他人！”^[263]

他们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讨论了什么不为外人所知。人们只能猜测，老板对季米特洛夫、毛泽东、王明和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的官员们在政治上的短视表示了不满。莫洛托夫自然像往常一样，对斯大林所说的一切都点头称是。斯大林认为，逮捕和处决蒋介石将必然深化中国社会的分裂，事态这样发展下去将使苏联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就在西安事变前一个月的1936年11月，纳粹德国与日本签订了针对苏联的《反共产国际协定》。这样一来，对斯大林来说，把蒋介石转变成同盟军简直就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了。此外，他还知道：12月1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通过决议要武力镇压张学良的叛乱。全心全意忠于蒋介石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已准备下达轰炸西安及调遣军队进行武力讨伐的命令，国民党的飞机此时已经开始轰炸陕西省内许多人烟稠密的地方了。12月13日，日本报纸《东京日日新闻》报道称：张学良于“12月12日下午”建立了一个“独立政府”，该政府可能已经“与苏联建立了攻守同盟”。

12月14日，塔斯社发表如下声明：

日本报纸《东京日日新闻》刊登同盟通讯社转发的一条消

息称：张学良在苏联的支持下大概已经建立了一个政府，而且与苏联结成了攻守同盟。对此，塔斯社经授权声明，这篇报道毫无根据，是恶意的杜撰。

苏联报纸《真理报》同样把在西安的事件说成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挑衅，目的在于分裂中国，它甚至称张学良实质上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

张学良随时都有机会来抵抗日本侵略者。他的部队士气高昂地要打这一仗。但是……当这个时刻到来的时候，这位前“满洲”的控制者却将中国东北最富裕的省份几乎不放一枪地交给了日本帝国主义。现在，他投机于抗日运动，表面上举起了反日大旗，实际上他是在促使国家分裂，在中国埋下未来动乱的种子，以便使中国注定落入外国侵略者之手。

在会见斯大林后的第二天，即12月15日，季米特洛夫将“主人”要和平解决事件的指示传达给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官员们，这些人是库西宁、莫斯科文、王明、邓发、陶里亚蒂以及他自己的政治秘书曼达良。第二天，他又到了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一起讨论了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指示的具体内容，该指示敦促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264]

不难想象毛泽东在接到这道指示时感觉如何。当毛本人明白需要和平解决冲突的时候，莫斯科的命令到了。由于一些技术上的原因，季米特洛夫12月16日从莫斯科发出的电报被耽搁了，未能及时到达保安，于17日或18日早晨才被译出来，部分内容甚至漏发了。直到12月20日，毛才读到了莫斯科指示的全文。^[265]但那时，他已经读到了塔斯社的声明和《真理报》上的文章，已非常清楚共产国际的态度。此时的毛也收到了张学良的《告国人书》，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张学良并不想要蒋介石死，少帅的目的是迫使蒋介石抗日。周恩来12月17日到达西安，开始与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磋

商，同时参加磋商的还有中共中央前总书记博古和红军副总参谋长叶剑英。蒋介石拒绝见他们，也不想讨论张学良的建议。“无论其为个人利害，或国家安危，只有立即彻悟痛悔，送我回京，”他对张学良说，“勿再自投魔鬼共匪的陷阱，及今悔悟，尚未为晚。”^[266]

日益紧张的形势迫使中共要当机立断。12月19日，毛意识到必须迅速解决事件。他感到极为不安，在当天的政治局会议上甚至情绪失控。他承认“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但他又说：“日本人说苏联造成，苏联说日本造成，双方对于事实的实质都有抹杀。”^[267]

政治局通过了一项旨在和平解决冲突的决议，这个决议与莫斯科晚来的指示不谋而合，该指示已于12月20日晚8点由毛泽东发给了周恩来。但在外界看来，好像是毛不得不接受了斯大林的命令。毛需要汇报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情况，但他同时也不想在自己的党内同志面前显得太窝囊。因此，尽管毛已经接受了莫斯科的指示，客观情况也有利，他还是没有与蒋介石签订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协议。当然，蒋也不急于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同盟，尽管作为调停者到达西安的英美军事专员要求他这样做。

12月22日，蒋的内弟宋子文和夫人宋美龄飞抵西安。到了这时，事态自行化解了。殷勤而有绅士风度的张学良无法抵挡迷人的宋美龄。在圣诞节，他送给了她一件礼物：他宣布他自己将陪伴她和她丈夫去南京！他是多么天真啊！

飞抵南京后，蒋介石立即把这个叛逆的元帅交给了军事法庭，张被判处十年监禁。1937年7月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他和所有其他政治犯都被赦免了。但蒋介石永不原谅他，张学良的命运是悲惨的。他出了监狱就被软禁起来了，受了许多年的苦。1949年，当蒋在毛的军队的打击下逃离大陆时，他带着张学良去了台湾。张到了台湾仍受软禁，直到1990年他近九十高龄时才重获自由！

所有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了。此时，蒋正准备第六次反共“围剿”。12月末，大批政府军开始沿陕北苏区边界集结。到了1937年1月6日，毛再也忍不住了。在他和洛甫发给周恩来和博古的一封电报中，他声称有必要“坚决备战”^[268]。

不过，保安的这种好战情绪引起了共产国际的迅速反应。从他们派驻中国的代表们的电报中，莫斯科的领袖们获悉：

最近，英国在上海的报纸一直在刊登文章，建议南京政府“在保存政府完整权威的基础上”与中国共产党人签订协议。美国报纸同样赞成使“所有武装力量围绕南京政府达成协议”。在与民族拯救运动有关的中国人中，甚至在与南京政府关系密切的中国人士中，都流传着一种传言，说曾经去西安帮助释放蒋介石的英美军事专员向蒋建议，对张学良做出让步，与红军签订协议。^[269]

1937年1月16日，季米特洛夫将给中共中央的新指示的草稿交给了斯大林。三天后的1月19日，莫洛托夫、季米特洛夫、安德烈耶夫、日丹诺夫和叶若夫聚集在斯大林的办公室，他们讨论了发展中的形势。他们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语气相当严厉：

我们特别重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过，这样的结果不仅可能被日本帝国主义和其特务的阴谋所破坏——他们正竭尽全力挑起内战——也可能为你们党的错误政策所破坏。

现在，更为清楚的是，党以前的政策，也就是通过排除蒋介石和推翻南京政府来寻求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是错误的。尽管党最近对其政策作了调整，党仍然没有能够完全离开这个错误的方向……事实上，党的目标是分裂国民党，而不是与国民党合作。与蒋介石和南京签订协议被看作向蒋介石和南京投降。与西安各派势力的合作形成了反南京的集团，而不是与他们共同行动反对同一个敌人。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亲日势力。

党在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有效地结束内战……在此基础上，党必须公开地宣布并坚定不移地执行如下政策：对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旨在联合中国人民的所有力量反抗日本侵略、捍卫中国的独立和完整的一切措施都给予支持。^[270]

斯大林敦促季米特洛夫给毛另写了一封信，强调需要改变在中国的工作方向。信是在第二天即1月20日发出的。季米特洛夫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名义请毛思考采取以下措施的时机是否成熟，即“从苏维埃制度转入在民主基础上的人民革命统治制度”，仅仅“在城市中心保留苏维埃，但只是作为群众组织，而不是权力中心”^[271]。

1月19日电报中不容置疑的口气改变了形势，现在是莫斯科再次考验毛是否忠诚的时候了。几天后，毛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即将于2月15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电报草稿发给了季米特洛夫。毛是向季米特洛夫请教如何修改电文的，季米特洛夫将电报原文和他的回电草稿报送到苏共政治局。2月5日，莫洛托夫用保密电话通知季米特洛夫，同意毛泽东的电文草稿，但做了几处修改。季米特洛夫当天就通知了毛。2月9日，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第二天，电文发到了南京。^[272]

电文的部分内容如下：

- ……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
-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 （二）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
 -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 （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至于自己，中共中央答应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并表示愿意将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直接隶属于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军事委员会。此外，中共还同意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273]

此时的毛已经44岁了，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在国家层面上已获

得了巨大的声望。尽管他还不是党的总书记，但他在党内的地位事实上是无人挑战的。但他对莫斯科的依赖依然如故，中共对共产国际的从属地位也是一样的。尽管莫斯科领导层对中国革命的设想经常变化，但中共一如既往地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苏联共产党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苏联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影响依然是压倒性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鲜明地证实了这一点。尽管毛内心深处的怨恨和不满不断积累，但对伟大的斯大林来说，他依然是个听话的学生。

1937年初，子珍生下了他们的第五个孩子。这次生的是个女孩，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给婴儿起名叫娇娇。后来，当这个女孩长到13岁时，毛根据中国传统给她取了个成人的名字：“敏”。毛是从孔子的一句名言“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中取了“敏”这个字的。与此同时，他把她的姓从毛改成了李，李这个姓来自他最喜欢用的化名“李得胜”，李得胜的谐音是“离得胜”。^[274]在毛的女儿出生后不久的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依照在少帅被捕前与他达成的协议，从保安的窑洞转移到了位于保安以南二百里处、陕北最大的城市延安。离开前，毛抱着襁褓中的女儿对她说：“我的娇娇，你赶上好时光哩，我们就要到城里住呢。”^[275]

注 释

第一篇 “润泽东方”

[1] 在当时，红色是弥勒佛的象征。

[2] 参见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韶山毛氏族谱》，第1卷，181页，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2。

[3] 参见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马社香：《红色第一家族》，4~5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编：《毛泽东生活档案》，上卷，60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

[4] Philip Short, *Mao: A Life*, New York, Henry Holt, 1999, p. 23.

[5] 毛泽东的祖母姓刘，生于1846年9月21日，卒于1884年5月20日，死时年仅37岁。就是说，早在毛泽东出生前九年就已不在人世了。毛泽东的祖父生于1846年5月22日，卒于1904年11月23日。

[6] “恩”是他那一辈（第18代）的字辈，除了毛恩普（1846年5月22日—1904年11月23日），属于这一辈的还有他的哥哥、毛泽东的大爷爷毛恩农（1841年12月31日—1907年11月7日）。他们的父亲、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1823—1893）是第17代，“祖”字辈。

[7] 毛泽东的父亲是“贻”字辈（第19代）。“贻昌”的字面意思是“赐予荣华富贵”或者“死后留下荣华富贵”。

[8] 毛贻昌在他的同辈人中年齿最长，换言之，是他所在的毛氏分支中第19代中的老大。因此，村民们都称他为“顺生大公”。

[9] 在旧式的中国家庭中，女孩子往往没

有正式名字，而只有根据其在兄弟姐妹中的长幼排序而定的小名。在大家庭中，这种做法尤其常见。七妹就是这样一个人名字。

[10] 湘是湖南的又一个古老的名称，此名得自流经湖南大部分地区的湘江。

[11] 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104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12] 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1939年12月28日在莫斯科为其填写的调查表：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ГАСПИ). Фонд 495. Д. 225. Оп. 71. Т. 1. Л. 265.

[13] 参见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4] 有趣的是，在《韶山毛氏族谱》中，毛泽东的这个弟弟的名字不是泽民，而是泽铭。参见《韶山毛氏族谱》，第5卷，4、180页；第7卷，5、387页，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2。看来，《韶山毛氏族谱》的这个记载错了。顺便说一下，一般的族谱中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

[15] 在《韶山毛氏族谱》的某一卷中，毛泽东的这个弟弟的名字不是泽覃，而是泽林（音译）。参见《韶山毛氏族谱》，第5卷，4、180页，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2。这个记载显然有误。在族谱的其他各卷中，泽覃的名字的记载都是正确的。参见《韶山毛氏族谱》，第7卷，388页，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2。

[16]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London, Vactor Gollancz, 1937, p. 131.

[17] 杨伯峻：《论语译注》，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18] 参见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105页，北京，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 [19] 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106页。
- [20] 参见上书，105页。
- [21] 参见[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85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 [22] 参见[美]斯诺：《毛泽东自传》，汪衡译，上海，黎明书局，1937。
- [23] Edgar Snow, *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 (1936—1945)*, Cambridge, Mass.,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57, p. 73; 吴亮平：《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前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24] 这里的“弟弟”指的是毛泽民，因为毛泽东此时所谈的，是毛泽覃尚未出生时的情况。
- [25] [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85~87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 [26] *Маркс К. Капитал. Критик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Т. 1. Кн. 1. Процесс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капитала //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Соч. 2-е изд. Т. 23. М., 1960. С. 78.*
- [27] *Панцов А. В. Из истории идейной борьбы в китайском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м движении 20-40-х годов. М., 1985. С. 12-25.*
- [28] 贫农，在社会学中指没有工作的穷人。“流氓无产者”指的是从事非法职业的社会群体（土匪、强盗等）。
- [29] 数字来自 *Гельбрас В. Г.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КНР. 50-60-е годы. М., 1980. С. 27, 33-34, 38.*
- [30]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7, Volume One of Autobiography of Chang Kuo-t'ao*, Lawrence, K. S.,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72, pp. 19-20.
- [31] [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89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 [32] 同上书，90页。
- [33]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Мао Цзэ-дуна, ранее*

не публиковавшиеся в китайской печати. Вып. 6. М., 1976. С. 192.

[34] 中国大作家鲁迅（1881—1936）在《阿Q正传》这部小说中对这种处决的场面有过描述，20世纪初在中国生活的美国医生爱德华·休姆（1876—1957）在其回忆录中也描述过这种场面。

[35]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p. 132.

[36] *Ibid.*, p. 130.

[37] [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88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38] 参见上书，87页。

[39] 高凯、于玲主编：《毛泽东大观》，88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40] 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106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41] 同上书，107页。

[42] 参见郑观应：《盛世危言》，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43]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p. 135.

[44] 毛泽东极有可能不喜欢这位姑娘。根据他的外孙女孔东梅的说法，时年14岁的毛泽东喜欢的是一个叫王十姑的姑娘。她也是毛的表妹。不幸的是，他和她命中相克，因此算命先生不赞成他们结合。王十姑后来嫁给了一位姓赵的人。参见孔东梅：《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16~1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45] 参见[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99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46] 参见马社香：《红色第一家族》，10~11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47] 参见《韶山毛氏族谱》，第7卷，387页，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2。

[48] 关于族谱的记载者经常记错的情况，详见宋平生：《新发现的〈韶山毛氏族谱〉叙略及毛泽东家族史事考订》，载《毛泽东思想研

究》，1990（2）。

[49]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50] [美]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90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51] Philip Short, *Mao: A Life*, New York, Henry Holt, 1999, pp. 29, 649.

[52] 参见马社香：《红色第一家族》，11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53] 参见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108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54] 廖盖隆等主编：《毛泽东百科全书》，第5卷，2658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

[55] Stuart R.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 Vol. 1, Armonk, N. Y. and London, M. E. Sharpe, 1992, p. 60.

[56] [美]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9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57]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p. 135.

[58] [美]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9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59] 梁启超：《新民说》，46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60]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61] [美]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92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62] 同上。

[63] 菲利普·肖特就持此论。参见 Philip Short, *Mao: A Life*, New York, Henry Holt, 1999, p. 38.

[64] William Edgar Geil, *Eighteen Capitals of China*, Philadelphia and London, J. B.

Lippincott Company, 1911, p. 273.

[65] Edward H. Hume, *Doctors East, Doctors West: An American Physician's Life in China*,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49, p. 35.

[66] [美]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93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67] Edward H. Hume, *Doctors East, Doctors West: An American Physician's Life in China*,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49, p. 35.

[68] Joseph W. Esherick,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69] [美]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93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70] Joseph W. Esherick,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 p. 204.

[71]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557～5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72] [美]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94～95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73] 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моей жизн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Пу И-последнего императора Китая. М., 1968. С. 59

[74] [美]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95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75] 同上书，97页。

[76]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8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

[77] Edward H. Hume, *Doctors East, Doctors West: An American Physician's Life in China*, pp. 35-36.

[78] Личное дело Мао Цзэдуна // РГАСПИ. Ф. 495. Оп. 225. Д. 71, Т. 1. Л. 291.

[79] Siao-yu, *Mao Tse-tung and I Were Beggars*,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59.

[80] Ibid., p. 31.

[81] 传统中，中国人用毛笔写字。

[82] Эми Сяо. Мао Цзэ-дун. Чжу Дэ (Вожди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М., 1939. С. 7; Личное дело Мао Цзэдуна //РГАСПИ. Ф. 495. Оп. 225. Д. 71. Т. 1. Л. 292.

[83]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pp. 138, 143.

[84] 参见廖盖隆等编：《毛泽东百科全书》，第1卷，37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

[85] [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98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86]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2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87] Siao-yu, *Mao Tse-tung and I Were Beggars*, p. 47.

[88] Li Jui, *The Early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of Comrade Mao Tse-tung*, White Plains, N. Y., International Arts & Sciences Press, 1977, p. 17.

[89] Эми Сяо. Мао Цзэ-дун. Чжу Дэ. С. 9; Личное дело Мао Цзэдуна//РГАСПИ. Ф. 495. Оп. 225. Д. 71. Т. 1. Л. 293.

[90] Stuart R.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 Vol. 1, p. 487.

[91]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29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9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104～105、108、110、111～112、123、131～132、135、178～179、183、208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93] 同上书，203页。

[94] 同上书，192～193页。

[95] 同上书，1页。

[96] [美]埃德加·斯诺：《毛泽东口述传》，翟象俊译，70～71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97] Личное дело Мао Цзэдуна //РГАСПИ. Ф. 495. Оп. 225. Д. 71. Т. 1. Л. 293.

[98] Li Jui, *The Early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of Comrade Mao Tse-tung*, p. 18.

[99]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00]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着重号是毛泽东原文发表时就有的。

[101]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p. 143.

[102] 1914年至1916年张国焘在南昌中学学习，南昌是湖南邻省江西省的省会。

[103]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7*, Vol. 1, p. 46.

[104] Siao-yu, *Mao Tse-tung and I Were Beggars*, pp. 161-164.

[105] 当时刚刚改名为国民党。

[106] 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2nd e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9, p. 276.

[107] 相当于1亿美元。

[108]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2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09] Edward H. Hume, *Doctors East, Doctors West: An American Physician's Life in China*, p. 239.

[110] Li Jui, *The Early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of Comrade Mao Tse-tung*, p. 47;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1, p. 95.

[111] Edward H. Hume, *Doctors East, Doctors West: An American Physician's Life in China*, p. 241.

[112] Li Jui, *The Early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of Comrade Mao Tse-tung, p. 47.

[113] 指军阀冯国璋。

[1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38~39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115] 同上书，122、167页。

[116] 同上书，163~164、177页。

[117]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1, p. 139.

[118] 廖盖隆等主编：《毛泽东百科全书》，第5卷，2662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

[119] 参见廖盖隆等主编：《毛泽东百科全书》，第5卷，2663页；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112~113、137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120] 高凯、于玲主编：《毛泽东大观》，80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121] [美]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99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122]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1, p. 84.

[123] [美]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99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124] 参见唐纯良：《李立三传》，8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125] Li Jui, *The Early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of Comrade Mao Tse-tung*, pp. 74-75.

[126] Личное дело Мао Цзэдуна // РГАСПИ. Ф. 495. Оп. 225. Д. 71. Т. 1. Л. 294.

[127] [美] 埃德加·斯诺：《毛泽东口述传》，翟象俊译，6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128] 参见廖盖隆等主编：《毛泽东百科全书》，第5卷，2661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Li Jui, *The Early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of Comrade Mao Tse-tung*, pp. 52-53.

[129] 参见廖盖隆等主编：《毛泽东百科全

书》，第5卷，2662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

[130] 参见上书。

[13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83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132] 参见廖盖隆等主编：《毛泽东百科全书》，第5卷，2662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

[133] Robert Payne, *Portrait of a Revolutionary: Mao Tse-tung*, London, New York, Toronto, Abelard-Schuman, 1961, p. 54.

[134] Li Jui, *The Early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of Comrade Mao Tse-tung*, pp. 50-51; Stuart Schram, *Mao Tse-tung*,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4, p. 43.

[135]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68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136] Robert Payne, *Portrait of a Revolutionary: Mao Tse-tung*, p. 54.

[137]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p. 147.

[138] Robert Payne, *Portrait of a Revolutionary: Mao Tse-tung*, p. 53.

[139] [美] 埃德加·斯诺：《毛泽东口述传》，翟象俊译，71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140]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 Vol. 2, Armonk, N. Y. and London, M. E. Sharpe, p. 20.

[141] 参见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111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Li Jui, *The Early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of Comrade Mao Tse-tung*, pp. 71-72.

[142] Личное дело Мао Цзэдуна // РГАСПИ. Ф. 495. Оп. 225. Д. 71. Т. 1. Л. 298.

[143] 参见周世钊等：《五四运动在湖南》，38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

[144]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 p. 20;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4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2004。

[145] Личное дело Мао Цзэдуна // РГАСПИ. Ф. 495. Оп. 225. Д. 71. Т. 1. Л. 295.

[146]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pp. 145-146; *Мао Цзэдуна.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я. Стихи.* С. 40.

[147]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3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48]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49]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3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150] 同上。

[151] Личное дело Мао Цзэдуна // РГАСПИ. Ф. 495. Оп. 225. Д. 71. Т. 1. Л. 295.

[152] [美] 埃德加·斯诺：《毛泽东口述传》，翟象俊译，73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153] 参见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112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154]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1, p. 450.

[155]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2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56] 这里指军阀。

[157]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 p. 21.

[158] Siao-yu, *Mao Tse-tung and I Were Beggars*, p. 207.

[159] Ibid., pp. 202-208.

[160] Подробнее см.: Спичак Д. А. *Китайцы во Франции (рукопись)*. С. 9-12.

[161] Там же. С. 13-14.

[162] Там же. С. 23-24.

[163] Там же. С. 23.

[164]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 p. 23.

[16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

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266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166] Siao-yu, *Mao Tse-tung and I Were Beggars*, pp. 208-209.

[167]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第二篇 做什么？

[1] Siao-yu, *Mao Tse-tung and I Were Beggars*, p. 166.

[2] 参见廖盖隆等编：《毛泽东百科全书》，第1卷，25、26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

[3] 参见马社香：《红色第一家族》，17～18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4] 参见上书，30页。

[5] 杨开慧生于1901年11月6日。

[6] Siao-yu, *Mao Tse-tung and I Were Beggars*, p. 51.

[7] Ibid., p. 50.

[8] Личное дело Мао Цзэдуна // РГАСПИ. Ф. 495. Оп. 225. Д. 71. Т. 1. Л. 318.

[9] 马社香：《红色第一家族》，22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10] [美] 埃德加·斯诺：《毛泽东口述传》，翟象俊译，75～76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11] 后来，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说这所住宅只有一个房间。此言的动机，可能是为了使斯诺对自己当时的穷困潦倒有一个深刻印象吧。

[12]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 p. 23.

[13] Siao-yu, *Mao Tse-tung and I Were Beggars*, p. 166.

[14] 现为八号。

[15] David Strand, *Rickshaw Beijing: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 13.

[16]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7*, Vol. 1, pp. 39, 38.

[17] Ellen N. La Motte, *Peking Dust*, New York, The Century Co., 1919, p. 20.

[18] David Strand, *Rickshaw Beijing*, pp. 20-21;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p. 134.

[19] David Strand, *Rickshaw Beijing*, p. 21.

[20] David Strand, *Rickshaw Beijing*, pp. 17-22;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7*, Vol. 1, p. 39.

[21] [美] 埃德加·斯诺：《毛泽东口述传》，翟象俊译，80~81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22] William Edgar Geil, *Eighteen Capitals of China*, Philadelphia and London, J. B. Lippincott Company, 1911, pp. 404, 406, 421.

[23] Ellen N. La Motte, *Peking Dust*, pp. 13, 15-16.

[24] Новая история Китая. М. 1972. С. 355.

[25] 中国人习惯于称其为“北大”。

[26]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7*, Vol. 1, p. 42.

[27] 当地方言把“乐亭”念做“唠亭”。

[28] 关于李大钊的生平事迹，参见韩一德等：《李大钊生平纪年》，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李大钊传》编写组：《李大钊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资料丛书编委会：《李大钊故居》，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李大钊纪念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Maurice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New York, Atheneum, 1979.

[29]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7*, Vol. 1, pp. 90, 265, 335.

[30]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p. 148.

[31]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1, p. 317.

[32] 参见北京图书馆马列著作研究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文综录》，1119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

[33] 参见上书，1120~1121页。

[34] Борох Л. Н.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мысль Китая и социализм (начало XX в.). М., 1984; Персиц М. А. О подготовительном этап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Ази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 Востоке.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М., 1982. С. 38-76; Martin Bergin, *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35] 指《诗经》，古代中国的一部民间诗歌汇编，其中有305首诗。

[36] 历史上大都是这样称呼《论语》的。

[37] 《毛泽东文集》，第2卷，2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8] 《毛泽东文集》，第3卷，2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39] 指的是朱塞佩·马志尼（1805—1872）、朱塞佩·加里波第（1807—1882）和米洛·奔索·迪·加富尔（1810—1861），他们在意大利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有重大贡献。

[40]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Мао Цзэ-дуна, ранее не публиковавшиеся в китайской печати. Вып. 4. М., 1976. С. 151.

[41]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 1964—1977”,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 22 (May 1998), p. 70.

[42] 《李大钊文集》，下卷，2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3] 同上书，241~243、246页。

[44] 参见韩一德等：《李大钊生平纪年》，59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

[45] 同上。

[46] 参见廖盖隆等编：《毛泽东百科全

书》，第5卷，2662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

[47] 载《民国日报》，1917-05-19。

[48] 《毛泽东文集》，第3卷，290~2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49] *Ли Дачжао.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М., 1989. С. 147.*

[50] 参见廖盖隆等编：《毛泽东百科全书》，第5卷，2664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

[51] [美]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102~103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52] 参见上书，105页。

[5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575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54] *Lee Feigon, Chen Duxiu: Found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55]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7, Vol. 1, p. 99.*

[5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281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57] 参见《陈独秀文章选编》，第1卷，170页，北京，三联书店，1984。

[58] *Ли Дачжао.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М., 1989. С. 147; Lee Feigon, Chen Duxiu: Found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 142;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7, Vol. 1, pp. 90, 110, 694.*

[59] *Личное дело Мао Цзэдуна // РГАСПИ. Ф. 495. Оп. 225. Д. 71. Т. 1. Л. 296.*

[60] [美]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103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61] 高凯、于玲主编：《毛泽东大观》，51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62] *Спичак Д. А. Китайцы во Франции*

(рукопись). С. 23-24; 罗绍志等：《蔡母葛健豪》，见胡华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6卷，47~57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

[63] [美] 埃德加·斯诺：《毛泽东口述传》，翟象俊译，7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64] 参见[美]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150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65]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1, p. 85.*

[66] [美] 埃德加·斯诺：《毛泽东口述传》，翟象俊译，77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67] *Stuart Schram, Mao Tse-tung, p. 48.*

[68]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p. 149; Мао Цзэдуна.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я. Стихи. С. 44.*

[69]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4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70] 参见罗绍志等：《蔡和森》，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6卷，11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

[7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268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72]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73]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74] 参见周世钊等：《五四运动在湖南》，9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

[75] *Движение 4 мая 1919 года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 1969. С. 41.*

[76] 转引自陈子明：《梁启超与五四运动》，见 <http://www.haokoo.com/else/3075679.html>。

[77] *Движение 4 мая 1919 года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 1969. С. 50-51.*

- [78] Движение 4 мая 1919 года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 1969. С. 54-55.
- [79]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2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 [80] Движение 4 мая 1919 года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 96.
- [81] Движение 4 мая 1919 года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 107;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 [82] 高凯、于玲主编：《毛泽东大观》，51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 [83] 即何叔衡。
- [84]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 [85] Движение 4 мая 1919 года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 71-72, 90-91, 94, 348.
- [86] Там же. С. 71, 84.
- [87]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 [88] Янь Вэнь (Крымов А. Г.). Воспоминание о «движении 4 мая» // Движение 4 мая 1919 года в Китае.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 1971. С. 129.
- [89] 周世钊等：《五四运动在湖南》，13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
- [90] 参见周世钊等：《五四运动在湖南》，13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 [91] 《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5卷，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92]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5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 [93] 高凯、于玲主编：《毛泽东大观》，51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 [9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281～282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 [95] 同上书，287页。
- [96]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 p. 172.
- [97] 参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卷，144、547～549页，北京，三联书店，1979。
- [98] 周世钊等：《五四运动在湖南》，17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
- [9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312～314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 [100] 同上书，355～356页。
- [101] 同上书，271页。
- [102] 同上书，406页。
- [103] 同上书，408～410页。
- [104] Li Jui, *The Early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of Comrade Mao Tse-tung*, p. xxix; Philip Short, *Mao: A Life*, New York, Henry Holt, 1999, p. 95; 周世钊等：《五四运动在湖南》，15～16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
- [105] 载《每周评论》，第36期，1919年8月24日。
- [106] 周世钊等：《五四运动在湖南》，29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
- [107]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 [108] 这里指的是和他一起办这份杂志的几个老朋友。
- [109] [美]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105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 [110] 参见周世钊等：《五四运动在湖南》，21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
- [1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401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 [112]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

1949)》，上卷，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两位英文传记作者张戎和琼·哈里戴的观点令人吃惊。他们在自己的书中写道，毛泽东在1919年写的有关妇女问题的全部文章仅仅表明：“作为一个男人，很显然，毛对女性毫不关心，他不愿对她们承担任何责任，……对她们没有多少同情心。”（Чжан Юн, Холлидей Джон. Неизвестный Мао. М., 2007. С. 33.）事实与这个结论正好相反！

[113] 实际上是决策部。

[114]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15] 周世钊等：《五四运动在湖南》，29～30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

[116]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17]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吴泰杰编：《毛泽东光辉历程地图集》，18页，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3。

[118] Личное дело Мао Цзэдуна // РГАСПИ. Ф. 495. Оп. 225. Д. 71. Т. 1. Л. 297.

[119]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1, p. 487.

[120]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419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122]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1, pp. 491-495.

[123] Ibid., pp. 488-489.

[124] 毛在其中远非无足轻重的角色。

[125]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587、591、592、593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127]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1, p. 496.

[128]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29] 毛泽东：《湖南人再进一步》，载《时事新报》，1920-06-11。

[130] 毛自称其外语只有“儿童水平”。

[131] [美]埃德加·斯诺：《毛泽东口述传》，翟象俊译，87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132] 公平起见，在这里我得指出，毛泽东在那以前可能读过《共产党宣言》的另一个译本。据罗章龙回忆，这个译本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油印的。此说是否真实，目前还难下定论。

[133]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Alexander V. Pantsov, *The 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9—1927*,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pp. 33-35.

[134] 对这个问题的更详细的讨论，参见Lee Feigon, *Chen Duxiu*, pp. 138-146.

[135] Гарушняц Ю. М. Движение 4 мая 1919 г. в Китае. М., 1959; Движение 4 мая 1919 г. в Китае.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Chow Tse-t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136] Ли Дачжао.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С. 204.

[137]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359、13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

[138] 参见罗素：《游俄感想》，载《新青年》，1920，8（2）。

[139] Делюсин Л. П. Спор о социализме. Из истори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Китая в начале 20-х годов. М., 1970. С. 31-34.

[140] Делюсин Л. П. Спор о социализме. Из истори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Китая в начале 20-х годов. М., 1970. С. 34; Bertran Russell, *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 1914—1944*, Boston & Toronto, Little Brown & Co., 1956, p. 185.

[141]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 p. 8.

[142] Bertran Russell, *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 1914—1944*, Boston & Toronto, Little Brown & Co., 1956, pp. 191, 192.

[143]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44] 同上书，58页。

[145] 同上书，55页。

[146] 同上。

[14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429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148] 同上书，449页。

[149]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5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431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151]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1, p. 518; Vol. 2, p. 26.

[152]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1, p. 605.

[153] Li Jui, *The Early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of Comrade Mao Tse-tung*, p. 134.

[154]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1, p. 518.

[155] 当地方言念做“王浦江”。

[156] “上海”这个名称的来历另有说法。根据这种说法，上海一词来自“上海浦”，这个名称最早可以追溯到12—13世纪，其意思是

“河流入海口的上游”，指的是扬子江入海口的南岸，即今日上海所在地。扬子江入海口的北岸当时称为“下海浦”，意思是“河流入海口的下游”。13世纪末的时候，“上海”这个地名已经包括当时的县城及其周边地区。在那以前，整个这片地区被称为“沪”。“沪”的原义是当地渔民用来捕鱼的一种竹制渔具。

[157] 又名苏州河，是黄浦江的一条支流。

[158] 例如，1885年时，住在公共租界里的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比例已达35:1。同年，法租界里住有约25000个中国人，外国人只有300人左右。到1925年这种比例也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当时法租界里中国人与外国人的比例为38:1。

[159] Далин С. А. Китайские мемуары. 1921—1927. М., 1975. С. 63.

[160] Harriet Sergeant, *Shanghai*, London, Jonathan Cape, 1991, p. 3.

[161] Вишнякова-Акимова В. В. Два года в восставшем Китае, 1925—1927.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М., 1965. С. 166, 170.

[162] Pan Ling, *In Search of Old Shanghai*, Hong Kong, Joint Pub. Co., 1983, p. 19; Betty Peh-t'i Wei, *Old Shanghai*,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3, 14, 15; *All About Shanghai and Environs: A Standard Guide Book,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Facts and Statistics*, Shanghai, The University Press, 1934; 唐振常编：《近代上海繁华录》，12页，香港，商务印书馆，1993。

[163] Li Jui, *The Early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of Comrade Mao Tse-tung*, p. 134.

[164] [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105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165] Григорьев А. М. Анти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программа китайских буржуазных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1895—1905). М., 1966. С. 65.

[166]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6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

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497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168] Титов А. С. Материалы к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иографии Мао Цзэ-дуна. Т. 1. М., 1969. С. 57.

[169] 高凯、于玲主编：《毛泽东大观》，52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170]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1, pp. 523, 525.

[171] Ibid., pp. 511, 527, 529.

[17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453~454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173] 同上书，475页。

[174] 参见[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15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175] 同上书，107页。

[176] 《列宁选集》，3版，第3卷，4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7] Глунин В. И. Григорий Войтинский (1893—1953) // Видные советские коммунисты-участники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 1970. С. 66-67; Панцов А. В. Тай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 406; Alexander Pantsov, *The 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9—1927*, p. 295.

[178]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1. М., 1994. С. 48;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Т. 1. М., 1987. С. 48-49;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7*, Vol. 1, pp. 122-123.

[17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486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180]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81] Личное дело Мао Цзэдуна // РГАСПИ. Ф. 495. Оп. 225. Д. 71. Т. 1. Л. 296-297.

[182]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1, pp. 583-584.

[183] 参见邵飘萍：《新俄国之研究》，日本东瀛编译社，1920。

[184]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1, pp. 534, 585-586, 589-591; Vol. 2, pp. 48-49.

[185]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86]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1, pp. 554-555.

[187] Чжан Юн, Холлидей Джон. Неизвестный Мао. С. 30.

[188]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1, pp. 493-494, 506-507, 518.

[189] Циу Лао-жэнь (Бао Хуэйсэн). До и после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и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ир. 1971. № 2. С. 120; 《人民日报》，1983-08-14; 萧劲光：《赴苏学习前后》，见《革命史资料》，第三辑，北京，1981; Donald Klein and Anne Clar, *Biograph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Commun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Vol. 1, p. 241, Vol. 2, p. 982.

[190] 参见萧劲光：《赴苏学习前后》，见《革命史资料》，第三辑，北京，1981；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博物馆”陈列资料。

[19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456~457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19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456~457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1, pp. 536-537, 539-540, 575-576, 615.

[193] Philip Short, *Mao: A Life*, New York, Henry Holt, 1999, p. 108.

[194]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 p. 16.

[195] Личное дело Мао Цзэдуна // РГАСПИ. Ф. 495. Оп. 225. Д. 71. Т. 1. Л. 296-297.

[196] [美]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105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197]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 p. 167.

[19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493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199] 同上。

[200] 《五四时期社团》，第1卷，28~29页，北京，三联书店，1979。张戎和琼·哈里戴断言，成立共产党的最初想法“与中国人无关”（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 *Mao*, p. 19）。这一论断是错误的。蔡和森是在与维经斯基及任何来自莫斯科的代表全然无关的情况下，独立地得出中国有必要成立共产党的结论的。

[201]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1. С. 30.

[202] Шевелев К. В. Из истори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М., 1976. С. 63.

[203]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7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204]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205] 同上书，57~58页。

[206] 《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卷，3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07]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208]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1, p. 604.

[20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

文稿》，514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2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211] 同上书，5、6、4页。

[212]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1, p. 544.

[213] 施存统：《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载《新青年》，1921，9（4）。

[214] Глумин В. И. Коминтерн 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Китае (1920—1927) // Коминтерн и Восток. Борьба за ленинскую стратегию и тактику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 М., 1968. С. 249.

[215] 李大钊：《李大钊选集》，218~2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这篇文章日期的确定可见《李大钊文集》，下卷，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16]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载《新青年》，1921，9（3）。

[217] 李达：《马克思还原》，载《新青年》，1921，8（5）。

[218] 他们在其他文章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其中的部分文章收录在以下文集中：林代昭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下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两卷本），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219] 参见吴秦杰编：《毛泽东光辉历程地图集》，21页，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3。

[220]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学制比较独特，小学分为三个阶段：初级小学、中级小学和高级小学。因此，一个高小毕业生很有可能已有16~17岁了。

[221] 参见吴秦杰编：《毛泽东光辉历程地图集》，67页，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3。

[222]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223] 同上。

[224]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7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225]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226]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7*, Vol. 1, pp. 105, 129.

[227] Личное дело Мао Цзэдуна // РГАСПИ. Ф. 495. Оп. 225. Д. 71. Т. 1. Л. 298-299.

[228] 参见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138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229]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230] 同上。

[231] 参见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139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232] 她是在1912年过继给毛的父母做女儿的。1920年，在毛泽东的说服下，这位姑娘下决心摆脱“封建婚姻”，因而可以说，是他帮助她离开她所不爱的丈夫的。那一年，泽建只有15岁，她当时的名字叫菊妹子。“泽建”这个新名字是毛泽东给她取的。参见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132～133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孔东梅：《翻开我家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18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裴健：《湘魂：毛泽东的家世》，56～58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92；《新湘评论》编辑部：《毛主席一家六烈士》，93～110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

[233] 参见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139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23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7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毛泽东文集》，第1卷，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35]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7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236]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78～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237]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 pp. 67-70.

[238] 高凯、于玲主编：《毛泽东大观》，51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239]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13～1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240] 同上书，14页。

[241]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 М., 1994. С. 27.

[242] 即印度尼西亚。

[243]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7*, Vol. 1, pp. 137, 139.

[244]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 С. 743.

[245]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7*, Vol. 1, p. 137.

[246]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 С. 60.

[247] Там же. С. 73.

[248] Там же. С. 57. 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是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

[249] 参见《上海地区建党活动研究资料》，120页，上海，上海市第一人民警察学校，1986；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250] Цит. по: Персиц М. А. Из истории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Доклад, подготовленный Чжан Тайлэем для III Конгресса Коминтерна как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источник) //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1971. No 4. С. 51.

[251] 参见《上海地区建党活动研究资料》，120～121页，上海，上海市第一人民警察学校，1986；陈公博、周佛海：《陈公博、周佛

海回忆录》，116页，香港，春秋出版社，1988。

[252] 参见《上海地区建党活动研究资料》，131页，上海，上海市第一人民警察学校，1986。

[253] 也可能是树德里三号。

[254] 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о первом съезд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1972. No 6. С. 151.

[255] 张戎和琼·哈里戴在他们的书中说，张国焘之所以被选为大会的主持人，乃是“因为他已经去过俄国，而且与外国人有联系”。（Чжан Юн, Холлидей Джон. Неизвестный Мао. С. 40.）事实并非如此。张国焘是在中共成立大会召开半年之后才第一次去俄国的。至于“外国人”，不知道他们所指的是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张国焘与他们的联系并不比这次会议的大部分与会者更密切。他之所以能被选为大会主持人，原因在于，他在这次大会的第一次会议前夕表现得特别积极。

[256] Личное дело Мао Цзэдуна // РГАСПИ. Ф. 495. Оп. 225. Д. 71. Т. 1. Л. 299.

[257]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7*, Vol. 1, pp. 140, 141.

[258] Ibid., p. 92.

[259] Панцов А. В. Судьба китайского троцкиста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8. No 3. С. 98.

[260]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7*, Vol. 1, p. 140.

[261] 参见陈公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12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262] 同上。

[263] 同上书，129~130页。

[264] 同上书，101页。

[265] Конгресс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в Китае //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1972. No 6. С. 151-152.

[266] 参见沈德纯、田海燕：《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主要问题》，载《人民日报》，1961—

06—30。

[267] Ленин В. И. Доклад на II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м съезд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народов Востока 22 ноября 1919 г. // Ленин В. И.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Т. 39. М., 1974. С. 327; 《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9卷，2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68]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9卷，164、2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69] 同上书，165、230~231页。

[270] Панцов А. В. Тай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 69-74.

[271]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8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272] 确实有这么一家出版社，是1921年6月刚刚成立的。这是一家合法的、表面上与共产党人毫无关系的出版社，实际上接受共产国际的秘密资助。

[273] Конгресс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в Китае. С. 153; 《上海地区建党活动研究资料》，9、122~124页，上海，上海市第一人民警察学校，1986；吴秦杰编：《毛泽东光辉历程地图集》，23页，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3；陈公博、周佛海：《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40、117页，香港，春秋出版社，1988；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7*, Vol. 1, pp. 136-152; Цюй Лао-жэнь (Бао Хуэйсэн). До и после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С. 117-127; Чэн Пан-цю (Чэнь Таньцю).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I съезде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 //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1936. No 14. С. 96-99; Siao-yu, *Mao Tse-tung and I Were Beggars*, pp. 196-203. 匪夷所思的是，张戎和琼·哈里戴完全不顾上述材料所提供的、早已广为人知的事实，竟然断言，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在1921年7月的成立大会上成立的，而是在此前一年，即1920年8月成立的。（Чжан Юн, Холлидей Джон. Неизвестный Мао. С. 34.）他们声称要揭穿所谓毛泽东是中共创始人之一的“神话”。其实，下面这个事实对于除他

俩之外的任何人都不是什么秘密：1920年8月成立的那个组织，并非中国共产党，而是上海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如果遵循某些英国作者的逻辑，那么就应当承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不是在1898年的成立大会上成立的，而是在15年前的1883年，随着“劳动解放社”的问世而成立的。

第三篇 民族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1] Tony Saich,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The Role of Sneevliet (alias Maring)*, Vol. 1, Leiden, Brill, 1991, pp. 309-310.

[2] 参见《上海地区建党活动研究资料》，10页，上海，上海市第一人民警察学校，1986。

[3] 参见《马林同志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7月），见РГАСПИ. Ф. 514. Оп. 1. Д. 20. Л. 85-91；《张太雷文集》，3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胡华：《中国革命史讲义》，9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Harold Isaacs, “Documents on the Cominter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45 (1971): 103-104；林鸿暖：《张太雷》，见胡华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卷，81~82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中共“三大”资料》，12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Tony Saich,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Vol. 1, pp. 216-246, 252, 317-323.

[4] Цит. по: Цзян Чжунчжэн (Чан Кайши).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в Кита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в 70 лет. 2-е изд., исправ. и доп. М., 2009. С. 32-33.

[5] 《马林同志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7月），见РГАСПИ. Ф. 514. Оп. 1. Д. 20. Л. 90-91。

[6] 姜华宣：《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和国共合作策略的几个问题》，载《近代史研究》，1985（2）。

[7] 参见《“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3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8] Tony Saich,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Vol. 1, p. 284.

[9] Глунин В. И. Коминтерн 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Китае (1920—1927). С. 252.

[10]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1]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 p. 100.

[12] 《毛泽东文集》，第1卷，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3]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 p. 134.

[14] [美]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108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15] 洞庭湖是长沙北边的一个很大的湖泊，“潇”和“湘”是湖南境内两条河的名称。

[16]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 p. 102.

[17]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8] 《毛泽东文集》，第1卷，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9]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p. 155.

[20] 参见吴秦杰编：《毛泽东光辉历程地图集》，27页，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3。

[21]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 pp. 174-175；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中共“三大”资料》，128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22] [美]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108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23]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 p. 177.

[24]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92～1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吴秦杰编：《毛泽东光辉历程地图集》，27～29页，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3。

[25] 参见马社香：《红色第一家族》，310～312、334～335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26] Мао Цзэминь.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я // РГАСПИ. Ф. 495. Оп. 225. Д. 477. Л. 12；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108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马社香：《红色第一家族》，259、286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27]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 pp. 120-126；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99～1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吴秦杰编：《毛泽东光辉历程地图集》，28～29页，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3。

[28]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 pp. 136-137, 177.

[29] Янь Вэнь (Крымов А. Г.). Воспоминание о «движении 4 мая». С. 130.

[30]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103～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31]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 pp. 132-140.

[32]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1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33]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1. С. 236.

[34] Tony Saich,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Vol. 2, pp. 589-590.

[35] “殷鉴不远”一句出自中国古代诗歌集《诗经》。这句话指的是夏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暴虐的桀在公元前18世纪被殷的统治者推翻一事，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在汉语中，“革命”一词的最初意思是“易天命”。毛引用这句诗意在表明，一场大的革命性变革已迫在眉睫。

[36] 《毛泽东文集》，第1卷，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7] [美]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105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38]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 p. 136.

[39] 吴秦杰编：《毛泽东光辉历程地图集》，26页，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3。

[40] 参见吴秦杰编：《毛泽东光辉历程地图集》，26页，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3；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41]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95～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42] 参见吴秦杰编：《毛泽东光辉历程地图集》，26页，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3。

[43] Tony Saich,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Vol. 1, pp. 344-345.

[44]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 p. 103.

[45] Ibid., p. 93.

[46]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119～120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47] 参见《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载《先驱》，1922（10）。

[48] Калачев С. (Наумов С. Н.).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 Кантон. 1927. № 1 (10). С. 42；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Китая. 1917—1927. М., 1983. С. 106；Соркин Г. З. Съезд народов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Проблемы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1960. № 5. С. 78-80；胡华：《中国革命史讲义》，8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

[49] РГАСПИ. Ф. 5. Оп. 3. Д. 31. Л. 56.

[50] Ленин В. И.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Т. 44. М., 1977. С. 702；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7*,

Vol. 1, pp. 207-209.

[51] 参见《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载《先驱》，1922（10）。

[52]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7*, Vol. 1, p. 220.

[53]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Китая. 1917—1927. М., 1983. С. 108-109.

[54] 陈独秀：《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载《先驱》，1922（9）。

[55] 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304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56] [美]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108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57] 张戎和琼·哈里戴称，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大会是因为“他的代表资格被大会所拒绝”。参见 Jung Chang and Jon Ho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London, Jonathan Cape, 2005, p. 31。可惜，事实并非如此。这个说法，和他们书中的许多其他说法一样，没有史料依据，很可能是杜撰的。

[58] 参见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中国共产党机关发展史参考资料》，38页，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59] 参见《中国共产党五年来之政治主张》，1~23页，广州，国光书局，1926；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中共“三大”资料》，5~7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60] 《“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10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61] 参见《民权运动大同盟宣言》，载《先驱》，1922（20）。

[62]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中共“三大”资料》，7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63] 参见姜华宣：《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和国共合作策略确立的几个问题》，载《近

代史研究》，1985（2）。

[64] Alexander Pantsov and Gregor Benton, “Did Trotsky Oppose Entering the Guomindang ‘From the First’?” *Republican China*, 1994, Vol. XIX. No. 2 (April): 61-63.

[65] Tony Saich,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Vol. 1, p. 327.

[66]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7*, Vol. 1, p. 250.

[67] Dov Bing, “Sneevliet and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CP,” *The China Quarterly*, No. 48 (1971): 690-691.

[68] Далин С. А. Китайские мемуары 1921—1927. С. 134.

[69] 参见姜义华：《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廖仲恺》，7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70] 参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94页，台北，作家书局，1965。

[71] Tony Saich,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Vol. 1, p. 53.

[72] Tony Saich,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Vol. 1, p. 310;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7*, Vol. 1, p. 138.

[73] Ян Куйсун. Общая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ВКП (б) (КПСС), Коминтерном и КПК до 1949 года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04. № 6. С. 103.

[74] Калачев С. (Наумов С. Н.).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 Кантон. 1927. № 1 (10). С. 51;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7*, Vol. 1, p. 260.

[75] 《李大钊文集》，下卷，8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76]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7*, Vol. 1, p. 260; 徐元冬等：《中国共产党历史讲话》，36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

[77] 参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345~348页，长沙，民智书局，1931。

[78] 参见《孙中山全集》，第7卷，51～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79] 马社香：《红色第一家族》，29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毛的这个儿子还有一个名字，是根据他在韶山毛氏家族中的辈分取的，叫“远仁”。“远”是韶山毛氏第21代的字辈。

[80]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1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81] 参见吴秦杰编：《毛泽东光辉历程地图集》，29页，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3。

[82] Tony Saich,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Vol. 1, p. 345.

[83]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7*, Vol. 1, p. 105.

[84]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1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85] 参见吴秦杰编：《毛泽东光辉历程地图集》，31、32页，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3。

[86] 《毛泽东文集》，第1卷，10、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7] 张戎和琼·哈里戴称，毛泽东自1923年1月以来一直热情地支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主张。这个说法没有根据。见 Чжан Юн, Холлидей Джон. Неизвестный Мао. С. 46-48.

[88] Tony Saich,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Vol. 2, pp. 448-449, 589-590, 616-617.

[89] 参见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中共“三大”资料》，155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90] 参见上书，128页。

[91] 同上书，62页。

[92] 作者与前中共党员王凡西的谈话（英国里兹，1992年7月17日）。

[93] Цай Хэ-сэнь. История оппортунизма в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Проблемы Китая. 1929. № 1. С. 4; Tony Saich, *The Ori-*

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Vol. 2, pp. 584-592.

[94] Цит. по: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Китая. 1917—1927. С. 140.

[95]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中共“三大”资料》，140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96]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7*, Vol. 1, p. 308.

[97]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1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98] Tony Saich,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Vol. 2, p. 580; 朱洪：《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178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

[99]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7*, Vol. 1, p. 311.

[100]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中共“三大”资料》，81～82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101] 参见上书，132页。

[102]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1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03]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1. С. 238; *Soviet Plot in China*, Beijing, Metropolitan Police Headquarters, 1927, Document No 13.

[104] Ibid., pp. 425-426.

[105]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1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06]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中共“三大”资料》，88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107]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и кита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 1986. С. 39.

[108]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1. С. 230.

[109] Записки Пэн Пая. М., 1938. С. 9.

[110]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Китая. 1917—1927. С. 166.

[111] 参见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中共“三大”资料》，103~104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112]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1. С. 241.

[113] 参见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中共“三大”资料》，157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114]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 p. xxx.

[115] 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1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16]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1966. № 10. С. 34; Saich Tony,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Vol. 2, p. 526.

[117]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1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18]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1. С. 240.

[119] Tony Saich,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Vol. 1, p. 611.

[120] Lydia Holubnychy, *Michael Borodi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3—192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72.

[121] 蒋宋美龄：《与鲍罗廷谈话的回忆录》，12~13页，台北，源成文化图书供应社，1976。

[122] Charles Shipman, *It Had to Be Revolution: Memoirs of an American Radical*,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82, 83.

[123] Далин С. А. Китайские мемуары. 1921—1927. С. 149.

[124]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7*, Vol. 1,

p. 519.

[125] Tony Saich,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Vol. 2, p. 697.

[126]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1. С. 255-314; Chiang Chung-cheng, *Soviet Russia in China: A Summing Up at Seventy*, Tran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Madame Chiang Kai-shek. Revised, Enlarged Edition, with Map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Cudahy, 1958, pp. 21-27; *Chiang Kai-shek's Secret Past: The Memoirs of His Second Wife, Ch'en Chieh-ju*, Boulder, CO., 1993, pp. 130-137.

[127]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1. С. 261.

[128] *Chiang Kai-shek's Secret Past*, pp. 133, 131, 136.

[129] Коммунист. 1969. № 4. С. 12-14.

[130] Черепанов А. И. Записки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ника в Китае. 2-е изд. М., 1976. С. 30-72.

[131] 《孙中山选集》，下卷，5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32]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116、1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33]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7*, Vol. 1, p. 315.

[134] 参见马社香：《红色第一家族》，29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Hans Van de Vende, *From Friend to Comrade: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0—1927*,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 136.

[135] 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载《向导》，1923（31）、（32）。

[136]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1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37]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 p. 192.

[138]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

(1893—1949)》，上卷，1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Angus W. McDonald, Jr., *The Urban Origins of Rural Revolution*, pp. 58, 120, 205；Philip Short, *Mao: A Life*, p. 144。

[139]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 p. 194。

[140] 根据他在韶山毛氏宗族中的辈分，这个孩子还有一个名字叫“毛远义”。

[141]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三年十一月），载《中国共产党党报》，1923-11-30。

[142]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中共“三大”资料》，103~104、120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143] 同上。

[144] 同上书，125页。

[145] 参见《林伯渠传》编写组编：《林伯渠传》，84页，北京，红旗出版社，1986。

[146]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1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47] Angus W. McDonald, Jr., *The Urban Origins of Rural Revolution*, p. 137。

[148] 昆仑是中国西南部一座山脉的名称。

[149] 毛泽东：《贺新郎》，见萧永义编：《毛泽东诗词对联辑注》，10~11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150] Далин С. А. Китайские мемуары. 1921—1927. С. 89。

[151] Вишнякова-Акимова В. В. Два года в восставшем Китае, 1925—1927. С. 216。

[152] Черепанов А. И. Записки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ника в Китае. С. 74。

[153]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7*, Vol. 1, p. 328。

[154] Далин С. А. Китайские мемуары. 1921—1927. С. 86。

[155] Вишнякова-Акимова В. В. Два года в восставшем Китае, 1925—1927. С. 201。

[156] Далин С. А. Китайские мемуары.

1921—1927. С. 87。

[157] Tony Saich,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Vol. 2, p. 580。

[158] 《国民党一大党务报告选摘》，载《革命史资料》，1986（2）。

[159] Юрьев М. Ф. Революция 1925—1927 гг. в Китае. М., 1968. С. 17-28。

[160] 《李大钊文集》，下卷，7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61] Черепанов А. И. Записки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ника в Китае. С. 99。

[162] Черепанов А. И. Записки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ника в Китае. С. 99。

[163] 参见邝光编：《中山全集（分类索引）》，第2卷，1171~1173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1。

[164] Alexander Pantsov and Steven I. Levine, *Chinese Comintern Activists: An Analytic Biographic Dictionary* (manuscript), p. 266；Ch'ü Chiu-pai, "My Confessions," Dun J. Li, ed., *The Road to Communism: China since 1912*, New York etc., Van Nostrand Reinhold Co., 1969, pp. 159-167。

[165] 为鲍罗廷服务的，有一大批中共党员。和瞿一起共事的，还有张太雷夫妇和几位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毕业生，后者包括梁启超的外甥李仲武、黄平、傅大庆和卜士奇。

[166]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1. С. 446。

[167] 《“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5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168] Tony Saich,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Vol. 2, p. 611。

[169] 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习惯于像西方人那样用拉丁字母署名。名字仅用首字母来代替，并且名在姓前。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使用的是当时流行的韦德—吉尔斯拼音系统，该系统得名于其发明者、两位英国教授托马斯·弗朗西斯·韦德（1818—1895）和赫伯特·艾伦·吉尔斯（1845—1935）。这种拼音法与联合国在70年代初正式颁行的现行拉丁字母拼音法

差别很大。在韦德—吉尔斯拼音系统里，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这三个汉字名的书写分别是 Tu-siu Chen、Ta-chao Li 和 Tse-tung Mao，署名时则变成了 T. S. Chen、T. C. Li 和 T. T. Mao。

[170] 作者个人收藏的档案。潘佐夫：《新发现的李大钊、陈独秀、任弼时信件》，载《百年潮》，2005（1）。这三封信和下一封信中括弧内的文字是作者加上去的。

[171] Ян Куйсун. Общая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ВКП (б) (КПСС), Коминтерном и КПК до 1949 года. С. 104;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7*, Vol. 1, p. 408.

[172] 1925年初，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73] 作者个人收藏的档案。潘佐夫：《新发现的李大钊、陈独秀、任弼时信件》，载《百年潮》，2005（1）。

[174]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1. С. 425.

[175] Hans Van de Vende, *From Friend to Comrade*, p. 150.

[176] 参见吴秦杰编：《毛泽东光辉历程地图集》，32页，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3；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1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1. С. 483-484.

[177] Далин С. А. Китайские мемуары. 1921—1927. С. 165.

[178] Далин С. А. Китайские мемуары. 1921—1927. С. 165; Глунин В. 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Китая накануне и во врем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революции 1925—1927 гг. Кн. 1. М., 1975. С. 148-154.

[179] 参见《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的工作问题议决案》，载《中国共产党党报》，1924（3）；《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案及宣言》，25页，出版单位不详，1925。

[180] 《“二大”与“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30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181]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1. С. 328.

[182]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Китая. 1917—1927. С. 159.

[183] В. К. Блюхер в Китае. 1924—1927 гг.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главного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ника. М., 2003. С. 15.

[184]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1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85] Philip Short, *Mao: A Life*, p. 149.

[186] 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1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马社香：《红色第一家族》，29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吴秦杰编：《毛泽东光辉历程地图集》，32页，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3。

[187]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1. С. 483-484;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7*, Vol. 1, p. 378.

[188] Мао Цзэминь.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я. Л. 124; 马社香：《红色第一家族》，259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117、120~121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1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89]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1. С. 520.

[190] 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1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91] Philip Short, *Mao: A Life*, p. 152.

[192]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1. С. 425.

[193] Записки Пэн Пая. С. 13.

[194] Angus W. McDonald, *The Urban Origins of Rural Revolution*, p. 224.

[195] 参见马社香：《红色第一家族》，259、260、265~267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196]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p. 143.

[197] “地主”的字面意思就是“土地的主人”，通常在俄语中被翻译为“помещик”，实际上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地主。中国的“地主”通常只是比普通的农民富裕一些的土地所有者而已。

[198] 马社香：《红色第一家族》，259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199]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1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Angus W. McDonald, Jr., *The Urban Origins of Rural Revolution*, p. 225；刘仁荣：《毛泽章》，见胡华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卷，290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200]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1. С. 521.

[201] Юрьев М. Ф. Революция 1925—1927 гг. в Китае. С. 159-167.

[202] Там же. С. 169, 174.

[203] Юрьев М. Ф. Революция 1925—1927 гг. в Китае. С. 239-241；Alexander Pantsov and Steven I. Levine, *Chinese Comintern Activists: An Analytic Biographic Dictionary* (manuscript), p. 290.

[204] Angus W. McDonald, Jr., *The Urban Origins of Rural Revolution*, p. 225.

[205]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132～1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206] 参见上书，135～137页。

[207] 参见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128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208]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 1, p. 487.

[209] 参见《郑超麟回忆录》，83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2。

[210]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1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211] [美]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

国》，董乐山译，109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212]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8～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13]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p. 157；Мао Цзэдун.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я. Стихи. С. 52.

[214] Войтинский Г. Тенденци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Китае и гоминьдан//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М., 1925. № 3 (40). С. 153-158；Он же. Сунь Ят-сен и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Большевик. М., 1925. № 5-6 (21-22). С. 44-52.

[215] 格·纳·维经斯基致列·米·加拉罕的信（1925年4月22日），未经整理的档案。这封信于1994年首次公开发表。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1. С. 549-553.

[216] РГАСПИ. Ф. 495. Оп. 163. Д. 177. Л. 1-4.

[217] Войтинский Г. Колони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на расширенном пленуме ИКК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1925. № 4 (41). С. 64.

[218] 着重号是作者加的。两年之后，在斯大林的政策失败之后，“就像国民党那样”这句话从他的发言的文本中删除了。在斯大林的对华政策失败前夕的1927年春，他开始试图给人以如下印象，即他在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这次发言指的不是现实中的国民党，而是“未来总的人民革命党，其中包括国民党”。但是，这种辩解是笨拙的。

[219] РГАСПИ. Ф. 558. Оп. 1. Д. 2714. Л. 17-18；Правда. 1925. 22 мая.

[220]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и кита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 58, 61. 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221] Панцов А. В. Тай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 296-298.

[222]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 1, pp. 484-485.

[223]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 pp. 227-229, 234-236, 320.

[224] 《汪精卫先生与革命的民众》，载《中央副刊》，1927-04-12。

[225] 《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载《政治周报》，1925(1)。

[226] Ch'ü Ch'iu-pai, *My Confessions*, p. 166.

[227] 参见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载《革命》，1925-12-01。

[228] Вн (Беленький С. Н.). Рец.: Мао Цзэ-дун. Анализ классов кита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Китайский крестьянин». 1926. 1 февраля. № 2. // Кантон. 1926. № 8-9. С. 37-43.

[229]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150、1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 pp. 310-319.

[230]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82~83页，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

[231] Вишнякова-Акимова В. В. Два года в восставшем Китае, 1925—1927. С. 198.

[232]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152、155、1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233] Шестой расширенный пленум Исполкома Коминтерна (17 февраля-15 марта 1926 г.).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 Л., 1927. С. 8.

[234] РГАСПИ. Ф. 514. Оп. 1. Д. 168. Л. 219.

[235] Объединенное заседание Президиума Исполкома Коминтерн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Контрольной Комиссии. 27 сентября 1927 г.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РГАСПИ. Ф. 505. Оп. 1. Д. 65. Л. 21. См. также: Троцкий Л. Сталин и кита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Факты и документы//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ленинцев). 1930. № 15-16. С. 8.

[236] РГАСПИ. Ф. 514. Оп. 1. Д. 171. Л. 7-9; см. также: Д. 168. Л. 219; Справка Райта

«О вхождении Гоминьдана в Коминтерн» // Объединенное заседание Президиума Исполкома Коминтерн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Контрольной Комиссии. 27 сентября 1927 г. Л. 33.

[237] РГАСПИ. Ф. 514. Оп. 1. Д. 171. Л. 7-9. Этого письма содержание также видно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I. М., 1996. С. 131-132.

[23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167页，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

[239] Dan N. Jacobs, *Borodin: Stalin's Man i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78.

[240] Вишнякова-Акимова В. В. Два года в восставшем Китае, 1925—1927. С. 237.

[241] Юрьев М. Ф. Революция 1925—1927 гг. в Китае. С. 312-313.

[242] Черепанов А. И. Записки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ника в Китае. С. 376.

[243] 蒋介石回忆道：“在俄国将军中，我认为，他（指布留赫尔）不仅是一位有能力的军官，而且是一位亲切而深明事理的人。”

[244] Черепанов А. И. Записки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ника в Китае. С. 376.

[245] 在1926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全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成立一个由五名国民党中央执委、三名共产党中央执委会委员和鲍罗廷组成的联席会议。但这个决议始终停留在纸面上。

[246] РГАСПИ. Коллекция неразобранн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Все принятые решения полностью собраны в: Черепанов А. И. Записки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ника в Китае. С. 403-404; 《中国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卷，714~715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247] Юрьев М. Ф. Революция 1925—1927 гг. в Китае. С. 320-321;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1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248]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I. С. 188.

[249] Панцов А. В. Тай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

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 137-138.

[250] РГАСПИ. Ф. 17. Оп. 162. Д. 3. Л. 55. 这份政治局决议的全文 1996 年才首次公开。

[251]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 1, p. 508.

[252] РГАСПИ. Ф. 17. Оп. 162. Д. 3. Л. 59, 74;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I. С. 205.

[253]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 1, p. 510.

[254] Юрьев М. Ф. Революция 1925—1927 гг. в Китае. С. 320-321.

[255] Там же С. 250;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上卷, 158、161、162~163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Li Jui, *The Early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of Comrade Mao Tse-tung*, pp. 283-284.

[256]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 pp. 319, 343, 358.

[257] Тумов А. С. Материалы к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иографии Мао Цзэ-дуна. Т. 1. С. 123.

[258] 毛泽东:《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1926 年 1 月 1 日), 载《中国农民》, 1926, 1 (1)。

[259] 毛泽东:《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1926 年 1 月 10 日), 载《政治周报》, 1926 (4)。

[260] 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也提出了这些要求。当然, 这份文件没有反映共产党人的真实意图。在中华民国成立周年纪念日的 1925 年 10 月 10 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指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在工人、农民夺取政权以前一直是有效的。

[26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1 册, 398~399 页,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262] 参见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 32 页, 北京, 红旗出版社, 1983。

[263]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上卷, 156、157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264] 事实上他当时已经离婚了。1924 年 7 月, 他同妻子加仑娜·帕夫洛夫娜正式解除了婚约。他选择这个假名意在表示与前妻的和解之意。但是在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他仍然没带家属。在布留赫尔第二次使华、前往广州的时候, 1926 年 5 月底, 加仑娜·帕夫洛夫娜和孩子们一起同他前往。当年仲夏北伐开始时, 他离开中国去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在那里, 他通过自己的翻译谢加尔在 1927 年下半年给自己的妻子写了两封信。信中说, 他打算娶苏联驻汉口领事馆的打字员加仑娜·亚历山大洛夫娜·科利邱金娜为妻。但是他始终没有同这位女士登记结婚。五年后, 布留赫尔娶了远东医学院一位年轻的女大学生格拉菲拉·卢金尼吉娜·别兹维尔霍娃。

[265] Казанин М. И. В штабе Блюхера.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1925—1927 годов. М., 1966. С. 41.

[266]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 p. 370; Блюхер Г.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муже-маршале В. К. Блюхере. Тюмень, 1996. С. 55.

[267] Юрьев М. Ф. Революция 1925—1927 гг. в Китае. С. 323-338;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 1, pp. 520-536; Angus W. McDonald, Jr., *The Urban Origins of Rural Revolution*, pp. 229-236.

[268]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上卷, 165~169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269] 《毛泽东文集》, 第一卷, 37、39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第四篇 枪杆子与政权

[1]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上卷, 169~172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Юрьев М. Ф. Революция 1925—1927 гг. в Китае. С. 416; Вишнякова-Акимова В. В. Два года в восставшем Китае 1925—1927. С. 273-302;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 1, pp. 532-572.

[2]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172～1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32页，北京，红旗出版社，1983。

[3]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1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Philip Short, *Mao: A Life*, p. 168.

[5] 这个机构是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在1926年成立的。

[6] Глунин В. 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Китая накануне и во врем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революции 1925—1927 гг. Кн. 2. М., 1975. С. 192.

[7]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 1, p. 529.

[8]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决案》，66页，出版单位不详，1926。

[9]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 1, p. 529.

[10]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I. С. 485-486.

[11] 参见《毛泽东生活档案》，上卷，93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

[12] Мартынов А. Коминтерн перед судом ликвидаторов//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1927. № 30 (104). С. 10.

[13] РГАСПИ. Ф. 17. Оп. 162. Д. 4. Л. 10. 这份指示的文本又见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I. С. 497-498.

[14] Сталин И. В. Соч. Т. 10. М., 1953. С. 17.

[15] Объединенный пленум ЦК и ЦКК ВКП (б). 29 июля-9 августа 1927 г.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Вып. 1 // РГАСПИ. Ф. 17. Оп. 2. Д. 137. Л. 83-84.

[16] РГАСПИ. Ф. 495. Оп. 165. Д. 71. Л. 27-31.

[17] Глунин В. 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Китая накануне и во врем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революции 1925—1927 гг. Кн. 2. С. 198-201.

[18]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 pp. 411-413;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1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9]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 pp. 414-419.

[20]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 1, pp. 534-535, 542, 547.

[21] Ibid., p. 557.

[22] C. Martin Wilbur and Julie Lien-ying How,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772, 773, 774.

[23]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 1, p. 572.

[24] Jonathan Fenby, *Chiang Kai-shek: China's Generalissimo and the Nation He lost*, New York, Carroll & Graff Publ., 2004, p. 127.

[25]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 1, p. 562.

[26] Chen Duxiu, "Political Report," Tony Saich, ed.,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ocuments and Analysis*, Armonk, NY and London, M. E. Sharpe, 1996, pp. 219-223; Глунин В. 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Китая накануне и во врем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революции 1925—1927 гг. Кн. 2. С. 153-157.

[27]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1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28]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12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29] Глунин В. 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Китай накануне и во врем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революции 1925—1927 гг. Кн. 2. С. 160.

[30]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 1, p. 573.

[31] Черепанов А. И. Записки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ника в Китае. С. 517; Jonathan Fenby, *Chiang Kai-shek*, p. 127.

[32]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上卷, 173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33] 同上书, 175页。

[34]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 p. 421, 422; Совещание Дальбюро и Ц [И] К КПК. 18 января 1927 года //РГАСПИ. Ф. 495. Оп. 154. Д. 294. Л. 3; Бакулин А. В. Записки об уханьском периоде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из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1925—1927 гг.). М.; Л., 1930. С. 51.

[35] Совещание Дальбюро и Ц [И] К КПК. 18 января 1927 года. С. 3.

[36] 从9世纪起直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 妇女缠脚的习俗在中国很普遍。通常的做法是, 母亲从女儿3岁起就开始用一块长长的布把她的脚紧紧地裹起来。终其一生, 这种近似于酷刑的肉体折磨都将伴随着这位女性。这样做是为了使脚长不大。小而弯的脚被认为具有性的意味。经过这番“手术”, 所有的脚趾头都被折断, 并被弯曲在足底, 只有脚拇趾没断, 因而是直的。据传说, 第一个缠足的女性是一位王室贵族的配偶, 她这样做是为了取悦她的口味独特而雅致的丈夫。

[37] 客家人的起义在中国并不鲜见,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太平天国起义(1851—1864), 这次起义造成约两千万人丧生。

[38] 例如, 在湖南省, 有23种附加税。与此同时, 在相邻的湖北省, 有61种附加税。在东部省份江苏, 名目繁多的附加税竟高达147种!

[39] Писарев А. А. Гоминьдан и аграрно-крестья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Китае в 20-30-е годы XX в. М., 1986. С. 17-53; Делюсин Л. П., Костяева А. С. Революция 1925—1927 гг. в

Китае: проблемы и оценки. М., 1985. С. 132-138; Angus W. McDonald, Jr., *The Urban Origins of Rural Revolution*, pp. 217-315; Roy Hofheinz Jr., *The Broken Wa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easant Movement*,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3-53; Fernando Galbiati, *P'eng P'ai and the Hai-lu-feng Sovie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6-20, 41-42; Lucian Bianco, *Peasants Without the Party: Grass-roots Movemen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Armonk, NY and London, M. E. Sharpe, 2001, pp. 175-214; Mary S. Erbaugh,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Hakkas: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s a Hakka Enterprise*, *The China Quarterly*, 1992, No. 132: 937-968.

[40] Костяева А. С. Крестьянские союзы в Китае (20-е годы XX века). М., 1978. С. 57; Делюсин Л. П., Костяева А. С. Революция 1925—1927 гг. в Китае: проблемы и оценки. С. 134.

[41] Глунин В. 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Китая накануне и во врем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революции 1925—1927 гг. Кн. 2. С. 186; Angus W. McDonald, Jr., *The Urban Origins of Rural Revolution*, p. 303.

[42] Костяева А. С. Крестьянские союзы в Китае. С. 57; Angus W. McDonald, Jr., *The Urban Origins of Rural Revolution*, pp. 272-273.

[43] Мао Цзэ-дун.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Т. 1. М., 1949. С. 10, 23-25; Angus W. McDonald, Jr., *The Urban Origins of Rural Revolution*, p. 271; Li Jui, *The Early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of Comrade Mao Tse-tung*, p. 295.

[44] 这是一种用纸做成的高帽子, 高帽子上通常会写上一些字: 某某土豪或者某某劣绅。然后会敲锣打鼓, 把他们绑起来在村子里游街示众。中国人自古以来都认为, 没有比丢脸更可怕的了, 因而这种方式被认为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惩罚。

[45] Angus W. McDonald, Jr., *The Ur-*

ban Origins of Rural Revolution, p. 308.

[46]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47]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

[48] 参见《毛泽东生活档案》，上卷，93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马社香：《红色第一家族》，30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49]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2~13、14、15、16、17、18、31~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 pp. 429-464.

[50]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1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51] 参见吴秦杰编：《毛泽东光辉历程地图集》，35页，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3；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1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52]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и кита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С. 94, 96-99.

[53] РГАСПИ. Ф. 17. Оп. 162. Д. 4. Л. 34. См. также: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I. С. 571.

[54] 这是上海无产阶级的第二次起义，第一次起义发生在1926年10月，是由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

[55] РГАСПИ. Ф. 17. Оп. 162. Д. 4. Л. 64.

[56]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I. С. 632-633.

[57] Angus W. McDonald, Jr., *The Urban Origins of Rural Revolution*, pp. 301-302;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 1, pp. 596-615; 唐纯良：《李立三全传》，103~104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

[58] 在湖南省的醴陵县，当时有传闻说，李立三的身为乡村教师的父亲，被当作土豪劣绅处决了。幸而这个消息后来证明是讹传。

[59] Angus W. McDonald, Jr., *The Ur-*

ban Origins of Rural Revolution, p. 310.

[60]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 pp. 467-475.

[61]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 1, pp. 581-582.

[62] Маяковский В. 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8. М., 1961. С. 59.

[63] 参见吴秦杰编：《毛泽东光辉历程地图集》，35页，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3。

[64] 参见上书，35页；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1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 p. 486.

[65] [美]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110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66] 这两个人都是在华专家。前者的真实姓名是叶甫根尼·西吉斯孟多维奇·伊奥克（1900—1937或1942），他在中国工作时的化名是约翰和约翰逊。后者的另一个名字是米哈伊尔·沃林（1896—1938），但这也是个化名，其真名是谢苗·纳塔诺维奇·别列尼基。1926—1927年的时候，两人都是鲍罗廷手下的工作人员，研究的正是中国土地问题。他们甚至在1927年初用英文出版了两卷本的专著，此书由鲍罗廷主编，书名为《广东农民问题》。另外，沃林还为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写过评论，该文发表在专门面向苏联顾问发行的《广州》杂志上。

[67]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p. 158.

[68]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1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69] 这个男孩还有一个按照他在韶山毛氏宗族中的辈分取的名字，叫“毛远智”。根据毛氏族谱，毛泽东和杨开慧还有另外一个儿子毛远怀 [又叫毛式谷（毛远怀是毛泽东的侄子。——译者注）]，他大概生于1923年3月18日，也就是说，比他的第二个儿子毛岸青大

八个月?! 毛岸青由毛的弟弟毛泽民和他的妻子王淑兰抚养。很可能, 族谱作者又搞错了: 毛泽东和杨开慧没有一个名叫毛远怀的儿子。族谱还有一个不准确的地方: 岸龙的名字被写成了岸立。[参见宋平生:《新发现的〈韶山毛氏族谱〉叙略及毛泽东家族史事考订》, 载《毛泽东思想研究》, 1990(2)。]

[70] 参见《维经斯基与蒋介石的会谈记录(1927年2月22日)》, РГАСПИ. Ф. 514. Оп. 1. Д. 240. Л. 12-13;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I. С. 630-631。

[71] РГАСПИ. Ф. 17. Оп. 162. Д. 4. Л. 90-93. См. также: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I. С. 658-659。

[72]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上卷, 193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73] 参见上书, 193~197页。

[74] 转引自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 278、280页,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63。

[75] Бакулин А. В. Записки об уханьском периоде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С. 201。

[76] Robert C. North and Xenia Eudin, *M. N. Roy's Mission to China: The Communist-Kuomintang Split of 1927*,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p. 59。

[77] [美]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董乐山译, 112页,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8。

[78]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 1, p. 619。

[79] Ibid.

[80] Глунин В. 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Китая накануне и во врем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революции 1925—1927 гг. Кн. 2. С. 258-269; 李颖:《从一大到十六大》, 上册, 234~294页,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 1, pp. 621-623; Бакулин А. В. Записки об уханьском периоде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С. 271-280。

[81] [美]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

国》, 董乐山译, 110页,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8。

[82] Цай Хэ-сэнь. История оппортунизма в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С. 67-68。

[83] Личное дело Чжао Сяньгуй // РГАСПИ. Ф. 495. Оп. 225. Д. 2682。

[84] Мао Цзэминь.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я. Л. 125; 马社香:《红色第一家族》, 266~268、315~317页,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4; Ли Минь. Мой отец Мао Цзэдун. С. 109-110, 120; 新疆大学、韶山毛泽东纪念馆《毛泽民》编写组:《毛泽民》, 见胡华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九卷, 500~511页,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刘仁荣:《毛泽覃》, 见胡华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三卷, 290~291页,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85] 参见韩一德等:《李大钊生平纪年》, 203~206页,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86]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 1, pp. 630-631。

[87] РГАСПИ. Ф. 17. Оп. 162. Д. 5. Л. 8-9, 30。

[88] Там же. С. 30. 这封电报首次公开于1996年, 见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I. С. 763-764。

[89]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 1, p. 637。

[90] Цай Хэ-сэнь. История оппортунизма в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С. 63。

[91] 参见刘仁荣:《毛泽覃》, 见胡华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三卷, 291页,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 121、128页,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1。

[92]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p. 160; Мао Цзэдун.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я. Стихи. С. 56; Цай Хэ-сэнь. История оппортунизма в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С. 64; 《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上卷, 203~204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Мао Цзэминь.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я. Л. 125.

[93]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 1, p. 640.

[94]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p. 160. 张戎和琼·哈里戴为了把毛描述成一位不讲原则的政客，其对事实的歪曲简直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他们断言，在1927年夏天的时候，毛看来“认真地考虑过两个选择”，一是站在国民党这一边，二是留在共产党内！（Чжан Юн, Холлидей Джон. Неизвестный Мао. С. 60-61.）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毛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共产主义者，他不仅无意与国民党的任何派系拉关系，而且还竭尽全力使形势向激进的方向发展。

[95] 指长江的九条支流。

[96] 指在武汉交汇的北京—汉口铁路和汉口—长沙铁路。

[97] 龟山和蛇山是长江两岸隔江相对的两座小山，龟山在汉阳，蛇山在武昌。黄鹤楼在蛇山上。

[98] 根据一个古老的传说，很久以前，有位姓辛的年轻人在武昌开了一个很有名的酒店。这位店主人很善良，有一次他招待了一位贫穷的道士喝酒。为了表示感谢，这位道士在他酒店的墙壁上画了一只非常神奇的鹤。每当有人对着墙拍手的时候，这只鹤就会随拍起舞。这位年轻人非常高兴：因为从那以后他的酒店总是生意兴隆，来看这只神奇的鹤的人通常会花些钱喝酒。十年之后，老道士再次到来这个酒店，他取出来一根长笛吹了起来，然后坐在鹤身上升天了。为了纪念这件事情，辛的家人在酒店的原址上建了一座黄鹤楼。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话，它应该发生在公元3世纪初期。据考证，这座塔建于223年。

[99] 毛泽东：《黄鹤楼》，见《毛主席诗词》，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100]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 1, pp. 486, 652.

[101] Ibid., p. 597.

[102] Angus W. McDonald, Jr., *The Urban Origins of Rural Revolution*, p. 316.

[103]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 pp. 515-516.

[104] *Mao Zedong: Biography, Assessment, Reminiscence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6, pp. 236-237.

[105] Li Jui, *The Early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of Comrade Mao Tse-tung*, p. 315.

[106]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2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07] 参见上书，205页。

[108]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 1, p. 656.

[109] 除瞿之外，这个领导机构的成员还有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和周恩来。

[110]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 1, pp. 656-657;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2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Григорьев А. М.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Китая в начальный период совет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июль 1927 г. - сентябрь 1931 г.). М., 1976. С. 14-16.

[111]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II. М., 1999. С. 73, 75.

[112] Письма И. В. Сталина В. М. Молотову 1925—1936 гг.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 1995. С. 115.

[113]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I. С. 503, 505.

[114]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II. С. 72-74.

[115] Бубер-Нейман М. Миров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сталинский режим. Записки очевидца о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Коминтерна в 1920—1930-х годах. М., 1995. С. 39.

[116]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 1, pp. 669-670.

[117]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II. С. 72.

[118]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

1949)》，上卷，2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19]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II. С. 160.

[120]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8—1938*, Volume Two of Autobiography of Chang Kuo-t'ao, Lawrence, KS, the Kasas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13;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2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Чэнь Гэн. От Наньчанадо Сватоу // Встуду красные знамена.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очерки о второй граждан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войне). М., 1957. С. 13-20.

[121] 郑当时是湖北省委宣传部长，因而作为湖北代表参加了会议。

[122] 《郑超麟回忆录》，上册，264～265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123]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 1, p. 489.

[124] 多年之后，会议的参加者陆定一称，他是德国人，名叫海因兹·诺伊曼，也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但这个说法不可信。因为苏共政治局是在1927年8月22日才决定派诺伊曼来华的。他抵达中国的时候，已是10月了。

[125] 参见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33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126] 参见《郑超麟回忆录》，149～152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2；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八七会议》，3～4、161～172、175～180、195～201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156～169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Marcia R. Ristaino, *China's Art of Revolution: The Mobilization of Discontent, 1927—1928*,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39-55.

[127] 《八七会议》，57～58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128] 同上书，73页。

[129] 同上书，74页。

[130] 参见上书，44、200页；Цай Хэ-сэнь. История оппортунизма в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С. 68.

[131] 作者对前中共党员王凡西的访谈（英国利兹，1992年7月19日）。

[132]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2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33]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 1, p. 659, Vol. 2, p. 13.

[134]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II. С. 79.

[135] Hsü K'e-hsiang, "The Ma-Jih Incident," Dun J. Li, ed., *The Road to Communism*, p. 91.

[136] 《八七会议》，112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137] 参见作者对俄罗斯国立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工作人员 Ю. Т. 图托契金的访谈（莫斯科，2005年12月19日）。

[138] Peng Gongda, "Report on the Progress of the Autumn Harvest Uprising in Hunan," Tony Saich, ed.,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 322;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3, p. 33.

[139]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209～2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40]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15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41]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2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42]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3, p. 39.

[143]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15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44] Peng Gongda, "Report on the Progress of the Autumn Harvest Uprising in Hu-

nan,” p. 323.

[145] Ibid., pp. 326, 325;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3, pp. 39-40.

[146] 有趣的是，差不多同时，我们所熟悉的、当时正在莫斯科的鲍里斯·谢苗诺维奇·弗赖耶尔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提出了建议：没收所有中国地主的土地。当然，毛泽东和罗米纳兹都不知道这一点。

[147]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3, pp. 37-42.

[148] 多年后，毛泽东告诉埃德加·斯诺说：“湖南省委和我军的总纲领，却为党的中央委员会所反对。不过后者似乎只是采取观望的政策，而不是积极反对的政策。”（[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113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149] Peng Gongda, “Report on the Progress of the Autumn Harvest Uprising in Hunan,” pp. 328, 504.

[150] 杨开慧：《偶感》，见萧永义编：《毛泽东诗词对联辑注》，99~100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151] 参见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142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马社香：《红色第一家族》，32~36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Личное дело Юн Шу // РГАСПИ. Ф. 495. Оп. 225. Д. 2799. Л. 4；《毛泽东生活档案》，上卷，93~98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

[152] 当时中共党旗上的锤子普遍被误认为是斧头。

[153] 毛泽东：《西江月·秋收起义》，见萧永义编：《毛泽东诗词对联辑注》，21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154] [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113~114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155] Peng Gongda, “Report on the Progress of the Autumn Harvest Uprising in Hunan,” pp. 328-329.

[156]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 2, pp. 3-35;

Григорьев А. М.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Китая в начальный период совет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С. 39.

[157] [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116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158] 同上书，114页。

[159] Лю Син. До и после «восстания осеннего урожая» // Всюду красные знамена. С. 26.

[160]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225~2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吴秦杰编：《毛泽东光辉历程地图集》，39~40页，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3。

[161]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

[162] 参见《陈毅同志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见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176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Чэнь И]. История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4-го корпуса // Советы в Китае. Сборник материалов и документов. М., 1934. С. 187.

[163] 参见吴秦杰编：《毛泽东光辉历程地图集》，40页，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3。

[164]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2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65] 据她的女儿李敏说，她妈妈的这个名字是她的外婆取的；这个名字显然跟她外婆记得的一句古代流传下来的谚语有关：“桂花迎贵客，明月照金秋。”（参见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149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166] 《郑超麟回忆录》，上册，265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167] 参见上书，155页。

[168] 参见杨瑞广、章学新主编：《任弼时年谱（1904—1950）》，7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Marcia R. Ristaino, *China's Art of Revolution*, pp. 71-72.

[169] 中华民国开国文献编纂委员会、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编：《共匪祸国史料汇

编》，第一卷，569、570页，台北，“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1964。

[170]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3, p. 51; John E. Rue, *Mao Tse-tung in Opposition, 1927—193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84.

[171] Мао Цзэ-дун.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Т. 1. С. 71.

[172]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II. С. 333.

[173] 毛后来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以自嘲的口吻说道：“当了个民主人士，只能当师长了。”[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236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74] Мао Цзэ-дун.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Т. 1. С. 60; 廖盖隆等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增订本）总论·人物》，277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

[175] Титов А. С. Материалы к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иографии Мао Цзэ-дуна. Т. 1. 166.

[176] Мао Цзэ-дун.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Т. 1. С. 60-61;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227～228、236～2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77] Lois Wheeler Snow, *Edgar Snow's China: 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Compiled from the Writings of Edgar Snow*,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1, p. 72.

[178] Agnes Smedley, *The Great Road: The Life and Times of Chu Teh*,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56, p. 10.

[179] Helen Foster Snow (Nym Wales), *Inside Red China*,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77, pp. 113, 116.

[180] Lois Wheeler Snow, *Edgar Snow's China*, p. 73.

[181] Helen Foster Snow (Nym Wales), *Inside Red China*, pp. 110-112.

[182] [美] 埃德加·斯诺：《毛泽东口述

传》，翟象俊译，11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183]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2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Мао Цзэ-дун.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Т. 1. С. 60.

[184]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3, p. 51.

[185]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1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86]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

[187]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3, p. 74.

[188]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

[189] 毛泽东：《西江月·井冈山》，见萧永义编：《毛泽东诗词对联辑注》，23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190] 参见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162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191]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3, p. 57.

[192] 《彭德怀自述》，1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93] 参见上书，115页；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3, p. 149.

[194]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3, pp. 149-151;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261～2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马社香：《红色第一家族》，48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195]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3, p. 151.

[196] 转引自《彭德怀自述》，1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97] Григорьев А. М.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Китая в начальный период совет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С. 107, 121.

[198] 《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3卷，

371~3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99]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VI съезд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М., 1930. Кн. II. С. 80-81.

[200]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VI съезд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М., 1930. Кн. I. С. 98.

[201]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3, p. xli.

[202]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VI съезд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Кн. I. С. 13.

[203] 代表团由八人组成。其中三人（瞿秋白、张国焘和黄平）是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两人（陆定一和刘明佛）是共产主义青年团驻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两人（邓中夏和余飞）是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赤色职工国际是一个国际性的工会组织。

[204] 《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05] 《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06] Мао Цзэ-дун.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Т. 1. С. 99, 87.

[207]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3, pp. 128-129, 163-165.

[208]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VI съезд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Кн. VI. М., 1930. С. 5-6, 8-10.

[209] Пэн Дэхуай. Мемуары маршала. С. 210-212;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斗争大事介绍》，187~191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

[210] Léonard Lévesque, *Hakka Beliefs and Customs*, trans. J. Maynard Murphy, Taichung, Kuang Chi Press, 1969, p. 70.

[211] [美] 埃德加·斯诺：《毛泽东口述传》，翟象俊译，117~11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212] 此说可见廖盖隆等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118、405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此说不确。廖盖隆等编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增订本）总论·人物》第118页对王佐死因的表述是“被诬陷致死”，该书第405页对袁文才的死因的表述是“被诬陷杀害”。——译者注]

[213]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3, p. 351.

[214]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VI съезд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Кн. V. М., 1930. С. 12, 13.

[215]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3, p. 139.

[216] 参见马社香：《红色第一家族》，54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Philip Short, *Mao: A Life*, p. 254；孔东梅：《毛泽东、贺子珍夫妇：为革命痛失五个子女》，载《解放日报》，2005-03-07；文夫、张乃胜：《毛泽东与贺子珍》，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

[217] Tony Saich, ed.,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p. 471-472.

[218]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55、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19] 同上书，56页。

[220] 同上书，56页。

[221]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303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2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3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23] Стратегия и тактика Коминтерна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колониальн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на примере Китая. М., 1934. С. 236-244.

[224]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3, pp. 256, 257, 504.

[225] 转引自《毛泽东文集》，第一卷，2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26]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278~2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227] Ивин А. Советский Китай. С. 144.

[228] Личное дело Лю Цзилана [Аньгуна] // РГАСПИ. Ф. 495. Оп. 225. Д. 1656; 廖盖隆等编：

《毛泽东百科全书》，第三卷，1401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274～2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229]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30]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31] 参见《陈毅同志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176～193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232] *Ивин А. Советский Китай. С. 43-44.* 括弧内的内容是引者加的。

[233]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2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234] 参见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168～169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235] 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见萧永义编：《毛泽东诗词对联辑注》，96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李淑一是杨开慧的朋友，她的丈夫柳直荀是湖南农民协会书记，1932年9月在一场战斗中牺牲（此说不确，柳直荀是被夏曦在湘鄂西苏区的肃反中杀害的。——译者注）。1933年夏，在得知丈夫牺牲之后，李淑一写了一首基调悲伤的诗。她没有发表过这首诗，但在《诗刊》杂志上首次看到公开发表的毛的一些诗词之后，她在1957年1月把这首诗寄给了毛泽东。李淑一当时是长沙市一所中学的语文教师。

[236] 根据中国传说，古代天有九重，第九重天最高。

[237] 吴刚，古代神话人物，被天帝惩罚在月宫伐桂树。

[238] 嫦娥，古代神话人物，月亮上的仙女。

[239] 指国民党的灭亡。

[240] 《毛泽东书信选集》，2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241] 同上。

[242] 转引自《郑超麟回忆录》，230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2。

[243] Alexander Pantsov, Chen Duxiu (1879—1942), *Collier's Encyclopedia*, Vol. 6, New York, 1996, pp. 180-180A.

[244] 毛泽东：《采桑子·重阳》，见萧永义编：《毛泽东诗词对联辑注》，29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245] 《毛泽东书信选集》，2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246] *Мао Цзэ-дун.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Т. 1. С. 109-155.*

[247] 参见王凡西：《双山回忆录》，116～117页，香港，周记行，1977。

[248]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II. С. 457.

[249] 墨西哥元与中国的货币“银元”在当时的中国同时流通，二者的兑换率是一比一。

[250] *Мао Цзэ-дун.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Т. 1. С. 1048, 1075.* 当时1美元相当于银元3.6元。

[251] 参见杨奎松：《走向破裂：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189页，香港，三联书店，1999。

[252] Правда. 1929. 29 декабря.

[253] 顺直是一个历史地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河北和天津、北京所在的区域。

[254] 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15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255] Hsiao Tso-liang, *Power Rela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30—1934*, Vol. 2,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7, pp. 26-29.

[256] 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57] 指蒋介石和广西军阀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在1929年3月爆发。

[258] 出自唐朝著名作家沈既济（750—800）的《枕中记》，它讲的是一位年轻人卢生在道人吕洞宾送给他的枕头上睡着了。卢生在梦中梦到自己飞黄腾达。但在醒来后，他才发觉原来一场梦，梦醒的时候店主人煮的黄粱饭还没有熟呢。毛泽东通过这个典故想表达的意

思是，蒋介石和军阀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是无谓的，中国的命运不会因此而有任何改变。

[259] 汀江是流经福建和广东省西部的一条河，龙岩和上杭是福建省西部的两个县。

[260] 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见萧永义编：《毛泽东诗词对联辑注》，26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261] 宁化、清流、归化是福建西部的三个县。

[262] 毛泽东：《如梦令·元旦》，见萧永义编：《毛泽东诗词对联辑注》，31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263]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02、1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

[264]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3, p. 261.

[265]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98、1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

[266] 赣江是江西西部的一条河。

[267] 毛泽东：《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见萧永义编：《毛泽东诗词对联辑注》，33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268] Григорьев А. М.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Китая в начальный период совет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С. 308, 309.

[269] 然而，他和同样没有与会的朱德都缺席当选为会议的名誉主席。

[270]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128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271] 在汉语中，“万”象征“长”或“大”。“万丈长缨”典故出自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汉朝著名外交家终军（公元前133—前112）想用一条长带子把不服从汉朝的南越王绑起来带回朝廷。

[272] 《庄子》中谈到的一种巨大的神鸟。

[273] 赣水是赣江的另一个名称。

[274] 黄公略（1898—1931），30年代初任红一方面军第四军军长，1931年9月15日在战斗中牺牲。

[275] 毛泽东：《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见萧永义编：《毛泽东诗词对联辑注》，35页，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276] 朱德任第一方面军的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毛任总政治委员。

[277]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3, pp. 455-502, 508-523, 529-532;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310~3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88~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Пэн Дэхуай. Мемуары маршала. С. 219-231; Советы в Китае. С. 201-211; Всюду красные знамена. С. 50-51.

[278] Григорьев А. М.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Китая в начальный период совет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С. 338.

[279] 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3, p. 459.

[280] Ibid., pp. 234-236;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2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281]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

第五篇 领袖的诞生

[1]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II. С. 1273.

[2] Там же. С. 939.

[3]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и кита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 204, 205.

[4]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II. С. 1019.

[5] Там же. С. 1029, 1037; 张秋实：《瞿秋白与共产国际》，314~317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6]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远东处（源于德语）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地区部门，组建于1926年。

[7]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 2, p. 86.

[8] 斯大林已于7月底任命他担任远东局

书记。

[9] 参见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145～146页，北京，红旗出版社，1983。

[10] Мэн Циншунь.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Ван Мине (рукопись). С. 66-67.

[11] Hsiao Tso-liang, *Power Rela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1930—1934: A Study of Document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7, pp. 125, 128.

[12] Ван Ми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2. М., 1984. С. 169.

[13] Запись беседы гг. Чжоу Эньлая, Чжэн Лина [Жэнь Биши] и [Г. И.] Мордвинова 16 ноября 1939 года //РГАСПИ. Ф. 495. Оп. 225. Д. 71. Т. 1. Л. 35.

[14] 李立三在莫斯科的生活可谓是跌宕起伏。尽管他一到共产国际就立刻“投降”了，为所有他犯过或没犯过的错误痛批自己，斯大林仍不打算原谅他。李一直处在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和共产国际的监视之下，他们给他起了个化名亚历克山德罗·拉平，把他派到苏联的一家工厂，让他像普通工人一样参加劳动。过了几个月后，他才恢复政治生活。1931年8月，他重新化名李明，被派往莫斯科的国际列宁学校学习。六个月后，他成了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成员，并开始兼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1935年7、8月间，他甚至同其他几个中共党员一起成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接着，他被任命为苏联国际工人出版社中文部主任，兼任共产国际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的主编。最坏的时期似乎已经过去了。已经结过两次婚的李在莫斯科又结婚了，他娶了个迷人的俄罗斯姑娘艾丽扎维塔·帕夫罗夫娜·季斯基娜。1937年秋天，他又受到新的指控。中共代表团这次指控作为编辑的李在“将审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材料译成中文时进行了歪曲”，损害了党的利益。这次审判中的一个主要被告是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的前校长卡尔·拉狄克。1938年2月25日，李被开除党籍，并被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关押起来。报复心强的斯大林仍

把他看做敌人。他在狱中受到严刑拷打，要他承认自己是日本间谍。但六个月后的1939年11月4日，他突然被释放了，甚至恢复了职位，但仍不允许他回国。

[15]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II. С. 817, 1079-1080, 1139, 1323.

[16]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и кита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 205.

[17] Ивин А. Очерки партизан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Китае 1927—1930 гг. М.; Л., 1930. С. 90.

[18]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II. С. 48, 1067.

[19] Там же. С. 1108-1109.

[20] 即刘安恭。

[21] 毛在大革命时期(1924—1927)把他家的地租用于支持湖南的农民运动。——埃德加·斯诺原注

[22] [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12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23]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4]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毛不会宣布与这些乡村流氓断绝关系。有时候，出于策略考虑，他不得不这么做。例如，1930年6月，在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和赣西特委会的一次联席会议上，为防止别人再指责他坚持“流氓无产者意识”，他在有关“流氓”问题的决议上加上了一段话：“红军和赤卫队在夺取政权和保卫政权中是革命群众的重要工具……不允许流氓掺杂进这些组织。”(Stuart R.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3, p. 453)但这条规定一钱不值，根本无法执行。1930年，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的估计，红军主要是由这些社会底层人员组成的。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II. С. 817.

[25] Stuart R.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3, pp. 636-639.

[26] [Лю Шици]. Советский район юго-западной Цзянси в 1930 г. (Доклад инструктора

ЦК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от 7 октября 1930 г.) // Советы в Китае. С. 237.

[27] 《前委开除江汉波党籍决议》(1930年4月4日),见江西省档案馆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576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

[28] [Лю Шици]. Советский район юго-западной Цзянси в 1930 г. С. 227-244;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II. С. 1272-1274; 《陈毅同志关于朱毛军的历史以及现状的报告》,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192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35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Mary S. Erbaugh,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Hakkas: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s a Hakka Enterprise,"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2 (1992), pp. 937-938; Stephen S. Averill, "The Origins of the Futian Incident," Tony Saich and Hans J. Van de Ven,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Armonk, NY and London, M. E. Sharpe, 1995, pp. 79-115.

[29]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II. С. 1349, 1368.

[30]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330~3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Philip Short, *Mao: A Life*, p. 257.

[31] 1930年12月30日,龙冈村附近爆发了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国民党“围剿”部队被打败,师长张辉瓒当了俘虏。

[32] 毛泽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见萧永义编:《毛泽东诗词对联辑注》,38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不周山是神话中的一座山,传说它被中国古代的一位英雄共工推翻。共工“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在对这首诗的最后一句进行评论的时候,毛写道:“共工是胜利的英雄……他死了没有呢?没有说。看来是没有死,共工是确实胜利了。”(转引自季世昌、

徐四海:《独领风骚——毛泽东诗词鉴赏》,18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33] 白云山位于江西省西南部,红军曾在这里进行过防御。

[34] “飞将军”是汉朝名将李广的绰号,他在与北方的匈奴人的战争中屡立战功。这里指代红军。

[35]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II. С. 1147, 1258, 1273.

[36] 转引自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163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37] 在加入中共之前,他在上海就从事这个职业。

[38]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 2, p. 175.

[39] Frederick S. Litten, "The Noulens Affair,"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8 (1994), pp. 492-512; Frederic Wakeman, Jr., *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p. 151-160, 253-254; 聂荣臻:《红星内部——聂荣臻元帅回忆录》,97~98、104~106页,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83。

[40]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V. М., 2003. С. 146.

[41] 参见杨奎松:《走向破裂——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189页,香港,三联书店,1999。

[42] 时为政治局委员。

[43] 时为中央委员。

[44] 真名张宗可,时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

[45] 米夫的一个学生,俄语化名伊凡·尼古拉耶维奇·伊兹梅洛甫,真名张闻天。

[46] 也是米夫的一个学生,俄语化名斯拉文。

[47] 即中央委员会特别工作委员会。

[48] Запись беседы гг. Чжоу Эньлая, Чжэн Лина [Жэнь Биши] и [Г. И.] Мордвинова 16 ноября 1939 года. Л. 33-34; Frederic Wakeman, Jr., *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 p. 156.

[49] 在各种文献中这一机构的名称不同。

多数情况下被称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因为1931年9月改组的主要对象是党的这个领导核心，而不是整个中央委员会。

[50] 参见力平、马芷荪主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21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51] 有趣的是，60年代中期，全国许多省突然冒出了几十个“毛岸龙”，不过，这些冒充者很快就被无所不知的安全机构戳穿了。

[52] Li Chongde, "Escorting Mao Zedong's Sons to Shanghai," *Mao Zedong: Biography, Assessment, Reminiscences*, pp. 222-226; 朱维阳：《钱希均和毛泽民》，见《人物春秋》编委会编：《毛泽东的家事》，14~15页，北京，春秋出版社，1987；一鸣：《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幼稚园》，载《新民晚报》，2004-06-13；《毛岸英三兄弟在上海时的情况》，载《新民晚报》，2004-12-23；马社香：《红色第一家族》，136~137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V. С. 1052.

[53] 参见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163页，北京，红旗出版社，1983。

[54] Смедли А. Рассказы о китайской красной армии. М., 1935. С. 314-315.

[55] 该法并没有直接说要没收（富农以外的）农民的土地，但是，对于不仅要没收地主的土地而且要没收那些“自食其力”的“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的规定，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没收所有农民的土地。地主都不劳动，只有农民才劳动。“大”的意思在这里是人人都是很清楚的：对穷困潦倒的乡村游民来说，任何有土地的人都是“大”土地所有者。

[56] 参见《邓中夏文集》，6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II. С. 1152, 1159, 1201, 1231-1232, 1237, 1282, 1432.

[57] Hsiao Tso-liang, *Power Rela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1930—1934*, Vol. 2, pp. 382-389.

[58]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319、320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59]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II. С. 893, 938, 939, 940.

[60] Hsiao Tso-liang, *Power Rela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1930—1934*, Vol. 2, pp. 391-407;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28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61]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3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62]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3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164页，北京，红旗出版社，1983；《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届领导成员名录》，48~52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63] 转引自力平、马芷荪主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22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64] 转引自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3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65] 参见上书，364页；金冲及编：《毛泽东传（1893—1949）》，290~29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Ван Сун [Лю Ялоу], Ли Тин [Линь Бяо] и Чжоу Ден [Мао Цзэминь]. Доклад Генеральному секретарю ИККИ Г. Димитрову. 8 января 1940 г. Л. 48.

[66] “关东”这个地名最初是指中国东北最南端的辽东半岛，大连和旅顺这两座城市就在那里。在日俄战争胜利后的1906年8月1日，日本政府在这个半岛组建了关东军，以保卫日本在此新获得的权益，尤其是保卫日本四个月后就开始建设的“南满铁路”。

[67] Ли Жуй-лунь. Восстание в Нинду// Всплуду красные знамена. С. 52-58.

[68]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3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69] 参见文夫、张乃胜：《毛泽东和贺子

珍》，75~79页，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3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29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70] Правда. 1930. 2 декабря.

[71]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и кита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 234.

[72] Там же. С. 240, 242;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V. С. 96.

[73]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V. С. 100-102.

[74] 《彭德怀自述》，1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75] Donald A. Jordan, *China's Trial by Fire: The Shanghai War of 1932*,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

[76] 《彭德怀自述》，1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77] Советы в Китае. С. 454-456; Stuart R.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 Vol. 4, Armonk, NY and London, M. E. Sharpe, 1999, pp. 209-214.

[78] 参见《聂荣臻回忆录》，上册，138~154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3。

[79] 这份电报相当含混。你可以感觉到，中央局成员自己都不完全理解临时政治局想让他们干什么，但是他们非常想表现自己的忠诚。“不用说，”他们写道，“我们必须与李立三的进攻大城市的冒险主义路线作斗争。但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有利。我们必须与过分害怕进攻大城市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情况就是这样。你能从中得出什么结论？

[80]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V. С. 146-147. 括弧内的内容是引者加的。

[81] “过去”一词意指毛泽东领导时期。

[82]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3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83]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V. С. 153.

[84] Там же. С. 158.

[85] Там же. С. 159.

[86]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3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届领导成员名录》，58~61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87] 王出生在皖南的一个村庄里。

[88]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3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89] Беседа [Г.И.] Мордвинова с т. Чжоу Эньлаем 4 марта 1940 г. Л. 34; Мао Цзэдун няньпу. 1893—1949. Т. 1. С. 378-379; 力平、马芷荪主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227~22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90]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379~3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91] Ван Сун [Лю Ялоу], Ли Тин [Линь Бяо] и Чжоу Деня [Мао Цзэминь]. Доклад Генеральному секретарю ИККИ Г. Димитрову. 8 января 1940 г. Л. 49;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V. С. 146-148, 152-153, 158-159, 193; Личное дело Мао Цзэдуна // РГАСПИ. Ф. 495. Оп. 225. Д. 71. Т. 3. Л. 176-179.

[92] Ван Сун [Лю Ялоу], Ли Тин [Линь Бяо] и Чжоу Деня [Мао Цзэминь]. Доклад Генеральному секретарю ИККИ Г. Димитрову. 8 января 1940 г. Л. 49.

[93] 指前线。

[94]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V. С. 187-188. 括弧内的内容是引者加的。

[95] 参见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30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96] 参见上书，309页。

[97]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V. С. 191, 192.

[98] 转引自王行娟：《贺子珍的路》，17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85。

[99] 转引自孔东梅：《毛泽东、贺子珍夫妇：为革命痛失五个子女》，载《解放日报》，2005-03-07。

[100]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V. С. 194, 223, 225.

[101] 参见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188页，北京，红旗出版社，1983。

[102]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V. С. 199.

[103]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3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Запись беседы гг. Чжоу Эньляя, Чжэн Лина [Жэнь Биши] и [Г. И.] Мордвинова 16 ноября 1939 года. Л. 34。

[104]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3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05]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V. С. 295, 298, 309, 323.

[106] 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о провалах и провокациях в централь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ях КП Китая в Шанхае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три года и о деле «Особого отдела» // РГАСПИ. Ф. 495. Оп. 74. Д. 299. Л. 1-60; Frederick S. Litten, *The Noulens Affair*, pp. 492-512.

[107]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31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08] 参见文夫、张乃胜：《毛泽东与贺子珍》，91页，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

[109] Deng Xiaoping, *My Father Deng Xiaop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5, pp. 210-217.

[110] 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167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111] 转引自王行娟：《贺子珍的路》，175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85。

[112]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33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13] 指彩虹。

[114] Браун О. Китайские записки (1932—1939). С. 108-109.

[115]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V. С. 1145.

[116] Там же. С. 1132.

[117] Там же. С. 1146.

[118]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II. С. 1306-1327; Т. IV. С. 103-104.

[119]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V. С. 243, 427.

[120] Браун О. Китайские записки (1932—1939). С. 67-68.

[121] 参见巴维尔·米夫主编的以下图书的清样：《Советы в Китае.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 Сборник второй》（М.，1935），С. 183-258。由于共产国际在斯大林影响下于1935年做出的重大的政策调整的缘故，这本书一直未能出版。作者个人收藏有此书的一本清样。

[122] 参见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198页，北京，红旗出版社，1983。

[123]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II. С. 49.

[124]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V. С. 585. 括号内的话是引者加的。

[125] Там же. С. 586.

[126]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33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27]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1934. № 20-21. С. 24-29; № 23. С. 32-51; За рубежом. 1934. № 27 (59). С. 1, 4-9; Мао Цзэ-дун. Только советы могут спасти Китай. Доклад на II-м съезде Советов Китая. М.; Л. 1934; Он ж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и итоги проверки раздела земли в Китайской Совет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е (Избранные речи и статьи). М.; Л., 1934.

[128] Правда. 1930. 11 февраля.

[129]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V. С. 693.

[130] 参见《聂荣臻回忆录》，上卷，187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3；*Браун О.* Китайские записки (1932—1939). С. 57-61, 104; Violet Cressy-Marcks, *Journey into China*,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1942, p. 166.

[131] *Мао Цзэ-дун.*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Т. 1. М., 1952. С. 404-405; *Мао Цзэ-дун.*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я. Стихи. С. 78-79; *Браун О.* Китайские записки (1932—1939). С. 61, 99-100.

[132]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V. С. 602.

[133] Там же. С. 614.

[134]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4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35] *Браун О.* Китайские записки (1932—1939). С. 106.

[136]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V. С. 613.

[137] 毛泽东：《清平乐·会昌》，见萧永义编：《毛泽东诗词对联辑注》，46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138] 张戎与琼·哈里戴认为，长征的想法出自于毛本人。（*Чжан Юн, Холлидей Джон.* Неизвестный Мао. С. 134.）这种说法完全不合事实。

[139] Helen Foster Snow (Nym Wales), *The Chinese Communists: Sketches and Autobiographies of the Old Guard*, Westport, CT., Greenwood Pub. Co., 1972, pp. 245, 246.

[140] 参见文夫、张乃胜：《毛泽东与贺子珍》，95～97页，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马社香：《红色第一家族》，323～324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141]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435～4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Браун О.* Китайские записки (1932—1939). С. 112-11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344～345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Великий поход 1-го фронта Китайской рабоче-*

крестьянской красной арми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М., 1959. С. 43.

[142] 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о провалах и провокациях в централь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ях КП Китая в Шанхае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три года и о деле «Особого отдела». Л. 30-32.

[143] *Браун О.* Китайские записки (1932—1939). С. 122.

[144] Mary S. Erbaugh,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Hakkas*, pp. 937-968.

[145] 秦邦宪的化名“博古”也是这样来的，它源于他的俄语姓氏“博古雷洛夫”的头两个字。

[146] Alexander Pantsov and Steven I. Levine, *Chinese Comintern Activists: An Analytic Biographic Dictionary* (manuscript), pp. 533-535; Helen Foster Snow (Nym Wales), *Inside Red China*, pp. 227-229.

[147] 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 *Мао*, p. 144.

[148] 《遵义会议文献》，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49] 参见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342～34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434～4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50] *Браун О.* Китайские записки (1932—1939). С. 98.

[151] 参见《聂荣臻回忆录》，上卷，246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3；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41、111～114页，人民出版社，1985。

[152] *Великий поход 1-го фронта Китайской рабоче-крестьянской красной армии.* С. 64, 65-66.

[153] 参见《聂荣臻回忆录》，上卷，246～247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3。

[154] 参见上书，246页。

[155] *Браун О.* Китайские записки (1932—1939). С. 134-141；《遵义会议文献》，116～117页，人民出版社，1985；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35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杨尚昆回忆录》，117～121页，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156] Письмо Ли Тина (Линь Бяо) в Отдел кадров ИККИ и ИКК от 29 января 1940 г. // РГАСПИ. Ф. 495, Оп. 225. Д. 53. Т. 1. Л. 180.

[157]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35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58] 参见《遵义会议文献》，1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许多年之后的1966年10月，毛泽东在回忆遵义会议的时候特别指出周恩来和朱德起到的“积极作用”：“若无他们当时就糟了。”

[159] Браун О. Китайские записки (1932—1939). С. 141.

[160] 参见《张闻天选集》，37～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61] 参见《遵义会议文献》，42～43、132～1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62] 转引自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170～171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163] 指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高级党校校长董必武。他在过去曾保护过贺子珍的妹妹贺怡。

[164] 参见孔东梅：《毛泽东、贺子珍夫妇：为革命痛失五个子女》，载《解放日报》，2005-03-07。

[165] 《遵义会议文献》，1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66] 参见力平、马芷荪主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28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67] 参见《遵义会议文献》，134～135页，人民出版社，1985；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36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168] 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见萧永义编：《毛泽东诗词对联辑注》，50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169] Браун О. Китайские записки (1932—1939). С. 151.

[170] 参见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172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根据李敏

此书的记载，贺子珍体内的弹片是17块。——译者注）

[171] Браун О. Китайские записки (1932—1939). С. 154, 155.

[172] Там же. С. 164.

[173]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 2, pp. 377, 378.

[174] Личное дело Лю Тина // РГАСПИ. Ф. 495. Оп. 225. Д. 3078. Л. без №.

[175] Stuart R.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 Vol. 5, Armonk, NY and London, M. E. Sharpe, 1999, p. xlii; Браун О. Китайские записки (1932—1939). С. 167-168; Титов А. С. Из истории борьбы и раскола в руководстве КПК 1935—1936 гг. М., 1979. С. 39-40.

[176] Вагнер К. О. (Браун О.). Справка о Чжан Готао и событиях 1935—36 гг. // РГАСПИ. Ф. 495. Оп. 4. Д. 298. Л. 75; Браун Отто. Китайские записки (1932—1939). С. 171-172.

[177]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462～4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78] Lois Wheeler Snow, *Edgar Snow's China*, p. 95.

[179]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463～4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Stuart R.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5, p. xliv.

[180] Браун О. Китайские записки (1932—1939). С. 183-184.

[181]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4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82] 参见上书，471页；Вагнер К. О. (Браун О.). Справка о Чжан Готао и событиях 1935—36 гг. Л. 77.

[183] Stuart R.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5, p. xlvii.

[184]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475～476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85] 张戎和琼·哈里戴称“毛和其他主要领导人长征前就知道有这个根据地”，但是他们没有提出这种说法的证据。与此同时，他们声称，共产党人往陕北的长征完全是由蒋介石策划的(?!)。Чжан Юн, Холлидей Джон. Неизвестный Мао. С. 149-150, 179.

[186] 转引自《聂荣臻回忆录》，上册，282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3。

[187] Stuart R.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5, p. 36;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481~4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88] 五岭山是横跨贵州和云南的一座山。

[189] 岷山山脉横亘在川青甘边界一带。

[190] Вагнер К. О. (Браун О.). Справка о Чжан Готао и событиях 1935—36 гг. Л. 76-77.

[191]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4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92] Вагнер К. О. (Браун О.). Справка о Чжан Готао и событиях 1935—36 гг. Л. 77-78.

[193] Браун О. Китайские записки (1932—1939). С. 177, 193-194.

[194] Agnes Smedley, *China Fights Back: An American Woman with the Eighth Route Army*, New York, The Vanguard Press, 1938, pp. 8-9, 19-20; Janice R. MacKinnon and Stephen R. MacKinnon, *Agnes Smedley: The Life and Times of an American Radical*,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 183.

[195] 参见吴秦杰编：《毛泽东光辉历程地图集》，62页，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3。

[196]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 2, p. 474.

[197] 张国焘的屈服意味着不仅张的红四方面军的余部成了毛的部队，贺龙和任弼时的第二方面军的部队也成了毛的部队。贺龙的部队从湘鄂边界的老根据地出发，历经艰险，于1936年6月到达西康与张国焘的部队会师。

[198] 在这一问题上，莫洛托夫在回忆录中有着直率得令人吃惊的坦白，参见 Чуев

Ф. Сто сорок бесед с Молотовым. Из дневника Ф. Чуева. М., 1991.

[199] 参见《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载《救国时报》，1935-08-01。

[200] 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1184~119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201] 参见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关系（1920—1960）》，420页，台北，三民书局，1997。

[202] Ван Сун [Лю Ялоу], Ли Тин [Линь Бяо] и Чжоу Денъ [Мао Цзэминь]. Доклад Генеральному секретарю ИККИ Г. Димитрову. 8 января 1940 г. Л. 53.

[203] Там же.

[204]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II. С. 49.

[205] 参见青石（杨奎松）：《共产国际压制毛泽东了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载《百年潮》，1997（4）。

[206] Туттов А. С. Материалы к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иографии Мао Цзэ-дуна. Т. 2. М., 1970. С. 137.

[207] Личное дело Мао Цзэдуна // РГАСПИ. Ф. 495. Оп. 225. Д. 71. Т. 1. Л. 242-243.

[208] Там же. Д. 6. Т. 1. Л. 62, 63.

[209] Туттов А. С. Материалы к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иографии Мао Цзэ-дуна. Т. 2. С. 613.

[210] Там же. С. 619.

[211]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1935. № 33-34. С. 83-88.

[212] 亚·莫·哈马丹的真名为法因加尔，是个犹太人，1908年出生在杰尔宾特。离开《真理报》后，他被调到《新世界》担任副总编辑。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他是塔斯社的记者。哈马丹命运悲惨。1942年，他被克里米亚半岛塞瓦斯托波尔市的纳粹关押。他化名米哈伊洛夫在战俘营从事地下工作，后被送入监狱，1943年5月被处决。

[213] Хамадан Ал. Вождь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Мао Цзэ-дун // Правда. 1935. 13 декабря.

[214] Хамадан Ал. Вожди и герои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М., 1936.

[215] Личное дело Чжан Хао (Ли Фушэн) //

РГАСПИ. Ф. 495. Оп. 225. Д. 2850; 汪幸福:《林氏三兄弟:林育英、林育南、林彪》, 73~75页,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4。

[216] 《毛泽东文集》, 第一卷, 372~373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217] 参见《张闻天选集》, 66~70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 上卷, 278~279、286~287页,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

[218] 参见《毛泽东文集》, 第一卷, 374~375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219] 参见《张闻天选集》, 上卷, 71~79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毛泽东文集》, 第一卷, 376~377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220]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33~134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9。

[221] Harriet Sergeant, *Shanghai*, p. 5.

[222] James Bertram, *Crisis in China, the Story of the Sian Mutiny*, London, Macmillan & Co., 1937, p. 108.

[223]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 2, pp. 474-475.

[224] 《毛泽东文集》, 第一卷, 390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225] 埃德加·斯诺于1905年7月19日生于密苏里州堪萨斯市。

[226] Edgar Snow, *Journey to the Beginning*,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8, pp. 147-156; Helen Foster Snow, *My China Years*, New York, Morrow, 1984, pp. 178-183; Thomas S. Bernard, *Season of High Adventure: Edgar Snow in China*, Berkeley, Calif., etc., 1996, pp. 131-132, 356-357; John Maxwell Hamilton, *Edgar Snow: A Biography*,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67-69, 303-304; Janice R. MacKinnon and Stephen R. MacKinnon, *Agnes Smedley: The Life and Times of an American Radical*, p. 73.

[227] Димитров Г. Дневник (9 март 1933—6 февруари 1949). София, 1997. С. 117. 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用俄语撰写的“日记”的档案文本, 参见 РГАСПИ. Ф. 146. Оп. 2. Д. 2-16; 关于宋庆龄“跟共产党员差不多”的说法,

参见 РГАСПИ. Ф. 146. Оп. 2. Д. 3. Л. 28。

[228] 在1926—1927年, 鲍罗廷甚至称宋庆龄为“国民党左派中唯一的男子汉”。

[229] 参见毛泽东:《沁园春·雪》, 见萧永义编:《毛泽东诗词对联辑注》, 63~64页,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1。这首词发表于1958年, 发表时毛对这首词做的自注是:“雪:反封建主义, 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 只能如是, 须知这也是写诗啊! 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 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 是指无产阶级。”(同上书, 64页。)

[230] 在陕西和山西两省边界黄河是从北向南流的。

[231] 指陕西和山西的高原。

[232] 毛最初写的是“腊象”。

[233] 分别指的是唐朝第二位皇帝唐太宗(626—649年在位)和宋朝第一位皇帝宋太祖(960—976年在位)。

[234] [美]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董乐山译, 50、53页,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8。

[235] 斯诺后来解释说, 毛的发笑缘于翻译错误。翻译把他提出的这个问题误译为:“您有几个妻子?”——毛在看过问题清单之后回答说:“废除一夫多妻制是我们为实现男女平等而制定的法律的基础。”

[236] 斯诺所说的这些传说包括1930年春出现的毛泽东死讯。在这年的3月20日, 共产国际的出版物《国际新闻通讯》发表了一篇悼词, 说毛由于慢性肺炎死在福建前线。

[237] [美]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董乐山译, 84~85页,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8。

[238] Edgar Snow, *Journey to the Beginning*, p. 163.

[239] Ibid., p. 165.

[240]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V. С. 1068; Jonathan Fenby *Chiang Kai-shek*, p. 279.

[241]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V. С. 1055-1058.

[242] РГАСПИ. Ф. 146. Оп. 3. Д. 3. Л. 25;

Димитров Г. Дневник. С. 117.

[243]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и кита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 266-269.

[244] РГАСПИ. Ф. 558. Оп. 11. Д. 187. Л. 24.

[245] Stuart R.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Vol. 5, pp. 323-332.

[246] Ibid., p. 334.

[247] РГАСПИ. Ф. 146. Оп. 2. Д. 3. Л. 28; Димитров Г. Дневник. С. 117.

[248]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p. 409.

[249] 抓蒋的主意是杨虎城出的，但决定是张学良做出的。

[250] 蒋自1928年起就是中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

[251] James Bertram, *Crisis in China*, pp. 134-137; [美]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298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252] 参见唐培吉：《中国历史大事年表·现代史卷》，320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Chiang Kai-shek, "The Day I Was Kidnapped," Dun J. Li, *The Road to Communism*, pp. 135-141.

[253] 《叶子龙回忆录》，38~3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254] Браун О. Китайские записки (1932—1939). С. 247.

[255] Edgar Snow, *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 (1936—1945)*, Cambridge, Mass., 1957, p. 1.

[256]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621~6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257]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 2, p. 480.

[258] Philip Short, *Mao: A Life*, p. 347.

[259]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 2, p. 481.

[260] РГАСПИ. Ф. 146. Оп. 2. Д. 3. Л. 29;

Димитров Г. Дневник. С. 118.

[261] Там же.

[262] Там же.

[263] Там же.

[264]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и кита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 270.

[265] Philip Short, *Mao: A Life*, pp. 719-720;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43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266] Chiang Chung-cheng (Chiang Kai-shek), *Soviet Russia in China*, Tran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Madame Chiang Kai-shek. Revised, Enlarged Edition, with Map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Cudahy, 1958, p. 79.

[267]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43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268]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6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269] Галицкий В. П. Цзян Цзинго: трагедия и триумф сына Чан Кайши. М., 2002. С. 176-177.

[270]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и кита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 270-271.

[271] Там же. С. 272; РГАСПИ. Ф. 146. Оп. 2. Д. 3. Л. 25, 41; Димитров Г. Дневник. С. 122.

[272] 参见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650~6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273] 参见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55~56页，延安，解放社，1939。

[274] 参见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4~5、42~43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275] 转引自《叶子龙回忆录》，4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2-5492号

在研究毛泽东的海外文献中，潘佐夫的这本书堪称迄今为止有关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关系的最具权威性的文本。这本书还颠覆了西方汉学界流传已久的一个神话：毛泽东“夺取政权的亚洲式道路”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关系。

罗斯·特里尔

美国著名汉学家，《毛泽东传》作者

这是一部全面、有见地和有着丰富的历史细节的作品。……这部传记的一大特点是，广泛地使用了新材料，特别是非常珍贵、卷帙浩繁的苏联史料。潘佐夫对俄文档案的利用显然要比张戎和哈里戴彻底。他对英文、中文和俄文文献同样熟稔。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教授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